

目录

[前言 8](#_Toc55383725)

[第一章 波蘭（上） 11](#_Toc55383726)

[第二章 波蘭（下） 36](#_Toc55383727)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59](#_Toc55383728)

[第四章 匈牙利 87](#_Toc55383729)

[第五章 羅馬尼亞 116](#_Toc55383730)

[第六章 保加利亞 150](#_Toc55383731)

[后記 175](#_Toc55383732)

[致謝 177](#_Toc55383733)





【美】伊娃·霍夫曼　著

胡洲賢　譯

回訪歷史：新東歐之旅

南京大學出版社

·南京市漢口路22號·

EXIT INTO HISTORY: A JOURNEY THROUGH THE NEW EASTERN EUROPE by EVA HOFFMAN

Copyright © Eva Hoffman 199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回訪歷史 : 新東歐之旅 / (美) 伊娃·霍夫曼 (Eva Hoffman) 著 ; 胡洲賢譯. ——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305-20677-1

Ⅰ. ①回… Ⅱ. ①伊… ②胡… Ⅲ. ①東歐－概況

Ⅳ. ①K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72713號

南京大學出版社

　　南京市漢口路22號　郵政編碼：210093

　　網址：www.njupco.com

責任編輯：盧文婷

特邀編輯：劉廣宇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陳基勝



# 前言

就像一個人生命中所有重要抉擇一樣，引發這個決定的誘因冥冥中早已天定。當1989年東歐的革命開始如一串強烈撥彈的琴弦回響之時，我就知道這是我想要親自見證的歷史事件。

“東歐”之于我，是有著私人聯結的強烈概念。我在波蘭（Poland）出生，在那里上小學，并接受密集的政治及情緒的早期教育。盡管甫一成年就移民，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波蘭，或者延伸來說，東歐，一直是我心中那片理想大地。因為我愛過它，失去過它，也因為與它草草切割分離，因此無可回避地，它就如同一片牢牢攫住我想象力的大地，承載著童年的歡愉、柔情、活力與人性的溫暖。

很大程度上，東歐實際上也始終陪伴在我左右。我在共產主義庇護下的波蘭長大，那個系統在四十多年中為世界很大一部分區域提供了，也可說是強加了主導話語。這套既定的“體系”在幾代人身上強加了一些不容動搖的限制，把整個社會分成相對極端的“我們”和“他們”。在各式各樣的緩和與冷戰、自由與鉗制之間，這一重要劃分的基本元素始終在那里。但在1989年的此刻，這一元敘事戛然而止；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怎么清楚，只知道東歐將會改變，且是徹底的改變，而我想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趕到那里去。這是我長途跋涉背后極端私人的渴望：我想要在“我的”東歐消失前看看它。但這一次，不帶我童年的夢幻和偏見。我想要努力一下，至少試圖了解它原來的風貌，從比較宏觀、比較健全，也比較全面的視角來看。弗洛伊德（Freud）說所謂的幸福，就是童年希望的實現；那么有意義的知識，或許就是童年的好奇獲得了滿足。

但是在我的遠征背后，還有個不那么隱私，但毫無疑問比較任性的沖動。我對那種使世界的眼光突然都集中到東歐的魅力無法無動于衷。很顯然，隨著1989年重要的事件一件件出現，歷史正在那里發生——而我認為這是我見證歷史的機會。我想要近距離地目睹它一天天地發生，了解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轉變對特定人群的生活和心靈有何意義；換句話說，撇開我要去那里一趟的極端私人理由不提，我就是想要在歷史發生的當下親眼見證，捉住活生生的它。

不過想去看任何一個地方原來的模樣，從來都是出了名的困難任務，或許東歐還是舉世最困難之地。我們的精神構造似乎天生就渴望一個想象的“他者”，不管是閃亮亮、精雕細琢和理想化的“他者”，還是一個黑暗、野蠻和駭人的“他者”。東歐在這方面頗符合我們的需要。好幾個世紀以來，它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分割、隔離，而且——考慮到那微不足道的地理距離——對我們而言奇怪地陌生。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作為“他者”、“異國”的替身。當莎士比亞（Shakespeare）想要找個地名來表示非真實的夢幻之地時，便稱其為伊利里亞（Illyria，對照實地，應位于當今的保加利亞〔Bulgaria〕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或是波希米亞海岸（Seacoast of Bohemia，眾所皆知地理上實際是不存在這個地方的）。而當他談及某個屬于我們政治關系外圍的幽暗領土時，他選擇在《哈姆雷特》（Hamlet）的最后粗略地提及波蘭。

真正的東歐地區，其文明和西方世界一樣輪廓鮮明而歷史悠久。大摩拉維亞帝國（The Greater Moravian Empire），也就是現代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1]](#_1_1)的前身，大約建于公元8世紀；第一個保加利亞王國在7世紀就達于巔峰；即使不算政治，波蘭和匈牙利也皆可宣稱自身的社會和文化有一千多年歷史；而羅馬尼亞人則聲稱是達契亞人（Dacian）[[2]](#_2_1)的后裔——太過難以征服的一個民族，以至于羅馬最終勝利后一慶祝就慶祝了三十年。然而盡管文明存活了下來，并且保住其特性，歐洲這一區域的國界在過去十個世紀里卻像在一位特別恣意放肆的玩家重新安排的棋盤迷局中，變化無常地漂移。波蘭、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亞在17世紀之前都有過帝國擴張的階段；但最近以來，東歐卻成了東西方帝國爭勝和擴張的競技場。部分是因為其在貿易通道上的位置，部分是因為地理結構，即幾個國家擠在一個相對小的區域里，于是歐洲這一部分的國家遂成為侵略、殖民、強權談判、分割和干脆占領的永恒目標。

那也就難怪這一區域甚少獲得長期的安定和經濟增長，并且在西方世界的想象里，始終都是“另一個歐洲”，相對于我們所認為的那個貨真價實的歐洲，發展得比較弱，比較不文明，也比較動蕩，更充斥著沖突。即便到了現代，在東歐已經變得比較容易進入，也更為人所知時，人們還是傾向于要么視其為原始野蠻之地，要么視其為輕歌劇娛樂的發源。但是，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那些年，東西歐之間的一些隱形屏障開始倒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成為民族國家，出了幾位有代表性的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東歐孕育出來的文明成果作為現代主義的突出部分開始受到賞識；而那些地區的大城市似乎也成了可合理造訪之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緊隨其后的鐵幕的降下，都讓那段間歇中任何可能的滲透驟然縮減，使得東歐在接下來的四十幾年間，隱沒得比過去更暗不可見。東西之間的溝通和旅游皆大范圍地停頓。諷刺的是，在實質距離變得益發微不足道的同時，文化和生活條件的裂縫卻漸次加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西方開始沿著物質發展的道路加速前進時，東歐的經濟卻接近停滯，甚至倒退。而在西方世界不斷經歷各式各樣的民主制度和多元主義時，東歐卻苦于政治煽動和中央集權而陷于實質的停滯。

這幾十年來，東歐再度成為測試西方世界希望、恐懼和誤解的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3]](#_3_1)。對某些人而言，它是理想有望的烏托邦寶庫；對另一些人而言，它是英雄戰區，掙扎對抗邪惡的反烏托邦社會；不過對絕大部分的人而言，我會大膽地揣測，“東歐”已經變成死氣沉沉的單調領土，那里的人民被壓在一個沉重的制度下，彎腰而行。

在那里長大的我知道，實情至少不是后者。我知道在東歐，生活就像其他各處一樣充滿驚喜與多樣化，不可能被簡略或縮減成少數幾個面向。

盡管如此，在踏上旅途之前，對于要看些什么，我還是做了些假定。我當然理解“東歐”這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虛構的，而我旅行所要經過的那些國家有著獨特的歷史、傳統和特性。然而我認為虛構至少是有用的，或許還存有某種程度的史實根據。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真實：那段歷史大部分出于毫無選擇，結果卻不得不大家共同承擔。蘇聯的占領時代創造了東歐，即便這樣的實體過去并不存在。盡管我很清楚目前對于恢復中歐、中東歐和中南歐間的差異的爭論，不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但這對于我的寫作目的來說并不重要。因著單純和方便，大部分時候我都還是將其稱為“東歐”，不過顯然有時“中歐”似乎才是比較正確的用語；這同樣也適用于“巴爾干半島”這個概念。

我決定走訪的五個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都可以合理地被說成古代東歐或者戰后歐洲的一部分；同時它們也是在我到達之時已經發生“革命”的地方。我決定不去那些退出共產主義陣營之后走上不同尋常道路的地方，即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阿爾巴尼亞；我也把東德（民主德國）排除在我的行程之外，因為就歷史上而言，即便在戰后曾是“兄弟”聯盟的一員，但它并非東歐的一部分。

不過盡管我認為將其稱作“東歐”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也知道那其實是一個有其社會和民族多樣性的區域。一致性是過去四十五年強加在東歐身上，并且被最近的事件迅速抹去的神話之一。如今東歐諸國再度呈現出多元化的族群、階層和亞文化，其中許多都熬過了同一性的意識形態而保存下來，且認同——通常還有敵意——依然未變。在探險之旅中，我試著公平對待這些分別和區隔。我既到外圍的小村落，也到主要的大城市；既造訪工廠，也去編輯辦公室；聊天的對象既有農夫、工人和自曝身份的貴族，也接觸了波蘭的猶太人、匈牙利的吉卜賽人和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

盡管并非原先就做好的計劃，但從波羅的海（Baltic）到黑海（Black Sea）的行程我走了兩次。1990年夏天走了一次，1991年夏天又走了一次。部分是因為我非得舊地重游不可，因為我覺得眼看兩次才為實。除了一些特定的印象必須自己再度確認外，也要加深其他的印象，繼續尚未完成的對話，充分感受特定地方的氣息；但重返也讓我得以瞥見一年后“改變”如何在每個國家發生。兩段旅程我都平均分配進每一個章節中。

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途中，我傾聽人民日常生活的敘述。東歐人雖沒有美膳雅（Cuisinart）料理機，可是他們有故事，他們的故事中嵌著歷史，與重復掃蕩這些小國家的騷動事件緊緊糾纏。在東歐，歷史似乎經常更厚實、更緊湊，也更沉重；少有幾人能夠與之脫離，或者完全不受影響。這在過去幾十年共產主義成為一種主導一切的主題時，或許尤其真實。這個主題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充斥于一切，滲透進所有，既是抽象的想法，也是具體的日常現象。無法逃離，也無法忽略在其庇護下所進行的大規模公共事件，或者這些事件對個人所產生的結果。這套體系非常全面系統，其成就之一就是幾乎抹殺了個人和政治之間的區分，而這個結果也絕對會讓人懷疑這種等同是否真的可取。

不管如何，這都意味著個人經歷在東歐往往要比在其他支離破碎得更嚴重的社會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具代表性。顯然個人生活和國家生活在性質上有著天壤之別，然而觀察周遭的社會百態，特定模式的貫穿始終還是讓我深感驚訝：訝異于特定種類的故事在每個國家重復發生的頻率，以及它們反映每個國家的歷史和處境的程度。國家、文化和社會畢竟是有機體，就某個程度而言，部分確實反映了整體。

如果說在東歐，故事比較接近歷史，那它也就比較接近道德劇——這是體制的另一項成就，強迫人民經常要在相當大的壓力下做出困難、冒險和道德上的選擇。幾乎每個人都曾經面對這樣的抉擇：他/她是要支持還是反對；在某一場會議中是要舉手贊成讓某人毀滅，還是袖手旁觀以求自保；是要告發鄰居，簽下危險的請愿書，在一場反猶太人的戰役中默立一旁，還是冒著遭到羈押的危險而抗議。

依我之見，人性在東歐似乎顯得更加強烈，因為在這樣的壓力下，塑型更強烈，畸形也就更強烈。當然，在我碰到的人當中，有我比較喜歡或比較不喜歡的，有比較認同或者比較不認同的；但更常令我感到悸動的，是東歐人在面對改變時的恢復力、沖勁和清醒的自覺。他們苦苦努力以對的障礙是巨大的，人類精力和創造力中的未知因素幾乎讓一切都變得可能。

整個社會是如何一下子推翻所有制度安排的？人們如何適應或許自己曾深惡痛絕，但生活卻又深深受其支配的世界觀的解體？他們如何重置日常和長期的生活方式？在我旅行經過的國家里，改變幾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羅馬尼亞外，也幾乎都是在全面非暴力的情況下完成的，鮮少遭到統治力量的反抗。隨著歷史改變的推演，這是最佳狀況的劇本，是披著最柔軟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在那里發生的更深層的轉化，其實是更戲劇化的，也經常是沒有方向的。因此我所看到的變化后的場景，就是各種調性和情緒的混合、平靜和熱情的紛爭，既樂觀又謹慎；也是不同時代的怪異組合，有點像是新近挖掘和翻轉出來的考古遺址，各年代地層的遺骨都在同一場混亂中被翻上表面。如今東歐飽受各式各樣的過去的糾纏，記憶、失憶和刻意的刪除也在其后緊追不舍。共產時代當然留有大量復雜的遺產，可是早于那個時代的種種也清晰可見。這個系統虛假的統一性一經突破，包納著種種態度、敵意、習俗，甚至是政黨的沉泥便從早前世代整個復活過來——這是“過去”從人為禁錮中掙脫出來后，所做的一種奇妙的重述。

如果說東歐的過去非常活躍，那未來則充滿了不確定性。對于今天發生在東歐的實驗，我們沒有已有的詞匯來稱呼它，也沒有先例可循。我們知道其歷史的重要性；但一旦靠得更近一些，歷史便會分解，粉碎成億萬的日常瑣事。除了高潮的時刻外——有時即便高潮也是如此——我們相對于歷史，依然是司湯達筆下滑鐵盧戰役中的法布里奇奧[[4]](#_4_1)。

在我旅行的時候，東歐雖然身處旋渦的最中心，但從中浮現的模式卻還難以探明。而且，任何觀察者的經驗都會經過他/她自己的視角和偏好的篩選，而所有旅游者也都要仰賴偶然和機遇的垂憐。所以當一本書的主題和范圍如這本書這樣廣泛時，提出的主張就一定要非常謙遜。接下來是對一段特定旅程的記述，也是一個人和一個地區在一個特殊歷史交叉點的遇合——一連串的碰面、交談、反思和印象，如同馬賽克碎片一樣，我僅希望從中能正確地浮現出更大的輪廓與圖景。

[[1]](#_1)世人習于簡稱捷克的國家，其實有極其繁復的歷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瓦解，素來關系較為密切的捷克與斯洛伐克于1918年10月28日合并為捷克斯洛伐克，即Czechoslovakia；直到1993年1月1日捷克與斯洛伐克才又解體成為兩個獨立國家。但因本書記錄年度為1990—1991年，文中所提及的捷克，仍是兩國各自獨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只是為顧及閱讀方便，此處說明之后，仍統一譯為其簡稱“捷克”。——譯注，下同。

[[2]](#_2)達契亞人于公元前約1000年時開始居住在該地區，亦即現在的羅馬尼亞民族，所以現在的羅馬尼亞人被認為是達契亞人和羅馬人混血產生的民族。

[[3]](#_3)羅夏墨跡測驗，叫人解釋墨水點繪的圖形以判斷其性格的心理學測驗。

[[4]](#_4)法布里奇奧是司湯達所著《帕爾馬修道院》的男主人公，誤打誤撞遇到拿破侖的軍隊，上了戰場，開了槍，受了傷，但直到事后才意識到自己參加的是著名的滑鐵盧戰役。

# 第一章 波蘭（上）

“意外，令人驚艷的意外，往往在別處發現。”司湯達曾在他的一篇鄉間旅游札記中這樣寫。意外帶來的刺激，正是我們旅行的目的。這回我所要旅行到的別處，曾經是我的家鄉，但是當波蘭航空班機下降至華沙（Warsaw）乳白的晨光中時，我心中仍情不自禁地涌現出一股期盼的雀躍。距離我上次來到波蘭其實還不到兩年，但是在我心目中，我的故鄉已經變得陌生了。波蘭在這期間經歷了一樁接一樁戲劇化的大事，一再占據新聞大標題：革命，共產主義的結束，一個世代的終結。在我心目中，這些頭條新聞已經重疊拓印在我個人成長的故國影像之上。波蘭已經從我身邊飛躍而去，這種遠去不是距離上的，而是時間上的。不知怎么的，我總感覺它的改變將會超出我的想象。

不過當巴士帶著我們從停機坪駛向機場時，我立即發現自己置身一種熟悉的氛圍中。準備下車時，一個男人以挖苦的口吻炫耀道：“波蘭文化的花朵回到了波蘭的土地！”每個人都報以會心的一笑。這班飛機的旅客大部分或許都是過去十年里的勞工階層移民——他們通常以政治為借口離開波蘭，其實只是想前往所謂的機會之邦改善他們的命運。他們算不上是高尚的流亡型移民，這也正是這句犀利的自嘲所承認的。這是我所熟識的幽默，儼如當地性格的一個標記，看到它那么自然地融入新的環境，我感受到了一陣小小的熟悉的喜悅。

入關處的女士很努力地擠出一個笑容。不自然的笑容明顯僵硬，她臉部的肌肉并不習慣這種表情，不過我還是對此表示感激。這種假裝出來的禮貌至少比我在這里經常受到的怒目而視要好多了。這個狹小、設備原始，且只有單一航站樓的奧肯切（Okęcie）機場還保留著貨真價實的搬運工人，他們來往穿梭忙碌的景象是我之前在波蘭所未見的。那位搬運我行李的腳夫十分熱愛這份工作，他不但朝我一鞠躬，抓著我的行李，興沖沖地賣力工作，而且在幫我把行李放到人行道后，不待我從皮包掏出賞金，就兩腳一并，又匆匆忙忙跑去招呼下一位顧客了。

但是當我和茲比謝克（Zbyszek）驅車穿過這座城市時，它的外觀看起來什么也沒改變。茲比謝克是我的一位電影導演朋友，特地前來機場接我。在這個5月的清晨，天氣異常寒冷，細雨綿綿，灰意朦朧。茲比謝克正為牙疼所苦，牙疼雖然惱人，卻再平常不過；華沙也同樣再平常不過，毫無亮點。這里絕對反對標新立異，寧愿縮減而絕不逾越，寧愿低調而不求極致。我們行經寧靜的小區，兩旁是低矮的灰色石磚建筑，沿著維斯圖拉河（Vistula）有一條被兩排樹夾著的人行步道，背著皮質書包的孩子們步行上學。

意識到自己對這寧靜的場面有點失望，我立刻譴責自己的古怪反應。我到底在期盼什么？旗幟飛揚宣揚革命的勝利？還是不要這么灰暗，多點明亮？或者因為最近才揚名國際，所以空氣污染應該要更嚴重一點？我猜就某種層面而言，我確實有這種心思，雖然不算太久前我才來過這里，這也正是新聞頭條和選擇性畫面的威力，即新聞界的海森堡效應，我們當下的認知都已受到其強烈的影響。

為了保持客觀，我問茲比謝克他對這里所發生的事有什么感覺。

“哦，我一直比較悲觀，”他輕快地回答，“我覺得所有事情都在崩潰中。”

“崩潰得比以前還厲害嗎？”

“厲不厲害并不重要。以前一切崩潰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崩潰的是‘他們’；但現在，所有事情都離我更近了，雖然不至于說是我的事，但是我會同情那些無法適應的人。”

我知道對波蘭人而言，失去悲觀就等于喪失了榮譽，所以我進一步探詢：“到目前為止，這當中有沒有產生什么好事？”

“呃，我最近在外地一個小鎮待過，那里討厭的嘴臉比較少了。你懂我的意思，他們最擅長的那種嘴臉。”

“我很好奇那些嘴臉發生了什么事。”

“哦，那些嘴臉是可以改變的。”茲比謝克堅定地說，“如果開始關心某些事，或停止酗酒，人的樣貌就會不一樣。那些嘴臉還是可以改造的，你曉得吧。”

我覺得人的面貌可以重新改造這個想法很神奇，不過言談間我們已經來到我即將居住的地方了。由于一個海外朋友的慷慨邀請，我有了落腳之處，一間位于隨處可見、俗稱“螞蟻窩”的建筑群中的公寓。這些建筑群儼如一團垂直疊放、毫無優雅可言的方塊盒，突出于光禿禿的地面，沒有草坪或樹籬柔軟地點綴其間，只以一扇扇密密麻麻排列的空洞的窗口冷眼瞅著這個世界。一片泥濘、未經整理的荒地在建筑后方延伸。停車場上有幾個孩子在學習溜滑板；水泥小徑上，兩個粗壯黝黑的男人不怎么清醒地摟肩而行，展現出醺然的同志友誼。

我從來沒有過在“螞蟻窩”停留或居住的經驗，不過這里的公寓是我經常造訪的一種類型：典型的波蘭公寓。公寓面積很小，清一色的淺褐色裝潢，而且就西方的眼光看來，建材極其輕薄脆弱。波蘭——或者說東歐——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在這種公寓中展開，而人們也不惜為之等待、賄賂與期盼。在我置身的這間公寓中，每處可使用的空間都擺滿了書：包括波蘭文學作品、學術性雜志、美國經典的翻譯本等。茲比謝克以贊許的眼光來回審視。后來他的牙痛加劇，只見他痛苦地皺著臉，跟我道別，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個新環境中。我有點緊張地環顧四周，自然而然地接了杯水，然后就只是握在手中，沒往嘴邊送。有人曾經警告過我不要喝這里的自來水，否則不是中毒，就是拉肚子。幸好一位受托前來幫我熟悉的鄰居及時來援，送我一瓶瓶裝礦泉水當禮物——雖然在遞給我的時候有點舍不得的樣子。

我決定在附近走一走，熟悉居住環境，順便尋找改變的跡象，卻看不到什么明顯的證據。由于華沙的大部分是在戰后最貧瘠的幾十年間建造的，因此建筑充斥著有意的社會主義集體意識的平庸風格。這里沒有餐廳、海報或霓虹燈，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在這附近能一窺都市生活，或有個燈火通明的避風港，得以喝上一杯上好咖啡。這里有的只是寬闊的街道、沉悶的建筑和一片灰色。

我很了解這種灰色，以前甚至還喜愛過這種灰色。對于在這里長大的人來說，那是心情和天氣的一部分，沁入骨髓，給人一種舒適的憂郁感。只是為何此刻卻讓人感到一股更甚于以往的凄涼？我想我是在用不同的天線接收它，此刻已經沒有了體制的保護性過濾——這種體制賦予很多內容以正當性和解釋，甚至包括這層層灰色。這種單調乏味確實可算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單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也是刻意采取的清教徒主義。他們不是傻瓜，深知美學和欲望的關聯，比如他們禁止在招牌上使用明亮的色彩，因為這些色彩會喚醒夢想，讓人夢想一個更加色彩繽紛的現實。

這里還沒有豎起五顏六色的招牌，所以這個小區就是眼前的光景，光禿禿的不具任何特色。不過這里絕對發生過某種大事，因而即便是眼前這般單純的景觀，也能引發我這般不同的看法。

回到公寓后，我泡了杯咖啡，并試圖打幾通電話，卻發現這完全是徒勞。三通中就有兩通完全沒有任何信號或連線，即使連上線了，也經常出現忙音，事實上是否真的占線也令人存疑。接著我突發奇想，想打電話給紐約的某個人，但在我堅持不懈的撥打后，長途接線員卻告訴我打到紐約要四到六個鐘頭才能接通。

我放棄了跟外界聯系的企圖，爬上床鉆入好幾層毯子下。外面的細雨綿綿已經轉為滂沱大雨，公寓內寒意刺骨。而這，這就是東歐，不是頭條新聞，也不是歷史。我怎么能讓自己陷在這里好幾個月？我伸手拿了一本書，想起何以圖書在這里大為暢銷。當然，在充斥著新聞扭曲與審查的黑暗年代，書本通常得以比新聞傳遞更多可靠的消息；同時，書本也是這一切的解毒劑，一個心靈的休憩之所，可以穿透四周搖晃的單薄墻壁，讓我們不但可以暫時逃避至幻想之境，也可融入書本中所描繪的另一個世界和真實中。

歷史往往過于夸張，沿著華沙街道而行的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在哪里發生的？這里到底有沒有發生過什么？不過當我接近市中心時，改變的跡象終于出現了。首先，在商店門面和旅館入口處，豎立有若干不引人注目的招牌，標示外幣交換的字樣。我走入一家掛有招牌的簡陋木屋，它另外還掛有蔬菜販賣的招牌。店內，一箱箱胡蘿卜和馬鈴薯的旁邊擺著一塊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各種外幣的官方匯率。外幣交換在以前是非法的，因此我總心虛地有回頭觀望的沖動。幫我兌換外幣的人現在當然已經習慣這一切了，鎮定如常地遞換了一堆數目怪異、夸張，宛如回到昔日通貨膨脹時代的貨幣。我的五十美元換得了近五十萬元的茲羅提（zloty）[[1]](#_1_3)，讓我剎那間覺得自己有如百萬富翁，不過我也可以感到波蘭貨幣的急劇貶值帶給百姓的焦慮不安。

“不過貨幣現在已經穩定了，男人也可以真的拿點錢給他們的女人花花了，”當我就此問兌換外幣給我的人時，他這么說，“只要他們別來找麻煩，我們自己一個人過也沒問題了。”

“他們？他們是誰？”

“嗯，該怎么跟你說呢，非法組織吧！他們想要控制這個行業，還有槍。我是自己獨立的；但他們是黑手黨的，全都是。我敢講他們有一半是以前的當權派，或民兵出身。否則這里誰會有槍？”

靠近市中心新世界大道（New World Street）的一些建筑低矮的街道上，充斥著臨時聚集的攤販，直接就在車頂或在人行道鋪的報紙上，陳列販賣些不起眼的雜物：一雙厚褲襪、一件夏威夷裙、一瓶伏特加酒、一些香蕉和草莓等等。這是新經濟秩序的萌芽，但整體而言，多么破舊又寒酸！那些拆除了閃亮包裝的貨品，有種“次級超現實主義”的憂郁色調，隨意排列組合，卻毫無詩意。

城市的核心部分，是灰塵飛揚、過于寬廣的大道，單調無趣的建筑和擁擠的人行道，一群人心情愉悅地從一間陰暗的餐館走出來。我走過共產黨總部大樓，又是一幢乏味的建筑，企圖透過冷硬的風格和陰暗的窗戶傳遞威嚴的氣質。有兩個男人手提公文包站在建筑前面低聲說話。我好奇里面正在發生什么。前面又是些賣水果和蔬菜的攤位，又是些神態疲憊的人細心地檢查販賣的胡蘿卜和橙子。我知道我應該將這一切視為企業活力和冒險精神的象征，但是相反地，在快速瀏覽之后，我還是感到和昨天一樣的失望。以往，在剝奪中仍有股虛飾的尊嚴，空無一物就像是荒誕至極的笑話，令人有種病態的喜悅，甚至邪惡的滿足。但現在，正如沉悶陰郁的建筑一般，眼下這些就是全部一切，微不足道的改善只襯托出感傷的氣氛。這就是波蘭勇敢踏入新世紀的出發點，一切歸零，滿目瘡痍。

我在一間毫不起眼的咖啡店跟我的朋友雷娜塔（Renata）碰面，點了一份三明治和沙拉。有位年長的女士已經研究了半天選擇有限的菜單，當看見我點的東西時，她嘟囔了一句：“就是有人口袋夠深，能夠填飽肚子。”

“你看到這里的情況了吧？”落座以后，雷娜塔開口道，“以前這里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在那種可悲的水平下，人們不會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義？他們知道誰也不比誰多。這里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

是的，這點毫無疑問，這里會有好長時間同時具有貧窮的癥狀和資本主義的病態。我向雷娜塔提及我對這里的最初印象和沮喪的心情。“轉變所帶來的憂郁，你所感到的就是這個，”她告訴我，“你才淺嘗一小口，我們可是不打折扣地經歷了整個過程，或者應該說，我們都正在經歷整個過程。我的意思是，沒有人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們必須從頭挨過。”

“當然，你不會認為以前反而比較好吧。”

“不，當然不是。不是比較好，而是比較單純。我們，他們，那是一場可以預測的游戲。現在我們處于完全開放的情況，沒有人知道每天會發生什么變化。我的意思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工作會怎么樣，或者明天晚上的新聞主播會是誰，或者當地的托兒所會不會關門。這些事誰都可以憑本事爭取，而且沒有誰可以怪罪。這種情況真的會讓人心情郁悶。”

“不過開放不是比較好嗎？”我問道。

“算了吧！別一副美國人的口吻！”雷娜塔嘲諷我道，“對，是比較好，毫無疑問，只是我能從中得到什么呢？我的薪水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而且買東西要花更多時間，因為我必須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比較價錢。以前是你買一個雞蛋，就付一個雞蛋的錢；現在是誰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意喊價。”

講到這里，她的聲音上揚，有股義憤填膺的味道。雷娜塔在高中教生物，有三個孩子，沒有什么時間去貨比三家。

在返家的途中，我決定采買些基本的日用品。嚴重短缺的時代顯然已經結束了，不過食物方面還是遠不及西方世界的豐富多樣。我買了一種奶酪，一種意大利香腸，從蔬菜店里買了一些西紅柿和胡蘿卜。這已經夠了，我心懷感激。不過就一般波蘭人的薪水而言，這些食物的價錢令人咋舌。在我暫時棲身的小區里，光是買這幾樣東西就要跑幾家商店，它們分散在各處，很不方便。加上我忘了這里是不提供提袋的，所以沒帶當地人采買時都會帶的“網兜”，結果就是必須跟幾個笨重的、幾近松脫且隨時可能滑落的包裝奮戰。回家途中，在一條幾乎空蕩蕩的街道上，一位身穿軍裝和高筒皮靴的軍人從容而行，兩手令人嫉妒地提著兩個差不多重的提袋，規律地在他雙腿兩側晃動。然后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一位彎腰駝背、包著頭巾的老婦人，朝我的方向走來，重復著單調的悲嘆：“我到處都痛，”她用甜美的聲音埋怨著，“我的脖子痛，我的背痛，我的腿也痛……”噢！恒久的東歐，我心想，你畢竟還在啊，雖然也許不會太久了。這老婦人對自己身體的疼痛并不怨天尤人，她直視我眼底的眼神是信賴的，眼睛是湛藍的，她知道她可以對我訴苦，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都一樣。

我去參加了“作家聯盟”（Writers' Union）的一場會議，做個短暫的訪問。會議在舊城舉行，位于華沙一處風景優美的區域，那里算是從灰燼中重建的地區。初次漫游其間，宛如來到一座保存良好的典型歐洲都市，蜿蜒狹窄的街道，兩旁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的連棟建筑，整齊地圍繞著一個方形大廣場，其間包括不可或缺的教堂，還有一座皇家城堡，寧靜地伸展在維斯圖拉河畔的懸崖之上。盡管古意盎然，其實除了少數幾塊古老的石頭外，舊城其他部分全是新近所造。

希特勒的野心之一，是讓華沙成為“第二個迦太基（Carthage）”。在1944年華沙接近兩個月的暴動期間，他幾乎如愿以償，任由德軍將華沙炮轟成廢墟。當時蘇聯陸軍在維斯圖拉河的另一端袖手旁觀，因為德國人是在為他們兩國征服波蘭人。

舊城的重建工作幾乎在戰后就立即開始。其實在這飽受創傷的城市，華沙居民更需要的是基本住宅和醫療院所。但是這粉碎的磚塊瓦礫與頓失的古老歷史，必然有讓人無可忍受之處，因此奮勇抵抗納粹、犧牲慘重的波蘭人毅然展開重建部分城市的工作，讓自然積淀了數世紀的城市風華再現。這項工作的意義，是讓這頁歷史不只活在人們的想象或黨派的論戰中，而且要用一磚一瓦具體呈現出來。

老實講，我一開始并沒有為舊城的風采所傾倒，也許因為我知道它是新蓋的建筑，讓我聯想到舞臺的背景。或許是它的精心保存，以及置于華沙的砂礫和塵垢之中的不協調與優美精致，令我有這種感覺吧。總之，我對于方形廣場內的俗麗藝術市場，以及一些觀光小店內的仿古裝潢并不感興趣。不過當我開始注意到裝潢的細節，像有豎框的窗戶、鑄鐵的門把手、紋章裝飾和拱形地窖時，當我開始思索這種種造型所需要耗費的人力與心力時，這座舊城便開始呈現出層次感了，主要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此舉所代表的意義。這種對過往的獻禮，對被珍惜過也被摧毀過的文明的堅定忠誠，喚起了我的浪漫情懷，一如我在這里成長期間所被反復灌輸的有關波蘭英雄事跡的民族情懷。

這項工程規模浩大。巴洛克風格的建筑外觀和哥特式教堂的重建得根據照片、印刷品和繪畫進行。為了準確重現城堡，完成其中的大理石畫廊、精致的木質鑲嵌地板和掛毯、當代家具和閃耀的水晶吊燈，成群的波蘭工匠必須重新學習早已被遺忘的技藝，廢棄的采石場也重新開放以采集與原來一樣的石頭。那些戰后建筑師所參照的畫家之一是貝爾納多·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2]](#_2_3)，也就是卡納萊托（Canaletto）[[3]](#_3_3)的侄子。貝爾納多·貝洛托之于華沙相當于卡納萊托之于威尼斯。他那幾幅以18世紀華沙為主題的作品目前就懸掛在皇家城堡內，城堡的重建部分就歸功于這些畫作。如果歷史持續得夠長夠久，一個文明的生命和其相關的藝術便會開始融合，如同相互滋養的古老堆肥。

這項浩大工程所激蕩的情感甚至穿透了所有黨派的界限。城堡的重建工作是在戰后二十五年才開始的，當時簽署合約的是一名共產黨官員。對他而言，致力于重建皇家官邸的工程或許有些諷刺；但是大概很少波蘭人，即令是國際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信徒，會完全抹殺自己體內所殘留的愛國情操。他們必然也感到對一個飽受蹂躪的國家來說，能夠銜接與延續過去的標志，絕對具有超越象征性的價值。

“文藝俱樂部”（the Literary Club）本身是幢舒適優雅的建筑，對波蘭的前瞻者或文人而言，是少數能讓生命跳脫凡俗、可以忍受的庇護所之一。像處于這個重要時刻的任何事情一樣，這次會議也別具歷史意義。這是動蕩后第一次會議，就連會議地點都有深層的含義。當1981年戒嚴令下達時，作家聯盟內部分裂，有些決定和政府合作，有些堅決不肯。那些異議分子，當然也就是代表波蘭大部分正統文學的成員，被禁止涉足文藝俱樂部的舒適領域。十年來，這是他們第一次重返此間，而且深具歷史意義地獲得平反。

這些在友善的主席那莊嚴低調的致辭中都提到了，他是個如橡樹般穩重堅毅的人。所有聲明、對話和走廊上閑談的極致謙恭有禮，都標示著這次會議本身的正式程度，完全沒有西方開這種會議時唇槍舌劍中通常展現的古靈精怪、淘氣頑皮或愉悅快活。波蘭作家從來不以任性孩子或反資產階級恐怖分子的風格出現，或許是因為反資產階級的立場專屬于共產黨員，所以在這里它不具有西方世界那種自負的吸引力。或許也因為波蘭大量的重要作家都受到同等重視，所以在中產階級的庸人和精選的少數藝術先鋒之間從來就沒有什么差別。作家本來就該為國家講話，本來就該一本正經，而絕不該是放蕩不羈的嬉皮，或是淘氣的破壞分子。

但在這非常時期，成為作家的條件卻幾乎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室內的派頭無可挑剔，卻幾乎沒有提及文學，談的都是生意經。波蘭的文化界差不多要被丟進自由市場這既可怕又可敬的怪物的肚子里了，而會議上作家的議程就是要搞清楚那只野獸是想要喂食他們，還是吞噬他們。

后者似乎更加可能。“你的意思是寫同樣多的內容，有些人卻可以拿到比較高的酬勞？”當講臺上的人說明了資本主義出版業的規則后，有人困惑地問道。“預付款呢？是按頁計算嗎？不是？那是怎么算？”“然后有時你還可以拿到兩次報酬，一次是在書出版前，一次是在出版后？”

一位來自羅茲（Łódź）的年長人士顯然剛剛弄清楚了這一切的含義，起身用震驚的聲音宣稱，在新體制下，言之有物的好書可能會賣得比二流甚至是非常差的作品更不好。

不是“有”可能，而是“很”可能！我真想直接告訴他。因為對此我不但深刻了解，而且飽受其害，所以內心不禁涌現幸災樂禍的感覺。但我短暫的惡意很快就被同情心取代了。這個會議廳里一些端莊威嚴、文質彬彬的人，一些比較沒有適應力或領悟力的人，那些過分倚重陳舊的固定寫作模式的人，還有那些假借政治嚴肅的罩袍掩飾自己欠缺文才的人，都將經歷一段非常嚴峻的時期。

而且，盡管會像很多波蘭人一樣深受其苦，他們所失去的將遠比他們的同胞更多。因為雖然有審查制度的困擾，但寫作在社會主義波蘭受到高度尊重，而且實際上享受補貼。當然，為了避免審查制度的干預，作家必須以迂回隱喻的方式寫作，那段時期也有可敬的作家拒絕公開出版自己的作品；不過大半時候他們的寫作——不管質量如何，是否受歡迎——都會像勤奮的勞工一樣得到報酬，方式統一，相當優渥，以頁數來計算。而且，為了彌補出書品種的稀少，至少就西方標準而言，波蘭書是以大得驚人的規模來發行的。另外還有在西方世界舉辦的現場活動，像是在德國接受專訪，在丹麥演講等等，所支付的珍貴外幣，也可在波蘭黑市以優渥的匯率兌換。

所有這些都失去了。會議在一上午的議程后，終于迎來高潮，文化部的副部長，團結工會[[4]](#_4_3)的成員前來為政府的政策辯護。他的演講在這場文明的聚會中幾乎引發一場動亂。會場內陳述和質詢來回飛舞，雖然內容都大同小異：政府怎么可以刪減文化方面的津貼呢？當初在一切都崩解的時候，是文化保留了波蘭的本質啊！

副部長懇請與會的文化人跟他一起考慮這件事，一起謀求解決之道。政府已經沒有錢，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支持文化產業了，這點他們應該了解吧？不過市場機制可以創造出它自己的繁榮景象，重點在此。這的確是重點所在，真正有才情的人總會脫穎而出，而如果暢銷書真的暢銷，有誰規定不應該如此呢？總之，在一般正常國家，事情就是這樣運作的，我們都希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不是嗎？

不過可惜的是，團結工會是無法掌控全局的。這位副部長是個聰明的年輕人，胡須修剪齊整，動作輕快敏捷，儼然不習慣官方角色或西裝革履的穿著，倒是長于唇槍舌劍，在此之前或許從沒有過什么面向公眾的經驗，甚至沒有正規工作的經驗。眼前這批群眾中一定有許多是他的好友，不過如今他已經越過了權力的壁壘，而權力的規則及其所帶來的分野馬上以驚人的速度取代原有的立場。依照文人們非正即邪的邏輯，副部長突然站到了和他們對立的一方。除此之外，盡管雙方都沒有惡意，但按照這個邏輯，宏觀和微觀的立場本質上就是互不兼容的，顧及整體利益和維護特定團體的利益之間也有區別。因此盡管副部長懇求大家考慮大局，這群文人的焦慮仍然無法平息。

幸虧午餐時間到了，對許多會議而言，午餐經常扮演及時雨的角色。這次午餐安排在樓下布置典雅的餐廳，幾代文學巨擘都曾在此用餐。餐廳的女老板兼服務員是克莉西亞（Krysia），我在波蘭許多機構中都見過她的“分身”：面孔姣好嚴肅，灰發整齊后梳。由于已在文藝俱樂部任職多年，所以她已然成為中流砥柱，對待俱樂部所有知名和半知名的會員都直來直去。

“要有耐心，謙虛一點，”當有人因肚子餓和長久的等待而顯得煩躁時，和我同桌的一名女士勸誡道，“最好不要惹惱克莉西亞。”當食物終于被端上桌時，其味道意外地可口，有雅致濃郁的酸黃瓜湯，爽口的奶酪卷，還有軟濃美味的蘋果甜餅，而且價格極為便宜。這顯然是給作家們的優待和特權。

餐后，我上樓在一間舒適的客廳喝茶，里面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下我和一名早先結識的作家。

“他們不會通過尊重波蘭價值的決議案，你能想象這種事嗎？”他告訴我。

我默默地搖搖頭，接下來是一串令我驚愕的長篇大論。這位作家的個子不高，從我的角度只看到了他從深扶手椅中冒出的腦袋，一顆就波蘭標準而言蠻漂亮的大頭——方正規則又有棱有角，眼睛深邃，胡須修飾齊整。雙唇在他慷慨陳詞時略微扭曲，給他平添了幾分瘋狂的意味。不過他的用詞精準節制，只是語氣有些陰沉強烈。

“我們為什么要自以為恥？我們為什么要覺得這么愧疚？為什么要因為生為波蘭人而捶胸頓足？”他發出一連串排比的質疑道，“我們為什么要代替全世界受罰？我們為什么要同意受罰？我們就比別人壞那么多嗎？我們做了什么駭人聽聞的事？我們從出生就被譴責為反猶太分子，我們被指控在戰爭期間表現惡劣。但天曉得，當時我們國家的處境多么惡劣！我是個工程師，也是個作家，數字是我的語言。我做過研究，我知道從統計學上講，波蘭根本沒有辦法拯救所有猶太人，何況任何藏匿猶太人的人都會被處死。但是拯救猶太人的大有人在，像是我的家人……好吧，我不想談論自己的故事。我非常難過大多數猶太人都離開了。相信我，當我的一些猶太朋友覺得他們必須移民時，我的心都碎了。我研究過波蘭猶太人的歷史，那是獨特的完美‘結合’（他使用了法語發音），波蘭文化精髓和六千年猶太智慧的結合。我最喜愛的文學是波蘭的猶太人寫的……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結合！”

“但你必須承認……”我開口道。在言談間，我曾向他示意我是猶太人，讓他有機會停下來或轉換話題。不過他太誠實，連暫停一下都不肯。

“對，我知道，有很多是必須承認的，但是為什么所有批評都只是單方面的？如果雙方真心想要對話，你必須讓我有說話的機會！再說立陶宛（Lithuania），現在我們又被指控給立陶宛帶來災難，因為在開戰之初，我們幫助蘇俄保衛立陶宛，不讓納粹占領。我們到底給立陶宛帶來了什么傷害？我看連指甲刮一下都不曾有！”

我為這場精力充沛、義正詞嚴的論戰折服，但還是決定打斷他，這回更加堅定些。“如果要維護波蘭的名譽，”我問他，“你具體會說什么？”

他的回答令我頗為驚訝。“我會維護我所知道的，”他說，“波蘭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工程成就，還有很大程度被誤解的1939年9月的抗戰。有人說我們的軍隊表現得像滑稽的小丑，那絕對不是真的。”

然后他又繼續說：“對他們來說，我們是個由沒有理性的笨蛋組成的國家，我們是骯臟、喧囂的野蠻人。你在我們街道上看到的是這種情況嗎？我最近去新澤西（New Jersey）找我的一個阿姨，她現在可得意得很，因為她覺得自己擠進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但是相信我，許多波蘭城市的城市化或漂亮程度都不輸給紐瓦克（Newark）！”（這點我相信。）“再說說這個舊城，我們所在的地方。我并不常來這里，我住在羅茲，但是昨天我四處逛了一下，天曉得，它真的能讓你感到溫暖，包裹你整顆心……不過我該打住了，”他突然說，“我大概讓你厭煩了。”

“一點也沒有。”我真誠地回答。

“很高興能跟你聊天。”他毫無笑容地說，只直視著我，行禮如儀地跟我握手，然后就這樣離開了。一個受到圍剿、飽受折騰、驕傲的波蘭愛國主義者，一個致力捍衛國家榮譽的騎士型作家。我環顧四周，客廳依舊空蕩無人，不過眼前更添上一層沉沉暮色，不禁納悶：那人是回到今天的會場，還是回到19世紀波蘭史詩或歷史長河中。

文藝俱樂部建筑前面的大街上，擺有幾張堆滿了書本的長桌。這類攤位吸引到的，通常都是些表情堅毅的年輕人，在華沙隨處可見。在我看來，他們是這個新鮮資本主義國家唯一真正值得高興的表現。不過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文藝俱樂部里那些文人的擔憂。由我在美國扎在書堆里的生活中，我知道書本是最輕便、最容易生產，也最去神秘化的現代商品。就某種程度而言，文學也是一樣。在這些攤位上，去神秘化的進程正急速向前躍進。琳瑯滿目的標題，高雅與通俗雜陳，這都是以前所無法想象的。有剛出道的明星的自傳、烹飪書、輕佻的色情作品，還有重口味的驚悚小說。那些驚悚小說多半從美國引進，被統稱為“勒德拉姆系列”，顯然是對暢銷書作家羅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5]](#_5_1)的禮贊。這些書全部由幾十個獨立出版商發行，他們動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當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著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難以抗拒的滿足。由于帶著新鮮事物的魅力，西方的垃圾作品此時更令人難以抵擋。在舊有政治社會體制下，或基于上層命令，或為了回應官方立場，委實出版了相當數量的胡言亂語，不過那都是熱切嚴肅的謬論，幾乎毫無閱讀的價值。

這個嘛，對于文學失去原有的崇高位置，我當然也不無遺憾，但同時對于西方飽學之士恣意批評東歐這種迅速吸收西方垃圾的情況，我也覺得不耐煩，仿佛東歐人就應該表現得比我們好，好于我們貧瘠卻高尚的良知。

新興的通俗作品并沒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嚴肅作品，雖然此刻的嚴肅作品也呈現出多樣的面貌。新的小說作品明顯缺乏，而多為傳記和其他個人文件：在蘇維埃古拉格受苦受難的英雄事跡、前內閣貴族的回憶錄和原共產主義時期當權者的告白。比如前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Edward Gierek）[[6]](#_6_1)寫的關于其當權期間事跡的著作便獨占暢銷榜龍頭。在這種新時期，人們的第一需求似乎是追求新潮，第二是還原歷史真相。這些紀錄性作品是動亂年間的基本寫實和記事。在新時代中，敘事型的記錄經常比小說先行問世；想象、創新的加工作品，則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與此同時，基本的事實是書本的多樣化和令人困擾的選擇。在集體化的年代，一旦有熱門書問世，人們都排長隊爭相購買。每個人都讀同樣的書，熱切討論書本的內容，如此形成了一個閱讀共同體，而且我猜想，可以獲得更深的體驗。但是現在面對一堆沒有區分、五花八門的書，到底要怎么選擇才好？要讀什么？什么時候讀？要怎么讀？有那么多書，要買哪本書好？再者，為什么要買書？還有那么多其他的好東西可以買啊！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讀同樣的書？數量——這當代最有滲透性的力量——已經開始展現它的威力了，而閱讀也注定成為更消費者導向的、更個人化的投入。

華沙的星期天。新世界大道上的教堂人潮洶涌；有人站在教堂外面，努力聆聽布道內容，還有人跪在人行道上祈禱。我搭乘出租車前往華沙城的綠洲之一：瓦津基公園（Łazienki Park）。出租車司機就像這里的大多數司機一樣：坐姿端正，說話有禮，開車平穩。因為通貨膨脹的關系，司機收了計價器的金額乘以兩百。街道上，一家人走在一起，身上穿著最好的衣服，手上捧著花束。盡管局勢不好，出門訪客時還是少不了鮮花。瓦津基公園是我所知道的最漂亮的城市公園之一，占地寬廣，風格多變：有池塘、圖畫般的小橋、起伏的山坡和正式的林蔭小徑，還有可回溯至18世紀的各式皇家建筑，包括涼亭、露臺和其他美麗的夢幻式建筑物。在一尊極其戲劇化的肖邦雕像前，孩子們正快樂嬉戲。一片寧靜。相對于一般人對波蘭人喧鬧、無禮的刻板印象，這種安靜是華沙令人驚訝的一點，甚至和我所預期的任性易怒的民族大相徑庭。事實上，我很少在公共場合聽到有人拉高嗓門說話，我也開始留意到波蘭人儀態舉止中十足冷靜的一面，不過這冷靜究竟是源于所處環境的壓抑，還是通過學習而懂得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鎮定，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拜訪了波蘭共產黨政權結束后的第一家報社《選舉日報》（Gazeta Wyborcza）。這是團結工會在圓桌會議時所創辦的報紙，正因為當初圓桌會議的召開，才得以產生今日的過渡政府。[[7]](#_7_1)報社位于一座寧靜的庭院，一個毫不醒目的招牌指向一扇不易發現的門。入門后只見一幕幾近雜亂的景象。由于倉促，《選舉日報》用的是一間昔日的幼兒園。而那辦公室——雖然叫辦公室，但正如此間許多用語一樣，都只是從比較富裕穩定的地區輸入的名詞而已——既有兒童用地不成比例的狹小，也帶有臨時搭臺的魅力。人們三兩成群地擠在造型小巧、沒有涂漆的書桌旁，共享計算機、電話，還分享香煙。當然，墻面上掛著團結工會的海報，但也有教皇的照片等等，其中還有一張列寧的照片，衣領上別著一個團結工會的徽章。這幅圖像出現在這個場景，仿佛在狡黠地眨眼，好像在說：記住我，我可是每個人讀幼兒園時最熟悉的啊！

我沒有驚動任何人地穿梭其間，這本身就值得一書了。我記得以前拜訪過一些毫無生氣的辦公室，其間每個人其實都在進行小規模的罷工。訪客的出現，立即成為大伙兒喝咖啡的借口，然后悠閑地怠工老半天。但在這里，年輕人神采奕奕地來來往往，一副嚴肅的表情，全神貫注于工作中。在舉行編輯會議時，人們走進走出，幾條看門犬也進進出出。一眼望去，沒有人穿西裝或其他有點正式的衣服。編輯會議由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8]](#_8_1)主持，他是位真正的地下英雄，如今擔任《選舉日報》主編。在種種貢獻之外，他還是個極有魅力的人，在主持會議時也不拘形式，輕松幽默，沒有美國類似機構常見的等級焦慮感。會議中笑聲不斷，日常新聞業務也同時進行：新聞標題該怎么擬，報道的重點在哪里，行文該如何保持客觀等等，每件事都按部就班地決定，而且整個過程沒有吹擂炫耀，只有波蘭人所標榜的犀利與睿智。

但這種隨意自在的態度其實是騙人的，因為盡管才成立幾個月，但《選舉日報》已成為一個極為嚴肅的組織，也是一份極為成功的報紙。報紙有好幾頁廣告——廣告這種東西在波蘭已經銷聲匿跡好幾十年，此外，報社也正在計劃擴大規模，并打算提高薪資，讓員工擁有股權。我對這一切進展的速度和老練程度大感驚愕，但或許我根本不該有這種感覺。《選舉日報》是由一群與時俱進、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所經營的，我為什么會認為他們不能適應新的情勢呢？西方普遍存在一種想法，認為后共產主義的東歐正處于青少年階段，必須經過笨拙而漫長的成長，才能融入“我們的制度”。但是西方那一套畢竟沒有那么神秘，而東歐也不全是跌跌撞撞的青少年。我凝視周遭急促忙碌的情景，心想：這就是自由，這種繁復瑣碎的聲音、這種真正在做事的專注力和蓬勃朝氣——不是假裝工作、被迫工作或抵制式地工作。從這里展現的活力和智慧看來，我覺得早在那憤世嫉俗的年代，每個人就已蓄勢待發，只待解放的一刻到來，他們旋即展翅高飛。

在華沙停留幾天后，一個導演朋友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9]](#_9_1)邀我走訪位于華沙北部約一百五十公里的鄉下小鎮什奇特諾（Szczytno），他打算和一個朋友到那里去完成一樁土地買賣，那塊地上蓋了他們的鄉間宅邸，只是之前一直租給別人。

“你早上五點半就得準備好出門。”當我同意一同前往時，他對我說。

“你在開玩笑吧！”我問。但是他沒有，所以此刻我正透過車窗望著籠罩在朦朧晨光中的平坦、沉悶的鄉村景致。道路兩旁有垂柳，還有白楊環抱的樹廊，對我而言這都是“波蘭”的象征。偶爾還會出現一輛馬拉的犁車，沿著田埂緩步前行。在村莊十字路口經常可以見到路邊教堂，那是很漂亮的色彩柔和的民間藝術，中間放置著一尊通常是圣母的木雕圣像，站在一個像巢一樣的有頂的小型神龕中，四周裝飾有對稱的、精細雕刻的圖案和花朵。歷經戰亂和承平，這一部分總算保留了下來。

在這段時期，混亂應該是稀松平常的現象，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也同樣搞不清楚，各持己見地爭論這是否是他們第一次可以合法購買土地，或者早先就可以買了。在克日什托夫的村莊里，我們和他的農夫地主碰面。那農夫身材魁梧，滿頭金發，還有一雙水藍色的眼睛；他太太則是一身古怪的裝扮，紫色花裙搭配藍色條紋上衣，再加上一件厚重的紅毛衣。這顯然是她最好的裝束，為了來鎮上，特意一股腦兒地套在了身上。

在什奇特諾法院里，臉色紅潤、牙齒缺損的農人正排隊坐在長凳上等著辦事。助理法官很快就叫到我們了，這毋庸置疑是對城市知識分子的優待。這是位親和、活潑的女法官，她在活力十足、毫不間斷地和我們聊天之余，手中不停敲打著一臺古老的打字機，填寫大量表格，而且每份還附有幾頁復寫紙。

“現在這里完全是一團亂，”她向我們確認，“事情堆積如山，每一天都在變化。人們跑來問我有關賣土地或買東西的問題，我都不知道該怎么回答他們。你以為華沙的人就知道他們在做什么嗎？他們自己也一團亂，看看他們每天送來的都是什么東西！”她指給我們一堆傳真來的笨拙打字稿，內容都是關于某些法律新規定的指導方針的。

“這些呢？”她指著一個書柜，“他們必須也重寫所有這些！”我仔細看了整書柜的法律卷冊，光是想想要改寫，甚至重新閱讀這數以千計、印在薄紙上的法律條文和規章，便令人有置身煉獄之感，宛如清理奧吉厄斯（Augean）國王牛舍[[10]](#_10_1)的不可能任務。但是我們和藹可親的助理法官似乎并沒有被這些繁重的工作壓垮，她是如此充滿活力而健談。

法官約十歲模樣的女兒來到辦公室，向她報告早上上學的事。法官媽媽高興地招呼女兒，然后要她乖乖坐好，好讓自己完成手邊繁復的填表工作。從法官迅速、坦誠而友善的聊天，小女孩像往常一樣做事的這個流暢銜接的過程當中，我開始多少領悟到人們在經歷這段重大、根本的改革時所采取的一種方式：就像這樣，一步一步地適應來到眼前的事物，而且一路評論，將現在和過去交織在一起，靜待未來展現的更大遠景。

我們的任務大功告成，克日什托夫的地主想要前往當地一間酒吧慶祝這樁剛剛完成的新交易。克日什托夫有點不情愿地答應了，直待我們踏入酒吧時，我才了解他興致不高的緣由。拜毫無人性的出發時間之賜，我們踏入酒吧時才11點，但酒吧內部那骯臟、毫無裝潢、裸露的水泥地面上已經擠滿了醉醺醺的大男人。他們不是微醺，就像英國酒吧里常見的那樣，而是橫沖直撞、大聲叫囂，牙齒不全的臉上眼神呆滯，不帶表情，相互瞠視。這幕情景令人厭惡，卻又帶點滑稽，大伙兒好像在表演典型的醉鬼似的。不過克日什托夫認為他們只是季節性的醉鬼：農閑時無事可做，因此前來買醉，讓女人們在家煮飯打掃。

把農夫地主留給他的兄弟和伏特加酒，我們自己則前往參觀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剛剛購入的土地。農舍本身狀況不錯，當初使用的預制建材，房屋比鄰而建；此外還有清新的田野，搖擺行走其間的母雞，外加附近一條清澈的小溪，現在這些屬于他們了，全都是他們的了。

我們回去接農夫地主時，只見他神采奕奕地從酒館冒出來。到目的地時，他還算清醒地彎腰親吻我的手，就算歷經了共產主義時代，終究還留著永不消弭的騎士精神。這是每個人對共產黨同志式平等主義的小小抗衡，而農夫地主也以這種方式表示他和任何有教養的都市佬一樣，是有格調的。

在返回華沙的路上，我們開過怡人的鄉間，撞見一幕奇特的景象。在一片輕柔、天然的田野旁，一群農夫圍在一張架放于草坪上的折疊桌周圍，桌上鋪的小型紅毯上，放著一尊淺灰藍色的圣母雕像。

“我們正打算圣化我們的田地。”一名面色紅潤、棱角分明、五官端正的農夫回答了我們的詢問。

“是回到原來傳統的時候了，你們曉得吧。”

“你還記得以前怎么進行的嗎？”我問道。

“呃，不，我不敢說我記得，”他高興地回答，“不過神父還記得，真的，他懂這一套。”

“神父呢？”我考慮是否該留下來觀看他們的儀式。

“喔，他還在忙，他每個村子都要去，幫他們圣化田地，還要收錢。每個人都有他的利益要照顧，你們曉得吧。”他爽朗地大笑。

我心想，這也有一點波蘭——盡管尊重傳統、篤信宗教，但對兩者亦抱有根深蒂固的、無禮的懷疑。

回到華沙后，我依約拜訪了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11]](#_11_1)這位新興的政治核心分子，他的世界地位猶如物換星移，在極短時間內飛速躍升。蓋雷梅克是位廣受尊崇的中古史學家，原來是瓦文薩的主要智囊，亦即反政府勢力的成員之一；如今身居權力核心，擔任“公民國會俱樂部”（Citizens' Parliamentary Club）的領袖。公民國會俱樂部是東歐局勢急遽轉變期間各地出現的眾多政治團體之一。這個身份使他成為議會反對黨領袖，而且不僅如此：雖然現有政府保障共產黨擁有三分之二議會席次，但那些黨員都非常低調，因為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2]](#_12_1)將軍已經明白表示，他在下次選舉前將會辭職。因此事實上，團結工會已經掌握了實權。在這次臨時選舉中，團結工會的許多候選人都是作家、藝術家和其他知識分子，因此政府結構也極為罕見，雖稱不上是哲學王[[13]](#_13_1)，但至少堪稱知識分子的結合。

我在波蘭國會拜見蓋雷梅克。那是一座舒適而不炫耀的現代式建筑，也是戰爭期間華沙市中心僅有的沒有被摧毀的兩座建筑之一，另一座是國家博物館。國會內部充滿了忙碌、嘈雜而刻意壓低的聲音。蓋雷梅克辦公室的門廳擠滿了等著見他的群眾，其中一位是我早先認識的由作家轉任的議員。以前他早上可不會出現在國會走廊，而只會待在華沙文人經常造訪的咖啡屋。體格魁梧、容貌瀟灑的他是令人注目的人物，有一頭白發和濃密的粗眉。此刻他卻是一臉怒色，醞釀著陣陣殺氣。但是當我問他是否喜歡他生命中的新角色時，他只發出低沉的抱怨，還帶著意義明確的手勢。

“我告訴你，如果我早知道這工作是怎么回事，我是絕對不會接下來的。”他說，語氣有著令人卸下武裝的坦誠，“我已經迫不及待要結束任期，回去寫作了。我筋疲力盡，實在跟不上……啊，事情真的太多了。”

“你辦公室沒有幕僚幫忙嗎？”我問道。

“辦公室？什么辦公室？”他語氣夸張地諷刺道，“我們沒有辦公室。我所有信件都自己回。你知道我收到多少信嗎？當然，你還必須回復地方上領養老金的那些人，他們擔心以后領不到錢。幸好我已經請了位很好的女士，到我家里幫我做這些事。我那可憐的太太，她光是接電話就忙不完了。當然啦，有電話已經算我運氣好了，不過她并不想把她的時間浪費在這種事上！”

在激烈陳詞之際，他的名字被叫到了，于是他大手一揮，仿佛要拋開一切，然后吻了一下我的手，大步踏入了蓋雷梅克的辦公室。

輪到我進入辦公室時，我還以為會見到一個愁容滿面的政治家，但蓋雷梅克是那種即使承受巨大壓力，也有本事讓對方覺得他正將所有時間和注意力都投注在你身上的人。他身材瘦削，動作精準有力，說話條理分明，此刻最關心的是新憲法，目前正監督草擬憲法一事。

他指出憲法委員會需要檢視波蘭本身悠久的歷史。世人一般都將波蘭人污名化，視為政治落后愚鈍的民族，但事實上波蘭人有相當漫長、有時還相當先進的民主傳統。在13世紀初始，波蘭各地區就已經有名為“瑟姆”（Sejm）[[14]](#_14_1)或稱為議會的組織，運用投票的方式決定重大議題。從16世紀末開始，波蘭的君主就是經過選舉選出來的，選舉權也逐漸從少數權貴團體擴展到所有名為“施拉赤塔”（Szlachta）[[15]](#_15_1)的階級，包括低階貴族和士紳階級，亦即包括了波蘭社會的一大部分成員。在文藝復興時期，當時領域寬廣的波蘭聯邦憲法，甚至還包括了值得注意的自由條款，保障宗教自由和個人權利。

“當然，還有我們的五三憲法（Constitution of May 3rd）[[16]](#_16_1)。”蓋雷梅克補充道。那是部令波蘭人深感驕傲的文獻，起草于1791年，是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受到舉世稱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_17_1)稱之為“偉大的美好”，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8]](#_18_1)也宣稱該憲法是自由的突破性進展。

蓋雷梅克表示，在他們編纂最新憲法的過程中，委員會還要研究美國、法國和西班牙的憲法，此外也要考慮保留共產黨所遺留的現行憲法的某些部分，例如工作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和接受醫療照顧的權利。

我很佩服他在談到過去，甚至不久前的過去時，態度始終鎮定，沒有挑起爭議的意思。當然，憲法只是關于最好意圖的國家藍圖，這部憲法并不比其他憲法更能保障條文中所允諾的權益；但是能有一位史學家主導憲法的制定，應該也算是一個優勢。

在離開蓋雷梅克的辦公室時，我特別留意了他懸掛在門上的一塊有凹痕的匾牌。雖然不大，卻蘊含著象征意義。匾牌主體是一只老式的、戰前的波蘭老鷹紋飾，頭上仍戴有皇冠，而且是原來的皇冠戴在原來的老鷹頭上[[19]](#_19_1)——這匾牌一定是藏在某個閣樓的箱子里的。匾牌的底部有個古字“soltys”，意思類似酋長。離開瑟姆時，我只希望這種友善的自嘲心態和參議員的熱情坦率能在官方政治的框架中幸存下來。

紐約的朋友們讓我帶一樣禮物給我從未見過的一些人，因此一位友人特地載我到那些人所住的華沙郊區。我們置身的建筑大廳鋪著光禿禿的水泥地面，屋頂垂掛著一截截鐵絲，空氣中還飄散著尿騷味，也沒有燈光。這顯然是一幢衰敗的建筑。“哈林區（Harlem）[[20]](#_20_1)。”我的朋友言簡意賅地評論。盡管周遭氣氛沉郁，但我仍不禁對把這個名詞荒謬地用在這里感到有點可笑。

我進入一個顛簸運行的電梯，躋身四壁凹凸不平、狹窄的金屬空間，幸而抵達的公寓還算整潔，主人還端出了波蘭式下午茶，有好幾種餅干和蛋糕——在波蘭飲食中，糕餅甜點可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被犧牲的。索非婭（Zofia）是位身材豐滿的女士，編著一條長發辮，態度有些矯作，顯然很想表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她丈夫尤雷克（Jurek）則身形憔悴，面容疲憊。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轉向當下每個人最掛心的事：現在情況如何？局勢轉變給他們帶來了什么改變？

噢，當然不可能變好的，絕不可能。這些人的財富急速縮水，相對的，另一批人的財富則急速增加。尤雷克剛剛失業，據他形容，他的工作是保護老舊建筑不受破壞。這也許意味著他是民兵中最低階層的成員，不過他沒有詳細解釋。

“現在倒好，他們文章寫得好像很聰明，什么失業的人很快會變得憂郁，”尤雷克說，“早上越來越晚起床什么的。其實他們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他們可以直接來問我，我就能告訴他們！”

“你為什么會失業？”我問他，雖然我并不指望獲得完整的答案，“哦，你以為他們對這種事會公平處理嗎？我告訴你，這些新人跟舊人一樣壞。全都是關系，他們根本不在乎誰比較有能力。這是一批新的貴族。很好，沒關系，我去一些以前參加過團結工會罷工的大樓找工作，我想做我的工作。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嗎？但不是的，他們看著我，好像我是什么怪物似的。”

“他們也找我麻煩，”索非婭插口道，“我做得很好，至少比有些人好，但是他們想知道的只是：你是不是團結工會的？只要他們不找我麻煩，我也不想惹他們啊。”

“你是黨員嗎？”我問尤雷克。“嗯，是的。”他回答，“我是黨員。我成長在一個真正的工人家庭。我父親是鐵路工人。但我不是什么狂熱分子。我參加了一些聚會，就這樣而已。他們并沒有要我們做什么，過去這些年，這個黨根本沒有什么了。相對而言，我更信仰天主教，雖然我不上教堂。所以你瞧，我信仰天主教，卻不上教堂；我是共產黨員，卻不相信共產黨。我只能告訴你，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你看，我們只想在這里好好過我們的日子。”他憤憤不平地繼續說，“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世界。我們聽音樂，我們去看電影。索非婭去過美國一趟，去幫人做事。他們為什么要找我們麻煩？”

“我選舉的時候還投票給團結工會，”他繼續道，“因為我想有個反對力量是好事，我們不應該只有一個黨。但是我告訴你，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變得更好，我也要去街頭抗議，去打倒他們。”我再度感到驚訝，這次是被他語氣的惡意所嚇到。

“你準備打倒誰？”我問。

“任何打倒我的人。”他憤怒地回答，我可以感受他苦澀的深切。這是新的底層邊緣小人物，原本就沒有享受到什么特權，現在又從原來攀附的社會平臺往下滑落，正是憎恨、不滿與極端主義政治要吸納的理想人選。

就我而言，我在波蘭的娛樂之一，是目睹波蘭語言孕育出的新詞匯與別有風味的俚語。這是這幾天對話中常出現的表達：

比如“邁向歐洲之路”就是個多功能慣用語，比較像口號，而不像俚語，而且就像一般口號一樣，帶有多種意圖。去歐洲無疑是眾所想望之事，但是其中真正的含義，就要看你是什么人，還有你想要什么了。對期待及早采納資本主義的休克療法改革者而言，它代表全面的自由市場；對希望結合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精髓的“新中間路線”者而言，它代表社會民主；對民族主義者而言，它代表同種同宗；對革新主義者而言，它代表多元化。我還聽到一位主教在電視演說中也提到“邁向歐洲之路”，主張將宗教引入學校。根據他的理論，教會和國家的結合具有普歐洲的價值。

還有“合資企業”一詞。啊，形形色色的合資企業！如果“邁向歐洲之路”是意識形態上的必需品，那么“合資企業”便是欲望上的愛慕對象。也許通往歐洲的路上就鋪滿了這些美麗、耀眼、難以描繪的商業計劃書吧。當然，還必須有信譽良好的西方伙伴，不過這里所謂的“西方”其實還包括了日本和中國香港。

“多金男”大概指的就是那些已經在合資企業上獲得成功的人。基于波蘭詞匯的變幻無常，這個名詞應該泛指“有錢人”，因為女性也開始創造財富。在這里人們提及“有錢人”時，多出于尊敬莊重，絕無侮辱或嘲諷之意，就像波蘭人說“戲劇人”或“制服男”（man of the cloth）[[21]](#_21_1)一樣。

和“有錢人”相對應的，是“美麗的靈魂”，就是那些心靈高貴的窮人，那些依然信仰社會烏托邦、知識分子的生活或為藝術而藝術的人。那些即使昨天還自命為“美麗的靈魂”的人，如今在提及這個短語，或者應該說這個詞時，也不再像以往那么心向往之了。在共產主義之后，這里需要的是心智強悍的實用主義者，而不是軟弱的超驗主義者。

除了上述人物形象外，還有“揮汗追逐權力的人”一詞。這個詞由一個年輕的政客首創，用以嘲諷那些從政目的與“一般國家”的政客沒什么區別的政治人物。我自己認為，這里所謂的流汗的人跟那些手提公文包的美國人構成了很好的對比，那些提公文包的人當然是絕不會揮汗如雨的。

“我們的波蘭地獄”這個詞一直存在，但也不斷融入新義。波蘭人所謂的地獄是一個大熔爐，融合了爭執與分裂、無政府的個人主義與外部生活——這些都多少帶有本國的寓意。這是大家早已親切熟知的，但是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他/她的想法，且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時，人們認為它現在還有些其他的意涵。

另一方面，也有毫無戲劇張力的詞“生命中的單調”。是我的想象嗎？我總覺得這個美麗的詞匯出現得更為頻繁。當人們解釋某項必須做的日常工作時，他們會說：“這就是生命中的單調吧。”或者當面對眼前這種日復一日的生活時——畢竟，大多數日子都是這樣的——他們會說：“好吧，該回到生命中的單調了。”

開往克拉科夫（Cracow）的快車頗為擁擠，但是非常安靜。“你一定要搭搭看，太方便了，跟西方的不相上下。”雷娜塔在我離開前慫恿我。這個嘛，其實不太像，這里煙霧彌漫，好像回到了從前，不過列車座位還算舒適，餐車供應的一些法式開胃小點心也頗為可口。人們聚集在通道上，壓低聲音聊天。

克拉科夫是我長大的地方，因此難免近鄉情怯。這里是我對波蘭和有關波蘭的一切看法的根源與原型所在，因此我并不希望情勢的變化打破克拉科夫數世紀來的歷久不變。我希望那里只有適度的改變，或甚至毫無改變。雖然我連在腦海中都不愿承認，但是一股遺憾的感覺卻逐漸滋生——遺憾即將消逝的波蘭，那熟悉而淡去的現實，那時間緩慢流逝所帶來的安全感。也許我只是不愿意失去個人的回憶，但我可以感覺到這里有人和我有著同樣的感受，正如失去某些未必喜愛卻熟悉的東西，令人有股無法言喻、難以捉摸的惆悵。

距離上次置身此地已有十四年了，可一漫步在克拉科夫，我很快就尋回了小時候這座城市所散發出的奇特隱晦的魅力。克拉科夫那堆疊在一起的年代、鵝卵石鋪設的街道和意外的景觀，既有令人舒緩的力量，也是一種釋放。聯排式石磚住宅可以追溯到14、16和18世紀。歷史悠久的教堂，掙脫石材束縛的雕刻。這一切皆令人心情舒暢。這種奔放、這種超越功能與需要的存在！“啊！不要跟我說什么需要不需要。”我一直想著《李爾王》（King Lear）里的這句名言。物質的吝嗇會造成心靈的吝嗇，讓我們縮小自己去適應環境。

回蕩著足音的方場和庭院，老先生們沉思著漫步其間；飄著藥草香味的老式藥房，還有整齊的彩色玻璃和暗色木材；詭譎多變的白云，璀璨的陽光，以上種種似乎再度擄獲中歐的心。在這里，即使下雨也令人神清氣爽，雨聲洋溢著昔日中產階級的旋律，而沒有后共產主義時期的冷漠嚴峻。

當我四處晃蕩時，一陣大雨突然傾盆而下，我只好跑向最近的一處棲身所。我好像直接回到了過去。我駐足的門廳是小時經常光顧的一家電影院，但后來就再也沒見了。記得當年十歲的我，曾在這里被一個男的花言巧語騙走了身上所有的錢。那段記憶突然浮現在腦海，清晰一如昨日。我以前的確在這里住過，在許久前的那個世界。

在古老氛圍的襯托下，這里的新事物也看上去更好。街上兜售商品的比較少，更多是19世紀風格的可愛商店，裝飾著拱形櫥窗和鉻合金門把。商店里擺滿了德國和奧地利化妝品，顯示出這里和原加利西亞（Galicia）[[22]](#_22_1)的關聯，這是我在華沙所未曾目睹的。在兩條街道間的拱門處有手風琴手和小提琴手合奏著俚俗的曲調。市中心一處人比較多的地方，成排的俄國女人正兜售金戒指——幾十個戒指，有的套在手指上，有的串在木條上。這些女人到這里販賣商品，意在換取行情較高，兌換也比較容易的波蘭幣。從她們所持的金飾來看，即使經濟困頓的俄國也有不少隱秘的資源。

這些都沒有干擾到這個城市寧靜的延續。古老的克拉科夫足以吸收這些新的景象而不至于被根本改變。當然，影響深遠的改變也在醞釀中。我下午見了齊格蒙特·馬提尼亞（Zygmunt Matynia），我們倆上次是在紐約碰面的。齊格蒙特五官柔和，聲音輕柔，對他而言，秉性正直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不可或缺的特質，因此虛榮或謊言只會對他的感情造成顯著的創傷。在一個將謊言制度化的體制下，我想他所承受的痛苦遠比別人更多。他曾考慮過移民，但最后仍決定留下，不過已經辭去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法學理論教授一職，只因無法接受該職位所要求的妥協。

如今，當局要求他參與克拉科夫“自治政府”的籌建工作，他也以無比的熱誠和豐富的學識擁抱這個愿景。自治政府是波蘭的新創機構，齊格蒙特暢談這個組織可能的設置和可能遇到的問題，既美好又帶有坦誠的理性。他已經思考了法國和美國模式各自的優點；思考了中央政府控制太多以及地方政府太過獨立的危險；還思考了克拉科夫的哪些歷史建筑應屬于私人產業，哪些應屬于國家資產。此時此刻，克拉科夫地方政府正處于最有希望、最有潛力的階段，人們可以通過哲學的思考探討它的前景，內心也因為有所期待而為之顫動。

我們的部分談話是在克拉科夫的一家著名咖啡店米哈利克（Michalik）進行的。在20世紀初期，這家氣氛溫馨、山洞一樣的咖啡店是克拉科夫浪蕩不羈的文人和藝術家的聚會之所。燈光柔和的墻上裝飾著以艷紅色為基調的壁畫，還有心懷感激的藝術家贈給咖啡館的諷刺漫畫，用來代替現金付款。咖啡店后方有一個小型的嵌入式舞臺，旁邊展示了昔日用于卡巴萊（cabaret）歌舞表演的成人木偶——后者的樣子是對不同階級和類型的人寫實而機智的諷刺。在沒有政治力量干擾時，卡巴萊歌舞表演和諷刺作品在波蘭一向盛行。

齊格蒙特和我選了一間包廂，里面有大理石桌面的小餐桌，以及造型奇怪、風格獨特的座椅。那些座椅的椅背不同尋常地高而彎曲，為入座者提供了一種有趣的夸張輪廓。在周末，克拉科夫人都特別重視下午茶，我們也在那里享受了片刻悠閑。之后，我們漫步到克拉科夫古老而莊嚴的主廣場。這片鋪設著鵝卵石的寬闊空地上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型賣場，名叫紡織會館（Sukiennice）；有13世紀哥特式圣母教堂（Church of St. Mary）；還有一座鐘樓，每天都播放一段斷斷續續的小號曲，紀念韃靼大軍的進犯。這里是我童年生活的重心之一。鴿子在這里聚集，紡織會館的拱廊陰郁空蕩。如今，拱廊上商店小攤云集，兜售木制民俗藝品、俄羅斯套娃和不入流的旅游紀念品。

這個下午，為了慶祝一個宗教節日，廣場變成了一個偌大的戶外教堂，游行隊伍緩步穿過廣場。信徒手上捧著圣徒雕像，正循著古老的傳統路線，從附近一所教堂穿越廣場而來。孩子們穿著五顏六色的傳統服飾緊跟雕像，他們后面則是一個讓人心酸的群體——年事已高的起義軍，穿著掛滿勛章的制服，個個彎腰駝背且滿面滄桑。戰后，他們就被迫從一個地下據點轉移到另一個地下據點，這也許是長久以來他們第一次在群眾面前露臉。看到這群老戰士，我有種奇特，甚至稱得上怪異的感覺，因為在我孩童期間，他們只存在于耳語中。如今他們身著制服，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宛如過去和嶄新的時代間藕斷絲連的傳承。波蘭保有太多的過去，深鎖在門后，靠著對記憶的執著留戀而殘存著。畢竟要完全抹殺歷史的任何一部分都是非常困難的。

晚間出現的又是另一幅令人矚目的場景。克拉科夫正大力籌備一場歡迎斯瓦沃米爾·米洛杰克（Sławomir Mrożek）的慶典。米洛杰克是劇作家、卡通畫家和諷刺作家，二十年前因政治壓力而離開波蘭，現在才首度歸國。歸來者——這是屬于他們的時刻。慶典包括表演、接待會和記者會。廣場中央古老陳舊的市政廳塔樓還扎著一條整潔的大型領帶，那是米洛杰克的標志。可惜不到幾天，領帶便因污染而被熏黑了。人們在街頭等候好幾個鐘頭，就為了親眼目睹那位個性害羞的作家本人。米洛杰克是當地人在海外獲得成功的典范，而且他的名氣在家鄉更大。

我來到史塔利劇院（Stary）——也稱作老劇院——觀賞《屠宰場》（The Slaughterhouse），這部戲是對波蘭人崇拜藝術、文化和高尚價值的性格的犀利諷刺。在禮數周全與風度翩翩的外表下，明顯隱含著戰爭的殘忍本質——肉塊、鮮血、殺戮。這部戲有著優良的制作和精準深刻的表演。波蘭人性情中的這一面是我覺得最讓人振奮的，這種尖刻、沉郁的懷疑主義，這種穿透虛榮和神秘的力量。

在返回華沙的路上，和我同車廂的一位老先生不停地問他太太，他太太也一直用尖刻嘲諷的口氣回應。“我們在哪里？”他問道，“這火車有多快？我們什么時候會到？”而每次他太太都毫不留情地責罵他。

快到終點時，老先生打了個盹，然后突然驚醒。

“起義開始了嗎？”他焦急地問，“我們趕得上起義嗎？”他指的是華沙起義。[[23]](#_23_1)這一次，他太太沒有回答。

歷史，它是怎么發生的？部分是急于回歸過去，逆潮流而行。擺脫共產主義，某種程度上是倒退的革命。有時候看來，波蘭似乎正試圖往后倒退一大步，抹殺過去的四十年。數以百萬計的皇冠被涂到先前光禿禿的波蘭老鷹頭上；共產主義時期的街道名稱被抹去，換回原來的名稱；皇家貴族的官邸也再度被冠以原本屋主的名號。目前對畢蘇斯基元帥（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24]](#_24_1)的狂熱正在升溫，他曾在兩次世界大戰間任波蘭國家領袖，在20世紀波蘭短暫的獨立時期掌權。另外人們對波蘭聯邦（Polish Commonwealth）[[25]](#_25_1)的感覺也在增強，在14世紀到18世紀，波蘭聯邦覆蓋廣大領域，涵蓋多個國家，目前很多人都將那段時期視為波蘭的黃金年代。

“他們想回到的波蘭，根本是迷思。”我的朋友雷娜塔以輕蔑不耐煩的口氣評論道，“他們以為是在回到傳統，或者回到歷史，其實只不過是迷信神話而已。他們給老鷹戴上皇冠，自己戴著好笑的帽子，以為這些很有意義，其實只是幻想出來的怪物，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但我想他們只是在尋找某種認同，某種象征……”

“你以為在老鷹頭上漆上皇冠會給他們認同感嗎？”

“呃，不然是什么呢？大家正在競相探索作為波蘭人的真正意義。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么四處尋找這種標志。”

“哈，他們在波蘭聯邦是翻不到什么東西的，”雷娜塔打斷我說，“其實波蘭聯邦并不像他們想象得那么偉大。他們想回去的那個波蘭，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就我而言，作為波蘭人此刻意味著回到工作崗位，而不去煩惱老鷹頭上的皇冠或對死去英雄的崇拜。專注于當下，這才是意義所在。過去的一切自然會解決。”雷娜塔傲然作結。

不過雷娜塔的見解是少數人的觀點。波蘭人有一個傳統的傳統，一種保留歷史記憶的天賦——或許因為在太長一段歲月里，他們僅能活在歷史記憶中。波蘭人是通過對波蘭的記憶而保留下他們的認同的。尤其是在歷經了一個多世紀的瓜分，真正的波蘭已經被從地圖上抹去時，他們的認同完全是靠著對波蘭的理想才被保留下來的。這是波蘭人自我意識強烈的原因之一——源自頑強地保存昔日記憶。在共產主義時期，當官方版本的歷史企圖扭轉人民對波蘭的認知時，他們是靠著非官方的歷史撐過來的。我還記得在我成長期間，老師如何在令人厭煩的政治必修課中，偷偷摻雜片斷的真正歷史，而那些冒險獲得的片斷資訊，日后又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后來我還記起了從夜晚一直進行到凌晨的討論會，亦即波蘭人所謂的“同胞夜談”。在那些討論會中，有關波蘭的問題從來沒有缺席過。

但是每一個朝代的開始都需要塑造它自己的歷史。歷經種種變革，所有波蘭的過去都被放在一個嶄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如同車輛轉過彎道，先前經過的景色以完全不同的角度與樣態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在報紙報道和日常的辯論中，關于波蘭的不同觀點都被激發出來：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對波蘭歷史有各自的解讀，也有新的論點強調波蘭的商業史，還有種說法，認為波蘭是正常國家，一向屬于歐洲民主傳統的主流。

不過除了對古老過去的再造、移借和修訂外，剛剛發生的過去也有它的問題，這是由對“前”和“后”的最新劃分產生的。這正是最近發生的事情的核心，亦即將過去四十年直接歸入歷史范圍。這是一段大部分人不想要的歷史，因此究竟該對這段歷史采取何種立場，也已經掀起了一場論戰。

后共產主義時期的第一位總理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26]](#_26_1)要波蘭人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畫一條“粗線”。后來“粗線”這個詞大為盛行，許多文章、對話和圖像都重復使用這個表達。這個詞本出于好意，目的在于杜絕苦澀的心態，忘記過去，繼續前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主張對過去展開報復行動的人，所幸那些聲音目前都被壓制了。放眼望去，到處都顯現著將那段不幸時光抹去的明證：比如推倒列寧、斯大林、捷爾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27]](#_27_1)雕像，還有極力恢復早期的符號、儀式和想象中的榮光的嘗試。事實上，這種回歸更早歷史的做法，也是一種壓制新近歷史的表現。

在此同時，關于這段黑暗時期的被埋葬的知識也持續地被挖掘出來。幾乎每一天，報紙都會刊登一些基于檔案發現的報道：比如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占領東波蘭，戰后蘇聯和波蘭的關系，以及波蘭共產黨的歷史等。

不過當然，記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把過去從人為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固然產生了光榮，但也制造了惡魔：比如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各種令人不待見的社會潮流。至于共產主義本身的遺存——不論是有形的基礎建設還是內化的傳統，例如日常習慣和思考模式——也不像雕像那么容易被推倒。各方對這些問題多有建設性的討論，也有很多溫和明智的訴求，而在目前，狂熱的人似乎還處于邊緣地位，處于中心的是幾乎令人訝異的平靜。

我和一位認識的老太太一起住了幾天。由于經濟改革的關系，她的收入緊縮，養老金只有原來的一半，不過按照波蘭的生活方式，還勉強過得去。海外的親戚會寄點錢給她，這也是波蘭經濟的秘密來源之一。她有個幫手每星期匆匆造訪一次，送來一些以極低價格購買的奶酪和肉制品——顯然，她也有自己的路子，或許有在農場的親戚之類的吧。不過我的女主人蘭妮卡太太（Ranicka）還是非常儉省地享用她的低因咖啡和火腿的。

公寓有位男房客，來去都非常安靜，每次出現在我們周圍時也非常有禮貌。他是位電影技術人員，而且就像所有人一樣很擔心失業，沒有了津貼的電影業是受創比較嚴重的行業。他所就職的電影“合資”公司目前還勉強支撐著，可是薪水實在很難趕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因為只有我的房間有電視，所以某個晚上，他們兩人都來到我的房間看電視節目《質詢》（Interpellations）。這是一個辯論節目，會邀請一位重要的公眾人物，接受反對黨和友黨人士，以及一般群眾的質詢。節目現場很快成為大家辯論的場所，套用雷娜塔的話，成為“我們新的大型咖啡店”。每個周四晚上，《質詢》幾乎將全國的人都吸引到電視機前來。節目中討論的節奏快速、犀利，而且每個來賓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國政治辯論性節目的節奏就顯得緩慢許多。到目前為止，辯論都不是毫無成果、陷于兩極化的爭辯。節目的重點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對國家最好，而不是煽動群眾，或顯示自己的政治正確。托神的福，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人知道政治正確是什么。

這一次，節目請來了萊謝克·巴爾采羅維奇（Leszek Balcerowicz）[[28]](#_28_1)，即當前波蘭劇烈而艱苦的經濟改革的工程師。討論主題為：是該進一步加速所謂的“休克療法”還是減緩速度。這是目前波蘭最火熱與最重要的議題，因為一旦失敗將影響重大。這項改革的目的在于快速朝自由企業發展，展現經濟活力，創造財富；可是一旦失敗，將導致更嚴重的失業問題與通貨膨脹，將百廢待舉的國家推入更加絕望的深淵。我的女主人和她的房客已經深受改革之苦，但他們兩人仍以哲學上接納的態度面對這一情勢。

“難道繼續加速推進不會讓你們感到緊張？”我問道，心想那一定會搞得我很緊張。

“哦，親愛的，我還記得1920年代的改革，”蘭妮卡太太回答，“那才更糟糕呢。”接下來，我驚異地聽到這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她有時對自己昨天所做的事還糊里糊涂——居然能夠如數家珍地記起她曾經歷過的各次經濟改革的細節，還包括通貨膨脹的速度和薪水的變化。1920年代通貨膨脹極為嚴重，于是每逢發薪日，她一領到父親的薪水，就立刻去采購，只因吃個午餐的工夫，幣值就會下滑很多。當時還在打仗，所以問題更加復雜。“總之，”她收起回憶，“我想他們總不至于讓我們餓死。”

“當然，我并不喜歡這樣，但是不這樣做也沒有辦法。”年輕的房客堅定地說，“總之，目前情況還不算太糟。資本已經開始流動了。我們必須把眼光放遠一點，你曉得的。”

這是我在這里和人交談時最常感受到的情緒：一種清心寡欲式的冷靜節制。當然，其中也不乏悲觀的評論、自我批評，或專喜歡潑冷水的人，但是我交談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人是驚慌、憤怒或苦悶的。我們總得想辦法撐過去，這是我一再聽到的說法，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令人驚訝的是，這里沒有罷工，沒有抗議，沒有大規模的暴力。更讓人意外的是，盡管政府宛如在沒有使用麻醉藥的情況下替國家進行一項痛苦的手術，卻至今仍擁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這種平靜雖然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這里不曾發生過任何事，但對我而言，這才是此地發生過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畢竟一個國家必須具備相當的政治成熟度，才能在惡劣的情況下展現出耐心和節制，才不會為了不可避免的病癥責怪自己選出的代表。但這是一個極其特別的時刻，這種奇特的安寧或許是動亂不已的波蘭歷史所孕育出來的。我的女主人一生經歷了戰爭和其他種種大風大浪，因此鈔票上多幾個零還不至于讓她動搖；年輕的房客不但經歷了日常生活的艱困，也經歷了波蘭戰后時期有如格外活躍的火山一樣一再爆發的動亂：1956年、1970年、1977年、1980年、1981年，當然，還有1989年。

事后回看，我們或可推斷那些暴動也許正為目前的境況奠下了絕佳的根基。沒有一個國家像波蘭一樣，反對“體制”的浪潮遍及全境且歷久不衰。一種反對文化從草根運動中，從地下刊物、非正式教育和形形色色的地方策略中，從直接的政治教育中滋生出來。這是有功用且可以運用的過去。在波蘭群眾不一般的耐心等待中，這樣的過去得到了回報。

這無疑只是一個暫停和緩沖，不可能持續太久。但是我想說的是：“請注意這個。請注意這里所發生和沒有發生的一切。請注意，有這么一次，即使持續的時間很短，這里的情況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惡劣。”也許我的要求太高了。不過我在想，如果我是女王，可以放下嚴肅的分析而有一點沉湎于愿望的滿足的話，我會讓波蘭往前推動到某一點，然后停下來。我會讓它多一點霓虹燈，但不要像紐約時報廣場一樣多到俗麗的地步；我會在街道上多放點車輛，但不是多到產生交通阻塞；我會鼓勵私人企業，但不至于產生令人瞠目的社會不公；我會在更民主，無疑也更分裂的未來，維持若干此刻的清心寡欲，以及對一般局勢的判斷能力。

一個周六的晚上，我和一個朋友共進晚餐。雅努什·格沃瓦茨基（Janusz Głowacki）是這里的劇作家，過去幾年住在紐約。但回到自己故鄉的雅努什卻顯得比平時還不安，站在街上環顧四周，想要找找在晚上9點這種非常規的時間，我們還能去哪里吃晚餐。我們先去了一間外國人經常光顧的飯店：維多利亞（Victoria）。我們明明看到有幾張桌子還空著，餐廳侍者卻冷漠地說沒有座位，我們只好憤憤地前往另一家。小餐廳都客滿，我們干脆去了間大的，歐羅普斯基酒店（Europejski）。它不只大，簡直堪稱巨大。天花板太高，餐桌太大，全餐廳都沐浴在昏黃的燈光下。餐廳前方還設有一個舞臺。雅努什和我坐下來，準備好了長久的等待，因為那些侍者好像并沒有提供服務的意愿。“他們收外幣小費，收入是一般人的十倍，所以干嗎理我們？”雅努什告訴我。不過還有一項是我們沒有料到的，只見餐廳前方的燈光突然大亮，電視攝影機也被推了出來，一個民間舞團循序登上舞臺。他們艷麗的服裝、濃重的妝容、虛偽的笑容和歡快的音樂在在令人不快。雅努什和我互望一眼，隨即不約而同地起身往門口走去。

回到街道上的我們再度駐足而立，不知道該轉向何方。“我們可以去某某人的家，那里總找得到吃的。”雅努什建議道。波蘭的社交生活就是這樣，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造訪別人的家。但是因為我不太愿意，所以兩人只好開始在黑暗空蕩的街道上漫步。街上沒有車子，沒有霓虹燈。我們唯一碰到的人醉得東倒西歪。又有兩家餐廳已經打烊。最后雅努什終于想到有家餐廳也許還在營業。餐廳確實還開著，當然，菜單上的大部分都已經賣完了，幸而還有烤羊肉串可以點。“請注意這已經很好了。”雅努什似乎真的很滿足于這項小小的勝利。我心情不好，所以喝了兩杯伏特加。我開始理解為什么波蘭人會酗酒了。“你瞧，這里的生活就是這樣，”雅努什說，“這些就是我們的成就和勝利。只要能好好吃上一頓，或者把破的鞋子補好，就感覺完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可以非常高興地回家了。不然，你以為自己還能做什么？”

某個晚上，我花了些時間和海倫娜·武奇沃（Helena Łuczywo）交談。她和亞當·米奇尼克是《選舉日報》的共同主編。一名報社“司機”載我們到海倫娜的家，雖然那輛車的凌亂狀況實在不符合這個冠冕堂皇的頭銜，他和海倫娜的交談也缺乏老板和職員間的正式態度。不過，盡管享有這種片刻的特權，海倫娜幾乎和這里每個人一樣過得很樸素，只是她所住的區域算是華沙幾個比較好的區域之一，甚至有個小小的庭院。她曾告訴我，人們現在開始指責像她這樣的知識分子并不知道波蘭生活的實際情形。“不過坦白說，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在我看來，她的說法應該是對的。逐漸式微的共產主義式平等主義，確實對平等化有真正的貢獻。而東歐的知識分子不像西方知識分子，并沒有被一般民眾排除在外的感受。

剛在她家的小客廳坐定，她女兒立即為我們端來白蘭地。海倫娜長舒了一口氣，《選舉日報》在過去幾個月成為波蘭最成功的報紙之一。由于大部分時間都是她負責，因此她每天都得高速運轉，忙個不停。

海倫娜是最近從地下組織浮出臺面的新知識精英之一，在塑造新近歷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她和其他一些我認識的人，他們這個大群體或許才是一直吸引我返回波蘭和東歐的真正力量所在。每個移民都有另一本想象的自傳，在我對自己歷史的修改中，我會留在波蘭久一點，久到足以參與和我同一代的政治反對勢力。波蘭戰后的知識分子以更豐富的內涵、更強的精神力量應對歷史的巨大挑戰。他們所體驗的種種，是同時代西方知識分子所向往，卻無法實現的浪漫傳奇。他們塑造了一場革命，或至少成為革命的先鋒。他們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就我而言，是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最鼓舞人心的運動。其后的推動力量，是無數的智慧和創新，還有一群毫不妥協，也絕不狂熱的政治精英。

總而言之，他們表達異議的方式，構成了我最喜愛的波蘭傳統。過去幾年間，我跟他們碰面，聆聽他們充滿活力和機智的談話，講述他們共同享有的歷史：共同行動、秘密學習團體、策略研究會議，還有不定期的被捕入獄。不過在這些諷刺與活力的背后，可以窺探到只有若干古老名詞才能描繪的情操，諸如正直、勇氣和道德承諾。

當然，海倫娜自己也冒過極大的風險，做過關鍵性的決定。她是位個子小巧、五官柔和的女士，臉上經常掛著溫暖的笑容，講話卻如同機關槍，態度堅決而毫不浮夸。海倫娜的父親是共產黨核心分子的一員，或至少，作為宣傳部副部長，曾處于核心集團的外圍。海倫娜說，在成長過程中，她并不太了解父親工作的特質，父女間對于他們猶太人的身份也沒有過多討論，部分是由于她父親是個有原則的國際主義者，對他而言，這些事情并不重要。在她父親眼中，族群的自我認同是一種倒退的行為。不管怎樣，海倫娜認為這些事沒有涉及也好。“我不相信美國每件事都要追根究底去分析的那一套，”她輕快地評論道，“畢竟，那不是重點。”但她自認是個堅強的人，并將自己的樂觀以及基本的安全感和力量歸功于父母對她的愛。

然而海倫娜對一些事畢竟心知肚明。她知道自己是猶太人，對于自己在夏令營企圖掩蓋這個事實的做法也深感嫌惡。這個插曲是她自我認知的重要轉折點之一，讓她下定決心，永遠也不要再墜入這種錯誤的迷思中。

她也很早就感覺到波蘭這個國家的某些地方已經腐蝕。比如她震驚地發覺家里有些情況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一致，因為，不管在家里討論什么，她受到的教育畢竟還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對一個年輕人而言，她注意到的某些情況總是顯得格外刺眼，格外讓人難以承受。比如理論上講，平等應該是普及的，但是她家卻住在相較于波蘭的標準屬于豪華奢侈的、特別保留給要職人員的住宅區。除此之外，他們還享有種種其他特權。另外，一些歷史的發現也令她倍覺沮喪。比如她上高中時，曾聽到一個嶄露頭角的異議分子談到斯大林針對多個民族的政策[[29]](#_29_1)，對她而言，這根本是一個令人驚恐的真相。還有一次，當她首度踏出國門時，接觸到一份由移民所發行的出版物《文化》（Kultura）[[30]](#_30_1)，其中公然抗議的文字也震撼了她，當時這種評論仍有褻瀆圣物般的威力。此外，意識形態偶爾也會在她家里抬頭。海倫娜記得她已經很大時，父親還當街打過她一次，因為他發現女兒在投票亭里把所有候選人的名字都打了叉，以抗議選舉的虛偽。“其實他是最疼我的，”海倫娜告訴我，神情間沒有一絲對父親的怨恨，“他只是一時氣瘋了。”

海倫娜直到1967年她二十二歲的時候，才真正下定決心投身政治。那年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大事，塑造了她那一代所有人的良知與意識。一是蘇聯入侵了捷克，二是波蘭政府開始展開反猶太人和反知識分子的運動。波蘭人習慣于將歷史上重大事件發生的月份作為該事件的名稱，所以那次運動便被稱為“三月事件”。

“我認為三月事件是一場完全沒有意義的表演，”海倫娜尖銳地評論道，“不過也逼得我們完全沒有辦法不投入其中。”也許迫使他們無法置身事外的原因是反猶運動的慘無人道吧。許多猶太人在那時離開了波蘭，其中大部分是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海倫娜則屬于那些未曾考慮過離開的人。這種選擇總是部分出于理性考慮，部分源于偶然因素。海倫娜從未親身經歷過反猶主義，加上她后來完婚的丈夫不是猶太人，且定居波蘭。就像許多那個年代的波蘭猶太人一樣，她深受波蘭文化的熏陶；而且——或許海倫娜會討厭我選用的字眼——如果不是受到團結一致和對國家的熱愛的激發，沒有某種愛國精神的話，她后來的許多行動都是無法真正得到理解的。

不過她的投身政治應該也受到出身背景的影響：海倫娜畢竟成長在社會參與的環境中，對她而言，某些理想雖然不時受到背叛，但仍然是她所認同的。事實上，她首次從事的政治活動，雖然內容不同，形式上卻重復了她父親約四十年前所從事的活動。當年她父親是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因印制和散發非法傳單，很快被扔進監獄；同樣的，海倫娜也和一個朋友印制傳單，呼吁工人和學生的團結，并在烏爾斯（Ursus）的工廠住宅區散發。

海倫娜的小小煽動逃過了法律制裁。在第一次的嘗試后，她拋下政治去結婚生子，在銀行工作，然后在沉悶的工作之余學習英語。直到波蘭再次天搖地動，再度面臨道德的轉折點。1976年，雅采克·庫隆（Jacek Kuroń）[[31]](#_31_1)這位日后成為極有魅力的反對勢力領袖，還出任國會議員的朋友要求海倫娜協助“勞工保護委員會”（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 KOR）。那是個新成立的組織，目的是回應對工人的迫害，日后成為團結工會的萌芽之一。

庫隆希望她擔任一家瑞典電視臺采訪團的英文翻譯，前往烏爾斯那家她曾散發非法傳單的工廠拍攝紀錄片。

海倫娜起先拒絕了這項會帶來相當程度危險的行動，尤其她很擔心“新聞里那些反猶太的屁話”，她不想承受那么丑陋的罪名。后來，她和另一個日后也成為團結工會重要領袖的朋友“仔細商議了”該怎么做。“我考慮了整整三天，”她說，“到第三天，我開始覺得反感透頂，對我自己、對我朋友都是。如果我同意為勞工保護委員會工作，我相信他們一定會讓我失業，然后展開抵制我的行動，不過我已經做了無法拒絕的決定。做人就應該這樣。烏爾斯的那些人的確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我知道我不能視若無睹，那不是做人應該有的態度。而一旦我做了這個決定，我就絕不會回頭。”

從那時起，海倫娜和她丈夫維特克（Witek）便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勞工保護委員會。后來雅采克·庫隆在他精彩的自傳中還曾述及勞工保護委員會時期的積極參與、無畏無懼，以及支持反對陣營的高明策略。勞工保護委員會最大的突破是有效地讓案件曝光，以純粹法律的立場就所有對勞工的迫害提出抗議，因此迫使當局遵守他們自己制訂的規章，在他們自己的游戲中擊敗他們。就是在這期間，數以千計的人都知道庫隆的電話號碼，一旦在公眾場合有逮捕行為，馬上就有人打電話給他，而他則可以通知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或其他有用的組織。這段時期有周末四十八小時拘留的規定，后來還形成了慣例，即庫隆和其他人會告訴他們的朋友，待星期日晚上他們獲釋出獄后，記得打電話過來回復。

只要有需要他們的地方，海倫娜和她的丈夫便提供支持，包括整理勞工保護委員會最新資訊或聯系西方媒體等。“事實證明，不論做什么我們其實都做得很好。”海倫娜的語氣客觀，心態持平。她習慣把自己和其他人一樣看待，在稱贊或批評自己時，沒有矯飾的謙遜或浮夸。

波蘭的特點在于工人和知識分子神話似的聯盟，這是波蘭“革命”獨一無二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勞工保護委員會的努力。馬克思主義的至善竟在此刻真正實現——當然，是站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的立場上的。團結工會剛起步時，海倫娜擔任《新聞快報》（Information Bulletin）的編輯，維特克則負責生產。海倫娜說，當時她的工作負擔“沉重得難以想象”，比她在《選舉日報》擔任編輯時辛苦得多。“消息大約有兩百頁，每個星期出版兩次，還得毫無差錯。”

在1981年的鎮壓行動中，海倫娜和維特克僥幸逃過逮捕。12月12日晚上宣布戒嚴令時，他們剛好看完電影，順便繞道辦公室。“這是一年來我們第一次看電影。”他們抵達時，辦公室的電話線已被切斷，電報傳送機也是。往窗口望去，只見一群群民兵正從前后包抄而來，辦公室里的一些同事已經準備好要抵抗，但海倫娜認為那只是“沒有意義的”英雄主義作祟，逃跑是唯一的出路。海倫娜和維特克即刻逃走，前往附近一棟建筑尋求庇護。門房立即讓他們入內，與此同時，軍隊也闖入了辦公室所在的建筑。

隨后兩年，他們一直生活在逃亡中。那是地下組織活躍的時期，只有透過海倫娜的描述，我才開始了解那種陰暗而輝煌過往的實質含義。海倫娜和維特克不能回家，否則馬上就會被民兵帶走。他們只能躲在其他人的公寓，而且每兩個星期就要換一間，如此才不容易被追捕。當年才七歲的女兒露西（Lucja）被托給海倫娜的母親照顧，他們每星期探視一次，通常選在一個公園散步。他們的婚姻因為維特克和跟他一起藏匿的女子有了感情，也于這期間破裂。盡管做不成夫妻，他們的政治活動卻沒有受到影響。兩人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仍和幾個朋友共同創辦了《馬佐夫舍報》（Mazowsze）這份主要的地下報刊。海倫娜和兩個女性朋友藏匿在一處。三人同睡在一張沙發上，腿就只好伸到椅子上。“我睡中間，因為不管任何情況，我都睡得著。”海倫娜說，“我的適應力在那段時間還真的通過了考驗。其他人都沒有辦法繼續下去，我卻可以。”她可以通宵工作，當其他人在桌上打字時，她也可以在桌子底下呼呼大睡。

對海倫娜而言，東躲西藏的生活最累人的地方，是必須一直扮演客人的角色。他們藏身的公寓很小，公寓主人都是一般民眾，很希望和他們聊聊天，了解最新的發展。“他們對我們很好，”她補充道，“我真的覺得欠他們很多。”當我詢問他們的短暫居留是否需要負擔房租時，海倫娜對于我竟然會有這種想法深感驚訝：“不可能，當然不用。我們根本不會想這種事。”她機關槍似地抗議道，“那是美國人才會問的問題。這里沒有人會考慮這種問題。”

顯然，也沒有人想過能不能信賴收留他們的主人，或者彼此，又或者他們自己。“這是在這里做地下工作的特點之一，”海倫娜說，“在這個國家，我們知道誰可以信賴。我們認為不會有人告密。”

的確，這應該是波蘭異議分子的典型處境，和東歐其他國家有著顯著的不同。由于反對勢力廣泛，社會的大部分民眾都團結在一起，再加上至少在這方面，人們相互是可以信賴的，許多民眾都愿意承擔巨大的風險。

除此之外，勇敢的精神也深植于波蘭的傳統，形成了一股信念的力量。海倫娜雖然沒有被逮捕過，但是她和她的大部分同志一樣，也有過公寓被搜查以及被秘密警察審問的經歷。海倫娜說，到頭來，每個人都發展出一套獨具風格的應對技巧。“雅采克·庫隆會和警察一直討論某件事情，讓警察覺得無聊之至，不過他本來就覺得我們應該跟每個人溝通。亞當·米奇尼克則會冷嘲熱諷，或企圖說服警察他們錯了。我則什么都不說，因為我根本不想說。我知道他們所有的把戲，又臭又長且毫無戲劇性，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警察知道我們不是重要人物，跟我們磨也磨不出什么結果。”

盡管海倫娜對自己非法行徑所冒的危險顯得若無其事，但確實有那么幾次，她也覺得自己就像置身電影《法國販毒網》（The French Connection）[[32]](#_32_1)中一樣。比如有幾個晚上她去報社上班時，會換乘好幾輛車，或繞道而行，或在高架橋下面奔跑，以便擺脫她認為形跡可疑的跟蹤者。后來這段秘密歲月終于接近尾聲。政治氣候開始轉變，海倫娜和其他人判斷應該可以現身了，不過還是必須聰明機變，以免招來對自己的指控。1980年代末期，團結工會總算恢復實力，又開始和政府展開談判，只是絕對沒料到他們會大獲全勝。

“我們完全缺乏想象力。”海倫娜說。因為團結工會當時所要求的不過是作為工會的官方地位，但當局已經看到了墻上的抗議涂鴉，準備交出部分權力了。

盡管事情的發展在意料之外，但他們卻很快心領神會。早在1989年討論過渡政府組成的圓桌會議期間，《選舉日報》便開始發行了。亞當·米奇尼克要求海倫娜加入報社。從那時開始，她便擔任發行人和副總編一職。對于這個新角色，或者踏入資本社會叢林，海倫娜顯得毫無所懼。我看到過她在《選舉日報》凌亂的辦公室主導全局時的自信，還幫她的職員從一家美國銀行取得房屋貸款。在一部關于《選舉日報》的紀錄片中，她也用她柔和而堅定的聲音表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那么艱困的環境并不是障礙，因為你絕對可以利用你所能掌握的方法和資源找到出路。海倫娜對報紙的規劃遠大，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她的野心不純然是自私的，仍是為了理想。對于《選舉日報》，她希望能成就和世界上最好的報紙相互抗衡、平分秋色的“甜蜜的小奇跡”。

盡管這種態度好像是標準的美式想法，但在跟她交談后，我能看出其根源多半還是本土的。就某種意義而言，地下工作為海倫娜此刻所踏入的更開放的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準備。雖然抱持著高度理想主義，但在歷練的過程中，異見分子也訓練了承擔巨大風險、迅速做出困難決定，以及肩負困難責任的能力。海倫娜是比較幸運的那群人之一，對他們而言，從一個時代到下一個時代幾乎做到了無縫銜接，不但工作上如此，在某些更珍貴的方面也是——比如一直未被擾亂的良知。她無需背負自責的包袱或藏匿羞于啟齒的秘密，也沒有需要放下的遺憾。

處于一個擁有如此巨大權力和責任的位置，她有沒有感到作為一位女性有什么特別困難之處？“沒有，完全沒有問題，”海倫娜回答，“在我旅居美國那年，這也是我無法理解美國女權主義的原因之一。不過你知道，在波蘭，女性的情況不一樣。一方面，女性處于更惡劣的情況——所有那些下班回家后排隊等著你的事；但另一方面，她們的境遇比較好。”她認為波蘭女性的境遇比較好，是因為波蘭的傳統，女性在參加社會運動與參政當權上始終沒有缺席，有著悠久的淵源。的確，在波蘭面臨危難時，許多起義和秘密活動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她們加入反抗力量，后來還潛入地下活動。這種為了維護共同的脆弱理想而產生的同志情誼，遠比兩極化的性別刻板角色更有力量。這也部分揭示了我在海倫娜等人身上所目睹的令人敬佩的女性力量。

天色漸暗，海倫娜的女兒露西原本一直在做功課，此刻進來問母親一個有關英語文法的小問題。海倫娜告訴我，逃亡藏匿最痛苦的一面，就是“想到露西，擔心自己會扭曲了孩子的一生。不過露西成長得很好，那段經歷也強化了她的某些個性”。的確，露西不像是個生命被扭曲的年輕人。她是個纖細高挑、非常迷人的十六歲女孩，面容俏麗，動作輕盈。海倫娜對自己女兒的美貌、經歷種種困難的適應能力，以及在《選舉日報》擔任助手時的乖巧能干十分自豪。不過此刻海倫娜卻忙著教訓露西：“來吧，露西！不要這么懶，你自己想得出來的，請你稍微動點腦筋好嗎？”她的語氣犀利但充滿疼愛，我看得出來露西也并不介意遭到挑戰或被布置任務，她們之間并沒有敵意或代溝。從這段短短的互動中，我可以想象露西正被導向我童年記憶中那套波蘭的人際關系體系。在那套體系下，人們互相喜愛卻并不感情用事，因為大家都平等地接受某種共同的期待，對于自己和對方應扮演的角色有著某種共識。或許這種共同的價值觀和榮譽感才是團結工會和海倫娜力量的核心所在吧！

當海倫娜陪我下樓幫忙叫出租車時，我又問了她一個“美式問題”。我問她，為什么要做這一切，為什么在明知隨時可能遭到懲罰，而且幾乎無法獲得報酬的情況下，還要承擔這些沉重的壓力和艱險？

“喔！伊娃，饒了我吧！”她回答，正如我所料，“其實，你知道的，”她有些尷尬地停頓片刻，“基于一種責任感吧！為維護我自己的尊嚴。人是不會自己走進糞坑的。我可以告訴你，”她的語氣略有變化，仿佛終于解釋到重點，“這里的實際情況就是那么討厭，讓人完全無法接受。是啊，有些人不喜歡我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以前干過什么臟事。我不干那種事，我既不想說謊，也不想過雙重生活。也許人天生還是有點正義感的，知道自己何時不正確，何時正確。所以有些事是一般人不會做的，僅此而已。”

我在波蘭長大期間，在克拉科夫周遭的社交圈中，海倫娜說的“他們”是遙遠的一群人，而且人們就希望他們維持那種形象：畢竟“他們”是那個意圖掌握我們生命、為所欲為的體制的一部分。后來我閱讀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回憶錄，看過他們對良心的敘述、對靈魂的探索，以及對上帝失敗的分析，但是我并沒有真正和“他們”碰過面。在我居住的波蘭地區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是見不到他們的。除了鐵幕以外，波蘭內部也有一層屏障。

那當然是個有孔的屏障，在某些圈子中，人們會定期穿梭于屏障兩側，不過他們也會感到自己真的跨越了一層無形的邊界，或在一層面紗后面，帶著偷窺的刺激心理往外窺探。他們是國家中的國家，就某種意義而言，可以說是被隔離的少數分子，是困在自己城堡里的藍胡子[[33]](#_33_1)。

不過當我和我那群異議朋友交談時，卻發現這個框架下有個有趣的轉變，因為這些異議分子很多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孩子。在這方面，海倫娜也不例外。在波蘭異議人士領袖中，父母屬于早期共產黨領導人物者的數目相當驚人。精英中的精英引領某種反精英的風氣，或者相反。

我的朋友們對于他們父母的所作所為通常模糊其詞，也許他們寧愿不知道。不過當他們發自內心地厭惡他們年長一代所支持或代表的東西時，就會打趣地談及自己父母的一些軼事。

比如我的朋友瑪爾塔（Marta）提到的1968年她入獄時的一段趣事，是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也許因為她是一名重要共產黨員的女兒，所以當時波蘭總理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中說明愿意釋放她，不過她得做些讓步，并且發表聲明。當她正發愁該如何回復總理時，父親前來探監，告訴了她一個有關他自己父親的故事。在大戰前，瑪爾塔的父親因為從事共產主義活動入監服刑，她的祖父前來探視。當時瑪爾塔的父親如果答應類似的條件，也有獲得特赦的機會。“我不知道你會怎么做，”瑪爾塔的祖父告訴她父親，“你也知道，我不是共產黨，我跟你的意見也不一樣。不過對于這種恩惠，我們是不會去乞求的。”在知道這個故事后，瑪爾塔知道該怎么做了。她拒絕了總理的提議。

當然，這批異議分子的父母都是早期的共產黨人，大多都在理想主義的激發下挺身而出，雖然后來踏上了腐化和濫用權力的不歸路。有一天，我終于見到了“他們”中的一分子——海倫娜的父親。剛見面時，不知為何，他立即讓我聯想到托爾斯泰小說中的一個小人物：一個落后于時代的、過氣的啟蒙主義理性主義者，絲毫不理會外面的世界早已超越他，依舊逗留在他的私人實驗室，以極其清晰的理智、樂觀健全的心態操作毫無意義的科學實驗。

海倫娜的父親費迪南德·哈博（Ferdynand Chaber）個頭矮小，因為年歲已高而身形消瘦，不過以八十四歲高齡而言，他仍舊行動敏捷，聲音也很爽朗，對于自己的年紀和活力甚感得意，“我的生活方式很理性，”他愉悅地告訴我，語氣明顯帶有教條主義的意味，“我吃得很健康，每天都運動，早上半個鐘頭，晚上半個鐘頭。我管理自己的花園，從來不看電視，因為電視就像心理上的口香糖。我跟別人相處得很好。為了維持健康，一個人必須有思想，也必須有行動。還有，我應該再加一句，我的個性非常樂觀。”

講到興奮處，哈博的聲音會提高到雄辯的分貝，還會規律地用手勢加強語氣。有時他似乎在對群眾演講，或在對一群需要激勵的無形觀眾演說，而不只是面對一個坐在一旁、接受茶水點心招待的客人。

不過，哈博的眼神始終寧靜，無論是談到理想、人類的本質還是點心和禮物。我們才開始談不久，他的聲調便揚升到雄辯的高度，每講一句，手指便在桌上敲一下，儼然以救世主的姿態窺探未來。“現在，我們正來到長期革命的轉折點。美國已經贏得了冷戰，但我們面對的戰爭將更為嚴峻——一場對抗霍亂、亞馬孫河叢林被毀、饑餓和饑荒的戰爭。我不想夸大其詞，不過這是最后的時刻，我們需要共產黨協助我們塑造新的良知。我很希望能活到2000年，屆時共產主義會重新獲得它的歷史使命。”

政黨的命運始終塑造著哈博的生命敘述，賦予它意義。他的故事具有全景式共產主義長劇的所有元素，蘇聯史詩性電影經常從中取材：秘密聚會和慷慨激昂的非法演說、入監服刑后又僥幸脫逃、在戰爭期間前往蘇聯朝圣、黨內地位提升，以及最終遭到驅逐。和許多過去的活動家一樣，他有令人肅然起敬、充滿熱情的歷史記憶，連五十年前的派系斗爭和意識形態辯論都能清楚地回憶，言詞間帶著澎湃的黨派熱情。

海倫娜的父親之所以成為共產黨員，原因同戰前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一則因為當年和富有的雙親前往鄉下度假，深深為他所目睹的窮困景象所震驚；二則因為在動蕩、工業化且貧窮的波蘭，他認為共產主義提供了一個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和其他社會弊病的答案。他在1928年加入了當時還屬于非法組織的政黨，不到一年即開始撰寫非法的宣傳冊，正如四十年后他的女兒也撰寫宣傳冊反抗他隨后出任要角的政權一樣。他很快遭到逮捕，被判刑四年，這是他一生六度被捕中的頭一次。

海倫娜懷疑她父親在職業生涯中持續做了一些“可怕的”事，而她也用了大半生來抵抗她父親始終篤信的教條；但是他們父女的境遇，或者命運，仍有著某種延續。費迪南德·哈博認為他之所以被從位高權重的黨內職位趕下來，是因為他的子女從事地下活動。在1960年代末期，海倫娜和她的兄弟都參加了一個名叫突擊隊（The Commandos）的共產黨改革派青年組織所領導的學生抗議活動。正如對待家庭異議分子的常用做法，那個組織成為黨內宣泄怒氣的鎖定目標，哈博的上司要求他公開清算突擊隊。在當時，“清算”是個帶有強烈情緒的字眼。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應該致力于“自我清算”，然后迅速接受懲罰。他們也必須接受命令去“清算”其他人；如果拒絕“清算”，很可能會帶來致命的后果。哈博拒絕“清算”，而且在自己的同志面前為兒女辯護。他說他就是這樣教育自己兒女的，而且為兒女和他們秉持的理想精神而驕傲。“說心里話，”對他而言，內心顯然是另一個獨立而次要的現實，所以他說，“我很高興我的孩子能為理想而活。”

為理想而活，這對現今許多重要異議分子而言，顯然跟對早年篤信共產主義的人一樣重要。只是上一輩將其信仰轉化為嚴格的教條，而他們的孩子則成為有原則的溫和主義者，對所有好戰的意識形態均抱持懷疑的態度。我曾問過費迪南德·哈博，他認為自己曾經的信仰到底哪里出錯了。“我告訴你我從中學到的一件事，”他回答，“我絕不會再用武力強迫任何人快樂了。”

然而，他們兩代都牽扯進同一出戲劇里，所卷入的斗爭，其本質他們早已熟知。這出劇目前已經步入尾聲。不過正如父母傳遞給子女的通常并非他們原本的面貌，而是經過美化的、想象中的自己，那些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也傳遞給下一代某種政治道德和社會參與的理想化的社會自我。只是諷刺的是，他們傳遞下去的理想，卻攜帶著反抗的種子，使得他們終于走向潰亡。不過那理想性和戲劇化，多少可以解釋我在許多當地人身上所看到的堅定的個性、挺直的腰桿和沉穩堅強的性格。只是這些特質能否在更為分化和復雜的新時代環境下存活，就不得而知了。

有個下午，我去拜訪了一個算命師。這是我平常絕對不會做的事，不過我告訴自己，去看她是反映當前社會現象。在波蘭，各式各樣的人都會去算命、去請教靈魂導師、去嘗試另類療法。最近這方面的需求更有激增的趨勢，或許是拜其他的解釋方式都徹底失敗所賜吧。

我求教的算命師住在人民軍街（Avenue of the People's Army）。這位干癟的老太婆彎腰駝背，沒有牙齒，身上裹著圍巾和毛衣。她拿出短禿的鉛筆、沾有油漬的紙和一打古老的紙牌。“你會發一大筆財，小姐，”她以平穩的聲調緩緩說道，“不過首先，你得先撐過這該死的休克療法才行。”真是個政治消息靈通的占卜者！“你的心臟沒有問題，”她說得篤定，“不過去照照心電圖也無妨。”我沒有透露關于我的任何信息，直到算命結束后才告訴她我是個移民。她憤怒地瞪了我一眼。我騙到她了！出于報復，她狠狠敲了我四倍的費用，不過就國際標準而言，她還算是便宜的。

一進入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我就驚住了，剎那間宛如置身舊金山或康涅狄格州或美國中西部。大理石地面、反光的表面、長形皮質沙發，還有精心設計的插花，在在散發出一種經過仔細琢磨的、不偏不倚的豪華，讓人覺得這里不會發生任何不好的事，也沒什么可發生的。這家酒店是幾年前才建成的，為本地屈指可數的典雅場所之一。

我來這里和一名美國記者小酌。飯店酒吧里全是外國人、自由化之后重新歸來的波蘭人、高級陪酒小姐，以及新興的有錢人。一杯伏特加，而且只是波蘭的伏特加，我的老天啊，就要花十美金。在光線昏暗的大廳，穿著俗麗西裝的男士圍坐在小矮桌的四周，討論著合資企業的問題。其他的則坐待合資企業之類的機會來臨。對這種人已經有個特別的稱號：萬豪酒店坐客。

和我碰面的記者很慶幸來到萬豪，對他而言，這里也許是華沙唯一能待的地方。在這里，他的行為舉止也宛如在自己家中一般充滿自信。他和一位來自加州的女性朋友一起現身，對于波蘭人之所以不太聰明，她自有一套理論：因為波蘭人的飲食不健康。盡管她并沒有和任何波蘭人交談過，卻好像并不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對。

我自己也會不時來這里，以離開景象破敗、氣氛尖銳的華沙，暫時沉浸在飯店平淡、單純的舒適中。不過今天晚上，飯店的氣氛卻有些詭異，令人窒息，宛如冷不防地甩了外部世界一記耳光。一名女歌手唱著一組國際歌曲，包括幾首猶太曲調。今年夏天，猶太歌曲似乎頗為流行。一些打扮過度的波蘭人昂首而入，仿佛刻意要吸引旁人的目光，隨后又出現了一群穿著邋遢的以色列人。更多美國記者加入我們，抱怨波蘭是如此一個難以忍受、乏味沉悶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我竟然有些抵觸，隱然對波蘭已有所牽絆。

團結工會的破裂，并非開始于一聲巨響或一句抱怨，而是轟動的崩裂。很偶然地，我幾乎在事發當時就聽說了，當時我正好再度造訪《選舉日報》，與亞當·米奇尼克見面。

米奇尼克個頭矮小，而且意外地，有著溫和的面貌。他的頭發和襯衫一樣凌亂，灰藍色的眼睛閃爍著警覺與諷刺的光。對我而言，他著名的個人魅力部分是種優雅的諧謔，部分則來自直言不諱的天性，能毫無戒心地敘述簡單的事實。或許這也是他借以展現道德權威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迷人輕松的方式傳遞深刻的道理。米奇尼克的故事已經成為波蘭政治神話的一部分。在大約十四歲時，亞當創立了一個名為“矛盾探索俱樂部”（The Club for the Quest of Contradictions）的組織，雖然不過是一個高中生的玩意，但日后卻成為波蘭成熟反對活動的一粒種子。這個組織探討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波蘭歷史與意識形態，讓當時的政府有如芒刺在背，因此被時任波蘭總理指名譴責；但對十幾歲的亞當而言，此舉不啻無上光榮。

從那時起，原本只想當一名歷史學家的米奇尼克，毅然踏上了激進主義、坐牢和寫作之路，而執筆寫作主要是拜關在監獄里無所事事所賜。他的許多英勇事跡和言論已經成為傳奇。有則米奇尼克的軼事不斷被傳頌，就是發現自己置身情緒失控的群眾中時，米奇尼克如何跳上臨時搭建的講壇，盡管有口吃的毛病，卻以言詞讓騷亂者安靜下來，阻止了他們攻擊夾在人群中的警察。雖然他本身對警方并無好感，但是他卻更加厭惡暴力和報復心理。他曾寫到在戒嚴期間，政府如何準許他前往蔚藍海岸歡度圣誕節，政府寧愿擺脫他，也不愿面對他的存在所帶來的尷尬。他以一連串雋永的語句回絕了政府的好意，其用詞遣字在我看來，真是在壓力下仍不失優雅。他寫道：（1）“如此公開承認自己玩弄法律，只有笨蛋才會這樣做。”（2）“向一名入獄兩年的囚犯提供前往蔚藍海岸的機會，以換取他的道德自殺，只有卑賤者才會這樣做。”（3）“相信我會接受這種提案，等于相信每個人都是警方的同伙。”

在團結工會成立早期，米奇尼克曾是瓦文薩的主要顧問之一，兩人也成為私交甚篤的朋友。那段友誼具有高度的象征意涵，代表了知識分子和勞工階級間一種格外迷人而純凈的聯盟關系，從而使得團結工會在斗爭期間成為一股獨特的現象。有很多關于米奇尼克和瓦文薩緊急會商、竊竊私語的影像，而總統、總理或其他代表權力的人物則守候在一旁，靜待他們的決議。

他們的搭配可謂大團結的最佳代表：兩人都精力充沛、個性幽默，而且非常聰明。他們的機敏和魅力各異其趣，那也是傳奇的一部分。瓦文薩自稱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一口濃重的農民腔波蘭話，公開表示自己信仰的虔誠，在面對緊急情況、危機和群眾時，經常展現出高度的智慧和準確無誤的直覺。米奇尼克的舉止則帶有若干古老波蘭的拘謹，是個完全的知識分子，有著良好的歷史觀和大局觀。據說他是瓦文薩許多政策后的智囊人物。

米奇尼克和瓦文薩的友情，當然是極為浪漫的；不過正如許多浪漫關系一樣，讓他倆結合在一起的差異性，此刻也正在打破二人的關系。就在這個下午，米奇尼克收到瓦文薩的一封信，要求他——或者應該說是命令他——要么辭去《選舉日報》主編的工作，要么撤下報紙刊頭上團結工會的標志。米奇尼克迅速向我解釋了這項令人吃驚的舉措的背景。導致這次決裂的裂紋早在過去幾個月便已逐漸顯露。這個決裂部分是私人的，《選舉日報》刊載了幾篇批評瓦文薩的報道。根據一項輿論調查，有些人對于瓦文薩的行為和他不會講法文頗有微詞，這點讓瓦文薩感到十分不滿。這是“知識分子”對出身群眾之人的毀謗；而瓦文薩的虛榮心很容易受傷，是眾人皆知的事。

盡管如此，命令米奇尼克辭職仍是一個相當專橫的舉動，令人懷疑瓦文薩是否認為他就是團結工會的化身和帝王。他的信函所實際表達的就是“團結工會，c'est moi（即我）”[[34]](#_34_1)。而這諷刺不單只是可笑而已，更會對波蘭產生許多潛在的影響。

我必須承認我實在不想失去瓦文薩在我心目中有如天才的地位，他不僅為自己而戰，也為整個波蘭而戰。我腦海中仍存有種種關于他的鮮明畫面：在最混亂的局面中挺身而出，機智地挑釁他的對手，尋求最佳應對方式和最有利的立場，為所有工人階級而戰，匯集群眾的憤怒和智慧而發出怒吼——否則他是在為誰而戰？在領導方面，瓦文薩似乎從未有過自我主義傾向，不過就像有些人會被權力所腐化，或許有些人也會因為沒有權力而腐化吧？在這個過渡時期，瓦文薩已經失去了戰斗或表演的舞臺。在圓桌會議上分割他曾擁有的權力時，他沒有替自己安排任何角色。過去幾個月，他過著平民的日子，顯然也萌生了怨氣。這位終其職業生涯從未在政治上失去平衡的人，竟第一次表現出如此笨拙的姿態，似乎仍無法把自己在波蘭生活中所實際具有的莫大重要性與此刻的無能為力聯系起來。

米奇尼克把他草擬的回函拿給我看。語氣充滿尊嚴，卻不過于正式，仿佛想要喚醒他倆之間曾經擁有的情誼。首先他以遺憾而堅定的口吻表明，他——米奇尼克本人，沒有意愿，也沒有權利達成瓦文薩的兩項要求。他提醒瓦文薩，《選舉日報》是個合作企業，編輯由他的同事們共同任命，有關標志等重大決定也必須共同決定。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米奇尼克問我。對于自己完成一篇強而有力的文書，米奇尼克帶有一絲作家的得意之感。但是對事態的轉折，他看來還是相當難過，我也可以感受到這種沉重。畢竟，這項爭執不單是兩個老朋友之間的爭論而已。事實上，他們之間的裂痕遠比這起事件更加嚴重，而且在過去幾個月不斷加深。這是“格但斯克”（Gdańsk）[[35]](#_35_1)和“華沙”之間的分裂，是團結工會的平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分裂。這是相互譴責的開始，是雙方角色兩極化的起點：在這新的一幕中，格但斯克的人們所代表的是民族主義分子，具有煽動群眾的傾向，把教會和國家混為一談，而且缺乏外交常識。知識分子則受到一貫的指責：自我優越感、和平民百姓脫節，還有想當然的，對共產黨過于軟弱。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這些發展明顯具有某種結構性的邏輯，是一種政治上的必然。如今他們共同的敵人已被擊敗，所有的意圖和目的都已經達成，因此團結工會的走向分裂，幾乎可以用數學邏輯推算出來，因為已經沒有一個巨大的磁場足以將他們團結為一體。一旦沒了統一的力量，人們自然會有不同意見、不同個性和不同意志，這些都是人性的一般特征。

但是不管是否難以避免，我仍可以理解為何這段友情的破裂，亦即團結工會的破裂，對米奇尼克而言特別痛苦。“瓦文薩是我孩子的教父，你知道的。”他說著，神情間再度流露出真切的悲傷。這段歷史使他們變得如此親密，也帶來了許多好的方面：彼此并肩作戰的能力、勇氣和對權力的成熟批判。但是那恐怖、英雄式的章節已經落幕，接下來的是多元的利益和彼此難以避免的爭執：競爭、選戰、呼喊口號與權力的斗爭，亦即民主的寫照，生命的寫照。

幾個月之后，我親眼見到了瓦文薩，那是在電視臺員工的一場聚會上。在這個夏天，他已宣布將角逐總統一職，事實上，他在電視臺的出現便是競選活動的第一炮。聚會廳內人山人海，充滿熱烈的期盼。當瓦文薩出現時，他一上來就說自己得了感冒，喉嚨痛，而且一個鐘頭內就得離開，以便趕赴另一場預定的活動。他面容蒼白、疲倦，人顯得矮胖。而他的演說，在沒有針對問題表達立場的時候，就是辯解和吹噓的奇妙組合。還有個人魅力——這最重要的神秘因素。他的魅力體現在他的精力、生活智慧，甚至是吹噓本身中；而一旦得到回應，他的魅力也展現在與觀眾的互動中。這是他最機智、最敏銳、最有自信，也最不正經的時刻。這明顯是他所熱衷的。他表現沖動，甘冒不韙。他不時有意無意地提及他所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接著又自我調侃地加以評論；他言詞尖銳地嘲弄聽眾，還說些不正經的笑話。這是一個還不算謹言慎行的政治人物，在演講中他指責新的團隊對他過于嚴厲；電臺的新首腦則解釋他們只是在扮演立場公正的媒體角色，不能區別對待，只把瓦文薩當成寵兒。但是我看得出來，在波蘭的環境中，所謂立場公正的概念，也許很難為一般人所接受。畢竟收斂個人的激情、意見和偏好這點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只是在過去幾十年的激烈戰斗和高舉黨派旗幟之后，對波蘭人而言，這種想法是不自然的，還需要時間適應。

在此同時，聚會廳內仍然充斥著激情和投入。一個鐘頭后，瓦文薩的助理提醒他該離開了，但瓦文薩不予理會，表示還要繼續下去。他就愛這一刻。他再次活動起來了。他高談他將成為什么樣的總統：“一個手中握著斧頭的總統”，清除前朝的權貴。這項政見完全針對立場溫和的對手馬佐維耶茨基而發。距離瓦文薩指定馬佐維耶茨基為總理還不到一年，此時這兩人卻極有可能成為競選對手。新的戰斗已經集結，另一個階段即將展開。

[[1]](#_1_2)茲羅提，波蘭貨幣名稱。

[[2]](#_2_2)貝爾納多·貝洛托（1721—1780），意大利城市風景畫家、蝕刻版畫畫家，以創作德累斯頓、維也納、都靈和華沙等歐洲城市的風景畫聞名。

[[3]](#_3_2)卡納萊托（1697—1768），意大利畫家，以描繪18世紀的威尼斯風光主題知名。

[[4]](#_4_2)團結工會，原名Solidarność，即波蘭工會聯盟，創立于1980年，由瓦文薩（Lech Wałęsa）所領導，主張非暴力的反抗模式。1980年代，團結工會結合波蘭國內的天主教徒及異議人士組織，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最終擊敗當局，成立波蘭共和國，瓦文薩亦在1990年成為波蘭首位民選總統。團結工會的成功事跡引來其他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各種反對團體的仿效，最后導致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相繼垮臺，并促成了19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

[[5]](#_5)羅伯特·勒德拉姆（1927—2001），美國作家，著有二十九本諜報驚悚小說，有“現代驚悚小說之父”之稱，《諜影重重》系列電影即翻拍自他的小說。

[[6]](#_6)愛德華·蓋萊克（1913—2001），1956年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擔任第一書記，和西方政治家關系良好，曾創造出經濟奇跡。后因經濟惡化，被迫于1980年下臺，并曾入獄服刑。

[[7]](#_7)波蘭圓桌會議于1989年初在華沙舉行，目的在于抑制社會動亂，規劃國家未來。會議分為團結工會所領導的反對派和統一工人黨所領導的聯合政府派。同年6月進行半自由選舉，統一工人黨被徹底擊敗；8月底團結工會所領導的聯合政府成立；12月波蘭結束共產黨統治。1990年初，波蘭共和國成立；同年底，瓦文薩成為首位民選的波蘭總統。

[[8]](#_8)亞當·米奇尼克（1946—），波蘭思想家，致力推動民主化進程，其政治代表作是《通往公民社會》。曾擔任團結工會顧問，并在瓦文薩執政期間短暫出任議員，1992年起負責主編《選舉日報》。

[[9]](#_9)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具有廣泛影響的波蘭電影導演、劇作家，以作品藍白紅三部曲和《十誡》等聞名于世。

[[10]](#_10)古希臘神話中，奧吉厄斯國王牛舍飼養有三千頭牛，三十年來從未清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為了贖罪，接受了這項挑戰，于一日內引入河水，將牛舍清洗干凈。

[[11]](#_11)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1932—2008），波蘭社會史學家和政治家，對波蘭第三共和國的形成貢獻非凡。在歐洲大學長期任教，是歐洲實體的信徒。

[[12]](#_12)雅魯澤爾斯基（1923—2014），波蘭政治和軍事人物。1981—1989年間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81—1985年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1985—1990年擔任波蘭國家元首，并在波蘭民主化之后將總統職位交給瓦文薩。

[[13]](#_13)哲學王一詞源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理想國》一書。書中借其師蘇格拉底的言論，認為理想國中的國民可分為平民、軍人、哲學家三等，其中哲學家必須具有高超的智慧與強健的體魄，是國家的統治者。

[[14]](#_14)20世紀前，這個詞指的是由三大議院，即下院、上院以及國王所組成的整個波蘭議會。后來直到波蘭第二共和國，瑟姆這個詞才開始被用于專指下議院。

[[15]](#_15)指波蘭王國、立陶宛大公國（他們在1569年合并為波蘭立陶宛聯邦）和在他們的影響下逐漸波蘭化的地方的貴族。

[[16]](#_16)波蘭立陶宛聯邦在1791年通過的國家憲法，編纂時間僅次于1788年正式通過的美國憲法。這一憲法的通過，惹惱了強鄰俄國，因此在施行一年后，即1792年，于俄波戰爭時被廢除，波蘭亦旋即遭到瓜分。五三憲法影響了后來的民主運動，在亡國期間成為復興波蘭的標志。

[[17]](#_17)埃德蒙·伯克（1729—1797），愛爾蘭的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

[[18]](#_18)托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國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動家、理論家、革命家及激進民主主義者。

[[19]](#_19)波蘭老鷹紋飾最早出現于公元10世紀波蘭第一王朝，后迭經修改。共產主義時期，皇冠作為反動標志從老鷹頭上被移除；民主化之后，才又恢復原有的設計。

[[20]](#_20)位于曼哈頓北部，以混亂的治安、奇異的路人、街頭籃球和涂鴉藝術著稱。

[[21]](#_21)這個詞原本泛指各行業穿著制服的從業人員，后來專指神父。

[[22]](#_22)加利西亞是中歐歷史上的一個地區名，居民西部為波蘭人，東部為烏克蘭人。該區長期為俄國和奧匈帝國的爭奪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歸屬波蘭。

[[23]](#_23)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波蘭地下軍反抗德國占領軍的戰役。

[[24]](#_24)畢蘇斯基（1867—1935），波蘭政治家，曾任波蘭第二共和國領袖。被普遍視為讓波蘭在經歷了一百二十三年的瓜分后，于1918年重獲獨立的功臣。

[[25]](#_25)指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nian Commonwealth，1569—1795），在17世紀達到鼎盛，是當時歐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其雛形形成于1386年立陶宛大公國君主約蓋拉（Jogaila）迎娶波蘭國公主。

[[26]](#_26)馬佐維耶茨基（1927—2013），波蘭作家、記者、慈善家和政治家，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二戰后中歐和東歐第一位非共產主義政府總理。

[[27]](#_27)捷爾任斯基（1877—1926），波蘭裔白俄羅斯貴族，蘇聯克格勃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創始人。該組織在俄國內戰和紅色恐怖時期，因拷打及處決大量人員而惡名昭彰。

[[28]](#_28)萊謝克·巴爾采羅維奇（1947—），華沙經濟學院教授，歷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波蘭國家銀行總裁等，被譽為“波蘭自由市場之父”。他以所謂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搶救奄奄一息的波蘭經濟，借由貨幣政策及市場改革的強力藥方，迅速將波蘭經濟導入正軌。

[[29]](#_29)斯大林在1940年代集體遷移和流放諸多少數族裔，其中包括波蘭人和猶太人等。

[[30]](#_30)1947—2000年由自由協會先后在羅馬及巴黎出版的文學政治性雜志，為研究波蘭文學的重要文獻，出版期間深受波蘭境內外知識分子喜愛。

[[31]](#_31)雅采克·庫隆（1934—2004），杰出的社會和政治人物，被封為“波蘭反抗勢力教父”。

[[32]](#_32)警匪劇情片，是好萊塢第一部拍出都市內飛車相互追逐效果的電影，1972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

[[33]](#_33)法國詩人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所創作的童話。故事主角藍胡子是個有錢卻樣貌丑陋的貴族，在城堡中獨居。

[[34]](#_34)此處用法語表示，顯然是對上一段說的瓦文薩不會講法文的嘲諷。

[[35]](#_35)格但斯克是團結工會的發祥地，德文名為但澤，Danzig。

# 第二章 波蘭（下）

距離我第一次搭機降落于華沙小型機場，已經將近一整年。這又是個五月天，但是這一次華沙給我的感覺卻不一樣。我感受著它無聲魅力所傳遞的寧靜旋律——面積廣闊的公園，規律嚴謹的日常作息，安靜的巷弄街道，獨行者鞋跟敲擊街面的回音。這次來，我不再期待看到什么預示變革的景象。但從上次來過后，我已經遍游東歐各國，大腦的“天線”已經適應了一種不同的城市美學，一種較輕的刺激和視覺噪聲。在此長大的經歷讓我知道，外界的刺激其實很少反映出人間萬象的真實趣味，而這并不耀眼的舞臺，又激蕩出了多少戲劇、變奏和快樂。

不過，舞臺本身也有了明顯變化。貫穿整個市中心的新世界大道上服裝店羅列，其中不乏品味高雅、價格昂貴的店家。幾個月前，豐田汽車門市開張，其上萬美金的產品竟然供不應求。有人提到最近新開了一家俱樂部，以有錢婦女為服務對象。還有一家包廂眾多、布置亮眼的希臘餐館，樓下掛著一個招牌：只限會員。沒有人真的理會那塊招牌，但是這種只限權貴的標志，在不久之前絕對無法想象。這里也有日本和中東餐廳。每家餐廳的服務生都變得比較有禮貌，不管什么東西都親切地加個指小詞[[1]](#_1_5)：“請問女士，您要一小杯咖啡，還是一小杯伏特加酒？”正式的態度顯得非常封建，我有時反倒希望（這也是人性無可救藥的倒錯吧）他們恢復原本桀驁不馴的粗魯低俗。

當然，這只是表面。雖然表面變得更光鮮亮麗并非沒有意義，但在光鮮亮麗的同時，也流于庸俗。新的東歐充斥克朗代克（Klondike）[[2]](#_2_5)淘金時期的爾虞我詐，以及“狂野東方”不受約束的機會主義。在緊挨著文化宮（Palace of Culture）[[3]](#_3_5)的地方冒出一個超大規模的市場，其混亂令人難以置信。搖搖晃晃的遮著塑料布的攤位內擺滿了草莓、奶油、香煙、電話錄音機、童裝和計算機組件。去年冷清慘淡的攤位，已經急速發展成這種無政府的活力。

至于文化宮本身——那個羞辱與嘲弄著蘇聯粗獷與力量的標志——我從它婚禮蛋糕的造型，以及山墻上造作嚴厲的獅子坐像，窺探到若干后現代主義的玩世不恭。除了它所代表的意義之外，文化宮何罪之有？

共產黨總部已經變身為股票市場。本季最賣座的電影是《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波蘭電影院沒有一家放映波蘭電影，一部都沒有。

市中心幾間貨幣兌換亭的玻璃上懸掛著新招牌：“武器”，令我瞠目，難以置信。其實亭內玻璃櫥柜中陳列的幾把逼真的左輪手槍只不過是梅西（Mace）防身噴霧槍，但它們的存在反映出人們最近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犯罪。而各種有關強盜、搶劫和詐騙的故事也解釋了為何這類奇特產品會受到大眾的歡迎。

失業數據現在得到定期統計。在街上，我經過好幾個熟悉的當代悲劇的形象：人們坐在人行道上，擺出凄涼孤單的姿勢，旁邊放著牌子，說明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人，或者染有艾滋病。

一個下午，我正坐在歐羅普斯基酒店的大廳啜飲咖啡，一個年輕男子朝我走來。他英俊瀟灑，一身筆挺的西裝，卻明顯懷有欺詐意圖。“我的錢被搶了，我女兒生病，肚子又餓，你不給我一點錢嗎？我不需要一大筆錢。”他一副專橫的口氣，眼神也厚顏無恥地顯示出他在撒謊。我嚴肅地搖頭拒絕。但是當這名毫無說服力的乞丐前往附近一桌波蘭人處乞討時，那群人卻跟他攀談起來。“讓我看看你手臂上的血管，”其中一人要求道。那乞丐故意緩慢地卷起衣袖。“你要錢明明是想買毒品。”問話的人下了結論。“不是的，”那家伙辯道，“我是要給我女兒的。”“那你身上為什么會有針孔？”問話者質問，“你想死，是不是？”“對，我看你想毀掉自己！”另一旁觀者憤怒地補上一句。不過，他們終究還是給了那男子一點錢。等他走開后，那桌客人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是否有誰能拯救這種人，抑或他只能自救。交談中這種個人感情的投入在紐約是絕對看不到的，但是那個男子的其他行為似乎卻是從其他現代化都市進口的。在我們這個小小的世界，是否各種病癥都可以模仿，甚至欺詐行為也會隨著國際化的電視網絡傳播到全世界？

一個晚上，我去華沙郊區一所別墅參加某位新貴舉辦的派對，他以從泰國進口計算機零件發跡。派對在一個植物茂密、景色宜人的花園舉行，令我不解的是，布置的主題竟是美國印第安風情。只見到處都是印第安圖騰的照片，還有一個紙糊的圖騰造型。樹上纏繞著成串小燈泡。屋子——或者套用派對主人偏愛的用語，“莊園”——里面有一間間寬敞的房間，搭配著現代化的設備，墻壁上懸掛著至為可觀的波蘭印象派和浪漫派繪畫。派對音樂偏重于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4]](#_4_5)的曲風，漂亮的年輕男女隨之舞動，活力四射，肢體動作有如芭蕾演員般靈活。對他們而言，此刻是不容許慵懶冷靜的。兩個男同志現身會場，一身時髦浮華的白色裝扮，頭戴紳士型草帽。

派對主人是個數學家兼企業家，向我解說了波蘭非法計算機貿易的發展史。大約十年前，因為和同事們工作上的需求，他開始從東南亞帶計算機零件回來，隨后就從計算機零件發展到整臺計算機，從一兩臺計算機發展為每趟帶十幾二十臺計算機。很多波蘭人都跟他一樣從事這種跑單幫的生意。他記得在飛機上曾遇見一個女的（順帶一提，這整個秘密的私人生意之所以能夠活躍至此，是因為從波蘭到遠東的包機票價出奇便宜），問他什么叫主機，結果一年后他回泰國時，那個女的已經開了一家店，而且計算機生意做得有聲有色。菲律賓有整家旅館都包給波蘭人的，整個成衣市場也由那群波蘭人運作。派對主人對于這段過往并不覺得難為情，也不認為這和他目前擁有的受人尊重的上層地位有何沖突之處。他仍在大學教數學，但他認為商業直覺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事實上，非法計算機貿易對共產主義的崩解也有貢獻，因為這類貿易創造了另一種商業系統，卻是政府無法管控的。基于在此地成長的經歷，我知道大多數波蘭人都會經營若干小型副業——無疑，這也是波蘭人進入初級資本主義如魚得水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群人中，一位女藝術家想要知道我是如何在美國“混成功”的。我是不是出身有錢有勢的家庭？不是的，我回答，差遠了。那，她問我，眼睛好奇地睜得老大，我需要往上爬嗎？是啊！一層一層往上爬，我告訴她，但是我不確定她有沒有聽懂我在嘲弄她。這些人在其他方面都表現得非常敏銳而含蓄，但一涉及財富、職業、野心時，就總忍不住露出赤裸裸的渴望之情，而且對自己饑渴的欲望并不覺得尷尬。

我很快便感到疲倦，其他人顯然有意繼續待到朝露沾濕草坪的時刻，我則還在調整時差。我心想這些人真的精力十足，每一方面都如此。波蘭式的炫耀或賣弄還沒有到頹廢的地步，依舊充滿著活力與期待，不過我忍不住把這幕情景和我所目睹的街頭景象聯系在一起。呃，好像沒辦法，我想那是無法像數學等式一樣組合在一起的。我記得有位歷史學家朋友曾經說過：歷史是借貸平衡的復式簿記過程，有所得就要有所失。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正是后共產主義東歐的寫照。派對主人吩咐他的司機送我回去，我也舒適地在安靜的華沙夜色中抵達居所。

很快，我再度和《選舉日報》的那群人聚首，海倫娜邀請我參加一個餐會。如今來往波蘭都變得比較容易：海倫娜最近才造訪過紐約；今晚聚會的主人在旅居國外近二十年后，終于返回波蘭定居；還有人最近幾天才從巴黎飛回國。層層障礙很快便被一一移除，而我對此甚至略感悵然，因為這類聚會在以往是難得又戲劇化的，總是伴隨著刺激興奮和濃郁的特殊情懷。我知道我這樣想并不理性，但情勢已經如此，我對于這新發展的總體狀況，還是感到欣慰的。

幸而這類聚會仍帶有以往非正式、即興的盎然生氣。聚會所在的公寓不大也不太整潔，卻自有其魅力，椅子是各式各樣奇特的組合。聚集在桌邊的一小群人是新的精英分子。這群人仍然年輕，他們有優秀的異議分子資質，全都是知識分子。一年前他們是統一團結工會前線的一員，現在——命運的車輪在初期這段日子轉動得異常迅速——他們已成了新反對運動的一分子。我去年造訪此間時瓦文薩寫給米奇尼克的信所開啟的裂痕，此刻已經加深。波蘭在這期間舉行了大選，瓦文薩當選總統，而許多反對他的黨派也開始成形。前來聚餐的這批人，就堅定地站在反瓦文薩的立場，把瓦文薩形容成怪物般的人物，不僅超級自負，還有獨裁傾向。他們認為，摧毀民主幼苗的很可能正是瓦文薩，而不是他們這些一般人認為的精英分子。

盡管對未來有陰暗不祥的預感，他們仍然興致高昂，狠狠地取笑對方，語氣中難掩喜愛之情，而且每個人都有極大的煙癮。海倫娜宣稱自己又累又餓，譴責主人晚餐拖得太晚。一個來自華沙附近地區的議員開始有聲有色地講述他選區最近經歷的一場戰斗，他五官端正，淺色金發加上清澈的藍眼，宛如海報上所描繪的理想型新波蘭政治人物。該地區有家成衣工廠，是當地居民的大老板之一，最近必須遣散約一千名員工。有家德國公司正籌劃開設一家工廠，剛好可以雇用這一千名，甚至更多的員工。這明顯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是當地市民卻持反對立場。那議員以有點嘲弄的口吻轉述他們反對的理由：“我們絕對不許、絕對不能再讓德國人高高在上了。”議員本人對外資擁有權是采取贊成的自由派立場的，覺得這種事沒有什么不對，因此必須施展所有說服的本事，讓當地人接納這位具有莫大獲利潛力的外國雇主。

理所當然地，那家德國公司非常感激這位議員幫了大忙，他則若無其事地說他競選正需要兩千五百美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向他們要。“你開什么玩笑？他們會笑你的！至少跟他們要二十五萬美金！”一個在西方待得比較久的人說道，顯然了解在西方，只有有野心的人才會獲得尊敬。唯有在提及這樣一大筆金錢時，有人才突然想到，向明顯有利益相關的一方募款，在政治上也許是不正確的。在美國會怎么做呢？有人問。也許非常隱秘吧，我回答，突然感到一陣厭倦。不過在座這些人沒有理由會自動遵循美國的慣例，在這個階段，所有規則都必須自下而上地形成。

晚餐后，話題轉到其他事情上。一條新聞快報提到某家新的食品行可以買到諸如卡芒貝爾干酪（Camembert）等稀有商品，接著大家聊起食譜，桌上的男士們也熱切地加入討論。議員先生記起年輕時性趣覺醒的時刻。“你克制一點！”他妻子警告他，不過議員極富詩意地述及他初次感受到熟女誘惑的軼事。接著又有人追憶起老朋友。“他1968年在坐牢吧？”有人詢及某先生。“對，不過只待了幾個星期，記得嗎？但被審問得蠻慘的。”對這間屋里的這些人來說，地下生活是他們共同的冒險，是他們的大學和研究生院，因此他們的傳記永遠會詳細著墨這一塊。不過那段冒險已是往事，屬于歷史分隔的另一端了。幾次偶爾的造訪，讓我想起以往這里經常進行通宵達旦的會議，因為這里時間太多，可以做的事太少，因此只有不斷的討論、討論、再討論。對于大家習稱為“同胞夜間會談”的這類集會，他們非常熟悉且深感親切。當然，現在每件事都已經不一樣了。不過對這屋里的人所展現的處變不驚；對他們面對驚濤駭浪依舊大步而行，仿佛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而不是最令人驚嘆的壯舉；對他們適應新情勢、新行業的迅速，我依然覺得驚訝不已。也許要一直活在持續震驚的狀態中是不可能的；也許只有在必要的改變根基都已經奠定后，站在一定距離以外回看，才會有這種震驚的感覺吧。

我以朝圣的精神決定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廠。那里畢竟是團結工會的誕生地，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也是新時代的起點。

我在一個灰蒙蒙的日子抵達格但斯克，從機場自行摸索到當地團結工會總部。那是一幢波蘭常見的建筑：潮濕、陰暗的走廊，飄散著難以描繪的濕氣。在等候的辦公室內，一位體型豐腴、精力充沛的女子對所有問題和埋怨都心平氣和地幽默以對。“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這是民主的官僚主義。”她押韻地回答一個對于新規定十分困惑、滿腹牢騷的男子。她以濃重的地方口音告訴我她其實已經超過退休年齡，可是她在這個造船廠工作了超過三十年，而且早年是個活躍的團結工會成員，“所以我的好朋友幫我安排來兼差，這樣我就可以跟他們做伴了”。

陪伴我參觀造船廠的向導是愛德華·史瓦基維茲（Edward Szwajkiewicz）。他短小精悍，蓄著短髭，身穿皮夾克，臉上沒有絲毫笑容或社交禮儀。這種不加修飾的嚴謹部分算是一種地方特征，我注意到其他人也是這樣，這種令人舒適的坦率作風還沒有沾染到首府優雅或造作的一面。但史瓦基維茲是團結工會的地區領袖，后來我才意識到，他的保留態度其實也來自久經歷練的戒心。“有些人我是永遠都不會對他們講任何東西的，”后來談到他的共產黨工作伙伴時，他才就這件事表示道，“我兩分鐘之內就知道了，就像我兩分鐘內就知道我能不能跟你談話。”

史瓦基維茲帶我到團結工會和共產黨政府第一次簽訂協議的會議廳。那是間沒什么特色的寬敞房間，令人聯想到社會寫實主義的自大風格，其間擺放著無數長桌和綠背座椅。不過當我站在會議廳里時，仍不禁感受到某種歷史的震撼，腦海中浮現出曾在這里舉行過的會議，疲倦而激昂的工人對著突然落入守勢的政府官員大聲叫囂著反抗與放肆的言詞。我站在這個平凡的空間，深受感動，就像面對某種人類成就的里程碑時那種心靈的悸動。

不過如今行走在造船廠的人并沒有任何勝利感。如果說這里是起源之地，那么這里也是開始消沉之處。團結工會也許就因為其所贏得的勝利，而終究遭到潰敗。史瓦基維茲告訴我這里的經濟情況岌岌可危，原本答應支持的外資始終沒有進來。“大部分來這里的外國人，都認為這是一趟非洲狩獵旅行。”他告訴我，“這里很有趣，但是我們很另類。他們不把我們的擔心當一回事，也沒有意愿和我們做生意。”

造船廠占地廣闊，卻散發著落魄工廠的虛耗氣息，雖然工程始終以某種形式進行著，但已經不再呈現活力充沛的繁忙景象。我們走過荒廢的建筑、搖晃的小橋，以及龐大吊車的陰影。就經濟而言，史瓦基維茲跟我解釋，造船廠成了它拼命爭取而來的改變的受害者。兩年前，這里有兩萬名員工，現在只剩八千五百人。一個船塢無助地停放著一艘已經完工的船，正是兩難處境的受害者：一方面，造船廠不再受到全額補貼，因此必須按照標準資本主義模式，貸款建造這只擱淺的巨獸；另一方面，原本訂購這艘船的公司已經無力支付船價，他們也無法逼迫對方履約。就像波蘭經濟的許多方面，造船廠被困在兩種體制中間，即如當地人所形容的“腐爛的共產主義和夾生的資本主義”之間。此外，造船廠也掙扎于社會主義經濟浮夸作風的貽害中，那正是導致它今日落入此種衰敗、毫無競爭力的地步的元兇。

寬闊的冶金廠房是全球有如煉獄般的工廠之一，但史瓦基維茲卻若無其事地領著我穿越惱人的噪音和充斥有毒化學物的廠區。我們快步通過，直到來到面積較小也較安靜的電力廠房，我才如釋重負。在電力廠房工作的少數員工都身穿深藍色工作服，造型有如廣告中的模范工人：聰明的臉孔、清澈率直的藍眼，流露出誠實或至少充滿決心的眼神。

我們站在凌亂的機器零件間對話，他們很樂意聊天，而且言詞犀利，辯才無礙。事情有沒有變得更好？我問他們。啊！如果不是他們的話，應該會變得更好，他們回答。不錯，仍然是同樣的他們，中間階層的當權人物，他們大部分仍占有跟先前同樣的職位。

“他們喜歡舊的規則，”其中一名員工說，“就是這些家伙讓這里停滯不前，害得我們哪里都去不成。”

這種說法我已經聽過好幾次了：最高階層的共產黨管理人員相對容易更替；中間階層，也就是任何官僚體系的主要支柱、行事消極的階層卻根深蒂固，難以撼動。這種人類的基礎架構就像過時的工廠和住宅區的硬設備一樣，極難移除。

“我們這里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一名年紀較大的員工說，“他一直在背后打我們的小報告，表面則一直說他希望每件事都能獲得最好的結果。你怎么跟他斗？當一個一直詆毀你工作的人就在你身旁的時候，啊，你真會氣死。”

“如果他還有良心的話，他現在一定會覺得很不安。”三人當中最年輕的一名員工試探著說。

“什么良心？”另一名員工回應道，“他們全都明目張膽，用從這里偷去的東西去搞合資企業了。而且誰也拿他們沒轍，因為現在我們有新的法律了。民主，正好讓他們逍遙法外。”

“嘿，你要不要親自跟他談？”另一人建議道，顯然認為能小小報復一下也大快人心。“你可以當我們的面問他幾個問題。”

不過那人并沒有出現，這讓我松了口氣，我對于帶有敵意的質詢并不拿手。

直到我離開前，最年輕，但也已經在此工作了七年的那名員工才以近乎反抗的語氣宣稱有些事現在的確更好了。“我們現在能意識到是在為自己工作了。所以午休吃飯，我們只四十五分鐘就會回來，這足夠了。因為我們現在想要工作了。”

其他人看著他，顯然認定這家伙是還沒吃過生活真正的苦頭。而我在后來跟馬里安（Marian）深談后，才充分體會到這群人挫折感倍增的心態。馬里安是冶金工程師，在船廠工作將近四十年了。他矮小靈活，有著精雕細琢的五官，敏捷的動作完全看不出年齡，而且彬彬有禮。對于一個境遇乖蹇，卻仍保有如此教養的人，我覺得很感佩。聽他講他的故事，其顛沛流離和歷盡滄桑，真可謂一個工人國度里勞工階級真正的辛酸史。1970年，當軍隊將矛頭轉向格但斯克的罷工工人時，馬里安被一輛街道上開動的坦克撞傷，一顆腎臟嚴重受損，有好幾個月都血尿不止。1980年，他參加了團結工會的第一波罷工，在戒嚴法實施之后，仍繼續從事秘密工作。結果1982年時，他以微不足道的借口遭到拘留。

“大致來講，情況就是這樣，”他的聲音柔和自制，“在拘留營里我變得很強悍，除了背叛耶穌基督外，什么都不怕了。如果有人拿把槍抵著我的太陽穴說，快招，把那些人的名字給我，不然我就開槍；我會說，來啊，你開槍吧。”這個人有過太多經歷，考驗自己的勇氣和反抗的力量。他在拘留營待了近一年，飽受鞭笞，終于獲釋時已經奄奄一息，以至于他人生中第一次放下工作，暫時休息。

1988年，新一波的罷工展開，馬里安再度出現在路障前。“那次是最辛苦的一次。”他說。因為在那段時期，人們已失去希望，而且開始恐懼。只有八百名船廠工人參與罷工。“一邊有秘密警察，”馬里安追憶往事，“我們內部還有告密者。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對這些人很生氣的原因。”

聽他講這段故事時，我很好奇為什么他會有源源不絕的恢復力和希望，在成功概率這么小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能堅持自己的所作所為。

對于我的問題，他笑了一下。“我告訴你為什么，”他簡單地回答，“因為不公正的情況實在太嚴重了，就是這樣。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剝削。我有七個孩子，有時候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才能喂飽他們。這樣是不對的。我只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這種情況還沒有結束，”他繼續平淡地陳述，“還沒有結束。他們還在我們中間，還掌握著船廠的命脈。我們現在要用其他方法，也就是合法的方式跟他們戰斗。不過我很樂觀，我們總有辦法做到的，這樣至少我孩子的孩子可以有比較好的生活。總而言之，事情就是這樣。”

在我們離開前，史瓦基維茲想幫我和馬里安照張相。馬里安站得筆直，幾乎是立正，就像以前農民或將軍照相的姿勢。然后他親吻我的手告別，再小跑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去。我有點遺憾地目送他離開。他身上具有某種令我動容的東西，或許是他人格的尊嚴，也或許是想到他身處種種絕望之境，卻依然能夠維系不墜的傲然尊嚴。

離開造船廠后，史瓦基維茲的態度終于放松下來，變成安靜的友善。他提議帶我到另一處具有象征意義的地點，即古老的圣布里奇特（St. Brigid's）教堂走走。在最隱秘的時期，團結工會曾在這里舉辦過許多次戰略會議。“不是因為大家都信仰虔誠，”史瓦基維茲告訴我，“我們有些人是不信教的；但是我們知道告密者不會到這里來，這里畢竟是圣殿。”

格但斯克就像其他許多籠罩在歷史陰影下的東歐城市，有兩個極端不同的性格，因戰爭而彼此撕裂。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于希特勒向波蘭發出最后通牒，要波蘭將這個自由港歸還德國，而波蘭拒絕后，戰斗的第一槍就打響了，開啟了接下來嚴重的暴力沖突。

結果就是單調乏味的戰后城市特質主導了格但斯克。圣布里奇特教堂位于舊城，又是一座精確復制的杰作。該教堂為雙塔式哥特建筑，明顯受到德國或漢薩同盟[[5]](#_5_3)的影響，因為德國和波蘭兩國的命運曾在此糾纏。在長達千年的歷史中，格但斯克反復落入波蘭人、日耳曼騎士和普魯士人手中，因此其繁復，甚至是恐怖的歷史，便有如貝魯特（Beirut）[[6]](#_6_3)綿延數世紀之久的歷史故事。

圣布里奇特教堂和諧的建筑無視當地的碰撞與沖突。教堂內部非常漂亮，細致的紅磚線條勾勒出天花板上交叉拱頂的邊線。在天花板下方，世俗的哀慟也受到了包容，或者該說是受邀刻意留下了它的注記。掌管這座教堂的神父一定具有鋼鐵般的勇氣，在遭到嚴重鎮壓的年代，仍公然陳列當年仍屬波蘭歷史禁忌的種種紀念文物。一間禮拜堂中有座雕像紀念卡廷事件（Katyń）[[7]](#_7_3)，當時有數以千計的波蘭官兵遭到蘇聯的謀害。另外還有一間禮拜堂是紀念國民軍的，那些戰士后來也參加了抵抗共產黨的戰爭。

1984年，波比耶烏什科神父（Jan Popiełuszko）慘遭謀殺后，圣布里奇特教堂另一名支持團結工會的神父也受到嚴厲的警告——一種黑手黨式的警告：他的司機在一個早上被發現遭人殺害。不過神父拒絕接受恫嚇，拒絕柔化布道內容，也依舊為團結工會的人提供庇護。

就是這種行為，使得教會在波蘭始終擁有崇高的權威。我雖然對此持有矛盾心態，但仍不得不敬佩這位神父十足的勇氣。想起先前馬里安以樸實的口吻述說，在1988年罷工的艱困局勢下，他們一小群罷工者深感失去精神支持；但是“萊赫·瓦文薩在那里，而且那時我們知道神父也跟我們站在一起，在那樣的情勢下，當局的勢力終于動搖了”。

步行穿過舊城時，我問史瓦基維茲，現在團結工會已經取得了官方地位，那么能為造船廠的工人做些什么。他坦言其實也不能做多少，有些被遣散的工人情況很差，能領到薪水的人，也因為貨幣貶值的關系而實際收入不佳。不過他很清楚他所能采取的行動其實很有限，并說他們正討論不同的選擇。但是團結工會現在必須謹慎行事，因為他們不想削弱瓦文薩的政府。

史瓦基維茲沒有不滿的情緒，只是抱持著平衡的現實主義心態。馬里安似乎也沒有不滿的情緒。不過當我想到他們所處境況的不公——至少不該受到這種待遇——我對他們的自我約束不禁由衷感到驚異。團結工會對此貢獻頗多，不過我在想，新的波蘭將為這些人提供怎樣的前景？

我只身從格但斯克搭乘區間車，前往附近當地人頗引以為傲的小鎮索波特（Sopot）。區間車雖然外形原始，不過功能健全，車廂干凈，運行準時，而且仿效巴黎地鐵，有個清晰的停靠站名簡圖。在我坐的車廂中有一群德國觀光客在以正常的音量交談，不過因為其他人都很安靜，而且他們說的是德語，自然就顯得很突出。突然，一個女人的聲音響徹全車廂，語氣帶有侮辱意味：“你們德國人，說話不要那么大聲！”她命令著，使用拗口的正式波蘭語，“在你們國家，你們可以這樣，但這里不行！非常干擾我們一般乘客！”這也許只是反射性的報復行為，對波蘭商人在德國所受的不公待遇表達不滿，或反映出更早以前的不滿。幸而一般乘客似乎都有幽默感，對她的爆發只是稍稍側目。德國觀光客安靜了一下，意識到這些話是沖著他們說的，然后又恢復了交談，聲音絲毫沒有改變。

經過這番突發的國際緊張后，索波特隨之飄散出最為迷人的慵懶氣息。火車站內吹拂著新鮮的微風，年輕人背著背包步出車廂。我的小旅店位于肖邦街（Chopin Street），在小鎮一道徐緩的斜坡上，樹木林立。我在那里和友人阿格涅絲卡·歐謝茲卡（Agnieszka Osiecka）[[8]](#_8_3)碰面，她正在當地參加她的戲劇的排演活動。她帶我到海邊散步。阿格涅絲卡有著雕像般的臉孔、寧靜的氣質以及永不枯竭的話題，是波蘭真正的偶像級人物。除了戲劇創作外，她還是個詩人、小說家和作詞家，所作的歌詞陪伴了一整代人的成長，就像西方的披頭士（The Beatles）一樣。除此外，再加上她驚濤駭浪般的羅曼史，使她的名氣直逼鮑勃·迪倫（Bob Dylan）或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9]](#_9_3)。領著我在索波特轉悠的她，不斷介紹著各種軼事、歷史和地標。她對索波特和許多其他小鎮非常熟悉，對自己所在的華沙周邊也了如指掌。雖然她絕對不會提及愛國主義，但波蘭對她而言，是真正熟悉、了解的家園，到處是她喜愛的角落、壁龕、回憶和她所疼惜的珍玩。

我知道索波特為何會成為我所喜愛的景點之一。不錯，這里設計得精靈古怪的粉色小別墅都被切割成了社會主義者堅持的小型公寓，波羅的海水域也被附近的工業所污染；但是節奏徐緩、陽光明媚的街道仍保有若干兩次大戰間招攬國際客人的酒吧的慵懶魅力，是個保守居民和放蕩不羈的文人同樣可以感到舒適之處。海濱人行道景色優雅，綿延伸展，兩旁排列著樹頂被修平的工整路樹，有法國的風味；木板步道一直延伸到朦朧的大海中，在晚春的日子里散發出老舊木頭混合著大海味道的溫暖氣息。

晚餐我們選在豪華酒店（Grand Hotel），這間英勇挺過風暴、努力維系著昔日奢華的酒店。閃閃發光的高大落地窗面朝大海；內部有個極其壯觀的新藝術風格的樓梯，螺旋而上，直達好幾層樓；主餐廳的家具以深淺兩種綠色呈現，和陽光下的大海相映成趣。

不幸的是，盡管室內裝潢是戰前風格，服務質量卻明顯是戰后取向。睡眼蒙眬的服務生倚著柜臺，越過少數于淡季齊聚此間的顧客，茫然地望向遠方。在我們努力忍受時，阿格涅絲卡追憶著昔日被視為波蘭中產階級儀式的漫長、悠閑的家庭度假生活，還有附近一家有名的咖啡館，以往經常有追尋靈感的人、美貌者以及酗酒者群聚于此。波蘭的藝術圈還不大，彼此交往密切，幾乎每個人阿格涅絲卡都認識。

晚間，我們出發前往“三聯市”（tri-city）[[10]](#_10_3)地區的海邊城市格丁尼亞（Gdynia），也是阿格涅絲卡的戲劇排演地點。劇院由地方性公司經營，擁有一批在波蘭流傳悠久的劇目，但是由于補助金逐漸削減，目前也處于慘淡經營的階段。不過盡管經濟陷于危機，劇院的氣氛卻是輕松、平常而友善的，正是劇院應有的氛圍。

排演中的休息時間，有人端來一些葡萄酒請大家享用。布景設計師也聊起他認識的一些導演的軼事和見過的小事故供大家開心。他跟我們說，把美國戲劇搬上舞臺是最難搞的，因為他們經常需要一些很古怪的道具或配件。記得有個美國導演在這里工作過一段時間，由于無知，那個人挑選了一出薩姆·謝潑德（Sam Shepard）[[11]](#_11_3)的戲劇，劇中需要十二臺烤面包機。那位導演顯然不諳實際狀況。首先，即使搜遍三聯市所有地區，也不可能找到十二臺烤面包機。導演后來妥協到只需要六臺，但到手的六臺面包機中有兩臺不能用，兩臺被偷走，還有一臺被一個脾氣暴躁的演員砸得粉碎。結果就是盡管十二臺烤面包機非常重要，但在那出戲中，最后還是只有一臺上場。“這種事可以激發人的創造力。”我們健談的設計師總結道。

排演進行得很順利，只有一幕阿格涅絲卡很不滿意。她希望舞臺上群聚的演員動作像機械式的機器人，結果“他們就只會猛搖屁股，樣子真粗俗”。在表達過她的不滿后，我們幾個人一起前往波蘭飯店，那是間散發著濃濃的1950年代怪異及有趣氣氛的餐廳。身著黑西裝的服務生搖擺著朝我們走來，有如滑稽電影里面的人物。伏特加和可口的奶油鯡魚源源不絕地送上來。在升高的舞池里，一個著緊身大露背洋裝的女人足踏細高跟鞋，和一位身穿大號西服的男士，正隨著現場樂隊所演奏的《別在星期天》（“Never on Sunday”）[[12]](#_12_3)徐徐搖擺。啊！從昔日的波蘭、在美國的青少年時期，以及那部電影，我喚起了這些回憶。這使我心情大好。也許當我們安全地從過去成長出來，可以用溺愛的眼神正視過往時，都會有這種心情吧！

大家的話題猶如月球牽引的潮汐般，再度轉到當前的經濟情勢。由于預算削減，劇院遭到重擊，演員們也都陷入了焦慮。他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前景，也許在這一季當中便會遭到解雇。不過跟我們同來的劇院經理倒有幾個備案：劇院的寬大門廳可以改建為酒廊和表演秀場，畢竟波蘭表演秀歷史悠久，足供取材；服裝部門可以替當地一家工廠制作制服；木工部門可以制作最近需求最盛的音響柜。最好的消息是，突然冒出一個不愿具名的善心人士，愿意為演出購置一架鋼琴。“在美國，這種人會被稱為天使。”我說。他們也同意這個說法，這人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天使。

我對經理展現的果敢和智慧深感佩服，但阿格涅絲卡則表示她對獲利率、納稅率以及突然成為話題中心的資本主義審計感到煩膩之至；取而代之，她開始談起她正醞釀的一出波蘭肥皂劇。這并不算是本土的藝術類型，而制作人熱衷于追求積極、樂觀和美國化的元素，顯然有意在劇集中剔除所有悲傷的成分。我指出，認為這類戲劇的本質就是哭哭啼啼、浮華不實，本來就是一種誤解；阿格涅絲卡則指出，積極思考有違波蘭人的本性。不過，由于國際性的誤解，史上第一部樂觀歡樂的肥皂劇也許即將在共產主義后的波蘭登場。

此行我帶了一系列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集，在返回華沙的火車上，我決定重新閱讀《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我應該是心有同感才會想看這本書。雖然威尼斯是這部中篇小說具有象征意義的合適場景，但是主人公阿申巴赫（Aschenbach）和塔齊奧（Tadzio）的碰面似乎更可能發生在索波特。在一片白色的地中海海灘上，托馬斯·曼筆下一個被責任心驅使、自律嚴謹、刻意升華的文化人，目睹了一名波蘭少年高貴而性感的美貌，并為之所征服。不過這類邂逅的尋常版本，這類有如阿申巴赫無所事事，只是好奇地凝視的行為，一定每天都在索波特的波羅的海海灘上上演。波蘭人和德國人住得這么近，然而對前來這些海岸度假的德國人而言，波蘭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者，大多數情況下讓人鄙視的他者，到頭來，只比猶太人少讓人鄙視那么一點點而已。但是在托馬斯·曼的小說里，他們是高貴、發光、有著無限魅力的他者。塔齊奧的家庭展現出高度優雅，近乎皇室般的儀態，而且他們擁有某些阿申巴赫所向往的東西，即某種尊嚴與悠閑所形成的智慧。

當然，托馬斯·曼的小說所描述的，無疑在現實中亦然，那種想要跨越至另一境界的內心渴望，無論多么熱切，終究都會面臨瓦解的風險，失去對自我的堅定信仰。不盡出于偶然地，托馬斯·曼的寓言也可被視為對旅行所隱含的危險的告誡：因為旅行者的角色定位模糊，隱晦幽暗，喚醒對原始叢林的想象，使得阿申巴赫終于走向光榮的不幸。或許我也應該以此自我警惕才對；只是，托馬斯·曼的另一境界，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我所認為的家鄉。這趟旅行盡管困難重重，但我所追尋的是熟悉的本質，只不過經過長久的分離，這一點也變得奇怪地難以掌握。

回到華沙，一個朋友帶我穿越布拉格區（Praga），那是華沙古老的勞工階級住宅區，也是當前最貧困的區域之一。這里真的非常破落，建筑水泥剝落、窗戶破裂、門面色澤斑駁且陽臺墜落，就算還沒墜落的那些陽臺也搖搖欲墜，好像隨時都會掉到行人頭上。這是個星期天，四處一片安靜。19世紀的工廠林立，人們仍在狄更斯式的環境中工作，市場上販賣著最廉價的物品，皮條客、妓女、私酒販、罪犯、騙子群集。一輛車上標志最近才由“民兵”改為“警察”的警車停在一幢建筑前，不久后就從里面拖出個男的，塞入警車，還把一個大桶塞入了車廂。無疑，他們是逮到了一名私酒販。一群肥胖的婦女倚著矮墻觀看這次逮捕行動，幾個小孩追逐著警車嬉戲。

茲比謝克對這個地區情有獨鐘，因為他就是在這里長大的。他父母開的藥房在1949年遭到沒收，他對此仍念念難忘。他記得這一區以前都住著猶太人和白俄羅斯人。小時候這里有個市場，里面有個他熟悉的怪人，那人名義上是賣鳥的，但是每次有人向他買鳥，他就把那只鳥放出鳥籠，讓鳥飛走……我們來到一個院落，里面有幾個穿著短褲的小男孩正在踢球玩耍。這個地方落魄的風情令我心有所感。我也是在克拉科夫一個和這里大同小異的環境中長大的。不過茲比謝克說克拉科夫昔日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所以絕不會比波蘭的這一區還要窮困——這里可是一直由俄國占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他苦澀地說，被俄國占領的地區永遠是最慘的。歷史累積的傷害，迄今仍怨氣難消。

一面荒廢建筑的墻上還殘留著俄國招牌的痕跡，是以前販賣食物和酒的商店所留下來的。再往下幾個街口，但見一間簡陋木屋上掛著一個還算新的招牌，上面以笨拙的字體寫著：“外宿中”（OUT WITH SHACKS）[[13]](#_13_3)。這種自我解嘲式的涂鴉，讓我精神為之一振。

因為一項墮胎非法化法案即將進行投票，最近幾個星期報刊上全是相關新聞。很多評論都由神職人員或其他教會的發言人執筆，教會方面顯然主導了整個辯論。由于其所代表的道德權威，每個人都噤口不語或表示同意。連我一向愛唱反調的朋友，平常對大小議題都吹毛求疵的人，此時似乎也裹足不前，含糊其詞地不敢暢所欲言。

在投票前幾天，我駐足在一小群于議會前示威的人當中。這群女人衣著輕便時髦，有些人手持標語牌，上面寫著抗議通過法案的口號，還有些人在散發傳單。光是看到她們這群人便讓人驚愕不已。這種合法抗議，而且針對的是一向習于效忠的政府，在波蘭是相當新鮮的；因為波蘭的反對一向要么很大規模，要么是在人民議會中進行的。而且，她們當中有些人自稱是女權主義團體成員和女權主義者，而女權主義在波蘭一直是被人們嘲弄或非難的對象。其中一個原因是，女權主義因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操弄而被標簽化及污名化了。無疑，女權主義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從過去脫身，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事后，我和幾個女人一起喝咖啡聊天。原來她們屬于兩個團體，我還察覺出來雙方關系有點緊張。其中一人是婦女聯盟的主席。婦女聯盟是從舊共產黨組織中接手的機構，她正在對其進行改革，以便解決勞工婦女的真正問題。她飛快的解釋中，儼然帶著自我辯護性質。其他同桌的婦女則屬于自由游走的女權主義知識分子，其中一位隸屬的團體以美國喚醒婦女意識的努力為典范，另幾位則是抱持西方女權理論的時代先鋒。

她們顯然都很擔心波蘭婦女的境況會逐漸惡化，教會的力量會打擊她們。不過她們的對話內容相當有趣地顯示出此地婦女所面臨的兩難困境，其實和美國并不相同。在某些方面，她們的起點更先進——如果我們將歷史視為朝我們所認定的先進方向發展的話，或者更正確地說，身處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她們，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地點出發。

其中一個原因是，波蘭從未經歷過美國1950年代那樣熱衷家庭生活和隔絕的郊區生活的時期。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下，婦女理當工作，她們也確實投入職場，幾乎和男人平分秋色。高等教育的區別對待主要針對的是階級——歧視上層階級，而不是性別，實際上有大量婦女進入職場，掌握較高權位，只是很少執掌最高權位而已。“這方面，共產主義的確有它的貢獻。”一名婦女有點不甘愿地承認。

當然，這也意味著，女性經常需要承擔工作和家務的雙重負擔。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年代，到處大排長龍，家務工作絕不輕松。不過不管她們面臨何種問題——而且那些問題真的都不是小問題——和我談話的那些女權主義者，似乎都不太能夠理解女性柔弱的概念。當我談及1950年代的典型美國婦女是那種消極被動、裝扮女性化、半孩子氣、像洋娃娃般的女人時，她們一臉茫然。“我見過一個女的，企圖把自己打扮得像個洋娃娃，”一個女的努力從記憶中搜索出一個范例，“不過她一點都不被動。”

確實，無論在公眾場合還是在私底下，我都經常碰到一些才智、力量和個人權威都相當杰出的女性。總之，在難以理解的文化價值領域，波蘭似乎很少以男性和女性價值來做區分，女性的勇氣、智慧和力量，皆與男性并駕齊驅。

也許這也和我們先前提過的政治傳統有關。在所有起義、叛亂和反抗活動中，女性和男性同樣全力以赴，是相互扶持的戰友。這種情況持續到戰后的地下工作，以及團結工會。“唔，你知道的，我們有太多問題必須彼此商量。”對于我的詢問，一個婦女如此回答，“我們一直都在戰斗，有些方面必須互相幫忙。”

在座的女性都很擔心教會的勢力膨脹會使她們的地位倒退。雖然聽來似乎不可思議，但顯然已經有人提議女性的教育應該和男性不同，也已經有股力量在朝我們所謂的“角色分工”的方向推動。

“如果很多女性停止工作的話，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我不能想象在那種設定下，婚姻要如何維持。男人帶著一肚子的問題和興趣回家，女人卻出去逛街買東西？他們會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們之間要談些什么。”這種“設定”，對西方女性而言才剛剛過去，在此卻有可能正在來臨——有些丈夫賺得夠多，可以靠一份收入維持一個家庭。我跟一些年輕女人談過這個問題，她們認為對她們而言，能夠享有不工作的特權，才是自由的本質。不過，我還是很訝異波蘭女性到這時才開始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試圖從這個問題中脫身。

訪問一家出版社時，我向一位從事編輯工作的友人博萊克（Bolek）提及，希望能會晤曾經擔任過審查員的人。

我認為這件事對他可能有點為難。“沒問題，”博萊克卻一口答應，“這里有個人認識不少那樣的人，他可以幫忙安排。”幾分鐘后，一個矮胖的男子手提硬殼公文包走進博萊克的辦公室。他在出版社的商務部門工作。

“你想找一個以前擔任審查員的人？”在博萊克提出我的要求后，那人問道。“那不必麻煩了，你面前就站著一個。”他邊說邊躬身行了個禮。

“真對不起，我不知道……”博萊克結結巴巴地說。我始終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省得大家尷尬。

對我而言，人們為何經常會刻意迎合其職業的刻板形象，始終是生命的一個小小的神秘之處。也許我們的工作會改變我們的外貌，就像和另一個人長久在一起也會如此一樣吧！不過，米哈烏·馬利茨基（Michał Malicki）肯定是根據昔日官方公務員的理想原型塑造出來的：身材健壯，有個大啤酒肚，穿著不合身的西裝，動作笨拙。他的頭發理得很短，接近平頭，藏在厚重鏡片后的眼睛幾乎讓人看不清楚。

那天我們共進晚餐，結果幾乎是話匣子一開，我對他的印象便全然改觀了。他能言善道，用詞精準，詼諧機智，而且邏輯清楚。他講話聲音單調，速度極快，而且帶著一種犀利的客觀性，不論是對自己、對他的職業，還是對以往和當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樣。我在其他共產黨員身上也曾注意到這種腔調。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對人類行為保持“客觀”的訓練顯然是有效的。在我們長時間的對話中，他從未企圖博取我的同情，或佯裝出任何尷尬或道歉的樣子。另一方面，他對自己擔任審查員的工作抱持著完全有意識的諷刺態度。事實上，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完全不知悔改、心存懷疑的審查員。

“也許我這樣承認并不好，”他開口道，灰色的眼睛中閃過一絲興味，“不過，我就是把我在公司的工作看得像是……呃，一個游戲，一場馬戲，一出介乎卡夫卡和米洛杰克之間的喜劇。當然，喜劇和悲劇只有一墻之隔，但是首先展開的是喜劇，后來，笑聲才從嘴角消失。”

這貼切的文學比喻，還有他所使用的跟英國情報員在提及他們情報單位時完全一樣的用詞——“公司”，馬上逗樂了我。但是當初他為什么會進入這個行業呢？“呃，你知道的，”他說，“生命中很多事就是這么發生的。”馬利茨基在大學主修地理這個在市場上并不熱門的領域，所以當他在大學布告欄看到一個小廣告，提供審查局的工作機會時，便去應征了。“半是因為我需要工作，半則因為好奇。”結果獲得錄用。

我很好奇他接受過何種訓練，畢竟這是項非常復雜精細的工作。哪些規則是公開的，又有哪些是潛規則？“喔，我們當然有法典詳列了各種規則。一般而言，我們有三大方面的禁制：軍事方面，軍事隱秘性是完全正當的，只是有些被夸大了；經濟方面，如果傷害到國家利益就會被禁——這點倒是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比如禁止公布工業污染數據；還有文化方面，標準當然比較政治化。不過這只是基本原則，真正比較細微和隱晦的部分，就只能通過看老審查員工作來學習。”

對于審查員，他將其區分為幾種。“有比較老派的忠貞黨員，他們就只是為工作而工作；有些是為政治前途而工作的；還有憤世嫉俗的共產黨員。比如我們主管，我敢說他就是個‘公然憤世嫉俗的共產黨員’。”說到這里，馬利茨基比了個引號的手勢，“一個真正撒旦型的情報分子。他的專長是教會歷史，曾經跟幾個神父聊天，負責審查他們的手稿，他的博學令人驚嘆，可以輕易駁倒一些還不錯的神父。”

“當然啦，也有些審查員是笨蛋，經常淪為大家的笑柄。比如有個女的，硬是拒絕一本研究四萬年前地理構造的書使用‘德國’一詞，因為根據規則，必須使用民主德國或聯邦德國。就有那種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笨蛋。”

我問他，對于比較細微和隱晦的規則，他傾向采取什么態度。他再度毫不猶豫地以波瀾不驚的語調回答：“從開始我就盡量不去審查，不去干預。在做決定時也寧愿不去請教我的上司。因為第一，我喜歡權力的感覺；第二，請教上司再做決定太浪費時間。不過基本上，我都是站在作家那邊。當然，其中有些作家是我比較尊敬的……有時候，我跟你說，有些手稿簡直不敢相信是出自最有名望的作家之手。他們應該自己做點編輯工作才對。”

我追問如果他自認站在作家那一邊，那多大程度上他能幫作家僥幸避免刪節？他自由裁量的余地有多大？

這一次，馬利茨基的回答讓我大感意外。“你知道，”他沉默片刻后回答，“這些都是如何詮釋的問題，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詮釋任何事，可以讓某一件事表示某種意思，或完全相反的意思。因為你知道的，在文學領域，每件事都可以被詮釋為任何一件事。”

每件事都可以被詮釋為任何一件事。這句話有種怪異的熟悉感。不知如何，馬利茨基從他公司隱秘辦公室內所探索出的結論，竟然和西方最老練的文學評論家所闡釋的概念相去不遠。沒有什么事有意義，或每一件事其實沒有任何意義，他們或許會使用不同的措辭，不過其實幾乎是相同的概念。一個主修地理，先前對文學并無特別喜愛的人，竟然可以達到這種層級的批判性領悟力，真是令人吃驚。不過話說回來，這種公司顯然是應用文學批評的最佳學府。審查員的工作就是操弄文字，而操弄是去神秘化最快速的方式。這種真正的政治游戲和多重詮釋的批判性游戲，會在某一點交會；當然，對作者而言，它們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審查員沒有批判上的優勢，但是卻有比較具體的權威；透過實際修改，他很快就能體認到其實文學作品并沒有絕對的意義。

基于他的有利地位，馬利茨基甚至可用詮釋不足的方式，故意略過文章明顯想要表達的意思。東歐作者經常使用暗諷及寓言式語言，以期“通過審查”，他說這種方式之所以可以規避審查員，也就是繞過他本人，并不是因為審查員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重點是，”馬利茨基解釋道，“我永遠可以跟老板說：‘這里面沒有什么，沒有弦外之音，單純只是字面的意思。’然后我和老板就都可以假裝這里頭真的沒有什么。畢竟社會主義下的生活，應該是一個充滿陽光和喜悅的大家庭，任何事下面都不應該有陰暗面。所以這是絕對可行，甚至是最好的方式——不要去挖掘外表下面潛藏的東西。”

不錯，馬利茨基的文學教育是優秀的，而就像任何專職的評論家一樣，他和作家越來越相互依賴。他喜歡那些被指派給他審查的作家，對這些作家有著很高的期望，當他們無法達到他的標準時，還會覺得幻滅。因此在某一階段，他很自然地就開始逐漸往隔開他和其他人——也就是作家們——的界線靠近。脫離公司的舉動是從他現身一個學生社團開始的，那個社團邀請他去參加一項有關審查制度的討論會。他先是請求公司允許他接受邀請，結果公司拒絕了，不過他還是決定去參加。他覺得此舉會冒很大的危險嗎？“冒險，冒險，人們都夸大了那些危險，”他尖刻地說，“他們能拿我怎么樣？把我關進監獄嗎？充其量，只是失業而已。”

不過，在社團所見的情況卻讓他一點兒也不開心。“當然，我了解我們的工作應該受到批判，這點毋庸置疑。不過批判應該建立在正確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對真實不感興趣，到現在還是這樣。他們只想妖魔化。當然，把你的敵人妖魔化，會替你自己增添某種分量。”他聳聳肩，“他們只想分析我這個人。他們很想知道一個人為什么會做我所做的事。我已經盡量保持禮貌，盡量和善地跟他們交談，還面帶笑容；但是隔天在學生圈里，我的笑容卻被描寫成虛偽的笑容，那是因為理所當然地，如果你是審查員，你的笑容就一定是虛偽的。”

他的言詞中帶有一絲苦澀和嘲諷，不過他的聲音仍然沒有改變。經過這次甘冒不韙之舉，他開始不再能適應在公司的工作。有一陣子，他還遐想在機構內部組織一個團結工會小組。不過，為了確定我不至于因而高估他，還仔細地加以補充：“那不是我干得來的事。我的性格并非好戰或革命型的。”后來他決定到一家共產黨青年雜志社擔任編輯。

經過種種變革后，他又朝最接近的行業前進了一小步，開始在一家知名的出版公司工作。跟之前的雇主相比，他并不覺得現在的情況有多好。“公司有公司的問題，”他說，“但是那里更有效率。這里連工作的基本精神都沒有，這點很糟糕。我的同事只能完成嚴格規范好的工作，還要先喝杯茶。連做最小的決定，每個人都怕得不得了。不過我想我本來就不該對此感到驚訝。畢竟存在先于本質，這是他們的存在教導他們的。”

我想我也不應該對他下面所講的話感到驚訝。“我一直告訴他們，他們必須商業化，必須出版可以賣得出去的書，但是我的意見并不受到認可。我想他們仍受制于共產主義的影響，認為他們的目標是出版好的文學。至于錢從哪里來……他們不會放下身段去擔心這種事。沙龍里是不討論錢的。”

我不應該感到驚訝的，因為不管必須使用哪套游戲規則，馬利茨基顯然都是個習于操弄的好手，這就只是場游戲。他看透前朝所有信念，包括反制度的信念，包括雙方都廣為推崇的文學神圣的信念。對于文學創作者，他的評論從來不失犀利。“這些日子有人在玩弄殉道的游戲，”他說，“有個著名的作家，每個人都知道他最大的悲劇是戒嚴時期從來沒有被拘禁過。每個人都被拘禁過，但不知道為什么，他卻逃過了。他當時還真的是到處奔走，乞求有關單位拘禁他。有時候看到有些作家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行為，我都覺得尷尬，因為他們是怎么來到我們單位，無條件接受我們要求做出的改動的，我都清清楚楚。作家的偉大，實在不應該基于他們曾經是被害者。”

的確，他從圍墻兩邊，從里面、外面，從中間、邊緣把每件事都看透了。那么，說到底，現在的他對于自己過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須做判斷，”他毫不猶豫地以客觀的語氣回答，“但是應該在時代的標準和氛圍下做判斷。共產主義因為它的辯證思維，因為它聲稱社會主義道德觀和其他道德觀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來就是辯證的。”他又加了一句，“你知道，我不是教條主義者，我反對簡化論和教條主義。畢竟，絕對價值是不存在的。”

在最后的轉折中，我們的對話也接近結束。正準備道別時，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了進來，跟我打招呼。而在送馬利茨基走出餐廳時，他頗有興味地回頭看了克日什托夫一眼。“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也許不記得我了，”他說，“不過我以前和他共事過。我負責審查他的作品，一個很好的導演，我非常尊敬他。”

“不，我不記得他，”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馬利茨基離開后說，“這種人不是一般人想私下交往的對象。”

至少在最近之前是這樣沒錯。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碰面純屬偶然，但是我卻有種對稱的感覺，因為在共產主義時代，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謂完全是馬利茨基的反面。當馬利茨基在玩弄他方便詮釋的游戲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卻在制作純正道德主題的電影。那些通常都是非常陰暗的影片，探討現實的墮落、謊言和嘲諷，也描繪人們相互間的責任與不負責任，以及情感、愛，甚至誠信的力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是獨特的，但其所強調的責任——一種基于具體人際關系，而非抽象價值的道德，卻是戰后波蘭和東歐藝術家與文人思想中一再重現的主題。這或許源于許多知識分子所信仰的天主教，只不過是對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應。不過責任倫理也是對規則、游戲與體制的無道德性，甚至是體制本身的一劑強有力的解藥，一種無可辯駁的回答。任何事都可以表示任何意思，但不包括我們彼此間的所作所為。

這種道德的轉向是對謊言與犬儒主義的反擊，可算是一種特殊的東歐人道主義，內部蘊含著非常現代的恐怖、諷刺與復雜性，它源自對人們以意識形態和權力為名可以對彼此做出什么事來的切身體驗。問題是，當挑釁變得越來越模糊，因而不再需要強烈的回應時，會產生什么變化？當審查不是來自“另一邊”，而是在出版社內部運作，而且無從得知審查員的真正用心是出于對自由市場的嘲諷還是只是比較務實時，又會有什么變化？就根本意義而言，這是東歐“改變”的核心所在。是否要出版比較商業化的劣質書刊以維持企業運作，是有識之士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的議題；而東歐已然脫離高掛道德旗幟的紀元，進入以議題為主的時代。

要論東歐知識分子面對競爭的現實，以及混沌不清的“正常”生活時會有什么變化，如今還言之過早。不過與此同時我卻有些自私地開始盤算，當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文人擺脫了審查制度的干擾或它帶來的好處，轉入這新的混沌道德領域時，會產出多么有趣的藝術創作。

因為覺得安娜·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Anna Branicka-Wolska）的自傳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和她聊了大半個下午。出身于波蘭最負盛名的貴族世家之一，她的故事也是波蘭和東歐所擅長的：飽受一連串驚濤駭浪的考驗、折騰與塑造，宛如一出劇情起伏、無所不包的歷史大劇。我是在地主協會的會議上初次見到安娜的，這個協會仿佛一個從朦朧深邃的過往中突然冒出波蘭地面的嶄新實體，幾個月前才剛剛成立，成員包括貴族、大地主和曾經擁有至少幾畝土地的小鄉紳。根據他們自己的統計，約有七百名會員。在共產主義終結一年后眾人才得悉，波蘭原來仍存在成熟的貴族階級，包括王子、伯爵夫人以及位階較低的要人等等。

當然，說波蘭的貴族曾經消失是不正確的，但試圖摧毀他們，或至少抹殺他們身份的企圖卻未曾停歇。波蘭始終有一大群貴族階級，包括一些大家族和若干小貴族，他們在很早之前便擁有選舉權，后來逐漸以無政府主義的分歧而聞名。不過波蘭貴族不再是其世界的主人的情勢由來已久。在割據期間，波蘭為鄰近帝國所吞食，原本的貴族也淪為受異族統治，而不再是自己屬民的統治者，貴族階級自此陷入貧窮與崩解之境。在此期間，波蘭不再存在于世界地圖上，但卻繼續存在于貴族世家和他們的腦海中，存在于保留著波蘭傳統的宅邸和莊園中，存在于即使背井離鄉也體現著某種“波蘭性”的人身上。

大戰后，貴族的血統幾乎成為貧窮和迫害的一紙保證，但同時也成為高貴的象征。再一次，波蘭貴族代表了一個被征服的——但對許多人而言——卻是真正的波蘭，他們從來沒有機會成為強權或墮落的反派人物。小時候，我偶爾會聽到某人是“望族”之后，雖處困頓的情境，卻應對得多么勇敢、多么令人欽佩等等。望族的姓氏從未失去其在波蘭所具有的階級意義。我也曾聽說有些農人，從不使用“人民文化中心”的新名稱，而始終以莊園貴族的姓氏稱呼其村莊，諸如拉齊維烏家族（Radziwiłł）或扎莫伊斯基村（Zamojski）等等。我也曾聽說農家子弟歸鄉尋根，遇到拉齊維烏或扎莫伊斯基等家族的人時，會特別對他們表達敬意，默默致禮。

地主協會今天的會議在華沙理工大學（Politechnika Warszawska）舉行。該校有幢建于19世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五角形院落周遭環繞著幾層樓高的拱形回廊。波蘭共產黨曾于此地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以此地又被稱為“統一廣場”。不過，我聽到有人還是使用“救世主廣場”的舊名。

群聚在大會議廳的人，很容易被錯認為一群強壯結實的英國紳士或農人。他們活力充沛，一點也不優雅。在一個極端重視外表品位的國度，這樣的打扮顯得十分樸素。不過在他們中間，還是可以看到宛如在羊皮紙上以纖細筆觸雕琢出的精致面孔。他們大半上了年紀，但也有年輕的面孔摻雜其間。致開幕詞的是一位年紀很大的男性，他雖然聲音顫抖，卻因為溫文爾雅的語調而十分動聽。“我們是從半黑暗中浮現出來的，”他開口道，“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首度可以承認自己是誰，從哪里來。”一般人很容易存著看笑話的心態來看待一群剛自曝身份的波蘭貴族的聚會，但一如以往，這位老貴族言詞中所蘊含的遭到壓迫、奮力求生的片段，令我為之動容。會議開始之前，有位老先生告訴我一個他很在乎、一定要我知道的事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貴族曾致力于反抗運動，結果他們也成了波蘭所有階層中蒙受最大損失的一群人。

這種種回響，讓我格外認真地聆聽安娜·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的述說。我們在歐羅普斯基酒店氣氛慵懶的咖啡廳碰面，神采奕奕的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大步走入。她是那種會被誤認為健康、壯碩的農村中老年女性的人，只是她有著柔和、溫暖的聲音，如晴天般湛藍的大眼睛閃爍著樂觀、坦誠的光澤。她的祖先來自東北邊境地區，我見過布拉尼茨卡家族位于比亞韋斯托克（Bialystok）的美麗的文藝復興時期宮殿，也就是他們的根基所在。18世紀時，那里曾接待過一群波蘭和法國演員以及一個芭蕾舞團。不過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本人是在華沙外圍維拉努夫（Wilanów）的一座興建于17世紀末期、有著三翼廂房的巴洛克風格宮殿中長大的。那宮殿原為皇室離宮，戰后改建成了極受歡迎的博物館和觀光景點。“那個地點很好，”安娜回憶幼年時光，“所以每個人都會來，政治官員、國際外交官和藝術家等等。”

這一切都被大戰改變了。安娜描繪當時維拉努夫反抗運動的神奇場景，宮殿的一個個大房間被改裝成靶場，為從事地下戰爭的年輕人提供訓練。戰爭開始時安娜才十四歲，而十六歲時她就已經和兩個姐姐一起運送武器，擔任郵遞員以及協助藏匿人犯了。宮殿還曾作為逃匿戰犯和農村黨人的庇護所。華沙大轟炸開始后，還有成群的年輕人逃到這個安全地點過夜，至今安娜仍記得那些快樂的夜晚，每個房間都鋪放著成排的睡墊。

在華沙起義期間，亦即戰爭邁向高潮及走向結束的階段，布拉尼茨卡家族最大的劫難也開始了。首先，他們被德國人逮捕拘禁；在德國人之后，俄國人緊接而來，就在俄國大軍開入華沙三天后，布拉尼茨卡和其他三個家族再度被逮捕。

他們十六人組成的小組注定在未來三年內相依為命。“當奴隸。”安娜這么形容。一夜之間，他們成為階級敵人，因為他們對抗納粹的力量剛好證明他們會成為潛在威脅。這個小組先是被轉送到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監獄（Lubyanka）[[14]](#_14_3)。他們以為自己一定會遭到處決，結果只在那里拘禁了兩個星期。有時記憶常會凸顯出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所以安娜還記得那段時間里陪伴她的一只獅子狗，那也許是唯一能存活于盧比揚卡監獄的動物了。那只狗頗獲一名蘇聯士兵的歡心，但他一直以為它是只寵物猴。后來，他們小組被帶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集中營。他們十六個人擠在三個房間，于嚴格看守下共同生活了兩年。第一年不許外出；后來規定放松，他們可以到一個小花園里走走，也可以幫其他受刑人砍柴；兩年后因不明原因，他們被轉到一個關著各個國家的人的更加嚴格的勞改營（安娜尤其記得有一大群日本將領也被關在那里）；然后，蘇聯任性的巨輪再度轉動，他們于1948年獲釋，也被獲準返回波蘭。

我問安娜被拘禁的那幾年是否是很絕望的一段時期，她明確回答不是。雖然他們很怕生病，時有口角，但整體而言，他們都展現出最大的韌性。“這個階級的人的志向，是向世人展現我們不但能在最好的環境下生存，也能在最壞的情況下存活。”她綻放出愉悅的笑容，“我們很得意自己的烹飪和縫紉技巧得到提高，大人還會給孩子們上課。我父親能講全套波蘭古典文學，讓孩子們的教育不致出現斷裂。”

“而我，”她面帶愉快的微笑繼續說，“我寫信給我心愛的人。”那些信從未寄出去，因為她所愛的人是一名反抗軍領袖，在變化無常的戰爭中他的行蹤如謎。安娜寫信的部分原因，也是想為她非凡的經歷留下記錄，以便戰爭結束后和她心愛的人一起分享。

她的期望落空了。“我以為他會等我，”安娜給了簡單的解釋，“但是當我回來時，他已經結婚了，而且人在倫敦。這是我的一大悲劇，而且就發生在我應該最快樂的時候。”

不過那些信在許多年后獲得出版。畢竟是記述一連串恐怖事件的豐富歷史，充滿鮮明的細節、敏銳的觀察以及獄友間的感情，甚至還飽含一種幸福感。安娜寫道，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刻，快樂也沒有完全遺棄她。不過當時的她可謂身心俱疲。回到波蘭，除了失去她心愛的人，還有更多的災難在等著她。他們十六人才穿過波蘭邊境不久便再度被捕，這次是被新成立的政府所逮捕。他們大多在幾天后獲得釋放，但包括安娜父親在內的幾個人卻被拘禁得比較久，這對她父親的愛國心和他所捍衛的一切可算是狠狠的一記重擊。安娜記得她父親曾說：“我可以在德國監獄生存，可以忍受蘇聯的勞改營；但是我不能忍受在波蘭被囚禁。”她父親沒有被拘禁太久，但之后不久他便過世了。安娜將父親的去世歸咎于那次囚禁事件。

政府有一些專門針對他們的手段，其中之一是禁止歷劫歸來的貴族住在老家附近。安娜和她的母親遷往克拉科夫，嘗試展開新生活。那是一段艱困歲月：她們沒有錢，而且身份特殊，人們甚至害怕被看到和她們有任何接觸。有些貴族被迫更改他們廣為人知的姓名。“這樣做的人不多，”安娜急急聲明，“但我們總得設法適應。”

有段日子，她們母女被迫節衣縮食到赤貧狀態，在別人的長沙發上睡覺，在最便宜的自助食堂吃飯，而且經常沒有錢買電車票。我聽安娜敘述時，深深感覺在一個他們曾擁有那么多的國度被貶抑至此，長期處于這種在當時被認為是正常的悲憐狀態，也許比關在監獄內承受明顯極度的不公不義，還來得難以忍受吧？但是當我提出這個疑惑時，安娜只是溫和地笑說人們把艱難和貧困看得太嚴重了。“總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的人，從來沒有被貶抑被排斥的人，對我而言，似乎有些不完整、不成熟。你不覺得嗎？”

最后，安娜取得了社會學學位，在被十四個工作機會拒絕后——這可是一個不承認有失業問題的國度啊——終于有個文學研究機構錄用了她。她還清楚地記得該機構的主管在面試時對她說：“從十六歲起，我就在跟你們這種人戰斗。”但不知道是為了何種理由，那位主管仍舊決定冒險雇用她。

最后，她也結了婚，嫁給了一個沒有貴族身份的人——盡管萬事歷盡，但這種身份的隔閡仍然事關緊要——一位遺傳學教授。“就這樣，”安娜說，“我們已經結婚三十八年了。他很愛我，我也喜歡他、尊敬他。我們的愛情屬于比較溫和的感情。世上有很多種愛情，你不覺得嗎？”

“而且我想傳遞這樣的信息，”她使用了說教的語詞，但語氣中卻毫無說教的意味，“人絕對不要絕望。冥冥之中，我總算找回自己的生命了。我覺得我很能掌握生命的訣竅。”她的確從未停止參與這個世界。借用她的用詞，就像大多數“這種背景”的人，她積極參與團結工會的事務。“喔，我不知道拆過多少你們送來的醫藥包裹！”她說，意指從美國送來的包裹。她組織了西伯利亞人協會，幫助那些曾在古拉格最恐怖的集中營服過刑的人。她做這項工作帶有使命的意味。“我了解他們曾經經歷過的事，”她說，“我對他們最為同情。”

“我覺得目前的我正處于生命的中間，”她以明媚的聲音總結，“我覺得被需要。我對人類的事有相當了解，試圖從每件事中萃取出精華，就像榨橙汁一樣。這是我的生命信仰。重要的是，鞋匠應該制作美麗的鞋子，作家應該好好寫文章，我是這么認為的。還有，要為其他人著想，這很重要，也是我的工作。你知道，曾經我會覺得我太老、太胖，我的心臟不好……但是現在因為忙于其他人的事，這些就都不再干擾我了。畢竟我是被這樣教育成長的，凡事盡力而為。”

這是充滿感情的結語，卻不見絲毫多愁善感；因為這林林總總已經清楚地在行動中、在生活中獲得明證。盡管我民主的偏見讓我對貴族的概念有所遲疑，但我仍不禁克服了自己所持的保留態度。我喜歡這位女士，喜歡她真誠的浪漫情懷以及從容不迫的態度，喜歡她所持的古老的理想主義，對世界最惡之處的理解，對自己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普世的人道主義的堅定信仰。在她體內蘊含著太多階段的歷史，太多感性和經驗的重要里程碑。

而現在，基于命運再一次毫無預警的轉折，凍結于記憶中已久的過去，正在進行一場奇特的復蘇。現年六十好幾的安娜，正考慮重新收回一部分她在維拉努夫的幼時家園。“只是一小部分，拿回更多是不對的。”她想將外圍建筑的一部分改建成為意圖歸鄉的老年人服務的休憩中心，再利用另一部分開設餐廳。她還難得喜形于色，開心到有點臉紅地告訴我一個更重要的發展，就是最近她獲準進入一個名為“馬耳他騎士團勛章”（Order of the Knights of Malta）的組織。這個名詞令我愣了一下，因為聽起來很像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筆下的虛構組織。不過這古老的騎士團目前在東歐依然非常活躍，而且只允許有幾世紀歷史的貴族參加，諸如此類歷史不協調的喜劇似乎從未停止上演。根據安娜的解釋，騎士團有從事慈善事業的悠久傳統，他們正打算在波蘭開設一家醫院，專門診治艾滋病患，她也很樂于出一份力。

不過，當我回想起地主協會會議中大半是年老的臉孔時，不禁懷疑日后“貴族”在波蘭還可能具有什么意義。矛盾的是，這個階級團體完好地留存至今，實在應該歸功而非歸咎于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系統的運作有如歷史的冰庫，將貴族的身份保存在固有狀態。但我懷疑，一旦冰庫開啟并與現實發生沖撞，貴族階級或任何其他人為保存的社會現象是否仍能繼續存活。對那些繼承了貴族頭銜，卻從未在自己的家族莊園中生活過，也無力取回自己祖產的中年專業人士；對那個出身大家族，目前以制造女性內衣為業的人；或對地主協會會議中那幾個年輕人而言，一旦他們開始自由游走于現代社會，貴族名號不再具有重要性時，貴族的意義又何在？

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對這一點是很清醒的。“在比較老的這一代，不錯，貴族階級是存在的，”她說，“我們彼此都認識，會在婚禮和喪禮中碰面，有時候參加這些場合的還完全是貴族。不過比較年輕的這一代？喔，也許有力量在朝那個方向拉動。也許有感情或勢利的因素存在，還有沿襲過去傳統的意義。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經常談到過去，但是這一切能形成一個真正的波蘭貴族階級嗎？我感到懷疑。”

我也懷疑。我朋友阿格涅絲卡毫不羞赧地承認自己很“崇拜”貴族。她說她喜歡他們一向秉持的怡然態度，以及日常生活的無憂無慮和優雅自持，也因為他們是很好的伙伴。在此之前，他們從不在乎賺錢的事，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任何事。安娜·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的確擁有那種迷人的貴族嫻雅氣質，畢竟早期優游的習慣很難戒除，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也很難抹去。不過即使像她這種性格的人，我都懷疑在面對新世界生存價值的挑釁時，能否堅持不變。從現在開始，將會有不同的“最好的人”出現，會有不同野心的驅策和不同的選擇。對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而言，古老維拉努夫的記憶將永遠有其意義；但是同時，新的維拉努夫亦將永遠無法恢復往日的榮耀或英勇，即使她重新收回當地祖產，其中的一部分也將成為日常商業用地。

除了在文字里，過去是永遠無法重新捕捉或再次重復的，這也為波蘭當前的情勢增添了一抹超現實的意味。這些從共產主義的溫克大夢（Rip van Winkle）[[15]](#_15_3)中重新復蘇的事物，雖然具體，卻帶有幽靈的色彩。這部分是因為個人和社會現象已經互不適應。有關安娜·布拉尼茨卡-沃爾斯卡的一切既沒有褪色，也沒有過時；但是昔日代表尊貴意義的波蘭貴族，卻只能換一種形態回歸，以一種更模糊的面貌，而且極可能消解于當前多元化的現實洪流中。

在前往位于華沙近郊的肖邦出生地熱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游覽的途中，我和打扮費心、十分健談的年輕出租車司機聊起來，后來不知怎么的，話題轉到了猶太人身上。當他確定我是猶太人后，變得更加滔滔不絕，無以遏止。“前兩天，我才載過兩個美國來的猶太人，”他告訴我，“人很好，非常好。我們開誠布公地聊，因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喜歡有話直說。可以說我們后來就像朋友一樣，氣氛很友善。他們告訴我，他們先前以為波蘭是反猶太的，我努力告訴他們實情并非如此。我就沒有反猶太。我認為我是個很文明的人，但是我的問題是，你知道，我不認識任何猶太人，我是在他們離開后才長大的……所以我所知道的都是別人告訴我的猶太人的樣子。”

那么，別人是怎么跟你說的？我想知道。“喔，你知道的，他們在我們的歷史中扮演了一個不幸的角色。他們是大資本家，你知道的，他們擁有羅茲的大部分工廠，那里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地方。我聽說他們很小氣，替他們工作很糟糕，而且他們連幫自己人的忙都不喜歡。”

我早上還沒有喝咖啡，精神不濟，昏昏沉沉，而且工業大道上的空氣污染已經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了。我真的必須回答這種問題嗎？我想我別無選擇。對于這類問題，我有我的“歷史責任”。所以我從最基本的開始講起。“你知道當時大部分波蘭猶太人住在小城市，而且收入僅夠勉強糊口嗎？”我問他，“還有，你知道猶太人向來有互相幫忙、從事慈善事業的偉大傳統嗎？”

“真的嗎？”他一臉驚訝，“你看，這是我們的問題。在學校沒人教過我們這些，也沒有地方可以討論。”我們又繼續聊了一陣，直到抵達終點。

熱拉佐瓦·沃拉是個樸素的莊園，四周被一個美麗的公園圍繞，有起伏的山坡和垂柳，處處可見亮麗的花圃，還有一條被污染了的蜿蜒小溪。這里風景如畫，帶著憂郁的氣質，每一處都令我心動，而肖邦也是我所崇拜的神一樣的人之一；但是和出租車司機的那段對話，多少減損了這地方的魅力。那司機輕易為成見所騙固然讓我遺憾，但更讓我不舒服的是他跟我對話的奇特方式，儼然把我視為上訴那些成見的法院，似乎在他面前的猶太人與他對猶太人的模糊概念之間，有著認知上的分歧。

不過，報刊上關于新的反猶主義的報道，對我也有同樣的沖擊。雖然出租車司機是第一個向我轉述反猶觀點的，但有關猶太的問題卻始終充斥在我周遭。對反猶主義的再度出現，不少人表達了不滿與憤怒；對波蘭被貼上反猶的標簽，也有人表達了委屈與憤怒。亞當·米奇尼克具有一半猶太血統，曾以“二度反猶主義”一詞形容波蘭對這項指控的反應。所以目前有反猶主義、二度反猶主義、反-反猶主義，無疑還有第三代現象存在。

反猶主義的背后指使者從未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沒有人見過他們，但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存在，因為有人在建筑物的墻壁上寫上了“猶太人清除區”（Judenfrei）的字樣，有人在標示華沙猶太人街原址的莊嚴紀念石碑上畫上了納粹的黨徽。還有人帶著激進的傾向分辨天主教神父和主教是否有猶太血統，連前總理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都沒放過，結果他的天主教背景完全干凈。因為新的反猶主義有一個明顯特征，即可將目標鎖定在任何人，不管其是否真的具有猶太血統。對他們而言，“猶太”宛如負號，代表他們所不喜歡、懷疑或不贊同的一切。

不過另一方面，對跟猶太相關的一切都感興趣的人也在逐漸增加，儼然是群具有懷舊情懷的猶太迷。聽說有成群的波蘭人蜂擁觀賞猶太劇團的表演；也有學生學習希伯來語，并前往以色列朝圣；還有一個人自命為管理人和檔案保管員，負責照顧華沙一處古老、荒廢的猶太墓園。

如果說貴族是被鎮壓者——在政治上被打壓的人——的回歸，那么反猶主義就是被抑制的態度——已隱入地下的態度——的回歸。不過重新出現的對猶太的癡迷，也有明顯的諷刺之處，因為正如每個人口口聲聲所重復者：“波蘭已經沒有猶太人了。”其實這句話并不完全正確。根據官方統計數據，還有一小部分，估計七千多名猶太人留在波蘭。他們留在這里經歷風浪，寄居在僅存的戰前猶太人社區的殘骸中。這群人，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過去從不看重自己的猶太背景，未來也不會。

還有些人，比如康斯坦丁·格貝特（Konstantin Gebert）——或朋友對他習慣的稱呼科斯特克（Kostek）——是戰后一代的年輕猶太人，他們成長期間對自己的猶太背景一無所知。他們的父母都偽裝或低調處理他們的身份，也許因為猶太人大屠殺的記憶對他們而言太過痛苦，也許不認為猶太背景對他們的子女有任何好處，或者就像科斯特克的父母一樣，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因此科斯特克是直到成年后，才得知自己是猶太人的。一旦知道后，他又以幾乎滑稽的方式輾轉得知，竟然還有其他人跟他的情況一樣。1970年代，一位在世界各地舉辦研討會的美國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6]](#_16_3)前來華沙舉辦一場探討猶太人認同問題的工作坊。科斯特克前往參加，本以為會場一定一片空蕩，想不到他的一半友人都群集現場。

在意識到這種情況后，科斯特克創立了一個小組，目的在于為小組成員提供一定程度的猶太教育，以求多少恢復一些猶太的認同感。參加這個小組的年輕人必須從最基本的開始學習：他們沒人在家里見過安息日儀式，也沒人上過猶太會堂。但是一點一滴地，他們學會了安息日儀式，學會了閱讀經文，研究托拉（Torah）[[17]](#_17_3)，并相互舉辦研討會，主題諸如中古世紀普羅旺斯的猶太人，19世紀波蘭的哈西德派猶太人（Hasidim）[[18]](#_18_3)等等。他們有些人學習希伯來語，有些變成虔誠的教徒，還有些移民到了以色列。

科斯特克留了下來，繼續他新聞記者和優秀政治評論家的工作，并以筆名達維德·瓦爾沙夫斯基（Dawid Warszawski）發表文章。他在團結工會里非常活躍，經常就波蘭猶太人的問題發表評論。

我有時會就猶太性和反猶主義等問題請教科斯特克，因為我發覺他對這些問題的觀點非常客觀可靠。而我剛好意識到在這類問題上，我很需要保持客觀的心態。當初我來東歐的部分原因，是想從一個成年人的角度了解這個地方，結果卻發現我的個人經歷、身份認同和忠誠中的波蘭和猶太這兩部分既拒絕分開，也拒絕融合。我非常仰慕波蘭文化內蘊的力量，可是每每對波蘭的情感波濤洶涌之際，我就無法不自責：如此一來，對那些曾在此地受苦受難的人豈不是就不夠忠誠？比如我的父母，他們在納粹大屠殺中飽受折磨，僥幸逃生。但反過來，每每聽到波蘭被簡單地形容為反猶太國家，我又必須克制住心中的反感，因為我知道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

就在跟出租車司機聊過后不久，我去拜訪科斯特克。他住在市中心一條安靜街道上的公寓中，那公寓擁有一座庭院，幾乎像個小公園。科斯特克帶我走進舒適的書房，只見書架上擺滿了各種語言的書。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翹著腿，口中抽著煙斗。他說出租車司機的觀念確實有可能全是道聽途說，部分是因為在共產主義下，理論上不存在民族劃分，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猶太問題是不公開討論的。當然，這并不代表共產黨人不會故意采取反猶主義，但是有關復雜的波蘭猶太人歷史的活躍的、被清晰表達出來的知識，絕大部分都塵封于戰前狀態。

至于目前的反猶浪潮，科斯特克仔細地將其區分為幾個層面：標準的宗教反猶太主義，老派的世俗反猶太主義，以及一種新形態的反猶太主義，亦即一種偽裝的假象，掩飾了反民主的情感，其實質是對開放、不確定以及多元化的抗拒，害怕改變。引導人們將后共產主義第一任政府的所有成員都貼上“猶太人”標簽的，也就是最后這種變種的反猶太主義。科斯特克帶著一絲好玩的口吻說，他曾問一些百姓為什么他們認為馬佐維耶茨基總理是猶太人，結果得到好些有趣的答案。“因為他很悲傷，而且常常在禱告。”一個老婦人回答，顯然具有混合各種刻板印象的創造力。當科斯特克拿出證據，表示馬佐維耶茨基不是猶太人時，一個男的抗議道：“這個嘛，但他終究還是當上總理了啊！”

在我們談話幾天后，我正巧看到科斯特克出現在電視節目《質詢》上，就波蘭人與猶太人的關系進行辯論。科斯特克是主持人，受邀嘉賓是以色列駐波蘭大使。在立陶宛長大的大使身材魁梧，態度和藹，講一口俄國腔波蘭語。對所有問題他都不回避，不管問題多么尖銳，都無損于他彬彬有禮的回應態度。有兩名質詢者代表右翼民族主義團體，成見甚深，而且見解迂腐得令人難堪。他們倆正好都很瘦，個性激動，其中一位喉結明顯突出，隨著激烈的言詞不斷快速移動，他認為猶太人要為波蘭土地上的共產主義和秘密警察負責，他們也控制了波蘭的海外形象。

大使很有耐心地回答這些問題，但鏡頭突然轉向一個克拉科夫團體，來賓之一是一份知名天主教刊物的作者，他迸發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話語。“先生們，”他朝先前發言的那兩人叫陣，兩手憤怒地比畫著，“你們的發言簡直讓人作嘔。我真羞于跟你們同上一個電視節目。我必須聲明，你們就是純粹的反猶主義！”他言詞的激烈讓我印象深刻：在比較冷靜的美國電視媒體上，絕對沒有人會做出這么失控的行為，或這么赤裸地表露自己的感情。

但是這番熱烈的對峙中真正讓我有興趣的，其實是件似乎很小的事情，亦即科斯特克頭上戴的圓頂小帽。科斯特克無論到哪里都戴著這頂小帽，但他表示從來沒有遭遇過反猶太的言詞。這跟我小時候所可能發生的情景大不相同，那時我們絕不會在街上講意第緒語（Yiddish）[[19]](#_19_3)，也絕不會有人明確表示自己是猶太人，比如在公共場合戴會挑起反猶主義情緒的圓頂小帽等；但現在，此舉卻似乎有防堵反猶主義之效。

過去，圓頂小帽明確表示了帽子的主人是猶太人，但現在興起的反猶太主義，在實質上欠缺具體目標的情況下，似乎是靠著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發展。就像移情性神經癥一樣，由于無邊的焦慮，因此會無助地試圖尋找一個目標和原因。一個朋友曾把她從城墻上撕下來的一張猶太人諷刺畫拿給我看，那是上次選舉時貼在墻上的。那幅畫直接抄襲大戰前的畫作，手法笨拙、丑陋、卑劣。薄薄的紙張上所描繪的猶太人蓄著長胡須，身穿黑長袍，留著側邊發辮（sidelock）[[20]](#_20_3)。過去幾十年間，這樣的猶太人其實都不曾出現在波蘭。

迄今為止，波蘭的反猶主義還不是大眾意識形態，也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結果。似乎只是個符號問題，借用古老的名詞表達無以名狀的新問題。也許符號性的“猶太人”已取代了共產主義時期“他們”的部分象征意義。“他們”在波蘭人的心理上是必要的，因為這是所有痛苦和陰暗問題最現成的解釋。現在“他們”已經不在了，但是解釋的邏輯卻不是一夕可以推翻的；因為陰暗的秘密仍有保留的必要，所以反猶主義的語言就正好派得上用場。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明顯的猶太人特征反而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因為一旦主動公開承認了猶太人的特性，便不符合他們所需，不足以掩飾其隱藏在背后的邪惡的神秘性了。

我曾聽說在某些村落，農民會在夜間造訪古老、荒廢的猶太墓園，祈求實現他們的心愿。因為他們聽說有些智者或魔法師就安葬在無法辨識的墓碑下，仿佛新近離開的波蘭猶太人屬于神話的時代。

在此同時，波蘭和猶太人關系的真正歷史卻大半仍停留在缺乏教導和盲目無知的狀態。這是一段漫長、復雜的歷史，包括長時期碩果豐富的共存共榮，以及不時出現的偏見和迫害，包括曾在這里成長與凋零的豐沛猶太文化，及其與主流波蘭文化的有趣融合。對這數世紀的歷史——尤其是最近的幾個篇章——的重建，注定有復雜難解與令人痛楚之處。但是正如“被壓抑的態度的復現”已經一再證明的，只有在完成了歷史記憶后，潛意識的作用才會停止，當下的現實才會以其真正的面貌被看待。顯然，歷史需要被記住，才能繼續往前走；同時，波蘭的歷史也必須開始往前走，才能被正確記住。現在這項行動已經開始，隨之而來的是有關波蘭——猶太人問題的討論。這個議題是我無法以旁觀者的身份保持距離的，只是在我看來，這波蔓延于波蘭的奇特、反復、失真的反猶主義風潮，可能禁不住仔細的檢視。它就像從共產主義冰柜里取出的其他現象一樣，一旦攤在現實的真實情景下，就將化為無形；這一切，跟“猶太人問題”，或少數留下的波蘭猶太人，其實沒有多大關系。

蒂科欽（Tykocin）是位于白俄羅斯（Byelorrussian）邊境的一個城市，在華沙東北約一百公里處。我決定到那里去看看外圍地區的改變情形，也因為剛好能搭阿格涅絲卡的便車——她獲邀到當地去朗讀她的詩作，談論文學、歌詞創作、戲劇和她擅長的其他許多事情。在路上她也滔滔不絕，告訴我她在豐富的生命中，如何多次調整自己的行為。年輕時她非常投入于一出學生戲劇，會在社交場合談論劇團所面臨的問題，直到一位年長的良師益友告訴她這樣做是不對的：在派對上，一個人應該優雅地閑話家常，而不是高談闊論自己的工作。于是幾年后她去紐約時，就照這種方式做，但是人們根本無視于她的優雅。“你是做什么的？”人們一直問她，而且顯然要求她反問同樣的問題。“他們意識不到我的態度有多么優雅，他們以為我沒有腦袋。”她哈哈大笑。

幸好阿格涅絲卡是個有趣的同伴，因為周遭景物幾乎是一片平坦與單調，偶爾才會出現我小時候最喜愛的若干憂郁的點綴：成排有如廊柱的白楊木、農場，以及似乎總比西方凌亂的草地。不過我們經過的幾個小鎮則毫無美感，讓人沮喪：幾乎不堪使用的建筑，骯臟破舊的車輛，以及穿著破爛的孩童。途中我們停在一個小鎮，希望能采購點食物。盡管我們特地選擇在名稱響亮的羅斯福街（Roosevelt Street）和威爾遜廣場（Woodrow Wilson Square）附近下車，但僅有的幾家食品店卻都因午餐時間而打烊了。即使沒有休息，我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歐防風和胡蘿卜，以及另一家店里的一些面包。別人指點我們去的小吃店也簡陋不堪，只有廚房大小，販賣一種黏糊糊的橙子味飲料。

然而，蒂科欽是個讓人靈魂感到滿足的小鎮，風格介于不受時間影響的村莊和小型歷史城鎮之間。在這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蜿蜒的小徑和溫暖的鵝卵石地面誘人放緩腳步。小花園里花團錦簇，探出圍籬怦然綻放。鄉間屋舍有些是木造的，有些是石砌的，全都低矮綿長，覆蓋著傾斜的屋頂。蒂科欽北面花園綿延，一直延伸到寧靜、寬闊的納雷夫河（Narew River）河岸，然后再往外展延，直達平坦、慵懶、草葉茂盛的濕地，仿佛從人類文明到大自然的轉折就是這般輕松，儼然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

此地文明的發展似乎也這般自然。蒂科欽郊區僅余一片丘陵和幾塊石頭的遺址，是第9世紀斯拉夫部落所遺留的早期村落。納雷夫河彼岸雜草叢生的地基石塊，則是16世紀一個皇家別墅的城堡遺址，提醒著人們蒂科欽曾經走過繁華，是獨立在外的幼年王子們的棲息之處。根據一本當地導覽手冊的記載，18世紀中葉，蒂科欽“采納一項巴洛克空間構圖設計”，以“具有紀念性的教堂”為平衡的軸心。教堂和其他幾座巴洛克式建筑，以其和緩的曲線造型和米黃與白色的外墻，依舊寧靜地主導著整個市鎮。

不過蒂科欽還有第二個焦點，即至今仍遺留的古老波蘭區和猶太區劃分的標記。猶太區的房子一般比較窄也比較高，因為一樓得充作小型店面，使非農業居民能夠維持生計。蒂科欽這一區域最主要的建筑為一間猶太會堂，呈現出莊嚴的文藝復興時期風格，從1642年屹立至今。

昔日這里不僅住有波蘭人和猶太人，有段時期，蒂科欽還是歐洲地區種族多元的典范，遙遙領先其他西方地區。這里曾住有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還有若干撒克遜人和韃靼人。根據可靠歷史學家的記述，這些民族在這里和平共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

經過一連串疆界變更、移民和戰爭的影響，這種有助發展的民族融合的境況已經不復得見，如今的蒂科欽幾乎是單一民族的地區。阿格涅絲卡和我走入已經改建成博物館的猶太會堂。會堂維護良好，墻上有17世紀的希伯來銘文，感謝當時富商的捐贈。我們進入后，有人開啟了猶太經文的錄音，冗長幽怨的經文顫抖回蕩，讓人恍惚感受到會堂的靈異氣氛。

一個矮胖、豐滿的女人打斷了我的沉思，她跑來將我緊緊抱住，兩眼還泛著淚光。這可和此地的靈氣無關。“你是阿格涅絲卡女士的朋友啊！”她氣喘吁吁地說，告訴我們她是會堂的管理員。“我們太榮幸了！”這就是波蘭文壇知名度的體現。

博物館館長是個面貌平凡、個性可親的女人，就像許多跟歷史關系密切的人一樣，她以近乎閑話家常的熟稔口吻談論著猶太會堂和蒂科欽的歷史。她和她的同事都不是猶太人，但是他們在變革前極力爭取，這才使得這個猶太會堂成為一處猶太地標，并獲得適當的維護。他們是安靜、友善的一群人，以極其虔敬的精神守護著這個遺失的世界：其中一人曾在海外研讀猶太歷史；館長本人則一星期去華沙兩次，學習希伯來文。他們今日所創造的這個小世界地處蒂科欽一角，由于他們的投入而整潔有序、生機盎然。在旅行中這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令我覺得：那些能認定自己的天職、全心全力為之投入的人，實在幸運。館長向我們展示一座17世紀蒂科欽的模型：當時巴洛克教堂還未建造，猶太會堂卻已經存在了。她告訴我們，模型中對稱的農場格局一直延續到現在，連農場主人的姓氏也沿用至今。那些古老家族一直握有權力，經歷世代恩仇，甚至延續到共產主義時期。

蒂科欽的改變顯然很緩慢，但是市中心一小片長方形的公園已經出現了改變的征象。公園內筆直的小徑兩旁橡木矗立，林蔭蔽天，暗色樹葉窸窣作聲。一尊17世紀蒂科欽領地貴族后裔斯特凡·恰爾涅茨基（Stefan Czarniecki）[[21]](#_21_3)的雕像正以優雅之姿傲視天下。恰爾涅茨基身著哥薩克指揮官制服，手持一柄頂端為球狀的手杖，球體閃爍著金光，和古老的雕像實在有捍格之感。其實那也真是最近才添加上去的，出自第一次民主選舉的某名候選人之手，目的在于贏取蒂科欽居民的歡心。

此舉顯然奏效，該候選人目前是蒂科欽的市議員，也是蒂科欽的話題人物。我們從博物館館長的口中聽說過他，還有一位邀請我們到她的小雜貨店小坐片刻的婦人，以及當地一名技術學院的老師雅內克（Janek）也談起過他。“啊！我們這位議員”，他們都這么開始，然后繼續說他如何不懂民主的含義：他偷偷販賣公有財產，完全不征詢別人的意見，甚至不雇用會計，因此沒有人可以查閱他的賬簿。“一個小丑，一個真正的江湖騙子，你看著吧。”雅內克的妻子告訴我，“還有，他也喜歡扮演小丑。”

我在議員的簡陋辦公室拜訪了他。辦公室只有一張搖晃不穩的桌子和兩把搖搖欲墜的椅子。他是個面色紅潤，身材肥胖的人，粗魯的儀態中流露出某種男性充滿自信的優雅。“啊，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時代已經改變了。”我一坐下來，他便告訴我，“他們搞不清楚，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替他們打算或幫他們付賬了。老實講，你還不能跟他們講太多你的計劃，最好直接去做。”

民主作風對蒂科欽而言還是個非常新的概念，他對自己專斷地使用權力的做法也毫無尷尬之意。他以透露機密的口吻告訴我，有一個競爭激烈的建筑，學校老師希望改建為幼兒園，現在已經處置完畢，由一個美國女企業家買走了，將改建成一間小型旅館。另外，世界銀行可能貸款給他改善此間的電話線路，并建立一個防止污染的發電廠。“我們這里需要更好的基礎建設，”他說，“這是排在第一位的。”

“不過，我有一個原則，”他補充說，并又給了我一個保密的眼神，“金錢應該流動起來。這點很美國化吧，不是嗎？”

我承認他說得不錯。其實，這位議員活像當年某個南部小鎮的大老板，連講話聲也帶著一抹深沉、歌唱般的輕快節奏，一種悠揚的、類似于美國南方口音的波蘭口音。

在此之后，阿格涅絲卡和我受邀前往雅內克家吃晚餐，他的妻子特意準備了精彩豐盛的一餐。在一張臨時拼湊的餐桌上，阿格涅絲卡和我坐在有椅墊的兩個座位上，小房間里還有另一名受邀前來的學校老師。他是白俄羅斯人，阿格涅絲卡私下還替他取了個“拜占庭人”的綽號，因為他有張溫和的長臉，一對清澈的暗色眼睛，還蓄著墨黑的胡須，就像古老拜占庭鑲嵌畫中走出的人物。個性有些內向的雅內克很聰明，在“拜占庭人”的協助下，在蒂科欽開了家書店，雖然他并不指望書店會有什么收益。“只是讓這里的人有點事做，”他以近乎辯解的口吻說，“這樣應該會讓一些有趣的事發生。”然后話題就轉到了議員和他可惡的行事方式上。

難道沒有辦法控制他的權力嗎？我問。雅內克不耐煩地揮揮手。這里的人不關心，也不知道該怎么做。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他們仍然在過時的個人權力和個人恩怨系統中糾纏不休；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有能夠匹配新的選舉法的比較實際的管理辦法與公民參與。

晚餐后，我們開車前往猶太會館旁的另一家小型博物館，阿格涅絲卡將在那里跟觀眾見面。結果直到車子快抵達目的地時，雅內克才通知我說我也是這次見面活動的受邀者！博物館大門上的海報證實了他的話，我的名字和阿格涅絲卡并列在受邀名單上。“美國貴賓，伊娃·霍夫曼”，仿佛這樣便足以證明聲望了。完全沒有料到會有這一招的我試圖抗議，并且指出我只穿了球鞋和T恤，還都是舊衣舊鞋。但是阿格涅絲卡輕快地丟下一句：“你是美國人，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就這樣，我發現自己竟站上了蒂科欽的舞臺。

見面會是在一個漂亮的橢圓形房間舉行的，地面裝飾有拼花地板，還擺有一架鋼琴。令人驚訝的是前來參會的聽眾都衣著正式，毫無鄉土之氣。幸運的是，阿格涅絲卡如我期盼的一樣幾乎獨撐大局，表現出色。對前來與會的年輕人而言，她是波蘭戲劇浪漫史的一部分，他們向她提出有趣的、涉獵廣泛的問題，她也用一樁接一樁的軼事，一個接一個的人物梗概來回答。

然后，聽眾轉向我，問了我若干有關美國的問題。他們想知道：美國的種族關系是如何形成的？毒品問題情況如何？在美國出版一本書有多么困難？還有，我覺得波蘭人可以理解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幽默嗎？最后一個問題問得我一頭霧水，幸而一個晚上很快過去了。阿格涅絲卡和我各收到一束美麗的鮮花，然后被帶往博物館樓上的房間，也是我們的過夜之處。這里顯然無法供應熱水，但是有兩條干凈的小毛巾，床鋪也很舒服。我已經學會惜福，對這種舒適的待遇心存感恩。

第二天早上，我再度以“美國訪客”的身份獲邀參加當地小學的年終結業式。我一踏入小巧的禮堂，立即引起了一陣騷動。正在進行的儀式被暫停，學生們起立，異口同聲地朗聲說“早安”。然后有人又獻給我一束鮮花，校長也發表了一小段歡迎詞。這種友善的正式禮節一向是波蘭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歷經冗長沉悶的社會主義儀式，仍僥幸保留下來。

這場小學結業式自有其吸引人之處。畢業生作詩獻給不同的老師，并朗讀自己的詩作，語氣雖有浮華之處，但也不乏幽默；追憶過去一年間所發生的戲劇化事件的小短文，稚嫩的情感和清新的筆觸均令人感動；此外還有詩歌朗誦和歌唱表演。在整個儀式過程中，孩子們都依高矮列隊聆聽，包括最矮小的一年級學生，一式金發，猶如麥田，安安靜靜，正襟危坐，圓圓的眼睛好奇地觀看著講臺上的一舉一動。一年級學生那排發出一點小噪音，立即被巡視的老師斥責。

儀式結束后，我被帶往校長辦公室聊天及享用蛋糕。校長是位迷人的金發女士，身材結實，腰桿挺直，散發出力量和正直的氣息。她對波蘭目前的情況不太滿意。“他們沒有發新的教科書，我們沒有明年的課表。情況很亂，而且越來越糟糕。民主是很好，但是必須要有目標、有紀律。”

我告訴她美國學校目前所面臨的有關種族、宗教等多元化問題，是這個同質化的地方根本無法想象的。她聽了以后，露出慶幸自己生在這里的表情。“我們都盡力而為。”她驕傲地說。

我們離開后，“拜占庭人”告訴我，校長是位共產黨員，但是每個人都很尊敬她，因為她帶來了無窮的活力，而且工作十分盡心盡力。“拜占庭人”提議帶我去欣賞蒂科欽的風景，包括他最喜歡的納雷夫河邊的一個景點。觀賞之旅需要搭乘他那輛我已經領教過并且擔心不已的座駕。那輛車——如果還能稱之為車——簡直像是個裝有馬達的搖晃鐵箱，好不容易滑入車廂、折起身體、擺正位置后，還要面對啟動的問題。“拜占庭人”似乎訓練有素，先開啟點火開關，跳出車廂，在馬達附近扳動了一下曲柄，讓車子往下坡滑動，然后追上車子，跳入駕駛座。

我心驚肉跳，唯恐車子在啟動途中沖向路旁的樹木，但“拜占庭人”在這一連串行動中，還能自如地跟我聊天。他帶我去的地方確實也值得我幾番驚心動魄。只見濕地愈見寬闊，似乎延伸到永恒，直到草叢、灰霧和河流渾然融合，形成一個無以名狀的整體，仿佛童話里從霧氣和水中冉冉升起的神秘怪物，無論外形還是本質都難以捉摸。附近一座茅草屋的屋頂上有幾只鸛鳥在圓盤狀的鳥巢里昂然佇立，而一身灰色防風外套、儼如鸛鳥的“拜占庭人”已融為風景畫的一部分。他語氣溫柔地告訴我，他最愛來這里釣魚，一個人駕著獨木舟。這也是為什么盡管他是附近唯一的白俄羅斯人，而且有人投以怪異的眼光，他仍選擇留在這里的原因。

回到鎮上，我獨自漫步在一條清靜的街道上，一名老婦人跟我攀談，然后邀請我去附近她家坐坐。她身材精瘦，看來很結實，接連告訴我三個怪誕的故事，一個接著一個，而且始終面露愉悅。先是有幾名女子自行前往濕地，結果遭到了攻擊。她們知道是什么攻擊她們的，那“東西”全身毛茸茸的。然后，有一個匪徒專門強奪女人耳朵上的耳環，有一次還把一個女人的耳垂割掉——當然，那一定很痛，那個女人一直尖叫哀號。最后，一個男的攔住一輛公交車跳了上去，結果一只手掉了下來！那是一只金屬做的手，里面都是珠寶黃金……

“所以你看，”她為這些現代狼人和盜匪的故事做結語，“當他們什么事都準許，就像現在這樣，人們還會做出更壞的事，一定的。”

我從她陰暗的屋子回到陽光燦爛的街面，安靜地坐在猶太會堂附近的一道矮墻上。只見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坐在自己家的凳子上閑話家常；一匹馬拖著一輛長板貨車，馬蹄踏在鵝卵石路面上，發出獨特的嗒嗒聲；溫暖的空氣中飄蕩著母雞的咯咯叫聲和鵝群抗議的聒噪聲。工業革命始終沒有真正抵達波蘭的鄉間，緩慢的發展創造出這幅前現代的混合景觀：有曬谷場的嘈雜，有高科技建筑，有農民的迷信，也有彬彬有禮的學校老師。

歸途中我們再度穿過憂郁森嚴的市鎮。波蘭，或者說東歐的風景在我心目中宛如一幅圖畫，有社會主義搖搖晃晃建筑所構成的狹窄垂直的前景，以及蒂科欽之類城鎮所綿延的深遠背景，那里蘊含著不同年代的歲月和美麗，是古老歐洲的一部分，神奇地存活至今。

我在華沙一直住在烏爾斯飯店，幾天下來，飯店的職員決定拋下拘謹的禮儀，跟我談天。有人告訴我，這間普通平價飯店最值得一提的，是團結工會和政府曾在這里舉行過多次會議，瓦文薩知名的“小睡”也是在這里。顯然，每逢會談進行到特別難以處理的時刻，瓦文薩便會提出一般人日常需求的特權，宣稱自己非常疲倦，然后上樓思考下一步該怎么做。

當我向職員提起這件事時，他對自己總統的慣用手法竟然不表贊同。“老實跟你說，我已經受夠這個瓦文薩了，”他嫌惡地說，“你知道他去拜訪英國女王的時候是怎么表現的嗎？”我知道，因為那件軼事已經廣為流傳。大致情況是，在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住了一晚后，瓦文薩通知女王，說她家的電力線路有點問題，而且提出了改善的建議。女王很可能會覺得這件事很有趣，但是瓦文薩的子民卻不這么認為。“這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總統應該有的行為嗎？”職員反問，“西方人會怎么想我們？一個真正國家的總統應該有禮貌，應該知道怎么說話。他應該是個紳士，是個教授。”

他的言論使我想起熟悉的回應。我早年在這里的時候就知道，在波蘭，有關性格的政治是不講究平等的。禮儀的階級性，以及何謂“文化人”是每個人共有的信念，不因為一個人的地位高低有別而持不同看法。如今最謹守那些殘存的古老封建觀念的，或許就是職員這類人，他們還不知道西方的實際情況，偏偏又那么在乎西方人的評斷，其實這種階級觀念現在已經過時了，甚至已經反過來了。

“我告訴你，我有時候會對外國人到這里來，看到這里的情況感覺很丟臉，”他放低聲音吐露，“我的意思是，就拿這家飯店來說……在一個正常國家，這是可以接受的嗎？”其實，我覺得這家飯店還算可以，雖然保守些。不過這位職員有個模糊的感覺，認為西方的標準優越到難以想象，這里的現實情況絕對難以企及。

“我很想過體面的生活，”他坦承，“我保持干凈，每天晚上回家一定把自己洗干凈。但是我一想到人們在車站看到的臟亂和貧窮……當人們到這里來，我希望他們覺得自己是來到了一個正常的國家，雖然不富有，但至少是個中等的正常國家。”

當然，他的話未免夸張。臟亂和貧窮并不是第一個沖擊外國人視線之處，外國人早已習慣了比此刻單調、沉悶的波蘭更為夸張的情況。不過這位飯店職員從來沒有去過西方，對他，以及對許多人而言，西方依舊是一個想象中的地點，而非實際的實體。直到最近，被視為禁區的西方始終是一處代表欲望的模糊存在，一個閃爍著魔法的地方。如今，西方又轉為另一種存在，一個極端的超我，被波蘭人用以鞭笞自己、認定自己望塵莫及之處。在這位飯店職員的心中，“通往歐洲之路”是通往“文明”之路，簡而言之，便是整齊清潔、更體面的火車站，以及應有的禮貌。但它也通往社會和諧與繁榮的神秘國度，一處令他自慚形穢，必須透過自貶，才足以仰望之處。

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到處充斥著似是而非和矛盾不一、付出和收益、贊成和反對、評價與批判，足以讓人有種道德的隱痛與折磨。目前情況變得更好，但也更糟；事情往前推進，也往后倒退；情勢絕望，但也充滿希望。各種診斷、分析、預測都持續進行。這里有自由，也有失業；財富逐漸累積，也陷入窘境；有各種選擇，也深受其苦。歷史是借貸平衡的復式簿記，我一再提醒我自己，但那是一種冷靜的觀點，是只有從相當的距離外才可能抱持的觀點。

在離開波蘭之前，我和亞當·米奇尼克短暫見了一面。他很擔心瓦文薩潛在的武斷傾向，以及針對前朝權貴的追殺心態。米奇尼克一向主張政治和解。他入獄時便曾著文論述，力勸團結工會應該接納每一個人，包括那些安安靜靜、從未采取強烈反對立場的人。他考察俄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元素，認為那些元素也許可以被運用于波蘭，并且試圖化解左翼和教會之間傳統的敵對立場。結果在民主化之后的反轉氣氛中，他卻因主張寬恕以前的敵人和曾囚禁他的人而遭到批評。

米奇尼克對于如今掌權的昔日朋友則沒那么寬容，他確信他們也非常討厭他。不過在目前的沖突中，他是局中人之一，因此必須保持評論的尖銳性。

從比較超然的觀點而言，他們在爭執些什么，或者他們劃分的界線在哪里，有時實在很難分辨。波蘭政治局勢一直千變萬化地不斷重組。從去年起，新的政黨不斷崛起，然后萎縮、分裂、合并，像細胞分裂一樣。有人擔心波蘭的政治會“魏瑪化”，亦即因為分裂而侵蝕民主的基礎[[22]](#_22_3)；也擔心“伊朗化”，亦即政教分離制度的崩解[[23]](#_23_3)。

顯然，原有左派和右派的劃分已經不適用于此刻的情況。比如直到最近，共產主義還被視為波蘭的保守勢力，因此任何反對共產主義者都是進步者。按照這個邏輯，自由市場是進步力量，最自由的人也最擁護自由市場，而似乎沒有人會持反對立場。與此同時，共產黨人重新主張若干傳統上被視為比較進步的立場——喔，這種矛盾的情況似乎不斷上演——諸如一種混合式經濟的觀念，可靠的社會服務，重新包裝為多元主義的國際主義，以及反-反猶主義。另一方面，反共產主義的群體中，新的進步和保守立場也在形成。保守主義者比較主張民族主義思想，尊重教會，激烈譴責共產主義；進步主義者則主張多元主義思想，對國外投資采取比較開放的態度，傾向于在前朝政權和當今時代之間畫一條“粗線”。

但是，從本質上看，波蘭主要政黨和政客間的差異還不是那么大。在主要政客中，每個人都希望踏上通往歐洲之路，每個人都承認合宜的自由價值觀，至少在公共場合如此。盡管大家都擔心瓦文薩的煽動行為，但在憲法規定的民主框架下，他表現還算良好：雖然經常叫囂把共產黨揪出來，倒是沒有采取正式措施具體去做。即便對完全自由市場經濟大表贊譽，卻也沒有人企圖廢除現行的免費教育或醫療系統，或迅速將工業巨獸民營化，而造成龐大的失業潮。即使有這些喧囂與躁動，極端主義者還是沒有取得優勢，或許這是因為波蘭環境中的某些因素發揮了現實制衡的作用，適時化解了極端主義的力量。比如經濟上的窘迫狀況，不論個人意識形態如何，都是一個急切而清晰的任務。另外，在西方警戒的注視下，波蘭必須表現出某些良好、溫和的行為，才能換取贊賞與波蘭迫切需要的現金。不管從過去中浮現出了什么鬼魅與幽靈，現實的力量畢竟還是掌握了支配地位。

與此同時，出現了新的多元主義的巴別塔，各種觀點、聲音和妥協交織在一起；各黨派企圖識別出自己的支持者，政治人物企圖掌握民眾的所好；還有投票和迎合——民主制度特有的謊言。不管怎樣，波蘭正通過現在這種正常的運作方式走向一個正常的國家。對我而言，那正是此地正在發生的情況，也正是我對這場非毀滅性的困難“革命”所下的溫和定義，盡管這里所謂的“正常”能否得到實際經歷這一切的人的認同是另外一回事。

在動身前往布拉格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一個朋友的公寓參加聚會。話題包括不斷躥升的房地產價格，南斯拉夫逐漸惡化的情勢，一種新潮的觀眾參與式戲劇，也談到這里每個人都非常重視的高中畢業會考。“你今年要參加嗎？”他們彼此詢問，仿佛要跟他們的孩子一起參加考試似的。每天報紙都有專文刊載有關會考的消息，有位父親還遠從國外回來陪女兒撐過這場考驗。

有些客人猛灌酒。老天，他們真能喝！毫不間斷地足足喝上幾個鐘頭，直到聚會結束。難道波蘭人已經發展出特殊的基因，足以適應伏特加的環境了嗎？最后，一個女人唱起愛國歌曲的片斷，還大聲講述一些輕佻的軼事。我有點尷尬，但其他人都神情自若——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事，為人們的各種怪異行徑留有更大的空間。也許這么做有它的道理，就是不要輕率地把人劃為不正常。

有個在某個社會機構工作的人講起他必須采取的縮減措施，以及，理所當然地，他應該先從那些前朝權貴下手。“該死的是，有些人真的很擅長他們的工作。我要怎么跟他們說呢？我的意思是，我恨他們，我當然恨他們，但是我能怎么說呢？我覺得他們也蠻可憐的。”

“我們就不必自欺欺人了，這種亂象可能要花幾十年時間才能厘清。”有人回答，特意講給我聽，“這種情勢還會繼續惡化下去，然后才能開始好轉。你怎么能認為這是一個正常國家呢？如果是捷克，那情況也許不同。你曉得，他們一直處于文明之地，知道事情該怎么做。何況，他們幸運地有哈維爾（Václav Havel）[[24]](#_24_3)，他在西方很受歡迎。”

餐會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晚上，那名酒醉的女士從臥室出來，精神奕奕的清醒模樣，顯然已經睡醒了。

前往布拉格的途中，我在克拉科夫稍作停留。當地電車居然漆成粉紅色！有些畫有宣傳圖示，也有些是1960年代的迷幻風格設計。色彩重新回到了東歐。

我在克拉科夫飯店餐廳和齊格蒙特·馬提尼亞碰面，一起小酌伏特加酒，品嘗奶油鯡魚。在過去一年間，他數度忍受違背良心之苦。開始在市政府工作后，他便很懊惱地發現，很多事情還是涉及標準的權力斗爭，完全沒有改革，包括辦公室的派系、陰謀和解雇不忠誠的職員，而且全都使用高壓手段，因為對于管理的專斷行徑還沒有新的法律或成規足以約束。齊格蒙特對此非常失望。就某方面而言，這些新的骯臟行為比舊有的齷齪行徑更令他的理想主義受傷。當初他對新波蘭的成立是那么興奮，但現狀絕不符合他對新波蘭的期望。因此有段時間他辭職不干；但后來還是回來了，判定終究還是留在市政府才能真正有所作為。

“現在讓我失望的，”他說，“是最好的人才都不會選擇從事公職，而是成為私營企業的生意人。你知道，因為這所有的沖突，還有尖銳，有時候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言詞，使得他們不愿意從事政治。”我知道齊格蒙特是個非常溫和的人，但依然對他所持的這種政治生活觀念感到有趣，咄咄逼人幾乎成了端莊正派令人難以啟齒的畸變。

像去年一樣，我們穿越中央廣場而行，而此地再度變成一座龐大的教堂。一位衣著華麗的主教正站在廣場上方的一座陽臺上主持彌撒。“為了紀念一位波蘭圣人。”齊格蒙特悄悄告訴我。廣場人滿為患，放眼望去全是安靜、虔誠的人。空中飄蕩著格里高利圣歌（Gregorian chant）[[25]](#_25_3)純凈的祈禱聲，廣場上的群眾也跟著禱祝，盡管有上百個聲音，但卻甜美寧靜。接著所有群眾都跪了下來，動作齊一，安靜地跪在鵝卵石地面上。這是一個充滿力量、令人不安的時刻，有這么多的一致，這么多的公開堅持，這么多的肯定。廣場全部為信徒所占領，我則尷尬地獨自站在一群跪地的信徒中。我看到齊格蒙特猶豫不決該怎么做，最后決定陪我一起站著。

離開克拉科夫前，我在咖啡店碰到一個朋友揚恩（Jan）。揚恩是位作家兼編輯，能言善道，言詞生動而幽默，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為他自由調侃的對象。我們品嘗著伏特加酒和奶油鯡魚，他則如連珠炮似地評論著當前局勢，說他有多么厭煩新的文人政治，以及這群新華沙人的陰謀、混戰與派系作風。“我們華沙的小地獄。”他做下這樣的結論。

然后，當我告訴他我行程的下一站是捷克時，他轉移話題，開始滔滔不絕地評論奧匈帝國時期這個地區波蘭人和捷克人的關系。那段時期的記憶對他而言絕不抽象，他還清晰記得父母那一代給他講的故事，顯然其中沒一個是說捷克人好話的。“捷克人是可怕的官僚主義分子，相信我，”他語氣中蘊含著真正的嫌惡，“是帝國中最糟糕的。他們愛發號施令，冷酷無情。他們會索取賄賂，而且永遠站在帝國權力那一邊，站在奧地利人、俄國人那一邊。我們太了解他們了，相信我。”這就是我所聽到的波蘭人對捷克人的偏見。對我而言，在民族偏見的詞典中，這是最令人費解的情感之一。也許是一種地域式的偏見吧，源于克拉科夫曾經隸屬于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源于似乎沒有關聯的過去——可當時深植的沖突卻依舊不時迸出這些零星的火花。

我就這樣帶著若干先入之見，啟程前往捷克。

[[1]](#_1_4)指詞的一種，通常帶有“小”或“微”的意思，口語中常用來表示親昵。

[[2]](#_2_4)位于加拿大西北酷寒地區，19世紀末曾引發淘金熱，至1910年消退。

[[3]](#_3_4)即華沙文化科學宮，為華沙最高建筑，1952年興建，1955年完工。因為是斯大林贈予波蘭民族的禮物，所以又有“斯大林的注射器”、“俄國婚禮蛋糕”的戲稱。

[[4]](#_4_4)小理查德，全名為Richard Wayne Penniman（1932—）。美國創作歌手、音樂人，作品主要創作于1950年代中期，曲風充滿活力和魅力，奠定了搖滾的根基，也對其他流行音樂類型如靈魂樂和朋克產生了重要影響。

[[5]](#_5_2)中古世紀以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主形成的商業和政治聯盟。

[[6]](#_6_2)貝魯特，黎巴嫩首都，歷史上曾屢次被征服。

[[7]](#_7_2)指卡廷大屠殺。蘇聯秘密警察機關于1940年4—5月間對被俘的波蘭戰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進行有組織的大屠殺，遇害人數高達兩萬余人。

[[8]](#_8_2)阿格涅絲卡·歐謝茲卡（1936—1997），波蘭文人，曾為兩千余首歌曲填詞，被視為波蘭文化典范。

[[9]](#_9_2)狄蘭·托馬斯（1914—1953），英國詩人及作家。

[[10]](#_10_2)由波蘭的三個城市組成的城市區，包括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亞。三個城市緊密相鄰，都坐落在波羅的海沿岸。

[[11]](#_11_2)薩姆·謝潑德（1943—），美國音樂人、劇作家、詩人和散文作家。

[[12]](#_12_2)1960年希臘電影《應召女郎》中的一首插曲。

[[13]](#_13_2)shack是雙關語，可指簡陋木屋，或者男女同宿。

[[14]](#_14_2)蘇聯時期情報機構的所在。20世紀30年代，盧比揚卡監獄“清洗”了數以千計的人。

[[15]](#_15_2)19世紀美國小說家華盛頓·歐文所寫的短篇小說，情節類似中國的黃粱一夢或南柯一夢。

[[16]](#_16_2)卡爾·羅杰斯（1902—1987），人本主義的創始者之一，首創非指導性治療，又稱案主中心治療，強調人具備自我調整以恢復心理健康的能力。

[[17]](#_17_2)廣義上指上帝對猶太教徒的指引，包括所有猶太教律法與教導；狹義上指摩西五經。

[[18]](#_18_2)又稱虔敬派信徒，是猶太教正統派的一支，受到猶太神秘主義的影響。教徒形貌特殊，除了蓄胡須與邊發、戴寬檐帽或毛帽之外，也穿著傳統哈西德派的黑衣，波蘭的多數教徒在納粹猶太人大屠殺中慘遭殺害。

[[19]](#_19_2)中歐和東歐猶太人所使用的語言，是德國方言和希伯來語等混合的語言。

[[20]](#_20_2)在臉兩側垂下一束頭發，一些猶太人以此表明自己的猶太身份。

[[21]](#_21_2)斯特凡·恰爾涅茨基（1599—1665），波蘭立陶宛聯邦將軍和貴族，為波蘭有史以來最有能力的指揮官之一，功業彪炳，官至王室陸軍指揮官。他被視為波蘭民族英雄，波蘭國歌亦有提及他的名字。

[[22]](#_22_2)1918年，德國依據《魏瑪憲法》成立共和國，憲法采用半總統制，權力由直選的總統和國會分享，國會選舉采取完全比例制。這項設計導致反納粹主義者無法整合，最終由希特勒掌權。

[[23]](#_23_2)1979年，伊朗發動革命推翻原有君主政權，成立伊斯蘭共和國，是政教合一的政體。

[[24]](#_24_2)哈維爾（1936—2011），捷克作家及劇作家，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知名異議分子。1993—2002年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25]](#_25_2)起源于9—10世紀，為西方基督教單聲圣歌的主要傳統，是一種單聲部、無伴奏的羅馬天主教宗教音樂。

#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一位在美國生活了十五年的捷克友人馬丁（Martin）約在布拉格機場碰面。他和一對情侶同來，那兩人都留著略長且看起來相當散亂的頭發，身穿T恤搭配牛仔褲。車子一開，馬丁作為主人就焦慮地開始問我對所見所聞有何感覺。這是他第一次回來。我們正穿過相當單調的城市周邊，但是一開進貨真價實的布拉格，我便進入了最原始的興奮狀態，那是種無可抑制的欣賞，是旅人偶爾才能得到的獎賞。

我完全沒料到這個散布在七個山丘上的城市，已經為我準備了既富麗堂皇又豐盛無盡的視覺驚喜，仿佛在它的地底某處有個不斷重新注滿的寶庫或噴泉，美麗的景物源源不絕地從中躍然而出。眼見之處，不是令人瞠目結舌的雕像或漆上色彩的裝飾品，就是華麗的建筑細節或林立的立體派建筑。這些東西通通融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美學上的超載，整體效果比所有構成要件加總起來大了很多。巴洛克式緊貼著哥特式，蜿蜒的新藝術壁畫對著細致的鐵制格子窗。城市位于伏爾塔瓦河（Vltava River）的一邊，仿佛從層層赤褐色磚瓦屋和蒼翠繁茂的公園中生長出來，最上面的布拉格城堡安靜地矗立。在城市中心將這兩部分連接起來的，就是令人屏息的查爾斯橋（Charles Bridge），它有著支撐整座橋梁、比例完美的哥特式拱橋柱，兩旁欄桿上還立著整排宏偉莊嚴、尊貴安詳、賜福于人的圣人像。

這橋上所傳達出來的慈善與自信的力量，讓我感到驚奇，由此生發出的對美、感官享受和愉悅的喜愛，也在布拉格的建筑中隨處可見。布拉格的歷史并不完全像它的都市樣貌所呈現出的那般和諧。以查爾斯橋為例，它原由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Moravia）王國國王暨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于1357年下令興建，他統治過最輝煌時期的捷克。但是這些雕像卻大部分都是在18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時增添上去的，在那個王朝統治的三個世紀間，捷克幾乎完全失去了原來獨有的特性和語言。和教會與皇宮如出一轍的巴洛克式風格，被外國君王和耶穌會人士——他們曾在波希米亞施行暴力的反改革運動——強加在這些雕像上，以此來報復由平民主義者揚·胡斯（Jan Hus）[[1]](#_1_7)所領導的激烈改革。

然而，即使歷經外來政權統治，布拉格的繁榮與發展卻從未中斷。除了1541年的大火之類的自然災害，這座城市從未遭受過大規模的破壞。走過它的古城區時，我內心突然浮現出一個奇特的想法：1939年德國入侵時，想要保存華麗首都的愿望，或許對捷克人的反抗構成了一種潛在的約束。我知道這純屬想象，但我能理解，想象布拉格的毀滅，必定如想象巴黎遭到炮轟一樣令人難以忍受。

馬丁帶我逛了這座城市的某些中心部分。“你覺得怎么樣？”他一直問我。對于我明顯真誠的贊賞，他開心得仿佛我是在贊美他個人似的。在1970年代中期，為了逃離一個已經變得難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國家，馬丁選擇了非法潛逃，而且過程極其戲劇化，包括沒有使用護照，卻越過了重重關卡的邊界。這一極度痛苦的事情，說來已經像是對遙遠黑暗時代不盡可信的比喻。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樣，當下他的出境限制被解除了，而他回國的情感強度與他先前決裂時的震驚度相當。他經歷了一段屬于某個特定時期的流亡，就像十四行詩只屬于某個特定時期般明確，甚至可說那段流亡創造出了屬于它自己的文學，以無法挽回的失落感所孕育的憧憬和抒情詩為標志。

既然放逐已經結束，馬丁索性忘我地沉浸在重新發現的愉悅以及看到布拉格仍如他記憶中那般輝煌壯麗的欣喜中。“前幾天，我看見一個背著背包的小男孩，”他告訴我，“讓我想到那個年紀的自己，在布拉格到處走著，渾然不知自己擁有什么。我想問那孩子，你知道如何看待你周遭的事物嗎？你知道這有多特別，有多美嗎？”

他帶我前往瓦茨拉夫廣場（Wenceslas Square），這真是條相當寬敞的大道，曾有大批群眾聚集于此聆聽瓦茨拉夫·哈維爾的演說，表達他們對舊領導人的輕蔑。天鵝絨革命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有那么一會兒，我們就站在哈維爾演講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前的階梯上。靠著某種聲學上有利的構造，聲音可以從這里傳到很遠的地方；而且這條大道就像戲院一般，往另一邊地勢漸高，堪稱上演政治大戲的天然場所。

距離劇變不過數月，和華沙是多么明顯的對照啊！這里涌入人群，大部分是帶著背包或吉他漫步而行的年輕人，和所有游客一樣，看起來有點無聊、脾氣不怎么好。書上有的任何語言都可以在這里聽到，不過大部分還是德文。在這個1990年的夏天，這股捷克風潮，或稱為捷克時尚，已經席卷了全球的年輕人。東歐的每場革命都被賦予了一個相應的標簽，而在這之中，又以天鵝絨革命最具哲學思潮、幽默感和搖滾風，因此被視為最溫馨、最溫和、最時尚的，正是與暑假相配的完美革命。

附近的那普日科帕大街（Na Příkopě Street）上懸掛著慶祝的旗幟，兩側也有始終在此的餐廳和商店。一整排商店依次而立，展示著珠寶（無可否認是最俗氣的那一類，而且一直如此）、迷人的波希米亞玻璃和瓷器。盡管幾乎難以置信，但我確實不經意地在某個櫥窗里發現了閃閃發亮的白色美膳雅食物調理機。經過波蘭后，在我看來這幾乎就代表著西方了，盡管馬丁跟我打包票說那單純是我受到劇烈改變的認知在作祟。

另外，這里還有很多間餐廳和咖啡館，有些有著吸引人的室外陽臺。馬丁決定中午到一個以掛有穆夏（Alfons Maria Mucha）[[2]](#_2_7)線條優美的油畫而聞名的地方用餐。他幾乎將那華麗的室內裝潢引為個人的驕傲；但是當他試著要說服我相信餐點和裝潢一樣好的時候，他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鴨子骨頭上面幾乎沒有肉，只有硬邦邦的皮；而捷克幾乎每餐都有的著名水餃，則干得令人不解，因為這種通常沒什么特色的水餃的唯一優點，就是其飽滿濕潤的口感，如果連這都沒有那就一無是處了。餐點里沒有蔬菜，當我要求一份沙拉時，原本就已經慍怒的服務生干脆不耐煩地翻了白眼。馬丁告訴我，我必須理解，在過去的制度下，他們沒有表現良好的動力；但我想不通，為什么連要讓廚藝更好的動力也完全不見了。

至于美感，它又經歷了什么？就第一印象來說，當今的布拉格居民整體看起來懶散、臃腫，又沒什么時尚感。可是盡管對我而言，捷克人看起來不怎么時髦，但明顯他們卻覺得彼此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大街上，年輕情侶們磨蹭鼻子、擁抱、凝視對方的眼底；在快速運行的地鐵扶梯上，他們緊緊依偎，或者在探尋感官享受中魂游象外。從那么多無憂無慮、彌漫著色情內容的捷克著作看來，我想是否出于某種外國人察覺不到的理由，使得這里真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說過的，是個情欲的天堂。

這里的地鐵是都市交通的楷模——無可挑剔的整潔，絕對可靠的運行，而且設計優良，一個管狀圖案反復出現在手扶梯欄桿、天花板和泛光的站臺上，車站的墻面都貼著瓷磚。地鐵由擅長設計地鐵的蘇聯人所設計。

做了一天觀光客的我，滿心感激地回到我從一對老夫婦那租來的住處，旅館房間幾乎一室難求。扎孔（Zákon）夫婦完美呈現了我從捷克電影和小說中所獲得的典型捷克形象。扎孔先生身材矮胖，有一張海象般的臉，留著小胡子，目光機靈閃亮，讓我立刻就覺得好可愛，再沒有什么比確認這樣一張奇特的臉下藏著一個和你一樣的人類更能體現幽默感的了。扎孔太太則莊重豐滿，一副不管碰到任何困難都能平靜微笑以對的模樣。她很關心我早餐要吃什么，看來我們足以跨越波蘭與捷克之間的障礙理解彼此的意思，解決一些基本的生活瑣事。對于這跨國交流的成就，我們倆都深感滿意。

扎孔先生看書自學英文——這個夏天似乎每個人都在學英文，因為他們知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往歐洲的道路要經過美國。雖然他詞匯有限，但發音卻十分正確，而且所有的簡單句都有種好玩的節奏感。

“要看一下您的房間嗎，女士？”他模仿正式的腔調問道，“我希望您能覺得它非常……”他停下來，舉起手指表示等一下，然后開始相當平靜地翻查字典，“舒適，”他清晰地發音，“我希望您能覺得它非常舒適。”

雖然整個裝潢幾乎是出于刻意的單調，但房間舒適，而且很大。米黃色的地毯、一種難以形容的人造毛褐色床罩、一張類瑞典風格的咖啡桌和淡黃色的微暗燈光。我畢竟是在東歐嘛。但是椅子上擺著新毛巾，床邊還有一盆花——這恰到好處的文明跡象實在讓人寬慰。當我發現熱水的供應不但充足而且規律時，已經可以說是十分滿意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就發生了一件事，讓我發現原來我們以為的跨語言的理解只是個假象。盡管我堅稱自己幾乎不吃早餐，扎孔太太還是開始在我面前擺上了足以讓我的味覺一蹶不振的食物。在小小的廚房餐桌上，有好幾種火腿、意大利蒜味香腸、干酪、雞蛋、臘腸、西紅柿，以及兩種蛋糕。扎孔太太熱心地圍著我轉，當看到她的客人的食欲如此匱乏時，還緊擰著雙手。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氣才沒有為了取悅她而愚蠢地把自己撐爆。

扎孔先生從伏爾塔瓦河釣魚回來。他黎明即起，進行這全國性的休閑活動。想起捷克小說和故事里的釣魚章節的我，再次有種得到認可的小小雀躍——從小浸泡在書中的人發現小說主題忠實地再現了真實生活時的那種欣喜。

因為發現自己對捷克語的理解實在靠不住，所以我決定到當地的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辦公室去找個翻譯。那里有位秘書說他能提供一位，然后明顯面帶狡猾地經過一番飛快計算后，說了個對這類服務來說相當高的價碼，就算放在曼哈頓或倫敦都算高的了。我有點被冒犯的感覺，不只因為被當成好騙的有錢西方人，還有這個男的那副利用自己國家新近變得流行為自己謀利的模樣。因此我直接說：“不用了，謝謝。”或許拒絕得太過簡潔有力。

一位在這里上班的說英語的記者邀請我喝杯咖啡，結果很快就演變成對哈維爾長篇大論的激烈抱怨。我看得出這位纖細高挑、蓄長發但前額微禿的記者因為發現了新的批判立場而精力充沛。他嘲諷哈維爾沒有經濟計劃，而圍繞在他身邊的異議分子同事也都是些對經濟改革一無所知的人。此外，內閣里有太多共產黨員。好吧，那家伙是寫了一些好劇本，我們就暫且不提有多好了，也有些聽起來還蠻不錯的道德文章，但這是正事！“你怎么會讓一個劇作家來當國家領導者？”這記者夸張地做出結論，好像答案不言而喻。

“總比是個政客來得好。”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然而，新批評論似乎已堅固地深植布拉格，或至少在核心集團內是如此。那天稍晚時候，我和一位我稱作奧塔（Ota）的人聊天，在過去的異議年代里，他和哈維爾相當親近。劇變之后的幾個月，也曾和哈維爾在公民論壇（Civic Forum）并肩合作，那是個還未形成政黨的政治團體，暫時作為非共產黨政治的保護傘。因疲勞和不滿，如今他已經退出了公民論壇。他說他一直對哈維爾的浮夸、表演傾向和專橫保持懷疑。奧塔指責說，當哈維爾還是公認的反對黨領袖時，他比較喜歡在餐廳和其他危險的公開場所會面，讓別人暴露于不必要的風險中。作為公認地下精神領袖的他，總是用命令的方式做決定，至今依然如此。同時他對經濟毫無概念，因而對宣布任何經濟改革都猶豫不決。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們都已經落后于波蘭了！甚至，奧塔繼續抱怨，哈維爾只聽他那些異議分子哥們兒的話，而他們只會提供差勁的建議和是非不分的贊美——這一點兒也不令人訝異，他下結論說，因為哈維爾從不悅納任何批評。所有這些都引起公民論壇和布拉格城堡——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哈維爾現在的居住地——之間的緊張，導致了這短命聯盟的嫌隙。

蜜月期結束得太快了！這可能是因為就某方面來說，這種因為有魅力的人格特質、道德權威和出其不意的決定而產生的異議政治，并沒有為講求實際的、妥協的一般政治做好準備。不過我還是不免思考我們期待政客在多大程度上免于人為錯誤。哈維爾不是應該從這懷疑中得到更多好處嗎？現在我們都樂于認為懷疑是通往真理的大道，但我發現自己對懷疑的沖動本身也存有懷疑。

在街上，理想尚未破滅。在這里被稱為瓦謝克（Vašek）的哈維爾的畫像到處可見。櫥窗里，他的裱框相片也已經取代了無處不在的列寧和東歐共產黨人的相片。

穿過瓦茨拉夫廣場時，我撞見一幕不協調的景象：一小群年輕人圍著一位金發、干凈整潔的美國吉他歌手。他放聲高歌，唱著令人感動的贊美詩歌，聲音優美平緩。表演完后，他和跟他一樣干凈整潔的助手們露出陽光般的笑容，發放他們所在的浸信會（Baptist Church）分會的宣傳單，看來傳教士們立刻就覺察到了這心靈上的空窗。

國家劇院的廣場上，則是另一種形態的免費音樂會。目前布拉格處處可聞音樂，為這轉變過渡期增添了歡慶的美好。傍晚時分，莫扎特和蒙特威爾第（Claudio Giovanni Antonio Monteverdi）[[3]](#_3_7)的樂聲從伏爾塔瓦河上的一個中心小島流瀉而出。在查爾斯橋上，業余樂團試圖彈奏出披頭士的韻味，而在各式各樣的爵士俱樂部里，看似嚴肅的年輕人穿著沉穩的黑色服裝，仿效1960年代早期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波希米亞風味。廣場上，受歡迎的演員和音樂劇名人演出輕松的通俗歌曲——淘氣而又甜蜜地發現另一個時代。一個銅管樂團演奏《噢，圣人來到》（“Oh When the Saints”），我身邊一位身材豐潤、心形小嘴涂著大紅色口紅的女士，神情純然愉悅地搖擺跳躍著，完全一副沉醉于生活之樂中的喜悅模樣。一直以來，布拉格都是音樂家的城市，盡管那可能也會改變。“在此之前，每個人都想要當音樂家，”奧塔對我說，“現在則人人都想成為生意人。”他相當滿意且認同地做出這個反映時代狀況和需求的結論，但是我個人卻希望至少在這方面，改變可以美好且緩慢。

為了休息一下，我走進一間酒吧——又是一個在每部捷克電影和小說中都看得到的主題。雖然現在離傍晚還早，但昏暗的石房子內部就像任何時候的波蘭酒吧一樣座無虛席，只不過和波蘭人不同的是，這里所有的男人——真的全部都是男的——并沒有喝醉。他們緩慢地啜飲著大酒杯里的深色液體，看起來好像可以永遠如此喝下去，而且或許也真的可以。當然，并沒有人來打擾我，不過在我走進去時，他們全都抬起頭來，不加掩飾地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我。對于自己既是女人又是外國人的雙重奇特身份，我也就只能忍受這么久而已。點來的啤酒幾乎原封不動，我就迅速結束了這次探訪。

有位朋友從紐約過來，我和她約在郊區的布拉格飯店碰面。那是個奇特的地方：空蕩蕩的大廳，莊重的大理石樓梯導向一樣空蕩蕩的酒吧和露臺，超大的皮椅——整體風格就是巨大。這是個高層要人飯店，是一個用來接見阿拉法特（Arafat）和卡扎菲（Qaddafi）等人物的場所，是東歐與中東幽暗的聯結。為了防御攻擊，飯店戰略性地建在一個孤絕的山坡突出處。

稍后，在逐漸暗下來的暮色中，我和友人走向布拉格城堡，這座建筑群和庭院的華麗綜合體從11世紀起就聳立在布拉格。往上走的是空蕩又陡峭的鵝卵石街道，僅由從酒吧散發出來的金黃光線和從城堡安詳地流瀉而下的蒼白燈影提供照明。平常，若是走在這種既長又陡的山路上，我可能不是精疲力竭，就是喘不過氣了，但現在的我卻像是被施了魔法，仿佛忘了自己是個有形的生物般被牽引而上。想必就是這種敬畏感或對美的感受，讓早期那些容易受騙的百姓相信君王就住在超凡入圣的國度里。

如今這座城堡則是那些看來多半難以置信的真實事件的發生地。哈維爾從監獄到布拉格城堡的崛起——當然有虛構的成分在內，可是他已然正在經歷世俗政治現實的嚴苛考驗。現在還在接受考驗的是他自己的理想主義。在無權無勢的時候，他寫出論述集體生活里道德的力量、個人真理改變世界之效力等等激勵人心的文章。他的純粹人道主義在務實的政治中能留下多少？這的確是這些動機良好的革命所帶來的有趣問題：這些出于好意的良善企圖的局限為何？

現在看來，這位作家總統還蠻適合這樣排場盛大的華麗舞臺。哈維爾似乎很喜歡國家的盛會。他入主辦公室的第一個舉措，就是讓皇宮守衛穿上戰前色彩鮮艷的服裝，還有開始乘坐那輛原屬于兩次大戰之間廣受贊譽的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4]](#_4_7)的勞斯萊斯。

城堡的庭院并不規則，以不同時代的印記引人入勝。要不是有位孤獨的溜冰者圍著一尊扭著身子，組成像花朵綻放一樣造型的雕像優雅地繞圈，實在是一片空曠明亮。那身影倏然而下，襯著夜空的軌跡驟降與轉圈，看在我眼里，就像是嘲諷布拉格不可見光的魔法的印記。

我所聽到的發生在封閉的幾十年間的故事，開始為布拉格蒙上不一樣的陰影，直到它變得像是黑暗童話里具有諷刺意味的漂亮場景，上演著詛咒降臨城市，擄獲其市民進入一個長長的奇異噩夢的故事。

比如安娜的故事就是如此。我和安娜·格魯索娃（Anna Grusova）初識于斯拉維亞（Slavia），那里曾經一度是布拉格文藝人士最喜流連的裝飾華麗的大咖啡館。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Jaroslav Seifert）[[5]](#_5_5)曾寫道，詩人都聚集在這里，向外望可以看到突出于布拉格山丘的迷你版埃菲爾鐵塔，以及蜿蜒淌過城市的河流。用詩的語言來說就是：“這是塞納河，對，這就是那塞納河”，而詩人們便可想象他們是在巴黎。如今充滿斯拉維亞的，盡是觀光客，而不是詩人，而且就算是強大的裝潢魅力也無法消除板著面孔的服務生們所制造出來的陰郁氛圍的影響。

安娜四十多歲，身材結實瘦削，面容憔悴；但是一開口講話，她就變得異常美麗。我不是說她有張多變的臉，而是她大大的眼睛中充滿了感情，好似承載了顯而易見的內在壓力。她深深被她的國家所發生的事觸動。她還記得前朝政權倒臺之后的那個星期，走進地鐵，看到搭電梯上來的人的臉：“那些臉都不一樣了。我每天看著那些封閉、生氣、低著頭往下看的臉，已經看了二十年，現在它們全都不一樣了。人們變得坦率。他們看著對方，有些許的信任，些許的希望。”

但對她而言，安娜帶有一絲平靜的遺憾說，這一切都發生得太晚了。為什么，怎么會這樣？我不斷地問，因為在我習得的美式思維中，從來沒有太遲這回事，這也不是我樂于接受的說辭。安娜嫻靜端莊地表示，她已經失望了太多次。她說，比她年長的人“過去”已經成功過，可以卷土重來；而年輕人則有機會整個重新來過；但她這一代還沒開始就被阻止成功的人，機會就甚少了。她已經經歷了幻滅，也經歷了懲罰，并且適應妥協了。她不認為自己有精力再重新開啟整個過程——她指的不只是新的行動，還有希望。

經過長談，在得知她的生平后，我才開始了解她身上匯集的環境的重擔，也才明白要是她沒有感到疲倦和一些謹慎，那才是駭人。

安娜承受的環境的重擔幾乎是從娘胎開始的，在她成為她父親的女兒那一刻就注定了，因為支配她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斯大林主義者遵循“麥克白”原則，也就是如果懲罰了父母，那么最好連他們的小孩也一起懲罰，尤其是當正義并不在懲罰者這一邊時。安娜的父親愛德華·戈爾德施蒂克（Eduard Goldstücker）失蹤那年她才十歲。她和身為早期共產黨員的父母很親，父母都屬于最理想主義的類型。她的父親是位翻譯家和散文家，在英國進行的捷克戰時抵抗活動中甚為活躍，戰后任職于外交部。1949年他曾短暫擔任捷克駐以色列大使，是首位也是1990年以前的最后一位大使。可惜無論是這個職位，還是猶太人的身份，在即將來臨的事情上都沒給他帶來什么好處。回到捷克后，戈爾德施蒂克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任教，但這卻不是他被從以色列召回的真正原因。然后有一天，他就失蹤了。

發現安娜的父親沒有回他們當時住的鄉間別墅度周末，她的母親便到布拉格去找他，完全不曉得他發生了什么事。可是當她到他所住的旅館柜臺詢問時，那急于討好當權派的柜員馬上通知當局，說他們剛剛逮捕的那個人的妻子出現了。當她懷抱著丈夫會出現在那里的希望重回旅社時，卻只看到兩名警察等在那里。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y）[[6]](#_6_5)主導的審判已然開始。

捷克的公審文件幾乎殘酷到讓人不忍卒讀。就像在蘇聯和匈牙利一樣，捷克的恐怖統治也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1948年，即鐵托（Josip Broz Tito）被逐出蘇聯集團后，斯大林下令在東邊國家進行一連串的“凈化”大清洗。捷克的審判全部由時任黨委書記、掌管國家安全的斯蘭斯基負責。但實際上這荒誕的行動是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務所主導的，他們全程監督審訊和行刑。以真正的奧威爾主義的語言來說，他們是被稱為“老師”的。在這段恐怖時期，幾百位非共產黨員遭到處決，還有幾千名被下獄或被送到勞改營。

一年后，輪到了斯蘭斯基。依照另一個不合情理的邏輯，為了給清洗無足輕重的人找到合理的理由，蘇聯判定他們需要找位于高層的替罪羊來說服平民百姓反黨是罪大惡極的危險行為。于是在捷克，斯蘭斯基被選為合適的人物，而為了要合理化這項陰謀的指控，其他十三位黨政要員也受到牽連，隨他一起受審。十四名被告中有十一人是猶太人，后來遭到處決的十一中，也有八位是猶太人。

就像所有被告的家屬一樣，安娜和她母親也是透過收音機聽到審判的。在受過審問和搜家后，安娜的母親即被釋放。母女倆有長達十個月之久的時間不聞愛德華的任何消息，如今卻聽著他承認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就像其他聽著丈夫用單調的聲音背誦冗長枯燥的致命供詞的妻子一樣，安娜的母親也知道她的丈夫是在復述一份背下來的稿子。直到很久以后，她們才得知是酷刑和人格的崩潰，導致了這些全然自我背叛的演出。

愛德華·戈爾德施蒂克相當幸運，他的審判被排在斯大林和順服的捷克總統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7]](#_7_5)過世后的1953年3月，彼時以無期徒刑替代了死刑。

安娜鮮明地記得在父親失蹤一年后，她去利奧波多夫（Leopoldov）堡壘[[8]](#_8_5)探望他的情景。“那是個周日早晨的平靜的小村子，穿著農民服飾的人上教堂；路、水、橋、樹，然后就什么都沒有了，只有黑色的土地和破土而出的堡壘。接著是很厚的墻，在一條黑暗的進入通道的中間某處，盡是粗大的欄桿。在粗大欄桿的一邊，大約一米外，是囚犯；另一邊，是女人和孩子。”

她記得自己努力做出開心的樣子，好讓父親相信一切都好；也記得一舉一動都在時刻盯牢她的警衛的掌控之下，那種感覺有多恐怖。從那時候開始，她說，她就相信一個人的命運并不總是你自己的，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有人有著絕對的力量，光憑個怪念頭，就可以決定你的命運。

這些是影響了安娜少年時期的事件，也是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事件，因為即便沒有直接受到影響的人，也生活在恐怖所釋放出來的黑云籠罩之下。唉，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公審有說服力地教育了人們投降的必要性。

那個可怕的時期產生了幾部回憶錄。其中兩部：海達·科瓦莉（Heda Magolis Kovaly）的《悲星之下》（Under a Cruel Star）和羅斯瑪麗·卡萬（Rosemary Kavan）的《愛與自由》（Love and Freedom），是由被告的妻子寫的。兩本都是關于悲慘事件的出色的書。兩位女性的經歷中最讓人覺得難過的地方之一，是在被烙上叛徒妻子之名后，就被拋進了孤絕之境。很大程度上，捷克社會只想明哲保身。安娜的母親在她父親“坦陳罪行”的第二天就被開除工作，因為，請她當會計的小奶酪廠老板解釋道：“和這樣的人一起工作，對勞工階層而言是難以忍受的。”而當時讀小學的安娜也很自覺地知道，即便她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也沒有機會升入中學。

安娜的父親在牢里待了四年，其中十一個月還是在單獨的牢房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讀或寫。他后來告訴安娜，他保持清醒的方式，就是在腦袋里做數學拼圖。被轉移到與其他囚犯同住的牢房后，他便開始教那些從來沒有上過中學的獄友們繪畫和文學。安娜記得有個年輕人后來還來拜訪她父親，感謝她父親為他提供了一生唯一的一段教育經歷。這些在獄中能夠利用記憶和知識資源的人是幸運的。

愛德華·戈爾德施蒂克還能活著看到“去斯大林化”的開始，也算是幸運的。殘酷的領導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喜歡做出感性的姿態，在一次這樣的姿態中，他于圣誕夜獲釋。安娜清楚記得當他如四年前突然消失那樣毫無預兆地重新出現時，那張毫無血色的臉龐，以及他們全都感受到的幸福。

在所有的事情當中，回避信仰對安娜的雙親最為困難。安娜的父親是猶太教徒，母親是天主教徒，安娜說他們倆都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中長大，但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非常自覺地脫離了原來的宗教。安娜認為，正是這種反作用的力量，引導他們在下一個信仰中投入了對教義系統的所有需求。和許多在那個階段信奉共產主義的人一樣，他們仍然認為在他們身上真實發生的難以形容的苦難只是原初思想的畸變。對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一直要到1968年蘇聯的侵入，才讓他們放棄了理想主義的無望形式，并且從根本上否決了他們的哲學。

不過所有人都曾有過片刻的希望。在1957年獲釋并得到官方平反后，安娜的父親回去教授文學、翻譯德文并且撰寫評論。安娜嫁給了伊日·格魯沙（Jiří Gruša）——后來他成為知名的捷克小說家——并且很快有了一個孩子。

政治前線也起了莫大的變化。共產主義巨石出現要崩裂的征兆，還有不斷高漲的想要把它撬開的大膽企圖——大半來自黨內——在布拉格之春的大爆發中達到頂峰。安娜的父親再度置于事件的中心，因為彼時他是政治回暖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作家聯盟的主席。那是個作家被視為反對黨議員的時代，也就是1968年盧德維克·瓦楚利克（Ludvík Vaculík）[[9]](#_9_5)1968年在國會發表著名演說，以及米蘭·昆德拉等人為這短暫的革命吹響號角的時代。黨內自由派的斯洛伐克（Slovak）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為第一書記。有八個月的時間，街頭可見生機勃勃的活動，并試圖從頂層施行“人性的社會主義”。

安娜的敘述始終冷靜而精準，但在談到那段時期的重要性，以及隨后而來的失敗時，她不時停頓，聲音也小了下去。前后的不同在于之前有“希望的前景”，而之后只有一片黑暗，希望的地平線已消失不見。“就像有個螺絲釘在慢慢擰緊，”她說，“呼吸的空間越來越小。”

讓很多人吃驚的是，蘇聯的坦克幾乎未受抵抗就開進了捷克；另一方面，1956年匈牙利革命遭血腥鎮壓的教訓依然鮮活。為了讓我對這些事件的影響有個概念，安娜告訴我，在那之前，她以為文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在蘇聯入侵后，現實完全超出了想象，以至于有段時間，她根本什么都沒有辦法讀，所有文學的描述和形式似乎都是惱人而虛偽的，在所發生的吞噬一切的黑暗面前微不足道。

1968年后，要當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幾乎已經不可能；在此之后才加入捷克共產黨的人全是出于投機和野心。對安娜這代的大部分人而言，只剩下狂怒或者屈服。處境再度變得危險的安娜的父母，想辦法移民到了英國。至于安娜自己，作為她父母的女兒，作為布拉格之春重要人物的妻子，她在生活中承受著微小、說不出口、啃噬靈魂的迫害。在工作的科技機構里，她遭到同事的聯合抵制，好幾個禮拜不給她任何事情做，于是她遞出辭呈以維護尊嚴。在她后來求職的一個地方，那個主管實在太害怕她的出現，竟然私下請求她趕快離開。而在一家會計事務所，她則被告知如果同意告發同事，就可以得到一份低水平的工作。“從那里走出來時，”她回憶道，“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連狗都不會想要吃她給的面包的人。”

就在那時，安娜開始選擇捷克人所謂的“內部移民”，那是種心理上的脫逃策略，是很多人用來維持理智的方式。她開始在一家服裝店當助理，一待就是十四年的艱苦歲月。當時安娜已經離婚，帶著兩個小孩。她一大早就要出門上班，而且要站一整天，還得做情緒上的調整。“在店里頭，我得檢查自己的用語，”她回憶道，“因為當我試圖變得更好時，人們會對我的用詞做出反應。有時我回到家會寫幾行字，不管寫什么都好，只為了提醒自己我還有這另外一種語言。可是我知道，從那時開始，我就得生活在兩個世界里，而那兩個世界永遠都不會融合。”

這些年來，我問她，比如說，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份出版相關的工作？“剛開始的時候，一度有這樣的機會，”安娜安靜地回答，“路過的話，我就會去看看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但他們都很緊張。我知道他們是怕我開口要工作。總而言之，在街上遇到人，而他們卻都裝作不認識我，這還蠻有趣的。過了一陣子，我便形成了一種應對的原則，就是除非人家先跟我打招呼，否則我絕對不先開口問候別人。但是我真正痛恨的是留在官方體制內，且以此為志業的人發出的抱怨，他們一直在說自己妥協和調整得多么辛苦。我覺得那是他們的選擇，待在體制外還是有可能的。”

在單身十年后，安娜的再婚幾乎是在滑稽的捷克背景下完成的。她會認識她的新丈夫，是因為他是少數幾名膽子夠大的律師之一，敢為她的前夫伊日·格魯沙辯護——彼時他正因自己的著名小說《調查表》（The Questionnaire）被指控為色情小說而下獄。格魯沙在三個月后獲釋，畢竟囚禁一個有名的作家，在西方世界會產生太不好的影響。

安娜的新丈夫也受到持續的騷擾，因為他接的都是異議分子和其他不受歡迎的人的案子，遂成了監獄周末拘留的常客，他們的房子也頻繁遭到警察的搜查。這就是“正常化”階段，也就是壓迫的深淵，處處盡是處決和酷刑的威嚇。

然而，不論她為自己的處境付出了何種代價，安娜都認為比起與制度妥協的絕大部分人，自己在“內部移民”中過得還好得多。“你看，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沒有人強迫我做。如果某件事是出于你自己的決定，就比較好承受。而我始終覺得我們——我指處于社會邊緣的人——是比較自由的。我們不需要參加5月1日的游行，或者打同事的小報告。而且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來行事，那已經是莫大的奢侈。”在那個時期，生死大事被謊言、腐敗和日常公然的傷害等這類較為瑣碎的事情所取代。我試著想象或許她可以習慣那些，可以做出妥協以換得些許的舒適；但是當我想象如果安娜留在體制內則不得不忍受和從事的數以千計微小且毫無價值的行為，便開始明白對她來說，留在體制外的選擇不僅僅是道德上的高尚舉動，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以維持自己身份鮮活。

我在布拉格和她一起度過了一些時間，在安娜了如指掌，并且以一種在這里常見的依戀所愛著的城市中漫步。在這里，人們一待就是一輩子，或者幾個世代。她這邊指給我看一座特別漂亮的庭院，那邊指一個修道院花園。與她更加熟識后，我會想她帶著自己的經歷，還有這些經歷所給予她的真智慧，活得何等優雅。在她身上有種并沒有試圖用任何虛偽和快活的愉悅來掩飾的持久的莊嚴。

我們也聊美國電視，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這邊隨處可見，安娜是忠實觀眾。最近讓她大感驚訝的是一對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私生活的人。“我覺得那樣談論你自己，是種自我疏離。”她靜靜地說，而我也在思考在她所有的苦難中，或者也正是透過這些苦難，自我疏離如何成為她一直所回避的事情。她所有的選擇都出于不要背叛自己；而所獲得的回報就是讓她保有全部的自我，甚至保有她的痛苦。

最后，安娜又生了一個孩子，她現年十歲的女兒；最后，她再度離婚，并且找到了現在住在一起的另一個伴侶。最近這幾年，她做著一份比較符合她的資質的工作，為一家醫院圖書館翻譯英文醫學文章。依照“三代連坐”的處罰原則，安娜的女兒無法上大學，而且一直得等到改變來臨，她作為不受歡迎之人的身份才得到改變。她的父母在二十年后回來，訴說著和這里辛苦非常的日子比起來，他們在布萊頓（Brighton）的舒服生活。我想起了海絲特·白蘭（Hester Prynne）[[10]](#_10_5)，還有她想在命運安排下忍辱負重活下來的渴望；對于許多東歐人來說，他們的國家就像某種命運的安排。

然而，過度的命運安排會生出宿命論，我因而能夠明白對于安娜這種生活環境中有著超乎常人的不幸的人而言，何以在一個新世代的開端，會感覺不到純粹的喜悅。對于無關的外人而言，依照最近的事件來看她的整個故事然后叫道“好耶！快樂的結局！”是很容易，但安娜根本沒有辦法使自己從生活的重擔，或者生活教給她的那種智慧中脫離出來。在這個層次上，在一個大如國家的有機體和一個獨立如人類的個體之間，二者各自的目的有著根本的不協調。當國家需要躍入一個新時代，并且選擇性地忘掉舊時代時，安娜仍必須自己帶著全部過去向未來前進。

安娜現在的伴侶約瑟夫（Joseph）是一本新雜志《中歐》（Central Europe）的編輯，有一晚我還受邀去參加了他們的編輯會議。開會的公寓是租來的，光線昏暗，充滿了豪華的深色家具，受到歲月侵蝕的毯子被丟在桌子和沙發上，還有成堆的書、手稿和紙張。當所有人聚集在那張蓋著毛毯的桌旁時，我竟有種置身荷蘭同業公會，或者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11]](#_11_5)的畫里之感，而不是在一場現代的編輯會議中。男人們全是大塊頭，有一張大臉，留胡子，寬松的襯衫敞著領子，袖管卷起。為了展現他們是20世紀的人，即便像是20世紀前半段，而不是順應紐約的潮流，他們全都像大煙囪似的抽煙，房間迅速充滿朦朧的煙霧，裊裊地漂浮在昏暗的空中。

就某種意義而言，他們一直是秘密團體的一部分，反抗在捷克遠沒有在波蘭廣泛，而且要更危險。《七七憲章》（Charter 77）這份捷克反體制運動的奠基性文件簽名者還不到兩千人，而且許多簽名者都為這一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異議分子活在被告發的恐懼中：幾個在《中歐》工作的人被放逐去做強迫性勞動，像鍋爐工或泥水匠之類的——這是當政者處罰不順從的捷克知識分子所喜歡的方式。但是他們的真實生活圍繞著他們的地下刊物進行，這是1968年后捷克出現的少數幾本刊物之一。這里地下出版物的傳播不如波蘭廣泛，手法也比較不成熟。每一期都用多張復寫紙打字，大約只有一百份，由幾個信任的人親手分發，然后再由他們傳給其他讀者。光是這種耗費心力的制作模式，就已經如石頭裝飾的中世紀盛宴一樣遙遠及不可靠了。

現在他們是公務人員，而且有計算機，對此他們非常引以為榮；但他們也擔心新的東歐問題：資金、買紙、準時發行。

《中歐》的刊名到底蘊含了什么概念和設想？呃，這完全是一個新保守派概念，他們解釋，安娜翻譯。他們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2]](#_12_5)的追隨者，也非常仰慕羅納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他們認為捷克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累積和制造財富的階級。

這些都沒有讓我太驚訝。異議的傾向和新保守派信仰的結合正形成一種東歐特性，跟其他很多東西一樣，全由當地的共產主義所孕育。在反對中央集權意識形態、體制籠罩一切的現實，還有勞工光榮的情感時，思想最先的轉向，就是走向與之對立的另一極，也就是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個人解放和中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優點。而且，這些術語在東歐背景里，都有了不一樣的意義。在一個完全不存在自由市場的地方討論自由市場，與在一個自由市場已經蓬勃發展的國家討論，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在這里，市場的概念代表著對一種極端不平衡的補償。如果東歐人民并不總能看出遵循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的最終影響，我不曉得如何能期待他們看出。當然，我并不想在這個時間點上去向他們說教財富的危險或者富裕的弊病。鑒于我對這些問題的個人看法，這樣做對我來說似乎過于傲慢；而我肯定，他們也會認為那是純粹的裝模作樣。

稍晚的時候，當討論轉到后共產主義的真實情況時，我深感驚訝。我被桌上飛來飛去的激烈觀點，以及其中蘊含的苦澀震驚。哈維爾正領導著一個假的“紅色”政府，有人這么說，而似乎人人都同意。他周圍有幾種令人厭煩的共產黨人，還有那些左傾分子、他的兄弟，他總是最先就想到社會主義的觀點去。事情還沒有真正產生變化，萬事都還有可能回到之前的狀態。“他們”沒有放棄一絲一毫的力量，而且“他們”還在等待“他們”的時機。

這是前途未卜的過渡時期的早期；而我在這樣的看法中感到一種世界觀，至少因為熟悉而帶來了些許舒適感。安娜以她安靜的敏銳提供了另一個解釋。她認為這些看法和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系，它們反映了“我們對于接下來要怎么做的焦慮，如今事情真的可以變好了，我們也得真正負起責任。而我們不想懷抱太大的希望，至少目前還不想”。

后來我讀到一篇約瑟夫的文章，已翻譯成波蘭文，論“歐洲概念”，那當然也把中歐的概念包括在內。約瑟夫屬于在西方幾乎不為人所知的一類人，但在東歐卻經常可以看到，也就是公開的宗教知識分子。那篇文章的大意是歐洲的道德根基要在基督教中找到，而一旦沒了基督教信仰，歐洲則注定要從其高度文明和政治力量上墜落。

米蘭·昆德拉在某個地方曾寫到，現在好的歐洲人，只有中歐人——他們十分痛苦地被從他們自認為合理歸屬的歐洲放逐，而對于他們來說，“歐洲”因此依然是一個意義深遠而未受污染的理想。可是現在我在約瑟夫的文章中既難過又有點驚訝地發現的是，即使是歐洲的理想，也屬于相當遙遠的過去。歐洲只能被孤絕地書寫，既與當代歐洲的現實隔絕，甚至也與歐洲關于其自身的話語隔絕。我問他，在他的框架內，對于現在住在西歐的大批穆斯林要如何處理，他們也該被包含在“歐洲”這個概念里嗎？即便不是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徒，但他們仍然是歐洲人嗎？他說他沒有想過這個；不過，這也不是會自然發生在他身上的問題。觀點畢竟來自經驗，而過去幾十年，關于民族和宗教多元化，不論是現實還是觀念，在東歐都受到了嚴厲的壓制。

這對于曾經在語言和國別上都是名副其實的大雜燴的這部分歐洲而言，實在是莫大的諷刺。但是關于原中歐曾經的多元文化的記憶，在過去幾十年的捷克已經被有效地抹掉。或許值得注意的是，我唯一一次聽到的中歐，來自這個觀念所謂的官方代表。弗拉迪米爾·熱萊茲尼（Vladimír Železný）本身就是這個觀念的一個體現：四十出頭的他有著輪廓分明、知性十足的五官，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天體物理學的教育背景。他是公民論壇的新聞發言人，也是最近創立的“卡夫卡社團”（Kafka Society）的負責人，并有計劃要建立中歐文化博物館。

他的“中歐”觀念與兩次大戰間此地迸發的強烈的創造性有關。在世紀交替時，那緊湊、斑斕的中歐地圖上產生了一段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文化繁榮。一種揮之不去的、燦爛的現代主義可以說就是從這個區域產生的，不只卡夫卡，還有弗洛伊德、馬勒（Gustav Mahler）[[13]](#_13_5)、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弗朗茨·韋爾弗（Franz Viktor Werfel）[[14]](#_14_5)和馬克斯·勃羅德（Max Brod）[[15]](#_15_5)，都來自布拉格周邊。熱萊茲尼認為他們感知的復雜性來自“文化三角”，即住在捷克境內的捷克人、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致命張力”。我想象，在賦予古老中歐其特殊活力的這幾個做了數世紀鄰居的群體之間，必定有一些差異和相似、相近和相異的交互作用。

但是在戰后，同一個地區經歷了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化，即大規模和文化單一的現代化。熱萊茲尼認為社會同質化是不健康的，也是無趣的，而猶太人和德國人從捷克的消失，為極權主義鋪了路。但是新的現代性有系統地摧毀了早先現代主義的記憶。歷史書上不再提及中歐，熱萊茲尼說，直到現在，這個主題才首度在課本上出現，標題為：《你課本上所刪除的》。

文化的中歐能否如熱萊茲尼所希望的那樣有機復活，我深感懷疑。背景——富麗堂皇的背景——依然還在，而太多其他的東西已經不見了。但是我看得出來何以卡夫卡一度不被承認的預言式存在可用于解釋剛剛過去的事[[16]](#_16_5)——也就是他的未來，以及重新恢復中歐記憶的痕跡何以能夠反擊過去幾十年完全統一的圖像。

同時，約瑟夫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和異質化的當代版本正面相逢：面臨著滋生了極端的西方相對主義的那種文化的滲透，并要與之共存，這種相對主義不僅質疑一種反對的信念系統，甚至還懷疑自身。當今東歐人習慣于以懷疑的態度來面對“他們”；但還不適應更激進的懷疑主義，即對于那個“我”的懷疑。他們尚未開始自我解構。其中無疑蘊含著一種力量——他們迫切需要的自我的完整與誠實。不過，隨著從孤立的境地走出，他們再次開始航行在更為開闊卻更少標示的水面上。

我在溫迪（Wendy）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優秀、可親的翻譯員，她以方便西方人的方式稱呼自己，并且邀我來一趟鄉村之旅，那是她許多同胞每個周末的例行活動。在一個美麗的周日早上，我在城堡區等她和她的丈夫奧塔。有那么一陣子，周圍有一種周日的寧靜和清新，好像那一周的浮渣全部被一掃而空了一樣。那鵝卵石路上游人如織，大部分是德國觀光客，有些人身穿阿爾卑斯山地農家少女裝和男孩的皮短褲，好像要回到一個時間還停留在戰前的地方，回到奧匈帝國的一個別致的前哨站。整點時，教堂鐘聲優美地響起。

溫迪和奧塔開著他們的拉達（Lada）[[17]](#_17_5)車來了，然后我們出發，進入舒緩起伏的波希米亞鄉間。繼波蘭之后，這里看起來也像是西方：路面都鋪著柏油，鄉下房子大部分都是石頭和磚造的，農場十分干凈整齊。

我們的第一站是個鄉間宅邸的小村落，溫迪和奧塔想拜訪幾個朋友。這是一個小聚落，規模大小可見：幾排幾乎一模一樣的小木屋樣的房子，間隔以蔓生著野花的泥土小徑。他們的朋友是對漂亮的年輕人，對于自己的小房子和庭院顯然很滿意，一陣忙碌迎接我們的到來。他們的兒子在一棵樹前撒尿，隔壁鄰居帶來一大籃漂亮的酸梅，整個場景就像捷克電影中的畫面似的，只是少了銅管樂隊或者室內樂隊。

主人向我講述了搭建這個小房子有多么困難，材料非常難找，但是他們盡量節約、精打細算，一切都自己動手。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這種鄉下房子是一種捷克式的迷戀，是想要為苦澀的萬事增添一絲甜意的熱望。實際上人人皆有一棟房子，包括工人，他們的收入通常比老師、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員還高。對許多人而言，這些小小的休息所是日常政治污穢的解毒劑，是一個人可以躲進“內部移民”和個人真正生活的恩典的引退。

我們這個小村莊的社交生活中心當然是當地的小酒館。吃完酸梅后，我們便沿著灑滿陽光的、未鋪石子的小巷向河邊漫步。還不到中午，可是酒吧外的野餐桌上早已經擠滿了人，而且那些人顯然已經喝了好一會兒的啤酒了。往下看河岸那邊，有幾個男孩在釣魚。

小酒館內部的柜臺上有一排非常粗糙的老式招貼海報。在東歐的旅程中，我已經習慣了這些，但我還是被接下來見到的裝飾震驚了：幾件掛在洗衣繩上的很丑的胸罩。顯然，這是某種玩笑。

晚些時候，當我們喝完啤酒，跟大伙兒說了再見以后，我問溫迪這種展示會不會讓她覺得不快，她卻好像反而對我這個問題感到不快。這是一種特定的幽默，她相當粗暴地告訴我，沒打算要冒犯任何人，我應該理解。好吧，我確實明白這本意是某種玩笑，可是在我看來，一排泛黃的胸罩實在是粗俗到不好笑。溫迪是個自由記者，在許多方面和我都算是志同道合之人，可是在這里，文化鴻溝就產生了。這一定是我在布拉格相互磨蹭鼻子——這也出現在許多捷克文學中——的情侶身上所看到的性感的另一個無法理解的層面。當展現在約瑟夫·什克沃雷茨基（Josef Škvorecký）[[18]](#_18_5)的小說精心設計的幽默中，或者處于米洛斯·福爾曼（Miloš Forman）[[19]](#_19_5)的電影才華的支配下時，這種色情可以令人驚嘆地狡黠、粗野、幽默；但沒了精湛技藝的把控，它也可以公然墮落為酒吧的玩笑。對我來說——這是我感官的極限！——這毫無疑問是令人作嘔的粗俗。

我們很快就放下了這個小誤會。下午3點多鐘，我們到了溫迪和奧塔與溫迪父母同住的鄉村小屋。這是個比較古老和繁華的小區，有寬敞的院子，四周環繞著附近森林的高大松樹，不過室內依然沒有水管線。溫迪的父母身材粗壯，看上去很舒服，他們一整個下午都在花園里閑逛。溫迪很快就端出了我在捷克吃到的最可口的料理，有蔬菜湯、沙拉和棒極了的多汁李子蛋糕。她似乎不解我對盤中有蔬菜為何會感恩到那種程度。之前我已經開始懷疑這里是否真的有蔬菜，結果確實有，只不過顯然是人們飲食中較不受重視之物——或許適合私自食用，但在餐廳幾乎一致被認為不夠格上桌。

溫迪九歲的女兒帶我參觀整個院子，帶我看她偏愛的地點和躲藏之處，而且全程跟我說捷克語，對我聽得懂她有十足的信心。或許是因為她孩子氣的詞匯和語調，我也真能聽懂。她是個認真的小人兒，有著可愛的笑容，一笑起來有兩個酒窩。溫迪對待她，和此地父母的習慣做法一樣，把她當成大人。被這樣對待長大的孩子好像比較快樂，帶著比較不害羞的“稚氣”，對于成人世界也比較友善。后來溫迪的兒子也來了，和幾個高中朋友一起，他們試著用英語跟我溝通，只是不太成功。和所有同齡人一樣，他們想要迅速學會英語，視其為進入現代世界的敲門磚。然后他們就進到森林里去了，展開一次捷克人熱愛的兩天長距離徒步。捷克人是厲害的露營和釣魚好手，并且是自己國家鄉村生活的狂熱愛好者。手提音響的聲音伴隨著他們離去，看得溫迪一臉不以為然。“看到沒？”她說，“很快的，他們就會忘記怎么聊天。”

到了離開的時刻了，我們坐上拉達開進粉紅色的夕陽里。鄉村一日游，捷克風格。在這日常的小快樂中，有種法國文化的小樂趣，盡管和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20]](#_20_5)筆下的并不完全相同。酒吧、鄉村小屋，它們是體系的解毒劑，我也可以看到它們合理的吸引力。相較于街壘路障，它們也許代表了一個沒那么英勇的模式；但歸根到底，所有革命或社會改革的目標都是——或者說都應該是——允許人們享受這樣的滿足，實現某種事物的秩序，讓生活的小樂趣可以有個正常的立足之地。

回到布拉格，我和馬丁及他的朋友伊日（Jiří）見面，共乘出租車沿著布拉格青翠的山丘一路向上，來到萊特納公園（Letenske Gardens）頂上的餐廳。我們坐在一個露天座位上，那是通過伊日和餐廳頭號潑辣女的“關系”才贏得的座位。吃著一貫的發胖食物，俯瞰布拉格的紅屋頂和金色的塔尖，壯觀地一直延伸至河邊，還要再越到河對面。這種壯觀的美景和歷史感，世上少有地方可以與之匹敵。

伊日是個英俊的金發男人。他是個畫家，也是簡樸的哲學家。在他身上，捷克人個性中的溫和已經被打磨成正面的美德。馬丁和他緬懷起他們共同接受的共產主義養育，就像是放棄信仰的天主教徒緬懷他們通過修女接受的學校教育一樣，帶著濃郁的諷刺和傷感。現在這些全部結束了。他們嘲笑記憶中的人民奧林匹克運動會，成千上萬的人從全國各地匯集到布拉格來，展現集體的體能優勢。大隊的同志穿上白色運動服，在巨大的運動館內游行和完成訓練來榮耀民眾。但是伊日記得他的兄弟一直磕磕絆絆，跟不上拍子；而馬丁想起一次下雨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白色制服在泥地上做完一輪俯臥撐后，便濺上了一身的污泥。人民嘲笑“人民”。在這些官方情景之后，馬丁和伊日深情地回想起布拉格的公園成了交際廣場，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精力充沛地相互靠在彼此的身上，而警察也因為意識到這是一場阻擋不了的狂歡而放松了警戒。

但是在談到他目前的處境時，伊日馬上變得悲傷起來。就某一方面來說，他很害怕對西方的開放，害怕新開放的世界。次要的藝術，也就是比較不具政治威脅性的，像是插畫、海報和印刷品，在捷克蓬勃發展，因為它們幾乎被允許自由發揮。但伊日還是懷抱成為畫家的野心，而繪畫就像所有推動視覺和實驗極限的藝術一樣，在東歐深受強加的限制之苦。伊日有個漂亮的工作室，幾乎不用付租金，是從前政府所提供的那種資源；但是同一政權也堅決主張嚴格的隔離。而現在，盡管有著好奇和熱望，伊日還是不太情愿從他的美學洞穴中出來，看看在這一大段的時間中，更廣闊的世界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就像一直絕食的人不能一開始就吃得太快一樣，他對突然的超載保持警覺。“我們必須慢慢來，”他說，“不能一下子全接受，我一次能夠真正了解的東西就那么多。我得有時間思考，消化。”

這不是普羅米修斯式[[21]](#_21_5)藝術家的英雄姿態，可是我在他的謙遜和自覺當中發現了一些很迷人的東西。他明白吸收知識真正的意義，也知道那需要慢慢來。

伊日靜靜地生活在布拉格，過著一種幾乎讓人想起戰前世界的生活。他畫畫、教書、去巴洛克教堂聽演奏會、在合唱團中唱歌。他個性中的溫和與禮貌，毫無疑問是與這種生活相一致的，也是這種生活所創造的。我也明白，為什么他可能不想被過去幾十年藝術令人震驚的失序突然震出他邊界清晰的框架。

用完晚餐，我們一邊喝著貝赫洛夫卡這種苦酒，一邊看著布拉格柔和的燈光。伊日用一種帶著嫉妒的口吻聊起一位在美國成功的藝術家同儕：“只是因為他叔叔認識的某個人認識某個人。”然后他又說：“呃，但相反的，我要待在這里。我沒有錯過布拉格。或許，從各方面說來，這才是我所偏愛的。”

“我們是小資產階級之國，”捷克人經常這樣自稱，“我們有中產階級的熱望。”這種坦承一半是自滿，一半是自貶。小資產階級意味著實際、具體和明智，但同時也行事謹慎、胸無大志。捷克是個平民之國——標準解釋是這樣的——因為已經好幾個世紀沒有貴族了。捷克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是1618年，在白山之戰（Bílé Hoře）[[22]](#_22_5)中，彼時捷克的貴族遭到哈布斯堡軍隊的大規模屠殺而就此消失。這一事件開啟了三個世紀之久的哈布斯堡統治與文化德國化，捷克的語言和身份幾乎自此消除。在那期間，捷克人被貶為商人、農民和公務員的次要角色，特別是公務員。在整個哈布斯堡王朝期間，成為職員或者官僚就已經到了捷克人所能到達的頂點。

“我們不是帥克（Švejk）之國”，是捷克人說的另一件事。或者，更少見的是說：“我們就是帥克之國。”

《好兵帥克》（The Good Soldier Švejka）——雅洛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的原創——是庶民感的完美呈現：精明、自我保護、狡詐和世俗。小說描寫了同名英雄的多次冒險，排除萬難只為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奧匈帝國軍隊。我承認，即便知道這是部偉大的作品，但事實上我并不喜歡它。主角小氣的冷嘲熱諷對我完全沒有吸引力，他愿意徹底地賣傻并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羞辱來保全他的皮膚。當然，我知道在賣傻之時，他是在揭露戰爭的愚蠢并襯托出一種荒謬的官僚政治——但我寧可他用更高尚（無疑會適得其反）的方式來與這些邪惡抗爭。這是波蘭的偏見，毫無疑問，一定是。

哈謝克和卡夫卡：兩者都屬于捷克文學奠基的一代，好像在安靜了幾個世紀后，突然不曉得從哪里冒出來，這個群體也包含了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他是虛構機器人和預言極權幻想的創作者。哈謝克和卡夫卡的人生幾乎完全重合在一起（他們都生于1883年；哈謝克在1923年過世，卡夫卡逝于1924年），而且他們是捷克人最常引用（至少在跟外國人聊起時如此）的文學參照點，用來解釋他們的國家，或者他們的處境，或者他們自己。

哈謝克出身平民，以捷克文書寫，過著一種冒險漂泊的生活，曾離開奧地利軍隊，改投捷克軍團，后來又離開捷克軍團改投紅軍，犯下重婚罪，并成為附近酒吧醉酒的常客。當然，卡夫卡是個猶太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以德文書寫。他們的性情真是相反到極點，但是可以說在不同的脈絡里，他們還是寫了同樣的主題：官僚變得狂暴，官僚機構成了陰暗荒謬——或僅僅是愚蠢荒謬地——進行威脅恐嚇的龐然大物。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兩位都生活在某個官僚系統和無理性最緊密結合的飽受壓抑的時間點上，我不曉得這會不會太富于想象力了。他們風格形成的年代正是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f）[[23]](#_23_5)帝國的巔峰與衰敗時期，當時捷克是卡卡尼亞（Kakania）[[24]](#_24_5)的鄰近省份，也就是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25]](#_25_5)重新將其命名為奧匈帝國之地，是個被一群職員、一群熱愛階級制度和崇拜形式主義的人統治的可怕停滯王國。與此同時，捷克又是個主權國家，從來沒有完全失去它的渺小感，或至少是消極抵抗的直覺，一種對壓迫狀況的頑強反對。這個節點一定加深了平常小人物和哈布斯堡王朝系統內志得意滿階層間的不平衡，或者，換個方式說，布拉格必定是個觀察官僚人格神經官能癥的有利地點。

有位捷克朋友聊起捷克歷史的韻律，一種近乎屈從與高度道德性應對的交替。后者體現在揚·胡斯身上，先是試圖改革，逐漸發展為對一個本質上是外國的教會統治集團暴行的回應；體現在19世紀末期的文獻學者和哲學家身上，他們想要通過翻譯莎士比亞和其他古典作品，以及通過對國家權利充滿理性的論辯來恢復捷克的身份；也體現在托馬斯·馬薩里克身上，他顯然是所有總統中最仁慈、所受教育也最全面的政客之一。這里有布拉格之春和《七七憲章》，當然還有瓦茨拉夫·哈維爾，即便在執掌權力大位期間，都還有著罕見的勇氣，用一種安靜、文明的聲音，繼續書寫他自己內在的歷史和國家新的道德困境。

對于壓制式統治的其他反應，是共產主義階段調適和撤離特點的混合：以帥克式的回應面對卡夫卡式的情境。哈維爾曾在某處寫到，“正常化”期間的麻煩，就是帥克們的接手。他們是那些會把自己的道德調調、他們散發的犬儒主義強加于整個社會的人。

我必須承認，在我每天與服務生、旅行社和郵局的接觸中，在和那些表情始終如捷克人所稱“馬蹄口”般陰郁的職員的接觸里，確實感覺到了帥克之類的存在。比如某天早上，我走進一家店問店員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牛皮紙箱，我想用來寄東西。她擺出驕傲的冷漠表情聳了聳肩。這不關我的事，她的動作在說：我連抬根手指頭都不愿意。看到附近有一堆盒子，我就指指它們，問是否可以買一個，結果她只是加深了嫌惡的表情，轉身離開。

不過帥克的個性也有可愛的一面。我隨處感受到的小小的愉悅享受，在伊日和馬丁的交談中聽到的成熟諷刺，持續不斷的笑話和扎孔先生幽默的眼神，每樣都像是在說：“沒關系，最終我多少還是可以愚弄一下這個世界，并且從中得到些樂趣。”荒謬感繼續存在，或許正是這個時代的可取之處，一如其他各時代都有其可取之處。

扎孔先生在安靜的早晨敲響我的門，召喚我到客廳去和他的家人一起通過一臺大大的彩色電視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哈維爾當上總統的就職演說。胖胖的扎孔太太，還有他們那特地為這場合而來的兒子，以及他的女友都在。哈維爾喜氣洋洋地走在通道上，努力壓抑快要壓抑不住的笑容，一旦迸發則可能有損這個時刻所需的莊嚴氣氛。扎孔先生指著各個國會議員，說誰跟誰不和，斯洛伐克代表單獨站在一堆。可以清楚地看出麻煩即將開始。但是哈維爾不由自主的笑容在他用典禮專用長筆進行就任簽署時不斷褪去。他看起來好像不只是開心，而是被他所參與的事給逗樂了：或許是因為棒透了的美夢成真太不可思議，也或者是其戲劇性吧。劇作家在現實劇場中變成了主角和制片。

典禮結束了，年長的扎孔先生從沙發上跳起來，跟每個人握手。“恭喜！”他大叫，“我們有總統了！”至少在這一刻，是“我們”。

一年之后，當我輕松地漫步布拉格，更近距離地觀察各個細節時，我有了重新發現的喜悅——那是首度前來此地，面對鋪天蓋地的全面沖擊時所未曾察覺的。幸好，布拉格的石磚和歷史并沒有改變，金色的光澤依然光彩奪目。眺望舊城廣場的遠景仍令我屏息，仰視鎮守橋梁入口處的兩座纖長的方尖碑也還是讓人震撼，上端兩個美麗的天使仿佛即將從水面和石碑上方振翅而飛，直入云霄。

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布拉格在商業方面似乎也沒有太大改變。相較于華沙的豐田沙龍和計算機精品店，此處街面的櫥窗里依舊展示著國產時尚產品和波希米亞水晶制品。就連其他東歐國家首都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書報攤，這里也依然未見蹤影。

某個下午，我走進市中心一間標榜專售翻譯作品的“國際”書店。我手邊已經沒有可供閱讀的刊物了，對書籍的渴求已經有如對飲食和睡眠般那樣急切。旅行顯然足以讓人重新領悟文學的意涵，而如果我曾經質疑過書本的功能，現在實在深感懊悔，也開始理解旅行作家為何總會將所見所聞聯系到他們所閱讀過的東西，即使在攀登冰川，或躍入致命的沼澤時亦如此。面對無法捉摸的世界，以及不計其數的地方、人物和偶發事件，我更加渴望書中世界的確實形貌以及既定規則。

因此，我帶著高度期盼踏入“國際”書店，但期望很快便落空了。英語區展售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和《小婦人》（Little Women），都是大號字體的兒童精裝版，外加三本中國針灸的書。在饑渴狀態下，我買了在東歐童年時期所未曾讀過的《小婦人》，還買了那時已經看過的《魯賓遜漂流記》。隔壁的柜臺有個中年美國游客正在購買《魯賓遜漂流記》和《金銀島》，顯然和我一樣已經饑不擇食。

我還拜訪了伊萬·加巴爾（Iván Gabal），身為總統民意調查辦公室負責人的他證實了我對捷克經濟早期進展的粗略印象。我以前便見過加巴爾，不過他后來轉換工作，現在占了布拉格城堡的第三個院落，這一定是世界最好的辦公室之一。我在樓下寬敞的等待區等他，置身各色人等中。有頂著一頭蓬亂長發的男子，顯然以嬉皮自詡；有年長的紳士，正從一只優雅的銀盒中取出一支香煙；接待員身穿一件設計精美的意大利毛衣，完美無缺，卻有過度打扮之嫌；足踏塑料長靴、戴著頭巾的女子，從紙袋中取出兒童鞋和蘋果，拿給旁邊的一名男子看。古老中歐的友善氛圍，產生于斯拉夫人、奧地利人、猶太人、藝術家、農民和科學家齊聚一堂，不分彼此的生動交流；新興東歐的友善氛圍則源自不同時代的元素輕易地便在同一個房間共存。

一個啃著蘋果的年輕女子懶洋洋地帶領我上樓到加巴爾的辦公室。加巴爾是個面容愉悅的黑發男子，喜歡穿襯衫打領帶和質量好的斜紋軟呢西裝。他態度和藹，展現出一種見過世面，也知道自己的價值的充分自信與廣博見聞。他是新的技術管理核心成員之一，儀表舉止有國際作風，其專業技能也在東歐的重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每一個年齡都會孕育出自己的主導特質，而他這種年輕人目前在東歐處處可見：頭發修飾齊整，洋溢著理性色彩，說話語氣帶有保守、克制的客觀性。我認得出這種人，因為他們非常美國化，似乎在接受了美國的專業知識之余，也吸取了相應的格調和作風。

加巴爾表示他對政治共識的迅速瓦解感到很失望。原本堅守后共產主義政治邏輯的公民論壇已經分化為三個相當敵對的派別。到目前為止，哈維爾還試圖維持中立立場，不過眾所周知他傾向于“保守”的一派。這里所使用的“保守”，實際相當于西方所說的“進步”，希望能盡快轉型為自由市場經濟。

這里所采取的官方經濟改革計劃雖然進展緩慢，但在某些部分比波蘭影響更深遠。不過加巴爾說，捷克人民對于私有制度的消極態度讓政府深感挫敗。雖然改革計劃已經啟動，可是申請經營新公司，以及對舊有工廠進行改革的計劃卻很少，改變農業集體化進程也受到農民的抵制，他們大部分人似乎已經沒有意愿重新回到私有化。“人們比我們想象中還要謹慎。”加巴爾說。

其實捷克人過于謹慎的態度，捷克人自己很早就注意到了。托馬斯·馬薩里克在自傳中即指責自己國人本性過于保守的傾向，那是一份帶有罕見的、節制的深情的文本（由馬薩里克口述，卡雷爾·恰佩克整理完成）。“只想追求物質的穩定，寧愿謀取公職，以確保享有退休金，”他寫道，“在所有這些現象當中，我看到的是恐懼：恐懼企業生活，恐懼責任，恐懼自我掌控。不錯，我們是缺乏海岸線，我們也不知道對岸還有另一個世界。我們就像池塘里的青蛙，只會互相呱呱叫囂。”

在和本地民眾的對話中，我也感受到若干這種怯于嘗試的心態，不愿踏出自我設限的框架。“對我來講已經太晚了。”人們經常會這么說。或者說：“還不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開始。”

我跟一個年輕人雅恩（Jan）談過，他是個工程師，擔心一旦經濟改革啟動、他的工廠私有化之后，自己就會失業。他的夢想是開一家從奧地利進口機具的公司。問題是，他解釋說，開設公司的相關法規還沒有制定，而且沒有人有錢，所以即使他開得成公司，又有誰會跟他買東西？再者，共產黨人仍潛伏在四周，誰知道他們想干什么？他可不想投資一家公司，然后被沒收。不，他的朋友們也都在等，等情勢進一步明朗化。

一個住在本地的美國記者給我講了一個關于找人清洗公寓窗戶的值得玩味的小故事。她打電話問一個朋友該怎么做。“不可能的。”她的朋友疲憊地回答。“這是什么意思？”她抗議。“他們只接商辦大樓的單子，沒有人會來私人公寓。”“怎么可能沒有辦法請人洗窗戶？一定有辦法的。”她堅稱。她朋友的態度很消極。有趣的是，她這個朋友在從事反抗活動期間，經常清洗窗戶，那是他所受到的懲罰。最后那個記者被逼得終于直接打電話給她朋友待過的公司，經過冗長的談判，總算說服他們派人來清洗窗戶。她說，盡管能夠理解個中緣由，但這種“不可能的事”到現在仍然非常普遍。

不過，捷克人在過去四十年中變得謹慎，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這么長的時間內，即使就東歐的標準而言，捷克所受的打壓也過于沉痛了。這期間，捷克經歷了斯大林時期的苛政，經歷了東歐最嚴酷的系列公審，經歷了布拉格之春的無情鎮壓。雖然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波蘭和匈牙利獲得自由，但捷克在最近二十年依然承受著嚴苛的高壓統治。他們沒有私人活動的余裕，在整個系統的籠罩下，幾乎毫無回轉的空間。黑市、第二經濟，這些在捷克都是不存在的。在波蘭幾乎全面保留為私有的農業，在這里則幾乎完全是集體化的。

波蘭人在從事非法活動的那些年間，變得非常習慣于扭曲規則，或在規則外行事，或根本無視于規則的存在，或理所當然地，故意違反規則。但對捷克人來說，在官僚體制之外從事冒險，發起行動或集會結社，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雖然如今體制的突變已然超越任何人最大膽的預期，但是心懷希望是無法在一夜間便養成的習慣，行事謹慎的習性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改變的。

然而像加巴爾這樣的人當然也是有的。對他們而言，改變之風有如旋風，令人目眩神馳。我上次見到他時，他正發起一個獨立的社會學研究所，有別于古老的官方組織，他們以經驗主義方式收集數據——這在捷克算是創舉，因為這個國家的所有數據都明目張膽地為意識形態所扭曲。加巴爾的事業很快便大獲成功，因此獲得哈維爾的賞識，擔任目前的公職，探測民意取向。他表示這項工作很繁重，而且不像他自己研究所的工作那么有趣，那才是“我的摯愛，我的一切”。不過，他發現新工作對他還是有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的妻子是博物館館長，目前在美國工作，這使得他們成為最時髦的先驅者，亦即新出現的東西方通勤的夫妻。但加巴爾發現這種外表光鮮的生活套裝其實有其毫不炫麗的一面。“我從早工作到晚，從星期一工作到星期六，”他神情有點困惑地說，對這么自律的人而言，甚至有點飽受折磨之感，“然后回到公寓，倒頭睡覺。沒有家庭背景，實在很糟。”

歡迎加入西方生活方式，我暗自評論。在雀躍擁有新國際地位之際，加巴爾這樣的人也同時被卷入一系列他的西方對手早已知之甚詳的新問題。他們必須權衡在贏取光輝和聲望的同時，要付出多少緊張、壓力和始終如一的匆忙；當面臨多元選擇，而只能憑借自己的好惡取舍時，他們必須考慮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哪種工作會爬到職業的哪一階層；在一個工作逐漸為野心所驅使，也更價值中立的世界里，有價值有意義的職業生涯首先意味著什么。

再次拜訪安娜時，我發現她的心態也已經改變了。一年后，她容許自己對未來抱持適度的樂觀，仿佛幾經思量，終于體會到自己生命的境況果真改變了。又或許——像其他很多人一樣——幾經思量，終于克服了對改變的惶恐：該如何適應新的可能性的那種惶恐。她并不打算此生做何戲劇性的轉變。她想一直做原來的工作，直到可以領取養老金。不過后來她考慮也許她終于可以做點從高中開始便想做的文學翻譯工作，在正常的情況下，那根本不該是件困難的事。“幸虧我還能做，”她說，“但想象一下歌唱家喪失了最好的歲月，或戲劇導演在想象力最旺盛的時候卻不能工作有多慘。有些人真的就這樣喪失了人生的精華，就這樣被活生生地剝奪掉了。”

同時，她的情況已經改變了。她的老板原本一直篤定，除了自己，幾乎沒有人會雇用安娜，不過現在他知道安娜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對他充滿虧欠感了。讓安娜慶幸的還有，若是見到面貌兇惡的人出現在她的街道，無須再擔心那些人是秘密警察，也不必懷疑自己的電話遭到竊聽了，雖然她早已習慣了這種擔心。

安娜的大女兒在幾經刁難后，終于獲準進入大學。接到消息時，我正好和她在一起。她非常高興：她女兒還年輕，可以重新開始，彌補失去的歲月。

安娜重申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過去，那是她自己選擇的生命。這種確證我在其他人那里也聽過。我曾經跟一位哲學家聊過，他比別人經歷過更多磨難，而他的回答強調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還引用一位拉比[[26]](#_26_3)的話：如果我們有機會選擇再活一次，通常都會選擇和前世同樣的生命。

我說我并不太相信這個說法。不過……一個人不能不選擇自己的生命，一個人無法拒絕生命。現在我可以領會無論是對哲學家，或是對安娜而言，重新掌握自己生命的意義是多么重要。否則又該如何接納自己這條成為明顯的不公正、赤裸裸的謊言以及黑暗荒謬鬧劇所戲弄的對象——也就是受害者——的生命？你僅有的選擇不是消沉悲觀的苦澀一生，就是擺出接納的姿態，相當于選擇了你所遭遇的每件事，甚至別人對你的所作所為。

在此同時，還有日常生活可以倚仗，一種只屬于自己、不會被盜取的個人生命。我在安娜家逗留了一陣。她為我做了一道極費工夫、飽含膽固醇的古老雞肉料理，需要好幾道醬汁、牛油和牛奶，可惜我遲鈍的味覺實在無法體會其中的微妙差異。她責備約瑟夫不分擔家務，怨嘆女人的際遇，但她表示自己并非女權主義者，相信女人自有不同的天命，因為女人可以生養孩子。她還為了一點小事責罵自己那有著酒窩、在我眼里簡直已是循規蹈矩典范的十歲小女兒。

安娜擔心她女兒這樣的孩子會變得過于自我和孤立，矛盾的是，原因竟是那些孩子被灌輸了太多集體主義思想，而且在兒童看護中心待太久了。她也擔心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缺乏任何民主經驗和實際記憶，只被灌輸了一套其自身歷史的虛假版本。

但是以她自己的家庭而言，各代間的聯系是牢固的。她告訴我，她和自己父母間的關系一直十分緊密。在最困頓的那段歲月，她是母親的知己。現在，她沉思著說，自己雖然已經五十歲了，但是當拜訪父母時，仍然會變回女兒的角色。相對地，她自己的大女兒，在她最需要的時候，也成了她精神上和事實上的幫手。不過安娜說，現在她去看女兒時，發現女兒反而變得令人喜歡地不是那么負責任了。像安娜這種際遇比較極端的家庭，代溝問題不像在一般比較平和或舒適的環境下那么明顯。不管他們為被抑制的青春期反叛或過早的成熟付出了什么代價，安娜和她的父母與孩子所收獲的獎勵是彼此共同的人性意識，那是一種經由時間孕育出的上下一體的團結意識。

另一個周末，另一場會議。在轉變之際，東歐似乎正耽溺于各種關于轉變議題的會議，仿佛不即刻進行自我分析，當今的歷史改變就無法發生。這種種會議有的探討民主的轉型，以及自由、正義、資本主義的轉型；有的探討民主的美德、民主的代價與民主的陷阱；有的探討通往歐洲之大道，擺脫過往體制之路徑；有的探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沙文主義、民族認同與帝國主義；當然，也有理想的會議主題探討文學現狀。一連串的信件、傳真、邀請函和書面建議，全都以最新的區域性世界語言英文撰寫，不斷穿梭于巴爾干半島和黑海之間，盡管多半都寄往同樣的地址。而一群經常搭機奔波于各項會議的人士，也絡繹不絕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27]](#_27_3)和維爾諾（Vilno）[[28]](#_28_3)，以及索非亞（Sofia）和馬德里（Madrid）之間，成為最新的一個階級。

這個星期聚會的主題，據我推敲，是捷克在共產主義后的文學情況，只是從令人費解的名稱“政治和文學的離異：籌備一個國家的婚禮”開始，整個會議便有點莫名其妙。會議主持人來自一個逐漸壯大的西方群體，他們目前熱衷東歐議題，視其為職業上值得開發的有趣機會。會議頒發了一個翻譯的獎項。講臺上坐滿不計其數的作家，其中有幾位還是頗為知名的外國訪客，紛紛就所討論的莫名其妙的主題發表了完全不相干的評論。一位上了年紀卻仍毫無顧忌的捷克人就共產主義或反共產主義——我也不確定是哪一個——發表了一篇令人激動的、煽動性的演講，透過耳機里不帶感情的實時翻譯，令觀眾猛翻白眼。一位愛爾蘭的詩人更了不起，就在講臺上麥克風前醉醺醺地睡著了。一個幽默的英國人先是條理分明地講了幾分鐘，隨后的論述則令每個人都難以信服。還有名年輕的法國哲學家比其他任何人講得都更不知所云。

不過，我們所置身的場所倒是值回票價。會議在目前的教育部所在地華倫斯坦宮（Waldstein Palace）舉行，這是布拉格的第一批巴洛克式住宅（始建于1624年），至今也被認為是最莊嚴豪華的地方。這場胡謅瞎扯會議所使用的房間可謂極盡奢華，置身其中，要花上好一陣子時間，才能在視覺上開始接受其細節。只見奢靡的繪畫遍布墻壁和天花板的每一角落，那豐盈的紅潤色澤加上金質鏡框和水晶吊燈，絢麗閃耀地反射光華，與色彩暈染的騰騰熱氣，成功構筑了一種近乎狂歡的富饒效果。通往內部的房門大約有十尺高，門把的位置非常高，聽說是因為這個宮殿最早的主人喜歡騎馬進入這間大廳，從馬鞍上開啟房門。巴洛克極盡浮夸的概念在此可謂登峰造極，這個房間的內部真是讓我深深體會到了這一點。

我的視線徜徉在這片奢華中，直到會議宣布餐會開始。“我們是為了啤酒才來這里的。”那位英國人不斷愉快地說。我和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29]](#_29_3)聊了一下，雖然他在捷克國內完全是通過秘密出版物而廣為人知的，但仍是捷克國內外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臉孔兼具了稚氣和老成的氣質，態度溫文爾雅，似乎從來不知道，也沒有見識過人類的卑賤和殘忍，沒有目睹過層出不窮的暴虐。克里瑪受夠了文學對政治具有天賦義務的說法，或東歐文學因為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創作，所以就特別有意義的論點，那可能是出于西方知識分子最后的情意吧，急于在他們受難的同道間尋求一種特殊的英雄主義。“問一個作家對政治有什么看法，就像問一個木匠對政治有什么看法一樣。”克里瑪以絕妙的見解評論道。或許也帶有一個作家的反省，拒絕被束縛在簡單的框架中。

我發現社會主義時期的捷克文學，似乎不像波蘭文學那么執著于政治議題和民族認同問題，有更多余裕描繪日常生活和個人關系，也不那么執著于伊索寓言式的風格。克里瑪說，這個嘛，波蘭是因為有“貴族傳統”的關系，捷克的文學則比較庶民化。“在莊園里討論政治，和在酒吧里談論政治是不一樣的。”波蘭雖然有不少酒吧，但基調卻是在莊園里定下的。另外，克里瑪解釋作家和審查者的關系在這兩個國家也不一樣。在波蘭，如果作家愿意玩暗示、隱喻和密碼的游戲，那么即便傳達了相當具有顛覆性的信息也可以成功脫身，但捷克卻沒有這種操作空間。作家只要有任何違反官方之處，就必須徹底走入地下，而矛盾的是，如此一來，雖然喪失了個人自由，他們卻獲得了文字的自由。他們在寫作時不抱任何出版的希望，因此反而不受審查制度的限制。這或許也是那幾十年間，捷克的文學比東歐其他地區的文學更能表達強烈的情感，而一旦恢復出版自由，也不需要做那么多轉型與調整的原因吧。

但是很顯然的，捷克文學還是必須經過診脈、祝賀、同情、檢查視力和咽喉等復原階段，才能完全恢復正常的生活。“這個會議有點奇特，對吧？”克里瑪試探性地問道，聲音相當溫柔。我點點頭，悄悄挑了挑眉毛。

我和溫迪去布拉格北方約四十公里的米洛維采（Milovice）走了一趟。那是個無關痛癢的鄉村城市，其實還更像一個村落，坐落于丘陵的一側，由一條水平的道路一切為二。不過這并非普通的村落。切分線以下的米洛維采屬于捷克，其上方則以俄文為主要語言。

帝國既然不是一天造成的，也就不會在瞬息間解體。盡管已經過去了如此之久，這里卻仍然可以目睹蘇聯遺留的痕跡，猶如一只曾經危險的巨龍，死后仍像鬼魅般逗留不去。殘余的蘇聯陸軍預計將在幾周內撤離捷克，但是在米洛維采這種城市，陸軍基地仍像過去數十年一樣繼續運作。

明顯的分界線幾乎是刻意為之，靠近丘陵下方的村落是老式的，相當迷人：石造小屋、蜿蜒的道路、教堂尖塔。丘陵上方的街道則呈格子狀，都是戰后的平扁式住宅，自有其階級分級。比較好的一部分是屬于軍官的，良好的獨棟住宅，前方有座花園；另外幾條街道上則是統一的公寓住宅，歸低階士兵所有。每幢公寓入口處都裝飾著一個軍人或工人的淺石雕，屬于冷硬的蘇聯風格：一種近乎令人喜歡的陳腐筆觸。那些建筑都已顯現年久失修的狀態，處處可見破裂的窗戶，曬衣繩上懸掛著邋遢的衣物。溫迪說，其他姑且不論，捷克人最討厭俄國入侵者的地方，就是他們在周遭所造成的亂象。

雜貨店里，老板娘用算盤這種古老的俄國工具計算價錢。櫥窗內擺放的貨物是捷克的，但是曾經在蘇聯居住過的溫迪告訴我，在對角線上擺罐頭作為裝飾的貨品陳列方式，顯然也是俄國式的。

該鎮的最高點也是重心所在是軍事設施。只見一座長形軍營前方放置著幾輛坦克車作為紀念品，凸出的坦克車車頭挑釁地伸向街面。此刻，幾個小孩正在坦克車上嬉戲，儼然將它當成了攀爬架。坦克旁邊展示有一排大型金屬防護物，上面驕傲地寫著俄文標語，諸如“讓我們贊美偉大的蘇聯陸軍”、“將榮耀獻給英勇的坦克部隊”等等。在軍營盡頭有個不顯眼的標志，明確警告：“止步。如果越過此點，將遭射殺。”我連忙催促溫迪調頭。在軍營前方的草坪上，有名年輕的父親正推著嬰兒車，除了身穿蘇聯軍服之外，就和其他地方快樂的年輕爸爸一樣。在軍官住宅區，另一位身穿軍裝的男人正在修整自家房前的草坪。

一群飛機結隊從我們頭頂低飛而過，發出刺耳的噪音。這種時候，還在進行軍事操演？哦，溫迪指出，駐扎在這里的軍隊總要找點事做，除此以外他們還能做什么？在街上，我走近兩名軍人，希望能問他們幾個問題，不過他們懷疑地瞅著我，低聲咕噥：“她想干什么？”然后快速走開。

這種陰暗邪惡的象征主義與平淡無趣的正常狀態的結合，實在有點超現實的感覺。這必定產生某種特定的心理效果，不斷提醒捷克人，捷克其實還處于“假設”的狀態，即使自認為一個正常自治國家，也只不過是假象而已。在“衛星國”生活最可悲的地方之一，就是被貶抑為這種荒謬的存在，我認為這種說法并不為過。如果直說這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或許還反而比較好些，至少種種情況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這樣，他們就沒了真正的政治存在感，宛如處于一種幽冥境界，一種被公認的假面游戲，一個介于列強之間的支架。哈維爾在其反抗時期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中，便曾要求自己的同胞用“假設”自己自由的方式生活，亦即盡管外在受到限制，但還是要表現出內在自由的精神。可是當時的政權所實行的卻是一種怪誕的、反其道而行的假設情況：雖然實際上受到奴役，但捷克人民必須相信并假設自己是自由的；易言之，他們必須活在謊言中，而被迫活在謊言中，勢必使得所有活動都失去了意義。這是對捷克情況的抽象描繪，然而我相信許多人想逃離東歐，不僅是因為經濟因素或“純粹的”意識形態因素，部分也為了這個緣故，因為即使他們的境況碰巧是舒適的，就某種程度而言，那也始終是荒謬的。

捷克是個小國家，米洛維采這樣的城鎮有很多，它們不斷提醒著這個國家的國民：他們既無法認同目前的情況，也無法試圖改變。所以大多數人才會打心底憎恨這些軍人：痛恨他們不好好維護自己的房子，痛恨他們的軍事廢物污染了當地的空氣和土地，最主要的，痛恨他們的存在所代表的意涵。

不過，溫迪表示，她目前已經心平氣和，對俄國人只感到可憐。他們大部分人其實并不想回到自己的母國，因為那里沒有工作、沒有住宅、沒有食物，有的只是對動蕩和激變令人懷疑的興趣。相較之下，在這里，他們可以過著和平的生活，也已經習慣了捷克相對富足的食物和較高的生活水平。他們有些人實在太希望留下來，因此借助了與移民美國同樣的手法：和當地女子結婚，以獲取公民身份。

我帶著一種明顯的壓迫感離開了米洛維采。幾天后在布拉格，我湊巧到位于美麗的切寧宮（Černín Palace）的外交部和一名助理聊天。就在他領著我參觀華麗的房間時，不巧撞見一群手持公文包的男人正在走廊進行緊張的會議。助理連忙小心地將我帶開，因為他才入職不久，對相關禮節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讓別人看見和我這種人一起置身權力的走廊是否妥當。“那些正在和我們的人講話的是俄國人，”他輕聲告訴我，顯然對自己能和重要事件如此近距離接觸頗為興奮，“他們在討論賠償問題。”

“賠償？”我問。

“對，我們要求他們賠償對我們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他低聲說，“但是他們不肯，反而要我們償付他們建造了卻不能帶走的所有建筑物。”

“但那太過分了吧！”我低聲道。有些歷史的不公雖然模糊不清，但有些卻是鐵錚錚的事實。“應該只是他們的談判策略吧！”

“當然啦，”他說，“他們休想從我們身上撈到任何東西。”然后哈哈大笑，因為蘇聯巨人此刻已經成為摔下城墻的矮胖子（Humpty Dumpty）[[30]](#_30_3)，他們的代表正緊張地和昔日的屬民談判，而且所處的地位低下，已經無法再從他們以往不斷壓榨的對象手中取得任何實質利益。

我和一位在此擔任駐地記者的美國友人一起出發，前往捷克三大屬地之一的波希米亞走訪一些歷史城鎮；其他兩大屬地則是摩拉維亞和斯洛伐克[[31]](#_31_3)。彼得（Peter）駕駛的豐田車外，是一片平緩起伏的鄉村景色，寧靜的村莊和溫和的陽光，沒有車輛，一片靜謐……直到他開始播放一卷饒舌音樂的錄音帶。這種自負、強勢的聲音和我們所處環境的對比，令我震驚得大笑。真是另一個世界。

彼得埋怨這里的景色淡而無味。這個國家小得可憐，缺乏任何戲劇性。但是我覺得這種溫婉令人舒緩，小巧的面積對旅人而言值得稱慶，對當地居民來說或許也是件幸事。小巧使得東歐國家很容易成為周邊帝國的獵物，但也使得這些小國居民迄今仍對本土的景物、地點和習俗具有強烈的情感歸屬。當面積處于這種友善的大小時，鄉土更有家的感覺，每一角落都可以輕易抵達與了解，在每個人的心靈中占據無可撼動的地位。

我們這一天的目標是捷克克魯姆洛夫（Český Krumlov）[[32]](#_32_3)，一個以完整保存巴洛克城鎮特色為傲的小城，擁有可能是歐洲最古老的劇院。這里也的確是個美麗的市鎮，街道上布滿了典雅的歷史住宅，只是已呈破敗之象，如詩如畫的景致，生動地展現著崩壞之姿。中央廣場周遭的小型建筑已用柔和的色調修復。廣場中心優美的噴泉旁圍著一群年輕人，他們有著黝黑的光滑面孔，閃著光芒的、絲緞般的黑眼睛，仿佛昨天才從印度歸來。他們穿著尋常的現代服裝，因此我們用了好一陣子才確定他們是吉卜賽人；不過一旦認出，彼得便不屈不撓地試圖尋找一處可以聽吉卜賽音樂的地方。起初，我們的搜尋可謂處處碰壁：人們或是不知道，又或是不想告訴我們，是否確實存在這種地方。不過，最后我們循著一處巴洛克裝潢的低矮建筑內部傳來的聲音，總算還是找到了渴望的所在。當然，如果我們所追尋的是完全正宗的吉卜賽音樂，那注定會失望，因為那音樂是從一個由大型電子控制面板接出的樂器里傳出的。不過，輕快的旋律是古老的吉卜賽節奏，演奏者也狂放地盡情演出。除了演出者外，這間客廳大小、四面刷白的小“俱樂部”里頭，只有幾名魁梧的黑眼睛男士，且都醉得相當厲害了。

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們在跳舞時維持完美的平衡狀態——從我們進入開始，他們就都決定要展現不知道是紳士的殷勤還是主人的權利，輪流邀請我回旋于石板地面。雖然他們眼睛迷蒙地洋溢著啤酒的醉意，動作卻一派莊重典雅。送我返回桌邊的長椅座位時，也行禮如儀地躬身致意，態度始終高貴。

我在波蘭長大期間，吉卜賽人偶爾會如同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使者般出現。他們乘著篷車行駛在克拉科夫的街道，衣著色彩豐富，蓬亂邋遢，近乎鄙俗。我記得自己曾經盯著一名和我年齡相當的吉卜賽女孩，她身上穿著一件半垂落的洋裝，我躊躇是否可以跟她講話，甚至懷疑她是否和我一樣只是個孩子。在我們避暑的村莊，他們會來看手相，帶著濃重的口音算命。捷克克魯姆洛夫的捷克吉卜賽人似乎遠比波蘭的現代化。我們跟其中幾個比較清醒的顧客聊天，尤其是其中一位面容嚴肅的年輕人，他看上去像那群顧客的史官和發言人，我們用我的波蘭化捷克語加上我朋友的德語互相溝通。他告訴我們，盡管吉卜賽人以流浪聞名，但這里的吉卜賽社群卻是定居的。他說他們大部分是1950年代從斯洛伐克移居而來的，之前在斯洛伐克受到歧視的情況十分嚴重。這里的人比較有禮貌，比較沒有歧見。這些年的改變算是正向的，雖然兇殺案件已經不再隱匿不報，但他們仍會受到小混混的攻擊。又比如這家俱樂部，可謂天鵝絨革命的產物，以前一直無法取得營業執照，現在連捷克人也會不時光臨。所以，為瓦謝克（哈維爾）干上兩杯吧，他總結道。

今天我們沒有見到捷克人，但是當天色漸晚，小小俱樂部內的氣氛也隨著震動的旋律和增加的顧客而熱烈起來。一位女子從一個小型吧臺后面出來，手上托著擺滿小杯伏特加的托盤，穿梭于樂手之間，將酒直接灌入他們口中。那些樂手仰首一飲而盡，樂曲的節奏完全不受干擾。近深夜時分，一群女人走了進來，石板地面隨之擠滿跳舞的人，男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似乎都無所謂……他們的舞姿沒有矜持，不見羞怯，單純為跳舞而跳舞，體態強壯筆直，帶著一抹莊嚴。

在狂歡中，彼得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因為他開玩笑地告訴別人說我是一個音樂經理人，可以介紹樂團到百老匯（Broadway）去演出。樂手們立即圍到我身旁，眼里閃著光芒，仿佛我是他們真正的希望。“百~老匯。”他們不斷說著。雖然我企圖解釋這只是個誤會，但是其中一人堅持在我的筆記簿上寫下他的名字和住址。他叫黑色米蘭。

第二天早上，一位嬌小的吉卜賽女孩在一名年長男子的促使下，在街上朝我們走來，用吉他伴奏著唱了一首哀傷的曲子，聲音不同尋常地極為成熟而性感，唱完后她向我們收錢。接著，我們在街上又遇到了黑色米蘭，身旁是另一名昨天和我們聊得蠻久的男子，但兩人目不斜視地跟我們擦身而過，似乎從來沒有見過我們——顯然昨天這些人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醉。

回到布拉格后，我拜見了剛上任的布拉格藝術學院院長米蘭·克尼扎克（Milan Knížák）。布拉格的藝術領域相當沉寂，只有少數“特立獨行人士”，而克尼扎克經常作為其中之一被提及，仿佛“特立獨行人士”已然成為一個公認的專業類別。他的公寓令人嘆為觀止，尤其相較于我經常光顧的那些單調乏味、千篇一律的住家，更是形成強烈的對比。他住在布拉格市中心，室內設計美麗典雅，有著拼花地板、法式落地窗和潔凈無瑕的白色墻壁。但是家具裝潢卻又極盡時髦和標新立異之能事，有著紐約曼哈頓經常可見的波希米亞式隔層。起居室的一角有一個迷你動物園，陳列著各種蜷伏、詭異的小型生物，一半是動物，一半是神話中的怪獸，漆著一種奇特混濁的金色涂料，散發出合成皮的溫潤色澤。墻壁上懸掛的繪畫混合了極其細致的線條和后現代厚實的粗獷：有用自行車零件和其他零碎對象組成的雕塑，也有超現實風格家具的雕刻組件。

這些兼容并蓄、隨意組合的作品的原創者，身材高大肥胖，有張布滿皺紋的寬臉，扎著金色馬尾，兩耳戴著幾只閃閃發光的耳環。我們坐在一張角度奇特的桌子旁，桌子中央隆起一個蛇狀向上彎曲的金屬線條，頂端是一個米羅（Miró）[[33]](#_33_3)風的趣味造型。從他所處的“環境”，我以為克尼扎克會是個神經質、愛引起爭論的人，不料他的行事作風卻與此大相徑庭。雖然他的一些觀點和新紀元相互輝映，但他本人卻十分嚴謹，甚至稱得上非常認真，可說是個實事求是的人。

此處羅列若干他的想法：首先，捷克人應該變得更加商業化。他于1960年代末期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那幾年間，他放下了藝術家的身份。在美國，藝術是沒有意義的，興趣都在別的地方，比如說在街上、在風景上和在學習如何做生意上頭。他在紐約開了一間刷房子的公司，從中學到的一件重要的事，即如何估價。在他看來，估價行為隱含著一整套人際關系，彼此間需要直截了當的陳述和直截了當的反對。在捷克，沒人學習如何跟彼此直接對話。在任何交流中，每個人都閃爍其詞，盯著地板。其實這種躲閃和害怕的習慣，通過簡單的商業交易行為就足以克服。

其次，藝術是拐杖，其目標在于最終達到不再需要它的境界。每個人在心里便可以做許多事。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了二十年，而且被孤立于其他藝術家。捷克當局宣布他為人民公敵，一再囚禁他，原本希望他成為“地下之王”的藝術界同僚，也開始害怕被別人看到和他在一起。在那段時期，他練習了“心靈的歷程”，亦即鍛煉專注力，以及一種自我發明的“想象”。比如，他會在心中塑造一座石像花園，然后進入冥想。他于是知道即使沒有藝術，自己也能夠存活。

再次，捷克的藝術很無聊，文學很無聊，音樂很無聊。出任藝術學院新任院長后，他發現學生也很無聊。這是因為在經歷了這段漫長歲月后，人們也變了。他們認為自己向往自由，其實內心仍然非常保守。他試圖告訴學生，藝術就是要去攪亂和打擾社會。他告訴學生，他們必須思考、界定自己。他讓學生練習，比如如何把一個想法和一張椅子結合起來，但是學生們太膽怯了。

藝術家也很無聊。現在終于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了，但是在這么長的一段時間后，他們首先推出的卻是垃圾。你必須先擺脫掉那些垃圾，然后才能生產出任何有趣的作品。就目前而言，藝術家只對賺錢有興趣。當然，你也必須尊重這一點，因為他們以前根本不能賺錢，只是這樣做是絕對無法成功的。總之，藝術不是必要的，而是次要的。

他把自己在柏林展覽的作品目錄拿給我看，這個展覽還曾導致他入獄。作品有油畫、雕塑，也有絕佳的時尚設計，比方延伸到腦后數寸、呈尖形樹葉狀的耳環，如果戴著出席雞尾酒會勢必有相當大的危險性。這種漫不經心、不拘一格的作風似乎讓人想起兩次大戰間捷克的藝術領域，其間展現著機智和趣味，無視高雅和低俗的區分。或許這正是小國的特色：這里的畫家并不介意當個畫匠，也不追求永恒的極致輝煌。

離開時，我詢問一張我頗為中意、風格“特立獨行”的咖啡桌的價錢，桌面畫上了結構主義的設計圖樣。克尼扎克所開的價錢顯示出對市場——西方市場的充分了解。我直視著他，努力以直截了當的語氣告訴他我買不起，然后雙方握手言別。

“我是那種對適應社會毫無困難的人，”茲德涅克·蘇法（Zdeněk Sofar）說，“像現在，我正在適應我的新環境。1968年后，我一樣做了調適。我喜歡大部分人，我追求的是輕松自在。”

蘇法在說這句話時，似乎并不覺得自己在吐露什么辛酸的事。他身材高瘦，臉孔紅潤，看起來比實際的五十幾歲年輕許多，就像一個經常從事戶外活動或喜歡踢足球的人。如大多數人初次碰面給人的印象一樣，他看起來很友善，具有同情心，彼此之間也不存在什么惡意。

直到不久前，蘇法都在眾所恐懼與嘲弄的馬克思-列寧學院擔任哲學教授。劇變后一個月，那家學院便關閉了。他隨即購置了一家餐廳，現在頗以身為餐廳主人自豪。因為遠在布拉格市郊，我頗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到地方。那家餐廳位于一個無產階級的運動中心，看不見城市景觀，只有大片的雜草地。據我觀察，這可不是什么有發展前景的地方。餐廳內有個酒吧，幾張桌子，上面鋪著皺到不行的紅色桌布，飄揚的灰塵中懶散地飛著幾只蒼蠅，墻壁上懸掛著兩大張袒胸露乳的美女照片，餐廳內坐著幾個身穿皮夾克、神情木然的年輕人。如果這是以往權貴的銷金之處，那么他們的財富顯然并不驚人。

不過，這個餐廳代表了蘇法在感到十分不安之時對安全的追求。事實上，身為一個共產黨員，或前共產黨員——我也很難斷定他以前，或現在，到底屬于哪一種——他真的覺得很緊張。“你知道，我很擔心同樣的事情還會上演，”他說，“這里經常發生同樣的事。他們凡事都怪罪到共產黨、猶太人和吉卜賽人身上。”

蘇法毫不掩飾他對自己任職的學院遭到關閉一事的不滿。“這樣做對我們非常不公平，”他直言，“我們是被教育部長解雇的。其實，我們比教育部長更開放，但是新時代的開始，他們需要表功。”

“在遭到解雇后，我馬上和另外兩個朋友買下這個地方。我領到六個月的薪水，就把那筆錢全部投在了這里。我們沒有什么大利潤，但或許能賺到足以獨立的錢。我再也不想倚賴旁人了。你知道，”他以苦澀的口氣繼續說，“1968年時我也碰到過相同的情況。我有能力，但是我變得非常，”他將大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比了個手勢，“渺小。艱困地熬過五年，我再也不想附庸于任何東西了。”

蘇法是順理成章地入黨的。“我來自一個工人階級的家庭，共產黨的家庭。”然后在1960年代早期轉向了改革派。他曾屬于一個社會學者團體，他們出版了一本有關捷克社會的書，但由于太具有煽動性，因此在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后便被禁了。在一連串的迫害中，那套書的大部分作者都被卷入其中；而他，經過左搖右擺，反復計算，居然逃過了報復。

“我那時本來可以移民的，”他說，“我當時人在西方。”（作為黨員，他獲得了出國留學一年的獎學金。）“但我有妻子，她不懂外文，還有個孩子……所以我留了下來，并且繼續往上爬。我很多出國的朋友都相信，1968年的新政權最多只能維持五年。我心底想的是，那就會失去人生最精華的五年。沒有人料到它居然維持了二十年。”

他重返共產黨高層，而當時共產黨也開始變成追求舒適事業之所，不再致力于早期致命的狂熱作為。因為受到那本書的牽連，出于政治性的選擇，他離開了社會學領域，進入哲學領域。“這不是我想要的，”他說，一樣不帶有任何自我批判的意味，“但是有時候，最好還是要彎腰屈服。”

我問他在“正常化”時期，他對黨的態度如何。“喔，我從來不支持1970年代的政權，”他說，仿佛對自己立場的變化不覺得有任何矛盾之處，“你知道，我在讀過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作品后，就從左派變成極右派了。”

米爾頓·弗里德曼？不過黨員確實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敵國作品。只是在聽到各黨各派的政治人物都將弗里德曼視為追求資本主義的指明燈時，我不禁開始認為這位嗜血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真可謂潛伏東歐的秘密情報員。不過弗里德曼究竟哪一點令蘇法如此心儀？“喔，從前最糟糕的地方就是經濟停滯。在理論上，我支持馬克思的經濟學，只是過了一陣后，經濟便成為一潭死水。人們經常無所事事地閑坐在一個地方，根本懶得裝出在工作的樣子。我親眼看著這個制度不斷惡化。而在失業和社會公平等問題上，沒有人比弗里德曼分析得更好。”

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固然出于外在的反對力量，但或許也出于這種完全內在的自我覺醒。不過這并不代表蘇法就完全放棄了他早期接受的訓練。“有些馬克思的思想，好比說經濟決定論，生活經驗的影響等，我仍然完全接受。如果我還能回到大學，”他緊抓著衣服，表現出罕有的激情，使其所說的英語都略為扭曲，“他們也不能逼我放棄。這是基本的信念，深植在體內。現在非常流行現象學，但是那個太模糊，對我而言也非常不理性。宗教對我而言什么都不是，我很接近實證主義。”

只是就一個實證主義哲學家而言，蘇法的若干結論其實更接近弗里德曼，而非馬克思。帶著我在他那些前共產黨同僚身上所曾目睹過的堅決，他期望這些結論能毫不妥協地徹底實踐。對他而言沒有折中。“如果補貼健康或教育，”他說，“就會保留舊有制度。我的希望是和舊制度完全切割，創造點別的東西。人們的內心都是保守主義的，大部分人在日常行為中其實并不接受1989年的政權，就像東德的情況一樣。如同剛結束了一場革命——失范和異化，非常大的異化。這個地方，”他指指餐廳，“去年發生了四起搶劫案。我們當政的時候沒有發生過這種事。這點讓我很擔心。”

蘇法說，1968年之后，很多他以前的朋友繼續反抗運動。我問他如何看待他們？他的回答十分直白。“我完全低估了這場運動，”他說，“1980年代早期我在美國，當我跟朋友談起這件事時，我認為《七七憲章》沒有什么效力，我們認為改變一定會來自黨內，沒有人料到后來的變化。”

因此，如果有預知能力，他會選擇比較有勝算的一邊。再一次，我發覺他的說法比他本人透露出更多內容，也更令人感到不安。不過這一點，或許也就是兩方無法兼容、格格不入的核心所在：當異議分子以巨大的規模和后果進行一局帕斯卡式賭注（Pascal's Wager）[[34]](#_34_3)時，蘇法卻以完全不同的賭金——職位、升遷和小小的權力，押在最穩妥的賭注上。

基于他一以貫之的實用主義，一旦墻上出現了嘲弄當局的手寫文字，不出意料地，蘇法自然就會熱切地將自己的姓名簽署在新勝利的一方。他參加了瓦茨拉夫廣場的示威活動。“對我來講，這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他簡短地說，“我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結束，因此把那一切都拋到腦后。”

如今時間流逝，反觀過去，他對“那一切”有什么感想？“呃，”他說，“我有過美好的一生。當我獲得獎學金前往西方，那就是對我的一份獎賞。我有一份好薪水，為自己盡力而為，我是個適應社會的人。”

這就是了，他的核心觀點、他的權宜與妥協。相當不加掩飾地，他自命是個機會主義者——一類晚期共產黨員，和另一種自命的犬儒主義者，例如我曾經遇到過的那位波蘭前審查員米哈烏·馬利茨基略有不同。犬儒主義者對于其所背離的理想有更敏銳的看法；機會主義者則似乎完全拋棄了理想，即便只是拿來作為參考也沒有。犬儒主義者似乎是為個人目的而扭曲既定原則，機會主義者則更多改變自己。

基于方便而行動，這是最常見的沖動，但是聽到有人這么輕松地將其視為指導原則侃侃而談，仍然不禁令人坐立難安。當蘇法談及他的兒子帶給他的不便時，我發現自己甚至稍微退開了一些，坐姿也有些僵硬。他的兒子在《七七憲章》上簽了名，因此在蘇法和他的上司間造成了一些麻煩。“在那之后，我不得不怪他。”他說，仿佛那也是不辯自明的。和他談話也讓我覺得特別累——因為覺得有做出評判的需要，面對茲德涅克·蘇法和其他與他類似的人時，有必要擺出一種道德的態度。近來在東歐這種需求格外明顯。這個人到底有多大罪責？這個人對他/她的朋友造成何種傷害？傷害有多深？他是共謀者、妥協者，還是暗中的反對者？他應該對此負責或只是共謀而已？這些問題似乎無從避免，因為必須先解決它們，上一個時代的壓迫才能完全清除。但那段時期令人窒息的壓力也就在這里：沒有人可以逃脫道德之網；而最普遍的選擇，也就是服從體制，卻又會被迫卷入這種不尋常的不愉快當中。也許這種日常的個人決定和被迫卷入的體制性罪惡之間的失衡，甚至是不協調，正是東歐此刻混沌、不知該如何正視過去的矛盾情結的罪魁禍首。對茲德涅克·蘇法這類其實相當常見的人物該怎么辦？他畢竟代表一種常態，而且是幾十年的常態。這里每個人都認識一個茲德涅克·蘇法，會在當地酒館和他打招呼，而且很多人也知道自己多么容易就成為另一個茲德涅克。這使得人們很難去評價，也很難不去評價。我可以感受到這種情況所帶來的巨大、沉悶的倦怠感，希望這整個煩瑣的情況能早日結束，早日宣判其無效、失效、被廢除或撤回。我想我感覺得到自己也很想遺忘，很想否定這一切。

這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一方面是過去的糾纏。在天鵝絨革命之后的一年半，捷克仍處于這種陣痛期，不是遺忘之苦，反倒比較像是受制于牢記不忘之痛，也就是仍執著于過去的傷害和不公。我在布拉格展開的每次交談，最終幾乎都會碰到“名單”問題，一份據云記錄著秘密警察告密者的名單，其中包括多達二十萬個人名。大多數人都主張公開名單，堅稱“那些人仍藏匿在我們之中，有些人還在工作單位獲得升遷。這樣不公平，我們需要知道那些人是誰”。其他人——這些人占少數——則指出那份告密者名單畢竟是秘密警察所擬定的，而在此之前，是沒有人相信秘密警察的。再者，記有最重要的告密者的名單也許在政權交替之際就被毀了。那份名單上誠然有罪該萬死者，但也有一些是受到審訊或拷問而就范的人，在那種情況下被迫簽署一份文件，如今因導致他人付出生命而受到譴責。

盡管有這些反對的聲浪，一般人仍支持制定相關“清理”法，將名單上的人踢出工作單位。“清理”的意思是凈化，這個字眼回蕩著納粹的陰影，尷尬地再度現身新時代，語言本身仿佛就在有意無意地警告這一過程的謬誤。在此同時，十名國會議員的名字赫然出現在秘密警察檔案上，暗示他們也是告密者。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國會議員解職，但那些政客都飽受強烈的請辭壓力。

我花了一些時間和其中一名議員聊了一陣，他的情況充滿了宿命的諷刺。他名叫揚·卡萬（Ján Kavan），他所遭遇的事情真是莫大的諷刺，因為代表反抗的地下組織在國外工作二十年的他，最近才返回捷克。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剛在國會發表完一篇演說，為自己辯護。一開講，就有三十個人直接走出會場。這場面委實令他有種今昔交錯的復雜之感，他說自己馬上回想起當年作為被孤立的學生異議者的年代，以及更久遠的有關他父親的事跡。

關于斯蘭斯基公審有本很棒的回憶錄《愛與自由》，就是揚的母親羅斯瑪麗·卡萬撰寫的。羅斯瑪麗是位活潑迷人，又非常有智慧的英國女性，說來有趣，她不幸地和一名捷克猶太人墜入愛河，并且挑在最錯誤的時間前來布拉格定居。抵達后不久，斯蘭斯基公審便開始了。羅斯瑪麗的丈夫帕維爾（Pavel）正好是任職于外交部的熱血共產黨員，他在一個美好的早上離奇失蹤，落入捷克監獄的虎口。

在公審的舞臺上，帕維爾·卡萬只是個配角，是名所謂的“證人”，其“證詞”是支持幾名主謀者罪行的證據。也因為如此，他逃過了死刑，在四年多后獲釋。只是不久后他便離開了人世，死于心臟病。

和安娜的母親一樣，羅斯瑪麗在帕維爾被拘禁期間也像是從地獄走了一遭，生活窮困孤立，還有艱辛困苦的體力工作。盡管如此，她仍然堅持留在她所選擇的國度，因為盡管備受折磨，她已經愛上了這個國家。直到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后，她才終于因參與反對運動，很有可能遭到逮捕而被迫離開了捷克。她的兩個兒子也差不多在同時離開。

揚和他的父親并不親近。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便遭到拘禁，出獄后又不久便過世，而且根據羅斯瑪麗在回憶錄中的敘述，他的父親其實是個很難相處的人。但是兒子揚后來對父親的世界產生了興趣，大學論文亦探討他父親所領導的戰前國際學生聯盟（International Student Union）。“令人驚訝的是，我當時就已經有種今昔交錯的強烈感覺。”揚說，因為在那段時間，他本人也涉足學生政治活動，變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激進分子，亦即自認為改革派的共產黨人，希望共產黨能從內部進行改造。后來他又和一群被稱為布拉格激進派的學生在一起，成為布拉格之春的推手。

其實初次接觸時，揚并不符合一般英雄人物的形象——他身材不高，行動有些笨拙，頭發逐漸稀疏，皮膚蒼白，而且心臟病剛剛才二度發作。他講話很小心，沒有言論過激或言過其實之處，或許是因為不想掉入自我辯護的陷阱。我相信他一直在檢視我，看我是否相信他，畢竟他已經非常習慣別人的誤解了。

我是在“赫爾辛基人權觀察組織”（Helsinki Citizens' Watch）[[35]](#_35_3)的辦公室和揚見面的，那是一個監督人權是否遭到侵害的組織，他在里頭負責一些工作。他辦公的樓里，還有另外不少于三個致力于人權與和平任務的組織，包括“約翰·列儂和平俱樂部”（John Lennon Peace Club）。赫爾辛基人權觀察組織的職員個個都是雙目有神，能講多種語言的年輕人。他們身穿時髦的窄腿長褲和寬大的T恤，來自不同國家，從事屬于他們這一代的革命活動，而且幸運地能在這么賞心悅目的環境下工作，還配有計算機和國際電話作為他們的戰壕和路障。

在這種環境下，揚·卡萬的故事似乎顯得格格不入，給人一種時代錯誤的感覺。他目前的麻煩源自一份秘密警察檔案，影射他在旅居英國期間曾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報告指控他在二十歲出頭時，曾和一個黨部官員見過幾次面。卡萬承認在布拉格之春結束、他首度前往英國時，仍然希望能返回捷克，因此曾和外交部一名負責教育事務的官員會面。那名官員對他的際遇表示同情，想要提供幫助。卡萬說，他跟那名官員曾禮貌地交談過，但是從未給過對方任何有意義的信息。

那是發生在蘇聯入侵后不久的事。接下來二十年，卡萬在海外像捷克的卡珊德拉[[36]](#_36_1)一樣，毫不厭倦地從事捷克政情分析的工作。在英國，他撰述有關捷克情勢的文章，并偷偷夾帶出訪談記錄和手稿，還創辦了一個刊物《東歐通訊員》（The East European Reporter），在東歐專業人士圈內備受推崇。后來他又設立了“帕拉赫出版社”（Palach Press），將包括哈維爾的文章在內的手稿交給西方出版人。他一天工作十八個鐘頭，開非法會議，并秘密潛入捷克活動。在限制非常嚴格的當時，他卻可以出入捷克，這被視為他與當局勾結的證據。但是卡萬拿了幾本他得以潛入捷克的英國護照給我看，我發現護照上所使用的照片都經過易容，根本無從辨識，比如蓄有胡須或使用了其他變裝手法，另外還搭配使用一連串的化名。在英國，更改姓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奔波海外，直到1989年11月歷史再次翻轉時才決定返回自己的家鄉。雖然在英國居住已長達二十年，但他說短短五分鐘內，自己便下定決心，返回國內。歸國不久，他便前往新成立的公民論壇工作；幾個月后，更以公民論壇候選人的身份參加議會選舉，不過這一平臺即使對于他以前致力異議活動的同事來說，或許也太過激進（在西方的語義上）了。他認為他的政治立場或許再度惹得其他人不快，或許這也是他目前身陷麻煩的部分原因。

“我不在乎繼續居于少數，”他說，“但是被貼上這種標簽，被指控和我終身為敵的人相互勾結……這個嘛，實在太可怕了。”他在議會走廊對我說，很謹慎地避免流露出怨恨或苦澀的語氣。人們經過他時或轉過視線，或使用過度熱情或歡樂的語氣和他講話，仿佛把他當成少不更事的反對派學生。

卡萬在國際上擁有相當的知名度，因此他的案子在海外已經造成轟動。英國和美國的報紙對他的案子的處理均表達了遺憾；但是在捷克，他幾乎完全受到孤立。有關他的傳言滿天飛。比如關于一次他潛入捷克后，有多少異議分子遭到誘捕的謠言；關于他如何密告自己父親的謠言——雖然報道這個傳聞的報紙所宣稱的事件發生日期，距離他父親過世根本已經相差了十年之久。雖然此刻沒有人能絕對肯定卡萬二十年前做了什么或沒做什么，但指控他的意愿依舊非常強烈。拜當時“卡萬事件”不斷出現在報道中所賜，所有和我聊起他的人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愿意站在他的立場認為疑點未經證實便不能加罪。這中間有問題，人們堅定地表示，一定有什么問題。

有關名單的傳言也在不斷擴散。誰在名單上，誰應該在名單上，誰對誰做了什么事……當然，告密自己的國人是捷克一種非常讓人震驚的現象，而這種驅魔似的急切需求也反映出當時告密行為有多么猖狂。但就是因為這種勾結，或說是適應的行為比比皆是，才使得真正緝拿真兇、清理舊賬之舉極為艱辛。要針對誰進行起訴？會不小心遺漏了誰？哪種程度的共謀關系才構成犯罪？何謂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般公民權？在對這么多人進行“整肅”之余，又該如何避免少數人成為代罪羔羊？

卡萬的故事錯綜復雜，細節很難厘清；但是由于他的家庭歷史的轉折，使他幾乎成為一個極具意義的范例，反映出追求“整肅”的意愿，如何可能只會令捷克墜入懷疑和處罰的旋渦，苦苦糾纏，歷久不衰——就像在驚悚的道德故事中，你所獲得的正好和你最初希冀者完全相反，揭露出你意愿的黑暗面。

在一個版本的輪回神話中，一個人在穿越到下一個世界時，必須喝下遺忘之水和記憶之水——一方面使其卸下過去的負擔，帶著希望和純真來到人間；另一方面又讓人們能夠帶著智慧和知識的記憶重返人世。這種平衡對于一般凡人而言是遙不可及的，但我一直在想這個神話，以及在穿越到一個“新時代”的此刻，東歐人或許也學習到：在他們深刻體會到遺忘太多所帶來的危機之后，太多的記憶同樣也會帶來莫大的危機。

“我們做筆記，我們旅行。空虛啊，空虛。”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埃及曾如此感慨。我在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亦復如此。

小鎮火車站。我提著行李箱，蹣跚地走向閑停在廣場另一邊的出租車。在前往旅館的途中，四周沉浸于薄暮時分的寧靜，什么都沒有。一群年輕人身穿皮夾克，在一家冰淇淋店前喧嘩笑鬧，然后是更無邊無際的寧靜。和出租車司機交談時，我發現斯洛伐克語跟波蘭語很接近，很容易理解。他一直稱贊布拉迪斯拉發城郊的鄉村美景。

這里是斯洛伐克的首府，這個地方最近正醞釀著不滿和分離主義的情緒。我看到了關于群眾、集會和暴動山雨欲來的報道。在弗拉迪米爾·梅恰爾（Vladimír Mečiar）的領導下，大型運動正蓬勃發展。梅恰爾是共產黨轉型的民族主義者，正鼓吹附屬捷克七十年的斯洛伐克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對這一現象的好奇，是促使我過來一趟的部分原因。不過我是在周末抵達的，而周末是連最迫切的政治熱情也會暫時擱置的時候。

我所停留的基輔（Kiev）飯店，采用一種光線朦朧的現代風格，在前共產黨官員眼中算是高級典雅的代表，飯店職員的態度不一般地粗魯。在餐廳里，我勇敢面對觀光團體朝我投來的質疑眼光和一群斯堪的納維亞青少年嬉鬧的喧囂尖叫，因為我非得吃飯不可。如果換個心情，我會驚異地發現自己猶如置身一個輕歌劇的場景：侍者們一副倨傲的神情，富有男性氣概地穿著寬松的白襯衫，緊身黑褲；女侍們則穿著貼身的、鞋帶緊系的白色長靴。一名身穿長禮服的鋼琴手正演奏著各類歌曲，從《彩虹彼端》（‘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到披頭士，再到這個夏天流行全東歐的《屋頂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的主題曲。但是我心情低落，即使食物也無法讓我開心起來，雖然公平地講，這餐飯已經算是我在捷克境內所品嘗過的最好的一餐了。

回到房間，我撥了幾通電話給別人引薦給我一見的人，但是每個都不在家。我不想出去到空曠的街道閑逛，也不想到大廳去忍受更多好奇的目光。除了這間枯燥乏味的旅館房間和我，這里什么都沒有。我只好用一杯沒加冰塊的伏特加酒撫慰自己，沮喪地想自己在地球的這個角落到底在干什么。記得布拉格的某位朋友曾問我奔波在旅途中感覺如何，我回答他，我最大的發現是這個世界是圓的，不管我多么害怕從世界邊緣墜落，前面總會出現另一個地方。“啊！不過最大的問題是，”他引用一名波蘭作家的話，“這世界的盡頭究竟是鐵絲網，還是竹籬笆。”現在我覺得自己來到一個世界的盡頭，兩者皆有，還逐漸退化成陳腐、少有人來的狀態。

在晨光的照射下，布拉迪斯拉發顯得比較友善，盡管第一眼看上去還稱不上迷人。基輔飯店坐落的地區，其外觀形成于社會主義時代。這里的許多老式建筑已被刻意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偏遠城市特有的俗麗氣質，使用便宜的建材，展現“他們”所獨具的丑陋天分。不過當在這個清風徐來、陽光普照的早上徜徉其間時，我開始感受到布拉迪斯拉發無拘無束、規模小巧且毫無矯飾所帶來的愉悅感。在一家百貨公司附近，有成群長著鄉村面孔的健壯男子，身穿磨損的寬松上裝，意興盎然地聊著天。女士們身穿1955年流行的洋裝樣式，腳踏高跟鞋走在街上，面帶怡然自得的神情。這一切——過氣的時裝和慵懶的節奏——莫不令人聯想到另一個中歐城市，即我幼年時居住的克拉科夫。我感到一種有時會在這種“落后于時代”之處找到的類似鄉愁的滿足感，一種混合著懷舊和熟悉的情懷。我們已經走過那段歲月，已經將其拋諸腦后，對于我們可能成為什么，它不構成任何挑戰。

在一間規模龐大，幾乎空置的民俗藝品行，我發現了一些我在普羅旺斯（Provence）之外看到的最漂亮的陶器，大型擺盤上繪制著藍紅交織的水果和樹葉，以及釉彩細致、造型優雅的農人。我曾經跟捷克人交談過，他們表示斯洛伐克的美感讓他們相信斯洛伐克人在精神或自我認同層面上，是有其特殊天分的。這種觀察中或許帶點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這正是讓斯洛伐克人不滿的優越感，而且刺激了他們飽受批評的民族主義情感。但是這種本土的美感確實強烈而鮮明地展現在這些民俗工藝品中，另外也展現在從雅那切克（Janáček）到巴托克（Bartók）等作曲家所探究的美妙民俗音樂中。就連我在一間圖書館墻壁上所看到的教化性壁畫，筆觸亦高雅而時尚。

只是斯洛伐克的“自我認同”究竟包含些什么，是個高度敏感的問題，因為斯洛伐克此刻的存在，實屬歷史上一宗小小的意外——一種小國的意外，而歐洲這一地區的這種小國可謂比比皆是。斯洛伐克有四百萬人口，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既接近波蘭語，也接近捷克語。再過幾個世紀，可能很容易便會和其中一種語言融合為一。再者，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短暫而可悲的那段時期外，斯洛伐克在近代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短促的輝煌時期是第9世紀，當時斯洛伐克人第一次和摩拉維亞人統一。但是大摩拉維亞帝國非常短命，第10世紀時，斯洛伐克便被匈牙利人所征服，并被統治了接近一千年，后來則受到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庇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斯洛伐克和捷克基于平等的邦聯方式，成為統一國家，不過斯洛伐克人始終覺得自己被視為二等公民。

小國經常為大國所爭奪、交換、瓜分和背叛，這一地區的歷史有太多這種事例。想要維持一個獨一無二的斯洛伐克主體意識，勢必需要一種獨特的韌性。也許當前宛如來自另一時代的激進民族主義，便是那種韌性與褊狹的另一種體現，是自我存續的必要手段和代價。

布拉迪斯拉發的舊城也有種胸無大志的魅力。在這非常炎熱的一天，烈陽折射在狹窄的石板街道上，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于某個意大利小鎮。一間間刷白墻壁的住家，窗臺裝點著天竺葵，百葉窗內不斷傳出無拘無束的嘈雜對話聲，角落的吧臺亦傳來男人的對話聲，在在給人一種從容卻豐富的溫馨感覺。

作曲家胡梅爾（J. N. Hummel）[[37]](#_37_1)的故居，是我見過的最低調的博物館，一個房間內擺放著一架古鋼琴和幾件典雅的家具，向后開放進入一座花園，從街上透過店面窗戶便可一覽無遺。我心想，在這寧靜的房間和城鎮創作精致的音樂，是件多么愉悅之事。

我在一間氣氛優雅的酒吧和約瑟夫（Jozef）碰面，斯洛伐克人自詡和捷克人不同的一點在于，他們是啜飲葡萄酒，而非痛飲啤酒的人。身為作家和翻譯家的約瑟夫，這回不知怎么的，竟然忘了像往常一樣去度周末了。他正打算前往鄉間的別墅，因此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他只有時間跟我喝杯酒。可是一旦坐定，他又似乎什么都不急了，興致盎然地品著酒娓娓道來。他是個圓滾滾的中年男士，有著令人愉悅的眼睛和斯洛伐克人橄欖色的皮膚，言談舉止在在顯示出他是個熱衷追逐樂趣、個性幽默而喜樂的人。這個周末他打算用自己小果園生產的水果制作果醬。因為從來沒學過開車，所以他打算搭公交車去。“我不懂機器，”他聲明，“再說，如果我必須開車，就不能在下午小酌一杯了。人必須放松一下，你不覺得嗎？”他開心地笑著。

他正在翻譯一本關于哲學的書，自己也寫點東西。我問他，斯洛伐克作家使用被認為非常小眾的斯洛伐克語寫作，幾乎沒有機會被翻譯成外文或暢銷海外，這樣會不會有挫折感。“是否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其實不重要，”他主張，“每個文化都是個自給自足的實體，已經具備它所需要的所有元素了。”

這種說法出乎我的意料，也頗讓人欣喜，因為其中蘊含著一個尚未陷入褊狹的局部、小型世界充實及豐沛的遠見。不過相對地，這也意味著另一個問題的存在。我問約瑟夫對分離主義運動有什么看法，我以非問不可的態度來問這個問題，并且期待他會給我一個進步的好答案，不料他卻突然變得閃爍其詞起來。他說這牽涉到復雜的國家認同問題，捷克人始終視斯洛伐克人為次等國民。連蒂索神父（Jozef Tiso）[[38]](#_38_1)也應被看作支持斯洛伐克獨立的人……講到這里，他突然露出不安的神情，決定說到此為止，沒有把話講完。

這句話開啟了一個小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蒂索神父是斯洛伐克的總統，而近日民族主義分子又重啟對他的崇拜。蒂索神父執政期間，是斯洛伐克在現代史上唯一獲得民族“獨立”的一段時間，而之所以能獲得獨立，則是拜和德國聯盟之賜，蒂索不過是納粹的傀儡。那一時期斯洛伐克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殘暴事跡，可謂罄竹難書。

所以當意識到約瑟夫竟然有為蒂索辯護的意圖時，我升起一種懷疑的情緒。我一向認為只有極端分子才會提出這種主張，但像約瑟夫這種善良親切的“知識分子”，全身上下沒有絲毫狂熱傾向的人也這么說，委實令我倍感困惑。這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民族主義，迥異于我從其他地方所感受到的：屬于19世紀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由于牽涉到基本的自我問題，便舍棄了其他道德觀念。或許是對被壓抑的過去所展開的另一種報復——一種因為長久以來屢遭壓制、遺忘與貶抑而產生的對“民族認同”的堅持。

后來，我又有了一次會談，這次比較符合我的期待，但或許并不符合當地的現實情況。交談的對象是斯洛伐克最古老的文學雜志的編輯。他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整個過程中香煙抽個不停。他認為分離主義運動只是一種少數人的現象，雖然制造出不少噪音，但一旦到了緊要關頭，人們便會回歸理性了。畢竟，沒有捷克屬波希米亞和摩那維亞的領土，斯洛伐克在經濟上會陷入窘境。再者，一旦東歐脆弱的邊界穩定被打破，誰知道會產生什么后果？斯洛伐克境內擁有大群匈牙利少數民族，是歷經幾世紀匈牙利人統治而遺留下來的，也是此刻斯洛伐克所企圖加以控制者。針對斯洛伐克人給予匈牙利人的待遇，他適度表達了自由主義者的憤慨。最近這里才舉行過示威活動，反對賦予匈牙利人完全的語言權，甚至婚禮儀式也不能以匈牙利語進行。對于上述這種情況，這位編輯搖了搖頭，沉吟地猛吸了一口煙。

他留給我一本他所編輯的雜志，其中有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39]](#_39_1)、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40]](#_40_1)和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41]](#_41_1)的作品——中歐作家群像。還有幾篇出自斯洛伐克作家之手，那些人名是我從未聽說過的。不過當我用我足以緩慢了解文章內容的斯洛伐克語閱讀其中一篇詩作時，便發現自己踏入了熟悉的領域。那篇詩作是對寂寞和女性痛苦的強烈而深沉的檢視，由于內容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感到自己愚蠢地被震驚了。為什么當我們在其他地方發現有著沛然感情和理智的真誠生命時，總會感到這么驚訝？更進一步，我們所認為的其他地方究竟是什么？波蘭對我而言一向代表這里，一個完全現實的地方；斯洛伐克雖然近在咫尺，在我的想象中卻屬于一個遙遠的角落。當我們容許想象中遙遠角落的居民忍受殘酷或痛苦的現實時，卻很少會設想他們同樣也擁有復雜、細膩的真實感受能力。或許真實細膩地感受整個地球的脈動根本是不可能的；又或許我們想要有個比較單純世界的冀望，原本就是根深蒂固無法消除的。其實期盼整個世界能變得跟我們一樣，與堅信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跟我們不一樣，兩種想法同樣讓人挫敗。

第二天，我搭出租車前往距離市中心幾里路的杰溫城堡（Devin Castle），亦即第9世紀摩拉維亞王國所坐落之處。半路上，出租車司機指著一群行走于鄉間小道上的人：“越南人，”他說，“是個問題。”越南人？我有點困惑地反問，因為他們出現在這里有種出現在任何西方國家都不會有的不搭調的感覺。“哦，是啊。他們在戰爭期間來這里讀書，然后就留下來了。他們是個問題。”啊，對了，越戰。這些當然是北越人，他們流浪到這里，然后停留下來，因為這里的生活比家鄉輕松，不過實在很難想象東歐能夠成為任何人的庇護所。

杰溫城堡是座雄偉、灰白、破敗的塔樓遺址，破落的筑壘城墻從巖石起伏的海角升起，然后消失在海岬一端，俯瞰在這里形成寬廣、寧靜彎道，并與摩拉瓦河（Morava River）匯流的多瑙河（Danube）。拜占庭僧侶西里爾（Cyril）與美多迪烏斯（Methodius）兄弟在第9世紀旅行到這偏僻之處，甘冒沿途的各種危險，只為完成摩拉維亞的使命，亦即將基督教義和西里爾字母帶到這個仍屬異教徒的地區。這些早期的多元文化信仰者對西里爾字母勢必頗多爭議，因為當時大多數的教會人士都認為只有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這三種語言適合被用來書寫圣經文字。

從這個戰略守望位置，摩拉維亞君王得以一邊注視德意志部族的行動，同時另一邊監視波希米亞部族的行動。今日在多瑙河的對岸，便可看到奧地利的農業地區，可以見到他們近乎強制性的規律設計，宛如先行清晰畫出了固定的區域和方塊，閃亮的車輛行駛在極其平整的道路上。與河流這一方雜草叢生和凌亂不堪的對比，更如展示報告般清晰明了。直到最近，奧地利一直這么近，卻又那么遙遠；現在，終于可以去到彼岸，親眼目睹了。而這種令人惱怒的近距離存在又似乎在不斷提醒這里的人，有些人就是過得那么輕松、那么舒適。

在鄰近杰溫城堡的某處，有只公雞正高聲啼鳴，一對好看的情侶在此閑逛。這是個溫暖、懶散的星期日。沿著一條衰敗的古老石階下行的我，再度往城堡望去，感慨世代交替正如小草的榮枯。也感慨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只不過是經年累月的齷齪事跡，唯有在相當距離之外，當它已成為平鋪直敘的故事和少數剝落的石塊時，才堪回首。

日暮時分，光線變得詭異而神奇：靠近地面，一座小型公園的樹下呈現一片漆黑；然而，天空仍是閃亮的靛藍色。這個效果可以媲美馬格里特（Magritte）[[42]](#_42_1)的畫風，同時呈現出光亮和黑暗。一群烏鴉大聲嘎嘎而鳴。一條小巷上有五名壯碩高大的警察，面對一排圍欄不疾不徐、不失莊嚴地同時小解。一群喝醉的青少年全身西方朋克裝束，跌跌撞撞地走在街上，不斷叫喊。我企圖招出租車卻始終無法如愿，不得不搭上公交車。在詢問這輛車是否前往布拉迪斯拉發時，只得到對方粗魯地回吼一句。

精疲力竭。一個后戰后社會。當你知道這一切的結果，即這種事情永遠都不會結束，且總是帶來惡果時，你要如何懷抱著熱誠前進？

我在永遠離開捷克之前，首度發了頓典型的旅人脾氣。事情發生在捷克旅行社（Čedok Travel Agency）。我去那里其實是辦一件最簡單的事：我想買張車票去距離此間不到三個鐘頭車程的布達佩斯（Budapest），那應該是最繁忙的路線之一。坐在玻璃柜臺后的女子看著我，仿佛我讓她做的是最不合理的工作。時刻表？她輕蔑地聳聳肩。她不知道。能不能請她查查看？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取下一個厚重、沾滿灰塵的表冊，似乎以前從來沒有查閱過。我贊許自己始終維持鎮靜的態度。最后，她終于查到相關信息。能不能幫我訂一張票？她瞪我一眼，仿佛我讓她做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不過她還是坐了下來，幫我訂了一張票。然后，她沒好氣地告訴我，要分到座位，我必須到車站去。聽到這里我終于爆發了。不行，我告訴她，我現在就要分好座位。那女人囂張地轉過身，開始和她的同事聊天。我也囂張地站在玻璃柜臺前，擺出十輛馬車都別想把我拖走的氣勢，相互僵持。幾分鐘過去了，排在我身后的人開始同情而不耐煩地低聲抱怨。終于，那女的沒有表現出如點頭等等的讓步姿勢，只是拿起電話，然后寫了一張紙條，一語不發地推給我，上面是座位號碼。

在整個旅行當中，每次在餐廳、旅館、旅行社、飛機場等處看到西方旅客氣憤地對東歐職員極盡侮辱地斥責，諸如“這里還是一個共產國家！”或“你們活該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時，我都頗不以為然。然而現在，潛藏已久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用詞在下意識中全冒了出來，雖然用的是毫無帝國主義氣勢的波蘭語。我大叫：“這里什么都沒有變！你們再怎么樣都是自己活該！”對我的咆哮，那旅行社職員只是抱以漠然的輕蔑。我大步而去，氣得發抖，當真豈有此理！

火車上，我和一個大約十歲的金發女孩同一車廂。她身穿牛仔褲，系著一條米老鼠的皮帶。和她同行的祖母有雙清澈的藍眼，如果不是滿臉細紋，甚至給人很年輕的感覺。她們說著捷克語，全程都在玩翻繩游戲，或有韻律地拍掌，帶著一種小孩嬉戲的感覺。祖孫間流動著一種快樂、充滿感情的喜愛，是那種一定要透過這種種動作和笑容來代代傳承之物。她們在抵達邊界前的某一站下車，我也很高興在離開捷克前的最后記憶中，能留下這幕美好的畫面。

[[1]](#_1_6)揚·胡斯（1371—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學家和改革家，也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認為一切應該以《圣經》為唯一的依歸，否定教皇的權威性，故被天主教視為異端，將他處以破門律，又將他誘捕燒死。揚·胡斯因殉道留名于世，也是捷克民族主義的標桿。1999年，天主教會正式為胡斯之死道歉。

[[2]](#_2_6)穆夏（1860—1939），捷克籍畫家與裝飾品藝術家。

[[3]](#_3_6)蒙特威爾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4]](#_4_6)托馬斯·馬薩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與愛德華·貝奈斯和米蘭·什特凡尼克一起被稱作“捷克斯洛伐克開國三元勛”。

[[5]](#_5_4)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1901—1986），捷克作家、詩人，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6]](#_6_4)魯道夫·斯蘭斯基（1901—1952），捷克共產黨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曾擔任黨的總書記。于1951年被捕，1952年以猶太復國主義等罪名被判處死刑，1968年被平反。

[[7]](#_7_4)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1896—1953），捷克共產黨領導人。

[[8]](#_8_4)指利奧波多夫監獄，由一座17世紀為抵御奧斯曼土耳其入侵而建的堡壘改造而成，20世紀時以關押政治犯聞名。

[[9]](#_9_4)盧德維克·瓦楚利克（1926—2015），捷克籍作家與記者，秘密出版物時期的重要作家，曾起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的《二千字宣言》。

[[10]](#_10_4)海絲特·白蘭，美國作家霍桑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紅字》中的女主角。已婚的海絲特與牧師丁梅斯代爾產生了愛情，被冠上“通奸”的罪名，被迫終身佩戴紅字“A”。但她不懼眾人的眼光，受盡屈辱卻又堅強而有尊嚴地活著，追求美好愛情和幸福生活。

[[11]](#_11_4)弗蘭斯·哈爾斯（約1582—1666），荷蘭黃金時代肖像畫家，以大膽流暢的筆觸和打破傳統的鮮明畫風聞名于世。

[[12]](#_12_4)米爾頓·弗里德曼（1912—2006），美國經濟學家，貨幣主義代表人物，以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13]](#_13_4)馬勒（1860—1911），奧地利作曲家及指揮家，是19世紀德奧傳統和20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音樂之間承前啟后的橋梁。

[[14]](#_14_4)弗朗茨·韋爾弗（1890 ——1945），出生于捷克的奧地利作家，活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15]](#_15_4)馬克斯·勃羅德（1884—1968），捷克猶太作家。

[[16]](#_16_4)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猶太人區，用德語寫作，與捷克文化也有隔閡，一度不被捷克人承認為自己的作家。

[[17]](#_17_4)俄羅斯知名汽車品牌。

[[18]](#_18_4)約瑟夫·什克沃雷茨基（1924—2012），捷克作家及出版商。他的作品風格多樣，所寫偵探小說聞名捷克文壇。

[[19]](#_19_4)米洛斯·福爾曼（1932—2018），猶太人，捷克裔美國籍電影導演、編劇，曾憑《飛越瘋人院》和《莫扎特傳》兩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20]](#_20_4)雷諾阿（1841—1919），著名的法國畫家，也是印象派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21]](#_21_4)指為了他人而甘愿犧牲自己。

[[22]](#_22_4)白山之戰，發生于1620年11月8日，是三十年戰爭早期的一場戰役，也結束了三十年戰爭的波希米亞階段。

[[23]](#_23_4)弗蘭茨·約瑟夫（1830—1916），奧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國王，后成為奧匈帝國締造者和第一位皇帝，在1850—1866年間，還曾擔任德意志邦聯總統。

[[24]](#_24_4)奧匈帝國期間，以這個詞稱奧地利社會。

[[25]](#_25_4)羅伯特·穆齊爾（1880—1942），奧地利作家。奧匈帝國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國。他未完成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小說之一。

[[26]](#_26_2)拉比是猶太人中的一個特殊階層，指接受過正規猶太教育，系統學習過猶太教經典，擔任猶太人社團或猶太教教會精神領袖，或在猶太經學院中傳授猶太教教義者，主要為有學問的學者。

[[27]](#_27_2)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首都。

[[28]](#_28_2)維爾諾，維爾紐斯（Vilnius）舊稱，立陶宛首都。

[[29]](#_29_2)伊凡·克里瑪（1931—），出身猶太家庭的捷克小說家和劇作家，通過《被審判的法官》等小說反對強權政治，號召民主與正義，其作品被禁止出版達二十年，只能夠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傳。

[[30]](#_30_2)英語童謠中的形象。一個廣為流傳的版本是：“矮胖子，坐墻頭，栽了一個大跟頭。國王呀，齊兵馬，破鏡難圓沒辦法。”后被引申比喻處于危險境地的人，或打破后難以復原的事物。

[[31]](#_31_2)1993年1月1日，捷克與斯洛伐克正式解體，成為兩個獨立國家。

[[32]](#_32_2)捷克克魯姆洛夫，南波希米亞小鎮，保持了中世紀的風貌，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33]](#_33_2)米羅（1893—1983），西班牙畫家、雕塑家、陶藝家和版畫家，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

[[34]](#_34_2)帕斯卡（1623—1662），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帕斯卡假定所有人類對上帝存不存在下注，并假設在上帝可能存在的情況下，信者和不信者會分別得到無限的收益或受到無限大的損失。他的結論是一個理性的人應該相信上帝存在，因為上帝存在，則信者受益無窮；反之，若上帝實際上并不存在，信者的損失也有限，頂多失去一些樂趣和享受而已。由此推論，相信上帝存在，方是穩賺少賠的賭注。

[[35]](#_35_2)1978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以監視蘇聯對《赫爾辛基協定》的執行情況為宗旨。該協定于1975年由三十五國共同簽訂，明確將人權引入美國與蘇聯關系的主流，使得擴張主義受到各國的集體制約。許多專家也認為《赫爾辛基協定》對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垮臺，確實起了推波助瀾之作用。

[[36]](#_36)古希臘神話人物，具有預知未來的稟賦，但因為抗拒阿波羅，說的話不為人所相信。

[[37]](#_37)胡梅爾（1778—1837），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奧地利作曲家與鋼琴家。

[[38]](#_38)蒂索神父（1887—1947），斯洛伐克羅馬天主教神父，曾為斯洛伐克人民黨領袖之一。1939—1945年為納粹的斯洛伐克共和國傀儡政府首腦，參與迫害猶太人之舉，二戰后被處死。

[[39]](#_39)埃利亞斯·卡內蒂（1905—1994），保加利亞出生的猶太裔作家，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德語寫作。

[[40]](#_40)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蘭著名的詩人、翻譯家、散文家和外交官，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1]](#_41)雅恩·帕托什卡（1907—1977），捷克哲學家，《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

[[42]](#_42)馬格里特（1898—1967），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因其作品中帶有些許詼諧以及許多引人深思的符號語言而聞名。

# 第四章 匈牙利

布達佩斯的火車西站（Nyugati）給人更南方的感覺，此站與埃菲爾鐵塔由同一個建筑師設計。美麗的玻璃屋頂下面，有點像巴黎建造于世紀末的豪華火車站，只是氣味比較刺鼻，整體外觀也比華沙或布拉格還多點橄欖色。只見赤腳的吉卜賽人身上穿著飄逸的多彩服飾，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1]](#_1_9)農婦身穿一層又一層僵硬的裙子，有個人把全身赤裸的孩子舉在一個造型雅致的小噴泉上方，隨處可聞見水果汁和西紅柿汁的味道。

我相當緊張地環顧龐大的車站：哪里可以招到出租車？我該如何拖著行李走過去？我一句匈牙利語都不會。不過正當我提起行李時，一個男的朝我走來。“德文？法文？英文？”我們選定使用哪種語言后，他便非常有禮貌地護送我去搭出租車，然后自行返回車站。那人顯然是車站向導之類的人員，專門替迷茫的旅人指點迷津。匈牙利的觀光旅游業發展得比其他鄰近國家都早，他們的準備也更為充分。

我此行居住的街道暗蒙蒙的，一種東歐式的黑暗，沒有霓虹燈，沒有街燈，但也沒有恐懼。幾乎是鄉村的那種黑暗。“是霍夫曼女士嗎？”一個帶有曼妙匈牙利口音的聲音從一扇窗里傳出來。有人照原先所約定的在等我。別人告訴我，我所住的街道名稱叫倫巴赫·塞巴斯蒂安（Rumbach Sebastyén），正如紐約的德蘭西街（Delancey Street）一樣，是有其特殊含義的。昔日這里是猶太區的正中心，如今卻只是布達佩斯一個被荒廢、遺忘的角落。不過，負責管理我所租公寓的婦人，倒是標準的匈牙利式猶太老婦：頭戴假發，身材小巧，貌似溫和，但有著舍監果斷的聲音和舉止。她為我買了幾種早餐食品，然后在一張紙上寫出價格，徑自用德文幫我加總。我不懂德文，但是這點并不足以阻止她全程用德文跟我對話。她帶我參觀我所租的小套房，值得慶幸的是其中備有若干生活設施：一間私人浴室、一部電話和一臺大電視。我的房東顯然頗以那臺電視為傲，特意提高音量試圖向我解釋些什么，仿佛這樣便可以刺破我的愚昧。

等她離開后，我馬上瀏覽各電視頻道，好看她究竟在得意什么。當然，有一個是匈牙利頻道，不過也有捷克、俄國和德國的，德國頻道正在播放隱晦的情色節目；還有些流行頻道，循環播放即將來訪的搖滾音樂會在歐洲大陸的演出時刻表以填補空白的時段。如果布達佩斯比波蘭或捷克更靠近南方，那么它實際上也更西化。

從我房間窗戶往外看，可見一個條狀的狹窄深幽院落，漆黑如墨，只有幾間公寓的燈火點綴其間。窗外傳來電視、做飯和聊天的聲音。當我逐漸入睡時，一首天籟般的舒伯特奏鳴曲從某處傳來，聲音出奇地清晰；接著是月色般充滿渴念的馬扎爾（Magyar）[[2]](#_2_9)樂曲，仿佛暗示這里文明與野蠻、東方與西方的混合多少仍系屬中歐。如果匈牙利比較靠近南邊，接近西方，那么——我應當記得的——這里也就不偏不倚，正好坐落于歐洲中央。

我在布達佩斯打了好幾通電話，都沒有下文，這里的通訊情況比華沙還糟糕，四次中有三次沒有撥號音，不然就是錯誤的忙線信號，或是微弱的電話掛斷聲。然后，比華沙更常見的現象是：沒人應答，或接電話的人勸我在早上8點前再打過去。布達佩斯是個早起、工作勤奮的忙碌都市。匈牙利人習慣同時做兩份工作，或者到處兼差。目前物價攀升飛快，薪水趕不上物價，有些人逐漸致富，人人都變得更有求勝心，工作也變得比以前更加勤快。

街頭到處可見忙碌的景象。布達佩斯的節奏、步調和交通都不亞于東歐其他大都市，此外還擁有東歐令人印象深刻的空氣污染。烈日炎炎中被塞在車陣里，對呼吸系統真是一項嚴峻的考驗，即使最油滑的出租車司機也被迫接受長時間的等待，不過他們為擺脫塞車所采用的行車技巧，就算以紐約的標準來看，亦令人嘆為觀止。

我在凱悅酒店（Hyatt Hotel）的咖啡廳小坐時遇到兩名英國婦女，她們埋怨布達佩斯毫無魅力，跟西方都市一樣，而且越來越西化。其中一名婦女記得開放前游覽時，這里還是一片灰暗與沉郁，對于獵奇的目光也比較有吸引力。我也記得二十多年前還是學生時，曾經短暫來訪，見識過布達佩斯沉郁的一面。當時人們都低著頭走路，肩上似乎永遠扛著沉重的負擔。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也經歷了二十年卡達爾·亞諾什（Kádár János）[[3]](#_3_9)和其“古拉什共產主義”（goulash Communism）[[4]](#_4_9)的治理，結合一黨專政和若干經濟自由政策，使得匈牙利成為東歐集團中發展最快的國家。今日的匈牙利，男人西裝筆挺，女人手執公文包，來回穿梭，各個忙于拼搏，面無表情。盡管我也愿意抵制異國情調的誘惑，但是就外表看來，布達佩斯的確太“正常”、太西化了，令我不免有不知身處何方的感覺。在這一切當中，東歐何在？我在看什么，或在搜尋什么？我們需要不同或相反的色調，才能激發不同的感受。但是布達佩斯市中心所展示的，正是現代都會的生活寫實：廢氣、人群、眾多商店，外加餐館林立。雖然大部分仍是低調和實用性的，但是在比較高級的小區，一些精品店幾乎像是巴黎或維也納風格，價格也同樣高檔。

盡管所有物品都越來越容易取得，但有一樣東西在東歐各地卻逐漸稀少，那就是時間。昔日這里的時間是不同的，充足而緩慢。有漫長的暑假，有持續到半夜的對話，人們會凝視窗外，看看那個下午他們的街道上會發生什么事……沒有需要趕時間的理由，沒有遠大的志向或財富以追求。而現在東歐各地的時間都加快了腳步，因為可能有什么需要趕著處理，日歷上開始布滿潦草書寫的記事，人們也學會說：“好的，我可以給你十五分鐘，我們快速碰個面。”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根本的轉變，就像轉變為多黨制一樣，因為時間的分配會影響我們和他人最深層的關系，也會影響我們自己的經歷。從現在開始，咖啡閑話的機會減少了，人們不再悠閑地邊喝咖啡邊閑話家常、觀察別人。單純凝視和緩緩思考的時刻減少了，臨時興起、不必事先約定便突然造訪的情況也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忙于生計，忙于重建這個世界。不過這樣一來，或許也可以減少反復品味生命不公的時間，持續、刻薄地觀察鄰居的時間，或因為欠缺希望和目的而虛度的單調乏味、毫無長進的時間。

所有匈牙利人都抱怨匈牙利人的不滿實在太多。的確，不太可能找到一個人承認這些變化真的有帶來任何好處。“什么事都沒有改變，”人們都熱切地向我確證，“真的一件都沒有。”

由于和波蘭一樣，這里暗黑的反諷似乎也關乎榮譽，因此對這類話的可信性我應該大為保留。不過這種對改革的無感，或許也反映出若干事實。“革命”在匈牙利發展過程中的位置，和波蘭或捷克不一樣，因此匈牙利走向“正常”國家的距離也明顯地比較短。在卡達爾統治二十年后，匈牙利已經擁有了私人企業所需要的現成基礎建設，1989年來臨時，共產主義事實上已經承認放棄意識形態的幽魂。在舊有政治和社會體制垮臺之前，新的政治結構已然成形。1980年代中期，異議分子已經分裂為兩個敵對團體，亦即日后兩個主要政黨的雛形。所以在隨后相繼出現的后共產主義時期的病態和綜合征上，匈牙利也表現得更為深遠。匈牙利幾乎沒有歡喜擁抱團結一致的階段。目前當權的是幾個定義非常清晰的政黨，外加“匈牙利民主論壇”（Magyar Democratic Forum，MDF）這個從異議團體發展而成的保守政黨。這種情況在東歐隨處可見，儼然成為后共產主義無法避免的邏輯。進步的異議分子在短暫的發光發熱后，便注定走向分裂。

在倉促走過后續階段的現在，匈牙利甚至已經達到了西方水平的政治冷漠。據我了解，上一次地方選舉，大約只有百分之八的人現身投票。

人們談起政府，仿佛視其為某種輕歌劇，只是不幸多了嚴肅和令人煩惱的一面。對于象征性事情永無止境的討論，比如匈牙利國旗上的紋章是否應該采用古老的圣斯蒂芬王冠，人們聽了只會翻白眼。我還聽說國會經常上演矯作的論戰戲碼，不過有些人將辯論的激昂歸咎于匈牙利語，因為這種語言本身內含炫耀與戲劇化的夸張傾向。

我個人則傾向認為國會大廈建筑本身或許才該為那些夸張的傾向負責。如果語言會影響政治的風格，那么政治操作的舞臺自然不遑多讓，而匈牙利國會大廈的建筑和裝潢可謂招致過度自負的始作俑者。國會大廈建于19世紀末，正值奧匈帝國的輝煌時期，因之彰顯出一種宏偉壯闊的氣派。國會大廈新哥特式的外觀，層疊綿延著拱門、穹頂、鐘樓，以及設計精致的入口。主廳并不大，但是金光閃閃的裝潢、光彩燦爛的水晶吊燈，以及新哥特式的木雕，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這種內部裝潢不啻鼓勵最謙卑的政治家也墮入王爾德的名言：“人生的首要任務，是盡其可能地矯揉造作；第二任務為何，則迄今無人知曉。”匈牙利民主論壇黨的批評者告訴我，該黨自從掌權后，便落入幾近專橫的姿態。在政治變革后，該黨以一紙行政命令規定學校應該加入宗教課程，不過那項命令隨后便遭撤回。另一方面，一位知名的政府發言人宣稱：“既然我們贏得選舉，新聞界現在就是屬于我們的。”民主精神中限制自我權力、友善與人分享權力等特性，在剛開始一定顯得相當別扭。除了行動引起質疑外，東歐的政客們還沒有完全習慣平等主義和權力分享的思維方式。

康拉德·哲爾吉（Konrád György）[[5]](#_5_7)或許是匈牙利最有名的作家了。他有一張我眼中典型的中歐臉，帶著濃厚懷疑色彩的神情，甚至散發出哀傷的感覺。眼神嚴肅而警戒，似乎有種引人不安的力量。“情況有很戲劇性的變化，卻也可以說毫無變化。”他說道，似乎對兩者均感不耐。

“我對于戲劇性的變化很有興趣，”我說，“因為每個人都告訴我毫無變化。”

“語言改變了，”他說，“以前僵化的語言不見了，現在人們可以掌控自己的語言，卻很難找到有創意的語言，已經出現了一大堆新的陳腔濫調。”

“哪種陳腔濫調？”

“有關民主的陳腔濫調。”

當然。我在東歐到處都可以聽到——高談闊論包容性、多元主義、個人權利和人權，全是很高貴的理想，但也很快便會令人感到陳腐，就像所有變成官方宣傳口號的東西一樣。重復性的語言會造成表達與含義的不符，因為容易形成無意識的自動表達。

但是人們的生活情況呢？現在有沒有什么改變？

他聳聳肩。“對于根本性的問題，人們可能持有不同的想法。”他一語帶過，仿佛不愿刻意強調這句話，“但認為他們在雅魯澤爾斯基的統治下不快樂，在馬佐維耶茨基的統治下就會快樂是錯的。不管來的是哪個‘基’，總有幸與不幸，有希望和絕望。”

不錯。對我而言，這點似乎終于正確地描繪出改變后此間所發生的情況：一個可以同時概括最近一連串事件所帶來的震撼，以及隨后籠罩東歐的奇特寧靜的注解。我們太了解烏托邦式希望所輕易點燃的革命、歷史與進步的循環，以及隨之而來的倒退；我們也太了解許多政治體制及其限制，以及政治本身的限制。政治可以讓情況變得比較能夠容忍或者難以容忍，但是面對人類社會，像是嫉妒、年齡、爭權奪利、對愛情失望，甚至是普通小感冒，政治都無能為力。踏入“正常”世界很難讓人天真地滿腔熱血，因為那個“正常”世界的缺點，一樣那么顯眼。

“但是讓我告訴你一個相當戲劇化的故事，”正當我準備舒適地沉浸于這個宿命論的觀點時，康拉德卻說，“幾個月前，一個秘密警察來找我——不錯，還是原來的那些秘密警察——一個非常好的人，非常有禮貌。他客客氣氣地告訴我他們想要移除我家里的監聽設備。大部分情況下，他們移除監聽設備是不會讓對方知道的，但是其中大概有十七個案子，他們想要公開執行，從而讓每個人都知道移除監聽設備的行動已經展開。他非常擔心我太太，怕她知道我們家有監聽設備會昏倒。”康拉德一臉好笑的神情，“我告訴他，我太太不會有問題的。”

我必須承認這段話讓我相當驚訝。匈牙利在卡達爾統治的最后幾年相當“自由”，以致我還以為監聽行為早已落伍。不過，一個政治體制能夠實現什么固然有外部的限制，但內部的限制，即使是最開放的政權，顯然也是緊縮狹窄的。

我那新近回歸祖國的捷克友人馬丁前來訪問幾天，不過馬上對每件事抱怨連連。布達佩斯的多瑙河太寬了，比例不夠完美，不如捷克的伏爾塔瓦河。布達佩斯太灰暗，布達山脈（Buda Hills）蔓延太廣，不像布拉格的山脈剛勁挺拔。

的確，這一段多瑙河河面寬廣，河水洶涌、灰暗，滿是垃圾雜物，毫無詩情畫意之感。河水一邊，較古老的布達爬升好幾層山坡；河水另一邊，平坦的佩斯則貿易欣欣向榮。設計優美的橋梁，全是納粹陸軍撤退時無端炸毀后重新建造的，綿延跨越兩岸，因煙霧和車流，顯得隱晦而朦朧。布達佩斯建筑規模之浮夸也令人側目。就地緣政治而言，匈牙利幾乎和波蘭一樣處于不利之地，但是在帝國掠奪的年代，匈牙利則比較幸運。基于1867年的折中方案，奧匈雙帝國成立，匈牙利亦成為羅馬尼亞和若干斯拉夫民族的帝國統御者。19世紀末期，匈牙利人甚至會嚴肅討論“匈牙利至上”及“天賜大匈牙利”，亦即歷史上所有曾隸屬于匈牙利的土地，終將整合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夢想。布達佩斯的大部分設計和建筑都是在這段民族優越期完成的，因此反映出當時匈牙利的光榮意識。比如其中心干道有如巴黎的奧斯曼式大道一樣寬廣，許多年代較久遠的公寓建筑也大得離奇。

但是布達佩斯畢竟是一個東歐城市，規模氣派的建筑是和煤煙、塵垢與凌亂的外觀相互依存的。我逐漸喜歡上這種結合，喜歡布達佩斯的嚴謹風格，與其徑自展現歷史創傷的那種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的態度。有些狀似高貴的雄偉建筑，似乎好幾個世紀沒有整修；許多平常建筑的石墻外壁還遺留有密密麻麻的彈孔，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也有可能是1956年抵抗拉科西·馬加什（Rákosi Mátyás）[[6]](#_6_7)斯大林政權時所留下的。布達佩斯曾數度遭到包圍，并英勇抵抗。

總之，布達佩斯的感覺像是佛羅倫薩，乃至布拉格的小威尼斯，是座嚴肅的都市，而絕非夢幻之城。對其而言，美麗是鑲嵌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不過，就瓦茨街（Váci Utca）而言，其標準和規模又另當別論。這是條迷人的狹窄街道，也是主要的旅游景點，被點綴得光鮮亮麗。瓦茨街是布達佩斯若干中歐韻味達到極致的地方之一，其魅力部分來自昔日的風采。18世紀末時，這條街就已經非常時髦了，有些咖啡店和古書店在此地已存在許久。在其中一個小廣場上，有座迷人的女孩手持魚簍的雕像，優雅地噴著泉水。這些小雕像和噴泉是布達佩斯美麗的特色，一種介于居家和公共藝術之間的藝術形態，是介于寬廣的都市景觀和親密凝視之間的存在。

布達佩斯人對于瓦茨街和其上的現代飯店，以及貫穿其間的步行拱廊，感到非常驕傲。“有種置身米蘭的感覺。”一個朋友如此形容。比較昂貴的店面閃爍著上好皮革的光澤、珍貴珠寶的璀璨，以及匈牙利刺繡的明亮色彩。有的地方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沖洗出照片，阿迪達斯專賣店前永遠有人在排隊，還有一家麥當勞，在周遭景觀的映襯下顯得格外俗麗而丑陋，不過我的匈牙利朋友們似乎也引以為傲，每次都試圖拖我去光顧——雖然一直沒有成功。

觀光客熙來攘往，奧地利、德國和荷蘭的訪客面帶疑惑地注視著標價；多是阿拉伯人的貨幣兌換商拉著觀光客的袖子，在耳邊低聲透露兌換匯率；還有個黑人手持海報，為一家脫衣舞夜總會做廣告。這就是共產主義結束后的東歐。

一天中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看見成排的特蘭西瓦尼亞農民站在瓦茨街上。他們從世界上更為貧窮的地區前來此地，販賣一些小商品。他們的面容和舉止反映出都市環境中若干幾乎被遺忘的東西，諸如最基本的健康、自尊或單純。他們皮膚紅潤，身材結實，目光直接而清澈，笑容坦誠而快樂。以一種農村的文化，他們全都穿著同一樣式的衣服，女人一身漿挺的白上衣，寬大的裙子，上面繡著同一款式的精細花樣，頭上戴著頭巾；男人則身穿雪白襯衫，外面套著繡花背心。販賣的商品也裝飾著若干重復的樣式和花紋：包括厚亞麻布做的桌布，上面裝飾有粗工刺繡的大花；陶器上有漂亮的綠色釉彩；還有繪制了宗教畫的玻璃等等。盡管這份生意的收入對他們而言應該相當重要，但是他們絕不推銷或乞求，就只是挺直了身體站著，手持一條桌布或女式襯衫，不帶任何表情地看著來往的路人。

我有一次靠近他們想要仔細看看商品，結果幾個警察朝我們走來，打斷了交易。那些特蘭西瓦尼亞人身手矯健，連同他們的商品一溜煙似地消失在人群中。我留在原地，驚奇地注視著這迅速的消失，滿心好奇那些警察在按什么規矩行事，因為那些特蘭西瓦尼亞人在眾目睽睽之下站在街上，連續幾個鐘頭都沒有受到干擾。這一定又是一套東歐人最擅長的“你假裝來捉，我假裝來藏”的游戲，說不定現在還在玩，僅僅出于習慣。

夜幕低垂，即使破舊的市容也變得迷人，浮夸轉變為寧靜的輝煌。當多瑙河成串珍珠似的街燈在水面投射出倒影時，布達山脈的峰巒也形成一道綿長的漆黑線條，其中只點綴著照明的紀念碑。從佩斯方向看去，布達城堡區以及附近馬加什教堂（Matthias Church）的哥特式尖塔成為視線的焦點。從布達往佩斯方向看去，目光的焦點則集中在壯麗輝煌的國會大廈及其在水中縹緲的分身上。沿著多瑙河往遠處看，是一連串燈光閃爍的橋梁和蕩漾在水中的倒影。

馬丁和我坐在佩斯一側沿著多瑙河開設的一家露天餐廳里。他對食物頗多抱怨，認為不如自己家鄉品種多樣。就我而言，這家餐廳的食物算是頗差的。不過話說回來，整個匈牙利的烹飪都乏善可陳。昔日出名的匈牙利料理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每樣食物都泡在油水和一種無色的辣椒醬里。新鮮蔬菜似乎已被排除在餐廳的食材之外，和布拉格的情況不相上下，或許同樣基于過度健康的理由。送來的甜點上面涂滿鮮奶油。一個吉卜賽樂團震耳欲聾地演奏著過于繁復的曲調：純粹是對靈魂的震撼。周遭充斥著迷人，也令人迷惑的匈牙利語，帶有巴托克式的切分音和愉悅感。即使在說英語時，匈牙利人都會注入他們自己語言特有的韻律和柔軟，產生一種奇特、微弱的低回。

布達佩斯的晚間文人聚會，乍看之下，會讓人以為是紐約曼哈頓上西區的聚會，只除了這里普遍穿得比較正式，禮貌也比較周全。這個匈牙利的新興階級還沒有完全習得那種簡潔冷漠的矯揉之姿，或故意展現的低調之態。在布置老式而奇特的小客廳里——一個從廚房區隔出來的空間，放置著厚絨豪華型座椅和沙發——人們情緒高漲，對話慧黠犀利。一對公開的同性戀伴侶，幾人曾經就職于西方職場，而且幾乎每個人都已經離婚。他們的話題包括新的雜志，以及房地產價格——至少在商用地產方面，這里已經遠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每個人都說得一口無可挑剔的英語，而且大部分還流利掌握其他數種外語，不過他們在“他”和“她”兩字的使用上卻奇特地漫不經心。有人告訴我，匈牙利人沒有這種性別上的區分用法，雖然我很難想象這樣一種語言上的狀態，但顯然對匈牙利人而言，即便是在其他語言中，女性和男性的區別也無關緊要。

不過，我終究是身在東歐，而不是曼哈頓。一旦開始聊起一些軼事，我馬上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一個激進派的經濟學家告訴我，要讓工廠員工放棄原來的社會主義工會而加入新的工會，是件很困難的事，原因很簡單，原工會仍掌握著飯店和度假溫泉——在意識形態和度假之間，大部分人會毫不猶疑地選擇后者。另一個人講了一個有關匈牙利人經濟上急于靠近奧地利的笑話。“你們知道奧匈足球賽誰輸了嗎？”那笑話是這么說的。“不知道。誰？”“意大利。”

“啊！這個笑話是以前哈布斯堡時期經常講的。”有個人指出。

當宴會女主人茹饒（Zsuzsa）熱切地談起我在短短數日內所聽到的第二個有關竊聽的故事時，典型東歐的感覺便更加強烈了。原來在卡達爾時期的匈牙利竟有這么多竊聽事件！

宴會男女主人的情況最近大為好轉。彼德（Péter）這位活力充沛、非常聰明、雙眼永遠閃爍著敏銳興味的男主人，被任命出任一個高級學術職位；而直到不久前，他可還是匈牙利遭到嚴厲迫害的異議分子之一，沒有工作，被不斷騷擾長達數年之久。

在那些年間，茹饒和彼德非常清楚他們樓上的鄰居就是告密的人，也就是說他們公寓里有監聽設備，樓上的人可以記錄他們在公寓中的一言一行，之后再轉交給警方。可以想見這兩對夫妻平常是不講話的。彼德性情比較溫和，會忍不住在電梯里跟對方點頭打招呼；個性比較強硬的茹饒則堅守立場，完全無視對方的存在。然后有一天，樓上的男主人打破沉默，要求彼德跟他聊聊。在小酒館里，那男的悶悶不樂地喝酒，然后借著酒力承認他已經負責監聽彼德好幾年了，如今他再也無法忍受這份骯臟的工作。他喜歡彼德，良心上覺得非常痛苦。總之，他希望彼德知道，他已經打算切斷監聽系統。

彼德是個仁慈又理性的人，他勸這位鄰居不要采取這么激烈的行動。彼德指出，他不做，還會有其他人來做，同時這位鄰居還會惹上麻煩，也許會失業。不管怎樣，接下來幾個星期，他們每次碰面時，鄰居男子對彼德和茹饒都顯得異常高興和友善，仿佛卸下了重擔。然而之后，他們之間再度恢復陰郁的沉默，彼德和茹饒猜想他們一定又重新展開了監聽行動。

那些插曲發生后兩年，匈牙利發生了比較重大的改變，這兩對夫妻的情況也完全反轉。彼德突然被平反，有了名氣，還接受訪問；鄰居夫妻則突然停止了監聽游戲。

“從這時開始，故事也從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轉變為巴爾扎克（Balzac）了。”茹饒皺著眉頭說。某天，她在公寓前遛狗時，樓上的鄰居太太走了過來。這次，鄰居太太跟她打了聲招呼，然后尷尬地企圖跟她談話。她們逗弄著狗，假裝這幾年間沒有發生任何事。鄰居太太表示很高興見到彼德出現在最近一個電視節目中。（“她當然很高興，”有人插口道，“她或許還很驕傲，因為她對彼德太了解了。”）

“不過，接下來這部分應該值得分析一下，”茹饒繼續道，“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對，竟然邀請她上來喝杯茶。”

來到公寓后，鄰居太太很熱切地到處參觀，興奮地嚷著這一切有多么時髦，多么美好。“喔！我一直很想看看這里裝修的結果怎么樣。”她說著，不知道自己的話里泄露了多少秘密。他們顯然一直利用監聽設備追蹤這間公寓的裝修工作。

接著，故事轉入一個沒有文學先例可循的方向，因為這種事只發生在后共產主義時期的東歐。鄰居太太熱切地轉向茹饒。“拜托你，”她說，“你也許可以運用你們的影響力幫助我們。你知道，我們以前在巴拉頓湖（Lake Balaton）[[7]](#_7_7)有點家產，但是1948年被那些混蛋奪走了。我們試圖拿回來，但有點問題。那些混蛋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不過你們，你們有關系，你們可以幫我們一點忙。”

茹饒說，她驚愕地聽著鄰居太太的話，勉強含混地回答，她不認為自己有力量可以做什么。故事就此結束，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有人建議，這些素材可以拍一部電視連續劇了，名字就叫《鄰居》，兩對夫妻的家運盛衰可以延伸到新的時代。東歐形式的鄰居，以其特殊的親密性，可以輾轉發展為同心協力或是卑鄙貪婪的關系。這種親密性凝聚成一道緊密熱切的道德古拉什濃湯，東歐民眾已經領會了其間的生存之道，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空間和閑情逸致去追求理想中的道德純凈；而在比較富有和自由的國度，我們偶爾會高唱道德純凈的理想，盡管也極少能在生活中具體實踐。

權力殘酷的親密性：間諜與被監視對象之間偷窺似的聯結，施虐者和被虐者間的殘酷聯結，導致面對面的接觸對雙方都極具沖擊性。在聽說茹饒的故事后幾天，有人告訴我更早時期的一段際遇，也是一次有如普通“鄰居”間的晤面，卻同樣荒誕不經。向我講述的這名婦人說她在1949年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公審中曾遭受迫害。數年以后，她待在一家劇院的門廳時，有兩個男人朝她走來。“你認識我嗎？”其中一個男的問道。“不認識。”她先是回答。那男的聽了用兩手遮住臉部，只從指縫中露出眼睛，正是當年遭迫害時她所見到的模樣。

“現在認得了嗎？”那人又問。

“喔，對。認出來了。”她回答。

“那我呢？”另一個男的也問，“你知道我是誰嗎？”

她更仔細地端詳那男子。“你，你是以前經常打我的人。”她回答。

“呃，那你想怎么樣？”那男子友善地反問，“我只是奉命行事。”

“對，”她回答，“但你也不需要打那么用力啊！”

然后他們一起走進劇院，觀賞表演。

芬芳的布達山坡。一條陡直的街道，古樹茂密，有如置身公園；恣意蔓延的花園，茂密的枯黃野草；占地寬廣的別墅，斑駁褪色，土石塌陷，色彩蒼白。正是塔可夫斯基（Tarkovsky）[[8]](#_8_7)電影里的場景。我來拜訪卡塔林（Katalin）這位剛認識的朋友。在她的公寓里，褪色的毯子優雅地垂放在沙發和書桌上，墻壁上懸掛著幾幅農村風景畫，還有一幅名叫帕恩（Pan）的鄉村男孩的畫像。從陽臺上可以遠眺布達山坡蜿蜒直達多瑙河的絕妙景色，以及壯麗的城市遠景。我們坐在陽臺上啜著飲料。卡塔林身材高挑輕盈，頭發盤于頸部，容貌間永遠帶著抹沉思與憂愁。

她柔聲告訴我她的成長情形，以及何以直到此刻才開始借由心理分析，挖掘她的猶太背景。出于某種原因，猶太背景戰后在此地比在波蘭更是禁忌的話題，她家里對此就從來不提。她知道她的身份背景中掩藏著秘密，問題是一知半解比完全喪失記憶更為令人困擾。她還記得祖父曾帶她去過一間猶太會堂，曾在家族聚會中間接聽到有關戰爭的創傷，也感覺到某些事情上蒙著一層迷霧。“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故事，”她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又該拿新獲得的知識怎么辦。你知道這種情況有多讓人苦惱嗎？”所以現在，仿佛對秘密展開驅魔行動，或至少讓秘密攤在陽光下，她對猶太教變得非常熱衷。身為學校教師，她正考慮前往布達佩斯新開的一家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9]](#_9_7)學校任教。

近期在匈牙利有類似復興猶太意識的風潮，也有對反猶主義復萌的擔憂。匈牙利的猶太人數居東歐之冠，有八到十萬之多，大部分集中于布達佩斯。在劇變開始之初，有人擔心在猶太人居重要職位的行業，尤其是媒體界，可能會發生叛亂。執政黨推出一種陳腐的戰前式區分，一邊是“平民主義者”，即所謂依附于鄉村與土地的真正的愛國分子；另一邊是“都市主義者”，即代表都市知識分子，并主張猶太人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的人。不過盡管喧囂不斷，嘈雜中倒是不見真正行動，種種跡象也顯示匈牙利并沒有真正步上反猶主義之途。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無端遭到開除；主要的反對黨自由民主聯盟（Free Democrats Union）中，有許多領袖是猶太人和革新的知識分子，盡管選戰中其他政黨毫不隱諱地用反猶太的戰略加以攻擊，但他們仍獲得選票支持。于是我樂觀地期望，或許反猶主義令人反感的言論終會逐漸喪失說服力以及對民眾幻想的操控吧。

“精神分裂”一詞經常出現在匈牙利人的對話中。人們談起過去真覺得自己有精神分裂癥，覺得自我分裂或有雙重人格，那種感覺甚至到現在還在折磨著他們。或許應該說特別是現在，自從——啊！這一點他們還是承認的！——自從整個體系改變以后。

也許這個詞就是匈牙利人性格中最自我標榜的特質：憂郁，正如波蘭人一樣。這種特質部分出于靈魂的抒情風格，出于英雄沖動的對立面，出于寧以輝煌壯烈之姿孤注一擲的性情。我所了解的匈牙利式憂郁英勇、迷人，夾雜著歡樂的多變氣質。在精神病癥領域里人們原本可能更糟的，這樣算是不錯的了。

但，不是這樣的，這里的“精神分裂”似乎跟我在波蘭或捷克所聽到的事又代表著不同的意思。在和社會學者加博爾（Gábor）對談的下午，這種情況再度發生。而據我所知，加博爾有份雖不太有趣，但十分正當的工作，他應該沒有理由有這種感覺——不管“這種”指的是什么，我難以理解其內涵。“是不是大家，比如你，都必須做很大的改變，才能適應新的環境？”當他提到這些日子他奇特地有種“精神分裂”的感覺時，我不禁開口問他。

“不，不是的，”他回答道，“只是我們過去的二十年正面臨不同的評價。我必須重新思考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而我不確定……呃，我不確定我的立場在哪里，或者應該采取什么立場。你瞧，我們太常自欺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讓你感覺自責？你是不是覺得有什么事是不該做的？”

“不，也不算是，”他說著，表情豐富的臉上閃過一絲沮喪，“只是如果不思考的話，有上百種存心欺騙的辦法，而顯然，你就是不會去思考。你沒有辦法每天都思考你的原始動機何在，否則你永遠進不了辦公室。但是現在，我晚上總睡不著，一直在想某篇有關匈牙利少數民族的文章是不是完全真實的，或者我是不是并沒有說出我應該說的話……呃，我就是不知道。因為我甚至在了解某些事情之前，就已經阻止自己去探究了。”

“這樣不是過分謹慎嗎？”我問他，“畢竟，如果你決定留在這里，就必須多少演點戲，不需要真的完全妥協啊！”

“啊，這正是問題所在，”他說，“我們已經搞不清楚什么是妥協，什么不是妥協了。”

“我懂了。”我回答，但其實我還是不懂，至少不完全懂。這是不是匈牙利民族太過敏感的一個例子？

在這次談話之后，我偶然讀到納道什·彼得（Nadas Péter）[[10]](#_10_7)的一篇短篇故事。有人告訴我，他是戰后一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過作品極少被翻譯為英文。這篇故事名叫《一個有關火和知識的故事》（‘A Tale About Fire and Knowledge’），文章形式介于諷刺性詩文和非常復雜晦澀的哲學論文之間。其迂回與精巧的文章論述的是某一國家人們所使用語言的雙重性，以及公共語言如何滲入，成為私人的、內化的語言，結果只余思想上的某種不適，作為記憶的印記，暗示二者曾經的分別。后來某個晚上，這個無名國家火災四起，電視臺亦報道了這次危機。一時激動之際，主播竟然一句話說順嘴，脫離名實不符的雙重語言，傳遞出真正的危機意識。頓時全國為之震驚，用餐的叉子停頓在半空中，因為人們都認出這幾乎被遺忘的真實語氣。之后危機解除，主播再度戴上一如往昔的面具，其他人也同樣暗自松了口氣，恢復原貌。

這個故事讓我對“精神分裂”開始有了線索。如果同樣的故事寫的是波蘭，聽到新聞的觀眾會忙著分析主播字謎游戲后面的“真正”意義；在捷克的版本中，也許永遠都不會發生主播將實情摻入報道中的情況，如果真的這么做了，就只會挑起恐懼的情緒，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主播會為她的失言受到處分。但是在納道什的故事里，字謎游戲已被每個人內化，乃至收聽新聞的人不再知道他們知道些什么，或遺忘了些什么。對照之下，這種更為復雜的雙重性，必定反映了卡達爾時期匈牙利的復雜氛圍——當時政府所提供的酷似真實和自由的一切，民眾有可能信以為真；因此也有可能與之共謀，幾乎淡忘掉原有的疑慮。

但這只是幾乎，卻非完全，因為要完全摒除眾人的疑慮幾乎是不可能的。有太多人仍然記得，盡管卡達爾政權以為人稱道的“古拉什共產主義”收尾，卻畢竟開始于恐懼和背叛。卡達爾早期的生涯是恐懼的最佳范例，情節引人入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是拉科西·馬加什無情政府中的核心一員；在1948年第一次整肅時期，卡達爾受命逮捕拉科西的頭號目標拉伊克·拉斯洛，并負責審訊工作。在黨組織中，拉伊克原本是卡達爾的上司，一個忠貞的斯大林主義者，也是秘密警察的創辦人，自有其殘暴的一面。卡達爾承諾拉伊克，如果他“招供”自己是美國間諜的話，可以免于一死；拉伊克同意了，而不出意料地，下場就是遭到處決。1951年第二次整肅的這一回，輪到卡達爾自己被關，遭到酷刑；直到1955年因另一道司法命令才獲釋。在悲慘的1956年暴動中，他再度憑借背后插刀展示了他的求生技巧。他先是加入一個革命團體，追隨納吉·伊姆雷（Nagy Imre）[[11]](#_11_7)；但幾天后，他便叛逃到蘇聯。在起義活動被蘇聯第二次入侵平定后，卡達爾出現在廣播中，宣布成立一個新的親蘇聯政府，由他自己擔任第一書記。接著又開始背叛曾短暫掌理國務的納吉，口頭答應保障他的安全，實際卻逮捕他和他的同志們。兩年后，經過秘密審判，納吉等人均被處決。（這段資料部分取自帕特里克·布羅根〔Patrick Brogan〕所著《被困縛的國家》〔The Captive Nations〕，該書是研究戰后歐洲極佳的史料。）

卡達爾剛開始執政時，也曾進行他自己的整肅行動，直到后來國家陷入絕境，他才被迫實驗性地增加產業自由化。結果絕大部分匈牙利人都贊許卡達爾的政權，因為相較于其他東歐國家，在私人企業方面，他提供了更多物資、機動性和寬容度。在共產主義末期，前來匈牙利的外國觀察家經常無法分辨匈牙利和西方國家有什么不同；匈牙利人自己也說，他們是“勞改營當中最快樂的營房”——有趣的是，波蘭人也同樣這么形容自己。卡達爾政權嚴酷的開端幾乎被完全從眾人的意識中抹去，直到最終才重新浮現，也就是直到納吉·伊姆雷在1989年被象征性地重新安葬，才敲響了匈牙利共產主義終結的鐘聲。不管如何，人們仍舊無法完全遺忘記憶中那勞改營的起源，或者忘記他們的看守者所提供的不過是一種交易，讓營房內越來越舒服，但外面那爬滿十分漂亮的瑞士常春藤的圍墻，卻永遠都無法拆除。

我想這種模糊的狀態，這種接近正常的“酷似”狀態，便是“精神分裂”的本質所在。在匈牙利應該比在波蘭或捷克更難知道一個人內心真正在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幾乎就跟在西方一樣困難。對于所處體制的情況，一般人會小小地自欺，或者不把實情全盤托出，以便同時相信兩件事。而如果一個人總是坦然地小小自欺，那么現在一定更難跟那段模糊的過去和諧共處：到底是要接受還是拒絕它，是要衷心贊許自己以前的態度，還是真心對那段酷似正常的生命感到痛苦而自責。

我覺得很神奇，在這一切當中，匈牙利微妙的審慎是如何反映人們所生活的復雜環境的？大環境的結構又如何鐫刻與交織在內心的小宇宙中，以不規則的碎片形式，層層包裹纏結？

布達佩斯是個到處都是博物館的城市。我從一家畫廊逛到另一家畫廊，里頭盡是豐富的古老文化的手工藝品。我漫步過一間間龐大的繪畫展示廳，那些畫作明明和西方繪畫息息相關，但對西方世界而言卻是個無名的藝術世界；明明屬于歐洲的一部分，卻又如此被排除在歐洲意識之外。如往常一樣，每當想起這點，我心中屬于西方的那一邊便會升起失落的感覺，而從我心中的另一邊，甚至會浮現出一抹憤怒。

布達山脈的城堡區內，坐落著幾家博物館，它本身也是一個博物館。皇室宮殿及其周邊建筑蓋好后淪為廢墟，又再重蓋，就這么毀滅性地周而復始。布達佩斯的居民最早躲入人跡罕至的布達山區避難，是在13世紀中期韃靼人恐怖來襲時。布達在隨后的幾個世紀成為繁榮的都會城市。然而其黃金時期在1541年土耳其開始統治時畫下句點。1686年布達試圖脫離土耳其統治時，曾導致長達七十五日的圍城，結果整個城市變為廢墟。繼而建立的巴洛克風格城市，再度于1849年遭到圍攻——哈布斯堡王朝對當地頑強反抗的鎮壓行動，在1848年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12]](#_12_7)革命浪潮中寫下了慘烈的一頁。最近一次令人心碎的攻擊，則是1945年1月蘇聯軍隊的進攻，掃蕩堅守最后據點、負隅頑抗的德國軍隊。不過這些還只是幾次比較重要的戰役，根據歷史學家的計算，處于戰略要害的城堡區，曾遭受過不下三十一次的圍攻。

在重建的城堡園區中，有間社會主義者名之為匈牙利勞工階級博物館（Museum of the Hungarian Working Class）的場館，此刻正在展示匈牙利被迫與當代歐洲隔離那個時期的藝術品。剛剛才過去的這段時期突然成為一段可供觀看的往事，而就像所有的過往，這段歷史很快就成為博物館館方和歷史學家注意的對象。華沙曾舉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展，布拉格也舉辦過共產主義最后時日的展覽。布達的展覽則針對斯大林-拉科西統治時代，亦即匈牙利人生活最悲慘的那段歲月。

穿梭于展覽廳的我，不禁感慨那段歲月是多么奇特，又是多么地脫離常軌——一半是歐洲，卻也有部分是拜占庭帝國的；部分屬于20世紀，部分屬于早先比較黑暗的時代。就像拜占庭帝國一樣，蘇聯的統御是個象征王國，生動地展現在這些展品身上反復出現、受到限制的象征上。每個物品、姿勢和表達方式，都在該象征系統中有固定與明確界定的意義，令人不得不懷疑這個具有高度形式化與神圣感的世界，在某種深層的延續性上，是否正是拜占庭這個以控制圣像和象征意義為權力基礎形式的帝國的后裔。

在走入展覽會場第一個展廳時，另一種相似感不斷縈繞于心。只見偉大領袖的大型海報和巨型雕像，群眾踏著整齊步伐、舉起手臂致敬的相片，還有對體格健美、英雄式“新人”與干凈、快樂的“工人階級”的膜拜，這所有的一切，都難免令人聯想到法西斯的象征手法。

還有藝術！在展示當代繪畫作品的整個展覽廳，我對那些臣服于恐怖主義美學統御的藝術家不禁心生同情。當然有些藝術家也曾以間接或公開的方式企圖反抗。比如無所不在的斯大林像，每個主要城市都必須豎立。在作品競標時，就有人試圖拿出最差的作品，以免承受獲勝的屈辱。那些畫作令人感傷之處在于，顯然有些畫家仍企圖在作品中維系若干畫家的尊嚴。比如有些作品呈現出奇特的組合，以嚴謹有力的畫風，表現令人作嘔的意識形態正確性。有幅氣氛憂郁、新印象主義畫風的作品，描繪一個女孩惆悵地望著窗外，手中正在繡制一面紅色旗幟上的斧頭和鐮刀。還有一幅畫描繪的是一個小男孩，崇拜地注視著一位一身戎裝的女兵。展覽中最無恥的畫作當屬一幅巨型油畫，但見一個年輕的士兵正朗讀著一份明顯激動人心的宣言，家人齊聚在破爛的小房間里屏氣凝神，仰望著這位少年英雄，就連正在削馬鈴薯皮的祖母也擺出恭順專注的神態。

我注視著這幅作品，試圖以欣賞一幅維多利亞時代庸俗作品的心態去感受其間的奇趣或興味。但是這種類比不管用。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我們或許并不喜歡畫家的感情，但他們的畫作仍是畫家本身的反映。然而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只看到畫家的虛偽矯飾，甚至是對內心的違背。這類作品太缺乏生趣，連粗俗技法的活力都付之闕如。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學院派藝術，只是它所企圖展現的不是高級繪畫藝術的慣例，唯見品位庸俗的公式。

在藝術展覽之后，文獻的展示就顯得比較有感染力。有些照片展示1949年的公審，包括一張令人難以忘懷的拉伊克·拉斯洛的照片。他是位身材高大、臉孔稱得上漂亮的男人，他注視著法庭，臉上同時帶著輕蔑，以及對自己命運的心知肚明。這幕影像格外令人顫抖的是，他之所以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是什么，是因為他不久前才站在迫害者的一方。

后續的展覽還有謙遜的“資產階級”室內裝潢造型的復制品。由于“資產階級”是窩藏敵人的大本營，因此相關建筑都被摧毀殆盡。放大的照片中展現著荒廢的一排排監獄牢房，與帶刺鐵絲網圍起的田野——監獄變得更舒服以前的牢房。1950年代早期的恐怖時期，匈牙利的情況格外慘烈，據云有高達四萬名受害者被處決或是遭到虐待與囚禁。展覽的最后，是一尊真正的被砍倒的斯大林雕像，鼻孔塌陷，一個大型的放在軀體旁邊的金屬制下巴被敲下來，已然成為生銹無用的廢鐵。1956年革命開始，時代巨輪繼續轉動。

人們凝視著這些陰暗的篇章，氣氛凝重沉靜。在展覽結束處放置的一個本子上，有人寫下長篇評論。盡管在匈牙利，如同在波蘭一樣，如果有心，每個人都可以挖掘到許多歷史真相，但如果終于能公開地彌合這種認知上的缺口，能完整而普遍地擁有這方面的信息，必定會產生某種掃除陰郁的功能。也許這會是不受限制的討論、哀悼和掌握未來的開端。

靠近瓦茨街的一間時髦畫廊的櫥窗里展示著裸體男子相互擁抱的光面照片。在一個地下通道，雜志上的照片風格有如《閣樓》（Penthouse）[[13]](#_13_7)，有些也頗為露骨。東歐正處于情色泛濫之際。共產主義永遠無法壓制的生命領域，便是情色。色情業的流行雖不能解釋為對真正清教主義的反抗，但或許可以說是對視覺清教主義、長久禁制色情行業與情色影像的反抗，仍是一種對“他們”的反抗。

有一天，我注意到國會前面擺放了一枚巨大的紅氣球，上面綁著一條橫幅，帶有Levi's的標志。這種并置頗為諷刺：從紅星標志到帶有牛仔褲廣告的紅氣球。不過這或許也是單憑一個對象、一個影像便可以賦予如此象征性意義的最后一刻了。象征王國已經崩潰，很快紅氣球就會只是紅氣球，情色也不過就是情色而已。

回到位于倫巴赫·塞巴斯蒂安的公寓后，我打開電視，里面正好在播放一部適合電視播放、描述舊金山單身生活的美國電影，擁有電視不可缺少的愚蠢劇情。接著是一部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Aaron Presley）[[14]](#_14_7)的老片子。如果在紐約，我大概兩部片子都看不下去，但是此刻我卻黏在電視機前。我猜我是有點想家了，而且，在東歐待了幾個月下來，屏幕上純粹的美國元素讓我全神貫注，無法分心。這些人為什么老是笑得合不攏嘴，展現他們潔白的牙齒？他們為什么這么活力充沛，樂不可支？當男孩和女孩（因為這些電影里似乎每個人都是青少年，不管他們的年齡理應多大）在一起時，為什么那么天真無邪？在遙遠的此間看來，這些透過角色所傳遞的動作、姿勢和個性，宛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由其怪癖狂妄的活力便可斷言，那是個沒有什么壓力，而且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的世界。從這里來看，顯得特別怪異。

我第二次來布達佩斯是搭飛機來的，坐進出租車前先看了一下它的計價器。由于欠缺監管，這里車費的差距頗大。出租車司機有張幽默的長臉，一個匹諾曹一樣的鼻子和一枚櫻桃小口。雖然致歉的語句使用過度，倒還算是說得一口不錯的英語。

“你的英語說得很好。”我贊美他。

“不，沒有很好，真的沒有。抱歉！”

“你在哪里學的？”我問。

“我老師三十年前就告訴我，我應該學一樣有用的語言。不是俄語。不過總之，我結了婚，有了小孩。抱歉！不過八年前我在郵政計劃署上英文課。我本來在那邊上班。”

“為什么會離開那個工作呢？”

“我以為出租車會是門好營生。畢竟，我沒有大老板。這點很好。”

“那出租車真是門好生意嗎？”

“對不起，這根本不叫生意。有太多出租車了，政府根本不制止。布達佩斯有一萬輛出租車。太多了。像你也許就會叫到另一輛出租車，也許！”

“過去一年，政府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抱歉！沒有人知道。他們說他們工作得很辛苦，結果他們提高了物價，沒有提高薪水。真是抱歉！”

我決定縱容我自己一下，因此這次住進優雅的蓋萊爾特酒店（Gellért Hotel）。啊！蓬松浴巾的奢華啊！蓋萊爾特酒店是棟有點怪異的建筑，完工于1918年，其白色石質外觀，搭配拱門與曲線的精致設計，宛如直接由蓋萊爾特山（Gellért Hill）的白色石灰巖上生長出來。同時，建筑本身寬廣、穩重的蹲踞之姿，正是我在匈牙利建筑中所見的特色。我的一個匈牙利友人稱之為“大地的氣魄”，而確實，這種飽滿、凸起的形態，也真的傳達出一種特別的氣勢。不過內部的一切則盡是平靜的優雅，有厚厚的地毯和法式落地窗。主樓層遍布著各式餐廳和咖啡廳，外面還有寬大的陽臺，只是其效果多少被布達佩斯可怕的空氣污染給破壞了。

我在這里會晤朋友，一起享用美酒、咖啡和特別調制的冰淇淋。當然，每個人都跟我說了去年一年間的政治情況。后共產主義時代的邏輯以匈牙利特有的方式展開：進步的自由民主聯盟已經喪失了一些支持；保守的匈牙利民主論壇仍企圖加強其對各重要部門的控制，以期建立一個“壟斷性的多數”——明顯重復了一種舊的匈牙利模式。最近爆發了一樁丑聞：最保守、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自有產權黨（Freeholders' Party）[[15]](#_15_7)不顧一切反對，要求檢視自身所有成員的秘密警察檔案，暗示他們當中不能有不愛國的老鼠屎自有產權壞了這鍋粥。檢視結果是該黨一名主要人物竟為重要告密者。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此事引發了熱烈討論，猜測自有產權黨將如何處理這尷尬的情勢。結果這件事很快就冷卻下來，因為當前有更急迫的事情需要處理，因此人們聳聳肩也就過去了。由此亦可見在現階段，一般匈牙利民眾對于調查、搜證和宿怨方面的興趣實在有限。

總體而言，匈牙利不比東歐其他國家，政治似乎不那么處于核心地位，盡管它可能產生潛在影響。當然，現在才只是開始，一個嶄新的世界才剛剛成型，每一步都在眾目睽睽的審視之下；但是政治的脈搏還沒有那么緊急，政治事務只是眾多事情中的一環。日常生活更為重要，有太多的發展方向和需要關注的內容。

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是蓋萊爾特酒店擁有著名的蓋萊爾特浴場（Gellért Bath）[[16]](#_16_7)。布達佩斯的浴場文化就像法國的烹飪文化一樣，豐富多樣，精致完善。這是在16、17世紀曾經統治匈牙利幾乎一百五十年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所留下來的遺產之一。雖然土耳其領主和勒索般征稅的希臘法納爾人（Phanariot）的統治，多半充斥著苦澀的斗爭與怨恨，但是誠如一位聰明的匈牙利人所指出的，一段能維持那么久的關系，不可能全部都只是憤恨。不管怎樣，她說，土耳其人和蘇聯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土耳其人至少不會逼迫屬民慶祝他們的節日。事實上，盡管在別處展現出高度的掠奪性，但在宗教和意識形態上，土耳其人還是寬容的。

土耳其人留下的這些有關水的習俗，即便經歷了所有最惡劣的時代，仍僥幸保存了下來；也幸虧有這類足以令人透氣的習俗，才使生命有喘息的空間。布達佩斯有些真正的土耳其浴仍在開放；也有各種各樣的戶外浴場是在土耳其人離開很久后才興建的，其中有平價的大眾浴場，也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奢華浴場。

蓋萊爾特浴場是其中最奢華的一處。在里面消磨了一個早上后，我深感沐浴真是結合了某種形而上學意義與形體愉悅的習俗。浴場門廳寬大無比，回音繚繞，到處可見大理石頂梁柱，還有一個精雕細琢的中央穹頂——這種設計通常都留給重量級的金融或國家事務，而不是逐漸消逝的沐浴儀式。進入女賓區后，情景轉為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17]](#_17_7)式風情，女人們在儲物柜之間的大理石地面上來來去去，或者一絲不掛，或者只系著一條圍裙式的白布蓋住下半身。四周以白色為主，薄霧彌漫，非常安靜。服務人員身穿白制服。經過一番比劃和交涉，以及匈牙利福林（forint）[[18]](#_18_7)的交易，一名導覽人員盡管不太情愿，可是終于同意幫我，領著我步上大理石臺階進入更衣室。只見到處一塵不染，地面也沒有水漬。褪下衣物后，我那粗魯無禮、面容不悅的導覽又引導我來到一間滿是霧氣的按摩間。在那里，先是用水管毫不客氣地噴濕我全身，再將我放在一張臺面上，徹底涂滿肥皂。然后我的按摩師就登場了，身穿方形胸罩和短褲的她，身材有如運動員般魁梧，毫不留情地對我的身體施展手指功夫，其間還不時夾雜著大聲的拍打，而自始至終，她都跟其他工作人員聊個不停。對她而言，我就像是廚房工作臺或傳送帶上一塊沒有生命的物體。

接著進入沐浴間。有兩個水溫不同的半月形水池，中間隔著一條大理石走廊，上面覆蓋有圓頂式天花板。淋浴室有如壁龕，全部用溫潤的碧綠孔雀石建造而成。在這富麗堂皇、圓融調和的室內，女人們泡澡、沐浴、來回走動，有些人身上披著羅馬式寬外袍，絲毫不覺難為情。這個早上前來浴場的大半是上了年紀的女人，她們的肉體呈現出不同形態的衰退樣貌：下垂的胸部，皺褶的手臂，松垮的腹部。親眼目睹我們肉身遭歲月摧毀蹂躪的實例，起先不免令人心情沮喪，但是那些坐在水池臺階和平臺上的女人，卻宛如置身發廊般閑話家常。她們已經習慣彼此和自己的身體，對她們中的一些人而言，沐浴是每天規律生活的一部分，給予酸痛的肌肉和骨頭最實際的撫慰。

逐漸地，我也習慣她們了。她們的安逸有種尊嚴感，而環繞四周的空間也有種補償性的高貴。它的美包括人體的脆弱，文明建筑的永恒性撫慰了人類本身的無常。這個圓頂石材建筑內部似乎將時間困在永恒的靜止狀態，以彌補它在我們生命中的無情流逝。

我在一個溫度很高，飄散著迷迭香氣息的桑拿間待了一會兒，然后穿著泳裝，進入主體的大眾游泳池，由玻璃屋頂穿射而入的艷麗陽光將這里照射得格外明亮。這片空間的設計饒富趣味又不失堂皇。泳池周遭環繞著盤旋有黃色花紋的石柱，旁邊是附有獅頭設計的噴水口，還有個正在喂食鵝群的農家女雕像，作為噴泉矗立在泳池一端。

作為這個儀式的最后一環，我進入一間陽光燦爛的露臺餐廳。這里曾是匈牙利好色者展示其挑逗功夫的地方，也不乏為了感情或榮譽的叫陣決斗。他們故作勇敢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世紀。現今是成群的觀光客和商人一邊享受著精致的冰淇淋，一邊在生意上彼此較量。

在這一連串沐浴儀式后，我覺得精神飽滿，心寧氣靜，仿佛尋回了重要的平衡。對我來說，這種以美麗輝煌來頌贊人體的和諧，似乎是文明一種微妙而重大的成就。

波蘭有一句古老的話，翻譯過來大致是“波蘭人和馬扎爾人是表兄弟”，意在表達這兩國性情上的親近。這種親近同彼此都有憂郁與裝腔作勢的個性有關，也跟兩國對抗外來政權所傾向采取之革命、反抗與其他注定失敗的對抗手段有關。跟波蘭一樣，匈牙利也有其一系列浪漫革命的英雄名錄，他們在世間燃起一道熾焰，然后年紀輕輕便離世而去。匈牙利的第一任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19]](#_19_7)認為“匈牙利的血液中有革命和不安的傾向”，只能用特別嚴格的手段才能馴服。他的統御，就像隨后的其他統治者一樣，都孕育出了異議分子；而東歐典型的反叛模式——秘密會社、陰謀審判與無情鎮壓，在每一重大歷史節點重復上演。1848年革命運動產生了三大領袖：科蘇特·拉約什（Kossuth Lajos）[[20]](#_20_7)、戴阿克·費倫茨（Deák Ferencz）[[21]](#_21_7)和裴多菲·山陀爾（Petőfi Sándor）[[22]](#_22_7)，這三人全是文人，也是行動家。其中裴多菲和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23]](#_23_7)的命運最為相似，也是匈牙利偉大的浪漫詩人，年僅三十六歲便戰死沙場。還有一位著名的波蘭參與者約瑟夫·貝姆（József Bem）[[24]](#_24_7)將軍，基于革命情感，他率軍在特蘭西瓦尼亞獲得短暫勝利。當哈布斯堡王朝請來“歐洲的憲兵”俄國軍隊，協助他們鎮壓民族運動時，這種種的獨立企圖都以常規的方式終結了。1849年，俄國指揮官略有自夸地向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報告：“匈牙利已經匍匐在陛下腳前。”

盡管經歷了數次重大中斷，但歷史卻從未將延續的絲縷完全切斷。這些早期的系列起義運動，最終變成了日后民眾自發的、導致悲劇性后果的大爆發，亦即著名的1956年革命。諷刺的是，就像波蘭一樣，匈牙利比較近期的反抗傳統，經過早期共產主義者到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異議分子手上——無論在象征意義上還是實質意義上，他們都像是當年的反對運動之子。正如波蘭的情況一樣，從大戰開始，匈牙利已可明顯地區分出幾代異議分子了，他們代代傳承，互相教育，如今則在被稱為“婚禮蛋糕”的國會大廈里親近而局促地并肩而坐。我跟其中三個人見了面，試圖研究戰后匈牙利歷史的運轉及其負載的不同強度。

米克洛什·瓦沙爾海伊（Miklós Vásárhelyi）屬于1956年革命的一代，距今已足夠遙遠，故得以籠罩上英雄的光環。我深入布達姹紫嫣紅的山區，前往他的公寓拜訪。他七十多歲了，矮小結實，身穿寬大的牛仔褲和磨舊的毛衣，動作遲緩，有著溫和的臉孔和一雙洞察世情的疲憊的眼睛。他說話緩慢，言詞精簡保守，不過我感到那并非出于不情不愿，而是他所經歷的驚濤駭浪已經化為清晰單純的一連串情景，以及幾個關鍵的“是”或“不是”。

在記憶猶新的幾次最讓人心灰意冷的歷史事件中，他都位居暴風眼和中心點；但他似乎已經超脫，而有種不含雜質的平靜。年輕時他是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理想型共產主義信徒，因此很自然的，戰后便加入了納吉·伊姆雷陣營，致力于政黨內部改革。瓦沙爾海伊在大學時代就已經認識納吉，隨后一起被開除出黨。他們的陣營在1955年開始反對拉科西·馬加什，1956年更成為那一連串的混亂與悲劇事件——亦即著名的1956年革命——的中心。后來促成了1956年10月23日暴動的學生宣言中的一項，就是要求由納吉·伊姆雷組織政府。

最初階段，革命只是自發性的反抗行為，一方是平民大眾，以及部分加入群眾的士兵，另一方則是秘密警察和奉派前往支持匈牙利當局的蘇維埃坦克，結果造成幾千人死傷。最后蓋勒·埃爾諾（Gerő Ernő）[[25]](#_25_7)領導的斯大林主義政府總算屈服了。

10月24日，四百輛蘇聯坦克駛進布達佩斯，不過當天的晚些時候，企圖控制局勢的蘇聯同意讓納吉領導政府。他的勝利維系了不到兩個星期，不過瓦沙爾海伊有些驕傲地說，當時圍繞納吉的陣營是“匈牙利合法政府”。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戰斗持續進行，約兩百輛坦克被毀。神奇的是，10月28日，蘇聯軍隊竟開始撤離。

11月1日，蘇聯人再度回來，同行的還有三千輛坦克和幾個師的陸軍。納吉陣營求助于聯合國，并期待西方能公開表態支持。

他們的期望終究落空了。談到這里時，我發覺自己再度處于極其尷尬的地位，內心的東西兩陣營橫跨大西洋，以懷疑的眼神相互對峙。美國大肆宣傳抵制共產主義，解放被奴役的國家，這使得納吉陣營相信被奴役的國家一旦英勇地致力于解放自己，美國應該就會挺身而出。不料，美國國務院甚至沒有將匈牙利局勢排入聯合國安理會的議程。當時正好發生了蘇伊士運河危機[[26]](#_26_5)，運河危機似乎是更重要的國際事務。

蘇聯軍隊一抵達布達佩斯，納吉陣營就只有逃命一途，因為鐵托政權同意提供庇護，他們遂躲進南斯拉夫大使館。納吉陣營中包括好幾個家庭，有子女和孫子女，總計四十人。

緊接著，11月23日——正好是革命開始后一個月——新成立的卡達爾政府派代表跟他們接觸，告訴他們該回家了，保證不會對他們采取報復行動。結果他們一坐上政府提供的大巴，就被載往羅馬尼亞一處瓦沙爾海伊形容為集中營的地方。

瓦沙爾海伊最痛苦的時期就在那里展開。1957年的一天，匈牙利的數名官員來到他們被流放的地方。這一次他們用大巴帶走所有男性，只留下婦女和小孩。等待他們的是監獄，還有一連串秘密審判，猶如前朝對拉伊克審判的翻版。我問瓦沙爾海伊在法庭上有沒有自我辯護。他溫和地回答說，很少。他們都知道再怎么辯護也沒有用。十名被告中，四名主要分子遭到處決，一名死在獄中，五名獲判不同的刑期。瓦沙爾海伊被判刑五年，實際服刑四年，其中一年半的時間還是單獨囚禁，沒有訪客，也不能和其他犯人或外面的世界有任何聯系。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聽了許多在監獄服刑的敘述，卻還是深深受到吸引：是什么讓這些人在那種情況下幸存，而且沒有崩潰，沒有變得充滿仇恨？監獄在東歐歷史上占了相當重的分量，成為一種規范——實際上是形塑——的經歷。不過雖然看似都是折磨，卻分成了各種層次。我的一位波蘭友人曾認真地告訴我：“有段時期，人們很喜歡被關進監獄。”因為那是道德榮譽的徽章，是對一個人信仰的肯定，也因為在監獄里可以碰到一流的獄友。但瓦沙爾海伊的監獄生涯不在那段時期，也不屬于那種類型，而純粹是道德上壓制背叛者的結果，也沒有信仰勝利后的榮耀。我問他那么長時間的單獨囚禁，如何維持神智健全。他笑了一笑。“我只是抱著希望，”他回答說，“我個性很樂觀，而且也算溫和。我早先看過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27]](#_27_5)的作品，知道唯一的問題在于他們究竟是想要讓我活，還是想讓我死。如果他們想要讓我活，那我終究會有重獲自由的一天。”多么奇怪！樂觀和溫和這兩項特質居然會成為力量的來源，而有這種想法的人，又是多么稀罕。但是我可以理解，這兩項特質，而不是憤怒與仇恨的苦澀內心掙扎，如何幫助他支撐過來。

一年半后，瓦沙爾海伊終于轉到了一個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囚禁的牢房，而且獲準閱讀書報。他愛上了福樓拜，而且看完了一名獄友私人收藏的七星叢書（Pléiade）的全套法國文學作品。監獄中有懷抱各種政治信仰的獄友，在情況惡劣、過分擁擠的牢房中，大伙兒不斷討論。

瓦沙爾海伊出獄后之所以能夠恢復正常生活，沒有怨恨與退縮，想必也是希望所賦予他的韌性。在他被折磨期間，妻子和孩子的支持當然也發揮了助力。出獄后的十二年里，他被禁止從事腦力工作，因此受雇于一家農業合作社，充當店員和工人。1972年，卡達爾政權放松管制，瓦沙爾海伊終于獲得允許，得以從事有興趣的工作，他也再度開始參與反對活動。盡管騷擾和監視不斷，但他始終不為所懼。

他在提到最后一項付出巨大努力完成的事情時，聲音中流露出一絲驕傲，即負責安排1989年6月納吉·伊姆雷的國葬儀式。匈牙利素有舉行象征意義豐富、儀式隆重盛大之喪禮的傳統，比如在布達佩斯為流亡多年的1848年革命志士科蘇特·拉約什舉行的喪禮便是其中之一。納吉遲來的喪禮在英雄廣場（Heroes' Square）舉行，阿帕德王朝（Árpád dynasty）[[28]](#_28_5)開國英雄們充滿戲劇張力、洋溢著活力的雕像下，吸引了數目龐大的前來致意的人群，此舉也使得1989年成為革命性的轉折點。這對瓦沙爾海伊而言是充滿激情、獲得清白的時刻。他輕描淡寫地說，在納吉審判被處決的人當中，有三個是他的大學好友。

局勢轉變后，瓦沙爾海伊成為反對黨自由民主聯盟的創黨元老之一。他是一名議員，雖然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也已經厭倦了實際性的日常政務，然而，他仍擔任歷史公正委員會（Committee of Historical Justice）主席，在道義上，有時也在物質上，為在那些年犧牲或受到囚禁的人尋求補償。

在他的生命中，當然也有充滿仇恨的時刻，瓦沙爾海伊安靜地說，但現在不是。他不想對以前的共產黨人存有積怨，或者“在事情發生三十年后，審判那些七十歲的老人”。他不認為犯下嚴重錯誤的人還應該占據最高的職位，但也深知在匈牙利新時代展開之際，還需要共產黨員的專業知識，畢竟共產主義社會內的管理者，至少在名義上，是共產黨員。“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怨恨，”他說，“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也無可奈何。只希望剩下的歲月能安靜地度過。”

這種和復仇主義完全相反的心態，也許緣于瓦沙爾海伊知道他已盡力而為，或者緣于一種自我接納的心態。這種恬淡也或許緣于發生在他和他朋友身上的事情的真相已經被披露于世，而且獲得了承認。被承認的需求，似乎如任何本能一樣基礎與有力，促使這方面得到滿足和解決的動力是迫切的。

“不管怎么說，你這一生過得非常有意思。”我不恰當地貿然說了這么一句，實在是因為無法充分表達出對他的故事或孕育這故事的大歷史的滿心敬畏。

“喔，是啊！是很有意思。”他淺淺一笑，“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不要那么有意思或許還比較好些。”

從瓦沙爾海伊的住處來到米克洛什·豪勞斯蒂（Miklós Haraszti）的公寓，令人有種跨越年代和美學領域的感覺。如果在美國，會馬上認出這是屬于1960年代的風格，而在這里，則會令人贊嘆一聲“哇！你瞧瞧！”豪勞斯蒂住在布達佩斯破舊、沉寂而迷人的市中心地區，但公寓本身被改建為閣樓似的空間——開放、空氣流通、光線充足。公寓內裝潢著白色櫥柜，金色木制家具，以及若干凌亂的雜物。一扇門上貼著一張海報，以粗體字印了一行標語“Igen、Igen、Igen、Igen”。“Igen”是“同意”的意思。這四個“同意”，是導致前政權垮臺的公投使用的口號，而豪勞斯蒂的異議團體當年也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豪勞斯蒂可以既是異議分子又是某種反主流文化的浪漫主義者，這固然是他年少輕狂時期的特征，也因為匈牙利當時情勢比較松緩，使他可以嘗試和游走在不同人物性格之間。在談話當中，他帶點困惑意味地拿了張自己1960年代的照片給我看，并且說：“這張照片可以告訴你所有事。”的確，那是一張當時反叛青年的標準照，一身蘇聯改良版軍裝，切·格瓦拉的發型和胡須，將原本秀氣的臉打造成典型的革命分子樣貌。

豪勞斯蒂現在打扮清爽，臉上也不再蓄有胡須，英俊的臉龐頗引人注目。他的朋友康拉德·哲爾吉曾經形容他是一個“瘦削，孩子氣的男人，有雙暗色的眼睛和黑色頭發，臉孔美麗而憂傷”。這也是一張閃爍著智慧的臉，帶有戒備的坦然和純粹的善良。他身上有種輕松的感覺，或許因為他這一代的匈牙利人已經處在比較輕松的環境中吧——我可不認為自己的這個看法太離譜。他也承受了相當多的騷擾、警方監視以及審查，但是這些都不再攸關生死。他曾在監獄中待過一個月，但是沒有受到單獨囚禁、刑罰和公開審判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這種威脅已經不再籠罩他這一代的人。他是在卡達爾政權放松了其最惡劣的鎮壓手段后才接棒主張異議的，因此不會再有眼睜睜看著威脅發生的事了。

和許多同輩人一樣，他之所以抱持反對理念，僅是因為他的上一輩以理想主義為名，卻明顯欺騙了他。不過他和同儕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幾乎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出這個結論。他是共產黨人之子，父輩意識形態的忠誠度非常高，因此正如豪勞斯蒂自己所形容的，他沒有大多數東歐人從中得益的“雙重教育之利”——在學校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家里是完全的懷疑主義。

豪勞斯蒂是個擅長說格言之人，即使用英文也不例外。他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從他所尖銳反叛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中汲取了多少。他說，早年馬克思主義教育留給他的最大特點，是傾向于理想主義和堅持原則，具有探究事實的基本沖動。還有另外一種傾向，使他凡事參與，涉獵廣泛，他笑謔地戲稱之為“愚蠢的激進主義”。“所有馬克思主義文化都有一個深藏的潛在觀念，”他對自己的理論感到好笑地說，“就是社會是知識分子必須改變的一樣東西。事實上，社會的定義就是，一樣你必須改變的東西。”

除了態度極端和藹可親外，豪勞斯蒂的才華與自信，多少跟他在同輩中一向以最優秀、最聰明聞名有關。在調侃了自己的積極作風后，他又很自然地談起有一次遇見肯尼迪家族一員的小故事，他很驚訝地得知“他們連在家里、在餐桌上，也用那種語言說話——對窮人該怎么做，該怎么幫助改革社會等等。聽起來很有趣”。有趣，但是可以理解，因為豪勞斯蒂的家庭背景雖然跟肯尼迪家族幾乎完全不同，但是他所屬的階層確實在社會主義之下獲得許多權力，這點他自己頭一個承認，因此隨權力而來的，也有一種責任感，或對下層階級的體恤：知識分子意識。

1960年代，這位年輕的東歐知識分子所表達的深層政治無意識，是他的西方同時代人非常熟悉的。有一陣子，人們很難分辨他究竟是個嬉皮、搖滾樂手還是個瘋狂的詩人。他寫詩，將鮑勃·迪倫的歌曲翻譯為匈牙利文；廣泛閱讀，涉獵任何他能到手的匈牙利文讀物，或其他三種他熟知的外國語言的作品。直到1977年，豪勞斯蒂都無法離開匈牙利旅行，不過他說：“我們的臉都是朝向西方的。”有一陣子，他甚至成為一個西方形態的毛澤東主義者，但很快受到同伴的譴責，認為他太不服從命令了。

他那幫朋友會和前來布達佩斯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包括學生、學者和其他同情東歐國家的左翼人士——熱切交換意見，只不過這些東歐迷全都帶著當局者迷的盲點。“我們經常感覺到，”豪勞斯蒂淡淡地說，“被觀察者比觀察者知道得更多。”因為當西方的新左派還在嘗試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理想時，東歐人已經是意識形態實驗中的活體了，因此雙方確實有認知上的差距。

矛盾的是，就是這種認知，讓他們比較不拘泥于教條主義。或者也沒有那么矛盾，因為純粹的教條只適存于純理論的無人空間，而豪勞斯蒂那幫朋友們所與之纏斗的，是運用到實際情況中的理論，并透過實際行動，設法改善那些情況。到1970年代時，豪勞斯蒂已經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遠拋在后。匈牙利的反對運動已經演變為人權運動，而不再是意識形態運動。“共產主義最主要的影響是，”豪勞斯蒂說，“消滅了左派和右派的概念。”整個東歐國家都得出類似的結論。豪勞斯蒂這一代人有一種身為東歐世代一分子的強烈意識。1970年代，他們從波蘭人處學會samizdat[[29]](#_29_5)的印刷技術，開始同波蘭和捷克的同志交換意見，甚至還在波蘭和捷克交界的塔特拉山脈（Tatra Mountain）進行有名的秘密會談。

豪勞斯蒂回憶自己年輕時投身反抗活動的歲月，將其視為自己的全盛時期，這是瓦沙爾海伊絕無可能的。豪勞斯蒂那幫朋友還創辦了一份雜志《發言》（Beszèlö），自由運用“真正的政治語言”。他們享有溫暖的友情、文學和有意義行動的喜悅。豪勞斯蒂皺眉說，他們甚至可以“自我諷刺”，這是任何政治精英團體很少有的特質。

此外，他們不像西方的反抗活動盟友，一旦步入成年，便陷于一種難以逃避的桎梏：反抗活動的吸引力與金錢和事業的牽引力之間的沖突。匈牙利沒有大錢可以賺，而正式工作也聲名狼藉：東歐的年輕人不必擔心被塑造成大怪獸，變成“資產階級”，也沒有成為大老板、大官員或者工作狂的動機。

豪勞斯蒂的正式工作只是在一家工廠當了一年的工人，即使這樣其部分動機也是為了研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撰寫了一本書：《一個工人國家的工人》（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這本書從未在匈牙利出版，但是在被警方沒收打字稿后，卻成為一場沸沸揚揚的審判中的主角。豪勞斯蒂被判刑八個月，不過在西方聲援的輿論壓力下，只服刑了一個月。除了這段就業的插曲外，豪勞斯蒂的謀生方式是從事非法的“黑工”，以假名給人代筆，甚至做一些走私的事。《天鵝絨監獄》（The Velvet Prison）是他的第二本書，對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長大的知識分子自動從事自我檢查和自我欺騙的微妙與下意識的心態有復雜而深刻的分析。對匈牙利人特殊的精神分裂情況，這本書的細微詮釋可謂空前絕后，再無書可出其右。

如今，豪勞斯蒂是自由民主聯盟的領導成員。當我問他從異議分子到反對黨是否算很大的躍升時，他茫然地笑了一下。“專業主義的挑戰和樂趣非常有意思，”他故意不正面回答，“我們都清楚，現在才學習如何當個職業政治家已經太晚了，不過我是以非常實際的方式在工作，我想我不會犯匈牙利政壇人士常犯的一個典型錯誤，就是不知道什么時候該下臺。”不過從事公職到底有什么是那樣困難的？喔，比如行政方面的工作。雖然他不介意跟一批秘書一起工作，完全不介意，但是如此一來，啊，說來真是諷刺中的諷刺！他就得更謹慎，比以前任何時刻都要小心。但對此，他沒有進一步說明。“我會辭掉工作，”他說，“如果外交手腕和說真話兩者的組合變成外交手腕占主要地位，而說真話變得不可能的話。”

不過目前，他認為他這一代的人置身政壇很重要，他們反國家主義的沖動或許是當前氣氛的一劑解藥，因為在他看來，目前又開始偏向中央集權了。對于新成長起來的左派主義這一代，東歐和西方并不一樣。“在社會主義下成長的人有一種特別的覺悟，”豪勞斯蒂說，“一種反意識形態的覺悟。”他的同儕所追求的政治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對這種標簽也不在乎，而是結合，套用豪勞斯蒂的表述，“是美國和歐洲的自由主義的混合”。

一定程度的歐洲。豪勞斯蒂說，他同意米蘭·昆德拉的看法，如果以前的中歐有任何優點，那是因為中歐對未來的期許比其他歐洲地區更歐洲化。但在某些方面，他說，匈牙利現在更接近美國，早期拓荒時期的那個美國。共產主義試圖摧毀所有傳統，結果意外地連封建主義也一并摧毀了。就某種程度而言，沒收財富使得匈牙利成功成為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所以此刻，豪勞斯蒂說：“我們正準備跳進一個自創的準新世界。”

一個有著舊世界負擔的新世界，確實如此，但也有著舊世界的經驗。豪勞斯蒂的同儕再度置身一個有趣的境遇。當我想起曾跟我聊過天的那群精力充沛、聰明睿智的人，一群結合了他們那一代特有的坦誠與若干來之不易的歷史教訓的人，不禁覺得他們不無可能帶來一些原創力，為這始終陳腐、乏味的官場政治帶來一些有洞見，并有可能有道德的新內容。

若爾特·內梅特（Zsolt Németh）又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是比較新一代的人。有心人可以寫本娛樂指南——只不過更新速度可能要比米其林指南更快——描繪東歐數目激增、覆蓋廣泛的政黨、協會、論壇、委員會和各種政治團體。在這本指南中，若爾特·內梅特所屬的青民盟（Fidesz Party，即“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Young Democrats Union〕的縮寫，但帶有“信任”或“忠誠”的意味）可以被列為匈牙利政壇中的一大特色，是當地土壤中長出的獨一無二的奇葩。青民盟以青年為基礎，因此最高年齡限制為三十五歲。當然，聯盟成立后第三年，幾個元老就開始覺得這個上限低得有些窘迫，而醞釀在自己到歲數前，提高年齡限制。

盡管只針對一個年齡段的觀點頗為可笑，青民盟卻是極其嚴肅的政黨，很多人也極為嚴肅地對待它，包括某些知識分子群體。這是最近以來，東歐人所持的標準心態之一：解決過去困境的唯一方式，是讓年輕人出頭，而這無疑也是青民盟的主要魅力之一。它沒有受到污染，沒有受到扭曲。在這里，不相信任何超過三十五歲的人有全新的意義。對于這個年輕政黨，人們經常使用的三個形容詞是：活力、專業、務實——正是許多人對新紀元所期許的價值。

我必須承認，若爾特·內梅特的確具備這三項特質。他看上去淡漠的寬臉，可以綻放出生動智慧的笑容。他靠著椅背抽著煙，一副輕松篤定的神情，宛如早已習慣權力與掌控，而言談間所展露的成熟、慎重的自信，更令人難以相信他只有二十七歲。當然，這是東歐的二十七歲；不過，我仍然有種難以企及之感。這種最新的政治人種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大劇的最后一章，一方面，主角人物在上場的時候，劇情已經接近終點；另一方面，他們因此可以重新出發，開創新局。若爾特·內梅特畢業于卡爾·馬克思大學（Karl Marx University）經濟系。不過他接受的真正教育來自一所特別的學院，跟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關系，由學生自行組織，且獲得了當局勉為其難的準許。1980年代，匈牙利有幾所這樣的學院，由學生自己設定課程計劃，自己聘請老師。內梅特形容這些機構既不是地下機構，也不是正式機構，它們幾乎不被允許，但也沒有受到威脅。這是匈牙利的不同之處，也是如今讓匈牙利蒙受其利，取得有利地位的特色。

青民盟的人都是這些學院出身的青年才俊，他們每年夏天都會去巴拉頓湖參加特殊夏令營。營隊會進行馬拉松式的長談，并舉辦有關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洛克（John Locke），以及當代美國學者如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的研討會，就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意義進行探討。“我們的討論全都集中于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哲學領域。”內梅特說。那些舊領域，已經因為東歐的情勢而獲得了新生命。不過這些未來的政治家將這些崇高的人性關懷與通常屬于西方年輕人的自信合而為一。他們的部分自信，以及絕大部分的知識架構，來自個人跟西方的接觸。在“古拉什共產主義”逐漸衰退的年代，他們中的許多人前往牛津和劍橋讀書。那里有復印機——它們在東歐動蕩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可以將一本本書完整地印出來。他們知道自己并不孤單。

和內梅特的對話中最發人深省的時刻，是我問他當時仍是學生，后來成為青民盟黨員的這些人，是否曾將老一輩的異議分子視為人生導師。畢竟老一輩的反對分子，諸如瓦沙爾海伊或豪勞斯蒂，或其他現在正領導匈牙利國內兩個主要黨派的人，經常受邀前往這些特殊學院和巴拉頓研習營。“你指什么？”他著實驚訝地反問，“我們才是他們的導師。我們有法律架構。我們可以在他們之間扮演協調者——到1980年代中期，他們就已經開始吵架了。”

不管這是對過去的傲慢，或是一個年輕政治家的語言，都切實表現出這群年輕人的嚴肅心態，也表現出他們的成長背景所孕育的權利意識——在豪勞斯蒂那一代，即使最有自信的人或許也不可能有這種意識。他們知道，很大程度上，他們可以反抗這個體系，而不致受到懲罰；也意識到不管多么反叛，他們終究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且他們沒有過去的負擔。我問他，他們思想中可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痕跡。“我們已經受夠了，老實講。”他回答。也許馬克思主義唯一殘留的影響，是內梅特這代知識分子——誠如他所描述的——“在情感上是強烈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無法將它單純地看作19世紀的另一種理念。”不過實際上，在他們踏上舞臺時，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激情、沖突和幻滅的冗長篇章已經結束，在明顯的缺乏興趣中畫上句點。

青民盟大言不慚而機智地描繪他們自己為“不帶任何形容詞的自由主義分子”，支持所有善良、公正的事物，幫助他們中間的弱勢孩童和年輕人。但是內梅特的高談闊論中所真正彌漫的，是職業政治家的價值取向。他談了很多策略，要有“效率”以及“政治程序”，仿佛其本身就是一個實體或應該膜拜的偶像。他也談到意見調查和獲得當地的支持等。青民盟在匈牙利主導了幾場最聰明的競選活動，包括創意性的海報和媒體顧問，一應俱全。

權力的施展使得內梅特和若干黨內老同志分道揚鑣。有時候這種事是痛苦的，但是“我們了解這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他說——這或許是瓦沙爾海伊和豪勞斯蒂不曾有過的想法。當然，老一輩的人知道友誼會因為政治而破裂，但是這種破裂是一個悲劇，甚至攸關生死，因為在他們那個年代，政治同時具備殘忍和神圣的元素。

但是現在的政治已經聰明地去神秘化了。在內梅特的年代，政治已走向實際，所需要的不再是追求神圣的理想，而是對“過程”的熱衷，還有對你自己的熱情，即你自己獨具的個人崇拜。我接觸過的東歐人，甚至政治家，幾乎都有自我謙抑或自我嘲諷的一面，而這在內梅特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他的舉止顯示出智慧和魅力，但也有嚴肅認真的一面，在一個正常、嚴肅、極端現實的世界中，這正適合一個正常國家羽翼已豐的代表。

正如音樂中會有重復出現的樂章，繪畫中會有重復出現的寫實主義，政治上也會重復出現自由主義的理念，只是每次都會呈現不同的樣貌。不過東歐的自由主義，與其說是重生，不如說是從延續不斷的懷疑主義熔爐中精煉而出。它見識過狂熱主義、教條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危機，亦即太熱衷于信仰或毫無信仰的危機。因此與其說東歐的自由主義是一個信念，還不如說它是一種制衡的行為，企圖結合希望的力量與合理期待的謙遜。

布達佩斯郊外一小時車程，如果往西南方向旅行的話，整個匈牙利好像就變身為度假勝地。從火車車窗往外看，讓我有種置身意大利的感覺。極目所望，皆是風景，加上代表夏日風情的標志和點綴：陽臺上朵朵紅色遮陽傘、室外咖啡屋、游泳池以及耀眼的花園，完全不像一個欠發達國家。這是前往巴拉頓湖，亦即匈牙利的漢普頓（Hamptons）[[30]](#_30_5)的必經之路。根據宣傳，巴拉頓湖是歐洲最大的湖，因為匈牙利是歐洲的小國之一，因此這個“內陸海”，包括其海灘和周遭的休閑小鎮，占據了匈牙利的很大一部分面積。正如漢普頓，諸小鎮成了藝人匯集之處，也帶著虛榮勢利和神秘。

在我落腳的度假小鎮的主要街道上，林立著販賣廉價飾品的商店，還有制作用精致薄餅包著四種甜餡的烤薄餅食品店，風味絕佳。每個人都穿著極為清涼的游泳衣走來走去，既不見羞赧，也不會不自在。這里展露身體的感覺不太一樣，比較沒有情色的意味，也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反倒顯得比較隨興而撩人。這個小鎮到處都是奧地利人，他們因為持有西方貨幣而有匯率優勢，還有對度假這事認真且狂熱的匈牙利人。四處可見水果攤，販賣可口多汁的桃子和李子。這里樣式一致的方形小屋蓋得很密集，是某機構工人們的度假村，算是昔日政權的額外福利之一。

而巴拉頓湖——一個孕育了許多神話的湖，表面平靜無波，一片灰綠閃爍著乳白與銀色光澤，似乎永遠籠罩著一層薄霧；覆蓋著蘆葦的沙洲延伸至水里，更增添了夢幻的效果。周遭的植物也纖細柔弱，非常浪漫。其中有些狀似白色棉絮的花朵，有個美麗的名字叫“孤女的頭發”，仿佛從湖水柔和的色澤中浮現而出。

我和朋友住的房子是與幾個家庭一起共享的。白天，大家聚集在庭院里各忙各的：一個祖母在打毛衣，一個父親在和兒子玩球，人們吃著野餐，我的三個朋友也在陽光下各自忙著寫稿。不知何故，人人互不打擾，早上的時光在友善的安靜氣氛中度過。在“文明的”社交圈，這里似乎高度發展出一種共存的文化，人們好似已經學會既不過分寡言，也不互相干擾的技巧：這是在擁擠環境中生活所得到的有益經驗。

這次招待我的主人伊萬·拜倫德（Iván Berend）曾經很接近匈牙利的權力中心，是負責策劃匈牙利經濟改革的人員之一。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在思考改革為什么會失敗。我們在陽光和煦的花園里聊了些這方面的話題。他告訴我，就某種意義而言，改革這個理念本身便已經埋藏著失敗的因素了。改革者認為，他們可以稍微修補一下既有體制，這里加入一些自由企業，那里添一點地方分權，但是體制本身是具有一致性的，拜倫德說，否則就不叫體制了。一個蘇維埃式的中央集權體制與自由市場制度是不兼容的，因為前者施加在創新精神和企業上的限制太嚴格了。

晚餐設在可以俯瞰一片草坪的擁擠餐廳里，包括另一種烤薄餅，里面塞滿黑色液狀巧克力。為什么超重的匈牙利人沒有特別多呢？或許一千多年來的民族飲食已經產生了特別的抗體，可以用最高效率催化巧克力和鮮奶油分解吧。

其后，拜倫德哀傷地談起像他這種背景的人在新的政治氣候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就算心中有任何憤恨，他也通過自律，或者了解游戲規則的禮貌意識控制得很好。匈牙利的情況是，內部的政黨改革者和外在的異議分子間的界限并沒有那么清晰，在社會交往甚至意識形態上都可以跨越。只不過以前是異議分子處于邊緣地位，現在是前改革分子處于邊緣地位。拜倫德擺脫這個困境的方式是去西方教書，但是我可以想象他在決定放棄畢生的事業時，那種悵然若失的心情，即便那份事業到頭來并沒有成功。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湖里長泳。一群天鵝，宛如中高階級的家庭在周日出游似地從我們旁邊傲然前進。湖水閃爍著迷人的色彩，一股奇妙的憂思與游泳激蕩的活力相互交織。這種模棱兩可和似對似錯的感受逐漸消失于無形，轉化成恰到好處、理應如此的心境。

波蘭人談論“有錢人”，匈牙利人則談論雅皮士。也許因為匈牙利人更熟悉美國的潮流吧，也或者——我的分析能力突然停止了——因為匈牙利新貴一般比波蘭新貴年輕。不過這也跟態度有關。嚴肅談論“有錢人”，表示對這些可靠而有成就的人士毫無諷刺意味的尊敬。匈牙利人則已經走得更往前了，就像在其他各類事務上一樣，對于那些成功搭上自由市場快車的人的尊敬或嫉妒，都因一抹嘲諷而淡化了。或許也有些悔恨吧：企業家是真正操縱著國家的人，每個人都這么說，而他們沒有社會良知，他們已經舍棄了道德政治。

埃娃·耶萊什（Eva Jeles）是我透過朋友認識的友人，不算是真正的雅皮士，但是如果仔細分析的話，這里也許沒有一個人真的算是。不過，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她都是一位極其成功的企業家。她和丈夫及女兒一起住的公寓是我所見過最豪華的，即使紐約的公園大道（Park Avenue）也不例外。戰前式的規模反映出匈牙利人對大的偏好，拼花地板閃閃發光，挑高的天花板有直達天際之感。公寓主人的吸引力也不遑多讓。埃娃三十余歲，骨架頗大，有著膚質細膩的美麗臉孔和卷曲豐潤的栗色頭發。穿著打扮一如她同時代典型的時髦美國女子，帶點玩笑式的折中風格，外加一雙有趣的粉紅色鞋子，以及設計俏麗、和裙子不太搭配的短襪。她的先生安德拉什·特勒克（András Török）是個相貌英俊、貨真價實的匈牙利人，有著烏黑的直發、黝黑的眼睛和高聳的顴骨，介乎韃靼騎兵和20世紀早場電影偶像的外形——雖然兩者都不是他所希望的樣子。在他文筆極佳的著作《布達佩斯評介導覽》（Critical Guide to Budapest）的書封上，他被形容為“一個有家庭有思想的花花公子”。他也是新出刊的文學雜志《2000》的編輯之一。今天他擔任我們的翻譯，因為盡管埃娃的英語很好，但她更愿意使用匈牙利語。

公寓內的家具還很少，因為他們幾個星期之前才搬來此處。很明顯，讓他們有能力遷居此地的，是埃娃的錢，埃娃賺錢的速度遠比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31]](#_31_5)還快。戰后東歐的一個特殊情況，是所有遺傳所得的財富都遭到沒收，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從相同的起點出發，而財富在這資本主義草創時期，仍被視為均貧條件下的紅利。

埃娃·耶萊什確實是從零出發，白手起家的。她生長在匈牙利東部的一個農家，在前往布達佩斯上大學之前，只到過那里一次。她學的是自己完全不感興趣的經濟學，不過還是乖乖參加了大學的研習課程。她住在青年旅社或家庭公寓分租出來的房間，過著僅能糊口的日子。1982年大學畢業后，她獲得了經濟學會的一份研究工作，這份工作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但是薪水很低。她一直認定自己會成為一名知識分子、一位學者，因為那是她那一代聰明人的共同想法。只是在學會上班并不讓她覺得快樂。“我在那里就只是不停地修改同一篇論文，一遍又一遍。我都已經二十五歲了，但在布達佩斯沒有公寓、沒有根、沒有錢。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沒有做研究的強烈追求。”

她說話時散發出的那股義正詞嚴的嚴肅和專注，使她的臉孔在美麗之外，更添一抹引人注目的魅力。談到生意時，她是絕對嚴肅的。她發現企業界對她的召喚，就像有些人發現藝術的召喚一樣。1985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是在學會收入的五倍。聘用她的芙特斯（Fotex）照相迷你實驗室不但具有革命性的經營策略，也是匈牙利最早的合資企業之一，雖然所謂合資只是公司某個人的美國朋友投資了一點錢而已。就技術上而言，在卡達爾的統治下，成立合資企業要比一般私人公司容易多了。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西方貨幣在這里始終享有崇高的地位。芙特斯在快照發展上具有壟斷地位，因此成長速度有如颶風一般，而埃娃也在公司里快速升遷到一個頗高的職位。

然而，當有人找她加入一個剛起步的集團，準備成立一個影視批發公司時，她仍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我參加了一點意見。”她說。有一個商業想法，然后創造現實訴諸實現，這一點正是她覺得深具吸引力之處。真正使她著迷的主要不是金錢，而是“冒險”——她先生在思索片刻后，才仔細選擇了這個翻譯。埃娃具有典型企業家的性格，對創新、冒險和策略充滿了熱情。她喜歡研究如何讓某件事成功運轉，然后又將興趣轉移到新的事物上。

她所提供的想法，以及后來成立的公司，名叫維科（VICO），經營策略大膽而簡單：從美國購入錄像帶，加上匈牙利配音，然后販賣給錄像帶出租店。當時大部分匈牙利人都有電視，其中也有足夠的人買得起錄像機，但關鍵在于如何勸人們開設錄像帶出租店。埃娃自己構思出整套運作方式。“我的任務是勸那些有點錢和有點夢想的人投資開店，多半是家庭主婦、服務生或店員，讓他們把錢從枕頭底下拿出來，開始創業。”

結果兩年內，匈牙利有了八百家錄像帶出租店。埃娃教這些新老板們如何做生意。她知道他們的恐懼和不安是什么，畢竟對于他們的處境，她并不陌生。她從相應的西歐企業主身上吸取如何運營的知識，但是匈牙利的情況跟西歐大不相同，因此大部分還要靠她的直覺。她說她在這方面還不錯，善于想象哪里會出現問題，而且善于從別人的角度設想。

那家公司大獲成功，一切圓滿，只是這也意味著她又要轉換跑道了。“錄像帶方面不再需要革命性的創意了。”她說。因此，1990年年底，她打定主意準備開始自己的事業。這一次，她要自己當老板。

我去拜訪過她的辦公室，白色、亮眼，裝飾著美麗的植物海報，讓置身布達佩斯老舊破爛地區的一幢灰色、墻皮剝落的建筑，散發出時髦的加州風格。她的新事業跟圖書銷售有關，對于一個缺乏戰略眼光的人而言，實在看不出其中有多大的商機。國營的圖書銷售巨人已經解體，圖書出版本身也已搖搖欲墜；但是對埃娃這種典型的企業家而言，這正是它的吸引人之處。她說，圖書銷售目前正處于維科剛起步時錄像帶市場所處的“發展階段”，換句話說，她是第一個介入經營者。她言談間神情十分專注——和作家們談到他們虛構的人物時所流露出的投入的眼神一模一樣——暢談她正在展開的市場研究，以及期待這一創意取得什么樣的成功。

當她描述她那應該會創造出數百萬福林收益的計劃時，我一直在想，這個成長于社會主義時代匈牙利鄉間的女人，是如何找到這樣的勇氣，更遑論創意，把自己看作商業冒險家的。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人的性格五花八門，無論哪里都一樣，但性格是需要某些條件來激發的。

我還是問她，自己的事業是否讓她感到驚訝。“我最感到驚訝的，”她沉吟了一會兒才回答，“是居然行得通。”什么行得通？我問她。“生意能做成功，”她說，“所有事都能到位。”

啊，是的。整個東歐都可以聽到這種“啊！成了！”的意外歡呼聲，至少那些意外發現這一不太可能的規則的人都有這種感受。在此之前，一般人都習慣性地假定，或應該說知道，沒有一件事行得通，尤其是腦袋中的計劃。解除這種設定，發現或許有些機制可以將個人的期望轉換為行動，一定需要一種根本上的、非常困難的心態轉變，就跟目前東歐人所經歷的所有事情一樣。那些相信進取、計劃和事業，眼睛閃閃發光因而有機會成功的人，和完全相反因而沒有機會的人之間的區分，也許比保守型民主人士和民主型保守人士之間的區分還要來得根深蒂固。企業家的影響會走向何方？我不知道。在我看來，在復式簿記的歷史賬簿中，相對于強迫式的指導，這種利己主義的啟蒙的得失是無法計算的。埃娃和安德拉什小心翼翼地告訴我，他們跟一般標準的新貴不一樣：他們沒有在布達的時髦山區購置公寓，他們的興趣和社交圈也遠遠超越金錢的范圍。我其實不太懂，但是我必須承認雖然豪門企業向來不是我最能同理的對象，但像埃娃這種憑借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白手起家的壯舉，就像一個卓越運動員或天才小提琴手的表演所能讓人直觀感受到的非凡精力、意志和技巧一樣，令人興味盎然。

后來，我又碰到過埃娃的丈夫安德拉什，這回是在他比較自在的住處“紐約咖啡館”。相較于克拉科夫或布拉格，布達佩斯以前更是個著名的咖啡館之都，其中許多都以聚集特別的社交團體和當權人士聞名，性質介乎文藝界半公開的沙龍，以及運氣或地位正走下坡的文人的避難所之間。紐約咖啡館極具文藝氣息，為作家們供應紙張、墨水和報紙，外加賒賬的優待。有些人還以此處為通訊地址收信。戰后這家咖啡館成為衛道人士的攻擊目標，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頹廢象征，還因而被迫轉為運動品商店。其實頹廢一詞并不足以形容該咖啡館重新整修的內部裝潢，比較貼切的描述是介于極致與盛大之間的杰作，包括三個綿長無盡的樓層，一個陽臺式的回廊，以及極其夸張的閃爍水晶與鍍金裝潢，即令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亦望塵莫及。安德拉什在他的布達佩斯導覽一書中充滿感情地描寫紐約咖啡館，而且，作為對戰前傳統的恢復，他的雜志編輯們每個星期會在這里聚會一次，討論內部事務并接待訪客。一個下午我來到此間時，他們的聚會才剛剛結束。我們在主回廊里喝咖啡，沒想到此舉給一名侍者帶來不便，他走過來跟安德拉什頻頻道歉，因為剛剛在安德拉什的固定座位上沒有找到他，因而害他錯失一通電話。古老的習俗、古老的禮數：對我而言，這類蓄意的復蘇倒也不失其魅力和方便性。

安娜和加博爾是六十幾歲的文人夫妻，在我心目中，他們是我所珍視也偶爾碰到的典型中歐人士。他們猶太人的身份并無損于這個事實，畢竟許多典型的中歐人都是猶太人。他們經歷了生命中的高潮與低谷，因此調整出一種靈活性，儼然是長年動亂歷史的產物，這深深觸動了我。他們很博學，精通多種語言，洋溢著年輕的活力。他們對每件事都會思考，也都會坦誠以對，具有東歐人令人愉快的坦率個性，似乎比我們少些禁忌，也許只有和共產黨相關的事情是例外，不過安娜和加博爾連在這方面都很坦然。

我一年前拜訪過他們。他們的公寓雖然稱不上豪華，卻舒服愉悅，收藏了一些很好的匈牙利畫作，包括一個村莊的水彩畫，描繪的正是加博爾成長的家鄉，他父親是當地優雅的猶太貴族。書房中擺滿了他們兩人寫的書，內容主要關于戲劇和文學。安娜的書架上還擺了有關女性的書，她在一家女性雜志社擔任編輯多年，加博爾則任職于一家文學雜志社。

加博爾的長相就像強壯結實的卡夫卡的翻版，大而突出的棕色眼睛，加上同樣突出的耳朵。他的回答迅速且隨興，我有時都懷疑他是否漏聽了我講的話。不過他并沒有遺漏任何東西，相反，他迅速領會了每件事，而且在我尚未意識到之前做出了判斷和結論。我們聊得很順暢，從一個主題聊到另一個主題，話題源源不絕。相較于加博爾的跳躍性思考，安娜則以她無礙的辯才，一路活潑暢談。她并未強調任何鮮明的性格，只維持著一種相當平常友善的態度，委實讓人尊敬；而她的智慧洞見使她無論碰觸任何話題，都能一針見血。

不過這一次，我驚訝地發現他們兩人有些警覺，甚至還有些憂慮。剛開始時，加博爾和安娜對于情勢的改變都非常熱切，不過他們告訴我，去年會過得那么困難，連他們自己都覺得訝異。他們不喜歡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基督教民族主義的趨向，對文化的價值遭到摒棄覺得很不安，發現自己很難認同采取一種更商業化的文化的急迫性。加博爾對其任職的文學雜志的逐漸蕭條，甚至可能歇業感到憂心忡忡，對他的新嘗試，即以商業為基礎運營巴黎雜志《國際文學》（Lettres Internationales）的匈牙利版，也甚為煩惱。

安娜是和我交談的匈牙利人中，第一個提到“女性問題”的女性，她對于這方面的若干倒退現象也感到沮喪。事實上，她并不認為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她知道女性主義的概念已經被前朝的“樣板女性”所毀掉了，那些都只是展示給粗心的外國人看的，就像俄國的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s）[[32]](#_32_5)一樣。然而，眼下年輕女性間所流傳的回歸“子女、廚房、教堂”[[33]](#_33_5)的思潮卻讓她深感困擾。

我覺得相當古怪，一個年長的女性可以抱持如此充滿活力的前瞻觀點，年輕一輩的女性卻那么不符潮流地自我退縮。不過，加博爾和安娜是戰前自由主義所塑造的大都會現代主義分子，經歷了戰后東歐的種種奇特變遷。他們這類知識分子，起初便視將要到來的為帶有獠牙的進步主義，因此他們的浪漫絕不會轉為狂熱與激情。起居室內懸掛著加博爾父母的畫像，美麗的臉龐流露著早期現代主義風格的優雅。加博爾還記得自己在匈牙利北部鄉間度過的快樂童年，那時唯一的電動車是他的玩具車，周末通常是在朋友家度過的，和他們一起的還有藝術家和作家。安娜的回憶則包括她母親告訴她的有關外祖父的故事。安娜的外祖父是個畫家，他的女兒們刺繡時，他會讀海涅（Heine）的詩給她們聽。安娜的祖父則像許多匈牙利猶太人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加入奧匈帝國軍隊，并以東歐貴族后裔的身份成了戰俘，在西伯利亞（Siberia）被囚禁了六年之久。

加博爾和安娜很少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血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匈牙利以德國盟友的身份加入戰局，而在那之前，霍爾蒂（Horthy）[[34]](#_34_5)將軍政權便已開始扭轉數十年以來的猶太人同化政策。但“偉大的休止”，借用安娜選擇的字眼，發生在1944年，希特勒下令占領匈牙利，設立一個親德政府，由霍爾蒂繼續攝政。在那之前，布達佩斯沒有德國人，安娜的家人和他們的社交圈也覺得自己跟噩運沒有關系。

1944年，針對猶太人的隔離和驅逐政策開始了。安娜的父親被送往勞工營，安娜和媽媽必須搬到猶太人居住區。接著是熟悉的后續政策：學校關閉，佩戴黃星標志和擁擠的猶太區。不過他們仍然相信這一切很快會結束。安娜的一個阿姨被放逐到鄉間，曾寫過一張明信片給她們，上面只有一句話：“我們被帶到奧斯維辛（Auschwitz）。”沒有人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

1944年10月，霍爾蒂透過無線電演講，要求與同盟國維持特殊的和平。安娜的父親短暫地從勞工營獲釋返家，家人們也以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但就在那時，隨著霍爾蒂決定完全從軸心國抽身，反猶太人的行動加強了。安娜的母親被帶走；一位有辦法的表親協助安娜，一起短暫藏身在一個畫家朋友的畫室，正如安妮·弗蘭克的情況一樣。德國人到過那建筑一次，但沒有走過庭院；第二次他們就長驅直入了。

那個晚上，安娜被帶到多瑙河沿岸。聊到這里，她順帶一提：“你有沒有去過盧卡奇（Lukács）溫泉？就在那附近。”我去過。那是布達佩斯美麗的浴場區，有好幾層梯臺和各種溫度的戶外溫泉。這群人的前四位被編成一組射殺，然后被扔進多瑙河。安娜和她的表親被編為第二組，受令上前一步，她們知道，這就是生命的終點了。

結果她們又錯了。受命執行這項任務的匈牙利人說，他們沒有興趣屠殺無辜的婦孺。他們說，他們會離開五分鐘，還給了她們每個人一點錢。

安娜和她的表親逃到最近的一個藏身處，即溫泉廁所，在那里站了一個晚上。安娜當時想的是：“如果這次能夠活命，那么在這一生中，我還會害怕數學考試嗎？”結果，她還是會怕。熬過了饑餓、更多次的躲藏與布達佩斯圍城戰，她終于明白，即使有過這些經歷，對日常生活的擔憂終將接手，學校考試依舊讓人緊張。

一切結束后，安娜和父親團圓，不久后他們即發現母親沒有活下來。然后，她繼續生命的下一篇章，就像她無法提前想象過去的篇章一樣，也無法預料未來的發展。

比起離開東歐的猶太人，我們對于戰后那些留在東歐的猶太人了解很少。他們通常是同化較深的猶太人，而且在共產主義之下，本來就不該有種族區別。那是共產主義許諾的一部分，也是吸引許多猶太人加入共產黨的原因。無需否認，和波蘭的情況一樣，在匈牙利的黨員中，也有許多優秀的猶太人。安娜是1947年加入的，部分出于理想，部分出于現實。一個黨內女同志暗示安娜，他們可以幫助她上大學，否則安娜絕對讀不起。

此外，戰爭的深刻經驗也讓她認為這個世界實在應該進行些改革。“我本來是個很熱情的人，直到世界開始翻轉，”安娜以她一如既往的平和態度敘述，“而這世界也未免翻轉得太快了。”首先，安娜本人很快成為嫌疑犯，因為她的“資產階級”背景，因為她懂英文，因為她有一次寫了“課程”這個詞，證明她是個勢利的人。

然后她認識了加博爾，這使得情況更為復雜，因為當時加博爾的繼父正在監獄。“我們的幻想在1953年破滅了。”安娜說。在所有前共產黨員的生命史中，都有個令其意識覺醒的確切日期，就像指彈一下，便從催眠狀態中醒來。對安娜和加博爾而言，那震撼倒不是來自斯大林的去世，而是加博爾的母親終于獲準探視遭到囚禁的丈夫，由此得知她的丈夫是莫須有地被囚禁的。在那之前，就像許多這類囚犯的家屬一樣，她總認為一定是因為某些事，或許是一件小小的違法行為才導致被囚。在我們的世界中，追求合理性是一種自然的沖動，我們都很害怕到頭來只是純粹、黑暗的無理性。但情況竟然就是如此。

在這個發現之后，而且知道許多人也有類似經歷后，安娜加入了一群內部的反對派改革人士，并參加了一個正醞釀1956年起義的文學雜志。她溫柔地回顧那段歲月，包括文人間的友誼和丑聞，對話的生動活潑，特別是那種有著共同目標的感覺。由于不服從中央政策，雜志編輯定期性地遭到撤職，只是換來的人從來不會變得更馴服或少惹是非。有一次，前任警察總長被任命為總編輯，結果令他上司懊惱的是，雜志竟然仍繼續原本的改革路線。然后是1956年革命那離奇的兩周以及驟然的壓制。那次革命的奇特在于，最初幾天雖然局勢緊張，城市的有些地方戰事激烈，但其他部分卻不受影響，平靜如故。起先，安娜還有種節慶的感受，之后情況急轉直下。

當一切結束時，結局對安娜而言是無可避免的。她離開了共產黨，結果幾乎找不到工作，不過她并不覺得自己有其他選擇。“我知道得太多了。”她簡單地說。對她而言，從來沒有要不要重新加入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反而是她今后的作品，是否還要使用“反革命”這個詞——那是官方對1956年革命的欺人之談，因為一旦使用，便等于屈從于扭曲的事實。“這是我永遠都不會做的事，”她說，“我也從不使用那個詞。”

摒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依附更為困難。安娜仍然記得一位朋友在1956年事件后不久所用的一種表述：“你知道，當我是共產黨員的時候……”安娜當時非常震驚。“不過我還是共產黨員啊，”她心想，“是黨本身變了。”

我問她是什么因素導致她幻想的最終破滅的，她拿自己母親的去世與之比較，而且毫無夸張的不協調感。“她被帶走的那天，我便失去她了，但是當時我不知道。我一直等，也許會有消息，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她。失去政治信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對安娜和許多共產黨員來說，1956年的革命和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的雙重震撼，才完全喚醒他們當時已泰半理解的事。對于弗洛伊德所謂重大創傷需重復發生，才會印刻在潛意識中的理論，此例不啻提供了反證。

加博爾則留在黨中，一直到最后，也許因為他意識到，掌握他們人生的命運本來就無所謂理性可言，也或許因為天性樂觀使他不愿面對最嚴酷的事實。加博爾說，他是一個永遠不愿離開童年的人，因此充滿熱切的玩心，即使談起戰爭中比較危險的時刻，也有如一種極度刺激與荒謬的冒險。他在戰前便加入了共產黨，即使他身邊的人開始被逮捕，盡管繼父被抓走，他也沒有改變。“我完全不懂這整件事是怎么回事，”他說，“我知道那些人跟官方的立場不一樣。然后，我了解這整件事就像宗教法庭（Inquisition）[[35]](#_35_5)一樣，他們先決定誰有罪，然后才去證明。但問題是我接受了這一點，這是一種自我防御的心態。在整個共產主義中，始終有些精神分裂的狀況存在。”

加博爾唯一一次覺得自己和黨有了無法協調的沖突，是黨居然要他從事一份朝八晚五的工作。對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中歐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種無可容忍的侮辱，所以他斷然拒絕。總之，他留在黨內的動機逐漸變得比較務實，雖然在最后階段時，他覺得黨員資格本身“很有意思”。他們的討論經常很熱烈，從內部可以學到和做到的一些事，在黨外是無法完成的。“不要把圍墻拆掉，你懂吧，但推推圍墻則無妨。”

不過，加博爾和安娜都繼而成了大眾文學家，戰后依然在東歐占有一席之地，而最矛盾的是，他們的境遇使他們比較接近兩次大戰間的巴黎文人，而非戰后的紐約知識分子。他們有很多時間，不需要太發愁金錢，對重要性、使命感和文化則具有強烈意識。加博爾成為一名劇評人，對于先鋒派情有獨鐘，任職于一家文學雜志社，寫了很多關于戲劇的書。安娜最終在一家女性雜志社找到工作，讓她有機會旅行和從事創作。唯一遺憾的是，她不知為何，依然算是邊緣的文學人物。但當我問她是否會覺得因為她是女人，所以事業多少受到妨礙時，她說其實不會。而我之所以這樣問她，是因為知道她對這種事非常警覺，“其他的歧視現象太多了，”她說，“在戰爭結束后，我們經常開玩笑，如果德國人征服我們，罪名就出在我們是猶太人；如果英國人征服我們，我們就是匈牙利人；如果俄國人征服我們，我們就是資產階級分子。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是個女人，就會受到歧視了。”

倒是加博爾表示，目前的改變所給予他們的困難，并不亞于他們之前經歷過的一切。在經歷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人生之后做此回答也許令人費解，但是這些改變確實對他們世界的深層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撼動。加博爾說，目前不確定的程度比數十年前還來得嚴重。在卡達爾時代，人們知道游戲規則，也知道有墻壁的存在。你可以去推，但墻壁不會倒塌。可一旦墻壁消失了，雖是良性的改變，卻也創造出另一種混亂與迷惘。沒了墻壁后，要如何定位你自己？又要去推什么呢？

安娜對于文化價值遭到摒棄特別覺得焦慮，其他時候也就罷了，怎么會是現在，現在是文化終于真正獲得自由的時候！她這一生都在避免自我造假欺騙，結果現在卻被迫適應全新的折中妥協。當她談到她的雜志如何試圖遷就“大眾”口味時，更加義憤填膺。“我不會去寫女明星和她們的狗。除了評論，我不會寫文章推銷書，我拒絕干這種事。”在那段惡劣的舊日子，她曾采訪匈牙利作家，并集結成書，結果有人要她拿掉有關康拉德·哲爾吉的那一篇。她拒絕了。后來經過一番討論，她雖同意刪掉幾句話，但那個章節至終獲得保留。而現在，她不可置信地說，經常合作的出版社竟以商業性不足為由，說無法出版她的新書。

“告訴你實話，”她說，“我們依舊在反對陣營中，也很驚訝自己的處境會這么困難。”經過一生浮沉，他們試圖堅持開明、現代主義的文化價值——這種情感再度面臨危機，而且不僅是在東歐而已。

“我們太老，不適合做這種事了，”加博爾說，然后又悲傷地加了一句，“下一步該思考的是死亡，那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雖然我并不覺得他們老了，但這也可能是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他們是一種標志性人物，代表時間的流逝，個人時代的推移，正需要就生命做一總結，也需要權衡力量重新再起——就像所有決裂和開始的契機，一種生命無常的體現。

\* \* \*

去年在此地時，我曾短暫探訪過匈牙利東北部一個小村落克勒姆（Köröm），因為那里深得我心，所以這次決定再去一趟。我和一個年輕的文學講師和翻譯托馬斯（Tomás），以及他任職于國立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母親伊洛娜（Ilona）一同開車前往。那個村落接近米什科爾茨（Miskolc）這個外表恐怖的工業城市，它號稱擁有匈牙利最高的“摩天大樓”，據我肉眼觀察，大概十六層樓高。不過在接近克勒姆時，我們經過了幾處地勢平緩、未經修飾的美麗風景，點綴著小型湖泊和池塘。接著我們搭乘渡輪越過慵懶、藏在陰影中的紹約河（Sajó River），渡輪大得可以容納一部車，靈巧地依靠水流導航。岸邊有棵高大的垂柳，牛群在安靜地飲水。托馬斯從小就經常來這里，對伊洛娜來說，這里則是第二個故鄉。我看得出來，這里的田園色彩與輕松溫暖對他們具有喚醒記憶的迷人魅力，即便對我也不例外。

我們在克勒姆的歇腳處是一座巴洛克風格的教區住宅，主人是位天主教神父，每個人都直接叫他托尼（Tony）。我們抵達時，托尼正在為一張他從附近農舍找到的路易十四時期的精致桌子上亮光漆，那張桌子過去是用來剁豬肉的，刀痕仍歷歷可見。此外，托尼還是個唯美主義者，一個時髦男子，他所住的古老結實房子中，滿是他所找回來的雜七雜八的工藝品與古董家具。

除此之外，他還是個精力無窮的人，在這偏遠的村落創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公益之邦：他船運大批書本與衣物給受困于特蘭西瓦尼亞的匈牙利人；為智力發育遲緩的孩子舉辦教育度假營，自己也在當地學校教書；去年夏天，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荷蘭青少年前來此間為他的項目提供幫助。

克勒姆本身是個完美的風景如畫的村落，有著玲瓏的小木屋、清麗的空氣和點綴著露珠的花朵。這里的房子色彩明亮，與波蘭和捷克以土黃為基調者大相徑庭——這里還更靠近南邊一點，而且大部分房子都有一個側廊，豎著一根根方形的白色廊柱。對于這些廊柱，托尼有個理論，或他所謂的資料。他堅稱這些廊柱起源于古希臘衛城（Acropolis）[[36]](#_36_3)，后來經過文藝復興與巴洛克建筑流傳下來。村民們的廊柱規模雖然小得多，但肯定是在努力模仿。托尼對太陽底下的任何事物，幾乎都有一套理論。

當然，托尼之所以在此地落腳，背后也有一個故事，一段歷史故事。不過當我們坐下來共進晚餐，圍坐在奇大無比的舊式廚房的大餐桌旁時，他又精神奕奕地聊起手邊的各種事情來。他個子很高，身材健壯，滿頭華發，面色紅潤，一雙藍眼坦誠而年輕。他說在外出旅行時，別人常誤以為他是“美國佬”，也許是他神情間總流露出某種純真或坦率吧。晚餐由他的管家伊隆卡（Ilonka）準備，貌不驚人的她個頭結實，動作笨拙，手忙腳亂，看來個性頗為害羞。但她的料理技術卻毫不笨拙或怯生，甚至可說已達藝術極品之境。這頓晚餐她做了一道帶點苦味的色拉，里面有十二種綠色原料，包括幾種托尼鼓勵她使用的當地藥草——托尼主張要就地取材；接著是加了鵝肝的清湯，滋味之精致是我從來沒有品嘗過的；在搭配了包心菜的意大利面中，伊隆卡展現了將完全相左的食材微妙地搭配在一起的本領；那類似海綿蛋糕的甜點卷包著杏仁內餡，質地松軟得讓人難以想象它們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我對于每道菜都贊不絕口，使得伊隆卡防衛性地垂下厚鏡片后的眼睛，像是懷疑我在諷刺她似的。不過托尼開心地聊起食物，將美食文化衰退和即將復蘇的歷史敘述一遍，并將之與共產主義以及將來的變化等等聯系起來。此外托考伊葡萄酒（Tokay，匈牙利語為Tokaji）也被他頌揚一番，真是人間美味。

接下來他繼續解釋，當地野生動植物有種特殊的力量和韌性，因為喀爾巴阡（Carpathian）盆地極端善變的氣候逼得所有生物都必須不斷適應。接著話題又轉向匈牙利人的性格，根據托尼的說法，經由不斷反抗和調適的平衡過程，匈牙利人也有種特殊的活力。他說馬扎爾部落發源于亞洲內部，在大約三千年前從周邊的蒙古部落脫離出來，大約兩千年前，托尼繼續說，開始往西移，最后才落腳于現在的區域。依照他的說法，這個民族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整合周遭文明的特質和習俗，同時又能避免被完全同化而喪失自我意識。所以馬扎爾人在亞洲和歐洲特質間發展出一種微妙的平衡，這種彈性使得他們能適應各方影響，而不致喪失核心性格。“法國人，你知道，被他們的榮耀感困住了，”他說，“他們的榮耀成為他們的負擔。而對匈牙利人來說，很少有什么事是絕對的。”

在冗長的晚餐后，我很快便入睡了。配給我的房間十分寬敞，有十字造型的拱形天花板和厚厚的墻壁，窗戶裝在深嵌的壁龕中。第二天，我在村子里繞了一圈，這里的生活真是一目了然，猶如敞開的牡蠣殼。

克勒姆可以分為地理上頗為明確的兩部分，一邊是匈牙利人，一邊是吉卜賽人。我們穿過吉卜賽區，伊隆卡分發衣服給所有前來領取的人。一群孩子聒噪地跟著我們到處走，個個臉孔美麗，配上大大的眼睛，而且很快仿效起我們的動作和他們聽到的英語。克勒姆的吉卜賽區很明顯也有自己的等級制。在比較“好”的地區，房屋是灰泥粉飾過的，有些還算寬敞，只是沒有任何外在裝飾；比較貧窮的地區則有如貧民窟，房屋簡陋，有些甚至僅僅是用大片硬紙板混合上泥土、稻草和其他雜亂的東西組合而成的。夏天，赤身裸體的孩子和大人懶洋洋地閑晃著，后面跟著一樣懶散的狗，給人一種嘉年華的怪誕氛圍；不過若換成冬季，住在這里一定很凄慘。聽說每到冬天都會有人凍死，盡管說實話，經常都是些喝醉酒，還沒到家便在半路睡著的人。

在匈牙利經常可以聽到對吉卜賽人嚴苛的批評，不過在托尼看來，光是吉卜賽人的大量存在，便是匈牙利靈活性的證明。“匈牙利的邊境比較寬松，”他說，“所以吉卜賽人才會在這里，而不是在西歐。從某一時期開始，西歐所有土地都被劃分為私人財產；但這里每個村莊都有些公共土地是不屬于任何人的，而且每個村都有條泥巴路貫穿而過，方便他們搭乘篷車旅行。匈牙利是唯一一個可以在泥巴路上行進上百英里的國家。”

好幾個世紀以來，吉卜賽人一直是歐洲另一個“異類”。就像猶太人一樣，他們是恐懼與嘲弄的對象；但除此之外，這兩者是既相同，又完全不同的對偶。猶太人靠著書本和圣經延續至今，吉卜賽人則在沒有文字文化，也沒有復雜信仰體系的情況下繁衍。他們經常依附于所住地區的宗教，所以在克勒姆，他們會來托尼的教堂，只是也會把他們習俗的痕跡帶進儀式中。他們會在死者棺木上留些香煙和伏特加酒，有一次甚至還放了一把小提琴，讓往生者在前往下一個世界的路途中能獲得慰藉；同時他們也經常覺得往生者的鬼魂會纏著他們。總而言之，吉卜賽人對我而言，儼然是生活于上帝律法及日常法理之外、獨一無二的奇特實驗——那是一種流動、游牧、短暫的存在，既看不出社會規范的制約，也看不到超越當下的欲望。令人驚異的是，這種方式的存在居然一再證明了它的韌性，以及吉卜賽人之不可同化的特質，仿佛沒有體制的生活也是人類存在的有力假設，并不亞于堅守體制的生活模式。

所有這一切都在逐漸改變，而且很可能會改變得更多。我心情復雜，被贊成進步的道德正確以及不無遺憾的美學撕扯著。又將消失一些色彩繽紛的差異，但不用說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不是影視技術公司，不會為了我而制作精彩的影片。不管怎樣，當我行走于村落周邊時，立刻明顯感覺到了吉卜賽人生活方式的危機。我停下腳步和一個年輕家庭聊了一下，他們身旁就是寒磣的居所，院落里滿是鐵絲、車胎和雜草。那個父親在一盆泥水中泡腳。他很驕傲地告訴我們，他會看電視上的新聞節目，知道匈牙利各個政黨的名稱。至于比較大的變化……沒有，他看不出他們會為吉卜賽人做些什么。“就像街道的名稱一樣，”他說，“名字雖然改了，但街道還是一樣。”他看上去對自己的比喻感到很滿意。那個母親懷抱著一個小男嬰，我問她是否夢想孩子上高中，或哪天能上大學。“他干嗎做那些連我都沒有做過的事？”她反駁道。

但是一個新成立的吉卜賽政黨“弗洛里帕”（Phralipa）在當地的年輕代表卻馬上宣稱，他們人民的新目標之一，便是教育自己。龍托·奧蒂洛（Ronto Attila）是個安靜害羞的年輕人，他交叉手臂環在身前，像是在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我們在一間比較富裕的水泥屋內交談，房間內裝飾著各種便宜的布料、成排的酒瓶和極為庸俗的石膏塑像。墻上掛著一張老舊的萬寶路（Marlboro）男性香煙廣告，天曉得那是如何輾轉來到此地的。房內有各種各樣的人，各個年齡的人，就站在四周，從敞開的門進進出出，觀看房間里的動靜。

雖然對生命的政治理解跟吉卜賽人具體實在、近乎異端的、與意識形態無關的存在可謂大相徑庭，但這個情景和與龍托·奧蒂洛的對話，都顯示出一種類似政治自覺的萌芽。對我所問的大部分問題，這位年輕的黨代表都以非常精明甚至套路的方式回答，和任何政客沒有兩樣。全世界的答案都一樣！但是他所描繪出的問題是嚴峻的。在過去兩年里，百分之五十的吉卜賽人失業，其中大部分都在米什科爾茨的工廠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辦法蓋新的房子，因此有時一間房子得住上二十到二十五個人。龍托·奧蒂洛正在申請資金，成立他們自己的建筑公司。他花很多時間在填表格上。事實上，吉卜賽人的衛生條件不是很好，經常生病，所以就必須填表申請傷病補助金。他把他正在填寫的一些表格拿給我們看，證明他說的是實話，或許也是為了炫耀，因為他是此地少數幾個知道怎么做這些事的人。他用充滿責任感的柔和語氣向我們確保，他愿意為他的同胞做任何事。畢竟，他是他們的代表。

村里還有其他吉卜賽政黨嗎，我突然心生一念，便隨口問了一句。對這個問題，這個新的民主主義者的反應可就本能得多。“我不會讓其他任何人進來的！絕不容許！”他宣示著，兩眼閃閃發光。嗯，這些才只是開始，等到明年，雖然未必是他所期盼的，但龍托·奧蒂洛一定就會得到答案了。我們又在另一間糟糕的簡陋住宅前駐足，一位抽著煙，身形瘦削，神態緊張的女人邀請我們進去。但見屋內是泥巴地面，墻上貼著一張從雜志上剪下來的非常舊的麗塔·海華絲（Rita Hayworth）[[37]](#_37_3)的照片。“我只有一個人。”她告訴托馬斯，表情極其憂傷。她先生去年冬天過世，孩子們也都離開家了。“我沒有其他人。”“住在這里一定很辛苦。”我環顧四周。“不是的，”她痛苦地搖搖頭，“那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只有一個人。”無論何處，人類的情況都一樣。

我們輾轉走出吉卜賽村落，后面跟著那群以模仿為樂的孩子。托馬斯領我來到當地企業的辦公室，這家公司雇用了村內大半的匈牙利人口。我們跟公司的會計員聊天，她是個金發、結實、四十多歲的女子，精力充沛，口齒伶俐。政局的改變為公司帶來極其諷刺的轉變：1960年，村子經歷了強制性的、令人厭惡的集體化政策，現在則面臨同樣出于被迫、毫無意愿的私營化政策。不錯，剛開始時，村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進入公司的，那名會計告訴我們。對很多人而言，這是一種悲劇。不過后來他們就習慣了，公司也經營得非常成功，收益逐漸增加，共享的農業經營方式變得更容易也更有效。所以現在，每個人反倒都對即將到來的私營化的最后期限心存憂懼。

會計皺著眉頭，真心煩惱地談到分配眾多共同財產的實際困難。員工要負責將價值一億匈牙利福林的財產以代金券的形式分給兩百名企業員工。但是要如何比較一塊土地和一輛貨車的價值？而且如果一塊土地小到無法自足地經營農業，被分到的人又該怎么辦？何況，大部分農民此刻都已經失去獨立務農的本領了。她看不出任何解決方法，同時，公司營運已經出現困難，亦即當前東歐許多大企業所共同面臨的惡性循環問題。當國家津貼停止，公司的主顧——比如米什科爾茨的一些從克勒姆購置牛奶的工廠——都開始停止付款，他們該如何支付乳牛所需要的飼料？很快地，公司員工的薪水也將面臨危機，不過目前她還沒有告訴他們這件事，不想讓他們緊張。這是一種出于父性或母性的心理吧，我很能體諒這點，因為我看得出來，她是真心把公司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來看待。

我問她新成立的各個政黨對她的窘境有沒有什么幫助，這激起了她相當激動的厭惡。沒有一個政黨有任何幫助，他們全都各懷鬼胎，而她自己有兩百名員工和實際的問題需要解決。他們只擔心誰可以支持他們的理念——“所以他們才叫政治人物啊”——關心的不是實際的日常難題。

不過我接下來遇到的一個政治人物，似乎對所有問題和訪客都有負責的意愿。他是克勒姆的市長，另一個精力旺盛、滔滔不絕的人。我開始相信托尼的理論，所有生長在喀爾巴阡盆地的物種都特別強悍。市長身材矮小，頭發艷紅，滿臉雀斑，非常好客。他親自來花園迎接我們，還拿自家葡萄園所釀制的托考伊葡萄酒招待我們。那酒滋味獨特細致，混合了淡淡的松脂酒[[38]](#_38_3)和甜甜的波爾多葡萄酒之味。我們一邊飲酒，一邊聽他比手畫腳地高談闊論。他告訴我們，“人們”對于新的自給自足的運作方式很難適應，仍然等待“上面”的指導。然而他不等待任何人，已經開始采取了一些行動。比如他已開設一間獨立的小學，也正在規劃許多其他項目。他自己是個老師，也是個足球運動員，喜歡新鮮的事物，喜歡采取行動——這正是他當初決定競選市長的原因。

公司的事該怎么解決？我問他。他長長嘆了一口氣。是啊，那的確很棘手。不過他覺得有個解決方法，就是幸好，就在村子外緣有座溫泉。他的想法是在公司解散后，立即再重組一家新的，以這座溫泉為中心建立一個別致、一流的度假勝地。

當我向托尼提及這件事時，他露出一臉好笑的神情。“啊，對，那座溫泉，”他說，“多年來，那已經成為克勒姆的固定觀念了。”那座溫泉就那么誘人地位于鄰近地區，而且未經開發，只要加以適當的支持，應該就會成為村民夢想中會下金雞蛋的母雞。這個評論使我對村民生活有了整體的概念：這里的村落和夢想中的溫泉，過去幾百年都基于相同的計劃；在這里住了好幾個世紀的吉卜賽人；此處的現代問題；以及回到那座可以像魔術一樣解決所有難題的誘人溫泉。

不過當然啦，還有另一段歷史切入這徐緩漫長的生命周期。我在托尼的房間和他聊了許久關于他遭迫害的那段歲月。托尼也在監獄中待過，前后八年。他是明曾蒂主教（Cardinal József Mindszenty）[[39]](#_39_3)所領導的激進派教士之一，在“那一小段時間”——他對1956年革命的稱呼——之后，是被指定遭受特別報復的一群教士之一。

托尼說，教士比較容易適應監獄生活，因為他們沒有妻兒需要操心，神學院的生活也已經為不論是與他人共享隔間還是更大的孤獨都做好了準備。“每間牢房就是一個有四名教士的小修道院。我們可以互相打氣。”在這“小修道院”中，他們互相教授語言，在肥皂上刮寫單詞，還在衛生紙上寫祈禱文。有時他們還會為彼此舉行彌撒，使用監獄里的面包和他母親藏在蛋糕里送給他的一顆葡萄籽，把水倒在上面。“一滴就夠了。”托尼說。我不禁聯想到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40]](#_40_3)的《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41]](#_41_3)，以及小說中描述的，對一個墮落的教士而言，彌撒所具有的神奇與轉變的力量。

后來，教士們被轉入其他牢房，和其他囚犯拘禁在一起。托尼說，和他同監的獄友都非常優秀。有一位前朝的部長，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一名憲兵。他們之間產生了非常有趣的對話，從他們的小宇宙中，獄友們試圖拼湊出一幅“統治體系的心智圖”。在這共同的困境中，雖然有時人們相互斗爭，“彼此深惡痛絕”，但他們卻發展出了“非常、非常深厚的”友誼。

最后，托尼被獄內一個團體征召，為秘密警察翻譯文件；如果不是這樣，那些文件將永遠不見天日。其中包括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中的論文、丘吉爾的回憶錄、有關蘇聯間諜系統如何運作的書籍，以及訓練狗的手冊和藥品手冊等等。毋庸置疑，正是這些閱讀強化了托尼天馬行空式推測的嗜好，例如他認為整個卡達爾時代是蘇聯主導的針對匈牙利人精心設計的實驗。不過，根據他的經歷，也不難理解為何他認定在權力的世界中，懷疑是事實之母。

有沒有人陷入絕望？在我試圖揣摩這翻轉的世界的過程中，這是我的標準提問。托尼的答案和每個人的答案都一樣。他不談論信仰，也許那方面太過敏感吧，只說心理上的存活非常仰賴個人的性格。托尼記得有個運動員拒絕做任何體力鍛煉，因為他覺得牢房內的空氣太污穢。“對我而言，運動對我幫助很大，”托尼笑著說，“還有瑜伽。但是對他而言，在那種環境下進行體力活動是無法忍受的，因此干脆說空氣很糟糕。”

在那段時間里真正始終陪伴他的，他說，是體認到在任何情況下，人們總可以尋找到一小處開口、一個小洞、一粒僅屬于自己的東西，人可以在任何狀況下都設法過“一種合理的生活”。這小小的體認也已經透過一段段一般人難以想象的故事，緩緩地在我心中成型。這些故事是東歐人生命的歷程，是他們共同擁有的生命記憶的一部分。我可以想象，他們也共同擁有由此得出的一種認識，就是同時承認權力與不公正，并且明白其實根本不必完全臣服，總有些什么是他們可以在其間運作的。

出獄后，有一陣子托尼不能傳教，而在工廠和教區圖書館工作。他利用那段時間學習藝術和大提琴，并組織教會的各項展覽和音樂會，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布達佩斯教會事務局最終得出結論，他做這些事惹出的麻煩比三個激進的教士還要多，于是決定讓他恢復傳教，條件是必須前往偏遠的克勒姆，等于遭到放逐。

托尼同意了。過去二十年，他蔑視當局的判決，將他的教區周邊轉化為一個藝術家、學生和國際天主教青年骨干的小型聚會中心。他的蓬勃活力使其有如一個因為不再恐懼而任由自己精力脫韁狂奔的人。我們的談話在托尼的房間進行。房內擺放著一臺三角鋼琴，他正在學習彈琴；另外還有一摞賞心悅目的書，以及幾幅現代宗教繪畫。他給我看一本他寫的書：“出于我私人的熱情。”寫的是皮林斯基·亞諾什（Pilinszky János）[[42]](#_42_4)。根據托尼的描述，皮林斯基堪稱匈牙利的T. S.艾略特（T. S. Eliot）[[43]](#_43_1)。最好的報復便是活得精彩，這世俗的觀念似乎很適合托尼思慮周詳的積極作為。毫不意外，托尼對改變十分樂觀，對他的同胞適應改變的能力也抱持著極大的信心，正如他們已經適應了許多其他事情一樣。“匈牙利人很有天分，”他說，“他們想要好的東西，最好的東西。”之后他便披上黑色長袍，主持晚間布道去了。

在我們談話過后，我在克勒姆安安靜靜地走了一個鐘頭。牛群沿著主路默默前進，然后用鼻子頂開柵門，自己進入它們的庭院，有如五點鐘離開辦公室的人群。村子里干干凈凈，村民在他們的小陽臺上聊天，有個吉卜賽男孩在一小片無人的草地上唱歌。時間慵懶怡人地往前挪移，正如天際的太陽。

在我離開克勒姆之前，另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出現在草原的景致中。她向我介紹自己是瑪吉特阿姨（Auntie Margit），這里的人習慣稱呼年長的女性為阿姨。瑪吉特阿姨有雙大大的藍眼睛，頭上戴著頭巾，嘴里只有一顆牙。她似乎永遠面帶笑容，話又多又快，跟我講話的態度宛如我是她的朋友，盡管她滿口匈牙利語。在七十幾歲時，瑪吉特阿姨成了一位藝術家。這一切起始于一名來自布達佩斯的有名藝術家在當地教會指導的繡帷編織活動。瑪吉特阿姨當時便感受到內心的召喚，并在那以后開始創作起自己的繡帷圖案來。她把她的作品拿給我們看，其中大部分是在幾平方英寸的帆布上編織的小畫，包括她的孩子們的婚禮、某個人的喪禮、圣人的肖像畫等等。她從一個古老的抽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折疊的桌巾和襯墊，上面有她母親和祖母繡制的花樣。她從小就看著女人們制作這種幾世紀來都沒有改變的紅色繡帷，她說這是她最初的靈感。當我告訴她，她正追隨著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44]](#_44_1)的腳步時，她開心地握緊雙手。在我們準備離開時，她還特地拿出一小片圣安東尼（St. Anthony）的繡帷，一手在她胸前按了一下，然后把繡帷遞給我，手勁出奇地有力，表示這小小的作品是她的一片心意。

我心想，管他政不政治，這才是一位改變自己生命的人。不是每件事都恰好符合預定的形態，感謝上蒼，這些無以數計的活力元素，或樂觀或憂郁的性格，永遠可以超越或顛覆更系統化的生命現實。

回到布達佩斯，我參加了兩個性質迥異的活動。一個是由桑多爾·費倫齊協會（Sándor Ferenczi Society）主辦的國際心理分析會議，名為“走向千年之末：政治更迭與精神分析”，翻譯后的譯名意思稍有偏差。

這類會議不是第一次在布達佩斯舉行，但值此新環境，仍具有關鍵意義。匈牙利是東歐唯一一個精神分析傳統挺過冰河時期而幸存至今的國家；不過即使在這里，精神分析也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只能在地下運作，維系傳承于一線之間。其實在20世紀早期，布達佩斯可謂僅次于維也納，是精神分析這奇特新知識的萌芽與發展之地。費倫齊是弗洛伊德親近的弟子之一，其他幾位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包括巴林特·米歇爾（Balint Michael）[[42]](#_45)和瑪格麗·馬勒（Margaret S. Mahler）[[46]](#_46_1)也都是匈牙利人。

這次集會的主題，可以被概括為政治壓迫和個人壓抑之間的關系。演講的題目諸如《記憶與責任：政治無意識》（‘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三代精神癥模型》（‘A Three-Generation Neurosis Model’）和《政治社會的性格與變異》（‘Character and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Regime’）等等。從這些演講簡化的英文翻譯看來，這些心理學家所關注的內心問題，其實幾乎是“外在世界”的復制。他們談及歷史的“累積性創傷”和“生存策略”，對此最重要的是遺忘。有人說：“被要求不要記憶。”還有人則談及分割與碎片化，這源于經驗與知識的分離。“匈牙利人有個大問題，”中場休息時，有人告訴我，“就是他們一直被教導要有兩張面孔，一張是公開的，一張是私下的。結果到頭來，連他們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些是謊言，哪些是真實了。可以想象，隨之而來的就是某種程度的分裂。”

在匈牙利創傷的后續，有人解釋道：“歷史根本不容許我們坐下來反省，對前一時期的紛亂整理出思緒。”而現在的問題是，在最深的心理層面，也是在國家層面，到底要追溯到多久之前，才能重建一套對生命或對歷史的融合一貫的敘述呢？還有人提議“腳本概念”的精神分析療法，亦即同時檢視外在和內在的現實。

這些問題跟一般精神分析師會討論的寂寞和個人主義等等所引起的精神癥迥然不同；不過，就像其他所有一切一樣，精神分析在某種程度上是其賴以實現的文化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跟組織這場會議的費倫齊協會主席哲爾吉·希道茨（György Hidasz）聊了一下，他是匈牙利精神分析得以存續的主要功臣。我們討論的話題轉向精神分析中的禁忌話題。匈牙利患者和分析師之間可以輕松地討論金錢這個西方人士總是諱莫如深的議題；但另一方面，希道茨說，他知道在某些個案的整個分析過程中，患者的猶太裔身份從頭到尾都沒有被提起過。對此我感到有些驚愕與神奇，不過或許我不該如此，文化畢竟會真實反映在心理層面上。在精神分析方面，東方和西方雖系屬同一傳統，但兩者迥異的歷史經驗自然會創造出不同的問題，甚至不同的人的建構。此刻齊聚此地的精神分析學家所最關注的，是東歐在此轉變之際最切身的問題，即從其漫長的黑暗中尋回共同的過往，并設法接納他們經歷過的種種令人難堪的真相。

用歌劇之夜作為我匈牙利之旅的最終樂章，可謂完美至極。輕歌劇是在政權更替、革命與反革命中幸存下來的匈牙利傳統之一，也許是因為本身過于微不足道，夠不上被鎮壓的資格吧。這出輕歌劇在一家特殊的劇院演出，酒紅色厚絨布裝飾的樓梯欄桿，外加處處金碧輝煌的過度裝潢，提供了最理想的奢華背景。觀眾的穿著也同樣花哨、歡樂而俗麗。我所看的歌劇名叫《維多利亞》（Victoria），是一位名叫亞伯拉罕·保羅（Ábrahám Pál）[[47]](#_47_1)的劇作家的作品。在沒有英文節目單輔助的情況下，我所理解的劇情講的是同名女主角的感情沖突與糾葛，因為她不知該情定英俊的美國外交官，還是瀟灑的匈牙利輕騎兵。劇情中還出現了戰鼓，我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單薄的劇情中夾雜了音樂、動作、服裝和活力四射的喧鬧場面。多種文化的混雜，交織成一個巧妙時尚的夜晚；從中可以窺見好萊塢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48]](#_48_1)的歌舞片、哥薩克（Cossack）[[49]](#_49_1)的雜技表演、維也納華爾茲、羅馬尼亞和波蘭的民謠，以及日本的天曉得什么東西。在這中間，還有一段苦樂參半的美妙曲目，彈奏猶太的曲調，從悠揚到逐漸活潑，用以調侃諷刺，并和一段軍隊進行曲相互對比。整場表演不斷提醒我，好萊塢電影和百老匯音樂劇有多少是中歐的后裔，而美國大眾文化又有多少受到這種精致歡樂及喧鬧精神的影響。表演不斷贏得觀眾熱烈的掌聲和歡笑，人們還跟著節奏一起拍手，正符合輕歌劇的輕佻與喧鬧。

《維多利亞》這出戲劇的概念可以在共產主義后的現代匈牙利重復上演，只需換上更新版的國際音樂總匯，再把外交官換成美國生意人——不過輕騎兵的角色或許就只能換成一個不那么浪漫的人物，諸如雅皮士之類的了。就某一層面而言，所謂萬變不離其宗——但我卻不再知道，這是一種悲觀的，抑或是非常樂觀的至理名言。

[[1]](#_1_8)特蘭西瓦尼亞，原為匈牙利王國之領土，在土耳其攻占布達佩斯后，成為匈牙利貴族的避難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因1920年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轉而成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

[[2]](#_2_8)馬扎爾，匈牙利主要民族。

[[3]](#_3_8)卡達爾·亞諾什（1912—1989），1956—1988年出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一書記，兩度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匈牙利人名與中文類似，姓在前，名在后。本書出現的匈牙利人名均按匈牙利姓名順序。）

[[4]](#_4_8)古拉什共產主義，又名肉湯共產主義或卡達爾主義，得名于匈牙利菜名“古拉什”，這道菜需要混合各類不同食材。

[[5]](#_5_6)康拉德·哲爾吉（1933—），匈牙利小說家和散文家，以主張個人自由聞名。

[[6]](#_6_6)拉科西·馬加什（1892—1971），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在1945—1956年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7]](#_7_6)巴拉頓湖，中歐最大的湖泊，著名度假勝地。由于匈牙利是一個內陸國家，所以巴拉頓湖有時也被戲稱為“匈牙利的大海”。

[[8]](#_8_6)塔可夫斯基（1932—1986），蘇聯最有影響的電影導演之一，作品有《伊萬的童年》、《犧牲》等。

[[9]](#_9_6)安妮·弗蘭克（1929—1945），德籍猶太人，《安妮日記》的作者。

[[10]](#_10_6)納道什·彼得（1942—），匈牙利作家，劇作家及散文家。

[[11]](#_11_6)納吉·伊姆雷（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曾兩度出任政府總理。任內試圖推動自由化與退出華約的計劃，但是蘇聯迅速調派紅軍鎮壓，納吉與其追隨者曾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卻在離開大使館后被捕，隨即以叛國之名遭到處決。直到1989年匈牙利民主化后，他才獲重新安葬。納吉在匈牙利得到相當高的評價，被視為自由的先驅與英雄。

[[12]](#_12_6)1848年歐洲各國爆發的一系列武裝革命，雖然大多都迅速以失敗告終，卻仍造成各國君主與貴族體制動蕩。

[[13]](#_13_6)由鮑勃·古喬內（Bob Guccione）創辦的男性雜志，內容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文章和軟色情圖片。

[[14]](#_14_6)埃爾維斯·普雷斯利（1935—1977），昵稱貓王，知名美國搖滾歌手與演員。

[[15]](#_15_6)匈牙利并無自由產權黨，此處疑應為獨立小農黨（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之誤。

[[16]](#_16_6)一座新藝術運動風格的溫泉浴場，修建于1912—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重建。

[[17]](#_17_6)費里尼（1920—1993），意大利著名電影導演、編劇，代表作有《甜蜜的生活》、《八部半》。

[[18]](#_18_6)福林，匈牙利貨幣名。

[[19]](#_19_6)利奧波德一世（1640—1705），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國王。在位時主張絕對君主制，在統治匈牙利后引起長期的反抗運動，直待1681年取消專制，恢復貴族之特權，放寬信仰權利才漸漸壓下反抗勢力。

[[20]](#_20_6)科蘇特·拉約什（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及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領導人，擔任革命中獨立的匈牙利共和國元首。革命失敗后，被迫流亡海外。

[[21]](#_21_6)戴阿克·費倫茨（1803—1876），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司法部長，因反對以暴力作為政治手段，和拉約什分道揚鑣。

[[22]](#_22_6)裴多菲·山陀爾（1823—1849），匈牙利愛國詩人和革命志士，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學的奠基人。

[[23]](#_23_6)拜倫（1788—1824），英國詩人及革命家，也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曾為希臘革命奔走，病逝于希臘軍隊的軍帳中。

[[24]](#_24_6)約瑟夫·貝姆（1794—1850），波蘭和匈牙利民族英雄。

[[25]](#_25_6)蓋勒·埃爾諾（1898—1980），拉科西·馬加什左右手，致力于斯大林主義的匈牙利化。1956年間短暫出任匈牙利第一書記。

[[26]](#_26_4)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以色列、英國、法國為爭取運河控制權，對埃及展開攻擊。

[[27]](#_27_4)阿瑟·凱斯特勒（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記者和批評家。著有著名政治小說《中午的黑暗》。

[[28]](#_28_4)9世紀時，東方游牧民族馬扎爾人在領袖阿帕德領導之下，西遷多瑙河流域，形成日后的匈牙利。

[[29]](#_29_4)秘密出版物，即秘密寫作、印刷和發行的方式，始于1950年代，一般都是以打字復寫稿的方式出版，在讀者中間流傳。

[[30]](#_30_4)漢普頓位于紐約長島東區，為海濱度假勝地，擁有若干美國最昂貴的住宅。

[[31]](#_31_4)霍雷肖·阿爾杰（1832—1899），19世紀一位多產的美國兒童文學作家。

[[32]](#_32_4)1787年，俄皇凱瑟琳大帝出巡克里米亞途中，克里米亞總督波將金為營造繁榮假象，下令在她巡游經過的地方搭建了許多造型悅目的假村莊。

[[33]](#_33_4)德語Kinder, Küche, Kirche，或稱“3K”，是一句傳統的德語口號，描述了德國傳統價值觀中保守的女性社會角色。

[[34]](#_34_4)霍爾蒂（1868—1957），匈牙利的軍人與政治人物。1920—1944年掌握軍政實權。1945年蘇聯紅軍占領匈牙利后，流亡葡萄牙。

[[35]](#_35_4)天主教成立的法庭，負責審判和裁決天主教會所認為的異端。

[[36]](#_36_2)早期人們在山下平原修建城市的同時，也會在附近山區修建軍事要塞，稱為衛城。

[[37]](#_37_2)麗塔·海華絲（1918—1987），美國知名女演員，1940年代紅極一時的性感偶像。

[[38]](#_38_2)希臘常見傳統酒，已有兩千多年歷史。

[[39]](#_39_2)明曾蒂主教（1892—1975），匈牙利籍天主教教士。

[[40]](#_40_2)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國小說家、劇作家、評論家，代表作有《戀情的終結》、《命運的內核》等。

[[41]](#_41_2)以墨西哥為背景的小說，主題在強調世界的權力和榮耀往往是一時的，只有上帝的榮耀是不變的、永恒的，最終的權力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42]](#_42_2)皮林斯基·亞諾什（1921—1981），匈牙利詩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俘，詩作風格以并具天主教信仰和思想的覺醒聞名。

[[43]](#_43)艾略特（1888—1965），英國詩人、評論家及劇作家，其作品對20世紀，乃至今日的文學影響極為深遠。194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22年出版的《荒原》被視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詩作之一。

[[44]](#_44)摩西奶奶（1860—1961），美國女畫家。她出身農家，只受過有限的教育，七十多歲時才因關節炎放棄刺繡開始繪畫，共作畫一千多幅，是自學成才、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

[[45]](#_42_3)巴林特·米歇爾（1896—1970），匈牙利心理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移居英國。

[[46]](#_46)瑪格麗·馬勒（1897—1985），匈牙利心理學家，早期在奧地利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移居美國。

[[47]](#_47)亞伯拉罕·保羅（1892—1960），匈牙利猶太歌劇作家，1927年任職布達佩斯歌劇院，以輕歌劇逐漸聞名。

[[48]](#_48)巴斯比·伯克利（1895—1976），好萊塢導演和歌舞編導，代表作有《第42銜》、《淘金女郎》等。

[[49]](#_49)生活在東歐大草原，即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的游牧民族。

# 第五章 羅馬尼亞

也許每個旅行家的想象中，都有一處心靈的百慕大三角洲，集合了所有對無名危險和未知黑暗的不安。在我的想象中，沒有任何創意地，這種莫名危險的代表就是羅馬尼亞；而在羅馬尼亞旅館的夜晚，最令我隱隱感覺恐懼的，是特蘭西瓦尼亞這個詞。

這種不安不僅源于當地嗜血的貴族——盡管光是閱讀虛構的吸血鬼德拉庫拉（Dracula）的原型的故事，便足以嚇得人血液凝固了。他是弗拉德·德拉庫（Vlad Dracul）的兒子，名叫弗拉德·則別斯，或稱穿刺弗拉德（Vlad Ţepeş，Vlad the Impaler）[[1]](#_1_11)。雖然歷史上并沒有他從少女頸部吸血的記錄，但其真實的“豐功偉業”也夠駭人聽聞的了。弗拉德·則別斯是15世紀中葉特蘭西瓦尼亞公國的王子，統治手腕極為殘酷。如其綽號所示，他特別擅長穿刺之刑，將人釘在尖樁上。有段時期，他的城堡院落中被處以此種極刑的封建領主多達數百名。以當時還不算發達的技術來說，他——盡管還有其他許多人——絕對有資格稱得上我們這個時代大屠殺的始作俑者之一。

特蘭西瓦尼亞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因為較近期的暴力事件而顯得更加陰暗。羅馬尼亞是我訪問的國家中，唯一一個在改變的同時伴有武裝戰斗之處，最慘烈的流血事件有些就發生在特蘭西瓦尼亞的城市蒂米什瓦拉（Timişoara），亦即羅馬尼亞“革命”最先爆發之地。在巡游東歐的過程中，我不斷聽到有關火車在夜晚遭到搶劫，游客在特蘭西瓦尼亞幽暗森林中失蹤的故事。匈牙利的朋友們還警告我，不要搭乘掛匈牙利車牌的車子進入特蘭西瓦尼亞，因為羅馬尼亞多數民族和數目龐大的匈牙利少數民族間的關系相當緊張。他們自己通常也會繞道維也納租車，再穿越羅馬尼亞邊界辦事。

不過，我第一次經由特蘭西瓦尼亞進入羅馬尼亞，還是搭乘了一輛匈牙利車牌的車子。而即使不考慮外在的危險，只是為了平復我自己的恐懼，這段旅程我也找了美國朋友彼得同行。在我們跨越國界前，羅馬尼亞的跡象便開始浮現。彼得曾經到過一些世界上更偏遠的地區旅游，養成了讓人搭便車的習慣，所以在布達佩斯和德布勒森（Debrecen）之間，我們就停車載了兩個走路的人，大家一路相伴直抵特蘭西瓦尼亞。

這兩個年輕人黑發黑眸，在我們離開匈牙利之前，一直拼命地搜購食品。“羅馬尼亞沒有東西吃，”他們緊張地說，“那里一團亂，什么都沒有。”兩人都來自特蘭西瓦尼亞東部地區的布科維納（Bukovina），同為電氣工人。他們本想前往奧地利申請工作護照，結果在邊境被遣返，無功折回。對此，他們似乎就是一臉的認命。也許正如他們所形容的，眼見一大群人試圖躋身神奇的西方，令他們心存羞慚吧。他們當中一人的英語和法語說得還好，因此我們便兩種語言摻雜著用，吃力但足以理解地相互溝通。羅馬尼亞的情況很糟糕，他一直重復地叨念。伊利埃斯庫（Iliescu）[[2]](#_2_11)總統承諾得太多，結果什么都沒做，恐怖的秘密警察仍然到處都是。不錯，伊利埃斯庫的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在選舉中贏得了絕大多數，但——那電氣工人認為——那是他們控制了電視和廣播，占盡所有優勢的緣故。他用法文說了一句：“戴菲斯帽的土耳其人！”這應該是土耳其人占領時期流傳下來的一句俗語，意思是，人在謀求私利時總是狡猾無情，就像戴菲斯帽的土耳其人。

結果，在匈牙利這一側我們沒有找到一家食品店是開門的，只好在只剩一片殘梗的小麥田間拿出隨身攜帶的食物像野餐般分享，然后帶著殘余的幾片西瓜，離開了這富饒之地。到了邊境，但見一長排車輛等著入關，旁邊豎立著幾個令人滿頭霧水的英文標志：“建筑等城市”，“喂食時請熄火”，第三個標志則是各種大小引擎的不同限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們的護照被拿去檢查，人則被趕到路邊等待。所幸我在布達佩斯的書店買了幾本英文詩集，現在就閱讀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3]](#_3_11)的詩打發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倒也蠻合適的，順帶平息內心的焦躁感。大約兩個鐘頭后，他們很有禮貌地把護照還給我們，卻沒有做任何解釋。

一旦進入羅馬尼亞境內，我們的乘客便開始道歉。為道路、風景以及貧窮等情況頻頻致歉。彼得和我都不覺得我們所目睹的情景有任何不同尋常之處，倒是我已經在旅游期間碰到太多這種自貶式的民族習性了。除了被貶抑為二等公民所令人感到的真正的羞辱，仿佛被迫處于此等窘境就已經令他們想要阻止外國人的評論，不愿再當面受到屈辱了。至少，他們希望借此表明，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可悲處境不是全然無知。

不過當我們行駛在鄉間道路時，貧窮的狀況也確實越來越明顯，柏油路面越來越少。這些道路上的行車狀況委實令人嘆為觀止！鵝群在我們車子前面昂首踱步，仿佛我們不過是另一只鵝；健壯的牛拖著車，跟我們分享狹窄的小徑；牛群恣意漫步，仿佛這地方是屬于它們的。我們經過的每個村落，都見人們三五成群地在昏黃的天色中站著聊天，孩子們朝我們又叫又笑，仿佛我們的車子給他們帶來莫大的快樂。但也難怪，畢竟我們經常開好久都看不到另一輛車。

我們原本預計晚間抵達奧拉迪亞（Oradea），根據我可靠的福多爾（Fodor's）[[4]](#_4_11)旅行指南，當地應該可以找到旅館。但是由于距離目的地還很遙遠，而天色已暗，時間又不早了，車行速度非常緩慢的我們決定就近落腳于一個我們始終不知其名的山中小鎮。結果竟是闖入了一間有如來自地獄的旅店，參觀的每個房間都沒有燈光，濕氣很重，且每樣東西都彌漫著一股臭味——據我判斷，是一種混雜了變質的油膩和一層層汗臭的氣味。無奈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留宿。我們的乘客則決定繼續他們無望的便車之旅。把他們留在半路上的我們，心中不無少許的罪惡感。

那家所謂的旅店外面一片漆黑，只有一盞燈閃爍著光，仿佛是一個高大異常的山怪之家，或者是一間搭建于高架上的狹窄木屋，里面還飄出樂聲。我們往人聲處走去，爬上搖晃的室外臺階，置身當地的夜生活。在一個大約兩個衣物間大小的房間內，有一個吧臺和三張桌子，大約坐著六個人，全都一身國際化年輕風格的打扮：皮夾克、細腿褲和長耳環。一臺音響播放著美國迪斯科音樂。我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又覺得喪氣：世界上再也沒有所謂遙不可及的角落了。但是我們所點的飲料卻是當地的，一種名叫拉奇亞（rachia）的李子白蘭地，味道嘗起來好似潤口清淡，其實卻是我所品嘗過的最烈的酒。第一杯下肚后，彼得和我便很容易地被說服用若干美金和一個身穿皮夾克的年輕人換了些列依（lei）[[5]](#_5_9)。喝了第二杯后，我的視線變得異常清晰，但爬下室外臺階時卻出奇地困難。不過鑒于我所要住的房間，我又很高興有這預料之外的后勁讓我沉沉入睡，無法進一步檢視我所睡的床鋪或周圍其他任何東西。

隨著旭日東升，我想象中的陰沉也轉換為一片明亮。陽光燦爛，小村落依偎在青翠的山谷中。拉奇亞沒有留下宿醉的不適反應，這也正是該酒所引以自豪的特點之一。令我們大感驚訝的是旅店居然供應早餐，或者勉強可稱之為早餐吧。餐點設在旅店旁邊的水泥陽臺，食物放在一張衛生堪憂的桌子上：包括差強人意的雞蛋和一片干面包，可惜的是沒有咖啡。我們要了一點冷飲，結果送上來一種黏稠、泛黃，味道完全不能接受的液體，讓我們決定放棄。英國廣播公司（BBC）曾報道羅馬尼亞爆發的霍亂，雖然是在更南部的地方，不過還是近得讓人無法放心。

這分明是寧靜晴朗的一天，四周風景優美。我到底在怕什么？此時此刻，我無法想象這里會發生任何恐怖的事，盡管這顯然也是想象力有未逮之處。我們悠閑地繼續上路，前往克盧日—納波卡（Cluj-Napoca），彼得在那里有約。車行間，周遭景色洋溢著亞熱帶風情，令人有置身亞洲的感覺。空闊的青翠山丘在烈日下起伏，折射著光線；牛群在慵懶沉寂的池塘中飲水；人們騎著自行車，頭上戴著圓錐形寬邊草帽。

我們經過的村莊，一幢幢小木屋都涂著薄薄一層向日葵的亮黃、青檸的綠、靛青的藍，只有這樣的艷陽才能容納并淡化色彩，大大減少了俗麗感。有些低矮的石造教堂，盡管規模不大，卻有著哥特式大教堂的繁復精細設計。也有些極簡的白色木結構教堂，優雅纖長的銀色塔尖閃著微弱的光澤，幾乎融化在陽光中。

羅馬尼亞的哲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6]](#_6_9)或許曾在這附近漫游過，才會認為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典型的村落形象，而我也覺得我們所經過的村落滿足了我對鄉村景致的想象。在更實際的層面，我也可以理解這片美麗富饒的地區為什么會成為各方所覬覦和爭奪的目標。特蘭西瓦尼亞可謂中歐內的中歐，是混亂甚至黑暗的中心。在14、15世紀享有了一段時間的自治后，特蘭西瓦尼亞便迭經易手，更換主人。1600年特蘭西瓦尼亞初次和羅馬尼亞其他地區組成聯盟，卻只維持了不到一年，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再度有組織聯盟的機會。經土耳其奴役約一個世紀后，特蘭西瓦尼亞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禁臠；1867年，基于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折中方案”，特蘭西瓦尼亞成為匈牙利的一部分。然而1918年，由于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參戰，作為對此的回報，特蘭西瓦尼亞重新回歸羅馬尼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蘭西瓦尼亞有很大一部分重新為匈牙利取回，但1944年又再度裁定重歸羅馬尼亞，作為對蘇聯占領比薩拉比亞（Basarabia）和布科維納兩地區的補償。這也難怪當地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兩方人民從來沒有機會心平氣和地化解彼此間的芥蒂。

在接近奧拉迪亞時，我們又載了另一個便車客。她是個身材健壯、精力充沛的女子，勉強會說英語和法語。她說她是工程師，不過在東歐，這個名詞涵蓋了許多罪惡。當我們拒絕接受她塞給我們的列依時，她索性邀請我們到她家里去坐坐。那個小區雜草叢生，人煙罕至。這是我所見到的第一棟羅馬尼亞公寓，所以頗感好奇。即使以東歐的標準而言，這里也算狹小而貧困，不過都是一個模子里造出來的。在小小的客廳里，她貌似吉卜賽人的女兒正在看電視上的美國搖滾樂團表演。書架上，除了擺放有羅馬尼亞的書外，還豎立著《浮士德》（Faust）和《群魔》（The Possessed）。女主人告訴我們，她本來打算教文學的，但是“我們只能做我們能做的，而不是我們想做的”，她用法語優雅地說著，聳了聳肩表示認命。

當我要求借用洗手間時，她顯得有些沮喪。“我們羅馬尼亞的工程很好，但就是少個收工。”她解釋，在國家忠誠和此時的尷尬間猶豫。我明白她的意思。只見地板是外露的水泥，天花板和墻壁上有松脫突出的鐵絲，浴缸內積滿污水，還有一截宛如汽車輪胎的東西。無論她所謂的收工是什么意思，這里確實“少得很”。

我暗自希望她能為我們提供點吃的，但是我的愿望落空了。不過我們的女主人用小型咖啡杯請我們喝了濃郁的土耳其咖啡，還告訴我們她非常高興有機會邀請我們到她家來。直到不久前，和外國人晤面還是一項會遭到懲處的犯罪行為。比如她的工廠里就有個職員因為和一個波蘭籍的同事關系友善，結果遭到每個工廠都有的秘密警察的威脅，說會遭到某種處罰。從那以后，那兩名同事便相互回避。這名工作伙伴還是來自羅馬尼亞的“兄弟之邦”的！這件奇聞顯示了羅馬尼亞直到近期所受壓迫的程度，以及對私人行為的控制，都超越了我在其他國家之所見。

“那些秘密警察還到處都有嗎？”我問。

她又心照不宣地聳聳肩，說了一句：“不然你期待什么呢？”

然后她馬上精神奕奕地說：“不過我不怪伊利埃斯庫，”她表示，“那是幼稚的做法。我們不可能一天就擁有民主。我們每件事都要學習。我們沒有民主的傳統。我們其實算是東方國家。”

離開那里之后，饑餓感越來越擾人。我們已經走了一整天，卻只見到一小間陰陰暗暗的所謂的“餐廳”，而且只供應一種類似牛肚湯（tripe soup）[[7]](#_7_9)的食物，散發出難以描繪的油膩味道。盡管饑腸轆轆，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吞咽那道黏膩的黃色湯料。

這一切都意味著在抵達克盧日-納波卡時，我對當地的魅力完全無動于衷，只管直接開向一家號稱當地頂級豪華的飯店。那地方有點古怪，也許是因為那種模糊、無處不在的衰敗氣息，卻突兀地搭配著豪奢等級的壯闊規模吧。人們各自成群地坐在陽臺餐廳的木制長桌旁。我們找到一處空位坐下，旁邊是一對年輕男女。那男的又是一個“工程師”，不過正在接受訓練成為一個啞劇演員。他會說法語，這點實在幸運，因為我們正需要一個人幫我們溝通晚餐。點餐過程顯然需要高度耐心的外交技巧。首先，我們被長久的等待磨煉了耐心，終于有個侍者走過來，我們趕緊表達最小的要求：請給我們一點東西吃，任何東西都可以。我甚至不太敢提出我想要喝點冷飲，只要不是黃色的，什么都可以。經過那啞劇男一番冗長的意見交換，侍者離開了。我緊張地詢問待會兒會供應什么。我們的中間人比了一個或這樣、或那樣的手勢。“他會去跟某個人講，”他回答，“他會想辦法的。”又經過一陣漫長的等待，那個侍者走回來，又是一番熱切的討論。“他會給你們拿點肉！”啞劇男勝利地宣布。但是冷飲呢？我一定要喝點冷的東西！啞劇男起身，去跟一整群站在門口的侍者積極交涉。大概十分鐘之后，奇跡發生了！一瓶冒著晶瑩泡沫的礦泉水被送到我們前面。最后，一頓可以下咽的晚餐也終于送到了。

“這里的食物是怎么回事？”我們問那位好心的翻譯，“都跑到哪里去了？”

“黑社會，”他說，“中間商。他們從商店收購所有東西，以高價賣給少數人。”他一臉的厭惡，“這里很亂，一片混亂。以前，你至少知道可以喝到啤酒，喔，也不是每天都有，但至少是一周一次，星期二喝得到。但是現在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我們是第三世界的國家！跟東方國家一樣！”

晚餐后，我們四處瀏覽，發現克盧日-納波卡其實是個很漂亮的城市，地道的歐洲風貌令我驚艷，如此眼熟、美麗的歐洲啊，竟在這么遙遠的世界一角！“納波卡”一詞是古羅馬的名字，此間人口眾多的匈牙利人仍稱呼這里為科洛斯堡（Kolozsvár）。這座城市由文藝復興時期匈牙利國王馬加什一世（Matthias Corvinus）[[8]](#_8_9)所建造，市鎮中央有座令人景仰的哥特式大教堂；圍著賞心悅目的廣場，店面門面均漆成這一地區巴洛克色系的乳黃色和白色。

不過建筑雖然是歐洲風貌，氣氛卻是……巴爾干式的。“要買嗎？要買嗎？”我們走在街上，人們接近我們悄悄詢問，雖然我們根本不清楚他們想賣什么。“香煙？巧克力？肥皂？”一群頑童也問我們。我們表示兩手空空沒有錢，他們表現出來的不是失望，而是厭惡。我們走向車子時，發現兩名男子正旁若無人地查看車子門鎖，直到我們上前指出我們有車鑰匙，他們才佯裝無事地離開。那晚稍后，我們看到一隊清潔工人，大多是身穿寬裙、頭戴圍巾的婦女，在幾乎全黑的天色中，手執大型掃把在掃街。是誰指派他們這么晚出來掃街的？這種荒謬絕倫的情景幾乎出自尤內斯庫（Ionesco）[[9]](#_9_9)之手，或是齊奧塞斯庫（Ceauşescu）[[10]](#_10_9)的杰作，那人素以怪異隨興的作風聞名。

第二天早上，我們出發前往馬拉穆列什（Maramureş）那處緊鄰俄國邊境的區域。往東北行駛途中，我們很快發現自己置身于山巒起伏、美麗原始的風景中。我們經過的村落絕不富饒，卻展現出豐富的美感，讓我們完全浸淫在所見的一切當中。一幢幢屋子漆著明艷亮麗的色彩，陽臺裝點著精致的鑄鐵邊框。屋頂也經常帶有活力洋溢、造型繁復的塔樓、老虎窗和尖塔，宛如童話故事的迷你版本。大部分的木屋前面都有雕工細致、獨立的木質門廊，有人告訴我這些門廊代表從生到死的通道——這里的人都以寧靜而非恐懼的心態面對這趟人生之旅。此外還有上面帶傘狀頂棚的石井。

鄉村小路上，女人們的穿著和我在布達佩斯瓦茨街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樣，她們手中拿著成卷的蓬松白色羊毛，邊走邊梳理。在逐漸暗下來的傍晚，她們坐在室外織布機旁，就在路旁樹下將羊毛編織成多結的厚實地毯。我們停下來看她們工作，她們也笑瞇瞇地邀請我們趨近觀察，手中的編織節奏不亂。雖然細節不同，但此情此景就像我兒時記憶中波蘭鄉村古老、質樸的一面，讓我深為感動——感激這熟悉的異國風情，這歐洲賴以成長的深耕文化，迄今依然存在。

傍晚時分，我們來到博爾沙（Borsa），這座城市高踞在馬拉穆列什山上，是特蘭西瓦尼亞山脈的一部分。只見主廣場上都是人，主要是男人，全都無所事事地站著。看到這群人沒有假裝忙碌，坦然露出毫無罪惡感的懶散狀態，雖然怪異，倒也不至于令人不悅。不過，我們的抵達還是引起了一番騷動。人們走向我們，提供一些無法理解的服務。一名出租車司機站在他破舊的車子旁，透過一連串繁復的手勢，表示可以賣汽油給我們。由于已經兩天沒看到任何加油站了，所以我們欣然接受他的提議。“多少錢？”我們問。那人用手勢告訴我們一桶十五美金。彼得正準備接受，但一種源自體內深層、屬于東歐的原始本能，促使我虛張聲勢地回口道：“十美金。”那人佯裝痛苦地考慮了半天，十二美金，他終于回答，一副做了天大讓步的口氣。好，我說。那人馬上和我擊掌為憑，其他人也紛紛發出滿意的聲音，因為我懂得他們的游戲規則。

隨著生意談成，所有事也回歸正常。那出租車司機靠著他的車子，繼續和他的同伴聊天，對我挑眉的詢問，他只是舉起一只手，擺出不要緊張的手勢。我聳聳肩。因為沒有跡象顯示馬上會有什么動靜，彼得和我就沿著博爾沙的主要街道往下走。我們發現了一家商店，自然而然地進去逛。店里擺放著一些丑陋的塑料夾克，不過也有些色彩鮮艷的當地制手工地毯，讓彼得頗感興趣。又開始了另一場交易。“多少錢？”他詢問店里一位略通英語的年輕女子。那女孩咯咯笑著，找一名較年長的店員商議。

“也許三十美金，”她終于回復，“也許五十美金。”憑這種方式也想欺騙沒有警覺性的外國人！

回到廣場后，那名出租車司機還在聊天，絲毫不受我們返回的打擾。我們站了一會兒。“旅館？”我們問道，指指對街一棟長相可悲的建筑。“不是，”眾人異口同聲道，并往東指，“現代旅館。綜合大樓。在那里。”

過了好一陣子，在某種無形力量的推動下，出租車司機終于上車，示意我們跟著他開上一條鄉間小路。我們在他家外面停下，這里靠近一條湍急的山間小溪。他從屋內取出幾桶汽油，小心翼翼地注入我們的油箱。

值得慶幸的是，“綜合大樓”看來還蠻舒適干凈的。一名橘紅色頭發、面色紅潤的接待員緊張地注視著我們，向我們保證他會盡最大能力說服侍者供應我們晚餐。經過一番幕后交涉，他端來了尚過得去的食物。我一直納悶，難道侍者真的會拒絕服務？基于什么理由？這一切似乎都令人傷腦筋地取決于個人。

房間還算不錯，讓我驚艷，只是墻壁管線內不斷傳來惱人的背景音樂。我要求領我到房間的女服務員把音樂關掉，她雖然照做了，卻不可思議且不以為然地瞪我一眼。我顯然已經忘記優雅或現代化是什么了。過去幾天，我一直夢想能洗個真正的熱水澡，現在終于可以如愿以償了吧！可惜，現代化的水龍頭里流出來的水跟其他地方一樣冰冷。“八點，我們有熱水。”那名紅發接待員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不過當我九點回到房間時，水還是一樣冰冷。“八點到八點半，我們有熱水！”我被如此告知。痛快地洗個熱水澡的幻想就此破滅，不過這類歡愉享受——它們已經不再是日常必要之事了——的無限期展延，是身在東歐必須學會的事情之一。

作為補償，而且是東歐的標準補償方式，我們可以在陽臺上小酌一杯。同時，精力充沛的接待員還提出給我們講述有關“革命”的小故事解悶。他說，一切爆發時，他人在布加勒斯特。當時他開車進入一棟政府建筑，結果才剛把車開出來，建筑物就陷入火海。他比手畫腳地敘述，帶有夸張意味。我們很難斷定他所說的到底有幾分是實話。

第二天早上，我們步入山區，草坪上露珠閃閃，溪水淙淙，微風輕拂。遠處不時飄來牛鈴清脆的聲音。而到了山頂，我們甚至進入了故事書中的情景，我覺得故事書應該就是從這里取景的吧。只見一間長木屋旁，一個老人和一個小男孩正看著幾頭牛吃草，那老牛郎身材小巧，體型瘦削，皮膚粗糙，“滿面風霜”一詞立刻進入我的腦海。小男孩則身穿白襯衫，綠色厚羊毛長褲，搭配鑲有銀釘的黑色背心，外加一條寬邊浮雕皮帶。他的皮膚是橄欖色的，一雙大眼睛充滿了智慧，臉上洋溢著我所見過的最清澈、最甜蜜的表情。

那老人邀請我們到他的小木屋內。木屋很矮小，我們幾乎無法完全站直身子，且彌漫著苦澀的濃煙，原來是一個木桶內正在熬制奶酪。他舀了幾勺牛奶般的甜蜜凝乳奶酪給我們吃，不過濃煙刺鼻，彼得和我都無法在屋內久留。那老人示意想試戴我的太陽眼鏡，然后點點頭表示贊許，他可以用它來抵擋陽光和濃煙。若那眼鏡不是根據醫囑特制的，我一定會送給他。因為如此，我們送了些從旅館帶出來的熏腸給他，然后繼續前行。在這逐漸加速的時代，真懷疑這種慢工細活的生產方式要如何存活。（不過后來我們得知，這類牧羊和牧牛人是羅馬尼亞少數能賺大錢的，因為他們制作的奶酪可以外銷。根據當地傳言，有個新貴牧羊人還購置了一架直升機，載著他從一個山頭飛到另一個山頭。）

在下山途中，我們遇到一群野餐的人，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用鐵叉烤肉，還帶了一瓶烈酒輪流分享。所以這里還是有食物的，也許當官方系統失靈時，就只能透過私人渠道流通吧。我們也貢獻出剩余的香腸。在高亢激昂的興致中，一個男的開始高歌，同時用力拍打大腿。

“伊利埃斯庫，棒！”一個女的高聲喊叫，并豎起大拇指。“救國陣線，棒！”她所展現的熱情令我不解，因為伊利埃斯庫最近才調派戴頭盔的礦工前往布加勒斯特，以暴力方式，而且似乎也是非法地驅散一項示威活動。

“你喜歡他什么？”我們問道。

“他像一個好爸爸，”那女的以法文回答，一副肅然起敬的神情，“他會照顧我們，他會為我們著想。”

另一個女的默默注視著這一幕，然后用英文對我們說：“你看，我們就是這樣，”她說，“我們沒有民主傳統。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強大的領袖。”

她自我介紹說名叫科爾內利婭（Cornelia），邀請我們第二天到家里坐坐。她在鴿子籠似的房間里幫我們準備咖啡，同時以一種渴盼、熱切的語氣跟我們聊天。她長得蠻標致的，橄欖色皮膚，杏仁般的眼睛，衣著輕便優雅，寬松的絲質長褲搭配卡其色長上裝，竟能展現出一種都會風情，也許跟她學英語的方式一樣吧，也是從電視和電影中學來的。羅馬尼亞將法文視為親近的外語，學校經常會教，或者人們私下傳授。他們對法國文化極為仰慕，對系屬拉丁語系也頗為驕傲，雖然羅馬尼亞語言中，其實有著強烈的斯拉夫元素。但是科爾內利婭從來沒有出過國，對所有事都充滿了好奇心。她在這里當老師，丈夫在軍中，不過她很快向我們保證：“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我們被蒙在鼓里，也糊里糊涂的。”她指的是羅馬尼亞到底如何發生“革命”，甚至有沒有發生革命，都折磨人地沒有定論。伊利埃斯庫畢竟是黨內部的人，而且早期是齊奧塞斯庫的盟友，只不過近期屬于一個“自由派”的支派。盡管如此，盡管有人質疑秘密警察仍在運作，盡管存在那些礦工的暴行，伊利埃斯庫仍然在羅馬尼亞群眾中享有廣泛的支持。科爾內利婭無法告訴我其中原委，她似乎自己也十分困惑。“不，我其實不喜歡他，”她說，“但也許我們應該給他時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看起來很沮喪。然后，似乎找到了正確的表達方式，她又用比較活潑的口氣繼續道：“你看，我們就是這樣，非常感性的民族，不怎么理性。我們一部分是希臘人，一部分是達契亞人，一部分是拉丁人。我們是地中海的一個民族。我們其實是東方人。”

她的說法其實前后并不一致，但是我開始能夠辨認出羅馬尼亞人在轉型期所套用的公式了。每個國家都有一套這種公式，像護身咒語一樣不斷重復，或像在一片混亂中，勉強抓住一根理解的稻草。“我們總有辦法熬過這一關的”，波蘭人一直這么說。“什么都沒有改變”，匈牙利人一致認為。而現在羅馬尼亞人的說法也顯出一貫性。“情況很亂，”他們都說，“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不懂民主。我們其實是東方人。”當然，套用公式的說法并非解釋，卻提供了線索理解人們是如何經歷他們的境況和世界的。羅馬尼亞人在說這些話時，通常都帶著認命的口吻，仿佛這場亂局不是任何人的錯，而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情況，一切都是命。

科爾內利婭說她不是一個“愛國志士”，但她愛她貧困的國家，尤其馬拉穆列什，她對此地的歷史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你也許不知道，”她告訴我們，顯然是從我們的名字中判斷出我們都是猶太人，“這里以前住了很多猶太人，現在都沒有了。我常常想到他們，有時候會去看看他們的房子、墓地。你們在附近看到的最漂亮、最大的房子有些以前就是猶太人的。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還能感覺到他們的存在。”

不，我不知道，我也沒料到在特蘭西瓦尼亞這個遙遠的角落竟有個一度繁榮的猶太社區隨著戰爭而消失。猶太人在這段時期似乎一直是困擾著東歐地區的幽靈，猶太人在此間無可避免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種出席、一種錯誤。總之，對于像科爾內利婭這樣的人，內心還留存著猶太人的點滴記憶，為當年沒有多認識一點鎮上的猶太居民所表現出來的真摯遺憾，我還是心存感念。也許我們不會經常表現出良知，但我們心底還是有良知的，對過去錯誤的記憶不會那么容易被抹去。

在我們整個談話過程中，科爾內利婭的兩個朋友始終在看電影《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盡管我們擁擠地坐在一起，他們卻始終沒有分神多瞄我們一眼，連我們離開時，也只是懶懶地揮揮手。反倒是科爾內利婭在送我們上車之際，展現出幾近拉丁族的熱情。

\* \* \*

有誰會留意一個名叫薩品塔（Sapinţa）的小村落的存在？不過此刻我們正前往薩品塔發掘“革命”之事。過去幾天，我們一直聽說薩品塔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包括公路封鎖和讓布加勒斯特派出陸軍直升機。“是真的革命。”有人語氣興奮地強調。或許革命，貨真價實的革命，終于來到羅馬尼亞了。

薩品塔位于博爾沙西部幾小時路程處。我們接近傍晚抵達時，當地看來有如荒廢的小鎮。灰撲撲的路面上不見人影，連動物的聲音也聽不見。只有窗簾緊掩的窗戶，以及氣氛沉滯的靜謐。不過，我一直記著一位匈牙利朋友的指示。“去找教士，”他建議，“他們認識所有人，知道所有事。”平矮的小屋上方清晰可見東正教教堂的尖塔，不過教堂空無一人。只是教堂附近有座墓園，引人好奇，所以盡管我們并非為此而來，還是到里面去停留了一陣。那座墓園滿布十字架，大小形狀一致，但都充滿了強烈的色彩。每個十字架上都繪有一個場景，描述了墓里住客生前的職業，畫風原始、筆觸細密：有坐在織布機旁的婦女，有牧羊人、鞋匠，甚至是出租車司機。經查閱我的福多爾指南，原來這里叫做“快樂墓園”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整座墓園洋溢著近乎惱人的歡樂氣氛。這座墓園最早是斯坦·彼得拉什（Stan Pětraş）這位男子的創作，他和死亡之間，必定有種親密而奇異的關系。不過他在1970年代末期已經離世，所以他那想必是某位不知名門徒所畫的畫像，此刻正從某個十字架上朝我們猛皺眉頭呢。在墓園后方，我們又看到一個男的正在繪制另一個人像，看來快樂的死亡已然成為本地的標準模式。他領著我們前往就在路旁幾步遠的教士住宅。

那座房子又大又安靜，我們穿過敞開的庭院柵門走進去。一個女子默默打量了我們一下，示意我們跟著她。我們被請進一個大房間，中間放著一張書桌，身著黑色長袍的教士就端坐在書桌后面。他年紀很輕，個子很高，面貌英俊且帶著稚氣。他一樣慢條斯理地打量著我們，用羅馬尼亞語問了一個問題。我們搖頭表明聽不懂，并試圖用我們會的語言跟他溝通，但是沒有一種奏效。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只能彼此相視無言。然后教士下定決心，領我們到另一個房間，光線沒有那么刺眼，而且比第一個房間還大。房間布置得像土耳其的后宮，鋪滿紅色系的地毯，散置著大型靠枕。教士有禮貌地招呼我們坐下，我們便坐了下來默默等待。最后，一個男孩走了進來，乖乖站在他父親的椅子后面，等待父親的指示。他們輕聲交談了幾句——所有的一切都以詭異、緩慢的方式進行——之后那個男孩就過來試圖用英語和我們說話，可惜他的英語詞匯量大概只有十個，很快我們便無以為繼。他們父子又交談了片刻，然后那男孩朝我們微微鞠了一個躬，便離開了房間。

我們又繼續等，繼續默默注視著對方。巴爾干時間。我們就這么坐著，有如禪學大師。其間并沒有尷尬，沒有手足無措的頻頻點頭或安撫性的笑容。我開始有種奇特的放松感。對事件的認知也開始改變，不再堅持完成某個計劃，只是靜待其變。反正世事總是如此推演。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我們被帶到花園，坐在蔭涼蔓藤頂棚下的一張長木桌旁。強烈的陽光透過葉縫閃爍搖曳。在蔓藤頂棚外的花園中，幾名農婦打扮的女人正在除草，動作流暢穩健。雖然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么事，但覺得這樣也挺好的。教士的另一個兒子出現了，年紀更小，也更無拘無束。他沒有跟我們對話，卻拋出一堆不可思議的字匯。“巴塔哥尼亞（Patagonia），”他詢問地望著我們，“亞利桑那（Arizona）、阿根廷（Argentina）、明尼蘇達（Minnesota）、波哥大（Bogotá）。”他想知道我們有沒有去過這些地方。我們每點一次頭，他便覺得神奇得雙眼發光。對他而言，提到的這些地名已經是全世界，實在充滿了神秘。

教士的妻子端了一盤食物和飲料走出來。教士喝了幾杯當地釀造的飲料，并鼓勵我們照做。在過了又是營養缺乏的一天后，我們狼吞虎咽地解決了送上來的雞蛋和辣味香腸，然后繼續坐著。而我開始失去信心，變得有點坐立難安。

不過我錯了，有個隱秘的目的其實正在運作中。那個較大的兒子再度現身，后面跟著一個身材不高，步履輕盈的男子。他自我介紹說是一位來自布加勒斯特的記者，已經在這里待了幾天，采訪有關“革命”的消息。他說法文，且正處于極度興奮的狀態。他會告訴我們是怎么回事。果然，教士和記者一開始競相談論起最近發生的事情，整個氣氛也隨之活躍起來。他們談得興高采烈，盡管我們起先只看到熱烈，卻不解其意。

以下是在他們的熱切講述中浮現的故事：在“后共產主義”統治下，五千名薩品塔居民選出一位新市長。他是個很有原則的人，教士兩眼發亮地說，一個好人，道德的典范。薩品塔的民眾很愛他，因為他想要將土地發還給原地主。但是原來的市長來了，或者應該說回來了，民眾對他的厭惡一如對新市長的喜愛。“那些人干了很多壞事，令人發指的事。”記者激昂地宣稱。不過幾天之前，被罷黜的市長還在一隊武裝人員的陪伴下，沖入新市長辦公室，用武力將合法的主人逐出，和其黨羽奪回權力。就是在這個時候，善良的薩品塔居民挺身而出，群集坐在主要道路上，阻礙羅馬尼亞各地來此的交通長達兩天。

他們的情緒隨著敘述這些事件而逐漸亢奮。教士幾乎穿著黑袍滿場飛舞，幫我們的杯子斟滿酒，還熱情地展示他剛生的嬰兒，要求我幫他照相。每個人都試圖營造出一種印象：這里的人非常特別，人品正直，具有鄉土情懷。他們拼命工作，跟布加勒斯特的人不一樣，奪走他們深愛的土地絕對不公不義。

一名滿臉胡茬的農人在言談間被帶了進來。他身穿工作服，戴著寬邊黑帽。他不但親眼目睹，而且參與了這些事件。在接下來約一個鐘頭里，他就只是靜靜地站在蔓藤幕帷下，偶爾喝杯酒。但一談到事情經過，便不禁激動地兩眼噙著淚水。那兩天中，人們手牽著手一起唱歌，成年的男男女女都為之哭泣。“這是真正的革命。”他們一直重復，很高興親自采取了行動，仿佛首度發現這么做的可能性。

可惜這個故事終究沒有得到讓人滿意的解決。公路被封鎖了兩天后，國家軍隊搭乘直升機進入薩品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士兵們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新任市長，他現在正在地方監獄等待審判；共產黨市長則掌握了職權，不過他也擔心自己激起的反感，因此有好幾個晚上都不在當地，而是跑到薩圖馬雷（Satu Mare）去過夜。

好像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或這種情況的合法性如何，或他們具有什么權利。對自己的反抗感到興奮的他們，卻依舊接受僵硬的權力行使方式，這是此間和東歐其他國家最主要的差異。這里，橋梁尚未建成，還差一步沒有到位。

我們坐在樹叢中，夜幕安靜而徐緩地降臨。故事講完后，我們便到薩品塔陰暗的道路上散步。四周一片寧靜，只有附近谷倉中傳來馬嘶聲。幽暗中，白色鵝卵石似乎發出了微光。教士的小兒子低聲念著美國籃球選手的名字。彼得像記者那樣企圖和壞市長的妻子攀談，對方當然置之不理。我們回到教士宅邸，教士的妻子帶我來到內室，她已經幫我準備好了床鋪，上面放了許多枕頭。我踉蹌地摸黑去外面使用廁所，然后到處尋找水源。廚房內有個水龍頭，但是沒有水。天亮時，他們送來一個金屬杯，里面裝著冷水供我梳洗。因為身上實在沒有更像樣的禮物，所以我放了幾塊美金，但是對方堅決拒收。

我們開車回布達佩斯去還車，天氣炎熱，路上仿佛在跳炫目的光之舞。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著一則奇怪的新聞，說伊拉克（Iraq）進軍科威特（Kuwait）。彼得和我茫然對望一眼，這個世界充滿了怪異的騷動。教士推測這趟旅程需要五個鐘頭，大概是以巴爾干時間計算的吧，因為我們整整耗了十二個鐘頭。我本來計劃下午搭乘飛機前往布加勒斯特，但是當我們抵達目的地時，飛機早已飛走了。

因為誤掉飛機的緣故，我決定搭乘東方快車折返羅馬尼亞。彼得已經前往布拉格，我再度只身上路。為了搭乘這個傳說中的交通工具，首先必須汗流浹背地在購票隊伍中遙遙無期地等待，晚間還得如此再來一遍，因為有人跟我說，如果想要臥鋪的話，最好早點去車站。我確實需要臥鋪、渴望臥鋪，因此提早了一個鐘頭抵達。結果發現我真的太傻了。在接下來的三個鐘頭里，車站時刻表不斷更新東方快車誤點的時間。我又累又餓，還無法移動。即便入口處附近的酒吧對我的誘惑力更大，我卻無法忍受拖著行李再度長途跋涉，穿越寬廣的車站走到那邊去，只能意氣消沉地默默站著，陷入一種自憐的情緒，心想難怪旅游的書大部分都是男人撰寫的。在這趟旅程中，我不只一次有此感慨，當初到底是著了什么魔，非得干這種事不可呢？

當波爾特-東方快車（Balt-Orient Express）駛入車站時，我已經快要達到忍耐的極限，盡管心中也明白，我的忍耐力其實充滿了彈性。眼前是一列難掩風霜的火車，也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一群人蜂擁而上。我跟著人群移動。旁邊一個瘦長的男子自告奮勇，愿意幫我提一件行李。我快速打量了他一眼，沒有時間深思熟慮，只能反射性動作，便把一個行李箱遞給了他。他把我推向臥車車廂的方向，然后祝我好運。我試圖向列車長反映我要一張臥鋪，但他只是不耐煩地將我推上車，然后車子馬上就開動了。

這是我的低潮期，筋疲力盡、精神緊張，也沒有任何抗拒能力，實在無法面對站在走道上完成接下來十五個鐘頭的旅程的可能。所以當列車長經過身邊時，我便發出無言的乞求，希望在目光中同時傳遞一抹威嚴與絕望；但他此刻已化身為動作不疾不徐的重要人物，只比了個少安毋躁的手勢。

我再度有種走投無路之感。然后，事態突變，只見那列車長從他的隔間走出，幫我打開一間臥鋪車廂。我沒有夸大其詞，才往臥鋪上一坐，它就塌了。不過這不是問題。列車長苦笑地搖搖頭，又領我到另一個車廂。我索性大膽問他有沒有餐車，因為從早上開始我便沒有進食。然而浮現在我腦中的，是從電影看來的東方快車，這輛車上當然沒有餐車。幸而我的新朋友列車長舉起了食指，似乎在說：“等一等！”幾分鐘后，他端了一盤食物過來，顯然是分了一半晚餐給我：若干山羊奶酪、一些西紅柿和幾片非常干的面包，還給了我一把瑞士軍刀和一瓶礦泉水。我深受感動。冥冥之中，總是有貴人及時相助。就這樣，我吃了一頓晚餐，花了幾美金和一包極受歡迎的健牌（Kent）香煙。然后突然間，我的心情奇特地整個翻轉過來。就這么簡單，毫無道理的，我不再感到害怕。我必須承認，在這幾趟旅行中，我經常被一種類似恐懼的心情所干擾。我害怕的不是極端的事，比如遭到搶劫或暴力攻擊之類的，因為我身上沒有什么好偷的，而暴力行為則屬于我根本不愿去想象的另一層次。困擾我的，主要是些低層次的焦慮感，像是擔心這趟東歐之行會不會超出我的能力所及：比如沒辦法處置我的行李，沒辦法找到食物和飲水，或迷失在一個偏僻小鎮的黑暗道路上，語言不通，無法向充滿敵意的陌生人解釋我的情況。這種不安的感覺也許是因為這種吉卜賽式的漫游，實在不適合一個中產階級的乖乖女。一個真正的淑女絕不會讓自己陷入這種粗糙的窘境。

不過現在，不知為何，那種焦慮感就這么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必須在這輛臟亂的火車中待多久，我也不知道答應和我碰面的新朋友會不會在布加勒斯特等我，但突然間，這些都沒有關系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接下來總是會有事發生，這個原則已經逐漸深植我心。這個世界還沒有走到盡頭，人們也還沒有陷入絕境。大半時候，大家都會伸出援手，而不是帶來威脅。

隔壁車廂的一個旅客敲敲我的門，低聲問能不能跟我換點美金。他說他要去土耳其度假，但是沒有一點真的錢，怎么能玩得盡興呢？當然可以，我說。為什么不讓他在土耳其痛快地玩一番呢？我注視著車窗外移動的一顆顆碩大明亮的星星，然后沉沉入睡。到了邊境時，我被海關官員吵醒。兩個體格魁梧、身穿軍服的羅馬尼亞人在我的臥鋪上坐了半個鐘頭，費力地填寫表格。所幸我已然轉換新情緒，因此這些顯得極其自然，也非常友善。之后我再度陷入熟睡，等再次醒來時，火車已穿越特蘭西瓦尼亞阿爾卑斯山脈，來到一片干涸的平原。下午一點鐘左右，火車駛入布加勒斯特。

幸好我已經調整心態，獲得心情的寧靜，因為布加勒斯特火車站可是需要堅定的心智才足以應付的。火車站寬敞但混亂，而且非常炎熱。來往穿梭、推擠的人打扮破舊，還有幾個衣冠不整的男人挨近我，試圖幫我提行李。當我看到答應前來接我的帕維爾（Pavel）和斯特凡娜（Stefana）時，實在開心不已。我只在紐約見過他們一次，當時帕維爾在新學院（New School）[[11]](#_11_9)教書。盡管在年齡上我們差距很大——他們比我年長約二十歲，但我們卻一見如故，他們也出于一時慷慨的沖動，提議在布加勒斯特接待我。他們暗示，我在當地絕對需要有人照應。

我們熱切地彼此招呼，仿佛認識多年的老友。接著，他們領我走向一輛破銅爛鐵一樣的古老的倫敦出租車，由一位脖子很粗的人駕駛，斯特凡娜說是他們的“家庭司機”。我跟他們報告我的旅行經歷以及那位慷慨的火車列車長。“他是羅馬尼亞人還是匈牙利人？”斯特凡娜和帕維爾異口同聲地問，然后忍俊不禁——他們身為飽經世故的國際人士，還有這種古怪的愛國本能反應，自己都覺得好笑。

斯特凡娜的公寓小巧玲瓏，布置典雅，洋溢著土耳其的風情。雖然和帕維爾是多年的伴侶，他們卻分開居住，我住在斯特凡娜這里。袖珍的起居室內擺著緞面扶椅，較大一間房間是斯特凡娜的寢室兼書房，床上鋪著一條洋紅色絲絨被，上方墻面則掛著一條色調較深的掛毯。高高的窗戶上百葉窗緊閉，隔絕熱氣和陽光，讓屋內朦朧怡人。在缺少其他資源的情況下，這是個善用品位和可愛物件裝點的柔美居家。我們的餐飲由“已經在這個家一輩子了”的弗洛麗卡嬤嬤（Domna Florica）負責打點。只見在迷你而原始的廚房內忙碌的她，動作間充滿權威與篤定。雖然年紀很大，身材矮胖，滿臉皺紋，但是眼神卻流露出一抹機敏與睿智。她用茄子蘸醬和不同的蔬菜色拉調制出極為美味的一餐——在接下來幾天，我將逐漸體會到要調制出這樣一餐多么困難。很早便疲憊入睡的我，對斯特凡娜和帕維爾超乎義務和期待的款待，可謂銘感五內。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某處庭院中傳來的公雞啼鳴叫醒。

早上，斯特凡娜帶我到菜市場散步，來一場當地之旅。第一次行經此間，但覺街道上散發出一種徹底凄涼的氣息，那種凄涼，遠非常態所及，幾乎無以言喻。時間雖然還早，但熱浪襲人，沉悶凝滯，空氣間彌漫著塵土。寬得離譜的道路空蕩而慵懶。我們走過一段情況比較好的街道，有樹木、低矮的別墅和一座漂亮的教堂，然后一陣蔬菜腐爛的酸臭氣息撲鼻而來，顯示市場就在附近。小型廣場上搭建著頂棚，下方設了幾個小攤位，販賣一些蔬菜、果實和山羊干酪。頂棚外圍的地面上也有人直接鋪放報紙來陳設貨品，有許多茄子、一些質量不佳的蘋果和梨子。到處可見各種垃圾，增加了濃烈的臭氣。

斯特凡娜將這個市場視為一種進步和相對富足的象征。但就一般民眾的食物供應而言，也就僅止于此了。廣場四周有些性質怪異的“食品行”，窗戶上是硬化的陳年污垢，室內一副任由衰敗的景象，有如洞穴般空蕩和潮濕。油漆早已剝落，地面暴露出水泥。架子上幾乎空無一物：東歐式的空虛，巴爾干式的空虛。一間食品行展示著幾箱玉米粉；另一家則陳列了一排的罐裝水果，外面擺放著大牛奶桶。不過斯特凡娜說她絕不會去碰這些牛奶，因為從鄉間運抵此地時，經常就已經腐敗了。一家店外站著一排人，斯特凡娜說，這代表那家店有新鮮面包。盡管熱氣撲鼻，我卻感到一股類似退化與死亡的寒意。這種情況、這種墜入混亂的景象，人們為什么可以接受？為什么沒有人大聲抗議？觸目所及，女人們走進那些凄慘的店內；街面上則是一群群敞著襯衫的男人，無所事事。這里幾乎看不到活動，聽不到噪音，仿佛連談話都已經沒了氣力。

我們買了些蔬菜，斯特凡娜又帶我到當地的主要干道勝利大道（Calea Victoriei），向我展示些那姑且名為“革命”——不論其準確的名稱應該為何——的事件的紀念地點。斯特凡娜的容貌和動作都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她的面孔有種脆弱之美，戰前成長在克盧日-納波卡，后來成為共產主義信徒。她形式上仍留在共產黨，屬于低調的黨員，但多年來，她一直參與帕維爾的破壞行動。身為社會學家的她，擁有媒體的專業知識，但是對于“革命”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她和其他人一樣一無所知。像其他人一樣，因為她認定有某種因素明顯在干擾他們的努力，所以更加執意要探究懸而未決的問題。

近期曾發生暴力事件的痕跡在勝利大道逐漸擴寬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廣場（Piaţa Gh. Gheorghiu-Dej）之處，令人壓抑地明顯起來。阿西娜宮飯店（The Athènee Palace）內部仍可瞥見昔日的輝煌，但墻壁上布滿彈孔。國立圖書館喪失了幾千本藏書，搭設的腳手架后方，看得到嚴重毀壞的痕跡，外交部所在的皇宮也受損嚴重。不過雖然就在其他建筑附近，共產黨總部卻毫發無傷。為什么會這樣？這也是讓民眾深感困惑的問題之一。這難道意味著共產黨也牽涉在推翻齊奧塞斯庫的政變中嗎？難道幕后已有協定，在齊奧塞斯庫下臺后由誰掌權嗎？政權更迭已過去了九個月，布加勒斯特的氣氛仍充滿謠言、各種解讀、猜測，沒有定論。

大學廣場（Piaţa Universităţii）在距離這些地標不遠之處，是下一個轉折、下一輪暴力事件的紀念場址。1990年6月，學生在此長達數月的靜坐，被伊利埃斯庫從北方召集而來的礦工暴力驅散。從那時起，這里便逐漸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圣殿。法律與建筑員工大樓外墻上掛著一條布條幅，上書：“新共產主義凈化區，這里曾發生過謀殺——行經此間請心存敬重。”在大樓正面一個壁龕內放置著慘遭礦工毒打的學生領袖馬里安·蒙泰亞努（Marian Munteanu）的畫像，四周裝飾著干花和黑布條。散置在街上的黑蓋炭盆里面燃燒著炭火和蠟燭。一小群人在此轉來轉去，每天晚上皆是如此。

新的圣地已然在整個東歐形成，用以紀念革命的主要人物和烈士。但是這處臨時的圣地比其他所有圣地更戲劇化、更有活力，就像一處活火山。它的能量尚未耗盡，熾熱的余燼暗示著另一次爆發的可能性。

在“事件”后，一群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人士組成了社會對話團體（Group for Social Dialogue），提供一個獨立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平臺。剛開始時，大家對此團體皆寄予厚望，或許也激發出些真正的評論。羅馬尼亞雖然有組黨的意圖和目的，但除了政府外，并沒有其他重要的政黨組織。源于國家農民黨和國家自由黨的兩個“歷史”黨派，既很少發聲，也沒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東歐北方的三個國家相比，此地存在的這種異議的種子在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便已經被完全驅散和壓制了，因此這里并沒有現成的組織架構得以作為反對黨的跳板。盡管被寄予厚望，但據我所知，社會對話團體大部分時間都在斗嘴，迄今并沒有什么實質成效。

不過，團體總部是若干有興趣的外國人交流信息的非正式中心，因此在任何跟信息有關者都很難獲得的羅馬尼亞自有其價值。該團體所在的建筑興建于18、19世紀之交，狀況不錯，在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屬于他的一個兒子；如今是個有模有樣的辦公室，也有一些學術人物穿梭其間。

在鋪設著大理石地磚的門廳，一個被稱為“藝術家”的男士說他可以讓我看些關于那些礦工的影像記錄，隨即又說現在沒有辦法，也許改天吧。這件事拖延了幾天，過程令人尷尬而混亂，不過后來我終于在合適的時候逮住了他。他架設好放映設備，然后不知從哪里冒出一個年輕女子和我一起觀看，并用非常破碎的英語翻譯旁白部分。那些影像雖然是沒有經過剪輯的毛片，但大部分卻都無需言語即一目了然。畫面內容包括在大學廣場靜坐的學生、知名人物的激情演說，以及人人都在唱即興改編的歌曲。他們在廣場靜坐了好幾個星期，要求政府清除內部的“新共產主義”。其中有首歌曲聲稱“我是個小流氓”，卻將這侮辱的字眼變為體面的敬語。“伊利埃斯庫唯一的貢獻，是把這個名詞神圣化。”一個人評論道。讓我驚訝的是，那位幫我翻譯的女子說那些學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分寸，他們唱歌、玩樂，一直持續到深夜，激怒了人們，所以礦工介入時，才會有那么多人樂見其成。但她顯然是站在學生這邊的，只是似乎不愿意表露激憤或明顯的立場。

然后，礦工出現了。影片中記錄他們在詭異的寧靜中抵達布加勒斯特外圍，戴著大型頭盔，揮舞著皮棍，一個個長著年輕、熱切的臉。鏡頭轉到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礦工們似乎隨心所欲地奔跑，追逐人群，包圍一個男人，毆打一名女人。“我當時就在那里，”幫我翻譯的女子在一旁說，“他們無緣無故地打人。如果你穿牛仔褲，那就代表你有美金，是叛徒。如果你穿短裙，那就是妓女。”那些礦工狂熱地攻擊。一名年長的紳士向他們喊：“這不是革命，這是國家的勝利。如果我說的不是真話，你們可以打死我。”但是其他人則向礦工們比出勝利的手勢，并指指人群，似乎是在說：“去打那個人。”然后礦工們登上火車打道回府。他們冷漠地用皮棍敲打著皮靴，頭盔上插著花朵，每個人都可以借用純真和甜蜜的標志，神情愉悅，對自己的杰作心滿意足。一名礦工高興地說：“為了自由！”有些女人跑上前去，獻上更多的花朵。

我心情陰郁地走回斯特凡娜的家，有些事我真的不懂。我不明白那么渴望成為新世紀值得信賴之人的伊利埃斯庫，為什么會選擇一個那么容易讓人聯想到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我不懂他為什么還能維系民眾對他的普遍支持。這不只是一樁脫離常規的行徑，根本就是不同的規范。就像每次遇到一種完全不同的現實感，這次令人惶惶不安。當天晚上，我們坐在桌旁唯一一圈燈光下，聽斯特凡娜細數圍繞這些超現實奇特事件的問題。首先，伊利埃斯庫為什么非得召集礦工前來？是因為警方和軍方不會服從他的命令嗎？還有，是誰煽動起不安的氣氛，使得恢復秩序似乎成為必要之舉？后來關入獄中的群眾中，很多根本就是“烏合之眾”，仿佛是從其他監獄或瘋人院抓過來的，完全不像有能力組織任何事的人。這些難解之謎令斯特凡娜相當沮喪。她已經比大多數羅馬尼亞人更清楚自己的立場了，但面對這種令人發指之事，即使她的風格也未免太過溫和了。

不過，在我聊過天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對這件事感到震驚，沒有一個人的語氣是我所預期甚至期待的強烈譴責。是啊，發生這種事是可怕的，人們都這么說，但是伊利埃斯庫并非出于惡意，只是沒有那么明智。總之，就我們目前所有的而言，他算是最好的了。礦工的暴力現身，雖然從“正常”觀點而言好像根本無法接受，但經由這種沖突的情感或宿命論的看法，將其融入混沌陰郁的猜測、詮釋和謠言，也就得到全盤接受了。

我勇敢地只身步行穿越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但迎接我的是更多美學的挫折感，一種簡直和道德的鞭笞不分軒輊的折磨。除了人為的災難外，布加勒斯特在1977年曾遭到地震的自然災害，因此市中心地區大部分建筑是地震以后興建的。但連這些建筑都已經呈現荒廢之感，似乎任由其自然退化，走向腐朽。熱氣逼人，令人無精打采。有些“商店”的櫥窗上掛著污垢，后面則陳列著少數凄慘的商品：一些玩具、幾箱橘子汽水和幾罐刮胡膏，更增添幾抹荒謬的感覺，猶如一個虛幻的世界。

我的腳步逐漸放緩。一則因為炎熱和周遭環境，一則因為周圍的人群。不知名的布加勒斯特群眾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心神不寧，就像那些怪異的建筑物一樣。我知道在齊奧塞斯庫手中被毀掉的事物之一，便是由于醫藥缺乏和居住環境惡劣，摧毀了羅馬尼亞人民的健康——政權的蹂躪似乎完全彰顯在百姓身上。布加勒斯特人的臉孔蒼白、黯淡、早衰，身體經常呈現怪異的扭曲，有時甚至已經變形。但還有一件更困擾我的，是他們神情的木然，缺乏敏銳性，缺乏表現力。這也是奧利維婭·曼寧（Olivia Manning）[[12]](#_12_9)在她的《巴爾干三部曲》（Balkan Trilogy）中所注意到的一件事。歷史的長期混亂會表現在人民的臉上嗎？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像羅馬尼亞這般一團糟的。到處都是漫無目的聚集的男人。這里唯一生動的色彩是幾名婦人身上所穿的便宜、刺眼的布料，其所構成的俗麗，或許是為了彌補周遭的一切吧。在回斯特凡娜家的途中，我在一家露天“咖啡店”逗留了片刻，聽說那是一個新的時髦地點。但那里卻沒有咖啡，唯一供應的冷飲是那種我在特蘭西瓦尼亞便領教過的黃色飲料。

其他東歐地區的人民都爭辯他們如何是“真正”歐洲的一部分，唯有羅馬尼亞像是勉強攀附于歐洲，隨時都可能墜入另一個時空，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存在。

斯特凡娜帶我去拜訪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其所任職的新聞界在伊利埃斯庫統治下已重新復蘇。我們爬上一截黑暗的樓梯，來到一個幽暗的小型公寓。斯特凡娜的朋友安娜（Anna）個子很高，皮膚黝黑，五官分明。在我看來，穿著一件低胸露背長裙的她，有點像土耳其人。

安娜在國家廣播電臺工作多年，直到該電臺受到埃列娜·齊奧塞斯庫（Elena Ceauşescu）的青睞。羅馬尼亞文化界是埃列娜的統馭范疇，而受到她的青睞絕對不是好事。不知何故，齊奧塞斯庫夫人對電臺展開清算，一口氣開除了大約八十名員工。在執政黨反復無常的劣跡中，這類專斷的開除也算是羅馬尼亞獨有的特色，更增添一種殘暴任性和荒謬的意味。人們在形容那些年的氣氛時，都試圖向我傳遞這種感覺。

我問安娜，她的電臺同事有沒有表達抗議，聯合起來。“你在開玩笑嗎？”她發出沙啞的大笑聲。“光是送出有一個人以上簽名的便條紙便屬違法。如果聯合起來，你想法律會怎么樣？”

但是人們至少會私下表示同情，或商量該怎么做吧？我追問。我把波蘭的經驗轉嫁到這里，但是這里的情況顯然不同。安娜意味深長地聳聳肩。“在到處都是告密者的時候？我們當時很害怕，天氣也很冷，要熬過冬天已經夠我們煩心了，大伙兒全都待在家里。”

被開除后，安娜有好幾年的時間都在一家電影院擔任售票員，直到身居要職的“某人”，跟另一個“某人”交涉，她才被獲準在電影院內部工作，擔任經理助理。在那些“事件”后，她一個被判二十年不得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受邀經營一家原本屬于共產黨的報紙，這才邀請安娜來替他工作。

羅馬尼亞就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幾乎在一夜間便冒出幾百家報紙和雜志；但是據我所知，大部分都是謠言制造工廠，粗制濫造些觀點不同的錯誤信息。安娜當然并不相信扭曲的事實，但她也不相信所謂的新聞客觀性。在她看來，新聞記者是具有新鮮想法和觀點的人。她負責報道有關政府和政治的消息，但是當我詢問她從哪里搜集資料時，她告訴我她是從電視看來的——而電視本身是由政府控制的，另外就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她說比較具有調查或報道性質的新聞模式，在這邊只有丑聞記者才會使用，他們侵犯人們的私生活，揭露他們生活中八卦的細節。她不會給自己找這些麻煩，所謂“事實”、“公正”、“真實性”等存在，在這里根本無從取得。但對她而言，這些似乎并不足以構成重要的標準。不過我想也是，“客觀”新聞報道的理念還沒有完全傳到東歐，這又是一個我們認為理所當然，這里卻不以為然的觀念。

我問她對于她所報道的政府有什么看法，她同意伊利埃斯庫的所作所為嗎？喔，并不盡然，她回答說。不過也沒有明確地表示反對……又是那種奇特的模糊其詞。安娜顯然是個很有活力和智慧的人，但是我在此間經常感到困惑的，是她為何不愿做任何結論，不愿說“是”或“不是”，不愿表達憤怒，不愿明確表達她的觀點。

斯特凡娜和我在夜色中走回去，穿過一片漆黑的街道。這種漆黑是鄉村森林間的墨黑，絕非屬于城市街道的。這分明是布加勒斯特相當市中心的地區啊，但是沒有街燈，周圍的建筑也沒有透出光線。在濃霧中，我幾乎看不清腳下的路面。斯特凡娜回想起昔日漫長、寒冷的冬天，為了節省金錢，為了讓羅馬尼亞免于負債，齊奧塞斯庫切斷了他的子民家中和大部分公共場所的暖氣，又是他的一個殘暴手段。雖免于負債，卻苦不堪言。有些老人在家中凍死，小孩也因此斃命。斯特凡娜受了很多苦。那種冷是無從化解的：冰冷的劇院里，演員們顫抖著表演，觀眾們也顫抖著觀看。經常不只是街上不供應電力，人們家里也沒有電，因此布加勒斯特一時之間便退化進抱團取暖、工業化之前的黑暗時期。

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在鵝卵石路面上，突然間，面前冒出一個男人，有如幽靈現身。在黑暗中，我們根本沒有注意到他朝我們走來。他問我們現在幾點。我們回復他沒有惡意的問話，又繼續前行，腳步有點踉蹌。想想數年生活在這種黑暗中，以及綿延數月的天寒地凍，我終于明白人們為何會失去斗志、失去抗拒的力量，甚至失去希望。

但是當我詢問斯特凡娜在紐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這里感覺如何時，她說：“喔，我好高興能回家，我幾乎哭出來。”這就是局外人不能理解之處：千絲萬縷將我們維系于故土的鄉思，即便家鄉是這般艱難。有時候，或許正因為故鄉是這般艱難。

在羅馬尼亞的種種匱乏之中，也許最嚴重的是可供參照的過去經驗的匱乏。最近的過去代表的是一種負資產，幾乎是純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樹立新的目標，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較遠的過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參考點，因此新的理念無所附庸。羅馬尼亞歷史的特點是斷續多于持續，是壓制多于獨立，是不同形式的專制主義多于自由主義。

共同的過去為什么、或者會如何影響現在，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我不相信光憑記憶就可以保證學到教訓，或者保證從經驗中受益。但是今日的東歐卻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共同的過去對于現在的確事關重大。如果小時候曾有祖母講英雄事跡給你聽，描述他們如何為眾人的自由而奮斗；或在高中的時候，讀到相關的文章，描繪一個美好的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或者家族傳說中有個精力旺盛的叔叔，和兩個朋友開了一家小店，后來發展成大企業，生產的帽針都出口到了美國等等。這些都很重要，因為這些故事會引導你朝某個標準或行為邁進。這些故事將理想化為實際，會讓你相信為自由而戰不是空想，相信冒險開家自己的小店是可行的。

有一天，我跟經濟學家達揚·達亞努（Daian Daianu）談起這件事，他認為甚至經濟改革也非常倚賴某種社會傳承。“沒有人知道羅馬尼亞要如何轉型，”他說，“因為這里沒有社會基礎，沒有可以起步的傳統。”

達揚本人在羅馬尼亞也算異數，年紀輕輕，短袖運動衫塞在長褲里，一身利落打扮，擁有美式作風和技術治國的專業知識。不久之前，他試圖分析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何以“在基因序列層面有了瑕疵”。不用說，他的研究計劃無法從老師處獲得多少幫助，后來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夠出版，原因之一竟然是研究太過復雜，以至于大部分同事都看不懂。他驕傲地告訴我他正在籌劃成立一家經濟研究機構，而且已獲得西方的資金支持。

盡管信心滿滿，但達揚承認國家的現狀令他完全陷入困境。“問題出在缺乏一個活生生的共同經驗，”他說，“波蘭有團結工會，已經運作了十年，人們學會了如何團結，如何采取行動，所以他們的改革很快就取得進展了。但我們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們習慣等待官方解決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終沒有來。我們必須學習自己做事。”

但是一個處于混亂癱瘓狀態的國家要如何振奮起來？羅馬尼亞的問題，不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而是是否有雞、是否有蛋。沒有一個已經存在雞和蛋的過去，他們要如何憑空生出雞或蛋來？

在陰暗的郵局里，我買了些明信片，結果到手的是幾張泛黃的紙張，上面是幾幅影像模糊、丑陋至極的布加勒斯特圖片。“垃圾！”一名青少年言簡意賅地評論一句，他身穿尺寸過大的夏威夷衫，臉上沾著黑色污漬。接著那無賴模樣的青少年堅定地跟著斯特凡娜和我來到街上。“美國都沒有這么貴。”他反抗地宣稱。“沒有嗎？”我驚訝地反問。“沒有。”他回答，“看吧！那里兩百美金就可以買間公寓。”他拿了張皺巴巴的紙給我看。我仔細查看，原來是一張洛杉磯報紙，看來他已經保存了好幾年了。我告訴他，現在他不可能用這個價錢買到公寓的。他一臉狐疑，繼續跟著我們，不斷提問：“每個月買食物要花多少錢？搭地鐵要多少錢？”我努力用些數字滿足他，他把那些數字全寫在掌心里。“你打算去美國做什么？”我問他。“美國有很多有錢人，我要替他們做事。”“那上學呢？你怎么上學？”“很多偉大的商人都沒有上過學。我想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就沒有上過學。”說完話，他就跑走了。

啊！是了，這正是最純真的美國夢，不受任何信息的干擾。不過誰知道呢，我對斯特凡娜說，也許他具有真正的企業精神吧。但斯特凡娜一臉沮喪。她聽說過和那孩子完全一樣的故事，企圖進入神話之邦，但是很快便被毒品和色情行業吸收了。當然，那確實是更可能的結果。

刻板印象其實就是事物的典型樣貌，這句話再度獲得證實。我安排訪問的庫爾達將軍（General Culda）完美符合我想象中的某種典型軍人的樣子。他的樣子很像拉丁美洲軍團或菲律賓軍團中的一員，個子短小精悍，健壯結實，一直保持抬頭挺胸的姿勢。穿一件短袖軍裝的他有雙淺藍色的眼睛，帶了一群隨員前來，房間內還有另外兩名制服人員，其中一名負責幫我們翻譯。

庫爾達將軍在羅馬尼亞陸軍中位階很高，是我在此間遇到的第一位樂于清楚表達自己意見的人，同時帶有華麗的政治辭令。他毫不猶豫地提到“國家價值”和“崇高愛國價值”，而陸軍有保護它們的職責。他不斷談及社會中有某些“成員”沒有充分尊重這些價值，以及“尊重游戲規則”的必要性——這是他非常喜歡的一個詞。他的人物性格的可預測性和語言的重復性讓我深感神奇。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嗎？一旦語言充滿套話，便失去了說話之人心口一致的可信度；但之后我又轉念一想，個人信念的公式化應該也是相信的一個表征或表現。

按照將軍的觀點，當然，是那些成員拒絕按照游戲規則行事，才造成了最近所有的紛爭。不過，我問他，真的有必要召集礦工前來嗎？

他斜眼瞥了我一眼。“你當時在我們國家嗎？”

我承認當時我不在。

“那容我告訴你一些細節。”他極有禮貌地提議道。

對我已經聽過無數次，而且始終分析不出原委的事件，他給出了他的版本：那些不尊重游戲規則的力量占領大學廣場長達幾個星期，交通為之阻塞。而且那些人一直試圖以非法方式“讓人民迷失方向”，即讓人們收到錯誤信息。他們還提出沒有根據的主張，尤其是宣稱有些人不應該擁有權力。他們說羅馬尼亞大多數人不了解情況，因此少數人有權提出解決方式。他們這樣根本不民主。

不過，當局自我克制，沒有使用武力。“羅馬和巴黎的記者們問過我好幾次，”將軍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引用西方意見說，“這種情勢我們還要容忍多久？”

最后，在選舉逐漸迫近的6月13日，實在已經是非干預不可了。于是當天早上，“維持秩序的力量”“解放”了大學廣場，“布加勒斯特松了一口氣”。但是不守規矩的成員再度發起攻擊。他們焚燒警車，猛力攻擊剩余的警力，逼得警方只好撤退逃走。

幸運的是，就在那時，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表出于憤怒在北方自發興起。“我們現在才知道，”將軍宣稱，“甚至在總統提出請求之前，有好幾千人就已經開始往布加勒斯特移動了，絕對不只是礦工而已。你必須了解，住在布加勒斯特外的百姓認為首都的人都腐化了。”

在這種氣氛中，將軍補充道，可以想見礦工為什么會直接向反對黨總部挺進，他們在那里發現了違禁品，好多瓶子里裝滿汽油，準備用來當汽油彈。當時的氛圍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時候人們會提供給礦工們一些錯誤的信息，想借礦工的力量進行私人報復，攻擊無辜的人。這可以解釋當時為什么有些礦工會反應過度，這點確實很不幸。不過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那些力量拒絕按照游戲規則行事。

這便是他的說法，有條有理的另一個故事，好人和壞人顛倒的版本。其后，我跟朋友聊起時，大伙又開始出現不同的詮釋、猜測和評注。將軍為什么要編造礦工攻擊反對黨這種莫名其妙的事？而且，礦工事先怎么會知道各反對黨的地址？有太多細節無法吻合。有權力的一方，先天占有統籌規劃的有利位置。比如撰寫偵探小說的作者，他們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也知道他們想要傳遞什么樣的印象；但他們的“讀者”，不幸地，也就是他們行動的目標，卻只有碎片的信息，零星的線索，和一種感覺，意識到這個國家內部有某些地方已經腐化。只是在羅馬尼亞，人們仍然無法相信那腐化的源頭可以被發現、被審問或被要求承擔責任。在東歐其他地方已經逐漸透明化的權力，在這里卻仍然是混沌、神秘而難以理解的。

不過讓人好奇的是，將軍也有他的困惑不解，即他篤信這些事件的背后有股邪惡的勢力在操縱。對他而言，那勢力便是匈牙利人。在我們的對話中，不管我的問題是什么，或我們所談的主題是什么，他動輒便提及匈牙利人。對他而言，追根究底，匈牙利人儼然是羅馬尼亞大部分災難的源頭。將軍相信是特蘭西瓦尼亞的匈牙利人挑起了國內的不安；極右翼組織“羅馬尼亞家庭聯盟”（Vatra Românească）的成立，只是為了回應匈牙利人的挑釁；羅馬尼亞在國際上風評不好也是匈牙利人故意散布假消息的結果。“我不是說匈牙利正準備開戰，”他說，“但這是種非傳統的作戰方式，包括操縱輿論和信息。那是現代軍隊必須有所防備的，我們正在設法應付這種戰爭。”

將軍帶有偏見地談論匈牙利人，而且不時目光狡黠地斜瞄我一眼，希望我明白其實還有很多話是他不愿意說的，有太多事不是一目了然的。顯然，即便身居權力中心的人，也在搜索另一股勢力，肯定有某個潛藏的原因，某個秘密組織的存在，使得他們始終無法遂行絕對意志。

“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捷克人”，這些名詞被一遍遍提及，起初代表著確實的存在，但后來相反的，它們似乎成了某種諷喻的形象，跛行在抽象、疲憊的心靈領域。在當今這個從波蘭到匈牙利的時間還來不及看完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斯洛伐克的大部分計算機都和IBM的產品兼容的世界里，這些指稱又有什么意義？但問題是，這些稱呼背后或里面包含了太多歷史。有一天在布加勒斯特，我跟佐婭（Zoia）聊天，她是個溫和、有思想的女性，有很好的自由信念。我以為她對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關系會表達出比較親善的觀點，結果不然，她反而激動地敘述當年匈牙利人治理特蘭西瓦尼亞時的殘忍行徑。這些虐待和不公不義的故事，全是她從父母那里聽來的。“我不是那種有偏見的人，”她說，“但是匈牙利人真的很傲慢。他們認為我們低人一等，對待我們像奴隸一樣。我們好長一段時間都是奴隸國家，到現在有些人走路還是會習慣性地低著頭。”

我問她，現在特蘭西瓦尼亞只有兩百萬匈牙利人，卻有八百萬羅馬尼亞人，這種比例應該無助于匈牙利人的傲慢吧。但是這整個問題顯然已經挑動了她敏感的神經，不會因事實已經改變而輕易被撫平。幾個世紀的傷害和不公不義，如今已滲透到了抽象層面，而抽象意義的“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此刻仍繼續為其所受的傷害互相報復。在旅程中，我經常想起《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13]](#_13_9)里哈克貝利·費恩所描繪的一段遠在南美的世仇，雙方荒謬而狂烈的爭執，其起因早已被遺忘，唯一留下的就是報仇的義務與責任。

至于布加勒斯特本身，則讓我不斷想起奧利維婭·曼寧的《巴爾干三部曲》這三本筆法艱澀的小說，其中所傳達的羅馬尼亞氛圍迄今仍清晰可見。其第一部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中，但她所描繪的情況和今日政局的混濁、流言蜚語、謠言、腐化、官員的無情毫無二致。誠然，曼寧曾在布加勒斯特居住了幾年，當時這里糧食豐盛，既有墮落富有的貴族，也有貧困不堪的小農；但除此之外，她仍目睹了同樣的漠然、混亂，以及突然的奪權。曼寧所描繪的英國女人對她周遭的情況一則覺得惡心，一則覺得神奇，經常表達出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只是這些對于她周遭既深且廣的混濁與非道德終不濟事，但那也不算她的錯。

但我又想起了保羅·戈馬（Paul Goma）這位羅馬尼亞作家。他一生飽受政治迫害，但在回憶錄里描寫他的國家時，卻充滿了感性的抒情。他在靠近蘇俄邊境的一個村落長大，仍記得那些蜷縮在茅屋中的農民所承受的非人待遇，瞬息萬變的政治不公，以及面對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和戰爭逐步進逼的煩憂。不過他的回憶錄中也充分描寫了生動的鄉間生活、早熟的性啟蒙、有趣的當地怪談，以及親密而無拘束的人際關系的刺激與趣味。這也許可以提供一條線索，說明東歐、中歐和中南歐的人民為何對自己的國家具有如此強烈的依戀，以及一旦離開后那種難以描述的鄉愁。東歐世界的人類行為不像西方，受到清教主義、個人主義或過度的自我意識的限制，需要相稱的尊嚴和距離。從我在波蘭度過的童年，我可以體悟：戈馬所描述的，是人與人之間比較親密的近關系，其中有豐沛的愛，以及隨之而來的恨，還有維系兩者的力量。

從外部獲得的對一個地方的感受，經常有別于內部人的觀感，這點在羅馬尼亞表現得特別明顯。只要我仍抱持一向的思考體系，或我的“標準”，或維持一個敏銳觀察者所需的距離，這里的生活簡直就沒法過。但是幾天后，也許是因為別無選擇吧，我漸漸屈服于一種消極接納的機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怠的氣氛中。而一旦這么做了，某種有趣的改變就發生了：所有似乎無法忍受的情況都開始變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種無拘無束的奇特情緒，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現的壓力，或內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為了什么目標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反正任何努力、偽裝和矯揉造作，或在布加勒斯特緊閉雙唇、擺出勇敢的模樣都毫無意義，不如干脆放松心情。有那么一段短暫的時間，我失去了對事物做判斷的感覺；但也開始理解，這里的人們是怎么熬過來的了。

在布加勒斯特的第十天，我發現商店櫥窗內有牛肉，展售的方式是將全牛分成四塊，吊掛在屋頂的鉤子上，還滴著血水。商店內幾個人就坐在那些實在不賞心悅目的肉塊下方。不知道為什么，并沒有群眾前來搶購。我在櫥窗前看了好一陣，那牛肉的賣相實在令人觸目驚心。但是商店前為什么沒有出現排隊的人潮？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肉不好嗎？我始終不得其解。這幕情景仍然是一張無法解讀的快照，算是羅馬尼亞超現實主義的另一畫面。

\* \* \*

我到新聞之家（Casa Scînteii）去拜訪《羅馬尼亞文學》（Romania Literara）雜志的編輯尼古拉·馬諾列斯庫（Nicolae Manolescu）。新聞之家的字面意思是“火花之家”，直到最近，一般人皆稱其為“謊言之家”，目前已經重新更名為“新聞自由之家”。新聞之家的建筑是眾多婚禮蛋糕式建筑之一。這種結構的建筑由蘇聯當年或大方捐贈給它的附庸國家，或要求其附庸國家興建以示效忠。而這棟建筑除了不自然的設計外，還帶有羅馬尼亞特有的那種難以描繪、處于嚴重崩解狀態的外觀和感覺。這種效果最主要來自沒有光線的走廊，人們穿梭其間，一副置身香榭麗舍大道（Champs-Élysees）的模樣，墻壁和地板還散發出難以辨識的氣味。

《羅馬尼亞文學》辦公室結合了崩解和褪色的優雅，馬諾列斯庫先生書桌上的玻璃有裂痕，墻壁上也有1977年大地震所造成的龜裂花紋。辦公室內有張厚實的長型木會議桌，還有幾把磨損的絨布椅。

多年來，《羅馬尼亞文學》為羅馬尼亞公認的重要文學雜志，而尼古拉·馬諾列斯庫本人也是國內首屈一指、意志堅定的公眾人物，渾身散發出無窮活力，臉上一直帶有頑皮的神色而充滿生氣。他挖苦地評論羅馬尼亞可悲的現狀（“如果羅馬尼亞曾有資本主義的話，我們保準也會把資本主義摧毀的；我們是滅絕大師。”），不過對于未來，卻仍抱持著令人驚異的樂觀主義。《羅馬尼亞文學》員工齊聚于辦公室，他們馬上讓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就像其他地方文學雜志社的員工一樣犀利、神經質、語帶譏諷，同時親切友善。他們拿給我看過去幾年在8月23日那周發行的雜志。8月23日是蘇聯陸軍解放羅馬尼亞的紀念日，直到目前為止，也是羅馬尼亞的國慶節。在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當天成為眾人向統治者家庭集體致敬的日子。在最近一次8月23日的周刊中，前面幾頁都是齊奧塞斯庫的巨幅照片，標題中盡是對領袖的頌揚之詞。整體印象令人震驚，尤其鑒于齊奧塞斯庫缺乏任何高貴氣質或個人魅力。那些照片顯示的，說來毋寧像個三流的暴發戶，臉上閃現著精明的狐疑與自滿之情，呈現一種令人不悅的組合。“真正的《羅馬尼亞文學》從第五頁開始，”一名編輯解釋道，“那頁以后是未受影響的。這是我們做出的妥協。”這項妥協比大多數出版物的情況要好，一般出版物從頭到尾都被卑躬屈膝之詞滲透了。

一名年輕作者神經緊張地抽著煙告訴我，他們經常被迫寫些親齊奧塞斯庫的文章，但其實是有辦法抗拒的，雖然一般人都認定你做不到。或許就是因為這種假定，才讓有組織的知識分子抵抗勢力總是被大舉摧毀。秘密警察一再制造他們的爪牙遍布每個地方的印象，因此幾乎沒有人敢測試他們的實力。再加上齊奧塞斯庫完全不可預料的善變，他幾乎是隨自己的興致在統治國家，沒有任何可看出的規律可循。

“齊奧塞斯庫只是羅馬尼亞一連串掌握實權的跳梁小丑之一，”一名編輯告訴我，同樣也猛抽著煙，“你知道，尤內斯庫從中躥起并不是意外。對他而言，荒謬劇就是現實。”

在這個房間內工作的作家所承受的壓力也沒有完全消除。其中有幾人成為中傷性文章的目標，“官方”記者還會打電話來威脅——即便“官方”記者的權力應該已經減弱了，但其實騷擾他們的還是過去那一批人。我問他們現在到底在做什么。在其他后共產主義國家，前“官方”作家大部分都保持低姿態。“他們都跳上了駿馬。”馬諾列斯庫先生如此回答，意指他們把賭注押在政治新貴身上，而且顯然狐假虎威，繼續耍弄恫嚇的伎倆。

晚間，馬諾列斯庫先生邀請我和幾名作家去卡普沙飯店（Capsa）用餐，那里是戰前布加勒斯特文人名士慣常的流連之所，經常被視為本地少數“好”飯店之一。果真，餐桌上鋪著白色桌布，木質護墻板上裝著幽暗的燈光，相較于當地情況，卡普沙的確富有多了，只是夏夜悶熱沉滯的熱氣和苦等兩個鐘頭才送上食物的服務，還是讓體驗大打了折扣。

在我們苦候食物之際，唯一的慰藉只是溫熱的啤酒，那同時也是顧客和侍者之間的笑柄。雖然時有斷斷續續或以英語翻譯的方式進行，但我們之間的對話倒是更為妙趣橫生。“我大概認識三千個英文字，”其中一名作家凄慘地說，“但正好都不是霍夫曼女士今天晚上所使用的。”通常，每逢對話難以為繼時，都是由瑪格達（Magda）填補空白。她是馬諾列斯庫先生的助理，精力充沛，本身也是位作家。座中個個都幽默風趣，別忘了無論在哪里，作家都是搞怪的一群人，但是這些作家也承認，他們對于新的文字自由感到緊張。“以后再也沒有借口了。”羅馬尼亞最負盛名的老一輩小說家之一，康斯坦丁·措尤（Constantin Ţoiu）悲傷地說。他的意思是，以后他們再也不能躲在東歐作家慣于使用的象征主義和密碼游戲帷幕之后了。原本流行的伊索寓言式風格突然被視為中世紀的過氣寫作手法，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古典寓言的存在，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圣經體系可以參照。東歐作家們所操弄的典故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有一個包羅萬象的系統存在，每個人只要使個眼色就知道對方的意思，作者和讀者也能透過彼此心知肚明的方式串聯共謀。但現在作家必須另辟蹊徑，直接表達他們想要傳達的意思，這也許是最困難的一項技巧。“我不知道已經這把年紀的我，是不是還做得到。”措尤先生坦言。滿頭白發的他帶有古典的迷人風采。“也許到頭來，我會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么可說的。”

馬諾列斯庫先生調侃另一個作家奧古斯丁·布祖拉（Augustin Buzura）：“他是——我是說他曾經是——羅馬尼亞最好的作家，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他必須重新證明他的實力？”我反問。

“是啊！這是真的，”布祖拉先生說，擺出謙卑的姿態，“我必須等馬諾列斯庫告訴我，我是不是做到了。”

東歐正在重新評估文學的價值，而且就像所有的重新評估工作一樣，這不但會影響未來，也會影響過去。諸如《自由的哭泣》（cris de liberté）等昔日以隱喻方式完成的作品，有可能會變得完全無趣——許多作品已肯定是如此下場，因為現在自由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困于此項理論轉折中的作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快樂。用過晚餐——那送上的餐食倒是很像樣——后，布祖拉提議我們去大學廣場看看，那里應該正在發生“一些事”。晚餐前，我們曾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比平常人多，也比較騷動。

我們穿過陰暗的街道抵達現場，在陰影中見到一幕怪異的景象。數十名警察正不疾不徐地排成一個整齊的四方形。在夜色中，他們陰暗的身影相襯于成排舉在身前的長形白色盾牌，宛如中古騎士。在無形分界線的另一側，則是密集的人群。一旦隊伍就位，警察便一致朝群眾挺進；同時，群眾也近乎儀式性地往前涌，然后又像浪花一樣退去，警察隨即跟著后退；然后，他們又往前挺進，日本歌舞伎似地跳著“威脅”，上演一場影子戲。

“即興表演。”馬諾列斯庫開心地說。布祖拉聚精會神地看了又看，馬諾列斯庫則看著他。“啊！作家，”他說，“他下一部小說的場景。”

無疑，東歐作家還是有他們的寫作主題的。不過此刻沒人了解我們正熱切注視的這一幕有什么意義。是抗議嗎？是有組織的嗎？是誰號召的？第二天，有些人被逮捕，然后就是謠言、闡釋和猜測。就目前而言，這只是羅馬尼亞政治大劇的一個小插曲，但這是一出隨時可能轉化成現實的戲劇。沒有人知道這次聚會會是一場悲劇，或是一場鬧劇；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

一年后，當我再次飛抵羅馬尼亞機場時，當地氣氛如何？在抵達一個新地點，或和一個新朋友見面時，總有一刻直覺地獲取整體的印象。之后，確定的感覺會逐漸碎裂，微妙的感受會逐漸囤積為模棱兩可，要經過許多次理解的重構，才能將碎片拼成全貌。但是在我第二次抵達布加勒斯特時，有好一陣子，眼前只見到羅馬尼亞的碎片。或許是因為有只雜種狗，絕望、饑餓地跛著畸形的腿，尾隨著乘客乞討；也或許是因為一張張風華褪盡、布滿皺紋的臉上那種被剝削的怪異神情吧。兩個襯衫衣擺飄在長褲外的男人繞著狹小的等候室走了一圈，然后聚在一起，交換著什么秘密——天曉得他們是從事什么行業的。還有一個男的，在我通過海關后便開始黏著我，低聲說著：“出租車”，口氣諂媚又堅持。“不用了。”我一直說，因為我在等斯特凡娜。但沒有用。他仍然跟著我到電話亭，又跟著我到長椅，而且還多了個同伴，一直輕聲耳語：“出租車。”直到我不耐煩地厲聲回了一句：“不要！”他們兩人才愕然地往后跳開，不再糾纏我，卻還是站在安全距離外瞅著我，看我會不會改變心意。

斯特凡娜出現了，后面跟著脖子很粗的格拉迪奇（Gradici）先生。我們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靈車，以合乎禮儀的緩慢速度駛抵市中心。斯特凡娜的公寓里有熱水、伏特加、弗洛麗卡嬤嬤的拿手色拉和帕維爾，還有愉快的對話。

再見布加勒斯特，幾乎有種類似愉悅的感覺，或許純粹是因為熟悉感帶來了喜悅，也或許是因為再度浸入那種緩慢、懶散的生活步調。但是市區的主要部分跟我上次來訪相比沒有多大改變。灰塵飛揚的道路上看不到新商業活動的征象，只有一家落滿灰塵的商店在賣洗發精、威士忌和香煙。我很快得悉那家商店的店主以前是秘密警察。

齊奧塞斯庫時代最惡名昭彰的暴行之一，是夷平整個村莊和市鎮，以進行他自己的建筑工程計劃，諸如水壩和“現代化”的住宅工程。幸虧他活得不夠久，無法按照他的心愿完成所有計劃，不過也有近乎四十個住宅區，包括許多歷史建筑成為這項異想天開的奇舉的祭品。有幾處被鏟平的地方就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因此在這個酷熱的早上，我便和斯特凡娜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車子前去一看。這類有代表性的暴行，有種令人著迷的怪異之處。

在格拉迪奇先生莊重的車速下，從布加勒斯特到最近一個村落弗勒迪切斯庫（Vladicescu）約十五英里的路程，耗了我們一個鐘頭。不過映入眼簾的不是一個村落，而是一片空曠。在我們駛入空蕩的主路后，綿延不絕的，盡是一片荒涼的平地，連一棵樹都沒有，延伸直到天際。一無所有，在行駛幾公里后，才終于看到一點東西，一片平坦中孤單的點綴。那是三個袒胸露背的男人正在空曠的平原上吃力地搭建一間半完成的屋子。我們趨近觀看，見到他們使用的建材是稻草、黏土、若干硬紙板以及幾片膠合板。這將是間極為原始的房子，不過卻是他們當中的兩位，即一位非常年老的男子和他的兒子，在村落被摧毀前原本居住的地方。

他們告訴我，當齊奧塞斯庫決定移除他們的村落時，他們奉命在接到通知兩個星期之內，就要搬離住了一輩子的地方。于是他們搬到布加勒斯特的親戚家居住，并在當地尋找卑賤的工作糊口。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在齊奧塞斯庫的計劃中，并不包括向他們提供替代住宅或生計。“幸虧，”他們中的一人說，“齊奧塞斯庫還來不及在這里做什么就死了。”所以此刻他們正在以前舊宅的遺址上重新搭建自己的房子。“不過你也知道，”那兒子告訴我，“我們沒有錢，沒有建材。這樣做是因為父親老了，他想要找回自己的家。”

街對面，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婦人正痛苦地彎著腰，從路旁水井打水注入水桶。在我們走近時，她沉默不語。對我們這種貿然闖入的陌生人，她當然有不說話的權利。不過當我們走開時，她卻在我們身后用幾乎是憤怒的口氣大叫：“我是回來這里等死的，我想要死在我出生的地方。”

弗勒迪切斯庫是遭到純粹恣意破壞的一個地點，我們來到的下一個村落——蓋爾曼尼斯特（Ghermanest）則更為態度不明。齊奧塞斯庫在那里還有機會執行他至少部分的計劃。只見路的一邊，蓋爾曼尼斯特一如傳統村落，有著色彩繽紛的小屋，種著花朵的小小庭院里養著小雞；而馬路另一邊和這質樸聚落面對面的，是三層樓高的樓群，相比之下，顯得格外剛硬高聳。讓人覺得糟糕的事實是，這些樓房建筑其實沒有那么糟糕。因為這是齊奧塞斯庫的暴行，所以我很想痛恨它；但是我在東歐看了太多這種結構，因此我知道這些樓房不是最差的。樓房涂著柔和的黃色，每棟樓之間還有些零星菜園。一個女的正從窗口往外看，胖胖的手臂架在窗臺上，滿懷興味地觀察著我們。但是當斯特凡娜說明我是美國訪客，詢問可否參觀一下她的住處時，她沒好氣地回答：“我不想和美國沾上任何關系。”然后砰地關上了窗戶。這是害怕外國人的舊習慣？還是真心的厭惡？

不過另一個年輕女子則很樂于邀請我們參觀她的公寓。踏入公寓的斯特凡娜和我再度有種心情復雜的驚訝感。公寓房間相當寬敞，廚房里具備在羅馬尼亞幾乎從未曾聽聞的東西：一臺洗衣機。斯特凡娜和我困惑地對望一眼。那名年輕女子告訴我們，比起以前和公婆同住的老房子，她更喜歡這里。這里有自來水，冷熱都有，不需要再去水井打水了。這里“現代化”，對年輕人比較好，只是老人家還是比較喜歡老房子。

回到車上后，斯特凡娜承認這些地方跟她原本想象得不一樣。也許即使怪獸也有野心，甚或有類似理想的一面吧。早期時，齊奧塞斯庫曾有志成為一個開明的專制者，一個類似羅馬尼亞君王的人物，領導國家邁向偉大和現代，即便需要以恐怖和鐵腕來成就現代化也在所不惜。事實上，大部分西方領袖都喜歡齊奧塞斯庫所實行的路線，以及對抗蘇聯的外交政策，還曾欣然邀請他到各國首府訪問。

回到布加勒斯特后，我去參觀了著名的國家統一廣場（Piaţa Naţiunile Unite），亦即齊奧塞斯庫獻給自己豐功偉業的最后一個禮物。那是一個瘋狂自大者的紀念碑。從廣場延伸而出的大道寬闊單調，兩側的人行道是一般人行道的三倍寬，兩旁公寓建筑的窗戶也比一般窗戶所需要的尺寸都大。但即便是這里，也流露出對時尚的野心：建筑由干凈的白色石頭所建造，屋頂上有精美的小雕像、老虎窗和其他小巧的結構，似乎同時反映出特蘭西瓦尼亞村落的美感，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一些老舊建筑所看到的奇特的后現代混合風格。這只是門面而已，斯特凡娜告訴我。在外墻的后面，許多公寓沒有暖氣或室內管線設備；而且，就在這些門面建筑的后面，還有許多尚未完工的骨架，或許注定永遠沒有完工的一天。為了這些建筑，齊奧塞斯庫鏟平了布加勒斯特一些最有魅力的小區和許多古老的建筑。

當我們走近這大雜燴的主體建筑時，其規模好似更顯膨脹。[[14]](#_14_9)辦公大樓內，高大壯觀的窗戶后面是一片寬闊到夸張的空間，灰塵密布，空無一物，只有一摞摞隨意散置的箱子。然后便是登峰之作：齊奧塞斯庫的皇宮，就像頭陰沉的龐然怪獸，據稱有四千個房間，坐落于一片雜草蔓生的空地上。這棟建筑的風格很難描繪，事實上，根本沒有風格可言，有的只是失去光輝的矯揉虛飾。這位共產主義君王追求碩大的病態在這里達到了最高峰，而也就是在這里，齊奧塞斯庫見證了自己的衰落。當他最后站在陽臺對民眾講話時，群眾報以噓聲。也許他的墜落在這個場景中便可預見，沒有實質內涵的華麗輝煌到達極限，并像過度膨脹的氣球一樣，終究難逃爆裂的命運。在那之后，不出幾天工夫，齊奧塞斯庫荒謬地企圖逃跑，結果被粗暴地處死，雖然幾乎沒有人會為他的死亡落淚，但是在一個新的、所謂民主的時代，居然上演這種戲碼，也屬怪異之舉。[[15]](#_15_9)

去年還在擔心如何維持他身為羅馬尼亞最佳作家地位的奧古斯丁·布祖拉，此刻已然成為一個叫做文化基金會（Cultural Foundation）的機構的領導人，而我正好要去該基金會處理一些私事。附屬于基金會的一家出版公司打算幫我出版我的第一本書，內容有部分談到我在戰后波蘭成長的故事，他們邀請我來討論有關出版的事宜。

我和馬諾列斯庫先生的助理瑪格達，也是我那本書的譯者，一起前往赴約。路上我們在附近地區繞了一下，結果在這里看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另一面。有個街道兩旁皆有路樹排列，房子皆采奇特混搭風格的單層獨棟的小區，混合了東方式盤柱和屋瓦、西班牙式露臺和現代化的對稱設計。這令我想起加州的融合式的建筑奇幻風格，不過加州的融合是在追求新的境界，所有風格和意義都可隨意組合，而這里的融合則是歷史運作和各種文化長期混合的結果。在這個小區，布加勒斯特從歐洲的邊緣滑落，但不是墜入第三世界，而是掉進古老的東方。我心想我們當中終究不乏有錢人，即使布加勒斯特也不例外。瑪格達說，這些房子以前主要屬于朝中顯貴，如今多半也仍是這些人的。

我們受出版公司會計主管邀請進入的房間，也有一種東方的空間感。房間很大，只有墻邊放了幾張緞面椅子。我的經紀人在信中只大略提到“買斷版權”和“收取版稅”的議題，會計主管和瑪格達則努力商討相關事宜。在整個交談期間，會計主管始終帶著一成不變的笑容，露出金牙，我也反射性地效仿他保持微笑，瑪格達亦然，我們就在這種緊繃的禮貌氣氛中進行了交易。我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在羅馬尼亞討價還價；但即使就當地的貧困標準而言，我認為提供給瑪格達的條件也太低了。我事后建議她可以嘗試談判，爭取比較高的費用，她沉思著回答：“對，好主意。我應該更精明一點。”

不過我看得出來，這個概念對她而言還很新，學起來也困難。

會計主管告訴我，我的書印發多少要由中央辦公室評估羅馬尼亞民眾的需要后決定。看來羅馬尼亞的集權主義尚未滅絕。另一方面，他提到去年一年就有近三百家新的出版公司成立和超過六百種雜志和報紙創辦，這個數據簡直像是一場噩夢。不過，我也自我安慰大部分出版公司甚至還來不及向某個中央辦公室正式登記，或許就如曇花一現般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談完生意，我們鞠躬致意，綻開空洞的笑容，然后被護送到門廳，等待會見布祖拉先生。這不是我所經歷的第一個羅馬尼亞會客室，所以我做好了耐心地漫長等待的準備，我們周圍的人也都麻木而認命地等著，一副早已習以為常的模樣。一個年長的男性得知我是美國來的，便以譴責的神情瞅著我。“你們在雅爾塔（Yalta）背叛了我們！”他指責我，顯然受到的傷害還未愈合。“你們拋棄了我們！”我不是第一次碰上這種突如其來的指責，而且不知道為什么，經常發生在這類會客室中。好像對于這位老先生而言，從當初受到不公正待遇使他的生活陷入癱瘓開始，迄今四十五年，不過是段漫長的等待，直到此刻才終于碰到一個可以代表“美國”的對象，讓他宣泄出來。“喔！我們不是回來了嗎！”我開玩笑道。他則行了個花式鞠躬。

上回我們談話時，布祖拉先生是眾多期待西方王子或權貴資助他完成出版夢想的人士之一。一年以后，他對這類名人已經不再存有幻想。“他們來這里，表達他們的興趣，不過一旦談到比較具體的事項，就什么都沒有了。一點都沒有。”他語氣熱烈，肉肉的臉因生氣而僵硬，“我受夠了這種西方作風的謊言，受夠這種原始的歐美作風了。”

我哈哈大笑。所以從他的立場而言，原來我們才是原始的！不過他的意思是什么？

“呃，你知道的，他們來這里，想的都是愚蠢的事情。就因為我負責這個基金會，就因為我想做點事，他們就認為我一定是新的權貴。他們寧可聽到有人在街上大叫：‘打倒伊利埃斯庫！’因為他們認為那才是反對勢力。”

布祖拉沒有把我包含在他所指責的西方原始主義中，我當然受寵若驚，雖然我并不確定我是不是夠資格。在羅馬尼亞這可惱的混亂中，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什么，或者誰是誰？

“他們只懂得黑和白，”布祖拉繼續道，“這是原始的，是齊奧塞斯庫式的想法。兩者簡直沒有差別。”

“但是你知道，羅馬尼亞的情勢對外國人來講，有時候真的太混亂了，”我試探著說，“充滿了模棱兩可。”

“我認為文明人應該懂得模棱兩可的事情，”他語氣厭惡地堅稱，“其實他們一開始就沒有興趣，只是用這種美麗的包裝表示拒絕而已。”

總之，布祖拉說他是出于一種公共責任來做這項工作的；事實上，他寧愿回到他的寫字桌，回到小說安全的復雜中。我覺得他的話中顯然對自己居于這種帶有政治性的職位保持著一點自衛心理。在其他東歐國家，這是知識分子可以名正言順介入政治的難得的絕好時機，知識分子也會毫不猶豫地抓住這個機會。但是在羅馬尼亞，權力仍妾身未明，無法擁有清白的美名，而政治性知識分子的選擇也依然如故——要么是骯臟的有效行政，要么是純粹的邊緣化。

不過，在我上次來訪至今的這一年間，政治氣候中有些事情已經改變、推動及透明化了，即使還不到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層面，但培養雞或培養蛋的環境已然浮現。一年前，羅馬尼亞匈牙利族民主聯盟（USHR）[[16]](#_16_9)存在的權利還遭到質疑，如今卻已經有了比其他任何已經存在的反對黨都多的擁護者——從而重復了一個在整個東歐地區都很明顯的模式，即實際的傾向和行為掩蓋了口頭表達的民族偏見。另外還有從“社會對話團體”延伸而出的“公民聯盟”（Civic Alliance）這個尚稱不上政黨的組織。在許多人心目中，它提供了真正能夠對抗伊利埃斯庫“救國陣線”的希望。馬諾列斯庫先生湊巧是該聯盟的要角之一，也是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他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因此，某個下午，我便在永遠活力充沛的瑪格達的陪伴下，爬上一座辦公大樓布滿灰塵的寬闊樓梯，來到公民聯盟的門口。一個年輕、消瘦、似乎沒有吃飽的年輕人出來應門，卻立即試圖把我們推出去。在瑪格達抗議后，他犀利而仔細地盤問我們是誰，想要干什么。最后他終于讓我們進門，并小心翼翼地把門鎖上。然而我們一入內，他便站到我們面前，開始講述他最近的政治功勛。他驕傲地告訴我們他是個吊車操作員，羅馬尼亞第一位共產黨領袖彼得魯·格羅查（Petru Groza）的雕像就是他摧毀的，完全是自發行動。當我適當地表示敬佩之意時，他又大膽地告訴我們，豎立于布拉索夫（Braşov）的斯大林雕像也是他推倒的。“我從小就反抗共產主義！”他宣稱，露出幾乎沒有牙齒的笑容。瑪格達和我決定封他為雕像終結者。

另一個男的踏入寬敞、燈光幽暗的房間，代替雕像終結者陪伴我們。他矮矮胖胖，表情溫和，聲音柔和，跟先前那位的犀利健談正好成了對比。不過他一樣不假意寒暄、不浪費時間地直接告訴我們他內心的話。他是黑海邊造船城市康斯坦察（Constanţa）的工會領袖，正在籌備一項總罷工的行動，預定幾天后開始。但是他不知道有誰會參加罷工，又有誰可以依靠。他們中間仍有討厭的昔日中階當權者，會嚇唬工人，也會在其他工會中離間他們。當然，那些工會中也有些是政府的打手，會宣揚根本沒有罷工的必要。不過，他能置身此間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可是一名工人階級代表踏入了政治過程，他也很高興能和公民聯盟聯手，有幸結識“羅馬尼亞最偉大的一批人”，這里也沒人質疑他不是教授。

在他談論之際，其他人紛紛來到房間內，會議隨即開始。公民聯盟或許是羅馬尼亞反對勢力中最重要的種子，不過目前還只是在燈光陰暗、其貌不揚的房間內，赤手空拳摸索的幾名身穿襯衫的成員而已。從討論中我計算出，他們的預算才一百八十五美元左右。他們認為自己需要募款，也需要一份報紙，不過還不知道該如何為這個想法尋得資助。就在這時，我對數目激增、毫無價值的出版品的驚恐促使我提出我的意見，也算是我唯一一次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他們也許不需要一份報紙，我建議道，必要時發布黨訊也一樣。他們對我的意見先是抱持懷疑的態度，但是當馬諾列斯庫先生幾乎同時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后，我的意見獲得了采用。這讓我開心極了。

他們討論到盛大的發布會要邀請哪些人士參加，在發布會上將宣布成立政黨。是不是應該邀請政敵前來參加？這些都是有關民主的尷尬事宜……

同時，他們還要考慮總罷工的事情。馬諾列斯庫先生希望罷工可以舉行，但是如果政府真的垮臺了，他們也不清楚會發生什么事。公民聯盟準備介入嗎？他已經準備好接受總統提名了嗎？碰上關鍵時刻，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組織力量；但是就高層次的政治而言，此舉顯然不夠周全，太過即興。

事后，馬諾列斯庫先生、瑪格達和我又前往卡普沙飯店繼續熱烈的討論。馬諾列斯庫先生告訴我，他最近被指控從一個美國組織接受了不少于一百萬美金，而且中飽私囊。這則構陷的故事被政府控制的電視臺報道成仿佛既成事實。事后一名記者還打電話問他怎么處置那筆錢。“我已經喝下肚了。”他回答，但是對方顯然沒有領會他的幽默。

就像東歐興起的大部分政治新貴一樣，至少以西方的名詞而言，馬諾列斯庫先生是位社會自由主義者和經濟保守主義者。然而在他的觀點中，還有一絲純屬羅馬尼亞人的想法：他也是個保皇者。他說，如果他成為總統，就會試圖迎接羅馬尼亞最后一位皇族，即米哈伊國王（Mihai I）[[17]](#_17_9)回國，建立一個以西班牙為范本的君主立憲政體。

對于這個觀點，我雖驚訝，卻不震驚，因為我已多次聽說羅馬尼亞最近興起的新保皇主義，因此知道這是一項非常嚴肅的政治主張，其所蘊含的絕望心態，也許比滑稽歌劇的表演還要真切。米哈伊國王在父親被迫退位后曾短暫登基，于1944年反法西斯起義中扮演了不無貢獻的角色[[18]](#_18_9)，并在1947年共產主義解放后退位。那時他才二十出頭。往后的幾十年間，他安靜地住在瑞士，成為歷史上一個被遺忘的人物。但如今在歷史無止境的轉折中，他有可能又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羅馬尼亞人都有這種想法，尤其因為他在戰后便沒有受到國內情勢的牽連，因此可以解決羅馬尼亞目前錯綜復雜的難題。“國王不會成為伊利埃斯庫，”瑪格達簡短地解釋道，“他會是一個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人物，跟我們以前所有的都不一樣。國王和伊利埃斯庫？”她哈哈大笑，“不，完全不可比。”

馬諾列斯庫先生認同國王會成為一個一統局面的人物，可以超越羅馬尼亞政治上的仇恨心理，超越一般人的懷疑，像西班牙國王在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_19_9)下臺后所扮演的角色一樣，成為民主的仲裁人，每個人都可以對他表示尊敬之意，又無需放棄對黨的忠誠。再者，馬諾列斯庫先生說，國王是個非常好、讓人敬重的紳士。然后他忍不住跟我們提到有次在美國碰到國王和他太太的有趣軼事，我們也再度開起玩笑來。看來馬諾列斯庫先生雖有很多事需要煩惱，卻始終無礙于他的幽默感。我告訴他，他也許可以成為第一個把嘲諷風格帶到官場的總統。“那是我的夢想！”他大聲說，雖然我懷疑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對此做好了準備。

洲際酒店（The Intercontinental）是布加勒斯特最時髦的大飯店，也是深受外國商人和記者青睞的住處。這其實是個可憎之處，大廳毫無優雅可言，聚集著神情可疑的人士，酒廊更有如阿肯色州（Arkansas）鄉間的公交總站。不過洲際酒店好歹有兩間有桌布和冷氣的餐廳，所以我邀請揚安·馬諾列斯庫（Ion Manolescu）到其中一家餐廳碰面，他是尼古拉·馬諾列斯庫的遠房親戚，也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作家，不料這邀約提議卻換來一陣緊張的沉默。

怎么了？我問。是這樣的，揚安緊張地回答，他們并不總是歡迎羅馬尼亞人進去，尤其是沒有外商同行的羅馬尼亞年輕人。

呃，那樣不對，我們不應該放任他們這樣做，我義憤填膺地說，雖然對他的說法也還半信半疑。我實在不該如此。當心高氣傲，不愿讓我插手的揚安走向侍者時，只見侍者馬上粗魯地皺起眉頭，告訴他沒有位子。這顯然是個謊言，因為餐廳內幾乎沒有什么人。這時，我出面介入，據理力爭，結果他們告訴我無論如何會為觀光客找到位置，他們還有另一間餐廳，價格是這里的五倍。我們退了出來，揚安滿臉受了羞辱的表情。

在為他的國家表達歉意后，揚安開始向我吐露他的文學野心。二十三歲的他有雙黑色、專注的眼睛，說起話來滔滔不絕，頗有智慧。我常聽人說，年輕這一代沒有受到老一輩極度妥協的污染或扭曲，是羅馬尼亞真正的希望，或許也是唯一的希望。確實，揚安具有熱切、完全覺醒的智慧，只有將自己的工作視為使命，而不只是一個職業或事業的年輕人才可能擁有這種特質。他屬于一個非常年輕的作家團體，在文學還被視為禁區的年代，便沉迷于他們的文學的理想。在那段黑暗時期，他們閱讀每一部可以到手的現代文學作品，比如某個古怪外國人留下的品欽（Pynchon）[[20]](#_20_9)、巴思（Barth）[[21]](#_21_9)或巴塞爾姆（Barthelme）[[22]](#_22_9)的小說，而且彼此傳閱，直到紙張褶皺不堪，此外他們還看手抄的詩集。

這個團體最熱切的希望，是能和最近的羅馬尼亞傳統做干凈的切割。在他們眼里，所有老一輩的作家即使沒有妥協，也不足以作為楷模。“就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總是在遷就檢查制度寫作，”揚安說，“總有一種面紗，一層帷幕，掩蓋在他們所寫的所有文句之上。”有太多羅馬尼亞現實沒有被呈現在文字中，其情況比在話語中還要嚴重。比如，揚安說，在羅馬尼亞文學中，沒有一個遭到秘密警察痛揍的角色。所以他們團體的一個信條和承諾就是：“拒絕暗示手法。拒絕偽裝掩飾。”他們想寫的書中會存在被秘密警察痛揍的男子。事實上，揚安即將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里就有一個這樣的角色。他說自己和同伴對這本書的價值都很有信心，仿佛這本小說是所有人的財產；他也相信他的同伴告訴他的是真話。他們早前還互相許諾過另一件事：不管真實多么傷人，凡事絕對真實。“我們整個社會都習慣了謊言，”他說，“所以我們希望擁有一個可以絕對真實和真誠的地方。”

他們判定，在他們所處的世界，文學上最能發揮力量的便是政治小說。不過并非傳統形式的政治小說，那個就免了。他和他朋友是徹底的后現代主義者。“現在不能寫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23]](#_23_9)那樣的作品了，”揚安說，“奧威爾（Orwell）還差不多，雖然他們希望能比他再多‘小說’一點。”政治意涵，不錯，但也要有想象力和風格。還有思想，絕對要有思想。他們的作風是親美的，揚安說，部分原因是為了擺脫上一輩的親法作風，他們想用“正面迎擊、直接和犀利的美國手法”寫作。不過他們也盡己所能地閱讀法國的批評理論，因為他們相信除非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否則無法成為一個好的、偉大的作家。

他強烈的嚴肅態度，精力充沛的企圖心和決心，以及令人驚異的知識，在在令我感佩。除了致力于小說創作，揚安也會寫些政治評論，但他隨即表明這不是因為他喜歡，而是因為：“在這種時刻，我們必須這么做。”我懷疑在西方是否會有任何二十三歲的年輕人說得出這樣的話來。不過話說回來，揚安和他同輩的西方人根本生活在不同的時代。盡管揚安期望成為后現代主義的時髦男子，但是種種糾纏、紛擾和嚴酷事實的壓力卻不是他所能擺脫的。

揚安在談到他需要閱讀、需要了解和需要去做的事時所表現出的那種殷切和渴望，令我想到另一位羅馬尼亞的知識分子米爾恰·伊利亞德年輕的時候，至少是他還沒有發展出搖擺不定的政治信念，使他太過接近法西斯右派的時候。在他布加勒斯特的小房子里，伊利亞德同樣也以或許是許多“鄉下的”知識分子都有的一種永不滿足的饑渴態度多方涉獵。對他們而言，廣大的世界只是內心渴望的遙遠目標，而沒有對自己“主要傳統”的焦慮感或傲慢心態，將自己隔絕在其他文化的多樣性之外。過去，這種邊緣性經常是一種力量的來源；未來，對揚安和他的朋友而言，這也會成為他們的助力。

帕維爾看起來比七十歲年輕很多，使我很難把他本人和他的年紀聯想在一起。他常穿牛仔褲，敞領襯衫，動作也和年輕人一樣靈活敏捷，臉上老是帶著狐疑困惑的表情，似乎本應一閃而逝的神情卻永遠停在了臉上。他說一口準確、流利的英語，只是偶爾會被冠詞的神秘所難倒；他也偏愛犀利的箴言，經常神來一句，卻用得恰到好處。在他身上，我經常感受到的羅馬尼亞人的混沌已然被淬煉成了對似非而是的謬論、矛盾、繁復等的洞察能力，清晰易懂且準確細致。

他在談話間偶爾摻入的奇特字句，讓我開始對他的個人經歷有了線索。他是我十分熟悉的一種人，卻也是我幾乎毫無所悉的一種人：他是“他們”當中的一分子，而且曾經是完全忠貞的信徒。他有點讓我想起我的父親，也許因為他們都有相似的背景。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命運選擇了我們，而非我們選擇了命運，這是我在這趟旅行中心中經常會升起的感慨。人的命運，其實很輕易便可能完全逆轉。就所有悲慘的層面而言，帕維爾的命運幾乎可謂我的家庭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帕維爾無法輕易談論他的過去，而我感覺那并非因為其中蘊藏了太多秘密，而是因為牽涉到某種深沉復雜的情感。待他終于決定跟我談時，我發覺他的過去其實就是最典型的那種：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東歐共產黨員典型的一生，不同的或許只在結局而已。東歐孕育了這種超越個人的生命模式。

這一切的源起，照帕維爾的說法，是因為當年“存在一股邪惡的危險力量”。尤其在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在兩次大戰間已經變成一種顯而易見的、廣受歡迎的勢力。對帕維爾這種成長在赤貧、半文盲家庭的年輕猶太人來說，想要對付這種勢力，選擇其實并不多。出于因緣巧合和個人傾向，帕維爾受到共產黨的吸引，十幾歲時，便已加入了一個高度秘密的小型行動；但是他沒有馬上成為運動所想要的服從的戰士。1936年，當莫斯科進行公開審判時，他告訴他的組織聯絡人說他并不認同這種做法。這一年輕時的表態馬上便被記錄下來，終其一生，帕維爾的政黨檔案都保留著這“黑暗的一頁”。

不過逐漸地，他的信仰和服從能力都加強了。雖然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他屬于飽學之士，但他卻從未完成高中學業，因為母親是家里的經濟來源，而他上學所造成的經濟負擔已經超出了母親的負荷。接著，戰爭和牢獄又相繼介入。不過他貪婪地繼續閱讀，培養出了對文學的熱情。后來在監獄中，他又開始自修外語。他最主要的教育便來自兩個地方：政黨和監獄。

1940年他第一次遭到逮捕，在獄中待了半年。第二次，他被法西斯警察逮捕，在那個“艱困時刻”，他真正體會到羅馬尼亞人行為的奇特與矛盾。指控他的是法西斯主義者，然而，他認識的某個鄰居，同時也是半合法的狠毒法西斯組織鐵衛團（Iron Guard）[[24]](#_24_9)成員，不但去探監，還傳授帕維爾接受審訊時必要的應對技巧。那一次，帕維爾拘留了三天就被送回家。幾天后，他得知那位幫他忙的鄰居參加了一次惡名昭彰的行動，屠殺了五十名前朝官員，包括羅馬尼亞的政治精英。

“我真的認為羅馬尼亞人有種凡事瞬息萬變的感受，”帕維爾反思那些事件說，“羅馬尼亞的法西斯主義到頭來沒有那么嚴重，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到頭來也沒有那么嚴重。”

也許這種瞬息萬變的感覺，還有一切現象和信仰的虛幻感，可以解釋我經常在和羅馬尼亞人的對話里感受到的那種飄忽不定的感覺。對于那么短暫的事物，何必采取什么堅定的立場呢，反正所有事物都會消失在永恒之流中。但這種宿命論本身也許就是從一種無法抗拒的非理性環境，從一連串反復無常的權力統治中孳生出來的，這種權力并非出于民眾的選擇或偏好，而是直接強加在民眾身上的。

帕維爾第三次遭到逮捕是在1941年5月，就在羅馬尼亞正式參戰之前，這次他被送到勞改營待了三年。那段經歷是其性格形成的重要里程碑，這種啟蒙儀式是許多未來的權力核心人物所共同擁有的。帕維爾談起這段往事，稱之為他人生中最美好也最悲慘的歲月。最好的是同伴，在專門為共產主義分子而設的監獄和勞改營里，帕維爾得以結識一群未來的國家新領導人。在這段共患難期間，他們達到了帕維爾所形容的一種結合了團結一致和“自然等級制度”的形態，一種理想社會的雛形。“這是社會化的一個很特別的經驗，”他說，“一個小社群，面對共同的危險，具有非常精準的角色分工。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段心悅誠服地臣屬于他人的時光。有些年長的領導人已經在監獄里待了十年了，他們當中有些很有人格魅力。我相信他們的操守，相信他們與生俱來的領導能力。”

然后，他補充道：“不過喜歡等級制度這一點，正是作為狂熱的信條主義者、作為斯大林主義者的必要條件。”當年他發現這個事實時，一定很痛苦。

當時，帕維爾并不了解這種理想社會在道德上所蘊藏的危機。在強烈的團體精神驅使下，帕維爾一行人一到監獄，便決定舉行蘇聯革命周年紀念，包括閱讀和詮釋果戈理（Gogol）的作品《欽差大人》（Inspector General）。

帕維爾的獄友中，其中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他也作為活躍的年輕共產黨員而被捕入獄。就帕維爾而言，他們兩人幾乎一見面就不投緣。他們在小小的牢房中共處了兩個月，牢房里還有其他囚犯，但是相對于其他人的友愛，齊奧塞斯庫始終郁郁寡歡。“我們住在一個相當親密的環境中，甚至不準去庭院散步。我們倆都是年輕的共產黨獄友，所以彼此間建立起同志情誼，進一步了解對方，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但，不是的。他跟別人建立關系的基本方式便是鄙視對方。在心理上，他讓我想起一個古老的亞洲制度：太監。太監的閹割代表提供具體證據，證明皇帝是至上的。齊奧塞斯庫的輕蔑也是依據同樣的原理，借由否認別人的美德從而表示自己的至上。我在他身上可以嗅到仇恨的本能。”

帕維爾記得一件事，讓他永遠對齊奧塞斯庫懷有敵意。有段時間，獄友舉辦了一次下棋比賽，用面包做成的棋子對弈。結果帕維爾贏了。“其實我的棋藝并沒有那么厲害，”他說，“但是在那間可憐兮兮的牢房里，我是最厲害的。齊奧塞斯庫的棋藝根本還屬于初階。但是我贏了以后，他卻向我挑戰。我說我們兩個比，他和我都不會開心，但他還是堅持要比。我們就對弈了一盤，結果當然就如大家所預料的。想不到那件事還有后續，是大家沒有預料到的：從此，他再也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

在齊奧塞斯庫出任總書記時，帕維爾便料到他會變得比原先更可怕。“他不是冷漠，而是燃燒著仇恨。我預期他最終會發展成恣意處死別人。也許外在環境不利，使他不能達成所有的心愿。”認為齊奧塞斯庫相對內斂，顯然源于一種東歐式的對極端的看法。而和他正好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埃列娜·齊奧塞斯庫身上。帕維爾剛認識埃列娜時，她還是個貧窮、安靜的年輕女子，沒有任何野心，不料后來卻成為一個極盡浮夸的怪獸。除了她本人和她丈夫之外，她禁止任何人公開慶祝生日；她也禁止科學院錄用新人，因為她本人自認便是所有學識的化身。“有段時期，”帕維爾咯咯笑著說，“我們的院士非常短缺。”

不過這種敵視的情況在監獄中很罕見。真正的困難是體力上的，尤其是饑餓。“我們當時很年輕，因此需要吃是很自然的，”帕維爾說，仿佛連這點脆弱之處也需要證明是合理的，“從這點來看，監獄生活真的很可怕。要解決饑餓，就要工作，那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我負責砍柴，拼命工作。在冬天的時候，我上半身是熱的，兩腳卻凍僵了。饑餓真是一種折磨，因為它把你困在內心的監獄里。有段時間，我連做噩夢也跟食物有關。不過也是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之后，我就開始適應了，從那以后，我總算取得優勢，失去了胃口。就連現在，如果有好的同伴，我會享受食物，但是除此之外，我并不覺得有需要或有必要吃東西。”我面帶詢問地看著他，他點點頭，就是這個意思。

帕維爾出獄時，他“不但成為堅定的共產黨員，而且準備好要采取行動了”。在羅馬尼亞共產勢力強大后，他的獄友事實上成了中央委員會。他那時二十幾歲。有一陣子，他跟其他年輕干部一起工作，后來被安置在外交部，“負責希臘內戰和南斯拉夫叛逃事宜”，亦即負責組織反鐵托勢力。后面這項工作是為公開審判和擴大整肅行動做的準備。帕維爾的工作使他必須被牽連到這類可怕的事情中。其實他這兩種工作的性質，即便用溫和的說法，也都算是有冒險性的。在政治游戲中，你永遠不知道忠貞何時會被重新解讀為背叛。

從他位于內部的有利位置，帕維爾可以親眼目睹這樣的政治轉折，以及他的朋友們逐漸擅長的致命陰謀。他知道戰后第一任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如何身在獄中，卻仍有辦法進行謀殺行動。他見到對勢力龐大的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25]](#_25_9)和其他“右傾分子”的公開審判是如何醞釀的。但話說回來，安娜·波克爾本人的無情也不遑多讓，曾讓自己的丈夫在1930年代遭到槍決。帕維爾也目睹過那些曾經參加了西班牙戰爭的人，是如何成為特定的致命報復的靶子，只因一項嫁禍鐵托的陰謀，需要他們充作例證，而鐵托曾參與組織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26]](#_26_7)。

在這期間，最令帕維爾感到不安的，是目睹自己曾經極其敬佩的人物，變成危險的勢利小人。“我覺得很失望，”他有所保留地敘述，“親眼目睹并親身經歷真正的英雄主義轉變為懦弱膽怯。斯大林主義最可怕的一項成就，就是這種物質、道德和政治腐化的結合。”也許對他最大的打擊來自他的良師益友，一個他在獄中特別尊敬的人。那人調任從事一項最初很神秘的新職務：成立秘密警察。

那位良師益友原本是怎么樣的人？我很好奇。我的問題似乎仍然令他痛苦。“他是所有人當中最有人性的，”他終于回答，“即使被關起來，他仍然保留著他的人性。”那位朋友對帕維爾最后的幫助，是沒有帶著他一起赴任。如果他進入秘密警察體系，帕維爾認為，那么他也會變成“一頭怪獸”。我想表示異議，但是他制止了我，語氣堅定地說自己一定會的。這正是某些體系的缺陷，它們能夠讓人有這種轉變；而黨本身也變成——事實上是早已經成為一部地獄制造機，能夠把人變成惡魔。“你不能想象的是，”帕維爾說，仿佛試圖讓我理解這一切的恐怖，“在這個過程中，那種被絕望擊潰的內在的錯亂。”

但盡管如此，和黨分離的那種痛苦，對帕維爾而言仍有如一種背叛，或有如失去一段深厚的感情。“痛苦的過程，”他說，“從生命中一段快樂的時期，一種深陷在狂熱中的生命，轉變為批判的立場，明白理想和現實的差異。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一再遲疑。很多時候，你會想要膽怯地認同他們，繼續保持沉默，聽憑英雄主義蒙羞，或頂著英雄主義的光芒說些模棱兩可的話。有時候我非常不快樂，不知道作為有紀律的革命戰士，我的責任是什么；或者作為一個人，我的責任是什么。”

我問他，他的猶太身份在脫黨一事上是否起了作用，但帕維爾認為他自己首先是羅馬尼亞人。帕維爾的年輕時代，比起我們來，或許還比較正常，即使最卑微的市民都抱持著普遍主義和理性啟蒙的夢想。他的父母是非信教者。“我是一個世界公民，”帕維爾半開玩笑地使用一個早期的字眼，然后又自我更正，“不，其實我是羅馬尼亞人，雖然有時候這并不是件好事。”他對自己的保守表述報以微笑，“就理性而言，身為猶太人比羅馬尼亞人有趣多了，不過這也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有些人想強迫我承認我是外國人。這是一種反猶太的脅迫形式，逼迫一個或許不是猶太人的人接受猶太人的身份。我從來不會屈服于這種威脅。”

他的個性讓他抵抗任何會驅使他背離自己真正信仰的威脅。他的懷疑——他稱之為初嘗自由的滋味——逐漸加深，于是越來越難以掩飾他的不滿，越來越難以接受交給他的命令。“在狂熱的時期，我很高興能執行命令，”他說，“后來，接到命令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我已經逐漸變成一個個體，這一點，從黨的觀點來看……”他停頓下來，搜索適當的字眼，“這么說好了，‘顯得可疑’。”那時，他已決定離開他的職位，他說，機構希望他消失，而他也巴不得永遠不要回來，于是他們同意分道揚鑣。

1956年，他以三十五歲的年紀進入科學院，主修歷史和社會學。其中部分原因是作為“自學成才者”的他，想要彌補缺乏正式教育的缺憾。在情感上，這生命的新一頁，開始于他近乎絕望，也就是失去信仰的絕望時期，伴隨著一種“強烈的罪孽感，某種類似宗教性的‘我有罪’的感覺”。

走出絕望的道路，極其矛盾地，竟需要回到源頭。就像許多激進分子一樣，帕維爾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便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現在他開始研究馬克思、研究列寧。“批判列寧，就像是一種對至親的異端行為。在感情上，我沒有辦法這樣切割。我需要從理論著手，發展出一套批判的觀點，方是對抗我的感情的方法。”

帕維爾從事政治心理分析的一個方式，是埋首寫作，向自己解釋他和斯大林主義的結緣。他近乎著迷地不斷書寫。不過在寫到兩千多頁時，他就決定把手稿燒掉——留著這些手稿太危險了。想不到在一個處于全面監視下的社會，就連焚毀自己的手稿也會讓人起疑。那些紙張太厚重，燃燒時煙很大，有些憂心的鄰居前來拜托帕維爾不要再生火，因為他們擔心秘密警察，那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會認出燃燒紙張的味道而前來調查。

完成學習后，帕維爾開始在羅馬尼亞電臺工作。1967年，他意外獲得許可成立一家社會學研究機構。從那時起，他的身份即使不算異議分子——因為在羅馬尼亞并沒有異議分子生存的環境——至少也是個評論家。那個機構展開民意調查和測驗。有好些年，帕維爾說，他“很高興能出版當權者不愿聽聞的結果”。他所寫的演講稿和文章，就當時的標準而言，足以被判定為顛覆分子。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逃過懲處，是因為那些負責審稿的中層當權者擔心有目前身處高層的他以前的朋友在包庇他，于是那個體系所制造出來的妄想心理，反過來卻成了對抗自身的機制。

他的罪惡感起先是因為脫黨，現在卻轉變成因為曾經身處黨內。1980年，他回到一個他認為可以“結清舊賬”的計劃，就是分析斯大林主義及其遭到扭曲和失敗的原因。

書寫這種手稿當然極端危險，帕維爾和斯特凡娜他們也確實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1982年6月一個炎熱的日子，帕維爾來到斯特凡娜的公寓，結果發現公寓被翻得亂七八糟，斯特凡娜也不見蹤影。神奇的是，他的手稿仍安放在桌子下的一個架子上，其實他們是按照愛倫·坡（Allan Poe）[[27]](#_27_7)失竊的信的原則存放手稿的，就是放在一個一眼就可以看見的地方。這個計謀奏效了。

帕維爾隨即拿著手稿跑到一個他認為很可靠的老友那里。大約三十年前，這個友人遇到了麻煩，他是因為參加西班牙內戰而失寵的人之一。從那以后，其他黨內友人都避之猶恐不及，只有帕維爾仍繼續跟他交往。帕維爾說，這并非出于勇氣，而是因為他做不出那種事。當時友人對他由衷地表示感激，反而讓他嚇了一跳，所以他完全沒有料到三十年后，當自己懇求朋友幫他暫時保管手稿時，友人竟會斷然拒絕。不過事實就是如此。帕維爾從未原諒他那位朋友，他們也沒有再見過面。

在那同時，斯特凡娜受到秘密警察的審訊。她采取裝傻對策：對審訊者始終以禮相待，客氣對談，假裝什么都不知道。結果表明，在面臨危機的時候，她無所畏懼，使得秘密警察只好放了她，什么情報都沒有打探出來。帕維爾的女兒也遭到審訊，同樣毫無所獲。

那份手稿最后在美國出版了，帕維爾對此心滿意足。那是一本內容非常緊湊，以近乎警句的風格對權力和財產集中化進行的研究。根據帕維爾的觀點，這正是導致斯大林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經濟衰退和訴諸壓制手段的背后機制。

我問他，除了斯特凡娜，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有沒有其他知識分子共同參與。沒有，他回答，他“不希望把這件事弄得像在進行什么陰謀似的”。但毫無疑問，這種隔絕也嵌在羅馬尼亞的生活邏輯中，嵌在鋪天蓋地的恐懼與相互猜疑的氣氛中。

他現在還保留著這種隔絕感。帕維爾在時局改變后，其實還像之前一樣，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深陷共產主義，仍認為自己是“左翼人士”的人；一個背負雙重負擔，在重新組合的羅馬尼亞拼圖中找不到任何安身立命之處的人。“對老一輩的人而言，”他說，“我是個變節者；對新的一代而言，我不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因為我曾是斯大林主義者。所以我很容易受到指責。”還有，他有種斯多葛哲學默默承受一切的心態，也許來自他深切的罪惡感。他補充一句：“我幫助左翼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直接參與。我曾經試圖參與形成的，就是‘原本那個’左派。”

他是否終于在情感上和黨完全切割開了？“這種事很慢，非常慢，”帕維爾感傷地說，“不過，呃，我猜想，愈早離開那套信條，腳步就愈不會陷得那么深。”

帕維爾的“腳步”似乎陷得非常深，甚至導致了重組他的內心世界，以及他的信念。不過也許在同那套信條決裂后，他依然能夠有所歸屬。“悲哀的是，”他說，“性格上我并不是一個狂熱分子。我之所以變得狂熱，是因為我年輕，以及當時的環境。然后我兩樣動機都失去了：環境和年輕。”

在這方面，他并不特別。他特別的地方在于承認自己應該負責，承認他的過失。成為那段恐怖歷史的共犯這件事始終如影隨形地困擾著他。在最近一次會議中，帕維爾遇到一位知名的匈牙利前共產黨員，告訴他說她對自己的過去“絲毫沒有應該認罪的感覺”，因為她是出于真心信仰，因此所作所為是出于善意，而且一旦不信了，她的行動也隨之改變。帕維爾覺得這種自我原諒的行為，是“一種舒適形態的無知。還有一種無知，是擁有鋼鐵意志的男女，直到終了都堅信不疑，而且相信真正的高貴就在于這種堅定的心志”。

“我為什么要提這件事，”他繼續說下去，“是想告訴你，我并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的，不是因為我一開始就已經加入，而是因為后來我還繼續參與其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他繼續敘述，表情間仍流露出飽受折磨的痕跡，“要承認你曾經奉獻的一切，你生命的本質和核心是一項錯誤，有多么困難。”

當然，我可以想象犯錯后的沮喪，但這遠是一種錐心之痛，任何人都沒有辦法用“沒有關系，不要緊”來安慰他，畢竟他所牽涉的情況太恐怖，他所參與的共謀也太沉重。然而，在聽他述說的時候，我覺得他也已經完成了一項值得稱頌的大事。通過與自己心中的天使和魔鬼搏斗，他把自己生命中的可怕事跡轉化為覺悟和良知，亦即一種將來會有助于我們思考的經驗，進而轉化為一段有用的歷史。

或許出于某種責任感，我決定去拜訪一所孤兒院。孤兒院跟羅馬尼亞有很多不愉快的關聯，跟其近代的恐怖也有所牽連。我已見識過一些孤兒院令人沮喪的照片，其中收容著因為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嬰兒，以及關在獸籠似的柵欄內往外看的骯臟受虐兒童。我并沒有興趣親眼目睹那些景象，但刻意回避似乎也不應該。瑪格達提議陪我去看看，于是我們就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車子出發前往土伊康（Tuican），我們獲準參訪當地一家孤兒院。當車行接近目的地時，方向變得很難判斷，地貌也沒有標示作用。到處都是泥巴地，幾乎看不出馬路在哪里。經過一個鉆油廠，我們被迫在機器間穿梭；油井旁有個可憐的小游泳池，上面漂浮著油光，有孩子在里面潑水嬉戲；接下來又是綿延的泥濘山坡地，格拉迪奇先生的老爺車差點陷在泥淖中，幸而我們想辦法把車子推了出來。

最后我們終于找到了那家位于主村外一個山丘上的孤兒院，大門處有群孩子，大小都有，兩手緊抓著金屬欄桿。第一眼見到他們，我承認我很害怕。那些孩子中，有的因為精神疾病和發展遲緩而面孔扭曲；有些動作不協調；有個男孩剃光的頭上布滿白斑；還有些孩子看來神情正常，我不怕他們，卻反過來為他們感到害怕。

一名身穿護士服的女子前來陪同我們，擋開那些一進門便緊緊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孩子。他們立即馴服地退開，反應之利落令我頓感一陣寒意。主樓內只見一個沒有人照顧的臟兮兮的小孩正在攀爬一截陰暗的樓梯。我們被帶到一間面積很小、氣味怪異的廚房，另一名同樣穿著護士服的舍監正在收聽收音機里播放的古典音樂。她同意跟我們談談，但是她不能帶我們去參觀其他地方。根據規定，星期日訪客不能隨意走動，或許這就是我們受邀當天來訪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覺得我看得已經夠多了。當我在這間怪異的“辦公室”落座時，不舒服的感覺立刻上身。那位身形矮胖、面無表情的女舍監在這里已經超過三十年了，她告訴我們這個孤兒院曾經歷的幾個不同階段。孤兒院收容情況最嚴重的個案，許多孩子是被父母拋棄的，還有許多是有殘疾的。在1960年代早期，羅馬尼亞情況相對比較好的時候，這里也比較舒適，有足夠的員工，孩子們也有玩具和手工藝品。然后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齊奧塞斯庫時代的災難開始了，先是資金被撤回，接著是員工和水電。一個沒有經過訓練的員工必須照顧六十名兒童，經常沒有水可以給他們洗澡或洗衣服。許多孩童都難免騷動或焦慮，而應付他們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昏睡。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情況已經好轉許多，主要是因為有個瑞士團隊對孤兒院感興趣，因此帶來了金錢、藥物和專業知識。瑞士人員發現，許多原本以為沒有希望的遲緩兒其實只是運動神經的問題，借由適當的訓練，可以輕易復原。如今有些孩子甚至已經可以上學了。

那位舍監以平靜單調的語氣跟我講述這些，臉上帶著空洞的笑容，仿佛在報告公司的季度盈余情況。她還談到一個女孩，說她離開孤兒院后，不知感恩地告訴別人有關孤兒院的可怕故事，包括挨打和被拴上鐵鏈等等。在我們談話期間，孩子們幾次好奇地探頭探腦，結果舍監只瞥上一眼，他們便趕緊退開了。有一陣子房間內充滿糞便的臭味，舍監冷靜的姿態卻絲毫不為所擾。我心想，這冷漠的女人收聽貝多芬音樂的房間，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瑪格達和我帶了幾箱餅干給孩子們，在我們離開前，舍監告訴我們：“你們放心，我們一定會分下去的。”其實我根本沒有想過他們有可能會不分給孩子們，這句話反而透露出貪贓的痕跡。在走出孤兒院時，孩子們再度圍住我們。“我媽媽什么時候會來？你是誰的媽媽？”他們不停地追問。一個孩子勾著我的手臂，陪我走到門口，眼中流露出我所見過的最單純的悲哀和乞求。

返回布加勒斯特的途中，瑪格達反常地感到頭痛。“你知道吧，秘密警察從這種地方帶走了很多人，”她告訴我，“聽說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人是最馴服也最殘忍的。你也看到了，只要有人給他們食物，給他們關心，即使是殘暴的關心，他們就會像狗一樣忠心耿耿。”對，我看得出來。但此刻我所感受的，不是完成一項使命的成就感，反倒是目睹了這一切后所浮生的奇特罪惡感，為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目睹一場悲劇而深感罪惡。

布克洛尤（Bucâloiu）一家人，包括莉娜（Lena）、格奧爾基（Gheorghe）和他們十六歲的兒子約努茨（Ionuţ）都是熱切的愛國者。出于對祖國的驕傲、寬大慷慨的心胸，以及，有個美國朋友或許也不錯的心態，他們提議帶我參觀羅馬尼亞的各個景點。莉娜是個心理學家，格奧爾基在一家工廠擔任管理工作，約努茨則是個有思想的少年，具有讓人驚艷的英語詞匯量，對文學作品廣為涉獵，對任何有關美國的事皆抱持著不可遏制的好奇心。

他們的達契亞（Dacia）仿佛是一個手工并不靈巧的青少年用硬紙板組合而成的，坐著那輛車，我們參觀了布加勒斯特近郊的村落和古老遺跡。現在，莉娜、約努茨和我又搭飛機前往位于羅馬尼亞三大主要區域之一摩爾達維亞（Moldavia）東北角的城市布科維納，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參觀當地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彩繪修道院。

我們搭乘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抵達蘇恰瓦（Suceava）機場，迎面而來的是令人困惑的羅馬尼亞亂象——奇特的氣味，大廳正中央居然有一些離奇的水坑。機場外，我們見到了莉娜的朋友，也是此行寄宿家庭的主人科卡（Coca）和米哈伊（Mihai）。然后，又是一輛質量低劣的達契亞，載著我們行駛在鄉間的道路上。比起南部，這里的景色更蒼翠，草坪更綠，樹葉更繁茂，光影的嬉戲更生動，微風也更愉悅。在雷佐里（Rezzori）[[28]](#_28_7)所寫的《一名反猶太分子的自傳》（Memoirs of an Anti-Semite）中，布科維納是個古怪的地方：一個同時存在腐化的貴族、無知的農民、博學的猶太人和矛盾的反猶太分子的富饒之地，不同群體共同生活在意識形態的迥異和日常生活的親密之中。即使現在，我們還是窺見得到現代和工業革命前不同時代的混合。道路上，汽車和馬車爭道，農民和吉卜賽人同行。馬的鬃毛上垂掛著紅色絨球和流蘇，在鮮艷的色彩中上下晃動。這里的房子不像我在附近的馬拉穆列什所見的裝潢精致，但也有雕工精美的木質大門，外觀體面繁榮。

“齊奧塞斯庫的手沒有伸到這么遠的地方嗎？”我對這一切深表贊嘆，“還是這個地區的人抵抗不從？”約努茨翻譯科卡的回答：“我們不聽他的，”她哈哈大笑，“我們不去聽，也聽不到。”

這便是置身天高皇帝遠之處的好處。當皇帝品行邪惡時，他的指令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傳到邊陲，且沿途已經遺失泰半。我開始思考，我們這個世界重要的區別不是北方和南方，或東方和西方，而是首府和地方。在動亂時期，地方各自成為運作的樞紐。“耕耘你自己的花園。”我半自言自語地評論道。“對對，伏爾泰總是給出金玉良言。”約努茨馬上領會了我的意思。

我們的目的地是靠近蘇聯邊境的伐木小鎮肯普隆格（Cîmpulung），鎮的另一邊以前是摩爾達維亞的一部分，在上一次瓜分領土時被切割了出去，迄今分離主義仍鬧得沸沸揚揚。

科卡和米哈伊住在肯普隆格外圍和喀爾巴阡山脈接壤之處。他們務農，但也在城市工作。科卡是護士，米哈伊是汽車技工。就在他們平凡低矮的農舍旁，豎起了一棟正在興建的新式鋼筋水泥房屋，這種樣式我在東歐地區隨處可見。因為在美麗的古老房屋中，突兀地夾雜著其貌不揚的新式建筑，所以羅馬尼亞的村莊變得像個折疊的屏風。科卡和米哈伊對他們的新家極為驕傲，他們打點這個家已長達十二年了，迫不及待地想搬進去。房子后面有個一畝左右被照看得很好的菜園，一片玉米田和一個可愛的果園。

我們享用的超級美味的大餐中，部分食材就是這里產的。大伙兒在一個怡人的花園涼亭中享用晚餐。首先端上來的是一大杯苦咖啡，以及和咖啡交替啜飲的當地烈酒帕林卡（Pálinka）[[29]](#_29_7)。“喝啊！”科卡一直慫恿我，因為我是幾人中喝得最慢的。“我要你透過帕林卡的眼光來觀察布科維納。”這種可以引發心臟病的飲料組合之后，是一道搭配著蔬菜和酸乳的精致的小牛肉濃湯，以及裝飾了蒜蓉的牛排。

“啊！甜蜜的生活。”我用意大利語贊嘆著。心想如果羅馬尼亞再接近意大利一些，就能理解這句話了。

“《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30]](#_30_7)，”米哈伊接口道，“費里尼。”

“你看過那部電影？”我頗為驚訝。

“兩次，”米哈伊回答，“很好的電影。”

看來我對此間鄉村褊狹落后的先入之見有點大謬不然，不過這些甜蜜，這豐富的滋味，為什么沒有傳到布加勒斯特去？

“有什么意義？”米哈伊聳聳肩，“他們不給我們足夠的錢，只想直接拿走。如果有機會，他們還是會把什么都拿走。”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農民的故事。那個農民只因為殺掉了自己的牛，而沒有交給集體農場而被帶上了法庭。就連這種事也有其歷史淵源。我曾看過相關資料，知道羅馬尼亞農民在奧匈帝國統治時期有時會把自己飼養的牲畜殺掉，以逃避外國領主強制征收的重稅。

光聽米哈伊和科卡的述說，會覺得政局的轉變似乎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多少波動。“在肯普隆格這里，管事的還是同樣那批人，”米哈伊說，“但是他們不會打擾我們，我們也不會打擾他們，我們只想過自己的生活。”

他們憎恨的對象，其實是吉卜賽人。科卡說，他們才是真正從新情勢中受惠的一群人。他們有做生意的頭腦，又習慣到處流動，現在可以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販賣他們的商品了。科卡在說這些話時，不免流露出輕蔑和憤怒。我也聽別人這么評論過。吉卜賽人是公認的可以持偏見立場抨擊的對象，就連約努茨這個對自己的意見一向深思熟慮的年輕人，也不免抱持這種態度，盡管他說他對任何“有成就”的吉卜賽人都很尊敬。約努茨認為吉卜賽人主要是依據“叢林法則”生存，這種人必須非常強壯，是“一個真正的人”。隨后他又引述了一些吉卜林（Kipling）[[31]](#_31_7)的相關詩句。

盡管其他人似乎都毫不受我們方才享用的美酒佳肴的影響，我卻突然發現自己的動作變得非常遲緩，于是決定小睡一下。科卡帶我到一間大房子，里面都是被子、枕頭和溫馨甜蜜的刺繡品。她幫我打開電視，這被認為是一種非常時尚的好客表現，就像美國郊區家庭所習慣的背景音樂一樣。

接下來，米哈伊帶我們去登山。由于他們家位于山腳，那山相當于從他家后院開始便筆直上升。我們走了大約兩個鐘頭，大半時間都穿梭在一片茂密陰暗的森林中，里面滿是高大的常青樹。直到最后一段路，我們才來到一片沐浴在陽光下的青翠山坡。陡坡上有位農夫正在割草，有個小男孩蜷縮著坐在高草中，宛如融入周遭環境的小動物；老鷹翱翔天際，無聲無息地在大地上搜尋獵物。這里空氣的純凈、掠過山脊的涼風、泉水的冰涼、草坪鍍著金光的翠綠，在在令人著迷。米哈伊拔起一株蕨類植物的根，告訴我們這種蕨根具有人參提神的特性，并鼓動我們嚼一嚼。不知道是蕨根的效力還是景色的魔力，我確實開始覺得比較輕松，也沒有那么累了。

即使這如詩如畫的田園風景，也不是沒有歷史的。那位收割牧草的農夫前來跟米哈伊打招呼，兩人指給我草坪中若干斜坡和小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便是躲在這里，擊斃了企圖攻上山丘的俄國人。我問當地人支持哪一邊？“喔，我們都支持德國人。”農夫驕傲地回答，米哈伊也表示同意。羅馬尼亞站在德國一方參戰，直到最后時刻才轉向；但是對這里的人而言，俄國人才是他們真正的敵人，至今依然。

下山途中，約努茨告訴我有關“謎奧理空間”（Mioritic space）的概念，這一概念經常被引述為羅馬尼亞神話和精神的重要內容。概念的起源“謎奧理”（Mioriţa），是遠古口口相傳的一首詩，有許多不同的版本。而在文字記錄的版本中，則是一首簡短的敘事詩，描寫三位分別來自羅馬尼亞三個地區，即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Wallachia）和特蘭西瓦尼亞的山中牧羊人，其中兩人密謀暗殺另外那個。他們想要暗殺的那位來自瓦拉幾亞的牧羊人收到了一只母羊的警告，于是決定安詳地把自己獻給布滿星辰的天空，和死神聯姻。由于這是一個典型的背叛和分裂的故事，因此將“謎奧理”視為民族神話對我而言實在是不可思議，然則羅馬尼亞人強調的不是謀殺，而是詩里面所描述的平靜接受無常和死亡的意念。“謎奧理空間”是一個過渡的空間，是在山中游蕩的空間，是變動的空間。以一種愛國的方式，約努茨愛這首詩。他指出這首詩的前幾句：“靠近一個低矮的山坡／在天堂的門檻／小徑下坡之處／來到曠野與盡頭……”正好描繪了我們此刻所行經之處。我的感想是，這則短小精悍的傳說中所體現的矛盾——一方面帶有溫和的宿命論，另一方面訴諸暴力——正是我在羅馬尼亞氣氛中所感受到的，迄今亦然。

回到農莊，科卡準備了胖乎乎的西紅柿煎餅，上面涂著奶油和糖漿，裹著油亮糖衣的李子，當然，還有帕林卡和咖啡。她似乎喝醉了，熱情地把我攬在胸前，要我告訴“每個美國人”她的度假地點。同時，米哈伊應該去美國賺大錢，我應該幫他找“第二個老婆”，這樣他就不會太郁郁寡歡了。米哈伊抗議他不要一個新老婆，他只想帶輛大車子回來，比如一輛凱迪拉克之類。在肯普隆格，美國夢顯然生動而美好。

我在黑暗中摸索，繞過鐵鏈拴著、朝我低吼的狗去室外衛生間，然后踉蹌地摸回來，精疲力竭地倒在柔軟的床鋪上，裹在被子里。“我會讓你在兩根稻草間睡著。”科卡早先曾說，我想她的意思是我會一眨眼的工夫就睡熟。她果真說到做到。

第二天，莉娜、約努茨和我出發去參觀修道院。乍看之下，那些修道院在干凈的空氣中顯得格外光彩亮麗。我們首先抵達的是沃羅內茨（Voroneţ）修道院，它面積小巧，設計精簡，只有木質屋頂往外延伸，像小鳥的羽翼般呵護著磚結構的屋身。塔樓上的屋頂往上收攏，有如一把中國油紙傘。我在農家和水井上都看到過這種設計，已經算是一種標志性樣式，不斷重復出現在簡單的農舍和宗教建筑上。修道院內部，狹窄的空間以一種幾乎難以承受的華美，不斷擴展與奔放，內側石壁上的每一寸，包括高聳的圓形大廳、壁龕和墻壁，全都覆蓋著壁畫，描繪圣經和歷史故事。這里甚至有種近乎東方意味的靈性，通過絕對的豐盈掙脫感官的羈絆而達到超然狀態。修道院外著名的外墻壁畫，也是美到極致。壁畫中所描繪的情景經常是陰森的，如天使刺殺小鬼，死者從墳墓里升起等等，但是畫風的生動，完美地平衡了民間藝術和高雅藝術，而且畫像和細節的豐富也表現出一種豐沛的感情而不顯陰沉。外墻壁畫的主色調沃羅內茨藍也有其神秘的一面。調制這種藍色的技法顯然已經失傳。這種藍色具有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32]](#_32_7)藍的純粹和正統，差別只在于這種色調更為暗沉也更為柔和。

距離沃羅內茨修道院不遠處的悠墨（Humor）修道院重復了大致相同的美感體驗，不過主色調換成了紅色。修道院前出現了一種十分不同的景象：一個皮膚上布滿白斑、類似麻風病疤痕的乞丐。我往他的籃子里丟了一點錢，然后轉開視線，不忍直視他伸出的兩臂。但莉娜卻讓我出乎意料地撲哧一笑。她以醫生的眼光打量那名乞丐，解釋說他是特別為我們做出的這種不忍卒睹的效果，也許根本沒病。“我喜歡，”她愉快地說，“很精彩，有戲劇性。”我很難理解。即使出于偽裝，那乞丐的存在也依然令人沮喪。但是我看得出來，她覺得真正有趣的是那種夸示的恐怖，那種表演，那短暫的單人秀。

莉娜在肯普隆格有位做心理醫師的朋友，我們一起去當地精神病院探訪他。我武裝好自己，準備迎接更多的羅馬尼亞式驚悚。結果醫院建筑本身至少和我預想的并不一樣，是奧匈帝國時期遺留的建筑，雖然外墻有些地方已經剝落，但是醫院內部鋪設著馬賽克地磚，墻壁是悅目的水藍色。莉娜的朋友彼德雷斯庫（Petrescu）醫生告訴我們，他是故意保留醫院外觀，不去修繕的——這樣“他們”就不會看中這棟建筑，據為己用了。

彼德雷斯庫是個羞怯內斂、神色憂傷的人。在羅馬尼亞人的臉上經常可以發現這種模糊的神態：五官溫和，藍色的眼睛因一種不確定而黯淡無光，聲音非常安靜。他讓我們穿上醫生大褂，這樣比較不會打擾病人，然后帶我們參觀他引以為傲的醫院，尤其是浴室的衛生狀況。

當我們來到男病房時，所有病人都從病床上爬起來，立正站在床邊以示敬意。撇開這一抹威權感不論，彼德雷斯庫以一種熟悉的親切對待病患，用手輕按病患的肩膀和額頭，聲音溫柔地鼓勵他們。一名病患乞求醫生讓他喝點酒，彼德雷斯庫溫婉地拒絕了。后來他告訴我們那個病人是名教士，盡管用盡所有醫療手段，仍無法治好他的酗酒問題。有一次，他甚至中斷了一個葬禮儀式，只為回到自己屋內解決酒癮，等教區居民跟過去找他時，他竟然已經呼呼大睡了。不過東正教教徒對于他們精神導師的小缺點似乎非常寬容。這名教士已經入院好幾次了，每次都能順利回歸他的宗教工作。

走廊上有個看上去是絕望的化身的男人，頭發蓬亂，身上穿著睡衣，外面套著一件敞開的袍子，走來走去，偶爾停下來，凝視著天空。“波蘭人，”彼德雷斯庫醫生說，“抑郁癥。”仿佛這兩個詞就足以解釋一切了。

在女病房區，同樣是溫和的叮嚀以及更多的診斷：“神經衰弱”、“性倒錯”、“精神分裂加愚蠢”，彼德雷斯庫簡要地概述，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奇特，立即讓我們有置身歷史更早階段的感覺。不曉得與這些醫學名詞相伴，病人是否也有著比較古老的病征。

回到辦公室后，彼德雷斯庫告訴我們，他是這座醫院七十名病患的唯一心理醫生，也是整個地區唯一的一個。他有個柜子，里面堆放著法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藥品，都是羅馬尼亞駭人聽聞的健康情況被披露后所陸續獲得的醫療救濟。由于缺少人員和時間，這所醫院主要靠藥物治療，不過彼德雷斯庫自己也經常不確定這些外國藥品的正確用途和劑量，完全靠臨床經驗隨機應變。他一再重復，最重要的治療方式，是他和病人間的“情感關系”。“我們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他說，“我們是同一個社會的成員。我知道他們的困難。這是一種相互尊重的關系。”他每周大概花半個鐘頭和每名病患在一起；十個星期后，大部分病患都會被送回家，由家人接手。他說他的目的不在于分析病人的靈魂，而是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

當我們離開醫院時，彼德雷斯庫說，醫院的真正問題是秘密警察仍然潛伏在四周，這也是他邀請我們晚間來訪，而且沒有把外面的燈打開的原因。甚至在鎖門時，他還神經緊張地四處張望了一下。

“不過，政權已經更替，他們還在做什么？”我問，對這些隱秘兄弟的角色深感困惑。

“占座位和下棋吧。”醫生含混地回答。莉娜認為，秘密警察目前雖然沒有明確的職能，但是他們正在等待良機，卷土重來。我很難判斷真相到底為何，秘密警察到底是真的無所不在，或者只是人們昔日古老的、合乎情理的偏執心理的投射。不過無論孰真孰假，陰影籠罩的恐懼氣氛確實迄今仍縈繞不去。

參觀完畢，彼德雷斯庫邀請我們去他家，他說在那里才能比較自由地談天。就羅馬尼亞的標準而言，他家算是相當富有的：寬大的房間、上好的木雕、一座菜園和一些果樹。有個房間里全是俄羅斯和羅馬尼亞的圣像畫，從14世紀到19世紀都有，靠墻壁堆放著數十幅。我問他哪里搜集得來這些藝術品，他只含糊地笑了笑。應該還有某種交易在內，或許是用病人給他的小費購買的。在羅馬尼亞，如果單看政府薪資，醫生屬于薪資最低的專業人員；不過每個病人都知道，醫療費用還應該包括某種形式的回饋，像是金錢、食物或禮物等。和莉娜旅行時，我們會順道拜訪她以前的病人，那些人全都盛情款待我們；莉娜也告訴我，她隨時都能仰賴這些病患。反過來，在這些訪問中，莉娜也經常把病人帶到一旁做一些非正式的治療，沒有人認為這種交易不正常。

晚餐期間，彼德雷斯庫和莉娜告訴我，他們和醫療領域的最新發展已經脫節，一是無法和西方同仁有任何接觸，二是幾乎沒有接觸文獻和醫藥信息的渠道，甚至無法估計他們究竟落后了多遠。現在他們則因為經濟原因，仍然處于孤立地位：到西方旅行完全超出他們的經濟能力，甚至圖書和雜志也買不起。

羅馬尼亞的精神病院有沒有被用作政治目的？我問他們。起先，他們只是空洞地否認；然后才猶豫地承認，或許在某些地方曾被政治利用。不過，他們又趕緊澄清，政府只會利用一些特殊人員做這種事，大部分醫生都是誠實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種事。在我們共處的這個晚上，電話響了好幾次，都是病人有所需求；彼德雷斯庫醫生似乎都很樂意地提供幫助，以模糊而擔心的聲音跟病人交談。他和莉娜都很勤奮工作，比大多數人都辛苦。“這是一種奉獻，”莉娜說，“我只是運氣不好，才在這場火中燃燒。”以羅馬尼亞人戲劇化的夸張傾向，我想這句話的意思是在表達他們全心全意的奉獻精神。和羅馬尼亞人聊天時，我經常有一種感覺，今晚也不例外，就是有一種障眼法，企圖掩蓋某些無法看透的或半真半假、或謊言、或我無法揣摩或懷疑的迷障。不過即便如此——縱使存在困難和腐敗，縱使存在對專業關系的陌生，我還是堅信這里仍普遍存在著希望幫助別人和做好事的愿望，只是對我們而言，以一種特別且聞所未聞的形式出現。

我們在肯普隆格閑逛，約努茨突然冒出一句讓我驚訝的話。他說：“我羨慕你，你就像一個自由的人一樣行動。”

“你不覺得你是個自由的人嗎？”我問。

“你知道，我們還是很害怕，”他回答，“我們仍然會回頭張望，我們都有這個習慣。我很痛恨這一點，也企圖克服，但這種事需要時間。”

“但是你這一代的人呢？你希望以另一種方式長大嗎？你會希望自己在不同的國家長大嗎？”

“當然，我們是有希望的。我們都是十幾歲的青年。如果連我們都不抱希望，誰還會有希望？不過，在每件事情都在發生變化的這段時期，我們正好進大學……感覺很混亂。我們能信任的老師太少，你知道，”他繼續說下去，“我沒有方向感，因為我什么都想閱讀，什么都想知道，但是我沒有系統，我不知道從哪里開始。”

“不過你還很年輕，”我插口道，“你可以一步一步來。”

“對，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年，”他承認，“但是很奇怪，我總有種時間的危機感……每件事都按時發生，問題就在這里。我讀過米爾恰·伊利亞德早期的小說，充滿象征性，我不懂那些象征，但是一件事導向另一件事，就像在字典里一樣。”他用手比了一個編結的手勢，表示每件事都交織在一起。

“也許我不夠強壯。”他沮喪地說。

“對什么而言不夠強壯？”

“擁有目標。我不希望你認為我很下流，但是我能找到的表達字眼，是我不想成為一個知識的手淫者，只是求知，求知，求知……總要為了某個目標而求知。”

約努茨認為他想成為一個精神病學家，像他母親一樣，因為精神病領域結合了真知和實踐。他想去美國上醫學院，卻又掛心父母。“我看見他們很……混亂，被這段時期弄得很累。而且不只混亂……還有創傷。比起一年前，我父親的頭發白了很多。他可能會丟掉工作。我母親工作得比以前還要辛苦，因為他們正在裁員。如果我離開幾年……很多事都可能發生。”

“另一方面，我很愛他們，可我不想和他們聯結太深……我不認為子女應該參與他們父母的戰爭。那不是自由。”

“你知道，”他繼續說，“我想到一個羅馬尼亞的民間故事，那個故事是這樣開始的：有一對老夫妻沒有孩子，他們一直祈禱能有個孩子。后來他們有了一個孩子。當然，那孩子很神奇，才三個月就長到像其他孩子一歲那么大。不過很快地，那個孩子就離開了。我想這個故事有兩個意義：生命都有自己的命運，以及萬物都各有其自由。”

的確，自由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而已，在聽約努茨述說間，我不禁震驚于人性的神秘，竟能孕育出自由。他的好奇、他對更廣闊視野的需求，都是無法從孕育他的環境獲得解釋的。偶爾，人的個人特質會超越幾乎任何條件的限制，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和表達的路徑。或許對于變革最根本的希望，是期待那些改變終能創造出足夠的空間，讓那些道路通暢無阻吧。

到了離開肯普隆格的時候了。我們將搭乘火車返回布加勒斯特。我們一直擔心會誤點，不過米哈伊開車送我們到車站，他宣稱“人絕對不要追著火車或女人跑”。顯然，我正好錯過了要在今晚舉行的一場農民婚禮，還有儀式上許多正宗的當地舞蹈。不過我也開始懷疑這些故事是不是專門編造出來誘惑我的。

我們訂的是臥鋪，但是有人——那個所謂無所不在的“有人”啊——騙了我們，我們被帶到一個只有普通座椅的車廂。莉娜和列車長展開了激烈的外交談判，最后列車長終于同意給我們一個臥鋪。每個人都堅持我睡臥鋪，莉娜和約努茨則去別處碰碰運氣。睡在我上鋪的是個年輕醫生，只會講少量英語，不過還是設法告訴了我：秘密警察仍然掌控每件事。就這樣，腦海里縈繞著那個早已熟稔的概念，我沉沉入睡。

返回布加勒斯特途中，雖然沒有見到真人，但是我對秘密警察這個概念有了更切身的體驗。瑪格達和她的朋友米爾恰（Mircea）與我相約在洲際酒店共進晚餐，充作道別宴。米爾恰是一個身材高大、個性開朗的醫生，在6月13日那個重要的凌晨礦工們出現時，正好在救護車上輪班。對于那天凌晨在大學廣場所目睹的場景，他仍然有種鮮活的戲劇感。其中最戲劇性的一點是，當時其實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廣場的一邊聚集了約三千名軍人，另一邊則是流浪漢和一群烏合之眾。群眾朝軍人胡亂扔些東西，米爾恰一直說，那情景就像在表演，軍人一起朝群眾逼近，群眾往后退，然后軍人再像浪花一樣往后退。這正和我上回在大學廣場所看到的一樣。“就只是表演，”米爾恰說，“如果他們真想驅散群眾，不到十五分鐘就可以辦到了，絕對沒有問題。”這是羅馬尼亞的政治劇。只是在那一次，不論由誰制作，都是刻意想要在現實中引起行動。

瑪格達隨即談到另一個“他們還在這里”的軼事。今天她經過護照辦公室時，瞥見一個令她記憶深刻的人。她在1970年代曾去申請護照，在等待相關文件期間，負責她的業務的職員故意整她，結果護照一等就是十年。在這期間，那人經常含沙射影地諷刺她、威脅她，讓她不必要地跑來跑去，還用性暗示的言語嚇唬她。“你當真等了那么久啦？”雖然這幾年間他們一直定期見面，可是那人還會這樣佯裝驚訝地問她。我不由想起卡夫卡《審判》（The Trial）中的門房。不過話說回來，在世界的這個角落，隨隨便便就會聯想到卡夫卡。

因為我在付賬方式上改了主意，所以我們的晚餐以一小段戲劇性事故結束。我先是用美國運通卡付賬，但是在瑪格達和米爾恰的勸說下，決定改用羅馬尼亞幣列依支付。此舉讓侍者大為光火。“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能！”他尖叫著，試圖從我手中奪走信用卡，一張臉漲得通紅。為了證明我可以，我立刻把他拿給我的信用卡賬單撕了，這更讓他的怒氣上升到最高威脅的等級。“你不能！”他再度咆哮，“我要去找秘密警察！”

“請便。”我說，佯裝無所謂地比了一個邀請的手勢。這種露骨的不公正行為迫使我冷靜以對——當然，我之所以能采取高姿態，也是因為我是外國人的關系。那侍者怒氣沖沖地離開，我瞅了瞅瑪格達和米爾恰，看這件事給他們造成了多大的不愉快。“你這樣做是對的。”他們說，但是我也看得出來，他們非常緊張。

那侍者回來，一言不發地扔了張新賬單給我。我猜一定有人告訴他要迎合外國人，但是對待羅馬尼亞人則不必。“你們以后再也不準踏入這家酒店！”他朝瑪格達和米爾恰大叫，而且一副想揍米爾恰的模樣。我們走出酒店，一個陌生男子尾隨而來，朝米爾恰嘟噥了一句：“我很高興出席你的葬禮。”

我們心驚膽戰地離開酒店，我不由自主地回頭看是否有人跟來。突然間，街上的氣氛似乎朝我而來，我不喜歡士兵身揣自動步槍四處巡視的畫面。或許我也體驗了一絲羅馬尼亞人生活了數十年的恐懼氛圍，體驗了一抹余韻，而那對于他們而言，就像一貫的天氣。“你知道，他們可以輕易找秘密警察來，那家酒店就是秘密警察經營的。”米爾恰說。不管怎么說，我們并沒有遭到實際的危險，剛剛所發生的不過是個愚蠢的惱人事件。不過這件事讓我體會到，被一個人愚蠢的一時興起所驚嚇是多么讓人討厭；而不斷發生這種事，不斷壓抑自己的惱怒和憤恨，又是多么令人懊喪；再者，必須克制和束縛一個人見義勇為的天性，終至被壓縮為挫折和苦澀的迷茫，又是多么讓人心生怨恨。

在我計劃離開的前幾天，布加勒斯特發布了大罷工的聲明。沒有人知道罷工是否真能實現，不過在所宣布日期的前一天，布加勒斯特的氣氛開始升溫。我當天原本要去訪問一家工廠，但一大早，工廠的兩位經理卻出現在斯特凡娜家，勸阻我前往。工人們情緒不安，我或許無法獲準進入，何必自找麻煩呢？

我問，盡管如此，我可以去一趟試試看嗎？噢，如果你堅持的話，他們說，隨即沉默下來。斯特凡娜告訴我，他們這么說，就是真的不愿意帶我去的禮貌講法。因為我沒有其他辦法進入工廠，只好做出讓步，也讓大家都松了口氣。

我去旅行社確認預定的火車是否照常運行，出租車司機操弄著他那輛破車，指著窗外一排排站在街上，手持條幅的人，他們就是我想參訪的那家工廠的工人。

旅行社內排著一列列沒有盡頭、也不移動的長隊。但現在我是何等能等的人啊！我靜靜等候，仿佛我在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等待，以不可思議的認命態度等待。一種牛一般溫和的耐性已經取代了我一向的焦躁，我對時間和舒適的感受已經在這趟旅行中被徹底改變。當我終于站到柜臺前時，柜員告訴我，如果有其他變化，請直接收聽廣播。

第二天下午，五顏六色的游行隊伍大步走在勝利大道上，每面旗幟的中間都有個大洞，戲劇性十足，挖掉的是原來共產黨的標志。空氣中彌漫著緊張、興奮的氣氛，人們腳步迅捷地在街道間穿梭。

然后，什么都沒發生，草草落幕。長相帥氣的總理彼得·羅曼（Petre Român）前去接見工人，向他們解釋，政府目前沒有錢給他們加薪。他們顯然理解了。就這樣——又一場沒有開始就結束的游戲，又一個沒有完成的表態，又一次一如以往的和稀泥。

在羅馬尼亞的最后一個晚上，我去欣賞了《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這布加勒斯特最熱門的話題。首先要說，這出戲是兩大著名流亡人士獲準歸鄉后的作品。聽說翻譯非常精彩，譯文出自尼娜·卡西安（Nina Cassian）[[33]](#_33_7)之手。她是位旅居紐約的詩人，在流亡多年后終于獲準自由來去。導演是利維烏·丘萊伊（Liviu Ciulei）[[34]](#_34_7)，他的才情已經在美國獲得認可。

這出戲在一間不透氣的小劇院演出——這里沒有空調之類的東西，而布加勒斯特的六月有時非常炎熱。演出水平一流，而且劇情正微妙地適合羅馬尼亞的氛圍。在丘萊伊的詮釋下，《仲夏夜之夢》搖身一變成為講述侵犯和人類順從性的戲。在回家的路上，斯特凡娜、帕維爾和我所談論的內容，正是過去四十年間所有東歐地區不斷重復的情況，亦即試圖將戲劇內的象征，對照于羅馬尼亞的現實狀況。“我想我們還是得這樣詮釋下去，”帕維爾說，“什么事都關乎我們、我們、我們。”

我一直聯想到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35]](#_35_7)一出杰出的戲劇《狗姆雷特，唬克白》（Dogg's Hamlet, Cahoot's Macbeth），把語言和藝術在不同背景下所能產生的不同分量，以戲劇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斯托帕德這出戲的第一幕中，語言只不過是在劇里被扔來扔去、玩弄操作的色塊；而在第二幕中，一名捷克作家在自己的公寓里秘密創作《麥克白》，充滿了冒險、危機、抗議和一種對自由的大膽欲求。在紐約，制作華美的《仲夏夜之夢》會是一出甜蜜的純藝術之戲；但在自由與正常都還無法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羅馬尼亞，藝術的意涵也只得被迫延伸。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整合了我對羅馬尼亞所有印象的夢。夢里我身在一群意大利人當中——可能是因為羅馬尼亞人經常視自己為拉丁人吧，而那些人個個都有張令人不安的模糊面孔。其中一人因為心臟病發作跪倒在地，其他人雖然都是醫生，卻沒有一個伸出援手。我費盡力氣地想要用一條毛毯蓋住他，只見他的臉色越來越蒼白，卻奇特地并沒有瀕臨死亡。然后門開了，另一個臉孔模糊的人走進來通知我：“這都是一場實驗。一場表演。”斯特凡娜和我對此意見一致，都認為羅馬尼亞的氣氛已經滲透到我的意識中了。

到了要離開的時候了。晚間，斯特凡娜送我到火車站。不可置信的是火車居然準時到站，而且列車長帶我到一間私人臥鋪，沒有任何刁難之舉。我感激莫名，很想把我的健牌香煙全部送給他，但斯特凡娜堅定地按住我的手。給小費是要有技巧且適量的。我們互相道別，然后我很快進入夢鄉。當我醒來，火車正停在一處不知名的地方，小鳥輕快地高聲啼唱。時間大約是清晨五點，我已經進入保加利亞境內。

[[1]](#_1_10)弗拉德·則別斯（1431—1476），“則別斯”在羅馬尼亞語中的意思即為“穿刺”。

[[2]](#_2_10)伊利埃斯庫（1930—），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成員，曾任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主席，1990年、1992年和2000年三次當選羅馬尼亞總統。

[[3]](#_3_10)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美籍蘇聯詩人，1972年被迫離開蘇聯，流亡美國，在大學任教與寫作，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_4_10)世界最大的英文旅游資訊出版公司。

[[5]](#_5_8)列依，羅馬尼亞貨幣名。

[[6]](#_6_8)米爾恰·伊利亞德（1907—1986），著名宗教史家，代表作有《神圣的存在：比較宗教的范型》、《薩滿教：古老的昏迷術》等。

[[7]](#_7_8)一種用動物內臟烹調的湯，據說有緩解宿醉的功效。

[[8]](#_8_8)馬加什一世（1443—1490），文治武功卓絕，其統治下的匈牙利領土達到歷史上面積最大，國力也達到最強。從1458年以十四歲之齡登基，至1490年身亡為止一直在統治整個帝國。通過數次軍事運動，后又成為波希米亞之王以及奧地利公爵。

[[9]](#_9_8)尤內斯庫（1909—1994），生于羅馬尼亞的法國劇作家，荒誕派戲劇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0]](#_10_8)齊奧塞斯庫（1918—1989），羅馬尼亞領導人。在位二十年，1989年被國內革命推翻后遭槍決。

[[11]](#_11_8)一所位于紐約市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乃世界著名的左派大學。

[[12]](#_12_8)奧利維婭·曼寧（1908—1980），英國小說家、詩人及評論家。

[[13]](#_13_8)馬克·吐溫的兒童文學作品，書名即主人公哈克貝利·費恩，乃《湯姆歷險記》的續集。

[[14]](#_14_8)指1984年動工的“人民宮”，即今日的議會宮，當時為僅次于美國五角大樓的世界第二大宏偉建筑，相對的廣場和大道等龐大建筑群，則是其配套建設。

[[15]](#_15_8)齊奧塞斯庫夫妻被伊利埃斯庫授權成立的特別軍事法庭快速審判，遭到槍斃，時稱“七日革命”。齊奧塞斯庫1989年12月20日結束訪問伊朗，21日在今為議會宮的陽臺上發表上文提到的那場演說，26日全世界電視新聞中便出現齊奧塞斯庫夫妻遭槍決的畫面。

[[16]](#_16_8)羅馬尼亞匈牙利族民主聯盟，1990年初成立。它聲稱不從屬于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是一個代表和捍衛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利益的組織。

[[17]](#_17_8)米哈伊國王（1921—2017），羅馬尼亞王國的最后一任國王。

[[18]](#_18_8)米哈伊國王曾加入國內支持同盟國的陣營，成功以政變方式推翻當時支持軸心國的內閣，得以和德國脫鉤。

[[19]](#_19_8)佛朗哥（1892—1975），前西班牙國家元首、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長槍黨黨魁。1939—1975年獨裁統治西班牙。

[[20]](#_20_8)品欽（1937—），美國作家，以寫晦澀復雜的后現代主義小說著稱。

[[21]](#_21_8)巴思（1930—），美國小說家，其作品被認為具有后現代主義和超小說性質。

[[22]](#_22_8)巴塞爾姆（1931—），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家。

[[23]](#_23_8)索爾仁尼琴（1918—2008），俄羅斯作家，著名異議人士，1973年著《古拉格群島》揭露蘇聯勞改營內幕，曾獲諾貝爾文學獎。

[[24]](#_24_8)鐵衛團，1927—1941年間羅馬尼亞的一個極右恐怖組織，后因武裝暴動而遭殲滅。

[[25]](#_25_8)安娜·波克爾（1893—1960），羅馬尼亞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擔任副總理，外交部長。1952年遭到清算。

[[26]](#_26_6)1936—1939年西班牙內戰時，中國、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的志愿兵組成國際縱隊，以對抗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勢力。縱隊成員亦包括詩人、藝術家、醫生與記者，如海明威、喬治·奧威爾、畢加索等。

[[27]](#_27_6)愛倫·坡（1809—1849），19世紀美國詩人、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

[[28]](#_28_6)雷佐里（1914—1998），羅馬尼亞作家及戲劇演員。

[[29]](#_29_6)喀爾巴阡盆地產的傳統水果白蘭地。

[[30]](#_30_6)意大利電影，導演為費里尼，曾獲得金棕櫚獎。

[[31]](#_31_6)吉卜林（1865—1936），英國作家及詩人，19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32]](#_32_6)弗拉·安杰利科（約1395—1455），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畫家。

[[33]](#_33_6)尼娜·卡西安（1924—2014），羅馬尼亞詩人、散文家，在多家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也是羅馬尼亞作家協會的主要成員。1985年赴美國訪問，因政治因素不得返國。

[[34]](#_34_6)利維烏·丘萊伊（1923—2011），羅馬尼亞導演、劇作家及演員，《新聞周刊》尊之為“國際影壇上最大膽、最富挑戰性的人物之一”。

[[35]](#_35_6)湯姆·斯托帕德（1937—），英國劇作家，曾獲得奧斯卡金像獎。

# 第六章 保加利亞

來到保加利亞，可說我已經超越了之前的預想和偏見。保加利亞這個名字中就回蕩著若干異國情懷，畢竟，這里是莎士比亞筆下伊利里亞[[1]](#_1_13)的真實地點，也是古希臘神話人物俄耳甫斯（Orpheus）[[2]](#_2_13)的家鄉古色雷斯（Thrace）[[3]](#_3_13)之所在，還是拜占庭、奧斯曼和斯拉夫（Slav）影響所及之地及古代商路交會之處。而現代的保加利亞，卻存在于我的知識范圍之外，即使以我在波蘭長大的背景而言，這里也屬于化外之境，是個遙遠國度。

不過在首度踏上索非亞的土地時，我發現這里完全是現代化氣氛，充滿不安與轉變，似乎正醞釀、翻騰或糾結些什么。1990年夏天，共產主義尚未完全退場，輿論基礎還沒有定向。我離開布加勒斯特時，腦海中殘存的影像是無聊閑晃的民眾和排列為伍的警力。抵達索非亞后，在乘車離開機場的途中，我發現市中心部分遭到封鎖，警察在周遭戒備；某個廣場上，但見另一撥無所事事閑晃的群眾。

“有問題，很多問題。”當我們確定彼此可以用最基本的俄語溝通時，出租車司機立即告訴我。昨天晚上，他解釋道，共產黨總部大樓遭到攻擊，然后有人威脅要自焚，因為他要共產黨退出政壇。

“但那樣做也許并不明智吧？”我試探性地詢問。我的俄文無法使我委婉其詞。“是啊，是的！”他語氣強烈地回答。雖然已更名為社會黨，但保加利亞仍是東歐集團內唯一一個共產黨在最近一次自由選舉中贏得多數的國家，此舉使得他們成為東歐唯一一個沒有借由操弄選舉而成就此等功績的共產黨。

不過接著，那出租車司機又表示，其實攻擊政黨總部并不太聰明。“搞破壞，”他的語氣充滿厭惡，“流氓手段。”

因為從羅馬尼亞打電話幾乎完全不可能，因此我并沒有預約索非亞的旅館。在出租車司機的熱烈推薦下，我隨意挑中了索非亞大飯店（Grand Hotel Sofia）。那家飯店位于市中心，占地甚廣，一言概之，就是俗麗。室內裝潢主要是塑料材質，顏色是灰暗的橘色、淺褐色和紫色。走道彌漫著洋蔥味和濃郁的汗臭味。燈光到處都調得很暗，或許是出于節儉的生活習慣。背景播放的是1955年左右的酒廊音樂，讓我的情緒更為消沉。在這不怎么干凈的大飯店里，到處可見成群的俄國人和越南人，一副難以遮掩的堅定的黨派形象。索非亞大飯店是一個屬于權貴的酒店。

因為我無法接受餐廳的模樣，便叫了客房服務，包括一份嘗起來明顯腐爛了的牛排。“我想肉可能不新鮮。”當侍者前來收拾餐具時，我告訴他。“我也不確定。”他嚴肅地回答，讓我第一次領略到保加利亞人的坦率。第二天早上，我立即轉到另一家設施比較好、價格也比較公道的住處。

雖然第一印象不佳，但索非亞那股松散、中性的特質卻馬上獲得了我的好感。也許因為它的大小規模適中，沒有壓迫性的關系，也或許是東歐元素和南部強烈的光和熱的戲謔組合，使得每件事都呈現出不同的感受吧。第一次細看之下，索非亞就像是橫跨在東歐破敗不堪的鄉間小鎮與意大利或希臘同樣破敗的小鎮之間。現代的索非亞大部分興建于19世紀末期，然后在20世紀逐漸發展。由于沒有經歷過非常繁盛的階段，因此形成此刻沒有什么特色的特點。這是個建筑矮小的城市，很少有建筑超過三層樓高。無從描繪的灰色石磚建筑社區令我聯想起波蘭克拉科夫周遭的建筑，不過有幾張搖晃的塑料餐桌和橘色座椅的戶外“咖啡廳”，卻又流露出強烈的南方色彩。街道上和不起眼的小公園里，經常可以見到低聲咕咕叫的鴿子。

這里的人們面容也形形色色，頗為美好：高挑精瘦的女子，面孔呈現出顯著的斯拉夫族特征和骨感的雅致；黑眼睛黑胡子的男子，宛如拜占庭圣像或禾林（Harlequin）[[4]](#_4_13)言情小說封面的男模；身著寬大黑袍的東正教教士；以及戴著斗篷樣頭巾的波馬克人，亦即保加利亞的穆斯林。

這里的人種由綿長的歷史孕育而出，色彩似乎比較稠密濃烈。保加利亞雖然屬于少數文化，卻擁有偉大精深的歷史厚度。這種厚度令我著迷，仿佛在山巖間遇到一處小水池，結果發現池水的深度竟然深達地心。在國家歷史博物館，我見到了金質手工制品，做工精細，無懈可擊，也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還有祭祀用的碗盆，有著細致的鑄鐵緣飾；若干金銀絲細工項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比其他地點發現的類似工藝品早了約一千年。另有后期的色雷斯器皿，形似典雅的醬汁盛器，尖嘴處拉長為美麗的馬匹或獅身鷹首獸。色雷斯石雕帶上裝飾著優美的人物塑像，其優雅的體態仍可在走在大街上的索非亞人身上窺見一二。還有纖小的女神雕像，比其他所有文物都更古老。雖可輕易將它們托于掌心，但那豐滿的臀部造型，仍給人一種極有權威與規模的感覺。

從民族認同來說，保加利亞人也擁有悠久的歷史。第一個保加利亞王國在第7世紀時即已建立，遠在英格蘭之為英格蘭、法蘭西之為法蘭西之前。第二個王國更延續到13、14世紀。發明西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5]](#_5_11)并將其推廣到整個地區的僧人西里爾與美多迪烏斯都來自此地。第一部斯拉夫文學作品用保加利亞文撰寫，早期俄國文學也從保加利亞豐富的僧侶傳統中獲得了滋養。

盡管有著悠久的歷史，但保加利亞小國寡民，又位居重要貿易樞紐，難免成為各種侵略、掠奪和覬覦行為的目標。索非亞本身便多次遭到摧毀和重建。最初在此定居的是色雷斯部落之一的塞爾迪人（Serdi），其后由羅馬人占領，并將其興建為一個相當繁榮的地方都會。在拜占庭時期，此地以“三地卡”（Triadica）聞名，意思為“在群山中”。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也很喜歡此地高山平原的位置。斯拉夫人在公元4世紀左右來到此地，重新將其命名為“史瑞迪克”（Sredec），亦即“中央”的意思。這座城市所遭受的最大打擊，來自447年匈奴人在阿提拉（Attila）[[6]](#_6_11)率領下的大肆破壞，幾乎從地圖上消失。其后，拜占庭的一位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us）在第6世紀時又重新興建，他的一項豐功偉業是興建圣索非亞教堂，不過要到許久之后的14世紀，這座城市才以索非亞為名。

圣索非亞教堂如今依舊屹立于市中心，以毫不矯飾的嫻雅展現著古典氣質。教堂附近有些打扮新潮的年輕人正有模有樣地表演披頭士的歌曲，如孔雀般色彩絢麗的吉卜賽人則提議說要幫你算命。入口旁邊有人正在發放免費食物，人們安靜地列隊領取。在寬大的教堂內部，沒有販賣風景明信片的小店，沒有細述教堂歷史的海報，也沒有其他標示展現教堂的重要性與歷史價值。灰暗的石磚上不見任何美化的裝飾，沒有雕像，也沒有高柱或任何神圣的小擺設，有的只是比例完美的低矮圓頂、羅馬式拱門和三座中殿，營造出簡單、具有智慧的效果。這個教堂內部似乎在說，我們需要的只是這些，這種空靈和完美已經足夠。圓頂下方的圓形大廳浸沒在舒適的幽暗光線中；鴿子徑行飛入，在破舊的地毯上搖擺踱步；人們隨興進出教堂，短暫停留，靜思默禱。

在距離這處神圣建筑不遠處，是一個外形更為壯觀，震撼力卻略有不足的地標性建筑——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Aleksandar Nevski Memorial Cathedral）[[7]](#_7_11)。話說回來，在索非亞幾乎沒有什么地方是距離遙遠的。教堂那金色洋蔥球狀圓頂以及金碧輝煌的內部，令人聯想到俄羅斯風格。這座建筑的興建緣于特殊的俄羅斯—保加利亞關系，因為這座教堂被視為感激俄羅斯人協助保加利亞人從土耳其手中奪回自治權的一個象征。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控制，亦即此地之“土耳其枷鎖”，前后共維持了五百年，且手段無情殘暴——或許因為保加利亞人從來沒有停止過激烈抵抗的緣故。只是面對土耳其帝國，一個小國不論是黨派的顛覆活動還是大規模的起義企圖都無濟于事。直到另一個帝國，即俄羅斯帝國在1887年向奧斯曼帝國宣戰，保加利亞才終于獲得自由。這種種事件，以及語言、字母和宗教上的親密，都是保加利亞與俄羅斯友好關系的原因。這種友情，在某種程度上，即使在偽善的蘇維埃“兄弟”時期也得以存續。

保加利亞的改變比我所造訪的其他國家還要慢上幾個月，也就是說，我剛好趕上保加利亞轉變的當下，而且正好就在急轉彎的轉角處。這段時期，經濟情勢介于已經傾覆的中央集權系統和尚無頭緒的新秩序之間，所有生產和分配的機制皆告崩潰，在物質上有如遭遇了心跳中止。單純就消費主義——啊！這個名詞距離現實委實遙不可及——而言，索非亞的情勢并不亞于布加勒斯特，所能供應者幾乎等于零。就我所知，在中央百貨公司的一個大型超市內，全部商品只包括幾盒可憐的餅干和茶葉包。我看到人們大排長龍等著購買洗衣皂。人們也很擔心在油電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將會度過一個黑暗、寒冷的冬天。

抵達幾天后，我在保加利亞反對勢力創始人之一德揚·丘揚諾夫（Deyan Kiuranov）的陪同下，光顧了市中心附近一處地下通道里的一家“咖啡廳”。侍者端來一道像三明治一樣的食物，并告訴我們沒有礦泉水，沒有糖，沒有牛奶，也沒有色拉。

“啊，是的，我們的苦日子才正要開始，”德揚·丘揚簡短地說，“我們會超越1980年的波蘭，大家最好先有心理準備。我們要開始過苦日子了。”

透過一個共同友人的介紹，這是我跟德揚的第一次碰面，但是我們立刻就聊開來，仿佛兩人背景、觀點和教育的迥異完全無礙于事。我后來才意識到我們之所以沒有隔閡，是因為德揚所受的教育差不多是世界性的，但他坦誠的性格也讓我倆一拍即合。戴著厚厚眼鏡的他，身穿一種白色無袖的尼赫魯上裝，身材有點胖，整個人散發著難以抵擋的聰慧和活力。

德揚提醒了我，在還不算太久的過去，波蘭是貧困的代表，而保加利亞則代表了地區性繁榮的標準。如今這兩者卻突然翻轉過來了。不過經濟上的黯淡并不足以阻擋保加利亞人對新政治局勢的熱情，在后共產主義的最初階段，保加利亞政壇的熱鬧和羅馬尼亞可謂正好相反，各種新興政治團體風起云涌。我表示自己沒太明白，拜托德揚幫我列舉幾個從左翼到右翼的新政黨。

“你是指戰前的左翼和右翼，還是戰后的？共產主義的？后共產主義的？”德揚問我，厚厚的鏡片后閃爍著一抹玩味的笑意。我舉雙手投降。至少暫時地，東歐已經徹底混淆了這些分野。我們決定不管這種區分了，德揚繼而告訴我，在這個人口不到九百萬的國家，有十六個政黨統一在反對黨的旗幟下，名曰“民主力量聯盟”，或者簡稱“民盟”（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8]](#_8_11)。還有幾個議會外的反對組織，因為票數不足，無法成為這個新立的民主俱樂部的完全成員。另有一個嶄新的共產黨，跡近極端主義，以及兩個以生態為號召的政黨。此外還有一個名叫人權運動的組織，完全在常見的分類之外，代表為數眾多的土耳其少數民族的利益，不過有些非土耳其民族的保加利亞人也開始加入。

除了民主的百花齊放外，在政治松綁之初，想象力也發揮到近乎神奇之境，這似乎是保加利亞所獨有。比如在選舉前三個月，索非亞的一個主要廣場上神秘地出現了一塊帳篷區域，本打算作為一個平等社會的縮影。幾百個人住在那個獨立的小區，小區為所有人提供自己的市政服務和免費醫療。也許這一烏托邦式的古怪想法可以追溯至保加利亞文化中深植的古老的共產社會習俗。在非常早的時候，外國旅行者就曾經在斯拉夫社會組織中觀察到過這種共產與平等的傾向；在10世紀時，保加利亞就曾鼓吹一個名為波格米勒異端教派（Bogomil Heresy）[[9]](#_9_11)的激進信仰系統，試圖廢除教會中所有等級制度，包括男女間的不平等現象。保加利亞基本上始終維持農村的生活形態，直到近期才跟上工業化的腳步，而一些古老的習俗，比如分享食物和親友間相互接送孩子等，一直維系到今日。

德揚在異議活動的早期階段曾發揮相當作用，并參與了生態開放黨（Eco-Glasnost）的創建，目前該黨已成為議會反對勢力的中心。不過他很快退出官方政治圈，對于權力的運作和陰謀感到灰心，因為一旦擁有了若干權力，他的異議同志便會開始分裂。他很擔心他們會自行孕育出新的精英主義，進而晉身新的權貴。

我感到，德揚的不抱幻想源于他的高道德期待。不過事實上，他剛剛獲邀擔任一個新的職務，而他對于能夠出任剛成立的“反黨派”報紙《地緣政治報》（Geopolitika）的編輯，顯然頗為興奮。乍聽之下，我以為他說的是“反-反黨派”，但他說：“不是的。我們還沒有到需要一個反-反黨派報紙的階段。也許將來會，但必須等到那時候再說。至于現在，我們的黨派性已經達到極限了。”

這項新的職務也帶來了新的職業倫理問題。比如德揚正考慮一旦出任新職，是否還應該繼續擔任保加利亞新總統、他的老朋友熱柳·熱列夫（Zhelyu Zhelev）[[10]](#_10_11)的非正式顧問。就當前保加利亞的標準而言，這樣的安排完全不成問題；但德揚希望能免除任何懷疑，不僅就保加利亞的標準而言，而且就任何標準而言。

“不過有件事是肯定的，”德揚說，“如果要繼續擔任他的顧問，我就要拿薪水。”他就這項聽似矛盾的說法繼續解釋：在保加利亞的新局勢中，金錢已經成為一種道德中立的保證。金錢是美式作風，是反共產主義的；這種經濟交易發揮作用的方式也和過去躲在幕后的耳語成交、私相授受不同。

“我們新近有個俗語，”德揚饒具興味地說，“金錢是干凈的。”

我哈哈大笑。經過多次扭曲辯證才終于得證：支領薪水代表你沒有被收買。

吃完點心后，我們在附近散步。德揚領著我看一些當地景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管理員正坐在地板上誦念可蘭經；土耳其浴場，目前正關門整修中；幾個販賣鮮花和葵瓜子的攤位，里面飄出東方的音樂。我們談到索爾·貝婁（Saul Bellow），德揚正在重新閱讀他的著作；還有我在喜來登酒店（Sheraton Hotel）剛買的海明威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11]](#_11_11)，那是我在索非亞所能找到的三本英文作品之一，當然，德揚也看過這本書。

在這幾趟旅行中，我經常發現自己同時被包圍在兩個層次的現實中：一個是物質的極度匱乏，餐廳連一塊方糖都無法供應；另一個則是德揚這樣強烈的快樂、心靈的幸福，以及對新的可能性所展現的興奮。保加利亞正置身新獲得自由的道德事實與物質危機的殘酷現實之間。此刻殘酷的現實正排山倒海而來，有如背負西西弗斯（Sisyphus）的巨石，攀登民主之陡坡。不過我想，憑借人類的精力和智慧的神秘變量，再大的巨石，仍然可以往上推送。

在索非亞停留數天后，我聯絡到另一位生態開放黨的創始人迪米特里娜·彼得羅娃（Dimitrina Petrova）。我和迪米特里娜曾在紐約有過短暫的會晤，她當時受邀在一群杰出的學者面前發表演講，當時我即感到好奇，是何種環境孕育出了如此強大的人物，能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置身一整屋的陌生人當中，以她竭盡所能習得的語言，面對詢問者的提問，用令人驚嘆的智慧、自信和魅力對答如流。她的回答和論述，使得復雜的理論逐步闡明，而達完整圓融之境，幾乎像交響樂般結束在最明朗的音符中。那是一場精彩絕倫的表演。

此刻，她剛參加完在南斯拉夫某處舉行的一場有關“轉變”的會議返回國內，我通過非常有效的索非亞秘密情報網和她取得聯絡。迪米特里娜三十多歲，面容姣好，有張光滑的橢圓形臉蛋，舉止有種動物般的沉穩，在緊張兮兮的紐約，特別令人側目。但這種泰然自若的沉穩氣質在這里處處可見，是一種體態的沉著，一種專注力，也不知是來自穿梭于嶙峋山路的習慣，還是來自自我的坦然態度。

上次晤面至今的數月間，迪米特里娜的發型已經從調皮的短發變為長長的馬尾。她已成為議會的一員，因此議會是她帶我參觀的第一個地方，決定之迅速，正是她的典型作風。抵達議會后，她又為我挑選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新的技術專家，一位狂熱的生態專家，以及一位哲學型的共產黨員。她把我介紹給那位共產黨員時是這么說的：“我把你介紹給霍夫曼女士，因為我想讓她見一下真正的共產黨。”

“社會黨。”那人糾正道，舉起一根手指開玩笑地警告。

“不過是用字而已。”迪米特里娜大笑。

“啊！迪米特里娜，身為政治人物，你必須了解用字的重要性。”那人佯裝悲哀地評論道。但他們之間的親切交談，仍看得我大感驚訝。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我花了相當多時間待在議會輕快愉悅的空間里，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黨派代表聊天，而他們相互間也都維持著輕松友善的關系。這是極為罕見的時刻，眼下的政治還不屬于職業政治人物，反對黨的成員也是專業人士和文藝界的精英分子。他們是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休息廳和走廊上洋溢著活躍的文藝俱樂部的氣氛，以及從事革命事業的熱忱。

在議會中有一些女性，我特意跟幾位女議員聊了一下。其中一位是自由黨的創辦人埃列娜·康斯坦丁諾娃（Elena Konstantinova），一位風韻猶存的中年女士，有張誠實的、不加修飾的美好臉孔，通常很難和從事政治運動的領袖聯想在一起。雖然專業是文學評論，在政局變動前，和政治也完全沒有任何關聯，但她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十分自在。她之前曾在波蘭住過一陣，研習波蘭文學，對團結工會極為仰慕。在投入政治生活前，這就是她全部的啟蒙了。之后改變開始，她覺得恢復父親曾活躍其中的一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自由黨派“激進民主黨”（Radical Democratic Party）“應該值得一試”。而這個想法一在腦海中生根，她便發現該黨一些最早的黨員還在人世。于是他們齊聚一堂，認定他們曾經的思想值得復興。就這樣，他們再度成立一個小黨，從過去的軀殼中復活。有時候，東歐的回到過去，還真是貨真價實地回到過去。

迪米特里娜介紹給我認識的另一位女性是共產黨議員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一個幾乎和迪米特里娜不相上下的對手。博科娃也很漂亮，黑發隨意盤卷，顴骨很高，身著優雅的深藍外套，圍一條愛馬仕圍巾。這股時尚風來自國外。和許多權貴分子一樣，她有機會去西方旅游，有一陣子還被任命為保加利亞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員。她也從事新聞工作，寫了許多讓黨惱火的關于女權的文章。

事實上，伊琳娜自認為女權分子，也試圖聚集議會的女性成立一個兩黨聯盟。這項聯盟還沒有成形，但這個下午，我見到迪米特里娜和伊琳娜在走廊上以同樣的立場進行黨團對話，因為一名議會議員竟然稱呼女議員為話匣子。后來那位倒霉的議員被迫道歉了事，不過迪米特里娜饒有興味地告訴我，那名議員在道歉時卻又干了一件蠢事，說女人是議會的“裝飾”。

很奇特的，在我旅游的諸國中，保加利亞是唯一一個以嚴肅態度討論女權的國家，這也許和我感受到的本地人某種不設防的坦誠態度有關吧。在這一點，以及其他方面，伊琳娜和迪米特里娜似乎很相似，都屬于某種不容置疑的后現代典型。我很難將伊琳娜與一個被視為反動勢力的團體聯系在一起，所以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她，是否考慮過跨越那道顯然非常模糊的界線，成為反對派的一員。

“我絕不會有這個想法，”她非常熱切地回答，“我不會離開黨的，尤其現在黨的情勢比較弱，正在努力地進行改革。”她表示自己最討厭的就是投機分子，一年前還信誓旦旦地對黨效忠，卻突然間冒出一堆政治正確的民主口號。你怎么能相信這種人？不，她是跟著黨一起成長的，她欠黨太多，她會和黨在一起，試圖從內部進行改革。

毫無疑問，機會主義者和擁有正直信念的人之間的差別，其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一樣深切，這種情況在此刻尤為明顯。迪米特里娜曾向我簡略介紹過一位杰出的共產黨議員，那人的兒子是同樣杰出的異議分子。“我喜歡他們倆的地方在于他們強烈的感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感受到他們的信念，他們的理想是從這種感受中孕育出來的。”她欣賞地說。把感受視為誠信的保證，而且應用于政治領域，的確是一種奇特、古老，又深具吸引力的想法。她本人也和幾位年長的共產黨員頗有交情，比如曾和我在議會休息室聊過一陣的樂天幽默、文質彬彬的鮑里斯·斯帕索夫（Boris Spassov）。除了身為議會議員外，他還是個哲學家，對邏輯和實證主義很有興趣。他是迪米特里娜在索非亞大學的良師益友，也是對許多她那一代的活躍分子頗具影響力的老師。在那段日子里，他是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今他自命為自由派的共產黨員，但肯定是共產黨，這一點他毫不避諱。

斯帕索夫很高興用英語聊天。他幾乎完全以自學方式學的英語，而且口語無懈可擊。“現在的情況是沒有希望，但是并不嚴重。”他熱情地談到他的黨，然后又精神奕奕地論述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問題在于共產黨沒有辦法從工業技術模式轉換到后工業技術模式。不過他認為共產黨不但可以挽救，而且可以改造。他樂觀地繼續說，自己仍然相信馬克思對于社會變革和社會團體行為有最為精準的概念。說到這里，他還特地引述他最近在英文期刊《馬克思主義評論》（The Marxist Review）上所看到的一篇文章，并問我有沒有看過最新一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志。他或許是在黨總部看到這些雜志的，但話說回來，這里一向比羅馬尼亞和捷克更容易獲得西方出版物，而這種易于獲取的特性，或許正可以部分解釋何以這里的知識分子比較活躍，也比較儒雅。

“重點是，”他透露玄機地靠近說，“重點是，老實講，相較于反對黨，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有更好的知識分子。他們會提出更好的理論模型，甚至也是更好的社會民主人士。”他給了我一個聰明的眼神，看我是否能夠領會這個轉折，然后飄然離去，參加一項重要的投票。

我的確可以領會。我在其他共產黨員口中也聽說過斯帕索夫對共產黨失勢的這套分析，就我而言儼然是一種自我脫罪的中立性的論述。不過讓我覺得有趣的是，今日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會和反對黨爭奪更好的社會民主人士的殊榮——就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民主而言。也許，對于建構一個好社會的內涵，也即對這場游戲的基本目標，人們已經初步形成了共識，只是對于這場游戲應該如何恰當地操作仍相持不下。

當然，議會畢竟不是文藝俱樂部，也并非所有歧見都是友善的。在會議廳內還是有沖突、有嫌隙、有狂熱的叫囂。比如現在，會議廳內就因為數日前共產黨總部遭到攻擊的事件而群情高漲。兩方都毫不猶疑地指控對方是煽起這次暴動的元兇。在這種政治紛爭中，社會黨，亦即共產黨明顯占有優勢。不僅因為他們屬于多數，而且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還處于少不更事的階段，對政治程序還懷抱著幾乎令人動容的理想情懷。迪米特里娜告訴我，民主力量聯盟幾乎沒辦法醞釀任何策略，因為這個聯盟的精神要求完全的誠信，不但彼此之間要有誠信，在議會中也要有誠信。

在此同時，共產黨總部的攻擊事件至少使得一個團體，也就是應該維護黨部安全的警察完全陷入混亂。或者他們不該保護黨部安全？這天上午，警察展開了一場靜坐示威，要求或者說是請求有關單位就他們在新秩序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下達明確的指令。在黨部的破壞事件中，他們因為反應緩慢和執行不力而遭到指責。不過他們遲疑躊躇，不知是否應該迅速展開還擊，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每個人都突然站在民眾的一方，那一旦民眾出于貌似自發的共同意志，襲擊昔日作為壓迫者象征的黨部，他們警察又該如何？他們應該接受誰的指令？如果只有一個主子，當警察就容易多了，每個人都知道，人民應該受到堅定、明確的權威當局的約束，不得逾矩。

我和一名議員針對土耳其人權利的談話幾經波折才成事。我們挑在一間私人休息室內進行，因為他意味深長地說：“隔墻有耳。”即便如此，他似乎還是覺得不安，有一次還指了指天花板，讓我了解，因為不可見的竊聽者，有些話他沒有辦法直說。

我不確定這種謹慎的態度是有道理的，還是出于后共產主義時代的偏執，不過這位議員紳士的舉止、柔和的聲音以及對土耳其人的同情態度，全讓我深受感動。保加利亞境內土耳其人的命運，似乎注定要么扮演殘暴的壓迫者，要么成為受到殘暴對待的被壓迫者。當保加利亞從“土耳其枷鎖”中掙得自由后，有些土耳其人決定留下來，普遍來說是最貧窮和最沒有受過教育的一群人，多半務農為生的他們畢竟已經在此繁衍數代了。但是一般人對他們的反感可謂根深蒂固。最近一輪對土耳其人展開的迫害行動是在1985年，為其助燃的與其說是民眾的偏見，不如說是當權者對民族意識所存的敵意。土耳其人在某種程度上仍維持著他們的獨立性，因此這些土耳其人會受到懲罰。迫害的方式相當怪異，在心理上卻頗為無情，即要求土耳其人改用保加利亞的姓名。有謂姓名代表了人的本質，這正是活生生的例子。土耳其人寧愿挨打、入監服刑或被放逐，也不愿做出這種自我背叛的行為。有些人被迫臣服后，卻因為喪失自我過于沉痛，最后仍不幸地選擇了自殺。還有超過三十萬的土耳其人索性逃到了土耳其，面對不可知的命運。

這些迫害所造成的傷害，是保加利亞反對勢力得以形成的土壤。自從政局變革后，有二十萬以上的土耳其人再度回歸，現在他們的命運至少在法律上已經獲得改善，雖然許多人回來后才發現自己的家園和工作早已消失。和我討論的那名議員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土耳其人的待遇，并確保他們的權利獲得了恰當的尊重。

那位議員以悲傷的口氣討論這個痛苦的話題，對受害者抱持同情的態度。因此幾天后，當我聽說這名議員當年竟是迫害土耳其人的積極分子時，簡直難以置信。原本認定的事實竟突然被推翻，讓我有點混亂。這種心境東歐人必定經歷過好幾千次，甚至時到今日也依然如此。這種震驚，不但因為發現一個表面極有道德操守的人竟然做出這種不道德的行為，也因為發現自己竟然遭到本身感知能力的全然背叛。知道自己竟可如此被感動、如此徹底地受到欺騙，感覺實在惡劣至極，因為這足以撼動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信賴。我終于領悟為什么政治上的誠信會成為如此受到強調的操守，當然，能否付諸實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旅行的每個城市，我都會尋訪當地的文藝俱樂部或文藝咖啡館，以獲取一點確定的溫情和熟悉的小道傳聞。但是索非亞作家俱樂部的小咖啡館里面又熱又擠，而且煙味濃到讓我難以呼吸，盡管在東歐已經待過太多煙味充斥的房間了，我還是不得不認輸。約好和我碰面的詩人鮑里斯·赫里斯托夫（Boris Christov）看出了我的為難，因此和我移步到樓上書店一個比較通風的地方。赫里斯托夫是保加利亞的著名詩人之一，個子很高，有著拜占庭式的長臉、逐漸灰白的胡須，以及深邃、嚴肅的灰色眼睛。他穿著印度式的襯衫和球鞋，走路如豹子般輕盈。

在這個較為舒爽的空間，布拉加·季米特洛娃（Blaga Dimitrova）亦加入了我們。她也是一名詩人和小說家，或許還算是保加利亞最知名的文壇人物。她不太會說英語，但是個性寬宏和美好的一面卻跨越了語言的障礙，自然流露。她的聲音低沉，非常放松，帶有很多氣音，仿佛在吹奏一支音質特別滑順的牧笛。這種共振經常可以在保加利亞人的聲音中聽到，難怪很多偉大的歌劇演唱家都來自這個地區。她長相美麗，總是笑意盈盈，神情間沒有絲毫做作或自滿，只有溫暖的熱誠。布拉加·季米特洛娃六十歲出頭，博學多聞。在東歐地區，這種飽學之士比想象中要多，或許因為這里沒有追求專業知識實現職場升遷的壓力吧，也或許多少是因為這里的時間比較充裕。我曾經閱讀過她的一些英譯作品：她的詩結合了感官的享受和很強的思想性；還有她的一部小說，就其出版時間和地點而言，可謂具有大膽的破壞性。在那段時期，自由書寫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大量閱讀德國、俄羅斯、波蘭和古希臘的翻譯作品。

鮑里斯·赫里斯托夫則多的是時間，因為他受雇于一家電影公司，條件是別在這份“工作”中做任何事。他對此并沒有怨言。他繼續寫他的詩，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看，他承認這種情況有種反常的優點。“我們這里的作家不需要為什么事分心，”他說，“寫作就是要專心。需要大量的專注和少量的天分。當你被關在一個牢房里，像我們這樣，就有機會專心了。”然后他又換了一個比喻以更好地解釋，他說寫作是一種沉思的方式，而這里的作家就像在“一個火箭里”，他還比了一個窄窄地上升的手勢。

不管是在火箭還是在牢房里，他們有時候都會漫游到遠古時代。我閱讀過一些他的英譯詩作，知道鮑里斯自己的詩躍動著超現實與泛神論的想象力，同時擁有自然、宗教和野性的氣質；作品里充斥著鄉間人物和半人的野獸，以及一種回旋的宇宙意識，其間無垠的空間和渺小的微觀事件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些詩篇令我想起保加利亞的民間故事，既世俗，又奇幻。

鮑里斯和布拉加兩人都很喜歡保加利亞的民俗傳統，他們為我講述鄉間口頭傳誦的非常繁復而深奧的詩歌。布拉加談到遠古的保加利亞神話，里面的諸神是非常遙遠的，比希臘神話還要遙遠，因此居間傳達遙遠神祇和人間世界訊息的大自然就變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能理解那些故事，”鮑里斯非常神秘地說，“你就會理解我們所處的深淵了。”

“深淵？”我問。“對，”他說，“我給你一個隱喻：一個深淵，底部是一個迷宮。”

這種說法已經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疇，我們的語言溝通畢竟并非完美。不過這兩位作家對其自身文化的理解與欣賞，讓我頗為驚異。在與保加利亞人的對話中，我幾乎沒有察覺到其他東歐國家人民經常表露的自卑情結。或許因為保加利亞的地理位置，自給自足，偏處一角，沒有受到當代的諸多拖累；也或許因為其文化的久遠和累積了幾個世紀的文化“自我意識”。不管原因為何，保加利亞人以別人注視下的輕松和坦蕩游走于思想世界。保加利亞的知識分子對于形形色色的西方事物都神奇地相當了解，但他們的接受似乎并非震懾于西方中心的光芒，正好相反，是出于一種他們自身獨立的自足性。

我問鮑里斯和布拉加有沒有考慮過移民。對于我的問題，鮑里斯告訴我他曾經和艾奧瓦大學的一位男士聊天，那人曾試圖提供給他一份工作，而且免費給他一座大房子。鮑里斯說：“一個人需要的是他自己的房子和他的朋友，他自己的水，自己的蘋果樹。”

“還有他自己的問題。”布拉加補充了一句，臉上帶著甜美的笑容。

“還有他自己的敵人，”鮑里斯用總結的口吻說，“我跟艾奧瓦的那個人說，如果你能在我的房子里塞滿我的敵人，我就去。一個人如果沒有敵人，那要做什么？”

接著，鮑里斯又談起索非亞處于世界中央的地位，還有我在此間所見到的那些美好的面孔，是經過幾個世紀的文化交融所創造出來的。他談論如何在古絲綢之路沿線的各種不同層次的藍色中，從印度一直追溯文化的延續性到這里；還有如何在人的笑容中追尋文化的變遷，越往西方走，笑容就變得越為開朗。

那通往歐洲之路呢？我問，借用了此刻的比喻。

“通往歐洲之路？”他狐疑地重復道，仿佛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想通往歐洲之路就在我們中間。”

“也或許在我們周圍。”布拉加說。這是我只在這里才聽到的概念。

索非亞的出租車是沒有計價器的。同樣的里程，他們的要價可以從三保加利亞列弗（leva）到三十列弗，按目前的匯率換算，亦即從四十美分到四美元。幾乎每個出租車司機的擋風玻璃上都貼著令人嫌惡的色情明信片，連我有次碰到的女司機也是一樣，仿佛這種圖片是她的職業徽章一樣。

不同尋常的是，克拉西（Krassi）的車上沒有。他在儀表板上方掛了一個毛茸茸的黃色動物和一張圣像。克拉西是鮑里斯的朋友，正載我去鮑里斯家參加一個聚會，沿途不斷以隱喻的方式發表他的觀感。

“我們以前就是那副模樣，”他指著一個相當奇特的畫面，但見一個穿著邋遢的吉卜賽人用繩子牽著一頭可憐兮兮的熊，“我們就像那只可憐的動物，被一個佯裝主人的乞丐牽著。”

或者，看到一張塌陷歪斜的長椅他又說：“那就是共產主義現在的德性。我們已經弄斷了它的一條腿，現在還得弄斷它其他的腿。”

終于，他的憤怒讓我印象深刻，因此我問他為什么那么恨保加利亞的共產主義。“因為對所有文明的問題，它都限定了答案。”

我又看走眼了，本還以為他是個天真的人。而且，對克拉西而言，“文明的答案”似乎就在這里，在保加利亞。途中，他播放了一盒爵士錄音帶，當我說我從來沒有聽過保加利亞爵士樂時，他驕傲地回答：“哦，是啊！我們這里什么都有。現在全世界都會知道了。”

克拉西剛從瑞典回來，他本來想去那里打工，但是幾乎找不到任何工作；而現在除了這個高度不穩定的出租車業外，他在這里也沒有工作。他和鮑里斯是索非亞近郊同一個小區的鄰居。“我們的牢房。”當我們駛抵那個巨大的工程時，他微笑地朝那片小區哈腰致意。確實，這片集體主義的住宅占地廣大，綿延不盡，置身其間令人頓生滄海一粟、微不足道之感。

不過，鮑里斯卻熱情豪邁，一副大統領的模樣，正式而殷勤地招呼每一個人。“非常歡迎來到我家，保加利亞，只要我活著，永遠歡迎你來。”他宣稱，舉杯敬我和另一位翻譯他詩作的美國詩人。

一位朋友在離開三十二年后，終于回到保加利亞。“他是我們最偉大、最真實的作家之一，”鮑里斯宣布，“而這兩位，”他指著我和那名翻譯，“是美國我最喜愛的散文家和我最喜愛的詩人。”

“保加利亞人只用最隆重的字眼。”那名新來者說。他曾在西方生活過，知道這種夸示的手法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又有人進來，其中之一——也許兩位——是保加利亞最偉大、非常偉大的電影導演。這些日子他們本應比較困難，畢竟補助金被中斷了，但他們的情緒仍很高亢。其中一位正在拍一部電影，講的就是他這位去國三十二年后歸來的友人。“那只是給我們自己看的，給我們這幫朋友。”他解釋道。相應地，那名放逐歸來的友人，則表示他和鮑里斯正在努力準備“一個小節目，獻給我們的朋友。他演奏小號，我負責唱歌，或許寫點新詩，為我們的朋友表演小夜曲”。

“這是我們最喜歡做的，”有人插口道，“為朋友而付出。”他們似乎真的不在意這個世界是否正看著他們。

“我們比較喜歡這種音樂語言，”那名放逐者告訴我，“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的對話不是用語言表達的吧？剩下的百分之十也只是在散播虛假信息而已。”

鮑里斯最愛保加利亞文化中的音樂部分，經常和鄉村音樂家一起進行即興演奏，還收藏了很多民謠樂器，其中大部分都有歷史淵源：其中一個是平扁的長型木質樂器，內部有兩根管子，名叫雙笛（dvoyanka），還有一種有三根管子。鮑里斯自己還發明了一種樂器，象征土耳其—保加利亞共存的可能性，用土耳其的嗩吶（zurna）和保加利亞的嘟嘟克笛（duduk）組合而成。

這些樂器有些可以吹出巴爾干農人和牧人的特殊音律所需要的雙聲部和復雜的和弦。這種音樂有狂野奔放的旋律，其復雜性幾乎難以掌握，而其音量和所采用的開放式五度和弦則需要很大的肺活量。這種時而穿透，時而纖細的音色，似乎跨越群山，或來自更遙遠的地方；而時而跳躍，時而環繞，時而復雜的節奏，先是奔放而出，再逐漸收回，仿佛一遍遍地述說著思慕之情。

“如果你聽了這種音樂，你就太了解我們民族了，”鮑里斯說，意指我將了解很多，“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藍調音樂，這些是我們巴爾干的藍調音樂。”

在鮑里斯演奏完畢后，我們安靜地坐了許久，接著美國詩人開始朗誦一些他記得的保加利亞童詩，然后大家此起彼伏地用華麗的詞匯表達高度贊許。在旅行途中，我一直追尋仍然存活的“正宗”民俗文化，卻屢屢與之擦身而過。正宗幾乎從來就不是刻意追求而能獲得的；然而一旦遇到了，你絕對一眼便能認出。

不知疲倦的迪米特里娜幫我介紹了幾個大學生，他們都屬于一個迄今仍在暗中運作，名叫“實踐”（Praxis）的團體。這群活潑、有活力的年輕人的志向，是涉獵并實踐所有形態的藝術創作。他們寫詩、寫小說、作曲和畫畫，甚至還在1989年之前極度困難的狀況下制作電影短片。

為了解釋他們創立的初衷，一位實踐的成員帶我到一個他們名之為“奇幻俱樂部”（Fantasy Club）的地方。如今回想起來，這俱樂部的全名其實也非常保加利亞，叫作“科幻小說、啟發和預言綜合俱樂部”（Integrative Club of Science Fiction, Heuristics, and Prognostics）。該俱樂部就坐落于官方文化中心內部，但直到最近，那家俱樂部都只是處于夾縫中的機構，所有東歐國家都存在類似的機構，在古怪或邊緣化的掩護下，可以討論些非官方的觀點。我見了該俱樂部的創始人，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年男子。他蓄著長發，坐在一間畫滿神秘野獸和銀河太空的旋轉圖像的陰暗房間里面。他在那群富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中間具有類似精神導師的地位。他認為科幻小說是一種高級形式，是思考未來的一種方式，也是探討道德問題的一種方式。在俱樂部內他們不但討論斯坦尼斯瓦夫·萊姆（Stanisław Lem）[[12]](#_12_11)和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3]](#_13_11)的作品，也討論“國家問題和全球問題”、“西方和東方的思考形態”、“次文化和反文化”等問題，更不用說“戀母情結的癥狀”或“性關系的未來”等了。

從實踐團體富有創造力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上述各種論調的影響。我后來又在一間沉悶的方形公寓內跟實踐的幾個人再度碰面，不過由于聚在此處的人充滿活力，整間公寓頓時活躍起來。這群人的領袖，明顯是位身材壯碩的長發年輕男子，他對藝術的愛好是全方位的。小客廳內有只阿富汗犬跳來跳去，和女主人一樣有著纖細的腿和苗條的身材。男主人是個嚴肅的年輕人，態度率真，而且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有哲學的背景。在索非亞住過一陣后，我堅信這里哲學家的比例絕對比哈佛大學或索邦大學（Sorbonne）[[14]](#_14_11)還要高。

房子主人和這個團體領袖的友情，源于雙方父母都在石油公司工作，且都離鄉背井遠赴利比亞（Libya）生活的共同經驗。利比亞有如一扇窺探世界的奇特窗口，雖然在那里覺得孤立而不快樂，他們卻也發現這世界不只是既存的社會主義；也是在那里，他們的反抗意識開始萌芽。他們的作品應該就是反抗意識的呈現，但是對我而言，卻宛如高度智慧和豐富庸俗藝術的奇特組合。他們展示給我看一些英譯很糟的冗長詩作，描繪對奇幻世界的追求，以圣杯、僧人和其他寓言化的物品為主體。然后，有人播放了一盒他們歌曲的錄音帶，立體音效，那是他們非常得意的混音技術，不過坦白說，他們的音樂在我聽來有如由新時代神秘主義和即興的肆意鋪陳、粗劣蔓生結合而成。

不過，撇開他們作品的怪異不談，創造者本身的無窮精力、坦率的態度與舍我其誰的坦蕩胸懷，使他們得以完全仰仗自身的資源，創作出這些作品，自始至終不期待任何報酬，甚至任何人的認同，這種種都令人感動。他們似乎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又或者是根本無視困難的存在。他們最新的作品是草擬了一份新的保加利亞憲法。他們把那份厚厚的文件拿給我看，內容已經翻譯成英文。草案很詳盡，思慮也很周全。他們告訴我，為了草擬憲法，大家都閱讀了許多國家的憲法，而且討論它們的政治哲學，直至深夜。

出于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認為他們的草案應該由政府接手，直接進行討論，一旦被迫等待就深感挫折。我再度為他們意愿之認真所感動。他們雖然才二十出頭，卻顯然不認為自己仍是剛體驗人生的“年輕人”，而是擁有成熟目標的成年人。這群人的領袖是個非常好，也非常憤怒的年輕人。政府的忽視更使他對加在自己身上的種種限制感到怒不可遏。他想要打破限制，甚至想要移民。

在移民問題上，我就像哈姆雷特對婚姻一樣：希望能到此為止。當然，我知道這件事的諷刺性，但是整個人口有如受到某種向陽彎曲的力量的驅使而向西和向北流動，這種連根拔起的代價與執意遷移的欲望，對我而言，儼然已臻絕望或無望之境。為什么希望總是往一個方向移動？如果我們總是在別處追尋希望，那各處的希望不是都逐漸凋零了嗎？基于這種心態，我對這些年輕人展開循循善誘的勸導：如果你想去一個新的國家尋求發展，那么你至少得辛苦十年才能立足；與其如此，為什么不在這里辛苦十年，在這里參與興建一個新的世界呢？

但是我的說法讓那位長發藝術家很生氣，語氣中也充滿不耐煩。他愿意去美國做任何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情愿去那里面對困難，也不愿在自己國家受到奴隸般的對待。“他們不尊重自己的百姓，”他熱切地說，仍指控著昔日的“他們”，“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嗎？”

“以前也許如此，但是以后應該會改變了，不是嗎？”我問。

“對，不過我只有一條命，”他說，“我不想再成為另一個迷失的一代的一分子了，這種人已經夠多了。”

屋主對他的說法表示同意，不過他的妻子沒有那么確定。她能在這里完成哲學學位就已經很滿足了，而且她認為她先生的一本結合了科幻和政治諷刺的小說不久即將出版。不過，這些年輕人都掙扎著想要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去。在他們心里，“更好”未必是更繁榮，而是更有尊嚴。他們對尊嚴的標準很高，而無論他們移民到哪里，正是這種尊嚴，這種對自己生命價值的驕傲感，必定會受到傷害。不過他們并不相信這一點。他們還年輕，他們想強悍而堅定地面對命運，展開對決，而且就趁現在。

我和一群來自克萊門特奧赫里德大學（Kliment Ohridsky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約好在水晶咖啡館（Kristal café）碰面。咖啡館旁邊的一座小公園已經成為新興波希米亞式商業活動的中心，這是政權垮臺后冒出的第一類商業活動。就像大多數東歐各地驟然冒出的這類市場一樣，陳列出來的商品質量低劣。相較之下，加州伯克利（Berkeley）的電報大街（Telegraph Avenue）儼然就是高級時尚區。手工粗糙至極的圣像復制品是售賣的主要商品，當我在一個攤位前詢問價錢時，賣主向我強調：“這個很貴，非常貴。”保加利亞人的坦誠也許不太適合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再往前走，幾個年輕人在一處室外舞臺上蹦蹦跳跳，綻放著狂野的活力，試圖用嘶啞的聲音詮釋重搖滾樂的唱腔，卻無掩其歌聲的洪亮美麗。

在悶熱、彌漫著煙味的水晶咖啡館，我和那些剛認識的心理學家一起落座，不抱希望地等待著我們所點的咖啡。我們聊起他們正在進行的計劃，和西方簽訂的契約。我再一次對他們的頭腦靈活感到震驚：剛一開放，他們便著手組織會議、國際研究項目以及比較研究，似乎沒有什么是他們所觸手不及的。言談間，我隨口提及想去城外走走。他們說沒問題，小事一樁。他們會幫我籌劃一次到保加利亞最富歷史性的城市之一普羅夫迪夫（Plovdiv）的旅行。不過怎么籌劃？為什么要幫我籌劃？我表示抗議。“我們喜歡做這種事，”他們想使我確信，“我們喜歡幫客人的忙。”他們很快決定由一個我還沒見過，叫做娜迪亞（Nadja）的人當我的向導。一個人隨即起身去打電話，回來立刻宣布娜迪亞很樂意帶我去普羅夫迪夫。就這么一眨眼的工夫，諸事已定。保加利亞似乎就是這么辦事的，簡單迅速，對他們而言，起而行比坐而言簡單多了。

第二天，我在指定地點和娜迪亞碰面，她以令我信服的熱情向我保證，她也正想去普羅夫迪夫走走。沒有問題，她先生可以開車載我們過去，唯一的問題是需要加油，能不能加到油比較不確定。不過她先生今天晚上會去一家加油站試試看。有時候晚上去排隊的話，早上就可以加到油了。排一個晚上？我不敢置信地問。喔，是啊，娜迪亞微笑著說，她先生已經習慣了。

最后，娜迪亞的先生用我的美金在一家使用外幣的專門加油站買到了汽油，那里只需要等上三個鐘頭左右，不像一般加油站要等十二或十五個鐘頭。就這樣，一個晨光微亮的晴天，我們馳騁在前往普羅夫迪夫的高速公路上。開出低矮的柳林山脈（Ljulin Mountains），周遭的景色呈現出干旱與艱苦的樣貌，路旁不是一片干燥的綠地，便是黃褐的殘莖。今年夏天，全東歐都苦于旱災和火災。隨著持續南行，樹叢漸次繁茂，開始呈現出希臘北部的風情，而此處也確實離希臘很近。不過這里也是通往伊斯坦布爾（Istanbul）的路，色雷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拜占庭人、十字軍和土耳其人的商隊和軍旅曾絡繹不絕地穿梭其間。

只是，這些豐沛的歷史在這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光禿禿的山丘間唯一的路標是一間路邊咖啡館，那是一個一層樓高的水泥方形建筑。因為那家咖啡館居然開門營業，而且供應味道濃郁的土耳其咖啡，因此對我而言，見到它的興奮之情實不下于見到任何高貴的紀念碑。過去幾個早上旅館所供應的微溫咖啡，讓我飽受嚴重的戒咖啡因之苦。

娜迪亞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可愛女孩，個子很高，橄欖色的皮膚，配上一頭濃密時髦的黑發和小鹿般柔和的黑眼，還有開朗、悅耳的笑聲。她丈夫德米安（Demian）似乎剛得了熱傷風，一直忙著量體溫和喝茶，娜迪亞開玩笑地說他太寵愛自己了。“但是我喜歡被寵愛啊！”德米安說。我的手提包里正好帶著一些我們皆抱以厚望的阿司匹林，這里阿司匹林很罕見，因此它的藥效也就更令人嘖嘖稱奇。

普羅夫迪夫是那種精神分裂式的城市，古老和新潮的分裂倍顯刺眼，因為新潮建筑實在很丑陋：市郊地帶坐落著一些生產計算機零件的工廠，接近市區的地區則蔓延著極不人性化的方形建筑，以及社會現實主義風格的旅店。

不過普羅夫迪夫的另一部分卻展現著一種無法加以分類的陌生魅力。一本普羅夫迪夫指南中是這么寫的：“舊城迎向我們的，是羅勒的香氣和古老木制品在陽光中烘烤的氣息。短而狹窄的彎曲街道上，聚集著一簇簇色彩繽紛的房子，凸窗設計層疊交錯，仿佛正相互依偎，在彼此耳邊悄聲低喃著令人輕松愉悅的沉寂和寧靜之美”，意圖以詩意的描繪彌補文法的缺失。

舊城的鵝卵石街道不但非常陡峭，還極端狹窄，房屋是所謂民族復興風格（National Revival）[[15]](#_15_11)的建筑。其所展現的美感，宛如出于一個18世紀后期或19世紀初期，從長期蟄伏中重新為保加利亞意識所喚醒的害羞孩童。由于保加利亞意識除了藝術以外，少有其他表現方式，因此在藝術方面融合了各種民俗意涵。民族復興風的房屋，通常為富有的商賈所興建，試圖結合本土藝術和工藝的不同元素，其結果是非常明確的保加利亞風格，十分美麗。舊城區的房子上層比底層寬，因此顛覆了我們對房屋造型的慣常預期，但倒也不至于違背我們的平衡感。在外觀上，這些屋子都漆著柔和的色彩，邊框則采用深色木板以示強調。在有些已經作為博物館保存的建筑內側，則極其迷人地混雜著本土工匠的手藝和大都會的時尚。這些屋子的主人有錢從旅行中帶回精致的法式櫥柜和絲緞躺椅，不過在建筑活計上，他們都是雇用當地木工，精雕細琢地展現出匠心獨運之美。屋子的天花板、門廊和窗板都采用近乎白色的淺色木材為底，雕刻著美麗、簡單的圖形，將傳統民族圖案轉換為更為優雅的紋理。每個房間的圖案都不盡相同，因為這些富商巨賈認為訴諸重復手法是件有失體面的事，會暴露屋主的想象力不足或資金短缺。這些房子中最為奢華的都屬客房部分，當時招待客人也是一種炫耀的方式。在主客廳的天花板中央，通常會有一個雕工細致的雕花圖案裝飾，作為豐饒的象征。

鎮上的大房子中，有一間過去為畫家茲拉廷·博亞吉耶夫（Zlatin Bojadzev）所有。在踏入屋子的一瞬，我發覺自己再度面對一項極品中的極品，非但超乎我的期待，也超乎我美學范疇的儲備。那間屋子目前是座博物館，用以陳列博亞吉耶夫的作品。就像他的生命有明顯的劃分一樣，展品也被分為兩大區塊。博亞吉耶夫在藝術史上是少數擁有非凡藝術生命者之一：他前半生用右手作畫，后半生，也就是早期中風發作之后，則改用左手作畫。兩只手畫出來的作品都非常好，不過在中風后，他似乎才發掘出自己完整的畫風和力量。他早期右手的作品帶有濃郁的荷蘭暖色調和厚實的塊狀畫風，描繪傳統農家生活的情景。后期作品的畫幅更大，畫風也更松散狂野，大部分仍描繪當地的村莊生活，但當地色彩更濃厚，就像在保加利亞神話故事或詩作中所感受到的那樣，同時具有質樸和幻想的元素。他的作品中包括體型寬大的農民和醋商造型，令人聯想到博特羅（Botero）[[16]](#_16_11)的超現實主義；也有類似夏加爾（Chagall）[[17]](#_17_11)風格的，如在神奇的鄉村街道上聚集著做夢的人，一圈圈農民匍匐在地祈求降雨。有張描繪博亞吉耶夫家人的群像，里面畫家本人蓄著胡須，身著西裝，面帶沉思，顯然是家族中第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祖母有如邪惡的女巫，即將坐著她宛如飛彈的長鼻子起飛；前排有個男人正在切一頭巨大肥豬的脖子，鮮血淋漓。作為第一個知識分子自有其貴重之處，那是一種屬于東歐的貴重特性，其間農業文化和現代性相互碰撞，交融出突兀、矛盾與豐饒的親密結合。

我想多了解一些博亞吉耶夫的生平和影響，但是博物館的講解員只有有限的英語能力，或許也只有有限的知識，她的介紹就像一只只會反復背誦導覽手冊的鸚鵡。“他是個大師。”她一直以緊張的語氣重復，仿佛這句話便足以讓我滿意了。“大師”似乎不只代表偉大，也是一個職業領域，比如“工藝大師”。我喜歡這種對藝術家進行專業分級的概念——為什么他們可以免于這種明顯的判別，其他人就不行？但對這位講解員來說，這似乎在暗示博亞吉耶夫超凡入圣，不是人類所能判斷或詮釋的。正因為如此，博亞吉耶夫一直像隱士似地被封鎖在自己的博物館內，不被解釋，在保加利亞境外不為人所知——但本人已臻完滿。

在一整天的起起伏伏中，娜迪亞始終維持著不慌不忙、和顏悅色的態度，輕松指揮著每一步該做的事，因此當她宣布到了午餐時間時，我們都很開心地跟隨她進入一家餐廳，在陽光普照的陽臺，置身陽傘下，享受了新鮮滿意的一餐。

午餐談話間，我發現娜迪亞和德米安對改變抱持著若干不同的觀點。娜迪亞才二十來歲，她的一名心理系同事評價她“是我們最有戰斗力的學生之一”。這句評語很難和她溫婉的舉止聯系在一起，但是最近的事件必然是她年輕生命中的主要篇章。她有個招牌動作：搖三下手，姿態優雅且蘊含著叛逆，意思是指某件事“非同尋常”。她在談起保加利亞國內所發生的情況時，便做出了這個手勢。“一聽說人們在集結，我們就趕去參加生態開放黨的聚會，噢，當時覺得好自由！”她說，“那是第一次，我們可以公開談論好多事，其他人都有這種感覺。從那時開始，每件事都改變了。”

并不是每件事都變得更容易了，遠非如此。為了買些東西當晚餐，娜迪亞必須花幾個小時排隊；她擔任研究生助教的收入，和德米安擔任初級建筑工程師的薪水加起來，才勉強付得起房租。不過我可以感受到她對生活在一個變動國家的冒險充滿了興奮，她的生命已與其緊密相連。

德米安是個比較憤怒的年輕人，對執政黨過去的行徑，以及仍在進行的作為生氣，也對自己因為缺乏技能和金錢而在工作上受到壓制生氣。他想離開，前往加拿大或希臘，娜迪亞有親人在那里。總之任何地方都比這里好。

在此同時，德米安并未止步不前。他正為干涸的保加利亞農田開發新的灌溉技術，也寫信給一家專門制造必要設備的美國公司，提議建立某種合作。他談起這些時，態度輕松自如，我已開始習慣保加利亞人的這種態度了。在他看來，事業好像會自然而然地順利發展。我不禁覺得，如果能直接把這種精神應用在保加利亞，那這個國家的脫困就指日可待了。

我們正準備離開餐廳時，一個坐在走廊說話輕柔的年長男子以神秘的口吻問我們想不想看些有趣的東西。我們當然想看。隨之而來的就是這棟餐廳建筑的參觀之旅。原來在19世紀初期，這里曾是一個土耳其商人的住宅，里面有個真正的后宮，是一片美麗的圓形空間，天花板是亮麗的藍色瓷磚，一張紅銅桌面的咖啡桌，旁邊擺放著紅色厚絨長椅，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觀望陽臺，讓屋主可以觀看自己的妻妾們在下面嬉戲的情景。這還不是全部。我們的導游又滿懷驕傲地帶著我們到下一層參觀。那是個土耳其浴場的遺址，建在依稀可見的古羅馬地面上。在通往小浴池的臺階上有幾個曲線曼妙的大型陶壺，沐浴者便是用這些陶壺淋浴。

導游堅持拒絕收錢，免費就普羅夫迪夫的古典文物為我們做了一次濃縮式的導覽。我們徜徉其間，發現到處都展現著古典的遺跡。每當意識到自己行走的地面堆疊著過去的歷史，我總是感激莫名——堆疊著成就、沖突和人類一再上演的激情與爭執，似乎永遠在變，又似乎永遠不變。世代交替有如小草。[[18]](#_18_11)遠在色雷斯人統治的時代，這里就有個小鎮，叫做普爾普蒂瓦（Pulpudeva）；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重新將其命名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隨后羅馬人改名為特里蒙蒂姆（Trimontium）；土耳其人易名為飛利浦（Filipe）。在丘陵起伏的普羅夫迪夫的一個山腳下，這個小鎮的羅馬劇院仍佇立著，廊柱和座席的遺跡比例勻稱，仍閃爍著白色的光澤，很像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Aix）的遺跡。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Trajan）在公元114年至117年建了這座劇場，后來幾乎毀于阿提拉之手。在這里意外見到這座劇場的感覺是美好的，因為漫步在這半圓形的石椅間，就宛如置身歐洲任何一個地方，保加利亞和法國，或意大利，或英國的距離與界線都消失了，曠古的時間也消融了，只剩下單純的歐洲和歐洲歷史本身，即便只是短暫的瞬間，也成為超然一統的力量。

意外啊，意外！我終于在這個莫名熟悉的偽裝下找到了你。

第二天，我們沿著陡峭的山路開上普羅夫迪夫附近一個名叫多爾尼維金（Dolny Vidin）的村莊，這里的人口組成一半是保加利亞人，一半是土耳其人。此地丘陵起伏，坎坷地布滿石頭。到處都是石頭，粉碎成尖銳的石塊躺在小徑上，堆成小丘，充當粗糙的臺階通往兩旁狀似盒子的丑陋房屋——其中許多也是就地取材，用石頭建造的。在小型中央廣場上，幾個人坐在長椅上，手指間轉動著深琥珀色的橢圓形念珠。我們坐下來跟他們聊天。他們的態度順服，兩眼看著地面，一致認為我們該會會學校老師，他會告訴我們想知道的一切。幾分鐘不到，這個人就出現了，顯然是聽說村子里來了幾個外人。他的態度敏銳且具有權威性，狐疑地質詢我們是什么人。負責幫我們翻譯的娜迪亞打消了他的疑慮后，那位老師便主張帶我們去參觀當地的清真寺。由外表看來，那清真寺只是另一間丑陋的水泥房屋，這里的信徒習于聚集起來隱秘地禱告。村子里的土耳其人不被允許建造裝飾馬賽克和尖塔的真正清真寺，只有寺的內部落寞地復制了寥寥可數的幾樣真的清真寺的元素：一個正方形房間內，墻被涂上了多種色彩，地板上鋪著層層的小地毯，一面墻上有個壁龕，里面堆放著念珠和花朵。不過建筑本身缺乏若干對伊斯蘭信仰而言很重要的細節，那位教師說，比如尖塔。現在，多爾尼維金的土耳其人總算有了指望，希望能蓋一座真正的清真寺。

有幾個人跟著我們一起進來，他們安靜地站在旁邊，態度拘謹，甚至馴服，和一般典型印象中強悍的土耳其人有天壤之別。他們似乎習于低著頭，而且顯然并不認為自己有說話的權利，整個人散發著難以言喻的消沉氣息。

當學校老師講起他們的故事時，娜迪亞又露出了她搖三次手的招牌動作。原來瘋狂的改名政策就是從多爾尼維金這里開始的，老師本人就是遭到嚴酷迫害的民眾之一。他在附近的戰俘營被關了幾個月。那座戰俘營在斯大林主義盛行的1950年代遭到棄置，但1985年又重新啟用，拘禁這批新的囚犯。最后，他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樣逃往土耳其，然后又和許多人一樣回到了這里，不過把妻兒留在了土耳其。“我們中的很多人不喜歡土耳其的生活方式，”他說，“而且那里也沒有工作。保加利亞是我們的家，我們在這里住了幾個世紀了。但還是有些人害怕回來。那些當權人物還在這里，就是毆打我們、把我們趕走的人。”

“對他們來講真是太沉重、太沉重了！”走出清真寺后，娜迪亞感慨道。的確如此。學校老師帶我們到他家。那真是處陰郁的地方，外面長滿雜草，臺階是幾個搖搖晃晃地堆起來的石塊。屋內有個小房間相當整齊，是他真正住的地方，包括一張床和一張光禿禿的桌子。房子的其他地方仿佛昨天才剛被颶風掃蕩過，或被軍隊入侵過。地板上滿是碎玻璃，一袋袋散開的洋蔥，外加本應待在衣櫥和柜子里的可憐物件——鞋子、鍋子和衣物等，凌亂地四處散落，反映出我們這個年代的凄涼景象，混亂和逃亡的景象。人們經常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收拾衣物離開，他完整地保留著這個證據，或作為證明，或作為紀念。在鄰近的一家公寓中，有張床墊靠在墻上，甚至還沒有拆開塑料包裝。主人臉上帶著一種習慣性的驚懼和沉重。“他們隨時準備走人，”老師解釋說，“我們還不確定自己安全與否，所以他們連床墊都沒有拆封。”

我們受邀到另一戶公寓中喝咖啡，妻子忙著招待我們，長相很像西方人的丈夫則和我們聊著村落生活的相關話題，他對當地政治顯然頗有野心。那妻子準備退回廚房，但我們鼓勵她留下來。她雖同意了，但我仍然看得出來，以這種她并不習慣的方式面對陌生人，對她而言是痛苦的。她兩眼低垂地坐著，顯然認定她丈夫會為她回答所有問題。長得蠻漂亮的她，衣著就像任何東歐小鎮里樸素的年輕婦女一樣，而非我在一般年紀大的土耳其女子身上所看到的傳統寬松長褲。但是我已經習慣了保加利亞完全放開、能言善道的活躍女性，以至于這位害羞、怯懦的人物仿佛來自另外一個時代。我也發現自己竟然帶著人類學家的好奇心在觀察她，畢竟她是我一直覺得有點神秘的那種沉默女性的典型，同時也在想，如果與她易地而處，我會有什么感覺。老實說，她看起來并沒有不快樂。娜迪亞試圖引她說話，但一旦我們將注意力從她身上移開，她顯然便如釋重負，接著又趁我們不注意時悄悄溜走。“對，這些都是東方的做法。”她丈夫說，顯示他是個現代男子，可以理解我們對他妻子行為的看法。

離開公寓重新走回石頭路面，一名有著沙色頭發和悲哀藍眸的年輕男子朝我們走來，自我介紹是本村代表之類的人物，主動提議陪我們在多爾尼維金走走。他名叫艾哈邁德（Ahmed），是人權與自由運動組織（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的地方秘書，也是位“藝術家”。不過從他曖昧的口氣和蒼白的笑容來看，實在很難判斷是哪種藝術家，或藝術家這個名詞對他而言是什么意思。艾哈邁德有張表情豐富的臉孔，尤其是悲哀的表情，說起話來也有種憂傷的哲學意味。他領著我們到他位于村子邊緣的“辦公室”。那是個空空蕩蕩、沒有粉刷的空間，中央擺著張凹凸不平的書桌；但艾哈邁德頗有架勢地坐在書桌后，告訴我們這間辦公室已經成為村中重要的所在，人們不時會前來請教一些切身事務。他們很多人對于自己有哪些新權利，或者怎么尋找工作都幾乎一無所知——這里還有一個一直以來的偏見，就是碰上經濟困難時期，首先被請走的，一定是土耳其人。艾哈邁德避談自己的就業情況，似乎對沒有工作感到羞恥；只談土耳其人在迫害結束后，目前仍持續遭受的傷害。最糟糕的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從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的人口中得到一句簡單的“對不起”。不過，艾哈邁德仍然相信，如果不是為了“政治”，村里的人應該可以友好和睦地相處。今天是節日，他們會宰一只羔羊作為犧牲；但在他心中，那犧牲所奉獻的不是伊斯蘭教的神明，而是愛，因為人與人之間只有愛是最重要的。他的眼里充滿感情。

“也許我是個浪漫主義者。”他說著，悲哀地一笑，儼然是個浪漫主義者。他讓我聯想到俄羅斯早期小說里經常出現的村莊浪漫事跡，這點保加利亞也不遑多讓——描繪一些溫柔的靈魂，在世界的小小一隅，懷抱遠大的理想，做著世界和諧的憂郁之夢。

那天，我們還碰到另一個浪漫人物，是艾哈邁德的一位老農朋友，在被剝奪了三十五年后，剛剛重新取回自己的土地。他的農地沿著山丘向上延伸，種了玉米和洋蔥，還有一個美麗的果園。當我們順道造訪時，他正在一棵櫻桃樹上工作。我跟從梯子爬下來的他說，能擁有這么漂亮的櫻桃，可見生命并不全然是壞事。

“啊，但是我們不能光靠櫻桃生存。”他悲哀地回應道。他是個真正漂亮的老先生，個子不高，身材精瘦，有張滿布細紋、善解人意的面孔，兩手染滿了櫻桃汁。

就像附近所有的農場一樣，他的土地在1956年被奪去成為集體農場。但是他不愿為集體農場工作，結果被痛揍一頓，遭到拘禁。對保加利亞的農人而言，接受集體化措施格外痛苦，因為在社會階層中，他們自認比蘇維埃系統中公認的貴族階級——工人——要高一等，結果現在工人反而跑來管理村莊。除了僧侶精英外，保加利亞從來沒有過任何貴族階級，農民一向是國家的中堅，一種天然的貴族。其他姑且不論，光是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對他們的地位和尊嚴就是一大打擊。

出獄后，這位農夫嘗試在集體農場工作了幾年，卻越待越痛苦。為了取代反抗的農人，農場不得不從外引進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對待土地——他的土地。發現自己實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即便痛恨山下那污染了周遭環境的錫礦工廠，他還是到那里去工作了，但由衷希望工廠會關門大吉。

“現在我終于又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勞作了，”他說，“我想要的就只是這樣。”我們直接坐在干透堅硬的地面上，他用兩手捧起一些土，讓我們看看，這就是他所冀望的一切。然后出乎意料地，他突然哽咽一聲，扭曲了表情。

有片刻工夫，他直挺挺地坐著，抽泣著，毫不掩飾他的表情。我想起一些古老的保加利亞故事，其中對土地的感情是支配一切的激情，會將人類的靈魂轉化為貪婪與執著，以及致命的沖突。不過，我仍不免為之動容，動容于這種附著于一個地方、地球上某一特定地點的強烈感情，以及到這種年紀還為某項自己所深愛、失去，許久之后又重新取回之物哭泣的能力。雖然過去可以挽回，但畢竟無法全部挽回，至少會殘留若干遺憾，遺憾自己所錯過的機會，以及永遠逝去的那段歲月。

“共產黨！”我們往回走時，德米安憤怒地踢了樹一腳。艾哈邁德手中提著一桶櫻桃，是趁我們談話時摘的。他告訴我們，那個農夫是他們土耳其人覺得可以信任的。“我們通常知道誰是好人，”他說，“他很孤獨，不多話，但是我們知道他有他的優點。心地很好。”

土耳其人很少擁有土地，也就沒有什么可以取回的。他們在錫礦工廠做些技術性不高的工作，有些人還在附近的煙草田當季節工。艾哈邁德有很多時間，因此自愿帶我們過去參觀。我們沿著一條石頭密布、塵土飛揚的道路行駛，來到一片遍布塑料帳篷的農地，帳篷內懸掛著風干的煙草葉。附近不見人煙，無情的烈日和濃郁的煙草葉融合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氣味，我們在里頭待上幾秒鐘就都受不了；但是在這里工作的人，似乎主要是婦女，卻能在里面一待就是幾個鐘頭。德米安一副要暈倒的模樣，娜迪亞則“非同尋常”地搖著手。

歸途中，艾哈邁德帶我們參觀一間保加利亞豪宅旁的壁畫，告訴我們那是屋主委托他畫的。我很驚訝該壁畫所顯示的功力，但艾哈邁德說那幅畫讓他惹上了麻煩。壁畫上是一個非常程式化的、身著長袍的女人，畫風比較接近抽象圖案而非實際人物，而讓艾哈邁德惹上麻煩的是那女人的胸部。如果近看的話，那胸部的圖案似乎隱含有土耳其的半月形象征，有些人從中解讀出了民族情感。結果，艾哈邁德被要求離職，至少他是這么說的。實在是因為他的態度略有閃爍，讓我不禁有點懷疑他話里的真實性。那壁畫真的是他自己畫的嗎？

多爾尼維金的晚間披上了粉紅的色澤。我們正準備離開村莊時，艾哈邁德突然在街上站定腳步，態度變得非常正式，邀請我們“去他家作客”。娜迪亞很快告訴我們，這是有關名譽的事，因此我們也鄭重地表示接受。他公寓大樓的入口處有種在村里許多人家門口普遍存在的、讓人好奇的凌亂感，一扇門被扯開掉落在一旁，四處散置著玻璃碎片和尖銳的鐵絲，仿佛屋外情況跟屋內住戶的精神狀態沒有關系，內外的區分是突然而完全的。

不過屋內是個頗為體面的房間，整齊的上下鋪，一張鋪著桌巾的長桌。艾哈邁德的室友是個安靜的年輕男子，幫我們端來美好的咖啡和質地堅實、味道甚美的辮子面包。艾哈邁德用夢幻的語氣談起加州，他有個叔叔在那里，答應邀請他去，他可以在那里的一間藝術學校修課，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接著他又把希望寄托在祖父身上。他的祖父德高望重，是個受人尊敬的醫者，如果他能治好一個患有癲癇的小男孩，就有可能致富。目前他正嘗試采用一種特殊的藥劑，包括讓一條蛇吞食一只青蛙，再拿那條蛇的毒液注射……

言談間，艾哈邁德取出一張他想為村落設計的清真寺的草圖。我為自己先前的懷疑感到慚愧。那張畫出奇的好，筆法細膩，有點皮拉內西（Piranesi）[[19]](#_19_11)的畫風。我問他對土耳其或伊斯蘭的傳統了解多少。似乎不太多。村里的土耳其人慶祝節日，大部分都去隱秘的清真寺進行，有時還會祈雨；但是閱讀《可蘭經》是受到禁止的，大部分年輕人要想知道經文內容，還得靠年長者的口耳相傳。“保加利亞人擔心我們會成為狂熱分子、原教旨主義者，”他笑了笑，“但是我們不會的。我們跟其他保加利亞人一樣，我們是現代人。”

在我看來，現代和前現代混合成了一種奇特、令人困惑的組合。在我們談話期間，艾哈邁德用一枝粗鉛筆在紙上不斷勾畫，并在離開前讓我看他的畫作——又是一張技藝極佳的畫，畫著一個標準的土耳其人，還附有一段以保加利亞文寫的話——因為保加利亞文很像俄文，所以我看得懂——表達了他的兄弟之情，以及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相互理解的企盼。

不過當我們道別時，他的心情變了，變得更為憂郁。“如果你要寫本書描述這里的情形，我已經幫你想好一個題目了，”他和我握手時說，“我認為你可以叫它《希望之后的那年》。”接著我們就離開了，他的神情則從憂郁轉為消沉、沮喪。他把他的夢想、理念和愿景都告訴了我們，現在他必須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和昨天相比一成不變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我們往南進入羅多彼山脈（Rhodope Mountains），在古老的巴奇科沃（Bačkovo）修道院停留。這里的山急劇上升，形成墻面般的石壁，垂直探入深谷，溪水奔騰，泡沫翻攪。修道院佇立在山頂，宛如另一塊特別方正的巖石。

保加利亞有許多這類堡壘似的修道院，有些已經超過一千年了，它們對保加利亞文化的存續起了關鍵作用。當其他所有地方的學問和文獻被消滅殆盡時，這里的卻得以保留，民族的情感也可以在這里自由表達。事實上，在土耳其入侵時，巴奇科沃修道院也曾被棄守過，直到第7世紀，僧侶才再度回歸。許多修道院不只是靈修中心，也是秘密活動的基地，經常庇護法外之徒或農民黨人，那些人在山區流竄，企圖從土耳其占領者手中奪回自己所有之物，或報復他們加諸保加利亞家庭的勒索性重稅和明目張膽的掠奪。農民黨內有不少女性，包括游擊隊小組領袖在內。幾個世紀代價慘重、不屈不撓的抵抗——保加利亞人的抵抗，并不亞于波蘭人或匈牙利人。

除了為農民黨人提供庇護之外，修道院也是保加利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道士也不像其他天主教修士，很少耽溺于苦行的虔誠修行。在保加利亞傳說和民間故事中，修道士經常以有罪的凡人形象出現，趣味成分遠多于神圣的意涵。在修道院所保存的文學作品中，也包括淫穢、寫實的日常生活描繪。有人曾說過一套修道士的穢言穢語給我聽，充分展現了保加利亞語言的豐富性。

前往巴奇科沃修道院必須徒步走一條長長的陡路，經過一個巴爾干市集，兩旁攤販賣著落花生和葡萄干，不配套的棄置衣物，以及一般常見的漆工很差的新做圣像。修道院本身是個美麗的地方，結合了豐富的古老建筑和裝飾，以及未經開發的清新自然環境。其基礎構造甚至可以遠溯到1083年，即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巔峰時期。[[20]](#_20_11)整座修道院包括幾個禮拜堂、教堂和宿舍，彼此以拱廊和庭園相連。讓我頗為自得的是，我現在已經可以從中認出若干民族復興風格住宅的建筑元素，它們日后不斷出現在各種建筑上；每種文化似乎都有這類標志性的形式，可以讓人從中窺探到它的世界觀。裝飾過的木制陽臺銜接在石磚建筑上，上層建筑突出出來，還有羅馬尼亞修道院常見的美麗的外墻濕壁畫。

在一座教堂外面，有一群人正等待著受洗。執事揮手要我們進去，我們就這樣一腳踏入了另一種漫無目的的徐緩時空。小禮拜堂內陰暗涼爽，從地面到天花板，乃至圓柱形的穹頂，都布滿了12世紀的壁畫，給人一種小巧豐盈的感覺。執事和德米安坐在一旁壁龕式的靠背長椅上，隔著高高的隔板低聲談話，無意間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構圖，宛如柯特茲（Kertész）[[21]](#_21_11)或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22]](#_22_11)所拍攝的影像，讓我頓生這樣的印象：這位身穿黑色法衣的執事，袖口帶有污漬，白色的胡須未經梳理，噘著嘴像帶有不滿，終其一生都在長椅一角，輕聲細語。低語間，只見德米安拿出一個打火機給執事看。那位執事顯然沒有見過這玩意兒，打了幾次都沒有點燃。

我們等待著。大約四十五分鐘后，執事才勉強起身，點燃幾根蠟燭，提起一些靠在遠古壁畫旁的水桶，裝水準備受洗儀式。“開始以后，十五分鐘就結束了，”他告訴我們，“神父不會浪費時間在這種事上。”

終于，身穿華麗袍子的神父進來了，系著一條繡有金色花紋的藍色緞帶，身后跟著等待的群眾。小小的空間馬上充滿了歡樂的嘈雜聲。嬰兒們哭泣，母親們滿面笑容。受洗儀式的確簡單迅速，有如在文件上蓋章一樣。每名嬰兒用水澆三次，在額頭上比個十字架標志，然后立刻用守候的家屬帶來的毛巾包好。有兩個青年男孩和兩個成年男子也以同樣的儀式受洗。“共產黨”，德米安憤恨地低語。最近這些前朝權貴分子紛紛受洗，表示他們只是平民百姓。不管是不是黨員，那兩個男子和男孩都笑咧了嘴，對于背上被滴上幾滴水似乎很開心。接著，大家手牽手，圍成圓圈行進，神父相當敷衍地比著祝福的姿勢，然后大家散開，談笑聲四起。在這間小教堂中，沒有什么神圣的氛圍，動作利落的神父和不耐煩的執事尤其如此。不過，盡管新近流行信教，但據我了解，保加利亞人整體而言是一個適應性很強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們所能見到、碰觸到、感覺到的一切，而非現實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對此頗感惋惜，他們認為一個強大的教會和強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蘭那樣，是對付共產主義最好的解藥。不過保加利亞這種腳踏實地的經驗主義，應該跟我在此間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關，人們不會受制于自我意識、自我扭曲和自我懷疑。娜迪亞曾研究過孤獨的主題，那天稍后，我問她保加利亞公認的社會病態是什么。呃，孤獨是其中之一。然后，她想了一下，回答我：抽煙。總體而言，這似乎是一種頗為田園牧歌式的狀態。

我們從巴奇科沃修道院直接開車前往普羅夫迪夫火車站，接著我再自行乘車前往位于黑海沿岸的城市布爾加斯（Burgas）。保加利亞的交通網絡使我得以用這種輕松的方式規劃整個行程，因為迪米特里娜是布爾加斯人，而且正好在當地探望她的父母，剛好可以跟我在那里碰面。那天天氣酷熱，光是站在艷陽高照的普羅夫迪夫火車站便已令人覺得不舒適。德米安抱怨身體不舒服，他和娜迪亞兩人都很擔心火車上的情況。果不其然，那趟火車之行活像一場噩夢。車廂內的溫度一定超過了華氏一百度[[23]](#_23_11)，而且人滿為患，車廂里和走道上全都是人，空氣中也繚繞著香煙的煙霧。所幸我瞥見了一個狹窄的位置，趕快比了個想坐下的手勢，車廂內的其他人馬上彼此擠緊了一些，一個人還坐到了另一個人的膝蓋上，讓出一個比較大的空間。我坐定之后才發現，這個車廂里全是一群年輕人，或者應該說是大男孩，說著俄語，全都是從西伯利亞來的。于是我們用我十分基礎的俄語和一些泛斯拉夫的語言溝通，在整個一共四小時的旅程中，就我理解，他們不斷贊揚西伯利亞文化的優點，還輪流喝一瓶看上去污濁的飲料，玩牌而且不停地抽煙，然后大剌剌地靠在彼此肩頭睡覺。他們偶爾會胡鬧，對我倒是都維持著良好的禮貌。只有一次，其中一人用挑釁的語氣說了一些話，不過其他人很快就讓他閉上了嘴巴。然后，在車行了大約三個鐘頭時，他們從頭頂的行李架上取下一把吉他，開始唱歌。

我的天啊，他們真能唱！他們唱的民謠，從節奏性的朗誦開始，然后上升到一種純粹抒發內心情感的音樂，歌聲中有種穩定強烈的力量，足以穿透人類尊嚴的核心。即使他們當中最令人討厭的那個小流氓，老是大聲侮辱其他人，還差點和人打起來，竟也因為率真、有力的抒情歌聲，使得整個人發光發亮。單憑這項俄國人的天賦，我便可以原諒他很多事了。這些人究竟使用了什么辦法，竟可以唱出這等歌聲啊。

然后他們收起吉他，每個人都將注意力集中于那瓶恐怖的飲料，以及相互喧鬧上。他們告訴我，他們從早上開始就沒有吃東西，而現在已經是晚上了。他們是在保加利亞“打工度假”，不過做些什么則含糊其詞。在我下車前，他們告訴我，我應該去拜訪他們的國家，我一定會在西伯利亞發現美麗而文明的文化。由于車廂里的熱氣和煙味，我暈暈乎乎地下了車，筆記本上多了幾個西伯利亞的住址。

慶幸的是，布爾加斯的空氣涼爽，帶有咸味的微風，立即顯露出海邊都市的特性。迪米特里娜和幾個朋友在火車站等我。他們的晚間節目已經開始，而且毫不猶豫就把我拉入了他們的團體。我們沿著一個賞心悅目、樹木林立的海濱步道走回他們經常聚會的文化俱樂部，剛剛他們就是從這里到車站去接我的。布爾加斯是一個典型的東歐城市，就像波蘭的扎科帕內（Zakopane）或匈牙利的圣安德烈（Szentendre），波希米亞的傳統深植于周遭的一切。俱樂部既是文藝沙龍，也是文藝界人士的庇護所，里面有幾個房間，裝潢成保加利亞民俗風格，其間洋溢著對話聲，人們在桌子間穿梭，和朋友打招呼。

迪米特里娜雖然住在索非亞，但她是從布爾加斯選出的議員，因此前來此間有走訪選區的意味；但是對大家而言，她主要仍是個老朋友，因此她這桌的氣氛友好歡樂。就像所有這類俱樂部，這里也有它的重要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斯多依鳩（Stoicho）。他既是自由投稿哲學家，也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眾多學子所推崇的大師。斯多依鳩蓄著胡子，身材肥胖，充滿活力，待人友善，在許多方面都極具洞察力——屬于東歐盛產的那種同時具有政治參與和旺盛的好奇心，且因觀點挑戰禁忌而讓人激動顫抖的知識分子。

此刻，斯多依鳩正在思考文化差異的本質這個相當當代的話題，不過，他提出了一個頗為本地性的原創視角，認為每種文化都有其對話形式，關心的問題和興趣點也與其他文化中的談話主題不同。再者，斯多依鳩認為，每個文化的對話都有其獨特的韻律，亦即一種文化情感的主要旋律。保加利亞文化的旋律表現在音樂中，每一小節都是三對四的節奏，而每一小節間也是三對四的節奏，這種延移、這種強烈的不確定性，正是保加利亞性格中一個很根本的東西，亦即對模糊性的接納，對既定事態的接納。

對模糊性的接納，我曾聽匈牙利人談論過這一點，也曾聽羅馬尼亞人談論過。也許這種接納是這些地區的特征，畢竟這些地區都比較接近東方。不過這個理論中關于音樂的部分，我想只能來源于保加利亞，這里的韻律古老而有力，音樂之神俄耳甫斯的七弦琴仍然鏗鏘有聲，余音繚繞。

接著，斯多依鳩又興致勃勃地告訴了我們一些導致誤會的國際會談。最近在布爾加斯舉辦了一場哲學會議，會中英美哲學家只想談論政治，而令他們失望的是，保加利亞學者只想討論前蘇格拉底哲學。斯多依鳩覺得西方人很“荒謬”，這畢竟是一場哲學會議啊。總之，不管多么國際化，他都不希望他的學生們追逐流行，而希望他們能追隨自己的信仰。“你必須有自己的臉孔”，他是這么說的。

我再度對保加利亞在這方面所展現的自信以及對自我信念的堅持感到震撼。斯多依鳩隨后又談及另一則有關外國人的軼事：“有些美國顧問來這里，為我們該如何舉辦選舉提供咨詢。他們對于事實和公眾形象的劃分似乎特別注意。所以最后我問他們，我們到底應該強調哪一樣？他們居然回答：形象，永遠要注意形象。”

“這我不意外。”我自認聰明地回答。

“不錯，不過這完全誤解了我們這里的人的心態，”斯多依鳩說。

“人們已經厭倦了謊言，他們想要真實的東西。”

我心想，噢，那很好啊——不過很快，保加利亞人追求事實、追求真誠的性格立即報應到我頭上。

一個身材高挑的戲劇制作人從桌子另一方傾過身來，熱切注視著我問道：“現在，你是在辦正事呢？還是純粹享樂？”

這個問題的威力之大，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實旅行途中這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徘徊不去。每個和我從事類似工作的作家，體內都抱持著這樣一種復雜的懷疑或近乎不真實的感覺，以至于時時有種罪惡感。我喜歡圍著這張桌子而坐的每一個人，事實上，我也很享受和他們共處；但是無從否認的，我內心一角始終維持著身為一個觀察者的距離，觀察周遭發生的每件事。

幸虧桌旁有其他人好心地試著請問我話的人打住，別再說了。“不要把我扯進這個問題。”他們一個接一個重復著這顯然是選舉口號的話，完全可以理解為何這個真誠的問題會讓我覺得尷尬。

“你懂吧，這是對形象的執著，”斯多依鳩說，“他們想知道這里發生的事情是否真實。”

我急切地表明寫作這個行業在工作和日常經驗之間幾乎沒什么分別，這已經是我所能做的最貼近事實的表述了。我們又討論了一下這個問題，看得出來桌上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短暫關系的復雜性和其所可能造成的誤解，也因為有這層理解，我們觀察者和被觀察者、訪問者和被訪問者之間假定的不對等關系，就這么自然而然地消散了。我不是冷眼旁觀者，他們也不是沒有覺察能力的個體。我們一同分享此刻小小的兩難之境，當一切終了，我們有了一次普通的、真正的對話。

迪米特里娜邀請我留宿她父母家，我們在其他所有人的陪同下，穿過涼風舒爽的街道，來到一棟標準的東歐式公寓住宅，拜其地方性的小規模所賜，看起來不那么沉悶。迪米特里娜的父母以我逐漸習慣的坦率方式歡迎我。她的父親熱切地跟我握手，母親則露出熱切歡迎的笑容。迪米特里娜的父親是工廠工人，是一位勞工階級的老式共產黨，也是目前新成立的社會黨最忠貞的骨干。他和女兒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但一樣互相尊重、感情親密。一張迪米特里娜的競選海報驕傲地懸掛在客廳里。她的母親是希臘裔保加利亞人，當地就有一個很大的希臘社區，她是這里的治療師。迪米特里娜告訴我，就在當天早上，她母親還被請到樓下去為一個病情相當嚴重的鄰居看病。她開出的處方是間歇性的饑餓療法，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治療方式。迪米特里娜斬釘截鐵地說，就算是沉疴重病，這些療法也一樣有神奇的功效。

今年夏天，布爾加斯每天只供應幾個鐘頭的自來水。沒有人知道水何時會來，不過一旦水來了，消息馬上就會傳遍整個市鎮，大家趕緊跑回家洗澡，然后用水桶儲水備用。傳言說那天晚上稍晚些時候會有水。在此同時，迪米特里娜的父親端出絕佳的晚餐，有保加利亞主食之一的豆子湯、沙丁魚與西紅柿沙拉。迪米特里娜回想起她在這里的成長歲月，渴望求知，想要主宰一切。她仍然有追求自我完美的強烈愿望，在議會工作之余，仍試圖抽出時間閱讀和寫作。她育有兩個小女兒，不過當我詢問在保加利亞的情況下撫養孩子的困難時，她回答：“喔，并不困難啊！他們就在你身邊成長。你只要讓他們長大就好。”當她不在家時，她的先生克拉西會照顧孩子。她說其實克拉西比她更有耐心。當他們兩個都很忙時，孩子就去跟克拉西的父母小住，他們在鄉下有間房子。

那天夜晚，自來水果真來了，我們趕緊把握用水時間輪流使用。在那間小小的公寓中，每個人都極其慷慨地接納我的存在，而這種情境轉變對我而言似乎尋常之至。我似乎再次習慣了幼年時親友間的熱絡關系，不然，就是保加利亞人穿透困難屏障的天賦實在具有感染性。

迪米特里娜和她的朋友們喜歡結隊旅游，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加入他們隨興的旅游團，游覽布爾加斯和周遭地區。冷戰期間，保加利亞黑海海岸屬于東方集團，而里維埃拉（Riviera）[[24]](#_24_11)則屬于西方集團。對數以千計的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的年輕人而言，能到黑海避暑是最浪漫的假期。權貴人士和大學生在此各有其指定的海岸區。此處令人向往的另一個原因，是可以在海邊遇到西方游客。許多年輕女性前來這里，其實懷著不只是浪漫，而是實際的期盼，希望能遇見某個人，隨后帶她們前往“另一邊”。她們經常能夠如愿，所以這里的海岸便以成就諸多羅曼史和婚姻契約而聞名。最近因占有匯率優勢之故，多數是奧地利的游客。至于其他東歐國家，則因為鐵幕已經打開，前往西方之路，不管是兩廂情愿還是爾虞我詐，都已改為以搭乘夜間火車或顛簸的大巴為主。

我們在陽光海岸一個相當美好的度假村徜徉了一陣。那里的旅館強勢地突出在白色沙灘上，但海灘并不擁擠，民風也不保守：人們穿著泳衣來回其間，態度輕松，不會遮遮掩掩。海水看起來非常清澈，但別人信誓旦旦地告訴我這里已經今非昔比，因為布爾加斯的工業造成了嚴重污染。啊，同樣的議題遍布全球。

不過，迪米特里娜和她朋友阿內利亞（Anelia）此刻所討論的是她們的私生活，這個議題永遠是最重要的。阿內利亞已經離婚，正在談一場姐弟戀。提起男友時，她顯得非常浪漫，也非常坦白。她想要跟那個男人生個孩子，很擔心他會離她而去。一向很有主見的迪米特里娜不理解阿內利亞為何需要那個男人。不過阿內利亞并不打算質疑自己的情感，她是又一個浪漫主義者，把自己完全交付給情感。“你對愛情有什么看法？”聊著聊著，她突然問我，一臉的夢幻神情，卻非常熱切，仿佛這種問題是有答案的，或仿佛有誰可以提供某種終極啟示似的。但是我回答她，對于這個問題，我懂得并不比她多……

但是阿內利亞和她的情人在公開場合的言行舉止卻極其謹慎。當我們一起漫游時，他們表現得好像不太認識對方的樣子。這種公開和私下的清楚區分，對他們而言似乎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維持自尊的本質，就是絕不讓自己的私生活公開化；但在自己可以信賴的小圈子中，卻又可以坦誠相見。而我之所以被歸入其中，或因我是迪米特里娜的朋友，也可能因為我是外國人吧。

在陽光海岸之后，我們又前往索佐波爾（Sozopol）這個位于布爾加斯南方一個小海岬上的市鎮。繼在普羅夫迪夫碰到種種意料之外后，我感覺自己在索佐波爾又撞見了異國風情。這個迷人的小鎮曾經是遠古的阿波羅尼亞（Apollonia），亦即希臘最古老的一個殖民地。當地還曾矗立一尊巨大的阿波羅雕像，在該城遭洗劫后，雕像被運送到羅馬。如今，這里猶如一方小巧獨特的寶石，幾乎全部是保加利亞文藝復興階段的古老房子，淺褐色的木料散發著淡淡的溫熱海水的氣息。整個市鎮都浸淫于這種屬于更北方土壤的淺褐色澤中，彌漫著芳香的氣息以及南方的陽光。索佐波爾已成為行家眼里一處相當時髦的休憩地，許多文化盛會也打響了它的名號。在海岬的一側，海水拍打嶙峋的巖岸，掀起光亮的水藍與泡沫的晶白；在另一側，則有一條蜿蜒的海濱步道，路旁種著無花果樹，樹干幾乎呈直角地伸向海面，仿佛想用寬大葉片的葉尖碰觸水面似的。在這美麗蜿蜒的步道，溫暖的空氣中飄散著樹木的幽香，混合了海水與陽光，訴說著一種神秘的南方氣息，一種感官上的圓滿。

那個晚上，我們小團體中一個為當地報紙撰稿的記者宣稱想要采訪我。頓時，我們的世界變成一種交互采訪的莫比烏斯帶[[25]](#_25_11)，訪問者和被訪問者的角色不斷轉換，無縫對接。那位記者主要想知道我對他的國家有什么看法，但出于某種原因，我們無可避免地聊到了東歐反猶主義的話題。那位記者說他無法理解，比如波蘭為什么會有反猶主義，“明明那里有那么多猶太人”。

這是一種獨特的保加利亞觀點，因為保加利亞似乎是在反猶主義上難得清白的一個國家。保加利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保全，是那段黑暗時期一項幾乎被埋沒的偉大事跡。因為站在德國這方加入的戰爭，因此保加利亞政府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被要求將住在國內的二十萬猶太人驅逐出境，但保加利亞當局力抗這個壓力。鮑里斯國王（King Boris）將許多索非亞的猶太人遷移到鄉間比較安全的地區；議會中亦有對德國要求的抗議；保加利亞東正教主教甚至熱切地宣稱，如果他們國內驅逐猶太人的火車開動，他個人將在第一節車廂前臥軌抗議。結果，幾乎所有保加利亞的猶太人都得救了。

我告訴他們當我第一次聽說這些事跡時，心中多么感動，他們也同意，那是他們國家值得驕傲的一項義舉。然后他們改變話題，問我之所以能在《紐約時報》工作，是否因為我是個迷人的女性的關系。當然，他們這么說讓我受寵若驚，不過我向他們解釋，我們是不會因為這個理由而被錄用的；即使因此獲得錄用，對我們也不是一種贊美……

解釋，相互解釋。有時，當我瞥見一絲細微但明顯的差異時，不禁懷疑我們到底能多么完整地闡述自己。

\* \* \*

迪米特里娜、阿內利亞和我再度回到布爾加斯的文化中心，不僅因為那里保證可以喝到咖啡，也因為我們約好和一個據稱是許多布爾加斯藝術家的“繆斯”的女子碰面。聽說那女子非常優雅迷人，是個“精致的女人”，迪米特里娜這樣強調。待我親眼目睹，發現那位“繆斯”比我在此地所見的任何人都精于化妝，舉手投足間不無搔首弄姿之處，還有刻意展現某種風情的意味。她自認是個浪漫的人，有些惺惺作態地告訴我們她目前正在寫的詩，以及和某位天天見面的男士之間書信的往來，因為有些事只能用寫的方式表達。其他人顯然都很崇拜她，認為她非常有女性美；不過對我而言，這些人自身的坦誠，毫不狡詐或矯作之處，好像才展現出更有力的女性美。

最后，話題轉向政治，三位在布爾加斯當地都具有一些影響力的女性，開始研究誰應該出來角逐即將來臨的地方選舉。她們提起幾個名字，然后又都否決了，因為那些人太想掌握權力了。

我問，在政壇，就某種程度而言，不是就該想要掌握權力，或至少知道怎么運作權力嗎？

對，繆斯回答，不過她看得出來，哪些人追求權力是為了造福人民，哪些人又只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她提到的那個人，呃，他太過于汲汲營營，忙于推銷自己，企圖討好每一個人。不，她們想要的人選至少得表現出不是那么想要當選的品位。

我問她：你或阿內利亞不能出來參加什么選舉嗎？

兩個女人都搖搖頭。我們都太貴族了，繆斯終于回答，微微嘟著嘴。太貴族，以至于無法出面爭取一項我們可能無法爭取到，或可能表現不夠好的職務。尊嚴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強求，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

在我與東歐人的言談間，這已然成為一個熟悉的論調，即對權力的新清教徒思想，部分源自過去數十年所孕育出的強烈反感，部分源自存在已久的對野心的不信任。從共產黨分配權力時期沿襲而來的一項假定是，同意參加權力游戲的人，幾乎就自動成為可疑分子。從更穩定的封建社會所傳承而來的古老思潮，則認為那些企圖攀爬社會階梯、超越自己或突破限制的人，要么是道德操守有問題，要么就是笨蛋。

就這種邏輯而言，高貴的政客是一個矛盾的詞句，而誠實的統治則是無從想象的謬思。雖然大部分時候，政治實務確實符合這個可悲的前提，但是在這幾趟旅行中，我經常思考，在我們綜觀情勢時，需要容許可能的政治藝術，亦即政治應被視為一種可能性的藝術，而不是一種理想或妖魔。

事實上，那天晚上稍晚時候，我便見證了一個對我而言的良好政治的可行典范。那天晚餐，一群人快樂地聚集在餐廳，迪米特里娜在離開布爾加斯之前，決定向她的友人說明議會最新情勢的進展。她開始說的時候，話聲柔和，但隨著她繼續，聲音和神情都越來越有力量。皺著眉頭的她，展現出一種極其專注的政治魅力。她不是在為觀眾而表演，但每個人都極其專心地聽她述說。她畢竟是一個完全值得信賴的人，是他們所認識的人，也是一位政壇人物，其中并無沖突之處。“不好意思，我必須用保加利亞語說，”她一度轉向我解釋，“我想讓我的朋友知道現在政壇的情況。”就這樣，她想讓他們知道現在的情況。然后，她又回到她的話題，繼續說。我看得出來，她在架構不同面向，直到每件事都條理分明，清晰呈現。

我在保加利亞時，一直想到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26]](#_26_9)和她的杰作《黑羊與灰鷹》（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那本書講的是南斯拉夫而非保加利亞，但是在這里，我卻可以活生生地見證她所描繪的諸多感受。1936年，韋斯特前往南斯拉夫旅行，原本只是單純的出于工作所需，但她卻愛上了所目睹的一切。1937年她重返南斯拉夫，追逐她當初的迷戀和直覺，探尋她所愛的究竟是什么。她丈夫一直逼問她為什么堅持要回到那里，她的回答幾乎難以言喻，或神秘難解。她告訴他，南斯拉夫是“一個每件事都可以理解的地方，生活模式誠實無欺，使得迷惑根本無法立足”。她試圖和丈夫溝通，不怎么成功地描繪在當地所感受到的一種難以描繪的圓滿、一種充足。她丈夫問她這種感受來自哪里，她回答：“喔，那里有一切，除了我們自己有的。不過我們擁有的似乎太少了。”“你的意思是，英國擁有的很少？”她丈夫追問，“或者整個西方？”她令人難以置信地大膽回答：“整個西方。”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南斯拉夫，是近期連串暴行之前的南斯拉夫。不過我一直在想韋斯特在那里究竟找到了什么，因為我在與南斯拉夫相鄰的巴爾干國家也感受到了這種難以描繪的完滿。我是透過種種不完整、短缺和年輕人的憤怒——麗貝卡·韋斯特之前也在南斯拉夫發現了許多憤怒，以及政治的紛擾和憤慨感受到的；是在人們坦誠的面孔以及不和其他人比較的傲然自信中感受到的；是在每件事的泰然處理與執行，沒有小題大做或患得患失中感受到的。他們似乎有本事可以消除許多起心動念和實際行動之間的緊繃關系。

當然，即便是在1930年代，南斯拉夫也不能算是什么人的政治典范，這點麗貝卡·韋斯特是深深了解的；而就任何寬松的標準而言，保加利亞也絕非人間天堂。但是我在這里的許多人身上所見識到的那種人們與自己、與世界直來直去的關系，以及由此釋放出的坦率的能量，在我看來，實在是一種重要而深刻的自由形態。

對不知情者而言，1991年夏天的索非亞似乎是一個物資匱乏之地，但是在二度造訪時，我卻看到了進步的標記。某個晚上走在安靜荒僻的街道上時，德揚指著一些新的私人商店要我看，我驚訝地見到一家化妝品店里擺放著成排的洗發精——先前這里根本沒有洗發精，洗發精仿佛是樣神奇的東西，足以代表最新潮卻又相當節制的東歐唯物主義。

“我們很快就進入后現代狀況了。”德揚說著，帶著我穿過一個室外商場。只見一片歪倒的簡陋木屋和臨時搭建的柜臺上，雖然極其刺眼，卻包羅萬象地展示著各種種類、樣式和地區不同的商品。手工陶器和萬寶路香煙爭相陳列，一張報紙上散置著向日葵種子，旁邊則是精密的電器工具。一個垃圾桶翻過來，成了賭博的場地，隨之因為一場短暫的扭打和一名友好的警察的介入戛然而止。賭客紛紛作鳥獸散，不過警察一轉身，他們又立即回來。再走幾步，一名手提公文包的東正教教士正饒有興味地看著另一群賭客，幾乎完全不在乎自己應該樹立什么榜樣。

當然，如果被定義為異質元素的雜亂堆棧，那么后現代主義其實一直存在于我們周遭，甚至存在于東歐看上去最單一的時代。這里始終有猶太人、吉卜賽人、土耳其人，以及各種混合的語言與其他時代的蛛絲馬跡，甚至在此間的居民也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只是現在這些歧異終于獲得承認，這種注意到斷裂與差別之處，而非盲目追求穩定與同構型的承認，方使東歐正式踏入我們這充分異質性的世界。

德揚過去一年經歷了若干失望，至少十年的熾熱希望與破滅期待都混亂地壓縮在了這一年。編輯的報紙因為沒有經費，始終未能發刊，他現在在一個以研究和發展民主習慣為宗旨的新機構“民主中心”上班。某個早上我找到他時，他正在接待一個中國代表團，接著又是另一個從丹麥來的團體。這個世界對于東歐版的民主實驗逐漸感到好奇。

在過去一年中，他也曾出外旅游，到美國這后現代之都進行了短暫的訪問，對那里無所不在的大眾文化，也就是“適用于每個人的文化”，以及一種特殊的、源于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無須永遠謹守一定的規范而獲得的自由皆頗感神奇。“那里給我一種感覺，好像可以隨時走出家門，然后消失。”德揚夢囈般地說。我告訴他，就我而言，這種沒有規劃的自由其實也有潛在的危機。就像我們會苦于過分強調協調和象征主義，可一旦缺乏，又會感受到一種失范。也許有用的自由和良善的社會的意義之一，便是找出一種快樂的象征性平衡吧。

這回遇到迪米特里娜時，我發現她言談間反常地沒有耐性，甚至還有些厭倦。在經歷困苦的秋季和冬季后，經濟情況終于開始好轉。有段時間索非亞糧食缺乏，她還把小女兒送到鄉間和祖母生活。她也正在考慮辭去議會的工作，因為議會變得太鉤心斗角，無法讓她覺得自己正在做些有用之事。反對勢力民主力量聯盟對于她而言，也變得太過保守。她以一貫的敏銳性分析，民主力量聯盟內部已經有了一小群人，目的不在追求任何目標，而只是“維系機構本身的永久性”。她覺得追求共同理想要比維系職業生涯或官僚體系還要重要的那段短暫時光，已經成為過眼云煙。從現在開始，政治回歸政治，唯一的不同在于對國家事務的高度幻滅感。

不過讓迪米特里娜感到最為痛苦的是缺乏時間。她很想多花點時間陪女兒，但是突然間她變得比以前更加忙碌。她想創刊的雜志很難發行，她需要募款，而議會有議會的事，迪米特里娜覺得自己每件事都無法做好，好像，她比了一個姿勢——手中抱著一堆西瓜，結果全滾到地上去了。我想保加利亞這句話的意思，就像雜技演員同時把太多的球拋到了空中。“我可以用些精神分析，”她說，“我們很多人都需要。”

“歡迎來到后現代，”我說，“精神病理學家是一定會跟著來的。”

完整聽過德揚的故事，我只意外地覺得自己對其梗概有多么熟悉：他這一代東歐人擁有的共同歷史特征實在是太強烈了。就像許多東歐異議分子領袖一樣，他是那些迭經各種懷疑與幻滅，卻仍留在黨內的早期理想主義共產黨員的兒子。德揚本人則以其特殊的方式，歷經信仰、修正、懷疑、絕望與異議等過程，那種種我都相當了解。

但德揚的敘述中有一個保加利亞獨具之處，在于他和他父母的故事間的關聯性。保加利亞的反對活動遲至1980年代中期才開始，德揚曾積極參與，無役不與。但是這期間最令人驚奇的意外，是在一段痛苦的不和后，盡管只有短短一段時間，他和父母竟然歸屬于同一方。在雙方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父母和他都加入了開放與改革俱樂部（Club for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亦即日后反對勢力的雛形。他們是在去參加第一次會議的途中，才發現彼此所前往的是同一個地方。對于他那仍在黨內的雙親而言，這是相當冒險的一步；但他們黨內有好些同志也都去參加了。

另一個重要的保加利亞獨具之處是，在改變后，德揚的雙親決定重新加入他們的黨。當執政最久的獨裁者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27]](#_27_9)1989年決定下臺時，共產黨也表達了改革的意圖。德揚的父親不久前才因為從事異議活動而遭到開除，結果不但受邀恢復黨員資格，還被提名為政治局的成員。意外的是，德揚竟然勸他接受。“我們很理智地考慮過這些事，”德揚說，“我告訴他，去吧，你是從那里開始的，盡你的全力去做！”顯然，當時連德揚也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共產黨可以變得更好。

過去一年，德揚對父母黨內新角色的態度變得相當復雜。“對我而言，他的最好還是不夠好。”他談起自己的父親，語氣出奇地強硬。不過，自始至終，他從未批判過他父母的信念。當他談起父母，尤其是談到母親時，語氣中有坦率的不以為然、誠摯的尊敬和一種對自己倚重最深者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形容自己的母親是一個“激進的”獨立、正直的人。最近，他也據此批判自己的母親人生中第一次變成了一個“美國妻子”，換言之，一個盲目支持自己丈夫的妻子。不過，從他的批評中，仍可察覺他對自己母親的期許。“其實她還好，”德揚說，仿佛刻意壓抑對自己母親的極度驕傲，“我想你會發現，她還不錯。”

德揚不是唯一一個對他母親推崇備至的人。始終維持娘家姓的伊斯克拉·帕諾娃（Iskra Panova）在索非亞享有近乎狂熱的聲譽。人們談起她，都說她是個極有魅力的老師。她曾經在索非亞大學教授過法國文學，是個具有勇氣和同情心的傳奇人物，是少數不可企及、不容懷疑的人物之一。

不過在我們見面的前幾分鐘，帕諾娃和一般和藹的家庭主婦幾乎沒有兩樣，擔心自己家里是否整潔。其實，她的公寓一塵不染，擺設著19世紀的木質家具和物件，帶有漂亮的本地風格雕工。七十余歲的帕諾娃身材嬌小玲瓏，面孔美麗溫和，一邊臉頰上有顆很深的酒窩，鏡片后一雙大眼睛，眼神仁慈而專注。不過她的聲音比想象中還要響亮且低沉，是她個性堅強的第一個線索。她起先不太愿意和我交談，可一旦獲得她的同意，聊起天來后，她就毫無保留地坦率與慷慨。

她言談中也極具雄辯的威力，我留意到這是她那一代共產黨員的共同特點，具有勸服的力量，或許也表達了采取行動、向外在世界發展的心志，而非走向內在和自我懷疑。和許多共產黨員一樣，她擁有非凡的歷史記憶。在她的詮釋中，保加利亞共產黨過去五十年的興衰，就像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經歷一樣歷歷如繪，彼此交織為一。

她的傳記也落入熟悉的動蕩模式。到現在，我已經熟悉了其中的大部分元素。諸如她父親是早期共產黨活躍分子，她自己在監獄和勞改營有過一段歷練。在戰爭剛開始時，她曾因參與反法西斯活動而被判處死刑，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等待執行死刑的經驗；但在最后一刻，她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直到戰爭快結束時才獲釋。在囚禁期間，她歸納出一些比意識形態更基本的結論。“我本身算是個人主義者，”她說，“但是生活在一個過分擁擠的牢房中，你會開始想，到底是在人群間比較好，還是單獨一個人比較好？我決定還是在人群中比較好。這些也許是簡單的問題，卻也是深刻的。監獄就像個教授友情和團結的學校，里頭決定了太多人的命運，需要互相幫助。比如，我們知道何時會執行死刑，會看到那些等待處決的人。我們學會如何跟他們相處。不管如何，人都可以獲得深刻的結論，會發現價值的所在，而那些價值都會留在你體內。”

有段時期，她從事正式黨職，然后懷疑的種子開始侵蝕。戰后她擔任一家青年雜志的編輯，但是因為某個原則問題而辭職，成為文化部部長，之后嫁給了她的副部長。“我負責理論，他負責組織。”她幽默地敘述。接著她決定轉向“真正的科學”，亦即語言學，她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后來，帕諾娃因為偏好俄國早期結構主義[[28]](#_28_9)而非斯大林主義流派的語言學，以至于惹上麻煩，這也讓我得以窺探本地知識界的復雜性。她和先生也于日內瓦為聯合國工作過一段時間，正逢捷克遭到入侵的“黑暗”消息傳來，因而決定脫離黨內主要活動，而成為文學協會獨立的異見者。

保加利亞的轉折來自較近期的階段。保加利亞目前那相對而言比較沒有報復性仇恨的政治氣候，或多或少是因為自一開始許多改革派的共產黨員便和反對運動有關。保加利亞戰后第一任總統熱柳·熱列夫和五名黨員創立了開放與改革俱樂部。帕諾娃對此并不表示驚訝。“是黨本身讓他們改變了意見，”她說，“部分因為黨教導他們要從政治的立場考慮事情，部分也因為黨本身可惡的作為。”

帕諾娃覺得“比較神奇的”是反叛的黨員接到最后通牒，要他們在政黨和俱樂部兩者之間做選擇時，每個人都選擇了俱樂部。

接下來的轉折來自改變之后，她和其他一群共產黨員最終決定脫離新成立的反對聯盟，重新回到黨內。為什么？

“在第一次圓桌會議討論中，有些令人困擾的傾向，”她回憶道，“那里有種原始的反共產主義，一種反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反民主主義。我在政治場中太久了，你知道吧，我很清楚這些傾向會如何發展。甚至現在我就可以看出來它們會逐漸開花結果，我可以看到反動傾向正在萌芽。”

就這個觀點而言，她的看法和德揚相當接近，他也對同樣的傾向深表擔心。不過德揚選擇退出直接的政治行動，帕諾娃則決定重新介入戰斗，在她原有的舞臺上打一場新的戰爭。出于某種原因，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已經重新獲得了足夠的信賴，爭取到像帕諾娃這樣忠心耿耿的衛士。正如帕諾娃所言，也許是因為這里的共產黨“不是進口的”，它有著本土的根源。雖然犯下不少暴行，卻沒有摧毀國家的經濟命脈，保加利亞因而成為共產主義的東歐集團中，唯一經濟獲得發展的國家。

總之，帕諾娃就像其他采取同樣路線的自由派共產黨員一樣，熱切地相信他們的黨可以改造，可以成為一個良善的勢力。在上次代表大會后，“它已經開始走出過去了”。

她希望她的黨能真正擺脫過去，重拾古老的理想主義核心，也就是當初吸引她的那一部分。不過她所忠于的也是真正的過去，盡管有那一切痛苦糾結。“我們的歷史，那漫長的歷史，”她的聲音逐漸揚升，“那是此刻還可以把我們維系在一起的力量。所謂的我們，包含了那些在勞改營的老共產黨員，那些眼睜睜看著別人在監獄里遇害的人。說來辛酸，太多過去的囚犯現在成為彼此的敵人。許多當年我在監獄里認識的女人，現在再也無法和她們說話了。還有許多1940年代被處決的同志，如果能活到今天，也會變成我無法茍同的人。英雄變成殺手，不過那些被殺害的人也奉獻了自己的生命。這些是深層的結構，是我們之間深層的關系。”

“幾年前，”她追溯道，“德揚告訴我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使命，應該把我的理想傳遞給他了。這個嘛，我不想傳遞我的理想。我雖拒絕了舊旗幟，但是舊有運動的觀念仍然是我認同的。這是我們必須保留的，不是作為過去的遺物，不是作為舊日的紅色女性，而應該將之作為一粒種子，可以繼續栽培。”

她信念的強烈令人感動。她雖然沒有把“運動”傳遞給德揚，卻傳遞了某項更為深刻的東西。在言談間，我告訴她我很敬佩她擁有充沛的希望力量，讓她得以有效地重新開始；她聞言即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她需要，也期望能擁有這股力量，因為經驗告訴她，大部分的希望其實只會導致失望。“我有一種算法，”她說，“要達到你希望的百分之三，你需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力量。但是我也有一個原則，乍聽之下也許很荒謬，但是對我卻很有幫助，那就是如果一個人一開始就做些保證可以成功的事情，那對他其實并不好。其中也蘊含了一個道德信條：如果你已經做過分析，那么不管是好是壞，你都必須遵循，即使你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或會把你帶向何處。”

依據道德信條采取行動，承受自己分析的結果，是這對母子共有的對于生命的反思。此刻德揚的分析正帶領他導向非常不同的結論。“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套信念，”他說，“如果我理智地做事的話，就要闡釋另一套新的信念。”

換句話說，他正在進入一個更為個人化、更為多元的世界，這或許是他的母親永遠不愿去做的。在這個跨越中，他希望能跟過去完全切割。“忘掉過去，”他以近乎憤怒的口吻說著，“讓我們往前走吧。過去對我們不會有幫助。我不愿我的孫子輩知道那些，連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往后看只會給我們一個錯誤的概念，以為我們真的知道我們在做什么，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喔，是的，我們已經用各種方式企圖加以分析了，我們有數學模型，我們什么都嘗試過了。我們以前有這個時間，但在這種新的情況下，那些一無所助。”

這是對急劇變化的強烈反應，也是一種非常后現代的歷史觀。有時候，過去不會照著邏輯推展到現在；有時候，經驗的“教訓”本身就有誤導性，因為歷史是不會重復的。這種強烈的反應，就某一方面而言，跟他母親其實是一樣的。他們所選擇的道路十分不同，但是其中強烈的洞察力和正直的信念卻是共通的。在保加利亞特殊的政治氣候中，這種延續的形態在將來或許會有用，或許可以使繼續前行不用背負太多苦澀的心理。

在索非亞諾富特（Sofia Novotel）酒店一間中性格調的整潔房間中，我蜷著身子捧讀在布達佩斯書店買的一本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29]](#_29_9)的小說。看這本小說純粹是為了逃避——應該沒有比從東歐到艾麗絲·默多克的小說世界更遙遠的距離了。不過結果一如以往，一個人閱讀的東西要么呈現出心中所求，要么就是這閱讀回應了需求。《神圣與世俗的愛情機制》（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這本小說，正如其自白中所說，是對“歷史人物的沉悶小說”的反制。每個人物都活在一連串無法預期的翻天覆地中，接下來什么都可能發生，事實也正是如此：一場美滿的婚姻突然發生令人震驚的外遇事件，分手、重新聯系、偶然與意外。正如書中人物都設法從自己的立場取得某種控制與秩序，但層出不窮的事件卻仿佛自有其獨立的生命般。現在不再是過去之因所結的果，人物不是命運。

的確如此。這是對東歐近代歷史最好的說明了。誰會在1979年，甚至1988年猜到1989年是重要的一年？然而，即便只關乎自己，我依然懷疑我們能否活在完全的偶然中，而不涉及一些比較深層的聯系。“歷史人物的沉悶小說”。是的，如果全部還原成過于武斷的推論，那的確是沉悶的：我怕貓，因為我母親打過我；我喜歡夕陽，只因為那是爸爸回來的時刻。但是生活在一連串不銜接的片段間，會導致另一種宿命論：如果我們的生命就是一件接一件該死的事，那我們還要做什么呢？我可以理解東歐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爭相攀附某種替代的信仰機制，因為如果沒有信仰，沒有懷抱一點對未來的希望，沒有一些或許虛幻但卻必要的虛構，人們就很難形塑自己眼前的生命。

一個晚上，我和替代社會主義黨（Alternative Socialist Party）這個小型的議會外黨派的幾名成員聚會，他們的座右銘為“用好心情從事政治”。我想這個座右銘對世界各地的政黨應該都派得上用場。聚會的氣氛當然相當友善。一名該組織的創始人問我，他們的黨可以在美國順利運作嗎。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們肯把社會主義這個詞拿掉的話，也許吧！”

達維多夫·阿森（Davidov Assen）是一個愛打趣的幽默的人，最近剛成為克萊門特奧赫里德大學哲學系系主任。他想起自己那位身為共產黨官方哲學家的祖父，早年曾卷進麻煩中，只因在文章中言及“仿效”列寧。

“如果不仿效他，那應該拿列寧怎么辦呢？”我問，對專政下知識界的規矩中這一新的調整深感困惑。

“當然是研究和尊敬他啦！”阿森回答。

這個話題讓另一名成員想起他們那個主要由哲學家組成的“牢房”是如何捍衛熱柳·熱列夫的。熱柳·熱列夫目前已是保加利亞總統，但當年他曾寫了一本關于法西斯主義的書，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另一名成員也提及他們當年遭遇的真正麻煩，因為他們沒有充分贊譽托多爾·日夫科夫女兒寫的一本書。就他們看來，那個女兒是個精神分裂者；但是對托多爾·日夫科夫而言，卻是“圣人中的圣人”，比馬克思主義的十個基本信條更觸犯不得。

他們現在可以暢所欲言有關戰爭的故事，那對他們宛如記憶猶新的一場鬧劇。

其后，阿森令人困惑地簡短描繪了他本人意識形態的曲折之旅：從一個成長于莫斯科的年輕先鋒，變成正統的神學士——即便他是猶太人——然后成為修正主義馬克思信徒，最終成為一個懷疑論者，在組織內部進行反組織斗爭。

現在呢？“啊！現在更難了，”他承認，“現在有了真正的選擇權。以前，你甚至無法選擇成為英雄還是犧牲者。像我認識一個人，他寫的東西讓他惹上很大的麻煩——他曾經一度成為英雄，但后來被黨召回并得到晉升，結果卻成為一個越來越可怕的人。”

“不過并非無法控制。極權主義是整體性的，所以才叫作極權主義，在內部沒有辦法撥弄它，你得跟它共存共榮。”

“現在每件事都是一個決定，一個性格的象征。比如現在有可能送我女兒到國外讀書。比如在我們系里有這樣的問題：是要雇用一個以前的權貴分子，還是雇用一個居心良好，卻比較沒有能力的人。這些是真正自由的選擇。”

無論是大規模的還是小規模的，個人層面的還是政治層面的，這都是緩慢、戲劇化、難以捉摸和史無前例的變化中，最簡單的本質。而在種種可能的變量，包括遺憾、懷舊、苦澀、報復、執著的記憶和自我欺騙的遺忘等等當中，達維多夫·阿森找到了一種銜接過去和現在的方式，似乎是真正自由的，也是真正解放的。

我問他，他過去的經驗是否有助于應對今日的種種。

“啊，我對過去沒有一點遺憾，”他回答，“因為其一，這是政治和人性方面一次鮮活的體驗。但這讓我想起尼采，”他繼續說道，“尼采曾說：‘那是生命嗎？是真正的生命嗎？那就開始吧！’所以我也這樣說，”他以此作為總結，兩眼閃閃發光，“我說，就讓這一切開始吧！”

[[1]](#_1_12)伊利里亞，歐洲歷史上的一個地區，在一些文藝作品中，伊利里亞被視為遙遠、奇異及幻想的國度之名，如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

[[2]](#_2_12)俄耳甫斯，古希臘神話中的音樂家和詩人。

[[3]](#_3_12)古色雷斯，東歐歷史學和地理學上的概念。今天的色雷斯包括了保加利亞南部、希臘北部和土耳其的歐洲部分。

[[4]](#_4_12)一家總部位于加拿大多倫多的出版公司，主要出版言情小說及女性小說。

[[5]](#_5_10)通行于大多數斯拉夫語民族的字母書寫系統。必須要說明的是，西里爾字母并不是西里爾發明的。西里爾發明的是格拉哥里字母，西里爾字母是西里爾的學生克萊門特在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的奧赫里德人文學院對格拉哥里字母進行簡化而產生的。

[[6]](#_6_10)阿提拉（406—453），古代歐亞大陸匈奴人最為人熟知的領袖和皇帝，史學家稱之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領大軍入侵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并對兩國構成極大的威脅。在西歐，他被視為殘暴及搶奪的象征，而古北歐的薩迦文獻則形容他是一個偉大的皇帝。

[[7]](#_7_10)一座新拜占庭式的東正教大教堂，是東正教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是巴爾干半島最大的教堂。

[[8]](#_8_10)此處作者似乎搞混了，民主力量聯盟的英文應是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縮寫為UDF。

[[9]](#_9_10)波格米勒異端教派，10世紀時成立于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呼吁回到早期基督教，拒絕教會的層級結構，其主要的政治傾向是反對國家和教會當局。

[[10]](#_10_10)熱柳·熱列夫（1935—2015），1990—1997年間擔任首位民選保加利亞總統。

[[11]](#_11_10)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在1920年代旅居巴黎的歲月。

[[12]](#_12_10)斯坦尼斯瓦夫·萊姆（1921—2006），波蘭科幻小說作家。他的作品常探討哲學主題：科技的影響、智慧的本質與外星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人類能力的限制等等。

[[13]](#_13_10)艾薩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科普作家，美國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14]](#_14_10)索邦大學，成立于13世紀，為巴黎大學前身。

[[15]](#_15_10)指保加利亞文藝復興時期，乃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時期，約1762—1878年。

[[16]](#_16_10)博特羅（1932—），哥倫比亞畫家和雕塑家，以描繪體型肥大夸張的人物聞名。

[[17]](#_17_10)夏加爾（1887—1985），出生于俄國的猶太人，后移居法國和美國，超現實主義畫家。

[[18]](#_18_10)這個隱喻出自《圣經·詩篇》103:15-16：“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再認識他。”

[[19]](#_19_10)皮拉內西（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師。

[[20]](#_20_10)此處原書有誤。保加利亞第二帝國1185年成立，1083年保加利亞大體上為拜占庭所控制。

[[21]](#_21_10)柯特茲（1894—1985），匈牙利攝影師，以在攝影構圖和專題攝影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著稱。生前未獲普遍重視，但現今卻被認為是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攝影記者之一。

[[22]](#_22_10)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法國攝影師，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

[[23]](#_23_10)接近攝氏三十八度。

[[24]](#_24_10)意大利地中海岸著名的避寒勝地。

[[25]](#_25_10)只有一個表面和一個邊界的結構，由德國數學家、天文學家莫比烏斯和約翰·李斯丁在1858年獨立發現。這個結構可以用一個紙帶旋轉半圈再把兩端粘上之后形成。

[[26]](#_26_8)麗貝卡·韋斯特（1892—1983），英國女爵士，作家、記者、文學評論家。西塞莉·費爾菲爾德（Cicely Fairfield）的筆名。

[[27]](#_27_8)托多爾·日夫科夫（1911—1998），于1954—1989年擔任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為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

[[28]](#_28_8)社會科學流派，側重對結構的認識，提倡一種整體的科學，透過表面現象尋求底層的關系，以期獲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結構，是20世紀后期分析研究語言、文化與社會的流行方法。

[[29]](#_29_8)艾麗絲·默多克（1919—1999），出身愛爾蘭的作家，受封為女爵士，1978年出版的《大海，大海》曾獲得布克獎。

# 后記

從索非亞出發的回程中，飛機在貝爾格萊德機場降落過境。大家都專心地抬頭看頭頂上電視里的新聞，我卻被大廳的閃亮精品店吸引了注意。干凈的鉻合金玻璃、閃閃發亮的商品！我并不算是個抗拒不了購物欲望的人，但是在好幾個月缺乏這種簡單的快樂后，我似乎深深感覺自己運用消費者選擇的權利遭到了剝奪，所以才會像個饑渴于糖果的孩子一樣，把鼻子擠到玻璃展示櫥窗前，根本沒試穿就買了件衣服。我的天啊！反正就是要買點什么東西。結果那件衣服根本穿不上。

隔天我就搞清楚了那些人為什么會那樣專心地看電視了，原來南斯拉夫暴發了反抗行動。有一瞬，我為當時的輕浮感到愧疚，但是我不太相信那個消息。在我走過的那部分東歐，對經驗、戰爭記憶和欲求常態的控制，在我眼里似乎都已堅定到足以鎮壓更為憤怒的情緒。不過在南斯拉夫，激情依循著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發展出某種糟糕的可能。

回來后，紐約好像比以往還要極端。浮華和退化，這兩者在東歐都極罕見。重返紐約后的幾個月里，東歐人的聲音總是在夜里叫醒我。一個羅馬尼亞經濟學家從哈佛打電話過來，用一種滿是迫切的聲音說他有多想證明自己，想要做好……“這里有這么多偉大的人。”他近乎絕望地說。“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我鼓勵道。“噢，謝謝你，謝謝你這么說！”他激動地說，好像我剛丟給了他一條生命線。一位保加利亞籍的年輕女子從艾奧瓦大學打電話給我，用喘不過氣來的小聲跟我說幾天前發生在校園內的謀殺案。“很抱歉打擾你，可是我沒有辦法直接打電話給保加利亞那邊的人，告訴他們當這些人被殺時，我事實上就待在房間里，”她致歉道，“他們不會明白的。”

在紐約街頭，波蘭語是此間七種左右的常用語之一。他們來了，東歐人來了，近距離地觀察我們，如同我們現在可以觀察他們一樣。世界徹底變得流動，而且互相滲透，不過也變得更加分離。或許正是互相滲透才產生了分離的需求，在讓路給我們這個世界的混雜現實前，那零散、反復在東歐某些地區上演的超大國主義，可能是民族身份的最后象征。

那些事實依然在東歐存在，在變遷流動中上演。在我旅游過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兩個國家，波蘭議會通過了一個倒退的反墮胎法案，匈牙利反猶太人的余燼繼續攪動著。與此同時，除了羅馬尼亞之外，大部分地區的基本經濟趨勢無疑是向上的，失業狀況也沒有預期中的那么普遍；而即便是羅馬尼亞——那里的礦工又被政府召喚去幫忙——也不見戲劇性的對民主的濫用。在我走訪的大部分國家，社會安全結構——像是免費教育和免費健康醫療等——姑且不論質量，也都還在。換句話說，消息是比希望的更好，也比害怕的更壞。在最初的歡欣鼓舞之后，東歐人本身即敏銳地意識到他們處境的限制：社會改變，還有經考驗證明可信的社會體系的有限性。這些限制也源于他們國家的經濟崩潰，源于無法光靠好意就摧毀或者重建的物質世界的艱困。如果改變某種程度上是復古的革命，那它們同時也是懷疑的革命，是去除了天啟希望的革命。

在烏托邦理想的缺席中，在他們自稱的自由規范和保守拉扯力量的混合里，這些更溫和的東歐社會正在仿效我們這當代的“正常”世界，而且剛好在一個我們的社會安排的缺點也變得明顯的時間點歸隊。在我們這邊，持續把東歐當成我們投射的一個屏幕來觀察的誘惑依然強大，那里依然是個廣闊的區域，也可視為道德的荒野保留地，應能幸免于西方更深的腐敗。鐵幕已經升起，可是想象的簾幕得花更長一點時間才能升起，而如果我們因此而傾向于對冷戰的懷舊，或是為東歐人最終變得和我們太相似而暗自失望，我都不會驚訝。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我認為東歐應該不算是個投影，而是倒過來，是一種自我反射。只要它不斷嘗試，想要變得更像我們，東歐在某種意義而言，就是對我們立場的檢驗。那里的社會目前是個實驗室，里面的一切都被從碎片中重新定義，而且是在我們世界的語境下、以我們的術語來重新定義。因此，他們等于是在間接地挑戰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世界到底是什么，還有我們想要世界包含什么；其中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又是該被指責的；什么是我們會建議我們友善以待的人采納的，什么又是該丟棄的。我們真的要建議某些人希望東歐人采納的純粹的唯物主義嗎？又或者，對于這個問題，純粹的非唯物主義？對我來說，變化所帶來的一個潛在的振奮人心的影響，是它們顯然攪動了經常讓人郁悶的過時分類，那是我們在社會辯論中習慣用來自我定位的分類。

確實，如今東歐人所面對的挑戰之一，也是能夠理解他們的人所面對的挑戰之一，是調整分類、濾鏡，甚至是情感，透過那些來了解他們的經驗，以跟上變動中的經驗本身。但是后來者也可能有某些優勢。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_1_15)就曾經說美國是這世上最古老的國家，因為論進入現代化，它是第一個，而東歐有可能是某種東西的先鋒：是與我們還未信服的某種方式不同的“第三種方式”。就像現實當中的所有實驗，那雄偉、復雜的東歐經驗既已成定論，也是全然流動的。它的結果只能隨著時間漸次呈現，也可能——或許是幸運的——永遠都不會有最后的論定。

紐約

1993年4月

[[1]](#_1_14)格特魯德·斯坦因（1874—1946），美國作家與詩人，但后來主要在法國生活，并且成為現代主義文學與現代藝術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 致謝

對于本書在出版過程中各個階段所受到的殷切關注，我深感榮幸，尤其感謝維京企鵝出版社（Viking Penguin）的帕梅拉·多爾曼（Pamela Dorman）和海尼曼出版社（Heinemann）的湯姆·韋爾登（Tom Weldon），感謝他們在編輯稿件過程中所展現的耐心、理解和機智；還有兩家公司編輯部所有善解人意、總是好脾氣地與我共事的人，尤其是維京的帕里斯·沃爾德（Paris Wald）與貝恩·坎拉尼（Been Kamlani），以及海尼曼的薩拉·漢尼根（Sarah Hannigan）。真心感謝我的經紀人喬治斯·博哈特（Georges Borchardt）冷靜和睿智的引導；他辦公室的同仁一貫可靠及友善，尤其是亞歷山德拉·哈丁（Alexandra Harding）和丹尼絲·香農（Denise Shannon）。艾爾茲別塔·瑪蒂尼亞（Elzbieta Matynia）和伊萬·桑德斯（Ivan Sanders）一開始就給予了莫大的協助；琳達·班貝爾（Linda Bamber）、雅努什·格沃瓦茨基（Janusz Głowacki）、彼得·霍金斯（Peter Hawkins）、埃娃·庫雷盧克（Ewa Kuryluk）、瑪爾塔·彼得斯韋茲（Marta Petrysewicz）和勞里·斯通（Laurie Stone）在本書成形階段提供了兼具洞見與同理心的反饋；薩拉·貝爾施特爾（Sara Bershtel）敏銳地審視原稿，她和桑迪·麥克拉奇（Sandy McClatchy）的熱情鼓勵給予了我莫大助力；他們的支持和興趣對我意義非凡。

此書的撰寫獲得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慷慨贊助；哥倫比亞大學（Colombia University）東中歐學院（Institute on East Central Europe）邀我擔任訪問學者，讓我得以進入大學圖書館，后來在某種程度上證實這是相當重要的經歷；而待在雅朵（Yaddo）和麥克道爾文藝營（MacDowell Colony）的幾個禮拜，使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思路。深深感謝所有機構。

我去的這五個國家中有很多人，若無他們的慷慨、開放和殷切招待，我絕對無法進行或者完成這項工作，在此無法一一向他們表示感謝。在一本類似這樣的書中，作者只是媒介，而不是演員，而對于所有陪伴著我走過整段旅程的東歐人，例如夏爾巴族（Sherpa）向導、維爾吉爾（Virgil）、各位東道主及朋友，我衷心盼望他們能感到這本書也是為他們而寫。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Kindle圖書共享】（ID:DZSGX8）制作分享，

掃一掃下方二維碼關注我們，免費下載更多優質Kindle電子圖書。



你不是一個人在讀書！

掃碼關注我們，與兩千萬書友一起享受閱讀。

（本書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果閱讀后覺得好，請購買正版書籍！）

